

目 录

本卷前言 8-1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1921年4月)

专题说明 8-1

No10536 关于向工人预科学员供给物资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2

No10537 关于统计播种面积和牲畜数量的命令
(1921年4月1日) 8-3

No10538 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条件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4

No10539 关于保证用汽车将粮食从西伯利亚等地运出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6

No10540 关于满足勒拿采金工业公司劳动力需求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10

No10541 关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等港口施工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11

- №10542** 关于保证彼得格勒商港供应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12
- №10543** 关于把皮锹套移交制革业总委员会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14
- №10544** 关于将运土袋、金属丝移交民用部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15
- №10545** 关于将描图纸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16
- №10546** 关于将栓钉、铁钉和扳子移交民用部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17
- №10547** 关于将前募集到的物资移交地方民用部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18
- №10548** 关于把包装袋和粗席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包装局
的决定(1921年4月1日) 8-19
- №10549** 关于把望远镜移交军械总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20
- №10550** 关于把有关物资移交军用日杂物品总管理局的决
定(1921年4月1日) 8-21
- №10551** 关于将军事物资移交民用部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8-22
- №10552** 关于将有关汽车队工作人员列入优待口粮专供范
围的决定(1921年4月1日) 8-23
- №10553** 关于金卢布兑换比价的决定
(1921年4月4日) 8-24
- №10554** 要求各省完成肉、油、禽蛋原定收集任务的命令
(1921年4月4日) 8-25

- №10555** 关于削减粮食供应的措施的决定
(1921年4月5日) 8-26
- №10556** 关于亚马尔半岛勘察工作的组织和任务的法令
(1921年4月6日) 8-28
- №10557** 关于顿河-高加索边疆区粮食委员会问题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8-30
- №10558** 关于向电讯设施修护连和通信连的红军官兵提供
前线口粮的决定(1921年4月6日) 8-31
- №10559** 关于禁止彼得格勒防务委员会发放计划外食品的
决定(1921年4月6日) 8-32
- №10560** 关于开通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利斯基线铁路
的决定(1921年4月6日) 8-33
- №10561** 关于开通洛佐瓦亚-斯拉维扬斯克线铁路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8-34
- №10562** 关于重新审议拆除格拉祖诺夫和季诺维也夫铁路
支线地区钢轨问题的决定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8-35
- №10563** 关于协助矿业委员会挖土机局工作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8-36
- №10564** 关于停止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征收汽车和机
床工作的决定(1921年4月6日) 8-37
- №10565** 关于将大麻纺织业列为突击工作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8-38
- №10566** 关于修订大麻纺织品种的生产任务以及有关确保
通航期木材流送和水路运输所需缆索措施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8-39
- №10567** 关于起草建立交换储备和实物奖励形式的决定草
案的决定(1921年4月7日) 8-40

- №10568** 关于原料收集的决定 (1921年4月7日) 8-42
- №10569** 关于确保1921年的泥炭运动顺利进行的决定
(1921年4月7日) 8-44
- №10570** 关于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享有特赦权以及暂缓
执行死刑判决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8-47
- №10571** 关于红军复员问题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8-48
- №10572** 关于加强土豆种子的收购和运输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8-50
- №10573** 关于扩大向日葵的播种面积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8-51
- №10574** 关于完成机械犁的定货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8-53
- №10575** 关于从国外进口煤炭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8-55
- №10576** 关于向泥炭工人供给高筒鞋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8-56
- №10577** 关于加紧采购和运送油脂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8-57
- №10578** 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申请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8-58
- №10579** 劳动国防委员会给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1921年4月8日) 8-59
- №10580** 列宁和瞿鲁巴致波克罗夫斯克市省粮食人民委员
(1921年4月9日) 8-60

- No 10581** 关于要求重新审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对外贸易方面提出的申请的决定
(1921年4月12日) 8-61
- No 10582** 关于认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纺织厂的工作为突击工作的决定
(1921年4月12日) 8-63
- No 10583** 关于向莫斯科等地执行委员会提供购粮援款的决定 (1921年4月12日) 8-65
- No 10584** 列宁和尼·巴·布留哈诺夫关于征收专用马铃薯问题的指示 (1921年4月12日) 8-67
- No 10585** 给各省粮食委员的电报
(1921年4月12日) 8-69
- No 10586** 关于把军队员额减至153万人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70
- No 10587** 关于安排1892~1895年出生的军人复员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72
- No 10588** 关于保留长期休假的红军战士的军服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74
- No 10589** 关于批准麻制缆索利用计划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75
- No 10590** 关于调拨15万普特大麻纤维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77
- No 10591** 关于关闭莫斯科-梁赞铁路伊诺科夫卡-因扎维诺段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78
- No 10592** 关于延长扩大耐火砖生产的有效期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79
- No 10593** 关于对耐火砖生产工人实行专供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80

- №10594** 关于扩大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决定的适用范围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81
- №10595** 关于以日用品奖励工人发起小组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82
- №10596** 关于向海关部门员工供应专供口粮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84
- №10597** 关于向劳动公社调拨小麦和黍子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85
- №10598** 关于特种部队的供应标准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86
- №10599** 关于草鞋分配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87
- №10600** 关于调拨3万双草鞋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88
- №10601** 关于收回面料和缝纫线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89
- №10602** 关于将麻袋交包装局支配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90
- №10603** 关于将打字机交印刷局支配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91
- №10604** 关于将日用品转交地方机构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92
- №10605** 关于将挽具转交地方机构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93
- №10606** 关于不得擅自提取皮带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94
- №10607** 关于将长波无线电接收机归还巴库广播电台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95

- No10608** 关于制止盗窃流送木材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8-96
- No10609** 致各省粮食委员会
(1921年4月13日) 8-97
- No10610** 关于秋明省行政归属问题的决定
(1921年4月14日) 8-98
- No10611** 关于为哥里自治共和国境内山民分配土地的决定
(1921年4月14日) 8-99
- No10612** 列宁关于执行提供10万普特小麦种子的命令的指示
(1921年4月14日) 8-100
- No10613** 关于坚决执行停止使用直达电报商谈的决定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8-101
- No10614** 关于吸收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代表参加区域经济委员会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8-102
- No10615** 关于向顿巴斯提供技术援助问题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8-103
- No10616** 关于向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拖拉机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8-104
- No10617** 关于加强种用马铃薯的采购及运输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8-105
- No10618** 关于将在木材流送方面有专长的军人派往省劳动局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8-106
- No10619** 关于使用木制油驳运送木材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8-107
- No10620** 关于减少居民区内马匹数量的办法的指示
(1921年4月15日) 8-108
- No10621** 关于确认边境铁路车站改建工程为紧急军事工程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8-110

- №10622** 关于削减民事部门警卫人员数量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8-111
- №10623** 关于将红军战士调往民警局工作一年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8-112
- №10624** 关于优先安排扫雷艇和护卫舰再装备与维修工程
的决定(1921年4月20日) 8-114
- №10625** 关于向楚瓦什自治州调拨纺织品、鞋和其他商品
的决定(1921年4月20日) 8-115
- №10626** 关于保留公共食堂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8-116
- №10627** 关于提供汽车和摩托车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8-117
- №10628** 关于扩大同阿塞拜疆签订工贸和经济协定的委员
会的权限的决定(1921年4月21日) 8-118
- №10629** 关于组织儿童夏令营的决定
(1921年4月21日) 8-119
- №10630** 关于订阅国外出版的俄文报刊的决定
(1921年4月21日) 8-120
- №10631** 关于停止无偿向农民提供农具的命令
(1921年4月21日) 8-121
- №10632** 关于向各省执行委员会发送钞票的决定的决定
(1921年4月22日) 8-122
- №10633** 关于在审议进口计划时通过预算方案的条件的决
定(1921年4月22日) 8-123
- №10634** 关于在国外购买泥炭工业所需工厂设备的决定
(1921年4月22日) 8-124
- №10635** 关于执行削减警卫、护送勤务的决定的通令
(1921年4月25日) 8-125

- No 10636** 关于确保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公共饮食业采购鱼产品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5 日) 8-126
- No 10637** 关于向居民供应鱼、肉、面包、油脂和其他食品的计划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6 日) 8-128
- No 10638** 关于将羊毛和熟羊皮转入出口储备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6 日) 8-132
- No 10639** 关于顿巴斯等工厂职工供应标准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6 日) 8-133
- No 10640** 关于红军裁减员额后的粮食供应标准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7 日) 8-134
- No 10641** 关于撤消各地军用仓库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7 日) 8-136
- No 10642** 关于恢复勒拿金矿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7 日) 8-137
- No 10643** 关于纺织厂燃料供给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7 日) 8-138
- No 10644** 关于取消有关从叶戈尔希诺煤矿往彼得格勒运送煤炭的条款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7 日) 8-140
- No 10645** 关于将食盐运往缺盐地区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7 日) 8-141
- No 10646** 关于确保 1921 年食盐需求的决定的补充 (1921 年 4 月 27 日) 8-143
- No 10647** 关于提供货物运输工具问题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7 日) 8-144
- No 10648** 关于为西伯利亚等地粮食工作者发放皮革制服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27 日) 8-145

- №10649** 关于淘汰莫斯科病弱马匹的进度问题的决定
(1921年4月27日) 8-146
- №10650** 关于增加留在莫斯科和莫斯科省的马匹配额的决
定(1921年4月27日) 8-147
- №10651** 关于移交技术器材的补充决定
(1921年4月27日) 8-148
- №10652** 关于将技术器材移交交通人民委员部的补充决定
(1921年4月27日) 8-149
- №10653** 关于各省执行委员会定期提供当地政治局势简报
的决定(1921年4月28日) 8-150
- №10634** 关于改善产业工人的医疗服务的决定
(1921年4月28日) 8-151
- №10655** 关于成立中央和地方三人小组监督石油产品运输
工作的决定(1921年4月28日) 8-152
- №10656** 关于指挥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登记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8-159
- №10657** 关于购买留种马铃薯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8-160
- №10658** 关于恢复和发展养蚕业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8-161
- №10659** 关于恢复和发展金箔工业是突击工作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8-163
- №10660** 关于彼得格勒铸币厂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8-165
- №10661** 关于批准从国外订购器材清单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8-167
- №10662** 关于批准进口电器材料清单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8-169

№10663	关于运输工具快速检修计划所需备件申请的决 定 (1921年4月29日)	8-171
№10664	关于动用黄金储备为渔场紧急购买所需设备的决 定 (1921年4月29日)	8-172
№10665	关于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特派员提供款项的决 定 (1921年4月29日)	8-173
№10666	关于从克里木运出战利品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8-174
№10667	关于将自行车转交莫斯科市工会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8-176
№10668	关于向粮食人民委员部调拨商品储备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8-177

党和政府领导人之间的通信

(1921年1月至1923年8月)

专题说明	8-179	
№08704	斯大林就工会问题争论致克·叶·伏罗希洛夫 (1921年1月25日)	8-180
№065467	列宁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 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 信) (1921年6月10日)	8-182
№08705	斯大林致伏罗希洛夫 (1921年7月27日)	8-189
№06554	契切林就肃反人员对外事工作的干扰致列宁 (1921年10月23日)	8-190

- №06555** 列宁给契切林的回信
(1921年10月24日) 8-194
- №06556** 契切林就肃反人员问题致列宁
(1921年10月24日) 8-196
- №08706** 伏罗希洛夫就调职问题致斯大林
(1921年11月2日) 8-197
- №08707** 伏罗希洛夫就车臣问题致斯大林
(1923年1月21日) 8-198
- №08708** 伏罗希洛夫就布琼尼任职等问题致斯大林
(1923年2月1日) 8-200
- №08709** 布琼尼就担任新职问题致斯大林
(1923年8月22日) 8-204
- №08710** 斯大林给布琼尼的回收
(1923年8月23日) 8-205

关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

(1921年6~10月)

- 专题说明** 8-206
- №0436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6月29日晚间会议第44号记录摘抄(1921年6月29日) 8-207
- №0436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7月12日会议第50号记录摘抄(1921年7月12日) 8-208
- №0436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1年7月15日会议第51号记录摘抄(1921年7月15日) 8-209

目 录

- No0436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1 年 8 月 18 日会议第 54 号记录摘抄（1921 年 8 月 18 日）…………… 8-210
- No04371** 契切林就不宜撤销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问题致列宁（1921 年 8 月 18 日）…………… 8-211
- No04372**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记录摘抄（1921 年 8 月 18 日）…………… 8-214
- No04373** 克拉辛就赈济饥民委员会问题致列宁（1921 年 8 月 19 日）…………… 8-216
- No04375** 卢那察尔斯基等就赈济饥民委员会出访问题致政治局（1921 年 8 月 21 日）…………… 8-218
- No0437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1 年 8 月 25 日会议第 55 号记录摘抄（1921 年 8 月 25 日）…………… 8-221
- No04374** 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决定（1921 年 8 月 26 日）…………… 8-222
- No04370** 洛佐夫斯基就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代表团出国访问事给政治局的信（1921 年 8 月 30 日）…………… 8-223
- No0437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1 年 10 月 20 日会议第 70 号记录摘抄（1921 年 10 月 20 日）…………… 8-225

对列宁大脑的研究

（1925 年 2 月至 1969 年 10 月）

- 专题说明**…………… 8-226
- No0624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列宁研究所申请报告》的决定（1925 年 2 月 19 日）…………… 8-227
- No0624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列宁大脑的研究》的决定（1925 年 2 月 21 日）…………… 8-231
- No0625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列宁研究所问题”的决定（1925 年 5 月 22 日）…………… 8-233

- №06251** 谢马什柯就成立大脑研究所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26年1月25日）…………… 8-234
- №06252** 拉姆金就科研人员对列宁大脑研究的看法给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的报告
（1928年1月11日）…………… 8-236
- №06253** 斯捷茨基就列宁大脑研究进程给斯大林的报告
（1932年1月10日）…………… 8-238
- №062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列宁大脑的今后研究工作”的决定（1932年4月13日）…………… 8-242
- №06255** 米柳亭就列宁大脑研究工作的科学成果给斯大林的报告（1935年7月5日）…………… 8-243
- №06256**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库洛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36年2月7日）…………… 8-245
- №06257** 加里宁就列宁大脑研究结果给斯大林的报告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
（1936年5月27日）…………… 8-250
- №06258** 彼特罗夫斯基就列宁大脑研究工作情况给苏共中央的报告（1969年10月20日）…………… 8-259

苏联军方关于舰队作用的争论

（1928年5月）

- 专题说明**…………… 8-262
- №06285**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与莫斯科军区、乌克兰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及波罗的海、黑海海军司令联席会议速记记录（1928年5月8日）…………… 8-264

布哈林同斯大林的争论

(1928年7月至1929年4月)

- 专题说明 8-276
- №01642 索柯里尼柯夫就中央全会事致加米涅夫
(1928年7月9日) 8-278
- №05904 布哈林在1928年联共(布)七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28年7月10日) 8-279
- №11865 加米涅夫所作同索柯里尼柯夫电话交谈的简要记录
(1928年7月11日) 8-300
- №11866 加米涅夫所作同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谈话的简要记录
(1928年7月11日) 8-302
- №11867 加米涅夫关于同布哈林谈话的便函
(1928年7月11日) 8-307
- №11868 加米涅夫对同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谈话简要记录的补充
(1928年7月11日) 8-308
- №11869 索柯里尼柯夫同加米涅夫谈话的简要记录
(1928年7月12日) 8-311
- №11870 K. 和 П. 两同志和加米涅夫的会见和谈话
(1928年9月22日) 8-312
- №11871 中-右派集团内部(莫斯科来信)
(1929年3月20日) 8-316
- №08320 布哈林在1929年联共(布)4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29年4月18日) 8-323

布哈林的清党材料

(1933年11~12月)

- 专题说明 8-392
- №06488** 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组织委员会会议记录
关于布哈林参加清党问题的摘抄
(1933年11月5日) 8-394
- №06489** 联共(布)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会议记
录关于布哈林参加清党问题的摘抄
(1933年11月10日) 8-395
- №06490** 联共(布)莫斯科河南岸区清党委员会关于布哈
林参加清党的决定摘抄
(1933年11月13日) 8-396
- №06491** 莫斯科州清党委员会关于布哈林参加清党的报告
(不晚于1933年11月15日) 8-397
- №06492** 布哈林在清党大会上的报告
(不晚于1933年11月21日) 8-398
- №06493** 布哈林在清党会议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1933年11月21日) 8-416
- №06494** 清党委员会关于布哈林的决定
(1933年12月13日) 8-450
- №06495** 莫斯科州清党委员会主席的请示报告
(1933年12月13日) 8-453

布哈林案件

(1937年2月至1938年3月)

- 专题说明** 8-454
- No05905** 布哈林在联共(布)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
的发言(1937年2月26日上午) 8-455
- No05907** 李可夫在联共(布)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
的发言(1937年2月26日上午) 8-482
- No05909** 叶若夫在联共(布)1937年2~3月中央全会上
的发言(1937年2~3月间) 8-496
- No05906** 联共(布)1937年2~3月中央全会布哈林和李
可夫专案委员会会议记录
(1937年2月27日) 8-511
- No05903** 布哈林给斯大林的信
(1937年12月10日) 8-514
- No05908** 布哈林给拉林娜的信
(1938年1月15日) 8-520
- No03359** 布哈林在“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中的最后陈
述(1938年3月12日) 8-523
- No05902** 布哈林的赦免请求书
(1938年3月) 8-548

关于布鲁西洛夫回忆录问题的调查

(1925年2月至1962年7月)

- 专题说明 8-550
- №087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第47号关于布鲁西洛夫出国事宜摘抄
(1925年2月5日) 8-551
- №08712 伏龙芝就发给布鲁西洛夫外交护照问题致俄共(布)中央(1925年3月21日) 8-552
- №08713 伏罗希洛夫就布鲁西洛夫妻子出国治疗事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5月6日) 8-553
- №087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1号记录关于批准布鲁西洛夫一家出国治疗的决定摘抄
(1927年5月12日) 8-555
- №087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关于批准布鲁西洛夫一家出国治疗问题摘抄
(1930年2月28日) 8-556
- №08715 关于布鲁西洛夫手稿使用问题给马林的信
(1956年7月14日) 8-557
- №08717 别洛夫就研究有关布鲁西洛夫的文献资料问题致苏共中央(1961年3月30日) 8-558
- №08722 佩列别利钦就调阅回忆录一事致苏共中央
(1961年6月2日) 8-560
- №08716 苏共中央书记处1961年4月19日会议第182号记录摘抄(1961年6月6日) 8-561

- №08724** 希利娜就转交回忆录等致佩列别利钦
(1961年6月7日) 8-562
- №08723** 伊瓦舒京就归还资料致苏共中央
(1961年11月16日) 8-563
- №08721** 有关阿·阿·布鲁西洛夫资料综述
(不晚于1961年11月17日) 8-564
- №08719** 扎哈罗夫等给苏共中央的关于布鲁西洛夫问题的
总结报告(1961年11月17日) 8-576
- №08720** 苏共中央关于布鲁西洛夫问题的决定
(不早于1961年11月17日) 8-579
- №08725** 科马里涅茨就笔迹鉴定问题致苏共中央行政部
(1962年6月30日) 8-580
- №08718** 米罗诺夫、马雷金就恢复对布鲁西洛夫评价问题
致苏共中央(1962年7月10日) 8-582

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巴黎会议

(1921年5~6月)

- 专题说明** 8-587
- №04016** 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会议第2号记录摘抄
(1921年5月27日) 8-589
- №04017** 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会议第3号记录摘抄
(1921年5月28日) 8-611
- №04018** 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会议第7号记录摘抄
(1921年6月2日) 8-628

阿斯特罗夫关于境外俄国难民问题的报告

(1922年6月)

专题说明	8-629
№03963 阿斯特罗夫就对境外俄国难民实施国际救援一事 给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的报告 (1922年6月1日)	8-630

【专题说明】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1921年4月)

1921年3月俄共(布)第10次代表大会决定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是为新经济政策的开始。本专题收入1921年4月一个月期间人民委员会、劳动国防委员会以及各政府机关发布的命令和决定130余件,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举凡机构设置、人员安排、生产调度、物资调拨、土地分配、粮食供应、口粮分配等等均有涉及。从中可以看出苏维埃政权转入和平时期的繁忙工作,也可看到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的交替。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刘燕明、侯静娜、任建华翻译)

№10536

关于向工人预科学员供给物资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1. 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向教育人民委员部提供 3000 套服装（包括衬衣），以供给工人预科学员。

2.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向教育人民委员部提供 3000 双鞋，以供给工人预科学员。^①

① 决定由小人民委员会委员于3月21日提出，4月1日通过，没有得到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的同意，因此问题被提到人民委员会。4月5日人民委员会讨论了此问题，决定修改第1条，仅供给500套军装。

№ 10537

关于统计播种面积和牲畜数量的命令

(1921年4月1日)

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各省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东南、乌拉尔劳动军委员会主席，巴什基尔、吉尔吉斯、鞑靼、哥里、乌克兰、土耳其斯坦等共和国。

抄送：各省统计局

播种运动已经开始。播种的结果和收成的好坏将决定共和国来年有多少粮食和饲料，并对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产生影响。请通过省统计局火速安排工作以弄清今年的播种面积和牲畜数量，并对粮食作物和牧草生长状况作不间断的统计调查，每月两次将调查结果及时上报中央统计局以便转报人民委员会。有关上述工作的实施方法和期限的指示已通过中央统计局第 893、895 号通告向各省统计局下达。你们的职责是采取一切措施协助省统计局及时完成上述任务，一天也不得拖延。工农政府将根据你们汇报的材料在确切规定的期限内制定实物税率，因此你们任何一省汇报的延误都会在有计划地安排农业、粮食和实物税征收工作方面拖政府的后腿。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1921年4月1日

No 10538

关于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条件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1) 委员会委员停止享受原有的粮食定量，其本人享受院士口粮，受其扶养的家庭成员均享受人民委员会委员口粮。

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人供给委员会根据计划委员会主席团的申请，以委员会负责工作人员和常设顾问的人数为基准，向委员会机关全体工作人员及其常设顾问拨付一定数量的苏维埃中央机关负责工作人员口粮。根据本条款提供的所有粮食由委员会主席团掌握。

(2) 每半年向委员会主席团拨付必要数量的服装及日用品，以保障委员会委员、负责工作人员、常设顾问及其家庭成员的需要。

这些物品的数量每次均由委员会主席团、粮食人民委员部登记分配局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定额处协商确定。

(3) 委员会委员在委员会的工作报酬为每人每月10万卢布，他们在其他工作岗位的薪金数额与此无关。

此外，委员会委员和特邀顾问每参加一次会议可凭号票领取1000卢布的报酬。

(4) 为给协助委员会工作以及受委员会之托完成计件工作的人员支付报酬，特向委员会主席团提供一定量的食品、鞋、上衣、布匹、日用品等，其数额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和粮食人民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委员部登记分配局、委员会主席团协商后另行确定。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539

**关于保证用汽车将粮食从
西伯利亚等地运出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鉴于共和国异常紧张的粮食状况以及必须将粮食从西伯利亚、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抢运出去，同时也为使粮食人民委员部汽车运输局各汽车场、汽车队和各机关的工作富有成效，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命令粮食人民委员部在和最高铁路与水路运输委员会协商后从其现有运输车辆中抽出 170 辆卡车，其中 150 辆派往彼得保罗—科克切塔夫区，坦波夫汽车场的 20 辆派往乌拉尔斯克运输原料。

(2) 命令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和西伯利亚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采取一切措施在粮食工作中最大限度地利用西伯利亚各部门的运输车辆，这些车辆在行动上要完全服从粮食人民委员部有关机关的调遣，车队领导则应以适当形式向其报告技术—器材和运营情况。

(3) 命令劳动国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在军用物资向民用部门移交过程中于今年 4 月 10 日前从民用和军用运输车辆（保留军事部门建制）中拨出下列数量（不包括已用于粮食工作的车辆）的运行车辆以备调遣：

(A) 给西伯利亚

向粮食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汽车场提供 100 辆卡车以备调遣，

其他地区也应能提供同等数量。

给乌克兰和高加索

提供可能数量的卡车，但供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汽车局支配的汽车应不少于 100 辆，供高加索粮食人民委员部北高加索顿河汽车场支配的汽车应不少于 75 辆。

(B) 从不再服役并指定给民用部门的轿车和摩托车中拨出 15 辆轿车和 15 辆三轮摩托车给粮食人民委员部。

注 1. 命令劳动国防委员会军用物资移交民用部门中央委员会研究粮食人民委员部提出的 475 辆卡车、40 辆轿车和 50 辆摩托车的要求并额外拨出必要数量的车辆，于今年 4 月 10 日前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有关这一问题的经论证的报告。

注 2. 对划归粮食人民委员部的车辆实行第 2 条中规定的调遣原则。

(4) 命令军事部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于 4 月 10 日前临时拨出运输拖拉机及备件、修理工具以及驾驶员供粮食人民委员部使用，以完成用拖拉机队从西伯利亚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区运输粮食的特别工作，其数量：从军事部门拨出的数量由协商确定，从农业人民委员部拨出 40 辆“伦巴第”和“克莱顿”牌拖拉机，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挑选。

注 1. “克莱顿”牌拖拉机可用“莫尔顿”牌替代，但必须在技术委员会认为后者在构造和性能上适合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的情况之下。

注 2. 粮食人民委员部所需数量的拖拉机挂车完全由各部门和各机关提供。

(5) 鉴于必须火速向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车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各总管理局、中央管理机构及其他机关以及其余民事和军事机关应在收到申请后三日内充分考虑并火速满足其所有要求，要求

的物资可以从汽车总局通过的供给粮食人民委员部汽车运输局及其车场和车队器材、备件、橡胶制品以及修理工具的年度计划中扣除。

(6) 军事部门保留两个设置在火车车厢内的流动修理厂(列车修理厂),此外,从现有上述类型的修理厂中拨出两个修理厂以及两个师汽车修理厂给粮食人民委员部。

注:拨出的修理厂连同其维修人员一同移交。

(7) 所有工厂、修理厂以及其他企业在修完坦克和装甲部队编内汽车后必须将粮食人民委员部及其汽车场和汽车队的定货当作军事定货首先加以完成,并对按时优质负完全责任。

注:交给汽车总局和军事工程总局及其地方机关的工厂和修理厂需要大修的汽车应有专人负责。

(8)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设立实物奖励基金,以保障全俄运输工会中央委员会组织的为援助顿巴斯而火速加班修理运输车队的工作。

粮食人民委员部汽车运输局在中央和地方参与组织上述工作。

(9) 命令燃料总委员会燃料和润滑油供给部门根据实际需要从现在储备中向粮食人民委员部供给上述物资。在共和国中部地区缺乏某种燃料的情况下协助粮食人民委员部开行直达货运专列获得燃料,运输的技术问题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与劳动国防委员会最高铁路与水路运输委员会协商解决。

(10) 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及其地方机关满足粮食人民委员部对汽车专家的需求,以优先完成粮食工作。

(11) 为最大程度利用汽车的载重能力,命令劳动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运输器材局经与粮食人民委员部协商优先提供粮食汽车运输所需的相应数量的装卸工人。

(12) 命令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人供给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事会另外拨出基本为实物的奖励基金以及所需数量的工作服，以供给从事用汽车运输粮食工作的工人和职员。

(13) 凡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及其汽车场、汽车队发运以及各机关和企业运给它们的拖拉机、汽车、备件和物资、家具什物和技术工具，一律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最高铁路与水路运输委员会列入全国运输计划的军事物资由共和国铁路与水路进行运输，计入粮食人民委员部的计划运输量。

(14) 由各有关机关、人民委员部、总局和中央管理机构负责执行本决定。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No 10540

关于满足勒拿采金工业公司劳动力需求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为优先和紧急满足勒拿采金工业公司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由军事部门下令从西伯利亚驻军中紧急抽调必需数量的采金工业专家以及所需职业和工种的熟练工人。

2. 为满足勒拿采金工业公司需要而抽调的红军战士交由西伯利亚劳动委员会管理，以便把他们派往勒拿采金工业公司。

3. 为满足勒拿采金工业公司需要而从西伯利亚驻军中抽调的红军战士的数额，由劳动人民委员部会同军事部门协商确定，其数量不得超过勒拿采金工业公司所需劳动力的一半，即调去的人在500名以内。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541

关于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等港口施工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根据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鉴于使阿尔汉格尔斯克、敖德萨、摩尔曼斯克、马里乌波尔和新罗西斯克等港口恢复正常状态并适应商品交换的进行具有全国性意义，将其列入共和国突击工程计划，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立即开展工作，以使上述港口能够正常运转。

2.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把上述工程列入应优先、紧急供给的工程之中，向它们提供所有必需的物资、设备和器材。

3. 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为港口提供使其恢复正常状态所必需的劳动力。交通人民委员部应在24小时之内向劳动人民委员部提出用工申请，劳动人民委员部应会同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对该申请进行审查并按突击工程予以满足。

4.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按专项突击工程口粮标准向承担交通人民委员部上述港口工程的全体工人和职员提供粮食。交通人民委员部应即刻向工人供给委员会提供有关工人和职员数量以及工作地点的清单。

5. 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为上述港口工程的进行提供所需资金。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No 10542

关于保证彼得格勒商港供应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1日会议决定：

(A) 通过下述决定草案，以进一步说明劳动国防委员会3月20日的决定^①：

(1) 批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局、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的代表在彼得格勒港联席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即按照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向国防委员会提交的申请拨给各种物资，以此作为彼得格勒港的大体供应计划。

(2)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立即向彼得格勒港拨付一个月工程所需的物资。

(3) 同时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会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在两周之内审核第1条中所说的计划，一方面弄清实现该计划所依靠的人员以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彼得格勒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生产计划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弄清有否可能增加对彼得格勒港的某些物资调拨。

(4) 有关彼得格勒商港的草案中凡未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协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3月30日通过的关于“将各商港恢复正常状态的工程列入突击工程”问题的决定：“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于明天，即1921年3月31日12时之前把落实关于‘将各商港恢复正常状态的工程列入突击工程’问题的所有具体措施分别送达各相关部门，后者应在24小时之内作出答复；如意见一致则送列宁同志签署，如有分歧则于周五，即1921年4月1日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商一致的问题交由季诺维也夫^①同志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决定。如意见一致则立即通过决定，如有分歧则于周三，即1921年4月6日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

(5) 上述委员会还应澄清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关于根本无力满足彼得格勒商港需要的说法。

(6) 确定彼得格勒商港工人专项口粮标准。

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工人供给委员会挑出能与海运管理局工人作比较的工人。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① 季诺维也夫，格·叶·（1883～1936）——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党的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25年是“新反对派”的组织者之一，1926年是托季联盟的组织者之一。1936年被处死。后平反。

№10543

关于把皮锹套移交制革业总委员会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作为对今年2月15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军事部门把第一日杂总库储藏的二十五万四千零三十五
(254035)件皮锹套移交制革业总委员会掌握。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军事部门将储藏在军用日杂物品总管理局仓库的物资移交民用部门的决定。

No 10544

关于将运土袋、金属丝移交民用部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作为对今年3月5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将军事工程总局仓库储藏的10万条运土袋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包装局掌握，将储藏在布良斯克的军事工程总局专用的11520普特金属丝移交金属分配公司以供制钉、拔丝、螺栓、铆钉厂联合公司之用。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军事部门将军事工程总局仓库里的工程物资移交民用部门的决定。

№ 10545

关于将描图纸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作为对今年3月21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军事部门从用于特殊情况的描图纸中拨出18卷交给粮食人民委员部掌握，同时留下相同数量归自己掌握。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军事部门将储藏在“红色礼物”仓库的物资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消费公社的决定。

№ 10546

关于将栓钉、铁钉和扳子移交民用部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作为对今年2月15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军事部门将储藏在军用日杂物品总管理局仓库的1500万枚栓钉、8万普特铁钉和3万把扳子移交民用部门掌握。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军事部门将储藏在军用日杂物品总管理局仓库的物资移交民用部门的决定。

№ 10547

关于将前募集到的物资移交地方民用部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作为对1921年3月7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军事部门将前线协助委员会在白海军区范围内募集到的物资拨
出一部分，并按所附报表移交地方民用部门。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所指何项决定不明。军事仓库物资的移交是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1月19日关于采取措施将军事物资用于共和国经济和民用需要的决定进行的。

№10548

关于把包装袋和粗席移交粮食 人民委员部包装局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作为对今年3月21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从“红色礼物”委员会仓库拨出1729条包装袋和19457张粗席并将其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包装局掌握。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军事部门将储藏在“红色礼物”仓库的物资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消费公社的决定。

№ 10549

关于把望远镜移交军械总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作为对今年3月21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从“红色礼物”委员会仓库拨出221架带罗盘望远镜并将其移交军械总部掌握。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军事部门将储藏在“红色礼物”仓库的物资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消费公社的决定。

№ 10550

**关于把有关物资移交军用日杂物品
总管理局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作为对今年3月21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按所附报表从“红色礼物”委员会仓库拨出有关物资^②并将其移交军用日杂物品总管理局掌握。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军事部门将储藏在“红色礼物”仓库的物资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和莫斯科消费公社的决定。

② 指信纸、复写纸、细绳和木匙等。

№ 10551

关于将军事物资移交民用部门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A) 必须坚决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有关复员军事物资以将其移交民用部门的所有决定。

(B) 将有关征用工农检察院海军局汽车的问题交李可夫的军事物资复员委员会处理。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0552

**关于将有关汽车队工作人员列入
优待口粮专供范围的决定**

(1921年4月1日)

批准工人供给委员会 1921 年 3 月 8 日关于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汽车局提供红军口粮的决定。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汽车队工作人员列入莫斯科公社 1 类优待定额专供范围。本决定不包括汽车局工作人员。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 10553

关于金卢布兑换比价的决定

(1921年4月4日)

人民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4 日会议研究了提高外币兑换比价问题并决定：

1. 将兑换比价提至 1 英镑兑换 6000 卢布，如以其他外币兑换则按其兑换当日伦敦交易所的比价计算。

2. 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七日之内制订国外兑换的受理规则。

3. 国外兑换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财政人民委员部代表受理并直接由财政人民委员部办理；兑换所得外币归入共和国外汇总储备。

秘书 斯维尔斯卡娅

No 10554

要求各省完成肉、油、禽蛋 原定收集任务的命令

(1921年4月4日)

致各省粮食委员会，粮食会议

一些省粮食委员会借口将以油、蛋实物税代替收集制，对此类食品的收集叫苦连天。

为避免发生误解，3月17日《消息报》刊登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以实物税代替收集制的决定的补充指出：在实物税公布之前，个别食品原定的收集任务仍然有效，任务应按以前制度，由以前部门完成。新制度的建立和机构改革不应妨碍今年的收购工作。

务必采取一切措施利用大斋这一收购油的最好时期，可宣布开展“收油两星期”活动，同时在不改变工作方法的情况下抓好蛋的春季收购。

肉的收集任务同样要百分之百地完成。在缜密制订的关于油、蛋实物税的法令中，规定收集的食品列入税收之内，因此务必要求在5月1日前完成食油征集额的25%。请立即用直达电报告知所采取的措施。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副粮食人民委员 布留哈诺夫

1921年4月4日

№10555

关于削减粮食供应的措施的决定

(1921年4月5日)

人民委员会听取了副粮食人民委员尼·巴·布留哈诺夫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负责审查粮食人民委员部供给计划的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决定：

(1)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把按“红星”供给证发给的口粮标准减少一半。

(2) 今后不允许以任何形式扩大国家供给的消费者范围，也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和在任何幅度上提高供给标准。

(3) 委托小人民委员会在最短时间内审查交通人民委员部的编制并根据战前定额以及现在铁路和水路的技术条件来削减职工人数。

(4) 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会同工农检查院制订给养发放和粮食供应的监督制度和形式，同时制订消费机关粮食供应的报表制度。

(5) 责成工农检查院会同粮食人民委员部组织给养发放是否正常的实际检查月，首先在一个月內检查两个首都、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各大工业中心、铁路和铁路木材开采和设备委员会的情况，尔后在两个月內检查军队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其他城市的情况。

(6) 委托小人民委员会在必须有教育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参与的情况下在最短时间内审议部分学校放春假和暑假回家以

及使非军事院校师生和全体苏联职工享有同等待遇的问题。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人民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0556

关于亚马尔半岛勘察工作的组织和任务的法令

(1921年4月6日)

考虑到必须尽快修筑从西伯利亚到欧洲以及我国北方各港口的北方大铁路以出口木材、粮食，鱼类、肉类、毛皮、脂肪、地下矿产和土壤资源，考虑到即将开展的西伯利亚大规模垦殖运动和西伯利亚对国家的意义，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任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组织亚马尔半岛的勘察工作。

2. 考察内容如下：

(A) 亚马尔半岛水道和曼加泽尔—图鲁汉斯克水道；

(B) 鄂毕湾，拜达拉塔湾和塔兹湾通往上述水道的途径；

(C) 在马列—萨列角设置港口的可能性；

(D) 修建跨越当地分水岭的铁路和兽力车路。

3. 委托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经与海军部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协商后在勘察作业地区设立站点、仓库和供应站。委托国家建筑工程委员会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商谈在这一地区设置无线电台事宜。

4. 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经与其他部门协商后供给这次勘察所必需的物资，并确定勘察人员的组成。

5. 按照工人供给委员会为北纬70%以上的北方勘察所规定的标准向勘察人员提供口粮。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6. 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所有机关都应给予此次勘察以大力协助。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乌里扬诺夫（列宁）
秘书 莉·福季耶娃

№ 10557

关于顿河—高加索边疆区粮食委员会问题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6日会议决定：

委托阿瓦涅索夫^① 同志向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关于顿河—高加索边疆区粮食委员会的问题。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① 阿瓦涅索夫，瓦·亚·(1884～1930)——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0年初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0～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 10558

**关于向电讯设施修护连和通信连的
红军官兵提供前线口粮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电讯设施修护连和通信连的红军官兵在线路上工作时，有权获得前线红军口粮。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6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559

**关于禁止彼得格勒防务委员会
发放计划外食品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6日会议决定：

彼得格勒防务委员会不得在未与粮食人民委员部协商的情况下
发放供给计划外食品，希望今后不再发生此类违反规定的事件。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0560

**关于开通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
利斯基线铁路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为顺利完成从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外里海前线运送大约 14000 名长期休假的红军战士的任务，即刻开通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利斯基线铁路。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6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561

关于开通洛佐瓦亚—斯拉维扬斯克线
铁路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6日会议决定：
开通洛佐瓦亚—斯拉维扬斯克线铁路，以便尽快开行运煤专
列。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 10562

**关于重新审议拆除格拉祖诺夫和季诺维也夫
铁路支线地区钢轨问题的决定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6日会议决定：

命令钢轨问题部门联席会议^①重新审议关于拆除格拉祖诺夫和季诺维也夫支线地区钢轨的决定并设法从其他地区向亚-恩巴铁路提供钢轨。如这样做仍不能解决问题，则将问题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① 负责钢轨和窄轨机车车辆统计与分配的部门联席会议。

№10563

关于协助矿业委员会挖土机局工作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1) 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下令紧急调配挖土机。

(2) 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立即发给挖土机局铁路年票——25张记名票和35张代用票，以确保负责监督、指导、维修和调配挖土机的技术人员出行畅通无阻。

(3) 责成各部门在人员、物资、燃料^①和装载工具上给予全力支持，不允许给挖土机局派来调配挖土机的代表设置障碍。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6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副本上没有“燃料”一词；这是根据通过的草案加上的。

No 10564

**关于停止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
征收汽车和机床工作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6日会议决定：

通过以下决定：

(A) 鉴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已完成其担负的汽车和机床的征收任务，因此这一工作宣告结束。

(B) 下一步分配剩余的征用机械的工作及一应事务移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重矿石和金属分配公司所属供给和分配委员会办理。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 10565

关于将大麻纺织业列为突击工作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将包括工厂大麻纺织业和手工大麻纺织业在内的整个大麻纺织业（同其制品名称无关）列为突击工作。

2. 命令交通人民委员部不受协定的限制而发运大麻纺织业的所有货物。

3. 命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责成纺织工业总管理局和金属局尽快将维修大麻纺织厂的机器设备问题交付审议。

4. 委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在一周内商定大麻纺织业各个部门的奖励标准。

5. 命令劳动国防委员会特派员设法弄清大麻纺织业所需的盐和煤油的数量，以加强用生产厂家自有原料生产大麻纺织品的联合体的发展。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6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No 10566

关于修订大麻纺织品种的生产任务以及有关确保通航期木材流送和水路运输所需缆索措施的决定

(1921年4月6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命令利用委员会根据有关消费部门的所有申请，修订纺织企业总局1921年度大麻纺织品种的生产任务。修订时应有制索业特派员参加。

委托利用委员会两周之内拿出1921年度（上半年）各有关部门使用大麻纺织品的计划。

2. 对劳动国防委员会1月19日决定的第2条作如下修改：限定为圆周3英寸和3英寸以上的粗绳和缆索。

3. 对劳动国防委员会1月19日决定的第2条作如下修改：特派员的权利和责任扩大到包括工厂和手工业生产的一切大麻纺织品；分配范围限制在第2条所规定的储备之内。

对第2条的注作如下补充：任命粮食人民委员部代表为特派员的第三助手。

4. 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1月19日决定第4条：对所有大麻纺织品的生产进行奖励，委托利用委员会一周之内审议奖励问题。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6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567

关于起草建立交换储备和实物奖励形式的 决定草案的决定

(1921年4月7日)

—

决议草案一条经列宁修改

(一) 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研究向特大工人区的消费合作社划拨一定数量的商品作为建立交换储备启动资金的问题。委托委员会(一周)两周之后向人民委员会递交决定草案，本决定不公布。

二

人民委员会决定

(1) 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研究向特大工人区的消费合作社划拨一定数量的商品作为建立交换储备启动资金的问题。委托委员会两周之后向人民委员会递交决定草案。本决定不公布。

(2) 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研究对本决定未作出规定的劳动者进行实物

奖励的形式问题。不公布。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人民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7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No 10568

关于原料收集的决定

(1921年4月7日)

(1) 为贯彻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定^①，兹命令粮食人民委员部、农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发展和改善原料的开采、收集与初加工方面最广泛地利用原料生产者的经济联合体(劳动组合、协作社、猎人协会等)，并协调一切措施促进新的类似联合体的成立。

(2) 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粮食人民委员部各原料局会同有关单位代表就原料的收购、收集、分类和储存等问题定期举行会议，建议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各地方机关也这样做。

(3) 经过计算后对游牧民族征收少量商品税；授权各地方机关在特别困难的情况下可以对某些居民免税。

对剩余产品的上交实行个人商品交换。务必做好游牧民族的各项供应工作，而不与他们上交的原料挂钩。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根据新的收购制度(税收和个人商品交换)研究游牧民族的供应问题。

划拨专门款项作为对游牧民族税后上交原料的奖励基金。

收购站的组建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根据居民的经济需要在临近铁路、水路和区洗毛厂的地方建立。

^① 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根据列宁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所作的决定。

对奥尔登绵羊的保护问题列入原料委员会日程。

委托原料委员会制定措施使放牧到中国 and 布哈拉境内的畜群得以返回。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一周之内向原料委员会提交关于建立用于和游牧民族进行商品交换的基金的决定草案。

鉴于向游牧民族收购毛皮和羊毛与居民供应问题有密切联系，这项工作可归粮食人民委员部管辖。

(4) 鉴于粮食人民委员部有关禁止加工麻籽和大麻籽以及以工厂返还适宜的种子以用于播种的声明，授权土耳其斯坦国民经济委员会在需要时对棉花籽采取同样措施。

(5) 那些已与粮食人民委员部签订合同以及用自己的种子播种的亚麻和大麻播种者有权获得比一般人多一半的免税播种用种并不受一般供应条件限制。

(6) 为了在所有加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共和国内制定原料收集的统一标准并协调原料的统计分类和分配工作，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参与下召开各共和国和各自治州有关单位的联席会议。

(7) 鉴于类似情况^①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机关进行的羊毛收购中已有发生，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就这一问题进行协商。

(8) 委托原料委员会紧急制定措施在居民中进行原料生产的宣传工作，责成国家出版社全力以赴突击出版有关读物。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① 指不同单位在同一地区收集同一种原料的情况。

№10569

关于确保 1921 年的泥炭运动 顺利进行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7 日)

鉴于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 1921 年的泥炭运动顺利进行对国家有重要意义以及这场运动很快就要开始，人民委员会认为必须放弃去年 10 月 30 日人民委员会令^①所规定的对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的供应方法并采取非常和紧急措施以确保这场运动的进行，兹决定：

1. 一周之内向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各个矿点的泥炭工人（按 2000 人计算）提供下列日用品：

序号	名 称	数 量	供应机关
1	容量为 3 维德罗的大锅或已有批 条但尚未落实的镀锌铁皮	20	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 给特派员、莫斯科金属局
2	行军灶	10 个	沙图拉建筑工程局
3	水桶	150 个	泥炭工业总管理局
4	褥垫和枕套用布或细平布	10500 俄尺	泥炭工业总管理局
5	各种刀具	200 把	粮食人民委员部
6	厨房和宿舍用布	500 俄尺	

2. 为全面开展 1921 年的泥炭运动，应在一周之内提供下表所列各种所需物资：

^① 指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泥炭水力开采的措施的决定。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序号	名 称	数 量	供 应 机 关
1	带起动箱的 75 马力发动机	4 台	泥炭工业总局
2	已有批条的瓦撬铁	1380 普特	金属分配公司或莫斯科金属局
3	玻璃	30 整箱或 120 个 1/4 箱	玻璃工业总局
4	已有金属分配公司批条的铁钉、 螺栓、螺钉、螺丝帽和铆钉		制钉、拔丝、螺栓、铆钉厂联合公 司
5	砖	120000 块	建筑材料工业局
6	车辆：雅罗斯拉夫列别杰夫厂生 产的货车。供莫斯科用载重 5—7 吨的卡车和强力轻型汽车，用于和 郊区联系	1 辆 1 辆 1 辆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汽车总局

3. 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力局审查泥炭工业总局要求拨给电工器材的申请，并按实际需要在一周之内予以满足。

4. 一周之内向各个矿点的泥炭工人提供下表所列的工作服：

序号	名 称	数 量	供 应 机 关
1	到膝盖的长筒防水靴	400 双	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 红海军供给特派员
2	奥地利式皮鞋(足球鞋)	75 双	同上
3	涂胶防水服(高腰防水裤和上衣) 或涂胶防水布	140 套或 1100 俄尺	利用委员会或劳动国防委员会 红军与红海军供给特派员
4	防水布服	260 件	同上
5	包脚布用防水布	4000 俄尺	同上
6	草鞋	10000 只	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 红海军供给特派员

5. 为在 5 月 15 日之前完成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为即将到来的泥炭生产季节向莫斯科各金属厂订购的设备以及及时在各地组装机噐，允许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以食品来奖励上述单位的工作人员，兹命令粮食人民委员部为此拨出如下储备物资：250 普特面粉、50 普特鱼或肉、75 普特盐、20 普特糖和 5 普特茶叶。

6. 允许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把输电工作包给那些按照人民委员会的决定有权承包国家电站输电工作的承包人，同时把在7月1日前钻出自流井的工作包给自流井专家。

7. 向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提供为期5个月的总数为2500万卢布的特别基金，用于对熟练技术人员的个人奖励。

8. 命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向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提供25份人民委员基本口粮（100张配给证），并交由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全权掌握。

9. 命令中央房屋土地局尽可能地为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工作人员保留原有住房，如必须搬迁应首先向他们提供住房。

11.^① 授权泥炭水力开采管理局在从4月15日至8月15日的泥炭生产季节调用6名熟悉泥炭水力开采工作的专家，不论其在任何机关、学校、企业和部队工作或学习。责成派出这些专家的机关和企业泥炭运动结束后接收他们回原单位，而学校则应向他们提供优惠条件继续学习并补上损失的学业。

12. 委托工农检察院对上述命令的执行进行监督。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人民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7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原文如此。

№ 10570

**关于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享有特赦权以及
暂缓执行死刑判决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对于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境内的革命军事法庭和铁路法庭提出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否有权赦免它们所判处的人犯的问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权这样做。1920年12月28日签订的俄罗斯—乌克兰条约^①第3条所规定的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和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军事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合并（革命军事法庭和铁路法庭在它们管辖之内），不能削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最高机关的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特赦权问题的专门协定而享有的不受限制的权利。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秘书 阿·叶努基泽

^① 原件为1920年12月23日，有误；这里指的是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批准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同盟条约，此条约由双方全权代表于1920年12月28日签订。

№10571

关于红军复员问题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8日会议决定：

(1) 成立由托洛茨基、李可夫（有权由埃斯蒙特同志代替）、捷尔任斯基、斯米尔诺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斯克良斯基^①、米哈伊洛夫和扎卢茨基等同志组成的复员委员会。

(2) 委托斯克良斯基同志按照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于星期三^②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一份决定草案，以取代关于复员军人的供应的命令^③。

(3) 委托斯克良斯基同志根据9月1日前军队人数将达到100万，如包括所有卫生、教学和其他机关在内将达到150万这一情况作出精确预测和计算。

(4) 委托斯克良斯基同志两周之后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关于军队年轻化，即征召18岁青年入伍的可行性报告。

(5) 委托复员委员会讨论关于必须随着军队数量的减少而改善军队状况的问题，并将确切数字和必要措施以及日程表一并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必须特别注意缩减警卫部队和警卫勤务，在星期三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方案。

① 斯克良斯基，埃·马·（1892～1925）——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8～1924年任副陆军人民委员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② 1921年4月13日。

③ 见劳动国防委员会4月13日关于允许长期休假的红军战士保留制服的决定。

所有应当复员的机关一律撤销。关于将这些机关转到其他部门的问题由劳动国防委员会酌情单个解决。

将被撤销机关的名称和名单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

(6) 批准超期服役 4 年的军人退役，委托斯克良斯基同志于星期二^① 向人民委员会提交关于近期尽可能多地让这部分人退役的决定草案。

(7) 责成最高运输委员会：1. 全面保障土豆和种子的运输，并讨论铁路和水路运输军人的范围、期限和条件问题；2. 专门讨论能否在 5 月 15 日前结束复员军人的运输和减少客流的问题；3. 专门研究军队部署和能否利用现已开始的航期的问题。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① 1921 年 4 月 12 日。

№10572

关于加强土豆种子的收购和运输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8日会议决定：

(1)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所属种子计划会议采取一切紧急措施以加强土豆种子的收购运输工作。

吸收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参加该会议。

定于每星期五向劳动国防委员会作汇报。

(2) 责成哈拉托夫^①同志和列扎瓦^②在两日之内谈妥在拉脱维亚收购土豆种子的数量。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① 哈拉托夫，阿·巴·(1896~1938)——苏共党员，十月革命后历任俄联邦粮食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学者生活改善委员会主席、全苏发明家协会主席等职。

② 列扎瓦，安·马·(1870~1937)——1904年入党。1918~1920年任中央消费合作社主席，1920~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5~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 10573

关于扩大向日葵的播种面积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为扩大榨油工业最主要原料之一的向日葵的播种面积并对其耕作方式进行改良，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委托农业人民委员部在向日葵种植最广的地区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推行向日葵轮作制。

2. 委托农业人民委员部组织向日葵改良品种的培育和育种工作。

3. 对那些将实行向日葵多区轮作制或将显著扩大播种面积的村庄，实行人民委员会1920年5月27日关于扩大劳动农户土地使用面积法令中所规定的措施。

4. 向日葵种植区内扩大了其播种面积的村庄和个体农户在种子、畜力和农具供应方面享有优惠待遇。

5. 为鼓励种植向日葵，建立用以奖励扩大（与1920年相比）向日葵播种面积的种植者的日用品专项储备。

6. 对向日葵的播种面积比1920年多的农户实行奖励，每多1俄亩奖励如下种类和数量的物品：

布匹	8 俄尺
煤油	15 俄磅
盐	15 俄磅
火柴	10 盒
车轮润滑油	2 俄磅

肥皂 2 俄磅

7. 对种植者进行奖励的商品储备的起步总量如下：

布匹 800000 俄尺

煤油 37500 普特

盐 37500 普特

火柴 1000000 普特

车轮润滑油 6000 普特

肥皂 5000 普特

8. 如播种季节结束后发现向日葵播种面积的增长总量超过预计数量，则所需奖励储备将增加相应数量的上述物品或由其他等价物品代替。

9. 用于奖励的所有实物储备交由粮食人民委员部管理，并严格根据第6条规定的目的，按照农业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协商制定的特别指示规定的程序发放。

10. 奖励储备物品的发放时间如下：

(1) 其中1/4在播种结束并确定超出1920年播种面积的数量之后发放，但不得迟于1921年7月1日。

(2) 余下数量的奖励实物在种植者缴纳了向日葵所应缴纳的实物税之后发放，与农户是否缴纳其他农产品的实物税无关。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 10574

关于完成机械犁的定货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1) 劳动国防委员会重申人民委员会 1920 年 11 月 23 日 (第 401 号记录) 关于在物资、器材、燃料、劳动力等的供应方面保障“法乌列拉”牌机械犁各项突击生产任务完成的决定, 命令所有物资和半成品的供应单位优先考虑“法乌列拉”牌机械犁生产的各项需求并予以满足, 甚至可以挪用用于其他非突击性生产的物资和半成品。

(2) 应根据第四国营汽车制造厂的奖励数量对从事机械犁零部件生产的各厂工人予以额外实物奖励, 建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修改根据金属局的报告所作的决定。

(3) 确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于今年 2 月 17 日颁发的委任状中赋予“法乌列拉”牌机械犁三人特别领导小组的权力。

(4) 为使机械犁的生产不致延误, 命令财政人民委员部拨出必需数量的金币以满足汽车总局的申请, 命令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进行紧急采购。

(5) 鉴于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为解决第四国营汽车制造厂的劳动力供给问题虽然采取过适当的措施, 但这些措施的执行却因劳动国防委员会颁布了关于遣散调到首都工厂的劳动动员工人和部队复员工人的决定而大受影响, 因此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认真考虑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提交的关于撤销劳动国防委员会

上述决定的草案。

(6) 不管总的问题如何解决，作为例外，特命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团和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责成莫斯科劳动委员会：从莫斯科其他工厂被遣散的劳动动员工人和军队复员工人中挑选出第四国营汽车制造厂所需数量和所需技能的人员，同时撤销从该厂遣散工人的命令；一周之内将莫斯科其他工人从事突击性不太强的工作的工人遣散一部分，以抵应遣散人数量。

(7) 作为执行 1920 年 7 月 15 日法令中的例外^①，授权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汽车总局运输处主任在自由市场上购买第四国营汽车制造厂机械犁生产所需的零星辅助材料。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 年 4 月 8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指人民委员会关于苏维埃机关和社会团体之间以及它们与私人企业和个人的结算程序的法令。

№ 10575

关于从国外进口煤炭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一周之后汇报南方港口实际接收煤炭和用铁路运输煤炭的准备情况。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协调各有关部门的要求。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8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576

关于向泥炭工人供给高筒鞋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命令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另外准备 50000 双高筒鞋以供给泥炭工业工人。命令利用委员会即刻按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的要求足额拨给一切必需材料，以保证在今年 5 月 1 日供货。

召集由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利用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以便弄清增拨材料从而把鞋产量由每月 75000 双增至 1000000 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考虑首先在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之间分配的问题。

委员会由李可夫同志负责召集。定于周二即 4 月 12 日向人民委员会汇报。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 10577

关于加紧采购和运送油脂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8日会议决定：

(1)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加紧采购和运送油脂，并从运到的货物中立即拨出一部分给泥炭运动，以保障泥炭工业总局工人五月份的供应，并使他们获得的油脂总量达到25000普特。

(2)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尽一切努力在5月1日前至少将70000普特油脂的一半运到。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 10578

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申请的决定

(1921年4月8日)

1. 批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总值 2617000 卢布的油类化工产品的申请。

2. 关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提出的总值 38948459 卢布的申请问题，放到周二^①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讨论，以使各有关部门在此之前提出自己的看法。

3. 委托列扎瓦同志向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全面汇报每一项计划外（用黄金储备）采购情况、支出的款额及余额。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① 1921年4月12日。

№ 10579

劳动国防委员会给拉柯夫斯基的电报

(1921年4月8日)

哈尔科夫，致拉柯夫斯基^①

劳动国防委员会4月6日会议认为不宜把乌克兰27家化工厂合为一个重点企业。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8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拉柯夫斯基，克·格·（1873—1941）——19世纪90年代开始参加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瑞士、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1918—1923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曾任党的中央委员、组织局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1941年被处死，后平反。

№10580

列宁和瞿鲁巴致波克罗夫斯克市
省粮食人民委员

(1921年4月9日)

波克罗夫斯克，致省粮食人民委员；

抄送：省执行委员会；

抄送：省党委；

抄送：巴龙斯克，德意志人公社

我命令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4月8日的决定，停止执行以前的一切命令，立即按本命令指定车站向德意志人公社发运10万普特优良麦种。接到命令后请告知，并用直达电报向我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分配部报告每天的执行情况。任务的完成由省粮食人民委员亲自负责。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粮食人民委员 亚·瞿鲁巴^①

^① 瞿鲁巴，亚·德·（1870—192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粮食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

№ 10581

**关于要求重新审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在对外贸易方面提出的申请的决定**

(1921年4月12日)

一、决定草案（列宁手书）

命令国家计划委员会重新审议对价值〈3490万〉3890万卢布（布）的（黄）金的申请以及在（对）外贸（易）方面提出的其他申请，原则是在粮食严重歉收和燃料供应难以为继的情况下采购1921~1922年度所需的最低数量的粮食和燃料〈必须以保障共和国供给的最低数量为限〉。

二、决 定

人民委员会今年4月12日会议决定：

命令国家计划委员会重新审议对价值3800万卢布的黄金的申请以及在对外贸易方面提出的其他申请，原则是在粮食严重歉收和燃料供应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在国外只能采购用以解粮食和燃料供应燃眉之急的必需品。

定于周五^①由计划委员会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汇报最必需的申

^① 1921年4月15日。

请项目的情况。

人民委员会秘书

№ 10582

**关于认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
纺织厂的工作为突击工作的决定**

(1921年4月12日)

1. 继续认定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纺织厂的工作为突击工作以及由此而来的一切结果。

2. 责成燃料总管理局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纺织厂调拨 200 万普特泥炭即该省历年加工的泥炭储备和大约 30000 立方俄丈流送木材。责成燃料总管理局在今年 7 月 1 日前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工厂提供 30 万普特重油，其中 4 月提供不少于 100 油罐车，5 月和 6 月各为 125 油罐车左右，并向该厂转交在普列斯和尤里耶韦茨的两艘油驳上的大约 30000 普特石油余渣。

3. 将科斯特罗马省涅列赫塔县科斯梅宁诺沼地及其全套设备和现有泥炭储备交由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有关工厂管理，以便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泥炭委员会领导下对其进行开发。

4. 责成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突击委员会于 7 月 1 日前修复 4 台机车和 140 节油罐车，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授权突击委员会使用以上设施通过专用直达货运列车运出部分石油燃料。

5. 授权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粮食委员会两次使用修好的粮食直达列车将粮食人民委员部安排的粮食运出。

6. 交通人民委员部每周应提供一次由伊万诺沃开往基涅什马、涅列赫塔、加夫里洛夫镇和诺夫基车站的往返加车。

7. 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于 4 月份拨给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

克省财政局 25 亿卢布，其中 10 亿卢布从 4 月份预算中支付，15 亿卢布从纺织企业总管理局为发放工人工资而贷的 100 亿卢布的计划外贷款中支付。不得晚于 4 月 22 日执行。

8. 所有经济机关、总管理局和人民委员部必须一如既往地在这个方面对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和莫斯科、彼得格勒一视同仁。

9. 命令粮食人民委员部每月向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提供 160 车皮粮食，其中包括当地驻军的粮食。

10. 委托汽车总局（由邦达连科同志具体负责）根据人民委员会的特令在 3 月内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及其在莫斯科的地方机关调集 20 辆状态良好的汽车，并将它们公平合理地分到各部门和各机关，以便将其尽快运到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交由省执行委员会掌握。

交通人民委员部负责在 3 月内将汽车运到目的地。

这些汽车将用来装运布匹，期限为 3 个月，同时委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为它们提供足够的燃料。

11. 委托库图佐夫同志代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的工人同利用委员会就涉及利用委员会的问题进行协商。

如有分歧不晚于周五或周六提交小人民委员会。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人民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 年 4 月 12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583

关于向莫斯科等地执行委员会 提供购粮援款的决定

(1921年4月12日)

被列宁勾掉的决定草案第5条

〈5. 命令财政局会同工农检察院对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执行委员会所属各局的金库进行审核，并根据有关金库合并的法令将查出的纸币迅速上交财政局金库。

注：对莫斯科各人民委员部所属金库的审核由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和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部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负责。〉

二、人民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12 日决定

人民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12 日会议决定：

(1) 拨款 80 亿卢布资助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执行委员会购买食品，委托财政人民委员部作出决定，这笔款项从何部门划拨才不致有损原料和粮食采购工作。

(2) 命令财政人民委员部将以此种方式筹集的款额按工人的比例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之间进行分配。

(3) 命令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省执行委员会削减所属各局的纸

币，从中拨给莫斯科消费公社和彼得格勒消费公社一定数量的纸币。

(4) 责成阿尔斯基同志向人民委员会汇报未完成任务的部门的情况。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人民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2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584

列宁和尼·巴·布留哈诺夫关于 征收专用马铃薯问题的指示

(1921年4月12日)

给各省粮食委员会的电报

抄送：各省执行委员会和各省粮食会议

沃罗涅日、叶卡捷琳堡、库尔斯克、奔萨、萨拉托夫、辛比尔斯克、维捷布斯克、戈梅利、下诺夫哥罗德、科斯特罗马、普斯科夫、斯摩棱斯克、梁赞、斯捷尔利塔马克-巴什基尔粮食人民委员部、喀山-鞑靼粮食人民委员部。

为避免由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以实物税取代余粮收集制的决定而在地方上产生误解，现对从居民手中征收副粮食人民委员布留哈诺夫第4206号电报指定专用的马铃薯问题作如下解释：这次征集的专用马铃薯属粮食机关，只是由生产者在冬季加以保存。鉴于马铃薯播种运动的顺利开展具有特殊意义，决定专用马铃薯的征收工作仍按以往制度进行和由原先的机关负责，要求在5月1日以前交齐，并按粮食人民委员部第131号电报的规定，除付给固定价格外，再对缴纳者予以奖励，每一普特马铃薯奖励两磅盐^①。要立即把采取的措施通过直达电报告知粮食人

^① 原件上此后有一段增补文字（在签名后的空白处）：对于戈梅利、斯摩棱斯克、维捷布斯克、辛比尔斯克和库尔斯克作如下补充：请按商品交换方式接收生产者上交的非专用马铃薯（商品），有关交换方式的指示随后寄送给你们。

民委员部和采购局。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副粮食人民委员 布留哈诺夫

No 10585

给各省粮食委员的电报

(1921年4月12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弗·伊·列宁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就坚决执行留种马铃薯跨省装卸和运输计划给各省粮食委员的命令。

抄送：各省执行委员会

据悉，一些省粮食委员由于地方扩大省内种子调拨量以及优先完成地方任务而未能及时完成跨省种子计划，从而损害了中央任务的完成。现在必须完成粮食人民委员部4月6日下达给你们的第55914号留种马铃薯计划。鉴于及时完成马铃薯计划并优先完成计划中的跨省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要求你们务必做到以下几点：(1) 宣布马铃薯跨省装卸、运输计划的完成为突击工作，必须按照中央的指示百分之百优先完成，(2) 第15524、17125和18626号电报指示在马铃薯计划完成中仍然有效，(3) 必须坚决执行粮食人民委员、副农业人民委员和副交通人民委员3月31日的第18425号电报指示，(4) 留种马铃薯跨省计划的及时完成由各省粮食委员具体和专门负责。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粮食人民委员 亚·瞿鲁巴

No 10586

关于把军队员额减至 153 万人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13 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13 日会议决定：

(1) 1921 年 9 月 1 日前把军队员额减至 153 万人，而且裁员工作应从中部各省驻军开始。

(2) 军队裁员后，其粮食需求应百分之百地得到满足。

(3) 建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吸收陆海军粮食供应总部参与裁军进度计划的制定，责成陆海军粮食供应总部根据裁军进度计划落实削减军队口粮标准和数量的进度计划。

改善军队的供给，使其到 1921 年 9 月 1 日能拿到 100% 的给养品，而且前方口粮标准应高于后方口粮标准。

(4) 军队裁员后，用于营房、军服和军鞋（不含粮食）等的费用应占裁员前费用额的 $\frac{2}{3}$ ，但不得超过裁员后实际费用的 100%。准确数字应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协商确定。应根据这些数字编制军需供应进度计划并视军队裁员情况对计划加以完善。

(5) 立即着手建立军服、军鞋和武器的动员储备，以期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同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商定的期限内使上述储备达到被动员军队需要的数量。

铁路的军事装备问题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同交通人民委员部协商解决，并报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

(6) 委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同有关部门协商制定改善指挥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人员待遇的措施，并在一周内将这些措施分别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

(7)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在一周内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或人民委员会提出对行政管理人员中的军人的物质保障措施。

(8) 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除了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动员进度计划外，还应上报它负责供应的部队和非军事机关的总计数字。

(9) 在部队及其管理部门和后方设有机构的一切单位，其裁员比例不应低于部队和军事机关的裁员比例。

(10) 本星期三^①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军队裁员的月进度计划，同时要每周报告已复员的红军战士的情况。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① 1921年4月20日。

№ 10587

关于安排 1892～1895 年出生的军人复员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13 日)

为贯彻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裁军和将绝大多数劳动力及资金用于建设的决定，军事部门已安排 1888 年及此前出生的军人退役，1889～1891 年出生的军人的退役工作也即将结束。

目前共和国的国际地位日益巩固，从而有可能进一步裁军即安排下列年龄组的军人复员，为此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立即安排 1892～1895 年出生的军人退役，无论是在部队、指挥部门、管理部门、军事机关和军事院校，还是在从事生产劳动的正规部队和劳动军供职的军人都不例外；退役工作要依照年龄顺序，从年长者开始，一个年龄组一个年龄组地进行。

注 1. 从事木材流送工作的劳动军战士和红军战士应被视为去职长期休假，但应同时宣布他们应征劳动，在作出新的安排之前要坚持工作。

2. 为加快退役工作进度和缓解铁路运输压力，要优先安排属于上述年龄组、原籍离部队驻地不超过 150 俄里的本地籍军人退役。要安排这些人走土路，不要走铁路。

3. 各地执行委员会要在军事机关参与下为徒步赶路的退役军人提供最大方便，尽可能地为他们提供食宿、开水、热饭菜和医疗服务。

4.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经与劳动人民委员部协商后确定需要补充人员（因老兵长期休假而出现缺额）的劳动军，并从部队抽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调 1896 年出生的军人为其补足缺额。用 1896 年出生的人，必要时也可用 1897 年出生的人取代年龄更小的、应从劳动军返回正规部队的人，经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协商，还可利用这批人充实民警机构。

5. 鉴于气候正在转暖，长期休假者应着退役前的服装和鞋子离队。

6. 应暂时留在部队的 1892~1896 年出生的军人的类别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确定。

7.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经与有关人民委员部协商后，应在最短时间内向各地下达符合本决定精神的指示。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 年 4 月 13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588

关于保留长期休假的红军战士的军服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1) 各部队、机关和院校在安排红军战士长期休假时应允许他们将原来穿着的服装穿走。

(2)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今年颁布的第277号令^①和第343/43号令的第1、2和3款予以撤销。

(3) 本决定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下令立即执行，并用电报予以公布。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指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1921年1月29日颁布的关于向长期休假的红军战士提供内衣、军服和军鞋的命令(见2月12日《陆军人民委员部通报》第32号)。

№ 10589

关于批准麻制缆索利用计划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1. 麻制缆索利用计划的有效期为1921年4月1日至7月1日。
2. 利用计划包括：
 - (1) 麻制品储备……30000 普特。
 - (2) 根据纺织工业总局麻制品司和手工业司的计划，1921年上半年应加工麻制品即缆索和粗细绳……450000 普特。
 - (3) 能在共和国仓库中找到的各种麻制品储备。
3. 本决定第2款所列数量的麻制品的用途如下：
 - (1) 归利用委员会支配的包装用各种粗细绳 70000 普特；
 - (2) 归利用委员会支配的用以制造挽具及满足大车队需要的粗细绳 50000 普特；
 - (3) 归利用委员会支配的与共和国居民进行商品交换需用的粗细绳 15000 普特；
 - (4) 归中央消费机关支配的麻制品如下：

顺序号	消费机关名称	各种缆索数量(普特)	各种绳索数量(普特)	各种细绳数量(普特)
1	农业人民委员部		8000	
2	粮食人民委员部	12500	17500	5000
3	煤炭总委员会	10100		
4	渔业和渔品总局	4000	16000	
5	林业总委员会	116500	12000	

续 表

顺序号	消费机关名称	各种缆索数量(普特)	各种绳索数量(普特)	各种细绳数量(普特)
6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	2000	1500	
7	国营机械制造厂联合公司	2000	5000	
8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矿业协会	2500		
9	交通人民委员部,铁路	2000	5000	
10	交通人民委员部,水路运输	56000	12000	
11	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运输器材局		1000	
12	国家建筑工程总委员会	3000	2000	
13	内务人民委员部	1000	2000	1000
14	教育人民委员部	500	1500	
15	制革总委员会	1000	100	100
16	泥炭工业总管理局	3000	1500	
17	工业企业农场总管理局	1000		
	总 计	217100	85100	6100

4. 未作分配的其余麻制缆索留作储备,其用途由利用委员会另行决定。

5. 调拨工作由纺织工业总管理局负责,中央消费机关须向其出具由利用委员会统一设计的凭单。

6. 纺织工业总管理局和中央消费机关应在下一个报告月的25日之前分别向利用委员会提供上述物资调拨的月度报告及接收和消耗情况的月度报告。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590

关于调拨 15 万普特大麻纤维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13 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13 日会议就从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储备中为麻纤制品司调拨 15 万普特大麻纤维问题决定如下：

说明：在最后一批运到的大麻纤维质量如前的情况下方可将上述 15 万普特大麻纤维从库存中冲销。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 年 4 月 13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591

**关于关闭莫斯科—梁赞铁路伊诺科夫卡—
因扎维诺段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关闭伊诺科夫卡—因扎维诺段，同时要求交通人民委员部养护好线路，以使在需要时保证装甲列车和运载留种马铃薯的直达货运列车畅行无阻。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No 10592

关于延长扩大耐火砖生产的有效期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13日会议决定：

(1) 将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3月23日作出的关于扩大生产耐火砖的决定的有效期延长至今年4月25日。

(2) 责成邮电人民委员部将博洛京同志有关扩大生产耐火砖问题的全部报告直接转来，并接收对博洛京同志的电报答复。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No 10593

关于对耐火砖生产工人实行专供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13日会议决定：

批准工人供给委员会关于提高耐火砖业工人的供给标准的意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 10594

**关于扩大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决定的
适用范围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13 日会议就对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6 日关于对一些地区渔业采购站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决定^① 增补内容决定如下：

劳动国防委员会 4 月 6 日的决定也适用于上沃洛乔克渔业采购站所属的 1600 人。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关于在 6 月 1 日前对白海地区渔业管理局、乌拉尔-恩巴地区渔业管理局、萨拉托夫渔业采购站和诺夫哥罗德省渔业管理局工人实行军事化管理的决定。

№10595

关于以日用品奖励工人发起小组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13日会议决定：

责成产品特别委员会依照下列清单向俄美工具制造厂工人及其家属发放下列物品，以奖励他们为装备工厂所作的贡献。

男装	75套
童装	60套
童鞋	60双
男内衣	146套
儿童内衣	180套
女套鞋	21双
男袜	142双
童袜	120双
男风衣	70件
女风衣	61件
儿童风衣	60件
男式手套	75副
女式手套	60副
女裙	61件
男鞋	75双
女鞋	42双
女内衣	183套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男式套鞋	75 双
儿童套鞋	60 双
女式长袜	183 双
怀表	73 块
床单	392 条
毛衣	75 件
女式毛衣	61 件
儿童毛衣	60 件
女式暖手筒	61 副
儿童暖手筒	27 副

责成阿瓦涅索夫^①同志将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已发出的物品数量点清并列入这个项目。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① 阿瓦涅夫，瓦·亚·（1884～1930）——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0年初任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0～1924年任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1924～1925年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10596

关于向海关部门员工供应专供口粮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4月13日会议决定：

对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3月23日关于海关工人粮食供应的决定作如下修改：“必须从今年4月1日起供给海关工人专供口粮，而不是后方红军战士口粮。”

№ 10597

关于向劳动公社调拨小麦和黍子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重申必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向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聚居区调拨 10 万普特小麦和 3 万普特黍子的决定，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关于执行情况的书面报告。委托粮食人民委员部将这一指示电告萨拉托夫地方当局。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598

关于特种部队的供应标准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13日会议决定：

在中央委员会执行警卫任务的特种部队与全俄肃反委员会所属部队享受同一供应标准。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No 10599

关于草鞋分配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13日会议决定：

- (1) 允许粮食人民委员部把 75 万双草鞋分配完。
- (2) 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特派员今后只能根据利用委员会的决定调拨草鞋。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0600

关于调拨 3 万双草鞋的决定

(1921 年 4 月 13 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13 日会议决定：

命令利用委员会从自己的储备中为交通人民委员部的装卸工拨出 3 万双草鞋。

关于向装卸工提供 3000 套服装问题，应与工作服委员会协商解决。出现分歧时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处理。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 年 4 月 13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01

关于收回面料和缝纫线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作为对今年4月1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收回莫斯科军区军需部仓库所存面料和缝纫线（见明细表第32号^②）并通过协商将它们转交服装工业总局和中央供应管理局。

将成品（见明细表第33号^③）和明细表第34号^④所示各种物品转交工作服委员会。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4月1日作出的关于从“红色礼物”委员会仓库收回信纸、复写纸、细绳和小木勺并将它们转交军用物品管理总局的决定。
- ② 《莫斯科军区仓库所存、应通过协商转交服装工业总局和中央供应管理局的面料和缝纫线明细表第32号》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第19全宗，第3目录，第205保管单位，第140、146页。
- ③ 《莫斯科军区仓库所存、应转交工作服委员会的成品明细表第33号》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第19全宗，第3目录，第205保管单位，第142、147页。
- ④ 《莫斯科军区仓库所存、应转交地方机构的物品明细表第34号》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第19全宗，第3目录，第205保管单位，第148页。

№10602

关于将麻袋交包装局支配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作为对今年3月5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将存放在军事工程总局仓库的90万条麻袋交粮食人民委员部
包装局支配。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3月5日关于军事部门将存放在军事工程总局仓库的工程器材转交地方机构的决定

№ 10603

关于将打字机交印刷局支配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作为对今年4月1日决定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从工农红军司令部收回15台完好的和13台有损坏的打字机并
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印刷局支配。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04

关于将日用品转交地方机构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作为对1921年4月1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军事部门将存放在西方面军仓库的日用品（见所附明细表）转交地方机构。

附件：第31号的明细表^②。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4月1日关于军事部门将存放在军用物品管理总局仓库的1500万枚栓钉、8万普特钉子和3万个扳子转交地方机构的决定。

② 《西方面军转交地方机构的办公日用品明细表第31号》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第19全宗，第3目录，第205保管单位，第159页。

№10605

关于将挽具转交地方机构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作为对今年2月15日决定^①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军事部门将存放在西方面军仓库的挽具（见所附明细表）转交
地方机构。

附件：明细表^②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13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显然是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军事部门将存放在军用物品管理总局仓库的物资转交地方机构的决定。

② 《西方面军转交地方机构的挽具明细表》见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第19全宗，第3目录，第205保管单位，第135页。

№ 10606

关于不得擅自提取皮带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13日会议决定：

告诉彼得格勒国民经济委员会不得擅自从橡胶工业总局彼得格勒仓库提取皮带，责成该委员会立即打电话对其提走利用委员会并没有决定拨给它的皮带（1000俄尺）一事作出解释。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 10607

关于将长波无线电接收机归还 巴库广播电台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13日会议决定：

(1) 责成海军部门下令将卸下的邮电人民委员部的无线电接收机迅速送回供巴库广播电台安装使用。

(2) 责成邮电人民委员部在必要时向海军部门提供一台小功率的无线电接收机。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 10608

关于制止盗窃流送木材的决定

(1921年4月13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13日会议决定：

责成莫斯科州燃料和森林工业托拉斯采取坚决措施制止盗窃沿莫斯科河流送的木材，于星期三即4月20日对流送木材的数量、对为防止盗窃和对流送工作实施更为有效的监督而采取的措施作出报告。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 10609

致各省粮食委员会

(1921年4月13日)

人民委员会关于各省粮食人民委员向产品特别委员会报告到1921年4月1日的商品剩余情况的命令。

尽管多次要求上报到4月1日止的商品剩余情况，但许多省至今没有交出报告。兹命令尚未提供报告的省粮食人民委员亲自负责，立即电告产品特别委员会几种主要商品的剩余情况以及按照布留哈诺夫3月28日第2768/B号电报要求留作商品交换用的商品的数量。请通过邮局将商品明细表寄来。

人民委员会主席 列宁
粮食人民委员 亚·瞿鲁巴

№10610

关于秋明省行政归属问题的决定

(1921年4月14日)

根据斯米尔诺夫同志的报告特作如下决定：

1. 在最后划定疆界之前，秋明省在军事方面暂归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管辖。

2.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0年4月25日的指示^①撤销。

3. 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召开有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秋明省执行委员会、吉尔吉斯共和国、乌拉尔经济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出席的工作会议，就有关秋明省的问题作出决定。

4. 就马克西莫夫的电报作如下说明：同各经济人民委员部的关系是由关于经济委员会的规定^②决定的。

5. 将有关15个乡划归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省的问题^③提前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区划委员会讨论，以便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期间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决定。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① 指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车里雅宾斯克省、秋明省和伊希姆县不再由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而由第一劳动军革命委员会管辖的决定。

②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3月25日作出的关于各州经济机关的暂行规定。

③ 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在1921年是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阿克莫林斯克省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县的中心（见《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和白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所属各省、县和乡资料汇编》，第86、87页，国家出版社，1921）。

№10611

关于为哥里自治共和国境内山民分配土地的决定

(1921年4月14日)

1. 批转涅夫斯基同志的报告。

2. 哥萨克村落不得迁移。

3. 满足山民土地需求的办法是哥萨克人执行委员会同山民(印古什人、车臣人、奥塞梯人)执行委员会通过协商将哥里共和国境内哥萨克村落的土地腾出一部分,同时责成山民执行委员会把腾出的土地和已迁移的哥萨克人的土地合理地分配给山民中的贫农。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 阿·叶努基泽^①

^① 叶努基泽,阿·萨·(1877~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主任、全俄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秘书。1934年当选中央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10612

列宁关于执行提供 10 万普特
小麦种子的命令的指示

(1921 年 4 月 14 日)

萨拉托夫，致省粮食人民委员

抄送：省执行委员会；

波克罗夫斯克，致省粮食人民委员

为贯彻劳动国防委员会 4 月 8 日的决定，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在 4 月 9 日第 279 号电报^①中责成波克罗夫斯克省粮食人民委员立即向德意志人民公社提供 10 万普特种子用小麦，并指出工会工作由省粮食人民委员负责。现在，从德意志人民公社所在省的省粮食人民委员 4 月 12 日提供的情况看来，波克罗夫斯克省粮食人民委员回避执行命令。对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敷衍塞责是不能允许的，因此我命令萨拉托夫省执行委员会和省粮食人民委员采取实际措施，以保证波克罗夫斯克省粮食人民委员完成下达的任务，并立即通过直达电报向粮食人民委员部、分配部报告采取措施完成任务的情况，将报告副本抄送农业人民委员部。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列宁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弗·伊·列宁和粮食人民委员亚·德·瞿鲁巴给当时在波克罗夫斯克市的粮食人民委员的命令，要求他迅速调出 10 万普特小麦种子以满足伏尔加河流域德意志人聚居区劳动公社的需求。

№10613

**关于坚决执行停止使用直达电报
商谈的决定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人民委员会 1921年4月15日会议决定：

鉴于一些政府机关和领导人屡屡违反人民委员会 1920年9月23日关于直达电报使用办法的决定，从而延误了国家重要急电的拍发，在此人民委员会重申：各人民委员部、劳动军革命委员会、总管理机构及所有中央管理机关及其部门都必须坚决执行人民委员会 1920年9月23日的决定，不允许任何违反规定的事情发生。

秘书 斯维尔斯卡娅

№10614

关于吸收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代表 参加区域经济委员会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15日会议决定：

吸收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参加区域经济委员会，这些代表享有发言权。参加区域经济委员会的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代表应由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这些代表的专门任务是检查区域经济委员会履行职责和完成任务的情况。

吸收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参加区域经济委员会，目的还在于将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 10615

关于向顿巴斯提供技术援助问题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决定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15 日会议就向顿巴斯提供技术援助问题决定如下：

(1) 赞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撤销劳动国防委员会在顿巴斯的所有平行机构和特派员的建议，把顿巴斯的工作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常设机构集中处理。

(2) 委托李可夫同志与捷尔任斯基同志就最大限度地协同工作和撤销捷尔任斯基的特别委员会的可能性问题进行磋商。

如有分歧，将有关问题交劳动国防委员会处理。

(3) 责成乌克兰工业局确定上述工人在向顿巴斯提供技术装备方面和协调其他重要工业部门与这次工作的关系方面应负的确切责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0616

关于向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拖拉机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为明确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1 日作出的关于采取措施以保证西伯利亚、乌克兰和高加索地区用汽车运送粮食工作的顺利进行的决定第 4 条的内容，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a) 鉴于“伦巴第”牌拖拉机的主要用途是运输，因此农业人民委员部应在今年 5 月 1 日前将其现有的全部状态完好的“伦巴第”牌拖拉机交给粮食人民委员部。

注：除了完好的“伦巴第”牌拖拉机外，还应提供相当于总数 25% 的破损拖拉机，以便拆下零部件作为备件，而且这些破损拖拉机不应包括在应向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的 40 台拖拉机之内。

(b) 命令农业人民委员部将事实上没有用于耕地的完好的“克莱顿”牌拖拉机交粮食人民委员部暂时使用，使粮食人民委员部从农业人民委员部接收的完好拖拉机数目达到 40 台。

2. 农业人民委员部应向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相应数量的拖拉机备件和工具。

3. 农业人民委员部应为其提供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所有拖拉机配备拖拉机手，每台一人。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 年 4 月 15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No 10617

关于加强种用马铃薯的采购及运输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15 日会议就采取紧急措施加强种用马铃薯的采购与运输问题决定如下：

责成由哈拉托夫同志、沃伊柯夫同志和奥金佐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

(a) 对在国外订购种用马铃薯工作的速度和保密情况进行检查；若情况不理想，今后在这方面应采取哪些措施；

(b) 对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其他部门在对外商务活动中的保密工作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

责成委员会亲自迅速落实认为有必要采取的大多数措施。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No 10618

**关于将在木材流送方面有专长的
军人派往省劳动局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作为对2月23日关于动员力量从事木材流送工作的决定的补充，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接到本决定后3日内将1892~1896年出生的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2月23日决定中提到的在木材流送方面有专长的红军战士和各类人员从各部队全部抽调出来并移交给省劳动局，由省劳动局安排他们从事木材流送工作。

2. 在同龄人退役的情况下，被调去从事木材流送工作的人员应在工作地坚持到流送工作结束，按服劳动义务处理。

3.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劳动人民委员部应在24小时内向各自的地方机关下达符合本决定精神的相应指示。

4. 本决定一经电报传达即刻生效。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秘书

№ 10619

关于使用木制油驳运送木材的决定

(1921年4月15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使用正在雷宾斯克地区越冬的木制油驳运送木材的决定：

1. 命令交通人民委员部向林业总委员会提供适合于在莫洛加河流域、舍克斯纳河流域和伏尔加河流域航行的木制油驳来运送上述地区的木材，使用期限到今年5月15日。

2. 命令林业总委员会在上述日期之前将油驳腾空并自己出资对油驳进行认真清洗。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15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No 10620

关于减少居民区内马匹数量的办法的指示

(1921年4月15日)

就减少城市居民区内马匹数量的办法给各省执行委员会所属饲料委员会（根据人民委员会今年4月5日的决定第3条组建）的指示

1. 根据人民委员会今年4月5日的决定^①，现建议减少通过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从国家储备中享受饲料供应的马匹数量。

2. 各地在接到本指示后应成立由工农检察院、省粮食委员会、省执行委员会、省农业局、省运输器材局、省军事委员会和省会议等的代表组成的饲料委员会，该委员会应在接到本指示后10日内：
(a) 查明通过粮食机关享受饲料供应的马匹数量；
(b) 根据新粮上市前可能提供的饲料的数量，规定为苏维埃机关、地方和军事部门服务的马匹的最低数量。

3. 制定和落实从苏维埃机关暂时收回马匹的计划，逐个确定每个机关应收回和保留的马匹数量。各县城也应建立这种由上述代表组成并行使同样职能的委员会。

注：省、县农业局机关为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机关。

4. 委员会应在工农检察院的代表、兽医和被收回马匹的单位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对全部要收回的马匹进行检查。

5. 首先应收回的是那些既不宜在部队和市内使役又不符合乡村人民需要的马匹。

^① 指人民委员会关于采取措施保持共和国马匹数量的决定。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对这样的马匹应屠宰并交粮食人民委员部机关处理。

6. 其次应当收回的是那些因饲料不足而变得衰弱但尚能用于农业生产的马匹。

7. 第三应当收回的是收回马匹对工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单位所拥有的马匹。

8. 第四应当收回的是饲料供应没有保证的其余马匹。

9. 将收回的全部马匹转交省、县农业局，由省、县农业局将其分配给能够自己解决饲料的无马农民和国营农场，而且应优先分配无马的红军战士家庭。

关于马匹的使用和归还条件，由上述饲料委员会视各地情况另行规定并报省执行委员会批准。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15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21

**关于确认边境铁路车站改建工程为
紧急军事工程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1. 确认与芬兰交界的边境车站改建与修复一期工程（旨在俄国与芬兰在这些车站的货物周转量恢复到预期水平）为紧急军事工程，这些工程是：

(a) 设有接发客货列车的车场、机车转向三角线、供机车停留和收集木材的轨道以及临时供水设备的别洛奥斯特罗夫车站；

(b) 需在海关仓库之间敷设两条线路的彼得格勒—芬兰车站；

(c) 需敷设4俄里轨道的拉苏利车站和拉苏利线先头地段。

2. 责成普遍劳动义务制推行总委员会机关首先满足工程所在地的需要。

3. 批准首先利用当地省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储备优先供应工程所必需的各种物资及工具，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在3日内向供应机关提出供应计划。

4. 在工程结束前要保持施工人员的稳定，在确有换班可能时，劳动人民委员部也必须在征得工程管理部门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人员调动。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0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22

关于削减民事部门警卫人员数量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鉴于各中央民事部门至今没有上报有关其必需的警卫人员数目的申请表，责成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第703号令^①成立的军区委员会和方面军委员会在一周内逐个确定各部门必需的警卫人员数量，而后将你们认为多余的警卫人员全部撤掉。

委员会应吸收各省分委员会和有关部门代表共同参与此项工作。

如民事部门不向委员会上报申请表，则可在提出警告后一周内将警卫人员撤掉。

工农红军司令部应在3周内向中央复员委员会报告取得的成果，以便在需要时能够进一步削减警卫人员的数量。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0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① 见《陆军人民委员部通报》1921年4月16日第66号。

№10623

关于将红军战士调往民警局工作 一年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为使民警局能够完成劳动国防委员会在今年3月23日的决定^①中赋予它的任务，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经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协商，将现在工农红军中服役的、1897年出生的红军战士调往民警局，被调动人员在民警局的工作期限为一年，一年后愿意留下来的人可继续留在民警局工作。

(2) 调动的红军战士自调到民警局之日起应完全遵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0年6月10日的《民警局条例》。

(3) 调红军战士去民警局工作的具体办法由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商定，被调动的红军战士应身着调动前的服装离队。民警局的装备问题应由内务人民委员部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解决。

(4)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经与内务人民委员部协商，还可将一定数量的指挥人员，主要是不能在作战部队继续服役的指挥人员调往民警局工作。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削减军事和民事部门的警卫护送勤务的决定。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0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24

**关于优先安排扫雷艇和护卫舰再装备与
维修工程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4月20日会议就优先安排伏尔加河扫雷艇和护卫舰的维修与再装备工程的决定如下：

(1) 确认从伏尔加河和黑海调往波罗的海的12艘舰只的再装备与维修（其中1艘需再装备，11艘需维修）工程为应予优先安排的工程。

(2) 交通人民委员部应在今年5月15日前全面结束舰艇再装备及维修工程，并赶在水位下降前将舰艇调往波罗的海。交通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应在今年5月15日前结束自己的工作，并指定专人负责以保证按期完成任务。

(3) 命令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1日的决定^①、参照适用于扫雷艇维修的奖励标准，立即将工人的奖励粮如数拨出。

责成哥尔茨曼同志、哈拉托夫同志和佐夫同志最迟在3日内将他们共同签署的关于伏尔加河扫雷艇和护卫舰维修工程奖励实施情况的材料上报劳动国防委员会。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保障舰船维修和波罗的海扫雷工作的决定。

No 10625

**关于向楚瓦什自治州调拨纺织品、
鞋和其他商品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4月20日会议就向楚瓦什州调拨纺织品、鞋和其他商品问题决定如下：

1. (1) 利用委员会应迅速向楚瓦什共和国^①调拨20万米坯布。

(2) 为楚瓦什共和国调拨3000双鞋。

(3) 产品特别委员会各分支机构应设法从速落实已确定的所有为楚瓦什共和国供货的任务。

2. 人民委员会今年4月19日指定的委员会应继续开展工作。责成该委员会想方设法进一步满足楚瓦什州的需求并查明粮食人民委员部1920年下达的为楚瓦什州各类居民供应粮食的任务的落实情况。委员会应在星期二，即今年4月26日，向人民委员会作出报告。

劳动国防委员会代理秘书 玛·[沃洛季切娃]

① 这里及以下各处均为原件的提法。

№10626

关于保留公共食堂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4月20日会议就保留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公共食堂问题决定如下：

(1)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在5月上半月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提供相当于3月份实际供应量的一半（即5万普特）的肉类供公共食堂和儿童食堂所用，并根据食堂入伙人数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之间进行分配。

(2) 成立由哥伊赫巴尔格同志、巴达耶夫同志和洛巴切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任务是在星期五之前^①弄清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把肉和鱼调往中心城市，还要弄清削减哪些消费者的供应才能满足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公共食堂的需要，标准低一些也无妨。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① 1921年4月22日。

№ 10627

关于提供汽车和摩托车的决定

(1921年4月20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20 日会议就向莫斯科市卸载委员会提供车辆问题决定如下：

重申劳动国防委员会 3 月 23 日作出的关于向莫斯科卸载委员会提供 1 辆汽车和 1 辆摩托车的决定^①。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下达在两日内从任何一个车库调出车辆的指示。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① 指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向莫斯科市卸载委员会提供 2 辆小汽车和 2 辆摩托车的决定。

№10628

关于扩大同阿塞拜疆签订工贸和经济协定的 委员会的权限的决定

(1921年4月21日)

1. 扩大同阿塞拜疆签订工贸和经济协定的委员会的权限，责成该委员会：

(a) 制定阿塞拜疆共和国、亚美尼亚共和国、格鲁吉亚共和国与梯弗利斯中央管理机关实现经济统一的草案；

(b) 起草三个共和国与上一条提到的中央管理机关的经济和工贸协定的草案。

2. 责成斯大林同志以委员会主席身份，用直达电报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三个共和国的代表召到莫斯科签订上述协定。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 10629

关于组织儿童夏令营的决定

(1921年4月21日)

1. 建议各省执行委员会对搞好这次儿童夏令营活动给予特别关注并加紧工作，为此应投入尽量多的人力物力，如划拨场地、对场地进行维修和提供设备等。

2. 批准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必须从速优先为儿童夏令营划拨场地的通令，批准农业人民委员部关于在国营农场为儿童夏令营划拨土地并提供种子及农具的通令。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米·加里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阿·叶努基泽

№10630

关于订阅国外出版的俄文报刊的决定

(1921年4月21日)

1. 命令俄罗斯联邦驻雷瓦尔公使馆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订阅 20 份国外（柏林、巴黎、华沙）出版的主要俄文报刊和杂志：《最近消息》（巴黎）、《舵轮报》（柏林）、《共同事业报》（巴黎）、《俄国书籍》（柏林）、《俄国呼声报》（柏林）、《俄罗斯意志报》（布拉格）、《社会主义通报》（柏林）、《为人民事业报》（雷瓦尔）、《自由报》（华沙）、《俄国思想》杂志、《现代纪事》杂志。每次邮寄时应单独打包将报纸杂志寄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由秘书处将它们分发给主席团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编辑，每人一份。

2. 责成阿瓦涅索夫同志关注各机关接收国外报刊的情况。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No 10631

关于停止无偿向农民提供农具的命令

(1921年4月21日)

1. 命令农业人民委员部采取紧急措施停止无偿向农民提供农具和其他用具，只有在现存专门决定对某些团体或某些个人作出规定的特殊情况下方可沿用无偿提供农具和其他用具的办法。

2. 命令农业人民委员部本着以农产品换取等价的农具和用具的原则抓紧制定向农民提供农具和其他用具的一般办法并将有关的决定草案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 10632

关于向各省执行委员会发送钞票的决定的决定

(1921年4月22日)

为使向各地发送钞票的工作有序进行，人民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22 日会议决定：

(1) 人民委员会依照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据财政人民委员部报告于 1920 年 6 月 19 日作出的决定的第 12 条和第 13 条的规定，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仅在确属紧急和重要的特殊情况下沿用预留钞票的办法，而在其余情况下应把向各地发送的钞票交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支配，由它们根据本省机关和企业的实际需要独立分配钞票。

(2) 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在 5 月份内向彼得格勒调拨 135 亿卢布。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秘书 斯维尔斯卡娅

No 10633

**关于在审议进口计划时通过预算方案的
条件的决定**

(1921年4月22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2日会议决定：

今后在审议进口计划时通过的预算方案必须按照现行的市场价格加上附加费用计算。

本决定务必通知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各人民委员部和各主管局的领导。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0634

关于在国外购买泥炭工业所需工厂设备的决定

(1921年4月22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22日会议决定：

批准泥炭工业总局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为泥炭水利开采管理局购买两家德国工厂和由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为泥炭工业总局购买两个过滤器和其他所需物品而拨付必要数额的德国马克问题的决定。

委托列扎瓦同志今天电告柯普请他转告克拉松，并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克拉松有足够的钱为泥炭水利开采管理局立即购买两家德国工厂。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0635

关于执行削减警卫、护送勤务的决定的通令

(1921年4月25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

1. 责成各省执行委员会采取实际措施，立即在各地贯彻执行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3月23日关于削减军事部门和民事部门警卫、护送勤务的决定。

2. 鉴于警力有限，又缺乏足够的资金用以补充人员、装备和警服，责成各省执行委员会在确定需要民警保护的民事部门的机关和仓库时，坚持尽可能削减警卫目标的原则，方法是对警卫目标进行全面评价及合理利用当地现有的警力。

3. 责成内务人民委员部通过共和国民警部队首长检查本决定执行情况并对各地区给以具体指导。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米·加里宁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秘书 阿·叶努基泽

№10636

**关于确保为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公共饮食业
采购鱼产品的决定**

(1921年4月25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向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运送鱼、肉产品的决定、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责成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两周内从部队抽调 18000 名壮劳力到渔场工作，其中 10000 人到伏尔加 - 里海渔场，5000 人到里海中部渔场和里海南部渔场，3000 人到摩尔曼斯克渔场。

2. 责成最高运输委员会将这些劳力如期送到指定地点。

3. 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从红军中抽调 3500 名 1895 ~ 1896 年出生或更年轻的制桶工匠，由劳动人民委员部分配给包装局和渔业和鱼品工业总局（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和行政管理负责人不在抽调人员之列）。

4. 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采取最坚决的措施落实其宣布的由察里津省劳动局动员 8000 名妇女、萨拉托夫省劳动局动员 1000 名妇女、斯塔夫罗波尔省劳动局动员 500 名妇女的动员令。

5. (1) 责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向渔业和鱼品工业总局调拨 3 万双胶鞋（首先是高筒靴）。

(2) 责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在两周内与食品业工会中央委员会和渔业和鱼品工业总局一起为渔民运送 5 万套制服、1 万条围裙、3 万双防水手套和皮手套，以及 4 万双各种型号的鞋。

(3) 责成利用委员会在 5 日内通过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向渔业

和鱼品工业总管理局的个体渔民每人提供 15 俄尺的衣料。

6.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立即完成已开始实施但迄今尚未完成 25500 普特细纱、3000 普特鱼网和 17 台织网机的订购任务。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将已运抵雷瓦尔和里加的全部鱼类食品火速运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

责成对外贸易委员会在 5 天之内对渔业和鱼品工业总管理局关于波斯货币的申请进行审议。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有关委员会确保为制作渔场急需的木桶采购的木材（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 500 标准木材）及时发货。

7. 命令林业总委员会火速发运渔场需要的所有制桶材料，其中包括立即向咸海地区发运 375000 个桶箍。

8.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运输材料处按照渔业和鱼品工业总管理局的请求立即向鞑靼共和国各车站、港口运送树脂产品（1 万普特），粮食人民委员部要保证为这次行动提供所需饲料。

9. 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在一周内就伏尔加水运区域管理局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的决定将一批轮船和大型舢板转交各渔业管理局的情况提出报告。

命令里海航运管理局立即确保从阿斯特拉罕向达吉斯坦的彼得罗夫斯克调拨 50 万普特包装材料。

10. 责成利用委员会按照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批准的预算在 5 日内向其提供对各渔场工作人员进行实物奖励所需的全部物品。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 年 4 月 25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37

关于向居民供应鱼、肉、面包、油脂和 其他食品的计划的决定

(1921年4月26日)

—

附有列宁修改意见的决定草案第5项

加上伊万诺沃 - 沃兹涅先斯克 5. 粮食人民委员部必须确保5月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公共饮食、儿童膳食、机关内部伙食不低于上半月的标准。为此可动用从国外进口的鱼类食品，也可动用莫斯科消费公社和彼得格勒省消费公社的资金通过直达列车（使用专用包皮并配备装卸工）尽可能从彼得罗夫斯克调运鱼产品，以及尽可能压缩军队的消费量。

二

人民委员会的决定

人民委员会决定：

1. 据粮食人民委员部报告：截止到4月1日，现有的鱼类食品为2875361普特，预计5~8月份可获得650万普特的鱼产品，包括春季渔汛的捕获量。

根据这些数字和拟从国外进口的鱼类食品，计划5、6月份每月拨给俄国欧洲部分150万普特的鱼类食品，7、8月份每月拨给200万普特。

鱼产品计划的按时完成完全取决于捕鱼及外运的进度。将这项工作列入突击性工作，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无论如何要保证这项工作的劳动力。一周后劳动人民委员部和粮食人民委员部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执行情况，并报告以前曾采取哪些措施，说明为什么光有这些措施还不够。

2. 将4月1日前各地已收购上来的肉类食品作为专用物资运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存入冷库以备急需。

鉴于近几个月内肉产品的追加收购尚无把握，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和罐头工业总委员会在一周内审议入秋前能否向罐头厂供应肉的问题，并在规定期限内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

5月份追加收购肉食品不再按计划摊派，鉴于肉食品收购由摊派改行收税，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弄清6—9月份应收购多少肉食品才能从6月份开始实行计划供应。

3. 据悉，5月份的肉、鱼食品计划是根据4月份对消费者的统计制定的，并根据新的统计数字作了压缩。计划无需详细审查，可以付诸执行。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一周内重新修订部队的肉、鱼和油脂的供应标准，目的是在非常困难时期和对劳动居民的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削减对部队的供应。请将结果在一周内报告劳动国防委员会。

4. 对已作出的关于莫斯科和彼得格勒节日供应的决定应予以考虑。

5. 粮食人民委员部必须确保5月下半月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公共饮食、儿童膳食、机关内部伙食不低于上半月的标准。为此可

动用从国外进口的鱼类食品，也可动用莫斯科消费公社和彼得格勒省消费公社的资金通过直达列车（使用专用包皮并配备装卸工）尽可能从彼得罗夫斯克调运鱼产品，以及尽可能压缩军队的消费量。

责成彼得格勒消费公社、莫斯科消费公社及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消费公社火速组织这种直达列车。

6. 估计用4月1日前收集的750万普特油料可加工190万普特植物油。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中央生产委员会在一周内会同粮食人民委员部修订油脂工业总委员会的生产计划，即扩大生产计划，8月1日前将工厂和粮食收集站现有的油料加工完毕。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及时将油料运往工厂。

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油脂工业总委员会应在两周后就上述问题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工作。

在扩大生产计划的条件下，俄国欧洲部分5、6、7三个月每月计划分配25万普特植物油，8月份分配50万普特。预计收购牛油962000普特，计划5~8月份将其中的73万普特分配给俄国欧洲部分，各月分配数量为：5月份分配65000普特，6月份分配125000普特，7月份分配259000普特，8月份分配281000普特。

7. 由粮食人民委员部提出并经利用委员会确认的4~6月份油脂分配计划应予以执行，同时责成利用委员会根据已经明朗的5月份油脂资源可能增加的数量制定补充规定。

对乌克兰消费者的油脂供应应当依靠当地资源解决。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的消费应执行利用委员会确定的标准，并靠扩大这些地区的生产及收购计划来解决。

责成利用委员会在一个月对已批准的油脂使用计划进行修订，以使这一计划同预计扩大的油脂工业总委员会的生产计划，同粮食人民委员部关于动物油从6月份起有可能增加的预测相吻合。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8. 据悉，5月份粮食计划是根据4月份的需求量制定的，并根据新的统计数字作了压缩。计划无需详细审查，批准实施。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人民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26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38

关于将羊毛和熟羊皮转入出口储备的决定

(1921年4月26日)

1. 鉴于洗净的羊毛取代熟羊皮成为受欢迎的出口商品，责成燃料总委员会和东南经济会议采取一切措施，确保燃料供应，保存好熟羊皮。

2. 将5万普特熟羊皮转入出口储备，如果出口的熟羊皮超过5万普特，多余部分不好存放，容许东南经济会议增加出口储备；如果出口的熟羊皮少于5万普特，可减少出口储备。

3. 命令最高运输委员会和经济会议采取一切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将羊毛运往纺织工业总局的中心仓库。

人民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26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39

关于顿巴斯等工厂职工供应标准的决定

(1921年4月26日)

鉴于顿巴斯联合企业和马克耶夫卡、尤佐夫卡、彼得罗夫斯克工厂完成金属冶炼突击计划的工作对国家极为重要，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顿巴斯联合企业和马克耶夫卡、尤佐夫卡、彼得罗夫斯克工厂的 16200 名职工和 32400 名家属（实际上有 39409 人）将享受与这些企业的矿工同样的供应标准。

(2) 全权委员会关于按井下工人的标准供应联合企业的决定应无条件执行。

(3) 这些企业的工人家属将获得同矿工家属一样的食品。

(4) 从事特别有害健康工作的工人将按照五金工人中央委员会南方局与乌克兰工人供给委员会商定的标准获得供应品。

(5) 为联合企业设立的供应和奖励基金，无论是提供给五金工人的还是提供给矿工的，均由联合企业统一掌握，不管进项来源如何，一律由工厂管理处按照实际情况调配。

(6) 责成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今后在关于顿巴斯实际供应的综合报告中将上述各联合企业的供应情况单列出来。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6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No10640

关于红军裁减员额后的粮食供应标准的决定

(1921年4月27日)

为了改善红军裁减员额后的粮食供给，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责成陆海军粮食供应总部利用它所掌握的粮食首先保证军队的需要，但是军队的粮食总消耗量不得超过4月份计划消耗的数量，由于军队裁减员额每月节省粮食50%，应利用节省下来的这部分粮食使目前人员裁减后的口粮达到法定标准，扩大前线与后方的口粮差额，首先对那些更坚决地裁减员额的方面军和军区实行这种改善供给的办法。

2. 自今年9月1日起全军所有人员都应领取足额前线口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务必向部队和军事院校（近114万人）提供足额前线口粮，对行政管理机关和后方机关中1/3的人员（约12万人）提供足额前线口粮，对其余2/3的人员（约24万人）提供后方口粮；根据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1920年第103号命令军队医疗机构固定人员领取普通口粮。

3. 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劳动国防委员会资源利用委员会拨给陆海军粮食供应总部的粮食应按照本决定第1项与第2项规定的标准首先保证军队的供给，只有军队的供给得到保证之后才能将剩余粮食供应归陆海军粮食供应总部负责供给的其他消费群体。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41

关于撤消各地军用仓库人员审查委员会的决定

(1921年4月27日)

鉴于同波兰的战争已经结束并与之签订了和约，国内外所有战事均已消除，共和国已转入和平状态，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命令劳动国防委员会中央军用仓库人员审查委员会在一个月内撤消其按照劳动国防委员会1920年5月10日决定在各地建立的机构。

具体实施办法按照劳动国防委员会中央军用仓库人员审查委员会颁布的条例进行。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42

关于恢复勒拿金矿的决定

(1921年4月27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恢复勒拿采金工业的决定：

1. 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反对在勒拿金矿开采黄金是没有根据的。
2. 责成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按照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批准的生产计划，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恢复勒拿金矿。
3. 责成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每月一次将勒拿金矿总的情况电告国防委员会。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0643

关于纺织厂燃料供给的决定

(1921年4月27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4月27日会议就纺织厂燃料供给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1. 目前燃料总委员会计划委员会尚未制定出1921年下半年的计划，因此无法确定1921年下半年能否向纺织工业总局提供燃料。

2. 1921年上半年燃料总委员会无力向纺织工业总局额外提供劳动国防委员会规定的75000立方米木柴。

3. 这批75000立方米木柴必须在1921年下半年拨给纺织工业总局。

4. 纺织工业总局自行采伐、不需要铁路运输的木柴全部归其所有。在紧急情况下，燃料总委员会有权处置这批木柴并立即将有关情况通知纺织工业总局。

5. 责成纺织工业总局在取得森林工业总委员会、燃料总委员会和劳动人民委员部的同意后，建立利用纺织厂专职工人采伐木材和采购其他燃料的制度，而且由这些工人采伐的木柴为相应的纺织厂专用。

6. 驳回纺织工业总局关于授权其下半年独立采伐和运输木柴的申请，命令纺织工业总局与森林工业总委员会就是否可以用通常的方式划出独立采伐区的问题达成协议。

7. 命令纺织工业总局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将其采伐的木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柴多运出一些，授权纺织工业总局在不能提供饲料的情况下按照省林业委员会的标准用布匹给马车运货工以补偿。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44

**关于取消有关从叶戈尔希诺煤矿往彼得格勒
运送煤炭的条款的决定**

(1921年4月27日)

鉴于乌拉尔利用叶戈尔希诺无烟煤进行生产的工厂所消耗的煤炭不仅相当于而且超出了叶戈尔希诺煤矿的开采量，决定取消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1月13日关于每月必须为彼得格勒国民经济委员会燃料处提供300车皮叶戈尔希诺无烟煤的决定。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45

关于将食盐运往缺盐地区的决定

(1921年4月27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将克里木和黑海、亚速海沿岸地区各港口及铁路线上储存的食盐运往共和国缺盐地区，将储存在盐场的食盐运往各铁路线和港口以便运往缺盐地区。

2. 命令最高运输委员会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的数据，在3日内拟订一个铁路和水上运输食盐的计划，交通人民委员部应保证为其提供必要的运输工具。

3. 责成乌克兰指挥部从复员的红军部队中抽调必要数量的干部负责盐场、装卸场所的食盐保护和途中押运，以负责将盐装车装船，将食盐从盐场运往各铁路线和港口，与粮食人民委员部商定实物奖励的办法。

4. 命令中央军事交通部抽调必要数量的载重汽车队支援地方上的马车运输，以便将食盐从盐场运往各铁路线和港口，命令交通人民委员部提供必要数量的取暖货车供参加运送和装卸食盐的工人住宿。

5. 命令乌克兰粮食人民委员部保证向运送、装卸和外运食盐的部队提供足额红军战士口粮。

6. 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1月18日的决定，按照燃料总委员会的调拨单每月为巴赫姆特盐矿提供不少于240车皮的煤，以便将矿井下的盐运到地面和重磨已爆破并准备运上来的岩盐，命令交

通人民委员部按照与粮食人民委员部商定的限期提供必要数量的运输工具，以便将这些盐运出。

7. 第6条规定归南方制盐工业联合公司支配的燃料不得以任何名义征用，此事由全乌克兰燃料和粮食特别委员会负责。

8. 要把满足南方制盐工业联合公司对设备、修缮和技术材料的要求与满足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的需求同等看待。

9. 批准部门间关于对以顿巴斯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形式超额完成燃料总委员会煤炭开采计划的工人予以奖励的协定，可利用为此而专门设立的盐业基金。

注：奖励标准在今年4月29日星期五之前还要取得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同意。

10. 责成劳动国防委员会特派员伏龙芝同志对采取措施从南方运出食盐进行监督，要求盐业总委员会、粮食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在24小时内为他提供一名常务助手。

11. 责成盐业总委员会和粮食委员部每两周一次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交一份有关食盐的采购和运输状况的简要报告。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46

关于确保 1921 年食盐需求的决定的补充

(1921 年 4 月 27 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对 1921 年 2 月 18 日的决定作如下补充决定：

1. 命令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 2 月 18 日的决定，将巴斯昆恰克盐湖列入一类实物奖励范围，并根据该决定尽快建立盐业工人工作服基金。

2. 鉴于共和国铁道兵部队正在进行裁减，命令中央军事交通部把铁道兵部队野战指挥部定编后多余的人员留下来，让他们去从事巴斯昆恰克盐湖各采盐分场的建设工作，把曾在亚历山德罗夫盖—恩巴线铁路建筑工地上工作的铁道兵部队留下来。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 年 4 月 27 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47

关于提供货物运输工具问题的决定

(1921年4月27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1921年4月27日会议就向粮食人民委员部提供运输工具问题作出如下决定：

- (1) 征调275辆汽车并将其转交粮食人民委员部。
- (2) 额外征调100辆汽车并将其移交粮食人民委员部。责成埃利斯曼同志负责执行上述决定中有关军车的规定。
- (3) 责成全俄肃反委员会（由温什利赫特具体负责）对及时执行上述决定及材料和配件的供应情况进行全面监督，并协助采取坚决措施落实征调委员会的决定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汽车中心的有关命令。
- (4) 5月15日为移交所有汽车和拖拉机的最后期限。
- (5) 命令农业人民委员部于星期五之前将负责运送拖拉机的人员名单报上来。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 10648

**关于为西伯利亚等地粮食工作者
发放皮革制服的决定**

(1921年4月27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对其今年4月1日的决定的第12条作如下补充：

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汽车运输管理局申请，从共和国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负责调配的储备物资中拨给该局一批皮革制服，发放给西伯利亚、乌克兰和高加索的粮食工作者。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No 10649

关于淘汰莫斯科病弱马匹的进度问题的决定

(1921年4月27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4月27日会议就淘汰莫斯科病弱马匹的进度问题作如下决定：

1. 对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年3月8日决定的第5条进行修改，将莫斯科苏维埃辎重马车队的马增至6000匹，其中轻便马车的马不超过1000匹。

2. 责成莫斯科运输器材局运输检查处对合理使用轻便运输工具进行严格监督，其数量不得超过第1条的规定。

3. 命令马匹鉴定委员会吸收莫斯科军区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对军用辎重马车队的马匹进行复查，淘汰不能使用的马匹。

4. 两周后向莫斯科防卫委员会提交一份有关执行决定结果的报告。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50

**关于增加留在莫斯科和莫斯科省的
马匹配额的决定**

(1921年4月27日)

决定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27日会议决定：

同意陆军人民委员部关于将留在莫斯科和莫斯科省供军事部门使用的马匹配额再增加500匹的申请。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0651

关于移交技术器材的补充决定

(1921年4月27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对今年2月15日的决定补充如下：

军事部门停止使用中央军事交通部仓库存放的技术器材和材料，根据所附的清单将这些物资移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所属的中央金属统计和分配委员会。

(附录：第2号清单)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52

关于将技术器材移交交通人民委员部的补充决定

(1921年4月27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对今年2月15日的决定补充如下：

军事部门停止使用中央军事交通部仓库存放的技术器材和材料，根据所附的清单将这些物资移交交通人民委员部作为动员储备。

(附录：第3号清单)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7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53

**关于各省执行委员会定期提供
当地政治局势简报的决定**

(1921年4月28日)

为了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经常了解各地一般政治局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责成各省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按照内务人民委员部规定的形式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简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No 10634

关于改善产业工人的医疗服务的决定

(1921年4月28日)

1. 报告悉。

2. 苏维埃医学必须为工业无产阶级服务，为此（1）直接在企业中或在企业附近开办医院，必要时由全民医疗机构负担费用；（2）改善对工人上门医疗服务；（3）由卫生人民委员部机关负责把药品送到工厂或工人家中；（4）使工厂委员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工厂医疗工作的安排；（5）将医疗和监督职能归一个机构行使。

（将报告交工人生活改善委员会作进一步研究，然后提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将听取意见的时间通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3. 责成卫生人民委员部采取措施迅速铲除医疗卫生总局机关极度膨胀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作风，裁减医疗卫生总局机关人员，并在一个月内在在这方面采取的措施报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10655

**关于成立中央和地方三人小组
监督石油产品运输工作的决定**

(1921年4月28日)

一、关于中央石油三人小组

成立石油三人小组的目的

1. 为了对1921年通航季节石油产品运输工作进行监督，为了在石油产品运输工作中对劳动国防委员会特派员（伏尔加州州长）予以协助，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22日第4284号决定，成立由燃料总委员会、交通人民委员部和中央军事交通部的代表组成的中央石油三人小组。

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的机构及其相互关系

2. 中央石油三人小组是隶属燃料总委员会的跨部门的最高监督和检查机构。

组成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的部门代表以及从他们中选举产生的主席和副主席，由燃料总委员会主席报请劳动国防委员会批准。

中央石油三人小组通过燃料总委员会主席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工作，报告应预先由中央石油三人小组全体会议审核。

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的执行机构

3. 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的执行机构是中央军事交通部；所有参

与运输石油产品的部门都必须全力协助中央军事交通部专门负责监督石油产品运输的机关完成劳动国防委员会委以的重任。

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的权利

4. 为获得必要的信息资料和统计材料，为协调石油产品运输中产生的各种问题，授权中央石油三人小组同所有参与运输石油产品的部门和单位直接取得联系，这些部门和单位不得违反中央石油三人小组在上述范围内提出的要求。

5. 授权中央石油三人小组利用拥有专用通讯设备的各部门的直达电报与无线电同三人小组保持联系和获得必要的情报。

6. 授权中央石油三人小组为了工作而吸收石油总委员会和中央内河运输管理局的代表以及其他有发言权的专家参加自己的会议。

7. 授权中央石油三人小组派出自己的拥有决定权的代表参加各种讨论有关石油产品运输问题的会议和委员会，为此有关部门应将举行这种会议和建立这种委员会的决定事先通知燃料总委员会以转告中央石油三人小组。

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的义务

8. 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的义务如下：

(1) 根据中央批准的计划对铁路和水路运输石油产品的情况进行监督；查明产生障碍的原因，通过交通人民委员部和燃料总委员会采取适当的措施排除这些障碍，使石油产品的运输能力达到最佳状态。

(2) 对运输石油产品的船只和机车车辆的最佳利用与修理进行监督；对油库和输油设备的完好进行监督。

(3) 协助改进各项业务服务：为运出石油产品提供适当的工作人员和劳动力，保证向他们提供食品及其他各种供应品和物资，对圆满完成这些业务的人员予以奖励，等等。

(4) 确保石油产品在存放地和运输途中的安全。

(5)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快解决中央存在的所有重大问题，以加强和加快石油产品的调出与运输。

报告制度

9. 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的执行机关根据各地的报告发布每日公报和石油产品运输方案。

此外，应每周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石油产品运输情况和改进运输工作的措施以及所取得的成果。

总 则

10. 鉴于伏尔加州州长被任命为负责运输石油产品的特派员，自中央石油三人小组开始行使职权之日起，现有的参与石油产品运输工作的各类特派员，不管是谁委派的，一律撤除。

关于颁发奖金

11. 授权中央石油三人小组主席和副主席向参加石油产品运输的人员颁发奖金，以奖励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从事业余学习。根据交通人民委员部今年3月16日下达给交通总局的第3196号命令，向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申报个人一次性奖金总额不得超过其月工资的3倍。为此，燃料总委员会应根据中央石油三人小组主席提出的预算为其提供必要的款项。

关于为中央石油三人小组执行机关的开支拨款

12. 燃料总委员会一次性拨出预付款100万卢布（花多少，燃料总委员会给补充多少）归中央石油三人小组主席支配，用于雇用中央石油三人小组执行机关所必需的工作人员，用于为这些机关购置必要的用具、打字机、办公用品等。

二、关于地方三人小组

建立地方三人小组的目的

13. 为了在地方直接对石油产品的灌装、运输、提送、排放和保卫以及对地方机关执行中央关于运输石油产品的命令和指示进行监督和检查，为了协助作为劳动国防委员会特派员的伏尔加州州长采取各种措施，也为了与中央石油三人小组保持联系，决定成立地方石油三人小组，其成员来自组成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的那些部门的代表。

地方石油三人小组所在地

14. 水路运输沿线的地方石油三人小组设在下列地区：巴库、彼得罗夫斯克、12 英尺停泊场（该三人小组从属阿斯特拉罕三人小组）、阿斯特拉罕、察里津、卡梅申、萨拉托夫、乌韦克、巴特拉基（从属萨马拉三人小组）、萨马拉、博戈罗茨克、下诺夫哥罗德、雷宾斯克、沃兹涅先斯克、彼得格勒、彼尔姆、梁赞、莫斯科、新罗西斯克、亚速海罗斯托夫。

必要时，经中央石油三人小组和伏尔加州州长协商，也可在沿水路运输线的其他地区组建地方石油三人小组。

注：无需另外组建隶属伏尔加州州长的州三人小组。在下诺夫哥罗德组建的地方三人小组同其他三人小组一样，直属中央石油三人小组领导。

铁路沿线的地方石油三人小组将建在中央石油三人小组认为必须组建三人小组的铁路枢纽和大站。

注：首先在哥罗兹尼组建直属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的地方石油三人小组。

石油三人小组的机构及其相互关系

15. 地方石油三人小组主席是中央军事交通部的地方代表，副主席由该石油三人小组成员选举产生。

在同时建有水路和铁路两个三人小组的地方，由参加两个三人小组的中央军事交通部的两名代表中选出一人兼任两个三人小组的主席。另一名代表为这两个石油三人小组的副主席。

地方石油三人小组主席、副主席和小组成员由中央石油三人小组批准。

地方石油三人小组服从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的领导。此外，水路运输线上的石油三人小组必须执行伏尔加州州长根据劳动国防委员会授予他的输送石油产品的职权所规定的任务。

当燃料总委员会的地方代表由于地方石油三人小组所处的条件不能直接参与石油三人小组机构的工作时，授权燃料总委员会指派地区石油委员会的代表代替燃料总委员会的代表参加地方石油三人小组会议。

地方石油三人小组通过书面调度报告和直达电报向中央石油三人小组报告工作。

地方石油三人小组的执行机关

16. 地方石油三人小组的执行机关是上述组建石油三人小组地区的铁路区段军事代表办事处、水路区段军事代表办事处和车站军事代表办事处，同时石油三人小组主席有权吸收交通人民委员部运输处地方机关和区水运局的工作人员参加有关工作。

地方石油三人小组的权利

为获得必要的信息资料和统计材料，为协调有关石油产品运输或有助于这项工作改进的各种问题，授权地方石油三人小组直接同参与石油产品运输的部门取得联系，而且这些部门必须执行三人小组在上述范围内对其提出的要求。

17. 授权地方石油三人小组优先使用各部门的直达电报和无线

电台与中央石油三人小组及地方石油三人小组管区内各站点保持联系。

18. 授权地方石油三人小组为了工作而吸收地区石油委员会的代表及其他有发言权的专家参加自己的会议。

19. 授权水路运输沿线的地方石油三人小组在必要时使用石油运输船队和地区石油委员会的快艇巡查运输船队或油库，不过这种巡查要与石油运输船队或地区石油委员会代表的例行巡查协调一致。

地方石油三人小组的义务

20. 地方石油三人小组承担如下义务：

- (1) 对石油产品的灌装、提送和排放实行监督；
- (2) 对石油产品的运输实行监督，查明出现障碍的原因，设法克服和预防这些障碍，将尽可能多的石油运出；
- (3) 检查输油设备的状况，及时采取措施扩大输油能力；
- (4) 检查油库是否处于完好状态，采取措施使油库做好石油产品入库的充分准备；
- (5) 尽全力协助石油运输船队的代表修理船只，并在船队缺员时协助补足；
- (6) 尽全力协助石油运输船队的代表以最快的速度发出石油直达列车，同时协助运输石油产品的直达列车以最快的速度运行，按照燃料总委员会通过中央石油三人小组下达的指示腾出油库；
- (7) 当无关的组织和个人干扰石油运输工作时，采取坚决措施排除这种干扰，必要时将有关情况报告中央石油三人小组，以便中央加以适当的干预；
- (8) 协助改进所有业务服务工作，如为运出石油产品提供适当的工作人员和劳动力，保证向他们提供食品及其他各种供应品，对圆满完成业务工作者予以奖励；

(9) 协助保证石油产品存放地和运输途中的安全；

(10) 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快解决地方上存在的所有重大问题，以加强和加快石油产品的调出与运输。

报告制度

21. 地方石油三人小组每天（每24小时）就其职责范围内的所有问题向中央石油三人小组提供一份详细的调度报告，报告的形式和密码由中央石油三人小组确定，报告由参加地方三人小组的各部门代表共同签署，他们对这些报告的正确性和准确性负责。中央石油三人小组将根据这些材料每周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提出报告。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8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No 10656

关于指挥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登记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为了对仍在红军中任职和已经转业的指挥人员与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普查登记，使中央和地方获得有关的详细资料，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委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全境对上述人员进行登记；军事部门进行上述调查之日起宣布以往的调查作废，并下令减少军事部门的纸张开支。普查用纸按一俄令纸 20 俄磅计算不应超过 400 普特，这批纸张应从军事部门的储备中支付。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57

关于购买留种马铃薯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决 定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29日会议决定：

鉴于留种马铃薯严重不足和春播季节即将结束，劳动国防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广为宣传：各地农民合作社和村社有权凭乡播种委员会的证明派代表用农民自筹资金按市场价在省内购买留种马铃薯。上述代表在公出期间不承担任何劳动义务和畜力运输义务，并有权使用畜力车装运马铃薯，如有可能也可利用铁路运输。不得以任何形式征用已装运的留种马铃薯，任何地方当局阻碍迅速运送留种马铃薯都将受到严厉查处。

责成最高运输委员会立即考虑采取少装货物和压缩一些部门的运输量的办法确保留种马铃薯的运输。

如不能达成一致，则提交劳动国防委员会。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0658

关于恢复和发展养蚕业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一、

列宁修改过的决定草案第4条

4.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协商〈通过和制定实物税标准〉制定征收蚕茧实物税条例草案并将其提交人民委员会，确定与养蚕户进行商品交换的原则和对最成功的养蚕户给予奖励的办法。

二、

劳动国防委员会关于恢复和发展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养蚕业的决定。

为了恢复和发展共和国的养蚕业以确保丝织工业和增加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出口储备，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在一周内会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制定恢复和发展养蚕业的生产措施计划。

2. 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范围内栽种的所有桑树都可以用来养蚕，任何损坏或砍伐这些桑树的行为都将受到共和国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采取紧急措施保持和

扩大桑树以及其他适于养蚕的植物的种植面积。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每月向劳动国防委员会报告所采取的措施。

3. 责成农业人民委员部采取紧急措施恢复和扩大养蚕站网，其任务是检查蚕的生长情况，对蚕的培育和饲养进行科学实验研究，向周围的居民推广养蚕技术。

4.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农业人民委员部协商制定征收蚕茧实物税条例草案并将其提交人民委员会，确定与养蚕户进行商品交换的原则和对最成功的养蚕户给予奖励的办法。

5. 责成教育人民委员部与农业人民委员部协商，在养蚕地区和丝织工业中心的高等农业院校组建养蚕教研室，通过开办统一的劳动学校和校外教育推广养蚕的知识与技能。

6. 农业人民委员部应在两周内制定出本决定的实施细则并提交原料委员会。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59

关于恢复和发展金箔工业是突击工作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1. 认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矿产委员会金矿开采工业总局恢复和发展金箔工业的工作是突击工作。

2. 将生产任务已被纳入金矿开采工业总局1921年硬性生产计划的最重要的企业列为重点企业，它们是：莫斯科白金制品厂、彼得格勒铸币厂、叶卡捷琳堡精炼厂、科奇科尔开采区、塔纳雷科沃-拜马克开采区、基特雷莫-科西瓦开采区、伊索夫斯克开采区、下塔吉尔开采区、阿亚特-沙伊里欣开采区、别廖佐夫斯克开采区、马林作业队、萨拉林作业队、博戈达罗万作业队、奥利霍夫斯克作业队、勒拿砂金矿。

3. 责成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粮食人民委员部根据金矿开采工业总局的申请，首先满足供应技术材料、电工材料、机器部件、粮食饲料、燃料和支柱木料。

至于金矿开采工业总局提出的申请，为勒拿砂金矿调拨的物资以货物到达伊尔库茨克计算，不得迟于今年6月1日。

4.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用一年半的时间在勒拿砂金矿区建立一个粮食饲料基地，基地的规模和粮食机关的所在地由粮食人民委员部在一周内确定下来。

5. 责成交通人民委员部采取措施首先将所有物资与工作人员从勒拿河上游和下游地区及时调运至勒拿砂金矿。保证勒拿金矿拥有足够的、强大的船舶运输能力，以便在维季姆河流域进行木材采

运。

6. 责成西伯利亚材料运输处采取同样措施将勒拿砂金矿需要的物资从铁路干线运至勒拿河两岸。

7. 责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首先为勒拿砂金矿和制铂业的工人与职员提供足够的工作服。

8. 所有运往勒拿砂金矿的货物，未经采矿委员会同意任何人都不得发往别处或挪作他用。

9. 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采取一切措施迅速满足金矿开采工业总局关于劳动力的申请，首先应满足勒拿砂金矿的需要，最后一批抵达那里的人员不应迟于今年8月1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办公厅主任 尼·哥尔布诺夫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1921年4月2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60

关于彼得格勒铸币厂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1. 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根据金矿开采工业总局的申请向彼得格勒铸币厂调拨必需数量的劳动力。

2. 责成劳动人民委员部按照金矿开采工业总局具体申报并经彼得格勒市有关部门确认的名单，从所有部门抽调曾在铸币厂、金银鉴定所和金、铂、银生产部门工作过的工人、工程师、技术员、金银成色鉴定人员、珐琅制品工匠以及铜版雕刻专家。

3. 认定彼得格勒铸币厂的一切工作都是突击工作，免除铸币厂职工的所有劳动义务。

4. 责成彼得格勒苏维埃保证铸币厂的工作人员拥有住房，为此应从工作地点周围地区拨出必需数量的住房。

5. 责成工人供给委员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

(1) 为铸币厂的职工提供重点企业专供基本标准。

(2) 将铸币厂列为实行实物奖励制度的企业。

(3) 责成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满足铸币厂对工作服的需求。

6. 责成彼得格勒消费公社按照足额发放专供口粮和实物奖品。

7.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为铸币厂管理处调拨 500 普特面粉、50 普特糖和 50 普特食油的专用粮食储备，用来在筹建铸币厂期间奖励工人以促进铸币厂尽快开工，用上述粮食储备发放奖品须同矿业工会彼得格勒地区委员会协商并在其监督下按照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规定的标准进行。

8. 责成燃料总委员会按照金矿开采工业总局的补充申请保证彼得格勒铸币厂的燃料供应。责成彼得格勒国民经济委员会按照金矿开采工业总局的补充申请向铸币厂提供电器设备和其他必要数量的材料及机器。责成彼得格勒国民经济委员会调拨一辆3吨轻型汽车供铸币厂使用。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61

关于批准从国外订购器材清单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批准煤炭总委员会提出的从国外订购第一批 340 万卢布的器材清单。

序 号	名 称	金 额(卢布)	序 号	名 称	金 额(卢布)
1	烟道管	366000	24	绝缘布	3000
2	压力计	23750	25	绝缘纸板	4840
3	蒸汽泵	626000	26	云母	8000
4	喷射器	70600	27	胶合云母板	3200
5	离心泵	300000	28	安全塞	1050
6	钢索	352500	29	保险丝	2350
7	螺旋钻头	24000	30	开关	3000
8	锉刀	26960	31	插座	1250
9	平口钳	800	32	灯座	6500
10	尖嘴钳	400	33	闸刀开关	15750
11	克丝钳	600	34	灯泡	109000
12	弓锯床	190	35	电流表	4830
13	喷灯	1500	36	电压表	1850
14	切管机	6000	37	电力表	2815
15	沃尔夫矿灯	560000	38	电阻表	1500
16	沃尔夫灯纱罩	14300	39	电动机	215000
17	瓦斯管和配件	193180	40	绝缘软线	7500
18	水阀和蒸汽阀	15070	41	虫胶	675
19	传动带	37285	42	感应导线	123250
20	美国纤维板	10500	43	橡皮阀	60000
21	橡胶板	65000	44	割煤机	200000
22	方销钉和螺杆	1400	45	水表开关	36000
23	贝格曼管	1605		合 计	3509000

减去将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电力局负责采购的灯泡（第34号）109000（卢布），合计为3400000（卢布）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 10662

关于批准进口电器材料清单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批准列入进口计划的电器材料清单。

列入进口计划的电器材料清单

进口计划 申请号	机构名称	物品名称	金额 (金卢布)
42	电力工业托拉斯	直流发电机和电动机	437965
		变压器及配件	843970
		高压电器	154175
		测量仪表	111135
		闸刀开关	171000
		设备材料	733065
		灯泡	3987753
		保险丝	326832
		弱电流绕组元件材料及设备	615153
		电力工业托拉斯电机厂所需原料	1396975
		扩大灯泡生产	154475
		发电站涡轮机备件	8931498
51,14	莫斯科第一和 第二发电站	变压器	341786
3	输电站		116100
53,54	彼得格勒第一、 第二、第三、 第四输电站	其他材料(设备、表、 绝缘材料)	148074
52	博尔舍沃输电站		605960

续表

进口计划 申请号	机构名称	物品名称	金额 (金卢布)
57、58	布良斯克输电站		28000
	休罗沃输电站		
50、63	博戈茨克输电站		
	普斯科夫输电站		
	发电站建筑工程 (卡希拉和沙图拉 建筑工程)	8台11万伏4000千瓦变压器	26000
		2台11万伏750千瓦变压器	3000
		1台发电站用的电动发电机	68958
		配电器	43000
		检测仪表	347500
		11万伏线路绝缘子	10000
		1个涡轮发电机激波器	778458
		总计:	10315916 卢布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63

关于运输工具快速检修计划所需备件的应用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1.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迅速满足交通人民委员部关于完成快速检修计划所需价值 9327342 卢布备件的应用，这笔款项从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国外采购专项贷款中支出。

2.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协商，在 3 周内查明，靠交通人民委员部专项贷款的哪一些项目实现这一应用，为此可借助罗蒙诺索夫同志的到来和格林施泰因同志前往瑞典的机会。将最后的批文交对外贸易委员会。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64

关于动用黄金储备为渔场 紧急购买所需设备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劳动国防委员会今年4月29日会议就批准为摩尔曼斯克沿海地区提供设备的申请问题决定：

为渔业总局拨110万黄金储备用以紧急购买所需设备以便不失时机地在摩尔曼斯克沿海地区捕鱼，并对渔业总局在这项工作上组织不力提出警告。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在最短期限内筹措外汇并与布留哈诺夫同志协商，以便毫不耽搁地发运所需物资。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莉·福季耶娃

№ 10665

关于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 特派员提供款项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1.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采取一切措施立即向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东南地区特派员提供 300 万旧卢布的金币。

2. 责成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会同粮食人民委员部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两周内就地为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驻东南地区特派员提供出口原料以凑足 1000 万卢布。

两周后由沃伊科夫同志报告决定的执行情况。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66

关于从克里木运出战利品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1. 批准将军械总部和弹药特别委员会提供清单的 1277 车皮军械和弹药运出克里木的计划。

2. 批准将利用委员会分配的 2000 车皮物资器材运出克里木的计划。

注 1. 给交通人民委员部的所有物资器材应就地移交并入交通人民委员部陆路运输计划。

注 2. 给海军部门的所有物资器材应就地移交并保证如数提供其申请的车皮。

3. 为了实现运出计划，自 5 月份起，最高铁路和水路运输委员会每月须提供 1000 节车皮，燃料总委员会须保证为交通人民委员部提供相应数量的燃料（14 万～15 万普特煤）。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须就地组建由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交通人民委员部、中央煤炭工业管理局、海军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工农检查院的代表组成的技术委员会，以便按照利用委员会的分配方案实际运出和分配战利品。

4. 供应总局长负责运出军械和弹药，劳动国防委员会红军和红海军供给特派员负责运出物资器材。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列宁）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第一批政府决定

劳动国防委员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0667

关于将自行车转交莫斯科市工会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为了保证向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工人组织提供交通工具，劳动国防委员会决定：

1. 立即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央汽车处从军事部门回收的500辆完好无损的自行车转交莫斯科市工会。
2. 责成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工人生活改善委员会对如数、按时转交这批自行车予以监督。

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 弗·乌里扬诺夫 (列宁)

劳动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劳动国防委员会秘书

1921年4月29日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 10668

关于向粮食人民委员部调拨商品储备的决定

(1921年4月29日)

俄罗斯联邦资源利用委员会决定（经劳动国防委员会 1921 年 4 月 29 日第 209 号命令第 22 条批准）

1. 责成粮食人民委员部于今年 9 月 1 日前通过商品交换追加收购 3000 万普特粮食（谷物、米、饲料），其中在西伯利亚收购 1200 万普特，在北高加索收购 1500 万普特，其余 300 万普特在完成粮食收集任务的俄罗斯中部各省收购，为此：

(1) 调拨 15000 万俄尺布匹（其中根据资源利用委员会第 2854 号决定调拨 1000 万俄尺，衣料和衬布 100 万俄尺，做内衣和衬衫用的布匹 400 万俄尺）和 500 万俄尺粗布（根据资源利用委员会第 2918 号决定从拨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布匹中拨出）；

(2) 根据资源利用委员会第 2854 号决定调拨 75 万轴线；

(3) 根据资源利用委员会第 2779 号决定第 2 条第 6 款规定从拨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物资中拨出渣油和半渣油 30 万普特（其中北高加索 15 万普特）；

(4) 根据资源利用委员会第 2779 号决定第 3 条第 15 款规定从收购奖励储备中拨出 45 万普特煤油；

(5) 根据资源利用委员会第 2854 号决定调拨 3 万箱火柴；

(6) 调拨食盐 30 万普特，其中根据资源利用委员会第 2854 号决定调拨 6 万普特，从西伯利亚粮食委员会的储备中拨出 24 万普特；

(7) 根据资源利用委员会第 2634 号决定第 2 条第 8 款规定从拨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窗玻璃中拨出 900 箱；

(8) 根据资源利用委员会第 2924 号决定第 2 条第 4 款规定调拨餐具、玻璃器具、瓷器 300 万件；

(9) 根据资源利用委员会第 2662 号决定第 4 条规定从拨给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物资中拨出香粉 15 万打；

(10) 调拨铁钎 15 万条；

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金属局所属中央金属统计和分配委员会的储备中拨出 3000 铁钉；

(11) 从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储备中调拨 1.5 亿卢布（按固定价格）的日用小百货。

2. 商品交换的标准由粮食人民委员部确定，原则是用于商品交换的工业品的数量应符合农产品的实际收购量。

3. 粮食人民委员部凭资源利用委员会统一制定的调拨单进行调拨。

4. 粮食人民委员部于 5 月 1 日前提出各省收购和商品储备分配的计划。

5. 粮食人民委员部应在下一个报告月的 25 日之前将追加收购粮食的进度和本决定第 1 条规定的工业品收支情况月度报告提交资源利用委员会。

资源利用委员会主席 (签字)

秘书 (签字)

【专题说明】

党和政府领导人之间的通信

(1921年1月至1923年8月)

本专题收入的是1921~1923年间党政领导人之间的通信11件，通信的内容比较广泛。列宁对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在《列宁全集》第42卷第11~16页已发表过一部分，这里发表的是全文。契切林同列宁的通信涉及某些契卡工作人员的行为同外交工作之间的不协调。斯大林同伏罗希洛夫的通信涉及1921年关于工会问题争论、民族问题等等。一些通信还涉及对布琼尼工作的安排。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王丽华、何宏江翻译)

№08704

斯大林就工会问题争论致克·叶·伏罗希洛夫

(1921年1月25日)

约·维·斯大林致克·叶·伏罗希洛夫

向布琼尼同志致敬

朋友！

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事情进行得很好：列宁等人的政纲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①。

我们这里毫不怀疑，你、伏龙芝、莫洛托夫、米宁^②和其他同志能够争取到顿巴斯（矿工代表大会也表示支持我们）以及一些工业城市和军队的支持。叶夫多基莫夫^③、梅利尼昌斯基^④和扎鲁茨基^⑤会帮忙的。在右岸不妨利用彼得罗夫斯基^⑥，不经战斗不给

① 指1920年底—1921年初俄共（布）党内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

② 米宁，谢·康·（1882—1962）——1920—1921年任第一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1922年任乌克兰和克里木部队司令员的政治助手，乌共（布）中央委员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委员。

③ 叶夫多基莫夫，Г.Е.（1884—1936）——十月革命后在红军工作。1919—1920年和1923—1927年任中央委员。

④ 梅利尼昌斯基（1886—1937）——1918年起任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成员，劳动国防委员会委员（代表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党中央候补委员。

⑤ 扎鲁茨基，彼·安·（1887—1937）——彼得格勒十月革命的参加者。1920—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秘书和委员，党中央候补委员。

⑥ 彼得罗夫斯基，格·伊·（1878—1958）——1919—1938年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1939年任中央委员。

托洛茨基和工人反对派让出任何一个代表的席位。

你的 斯大林

№065467

列宁对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的意见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信^①)

(1921年6月10日)

事情的实质在于，在政治上莱维^②许多方面是正确的。遗憾的是他干了一系列违反纪律的事，因此被开除了党籍。

① 此件同起草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有关，提纲委托参加代表大会的俄国代表团起草。1921年6月1日，卡·伯·拉狄克送交列宁一份按照奥·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建议修改过的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和一份由他们两人拟的提纲草案。列宁在装这些材料的信封上写了自己对这两个提纲草案的初步意见（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465页），之后又写了本书收录的这一详细意见。

共产国际关于策略问题的提纲草案根据列宁的指示改写后，在有一些代表团参加的预备会议上讨论过几次，最后以俄国代表团的名义提交第三次代表大会。7月1日，列宁在代表大会上作了捍卫共产国际策略的讲话（同上，第27~37页）；提纲于7月12日由代表大会一致通过（见《共产国际文件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决议、提纲和号召书（1919~1932）》1933年莫斯科版第180~201页）。

此文件的部分内容已收入《列宁全集》第42卷第11~16页，本书所收文件是根据《列宁文集》第41卷的付印稿译出的。新增内容放在方括号内。

② 莱维，保·（1883~1930）——德国共产党人。早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斯巴达克联盟的领导成员。1918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0年当选德国统一共产党主席。在德国“三月发动”问题上同德共“左派”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生严重分歧，被开除出德共和共产国际。1922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接着又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塔尔海默^①和库恩·贝拉^②的提纲在政治上是根本不正确的。那是讲空话和玩弄左的把戏。

拉狄克^③摇摆不定，对“左派”的愚蠢行为作了一系列让步，从而把自己的草案初稿弄糟了。他的第一个“让步”最能说明问题。他的提纲的第1条《问题的范围》原来写的是（请注意）“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拥护共产主义原则）”。后来改为（反而改坏了）“争取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

妙极了！[您瞧，似乎比塔尔海默之流和库恩·贝拉之流“更左”，结果倒成了异乎寻常的蠢话。]这样的引文削弱的正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必要性。这真是荒唐之极。

为了夺取政权，在一定的条件下（包括已经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都拥护共产主义原则这一条件），是需要工人阶级的有社会决定意义的部分的大多数在有决定意义的地方发起冲击的。

这样来修改、改坏这一真理，即在论述共产国际关于争取工人阶级拥护共产主义原则的总任务的第一条中削弱必须争取工人阶级

① 塔尔海默，奥·（1884～1948）——德国共产党“左派”代表人物。早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7年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8年当选德共中央委员，1920年任政治局委员。1921年春参与制定“进攻理论”，支持“三月发动”。在共产国际三大上同库恩·贝拉一起提出“进攻理论”策略提纲。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失败后被撤销领导职务。1928年被开除出党，宣布成立德共反对派。

② 库恩，贝·（1886～1938）——1902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8年1月创建匈牙利共产党，当选中央主席。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和军事人民委员。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不久被派往德国指挥“三月发动”。返回苏俄后继续在共产国际工作。1938年被处决，后平反。

③ 拉狄克，卡·伯·（1885～1939）——1904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190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1925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36年被捕，后平反。

的大多数的原理，这是库恩·贝拉和塔尔海默头脑愚钝的典型表现（可恶极了，表面上装出一副了不起的样子，实际上该打屁股）。也是……拉狄克易受别人影响的典型表现。

拉狄克的提纲本来就非常冗长，没有重点，抓不住政治上的中心问题。而拉狄克还向其中掺水，把它糟蹋得不成样子。

该怎么办？我不知道。白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如果您不希望在代表大会上发生公开斗争〔（我会乐意地在会上狠狠敲打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这样做对事业是有好处的）〕，那么我建议：

（1）今天（既然布哈林坚决主张你们必须今天解决基本问题而不能再拖——其实往后拖更好）就用准确无误的表决否定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根本不正确的提纲。要作记录。你们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而采取宽容态度，就会把一切都弄糟的。

（2）把拉狄克未经“改善”的草案初稿作为基础，关于这种“改善”，我已举了一个例子。

（3）委托1~3人来压缩这个提纲草案，进行修改，使它（如果能做到的话！）不再没有重点，而是清楚地、明确地、毫不含糊地把下述内容作为中心思想切实突出出来：

共产党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争取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不仅是组织的领导，连共产主义原则都还没有得到这个大多数的拥护。而这是一切的基础。“削弱”这个惟一合理的策略的基础，是一种罪恶的轻率的行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欧洲堆积着大量易燃物的形势下，革命有可能很快爆发，工人阶级也有可能^{在特殊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但是，现在把共产国际的策略建立在这种可能性上是荒谬的；认为宣传的时期已经结束而行动的时期已经到来的写法和想法〔以及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的种种无稽之谈，而拉狄克甚至在他

的第一个草案^① 中很多方面就对他们作了让步——附带说明一下：我还未能完全照“改善过的”草案对原草案进行核对)] 也是荒谬和有害的。

共产国际必须把策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始终不渝地、有步骤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首先是在旧工会内部。这样，无论事态怎样变化，我们都肯定能够取得胜利。至于遇上极其幸运的情况而在短时期内“取得胜利”，这是傻瓜也能办到的。

因此：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必须采取《公开信》的策略。这一点要讲得直截了当，清楚明确，因为对《公开信》[朝库恩·贝拉那边]的动摇是最有害、最可耻的，也是最流行的。用不着隐瞒。凡是不懂得必须遵循《公开信》的策略的人，都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闭幕后至迟一个月开除出共产国际。我曾经投票赞成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② 加入共产国际，现在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错误，应该尽快地、彻底地改正这一错误。

与其像拉狄克那样长篇大论，意思含混，不如翻译《公开信》全文（如用德文，则援引全文），反复解释它的意思，而且把它作为一个范本来阐释。

我认为，策略问题的总决议应该就讲这些。

只有这样才会定下调子，使中心思想明确起来，不致模棱两

① [“不是诺言，而是行动”——拉狄克按库恩·贝拉的方式解释为：“干吧”，“冲上去搏斗”。这是无稽之谈。不应该按库恩·贝拉的方式去解释言行一致。]

②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成立于1920年4月，由在1919年举行的海德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的“左派”共产党人组成。1920年11月，为了便于联合德国所有共产主义力量和帮助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内的无产阶级优秀分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党暂时被共产国际接纳。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必须放弃宗派主义，必须同德国统一共产党联合。由于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领导人没有执行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只得同该党断绝关系。

可，使任何人都不可作随心所欲的解释（像拉狄克那样）。

这样，拉狄克的草案初稿就会至少删去四分之三。

丢下提纲去写小册子并对它进行表决的做法该结束了。那样做，即使我们大家没有争论，也免不了犯局部性的错误。而如果没有重点，却有争论，我们就会犯重大错误，把全部事情弄糟。

再有，如果你们实在想加，可加上一些补充；根据这种策略，在细节上，作为例子，不是作为原则，恰恰是作为例子，还可作如此这般的补充。

其次。

笼而统之把塞拉蒂^①和莱维说成是“机会主义”，这是库恩·贝拉式的愚蠢。塞拉蒂有错误；错在哪里？应该讲得一清二楚，指明是在意大利问题上而不是在总策略问题上。他错在同共产党人搞分裂，没有开除改良主义者屠拉梯之流。意大利同志们，只要不做到这一点，你们就是自外于共产国际。我们就开除你们。^②

而对意大利的共产党人，我们要提出最严肃的忠告和要求：只要你们还不能够坚定地、耐心地、巧妙地说服塞拉蒂派工人的大多数，把他们争取过来，就不要神气，就不要玩弄左的把戏。

“莱维事件”不在总策略问题上，而在对三月行动的评价上，在德国问题上。布兰德勒^③说：是单纯防御。因为政府进行了挑

① 塞拉蒂，扎·梅·（1872～1926）——1892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9年起是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主张加入共产国际。1920年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执委会委员。1922年4月出席在柏林召开的三个国际代表会议，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4年率社会党部分党员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② 意大利问题曾提交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原因是意大利社会党抗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将其开除出共产国际和承认意大利共产党为共产国际在意大利的惟一支部的决定。

③ 布兰德勒，亨·（1881～1967）——189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1923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1年采取“左派”立场。1923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9年被开除出党。

衅。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

(1) 一切号召进攻的喊叫都是错误的、荒谬的，可是这种喊叫多得不可胜数；

(2) 既然政府进行挑衅，企图把共产主义的小要塞（共产党人得到多数人拥护的中心地区）拖进战斗，那么号召总罢工的策略就是一种错误。

(3) 今后应该避免这种错误，因为右派在内战中以巧妙的手段杀害了两万工人以后，德国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形势。

(4) 把几十万工人（布兰德勒说是一百万。是否吹牛？是否自我陶醉？为什么没有各州、各城市的统计数???) 的单纯防御说成是“暴乱”，而且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违反革命纪律的行为。由于莱维还有另外一些违反纪律的行为（要准确地、极为谨慎地列举出来）所以他应该受到处分，被开除是罪有应得。

应当定出一个开除的期限，比如说半年。然后允许他重新申请入党，如果在此期间他守纪律，共产国际就建议吸收他。

[（如果有头脑的人因为犯错误和违反纪律就被永远清除出党，而让那些遵守纪律的傻瓜习惯于别人在策略上对他们作出让步，那么其结果必将是整个党垮台。）]

（除了布兰德勒的小册子，我还什么都没有看过，这些意见只是根据莱维和布兰德勒的小册子写的。布兰德勒只证明了（如果可以说是证明的话）一点：三月行动不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莱维这样谩骂，理应被开除]，而是几十万革命工人的英勇自卫。但无论多么英勇，由于政府从1919年1月起已通过挑衅杀害了两万工人，今后再也不要再在政府的挑衅面前这样应战，要到全国的而不只是一个小地区的大多数工人都跟共产党人走的时候再说。）

[(1917年七月事变不是巴枯宁式的暴乱。谁要是作这样的评价，我们就把他开除出党。七月事变是英勇的进攻。可是我们当时得出这样的结论：下一次我们决不过早地发起英勇的进攻。过早地全面应战，——这就是三月行动的实质。不是暴乱，而是错误，这个错误由于几十万人在防御中表现英勇而减轻了。)]

关于什麦拉尔^①，能否搞两三个材料？

如能为共产国际刊印有关各国的材料，哪怕每国两份(每份2~4页)，那倒不错。[否则塔尔海默和库恩·贝拉这两个傻瓜在歇斯底里地号叫，却毫无事实根据。]

关于什麦拉尔和施特拉塞尔，都有些什么事实？

别忘了一件大事：一定要删去拉狄克提纲初稿中所有谈到“等待的党”、所有进行这种谴责的内容。一概不要。^②

关于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的问题，要具体地、专门地、清楚而明确地提出来。

如果我们两人在这方面意见不一致，我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

列 宁

1921年6月10日

① 什麦拉尔，鲍·(1880—1941)——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897年加入捷克社会民主党。1921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后任中央委员。1921—1929年和1935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② 列宁可能是指拉狄克提出的关于共产国际策略问题的提纲初稿中的下述内容：“他们(即拉狄克所说的许多国家共产党内的中派集团)看到共产国际要建立的只是真正革命的群众性政党，便耸人听闻地大叫共产国际陷入了宗派主义。德国的莱维集团、捷克斯洛伐克的什麦拉尔集团等就是这样干的。这些集团的性质很清楚。这是一些用共产主义的词句和理论掩饰其消极等待革命的政策的中派集团。甚至当捷克斯洛伐克的大多数工人已经站在共产主义立场上的时候，什麦拉尔集团还迟迟不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08705

斯大林致伏罗希洛夫

(1921年7月27日)

嘿，朋友！

我打算8月10号去罗斯托夫，然后到莫斯科。如果能见面谈谈东南地区的事情^①就好了。如果可能的话，给我准备十来普特的面包，当然，如果没有就算了。

紧握你的手。

向布琼尼、布勃诺夫^②致敬！

你的 斯大林

① 大概是指清剿土匪，1921年土匪是苏维埃国家最危险的敌人。

② 布勃诺夫，安·谢·（1883~1938）——1921年起任北高加索军区和第一骑兵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俄共（布）中央东南局委员，1925年任俄共中央书记。

№06554

契切林就肃反人员对外事工作的干扰致列宁

(1921年10月23日)

致列宁同志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只要黑海-库班沿岸地区的特别部以至肃反工作人员仍按目前的方式行事，那么要同土耳其保持良好关系肯定是不可能的。由于这个原因，同美国、德国和波斯已经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如果新罗西斯克一切照旧，那么同那些准备取道新罗西斯克归国的胡佛手下的人总会闹出乱子来。我经常通过达夫强^①同志提醒全俄肃反委员会注意这些情况，10月8日写了第11/5240号函给温什利赫特^②同志谈了这一点，但毫无效果。

8月3日，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侦查员在阿尔马维尔逮捕了土耳其大使馆的外交信使费里敦-别伊，拆开了他的外交公文包上的火漆封印，而且对他的态度极为恶劣。在此之前，土耳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伊泽特-伊兹梅特在阿尔马维尔那里受到更为恶劣的待遇，我已就这个问题正式致函全俄肃反委员会，同达夫强同志也谈过多次，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答复，那里的肃反委员会看来没有把中央放在眼里，连答复都不屑答复一下，全俄肃反委员会甚至没有告诉

① 达夫强，Я. Ф. (1888—1938) ——1905年入党。1920年10月至1921年2月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部主任，同时任外交人民委员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波兰司司长。

② 温什利赫特，约·斯·(1879—1938) ——1900年入党。从1921年4月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后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副主席。

我这件事的下文。我们同德国已经闹了一个大乱子，原因是新罗西斯克特别部在海上对德国轮船强行搜查，我们的肃反工作人员，不顾德国人的抗议，从船上带走了几名乘客。政府不得不向德国道歉，而当地的肃反工作人员对此却无动于衷。胡佛手下的一些人乘坐的美国驱击舰也在海上被新罗西斯克的肃反工作人员截住，他们上船进行搜查，对美国人的态度极为粗暴。当外交人民委员部驻新罗西斯克的特派员想登上美国的驱击舰向美国人致意时，站在岸上的肃反委员会的侦查员当着美国人的面十分粗暴地阻止我们的特派员上船。肃反工作人员的行径给美国人造成了极坏的印象，他们上岸提出了抗议。土耳其人不断向我申诉，指责图阿普谢的特别部以至肃反工作人员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搜查军舰，对土耳其轮船开枪射击，对土耳其的公职人员，特别是对穆斯塔法·基马尔^①的密友，土耳其驻图阿普谢领事萨布里-别伊态度十分放肆。如果特别部怀疑土耳其人走私，土耳其大使不反对对他们采取隔离措施，但他坚决抗议搜查军舰以及缺乏政治修养的肃反工作人员在搜查时侮辱他们。在新罗西斯克发生类似事件时，肃反工作人员侮辱了土耳其的国旗。当土耳其的三桅小帆船做生意的小商人（有时他们由于遇到暴风雨不得已）进入这些海港时，竟然不予补偿地没收他们的货物，甚至是这些船主正在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在当地的代办机构交换货物时也这么干。土耳其大使多次向我十分坚决地指出，被我们的肃反工作人员洗劫一空的土耳其小商人回到小亚细亚后就在那里散播种种有辱苏维埃俄国声誉的传闻，因此小资产阶级群众对我们的看法就越来越坏。我为了这些船主的问

^① 基马尔·穆斯塔法（阿塔图克，基马尔·胜利者·穆斯塔法）（1881～1938）——1920～1923年任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1921年3月16日签订了俄罗斯联邦和土耳其友好互助条约。

题，曾多次同列扎瓦^①和克拉辛^②两位同志讨论过，但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设法调整这个问题的努力毫无成效，因为当地肃反委员会的侦查员们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现在，三桅小帆船船主来得越来越少了，原因很简单，土耳其人由于发生了这类事件而把我们看做强盗和海盗。还在不久前，当地卫戍司令的秘书卡尔采夫带了武装人员，在晚上闯入萨布里-别伊的住处，对他和当时在场的土耳其驻莫斯科大使馆的里扎-别伊大尉大肆侮辱，当这个卡尔采夫因此被捕后，当地的特别部马上下令释放他，而对土耳其领事却没有赔礼道歉。黑海的肃反工作人员使得我们同有代表驻在他们辖区内的大国一个一个地发生争执。肃反委员会的那些没有政治修养的侦查员们握有无限权力，对任何规章都置若罔闻。

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图阿普谢和新罗西斯克的特派员汤姆森同志努力设法改善这种情况，但毫无效果。肃反工作人员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还不断威吓他。他反对这种行径的努力都毫无结果，他担心他在那里会被逮捕或者会成为告密者的牺牲品。

领导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部的莫吉列夫斯基^③同志一点也不改变现状。我曾向温什利赫特同志提出建议，如果全俄肃反委员会不相信汤姆森同志，可以由中央另行任命别的人去，并且由全俄肃反委员会授予他全权，目的是要那边的人都听从他的指挥。但是全俄肃反委员会依然我行我素。胡佛手下的人冬天将通过新罗西斯克运来部分食品，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和美国人的关系也会弄得

① 列扎瓦，安·马·（1870～1937）——1904年入党。从1920年起任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② 克拉辛，列·波·（1870～1926）——1890年入党。1920年领导驻伦敦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后任驻英国全权代表。从1924年起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

③ 莫吉列夫斯基，С. Г.（1885～1925）——1914年入党。从1919年10月起任莫斯科肃反委员会侦查部门主任、特别部副部长，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部主任。从1922年起任外高加索肃反委员会主席。

很僵。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才给您写信。全俄肃反委员会总是回答说，它在那里已经有工作机构。但是这个机构我们也看到了。如果全俄肃反委员会不相信汤姆森同志，我们还有外国代表就这类事实提出的大量申诉。我请求中央在征得外交人民委员部同意后派出一个由全俄肃反委员会授以全权的人，这个人完全可以依靠，他不会允许在处理外国人事务时再发生此类行径。主要的是这个人不能是特别部那个与世隔绝的圈子里的专家，不会蔑视超出他本部门范围的一切。不要说土耳其，就是对美国的态度也十分重要，不能对这些港口的现状掉以轻心。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格奥尔吉·契切林

№06555

列宁给契切林的回信

(1921年10月24日)

契切林同志：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您的过错在于软弱。应该做的不是“谈一谈”，也不仅是“写封信”，而是向政治局提出建议（而且应该及时这样做，而不是一拖再拖）：

(1) 经外交人民委员部同意后派出一个十分坚定的人；

(2) 逮捕坏透了的肃反工作人员，把犯罪的人带到莫斯科来枪决。

征求温什利赫特的意见后，附上全部材料，星期四把这个问题提交政治局^①

应该学会更快更准地推动这类工作。哥尔布诺夫^②应该做这些事；他应对此负责；而我们总是支持您的，如果哥尔布诺夫能把肃反委员会的坏蛋送去枪决的话。

列 宁

10月24日

^① 1921年10月26日，契切林致函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他在信中转述了他1921年10月23日给列宁写的信的内容，并建议派卡·安·彼得松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驻黑海沿岸地区的特派员。1921年10月27日，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通过了列·达·托洛茨基提出的如下建议：“(a) 要求全俄肃反委员会提供肃反机构下达的有关涉外工作，特别是港口和边疆城市涉外工作的细则。责成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同志研究这些工作细则。

(续第 194 页注释①) (b) 通过权威的工作组(或个人)(该工作组应下到各地去)严厉追究不执行这些工作细则、仍然按 1918 年的工作方法行事的地方肃反机构的责任。不管采取哪种办法(派工作组或派个人),都责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提出任命。

(c) 如果至今还没有有关涉外工作的详尽的工作细则,则建议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拟出极为明确和确切的工作细则,对不同的国家(公开敌对的国家、同我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友好国家)要区别情况分别对待。

(d) 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要密切注意,务必使肃反机构的工作反映出与我国所处的国际形势相适应的变化。在上述三个部门的会议(在一定情况下还可吸收陆军人民委员部的代表参加)上,这方面的一切新的情况都应当变为对肃反机构下达的新的补充工作细则的依据。

向帕·彼·哥尔布诺夫同志指出,他的责任是监督这一条的执行情况。他应更正式、更严格、更经常地进行这项工作。

(e) 任何违犯工作细则的行为都应受到惩处,因为只有加以惩处才能杜绝有害的游击习气。

(f) 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同外交人民委员部或通过其他途径发布有权威性的政府公报,内容是:与苏维埃俄国为敌的国际报界散播谣言,说出于肃反机构的活动,无法和苏维埃俄国保持事务关系;政府仔细地调查了对肃反机构处理涉外事务时的错误行为的种种指责,其中有一些事例已经得到证实;政府立即采取措施,惩办肇事人员,更确切更严格地给监督机构下达涉外工作细则;采取的措施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见效。

责成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协商后决定用哪个部门的名义发布这一政府公报。公报应先交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两同志审阅。

(g) 派彼得松同志去新罗西斯克任外交人民委员部代表,责成他在抵达并了解情况后立即向中央提出经全俄肃反委员会驻黑海沿岸地区机构同意的工作细则草案,以杜绝涉外工作中的错误行为”。这个决议的摘要曾刊登在《列宁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一书中(1987 年莫斯科第 2 版第 487 页)。

彼得松,卡·安·(1877~1926)——1898 年入党。1917 年 12 月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会务委员,后担任拉脱维亚步兵师政委。1918 年 12 月至 1921 年 2 月任东方战线第 5 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 年 11 月至 1922 年 7 月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驻新罗西斯克特派员。

② 哥尔布诺夫,帕·彼·(1885~1937)——1918 年入党。1921 年 2 月至 1922 年 2 月任外交人民委员部办公厅主任,同时从 1921 年起任该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No 06556

契切林就肃反人员问题致列宁

(1921年10月24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10月14日我给您寄去东西，因为其中（用红铅笔画出的）有厄克特^①的信。值得一读——英国最有势力的集团就是通过他的眼睛这样看的，而胡佛^②是他的股东。

我以前没有提出关于黑海肃反工作人员的问题，是因为指望通过我们的特派员能把那里的事处理好。我这次写信给您简单地谈谈闹的这些乱子，而不是“确切地”根据文件来谈的，因为我给您写信的目的只是要往那儿派一个强有力的人去控制局面。至于惩处的问題，让将去那儿的人自己去后查明情况，提出起诉。我们现在正在挑人，以便在取得温什利赫特同志的同意后于星期四提名。同时将提出参加承认债务委员会的人选。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格奥尔吉·契切林

① 厄克特，莱斯利（1874～1933）——英国金融家和工业家。1921～1922年同苏维埃政府谈判收回其原先在俄国的康采恩问题。

② 胡佛，赫伯特·克拉克（1874～1964）——美国总统（1929～1933）。1919年起任美国救济总署署长。1921～1928年任美国商业部长。

№08706

伏罗希洛夫就调职问题致斯大林

(1921年11月2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在莫斯科我已经对你讲了，我打算改变自己的“角色”，而现在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这么做了。军事部门的工作已经使我感到厌烦，而且这里的工作又不是重点。我认为，搞文职工作对我将有益些。关于调职事期待你的赞同，并在中央给予友好的支持。想在顿巴斯工作，请中央将我派到那里去。任何工作都可以，希望能重新振作起来，否则，我在这里要开始消沉（精神上）了。该怜悯我。

紧紧拥抱。

你的 伏罗希洛夫

№08707

伏罗希洛夫就车臣问题致斯大林

(1923年1月21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祝贺你又一个自治区成立！1月15日，在距离格罗兹尼市24俄里的乌鲁斯马尔坦村，在车臣族村民代表（每村选派5人）大会上庄严地宣告了车臣自治区的成立。米高扬、布琼尼、列万多夫斯基和我都去了车臣。得到的印象是：车臣人同所有的山民一样，不好也不坏。毛拉是惟一的文明力量，享有无限的影响力。他们以东方外交官的精明来使用自己的神职地位。居民们生活在原始愚昧和对“神”的畏惧之中。依我看，在车臣和哥里共和国工作过的以及仍在那里工作的我们的一些能说会道的、绝顶聪明的共产党员没有学会任何东西，也不可能教给别人什么。分化，“依靠贫苦分子”，“同毛拉和族长斗争”以及其他一些高谈阔论都是掩饰自己的无知的幌子，他们根本不明白，怎样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

在我们讲话（正式地）以后，毛拉的头领声明，他代表全体车臣人向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机关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如下愿望（要求）：

1. 应该建立一个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掠夺人民的政权。
2. 应立即采取无情的措施消灭匪徒、偷盗和抢劫行为。
3. 允许成立具有足够人数的车臣警察局。
4. 允许伊斯兰法庭的存在。

这就是可怕的毛拉们的基本要求。由于时间已晚以及集会的人

数很多，我们建议他们组成 150~200 人的代表团，同我们一起去格罗兹尼市，以便较为详细地讨论与自治有关的实际问题。

有一点让人担心的：一部分毛拉和商人将参加这个临时召开的代表大会，但是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需要自己来议论一下局势。同客人们一起聚会的有 400~500 人。

选出了 200 多人，其中有：

毛拉：35 人，

商人：70 人，

庄稼人：140 人。

我认为，这次协商会议的组成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正如我们原来预料的那样，毛拉是头目。在我们在车臣培养出忠诚的、了解车臣的干部和车臣也熟悉的工作人员之前，我们不得不同毛拉打交道。

毛拉都是很狡猾的人，要做点工作把他们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只有傻瓜才会相信在车臣能实施各种各样的“分化”、“通过贫农施加影响”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

当然，如同其他地方一样，车臣也有贫农。但是，第一，在车臣几乎完全保留着宗法种族关系；而第二，贫农对毛拉和神职人员的尊敬要超出对富农（富农已经知书识字，是受过教育的）的尊敬百倍，此外，毛拉和各种神职人员都是靠贫农供养并发福的。

[克·叶·伏罗希洛夫签字]

№08708

伏罗希洛夫就布琼尼任职等问题致斯大林

(1923年2月1日)

亲爱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最近收到了阿·卡缅斯基^①的信，他在信中谈到了他的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里发生的“混乱”的事情，并提出了用以布琼尼为首的新的委员会来取而代之。正如卡缅斯基信中所说，伏龙芝会对你谈这个“天才”的组合的。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出结论，伏龙芝已经同意了这一点。

我认为，不用我说你也可以看出卡缅斯基等人提出的方案是非常愚蠢的。但我仍然认为，对于这件事我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并不是多余的。还是在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卡缅斯基就对我谈起过这件事，并询问我的意见。我表示坚决反对。但没有发挥自己的想法。我那时觉得，卡缅斯基似乎同意了我的看法。而这个组合的重新提出，使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这里是否有比我们的“忧郁骑士”阿·卡缅斯基所理解的更为深刻的东西？但就问题的实质而论，我认为，不能把谢·布琼尼提到这个职位上来，原因如下：

1. 布琼尼，抛开他的个人品质如何以及对这个角色的适应能力不谈，他太农民化，太出名，又十分狡猾。国外的“白色”报刊（《舵轮报》^② 1923年1月11日）就常常以悲伤的调子来描写布琼

① 卡缅斯基，阿·（1885～1938）——1920～1921年任副民族人民委员，1921～1922年任顿河州委书记。1922～1923年任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② 《舵轮报》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国外的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在柏林出版的报纸。

尼不是没有别的用意的。国内的反革命同样也寄希望于未来，我们的敌人对这个未来的概念是：布琼尼应该起到某种救世主的作用，他应该成为领导“人民”运动的（农民）领袖。鉴于这些情况，把布琼尼抛到农民土地的大海里岂不是发疯了吗。

2. 假如布琼尼由于这样那样原因不适合于这个职位，那么，党把他从这个高位上撤下来就会陷入困境，而布琼尼本人，以及所有追随他的人们（这样的人现在很多，而在人民委员部里将会更多）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解释这一措施的。

3. 一旦任命了布琼尼，国内外的白卫分子，一定会对此叫嚣起来，把任命说成是我们的软弱，是最后的一着棋。

4. 如果在某个时刻，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利益真的发生了严重的冲突……^①，布琼尼会站在后者一边的。

我比党内的任何人都了解布琼尼，同你一样，我也认为，为了革命必须充分地利用他。在这方面我尽我自己的能力做了一切，结果似乎还是可以肯定的。

但是，以前我不止一次地说过，现在还应该重复一下，我们的一些亲爱的同志（在中央的）总是不知不觉地过分大肆宣扬布琼尼，说什么“布琼尼的”军队，“布琼尼战士”等等完全不符合党的任务，也不符合总的革命任务的东西。今天，第一骑兵部队司令部的政治委员捷尔同志给我讲述了骑兵连生活中的一件事。当问及一名年青的红军战士，他为谁而战斗时，后者回答说：“为布琼尼”。

恐怕你已经厌倦了，关于这一点我就说到这里吧。如果超出健全的思想，某人硬想要认真地支持布琼尼作农业人民委员部的候选人的话，那么，请注意，我将在党内、全会上、甚至在代表大会上

^① 无法辨认。

提出坚决的抗议。

你认为，我这是不是徒劳无益？不，这不是徒劳无益。如果我不及时收拾杜缅科^①，他就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

如果我们不考虑目前时局的特点，犯了这样的错误，毫无根据地任命布琼尼为人民委员，这就等于在院内玩火……^②

现在就另外一个话题说几句。

第三天，卡尔梅科夫和另外4名州委员会委员到此来审查卡巴尔达人的纠纷。根据全部信息得知，卡尔梅科夫做得太“过分”了些，应该稍微制止他一下。我们将做点工作，但必要的时候，你应该向他指出其行为的危险性。

近日，阿里-米塔耶夫同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在格罗兹尼签署了保护哈萨夫尤尔特—格罗兹尼铁路线的合同。

全部资料说明，能够借助于车臣盗匪本身来消除车臣的匪祸。

伊里奇的文章我读了4遍。

从实质上讲我同意伊里奇的观点，只是担心，很多人，甚至“老头们”不能理解伊里奇。伊里奇提出的结构有些沉重，不那么严整，但是，看来，伊里奇已决心彻底改变党的管理体制，以及国家的部分管理体制。非常想知道你的观点，以及其他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如果有时间的话，请简单地给我写几句。

来这儿的季诺维也夫同志说，他不理解伊里奇的文章。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较为详细地了解代表大会的信息。如果

^① 杜缅科，波·莫·（1888～1920）——1919年起任东南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的混成骑兵军军长。

^② 无法辨认。

你不给我写正式的信函的话，那就写私人信件吧。

祝一切好。

紧紧握手。

你的 克·伏罗希洛夫

№08709

布琼尼就担任新职问题致斯大林

(1923年8月22日)

最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今天我动身离开这里，很遗憾在临行之前没能见到你，因为我是带着非常沉重的心情离开的。

第一骑兵集团军的几个师转到了新的驻地，如果不能对他们进行经常性的监督，他们的战斗力将会下降，而从罗斯托夫对他们实行监督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请求您尽快地亲自使这个问题摆脱模棱两可的状态。我个人认为，惟一的对事业有利的解决方法是，给予我机会，让我将共和国的整个骑兵队伍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这就是任命我为骑兵部队总司令的助手和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应该给我机会，让我拥有一个不大的管理机关，涉及到骑兵队伍的所有问题都集中到这个机关里解决，如：队伍的组织、训练、休整和检阅。第一骑兵集团军野战司令部的干部将参加这个机关的工作。

恳求您，尊敬的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以最快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最终把我从目前这种地位不确定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如果不使您为难的话，请将结果告诉我。

深深敬重您的 谢·布琼尼
莫斯科，1923年8月22日

№ 08710

斯大林给布琼尼的回收

(1923年8月23日)

密电

顿河畔罗斯托夫
致布琼尼

您可以相信，我们将使您成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总司令助手和共和国骑兵司令。

斯大林

1923年8月23日

【专题说明】

关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

(1921年6~10月)

1921年苏俄发生严重的灾荒。为救济灾民，由高尔基牵头，会同普罗科波维奇、库斯科娃等社会名流向政府建议成立赈济饥民委员会。列宁很重视高尔基的建议，6月29日俄共政治局开会讨论，原则上同意高尔基的建议。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成立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决定。委员会成立后，要求组团出国以争取国外的援助。俄共领导人对此意见不一，契切林和克拉辛表示支持，认为派团出国不仅有利于募捐，还有利于向西方借贷、租让等工作的开展。持异议者则认为该团是“反苏反共的自由民主同盟”，不能派这样的代表团出国，应当让苏联工人阶级直接同西方打交道。政治局最后不仅拒绝了派团出国的要求，而且解散了赈济饥民委员会，逮捕了委员会成员。高尔基移居国外。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赵国顺翻译)

№0436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1 年 6 月 29 日

晚间会议第 44 号记录摘抄

（1921 年 6 月 29 日）

出席：政治局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莫洛托夫同志。

中央委员：布哈林、施略普尼柯夫^① 和李可夫同志。

听取：4. 高尔基同志有关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4. （1）原则上同意高尔基的建议。

（2）成立一个委员会，成员由中央按照高尔基的名单拟定的人选组成，并增补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为委员会委员。

任命加米涅夫同志为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同志为副主席。

（3）为事先讨论细节问题，成立由加米涅夫、李可夫、泰奥多罗维奇^②、斯维杰尔斯基^③ 和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

① 施略普尼柯夫，亚·加·（1885～1937）——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1917），劳动人民委员，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1922）。

② 泰奥多罗维奇，伊·阿·（1875～1937）——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0～1928），国际农业研究所所长（1926年起）。1928～1930年任农民国际总书记。

③ 斯维杰尔斯基，阿·伊·（1878～1933）——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18～1922），俄联邦副农业人民委员（1922～1928），农业科学院院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0436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1 年 7 月 12 日

会议第 50 号记录摘抄

（1921 年 7 月 12 日）

出席：政治局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莫洛托夫同志。

中央委员：布哈林同志。

听取：7. 有关赈济饥民委员会的情况。

决定：7. 允许“社会活动家”参加，他们在主席团 7 个名额中不得超过两个，且不进行主席团选举（……）

中央书记 维·莫洛托夫

№ 0436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1 年 7 月 15 日

会议第 51 号记录摘抄

（1921 年 7 月 15 日）

出席：政治局委员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里宁、莫洛托夫同志。

中央委员布哈林、施略普尼柯夫、拉狄克^①、李可夫、雅罗斯拉夫斯基^② 同志。

听取：6. 关于赈济饥民委员会。

决定：6. 成立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任何关系的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但该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均由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主席团也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

中央书记 维·莫洛托夫

① 拉狄克，卡·伯·（1885～1939）——1904 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1908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1924 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 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1925 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36 年被捕，后平反。

② 雅罗斯拉夫斯基，叶·米·（1878～1943）——1921 年起为中央委员，1923 年起为中央监委书记，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0436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1 年 8 月 18 日

会议第 54 号记录摘抄

（1921 年 8 月 18 日）

电话征询政治局委员通过：列宁、斯大林、莫洛托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同志。

听取：1. 赈济饥民委员会代表出国访问事宜。

决定：1. （1）推迟赈济饥民委员会出国访问。

（2）建议该委员会委员前往发生饥荒的省份向饥民提供实际帮助。（……）

№04371

契切林^① 就不宜撤销全俄赈济饥民

委员会问题致列宁

(1921年8月18日)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目前，西欧所有的报纸、电讯稿和无线电电讯稿在提到社会活动家委员会时，都没有把它看做所期待的或者符合其愿望的苏维埃政府的替代物（恰恰相反，所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在就赈济饥民运动发表声明时都谈到一定要同苏维埃政府打交道），而是把它看做是所谓苏维埃政府新方针的证明。这是那种关于苏维埃政权蜕化的总看法中的一个插曲。这种看法是目前资本流入我国以及向我国提供或不久的将来可望提供各种贷款的主要动力：这里有红十字会的援助，有通过南森实施的“国际政府贷款”，有通过别尔津实施的英国贷款计划、厄克特的大规模计划及克拉辛实施的广泛实物借贷计划。^② 消除这种看法为时尚早。在就社会活动家委员会一事大肆张扬以及我方正式声明之后再禁止该委员会出国访问并以某种方式取消社会活动家委员会，这就意味着消除这种看法。假如这个委员

① 契切林，格·瓦·（1872～1936）——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3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1930年退休。

② 指挪威外交家南森（1861～1930）来莫斯科商谈组织救援伏尔加流域饥民的国际组织问题，别尔津（1881～1938）任驻英国全权代表（1921～1925）时的活动，英国大企业家厄克特（1874～1933）1921～1922年间关于归还其在俄国的康采恩同俄人民委员会所进行的谈判，1920～1924年任外贸人民委员和驻英国商务代表的克拉辛所进行的谈判。

会根本没有成立，当然谁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在委员会成立了，对其大肆宣扬了，对它下了保证，与之对话并将这些对话到处传播了，在公报中正式提到该委员会和即将出国访问，在这之后采取如此轰动的措施，就会突然地粗暴地揭去我们给资本以希望的帷幕。春天《小巴黎人报》^① 登载了一篇克拉辛^② 同志答记者问，其中不是把我国的租让政策说成是我国利用资本的办法，反而说成是与资本的妥协，当时我就曾提醒您，这种看法与我们的基本观点是背道而驰的。您当时却说，派克拉辛同志出国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当时政治局作出决定，同意克拉辛同志在西欧的这种提法。可见，政治局已正式同意我们自己散布的关于我们蜕化的说法。从那时起，我凡事均以此决定为基础。这种说法确实大大促进了我国政治地位的巩固。当关于饥荒的恐怖报道开始时，我正准备与法国谈判。因饥荒引起的惊恐使我国的政治地位急转直下。但现在出现了新的转机，相反，正是由于关于反饥荒的报道，由于每个国家的政府生怕别国政府借饥荒之机从经济上对俄罗斯进行渗透而出现的各国政府间的竞争，我们又面临着新的机遇。我们现在正处在关键时刻：事态可能向两个方向发展，要么是我们大家面临的危险大大增加，要么是新的机遇大大增多。我们对布劳恩们^③、南森们、施列津格尔们采取的全部财政和外交行动目的就是要往后一种方面发展。在饥荒初期，西方报刊把成立社会活动家委员会说成是我国软

① 1876~1944年在巴黎出版的小市民报纸。

② 克拉辛，列·波·（1870~1926）——1890年加入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派。十月革命后历任红军供给非常委员会主席、工商业人民委员、交通人民委员。1920~1924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1920~1923年兼任驻英国全权代表和商务代表。参加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此后先后任驻法国和英国全权代表。

③ 布劳恩，奥·（1872~1955）——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之一，农业部长，1920~1932年领导普鲁士联合政府。

弱的表现。现在情况发生了逆转，他们又把该委员会的成立看成是我们有应变能力，认为这是苏维埃政府要改善俄罗斯的状况，向它投资是有利可图的。今天晚上我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到一位同情我们的美国人所写的报道的片断，其中谈到许多好事，并将社会活动家委员会归功于我们。在现阶段国外报刊宣传中，我要指出那篇颇有代表性的捷克总统马萨里克在《时钟报》上针对基什金^①的言论发表的讲话，他说：“俄国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着意义重大的事件；克伦斯基政府的前部长们当着苏维埃政权代表的面尖锐地抨击时局，这在半年前还是不可能的；社会与苏维埃政府之间又架起了一座桥梁。可以交换意见了，此外，在野团体也可以与政府进行合作了”。与此同时，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俄罗斯意志报》^②却与《时钟报》及其他类似的西方报纸背道而驰，竭力证明布尔什维克不能把国内的有生力量结集在自己的周围。这就是目前的局势——资本竭力靠近我们，它利用饥荒与我们的接近，并且对我们采取新方针寄以希望。突然转向去反对社会活动家委员会就会给这一关于新方针的观念，给我们正在得到的好处以及目前方兴未艾的我国外资的利用以沉重打击。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契切林

① 基什金，尼·米·（1864—1930）——1917年任临时政府国家救济部部长，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的组织者之一。

② 《俄罗斯意志报》——右翼社会革命党的中央机关报，1920—1922年在布拉格出版。

№04372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会议记录摘抄

(1921年8月18日)

送列宁同志

1921年8月18日

听取：有关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出国代表团的出访问题。

决定：就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关于委员会代表团立即启程的建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

(1) 鉴于苏维埃政府已经在与一些西欧国家政府以及诸如胡佛^①组织和国际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进行谈判，认为代表团立即出国已无必要，那样会分散力量并使之丢开俄国国内目前紧迫的实际工作。

(2) 向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指出，鉴于已开始向饥荒地区发放粮食，他们必须立即集中全部精力做好这些地区的工作。建议立即将绝大多数委员派到各地参加粮食发放和建立食品发放点等工作。

(3) 如不服从全俄执行委员会的第二条决定，将按照中央政府

^① 胡佛，赫·克·(1874~1964)——美国总统(1929~1933)。1919~1923年是美国救济署领导人，1921~1928年任商业部长。1921年提出援救俄国百万儿童和残疾人的建议。

关于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

权力机关的指令把该委员会委员指派到这些饥荒地区去（第3条不公布）。

摘抄无误。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叶努基泽^①

^① 叶努基泽，阿·萨·（1877~1937）——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主任、全俄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秘书。1934年当选中央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04373

克拉辛就赈济饥民委员会问题致列宁

(1921年8月19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我读了契切林8月18日就普罗库基什委员会^①一事给您的信，我完全同意他的论据。禁止已经批准的出国访问（否则我们就不应向全欧洲申请签证）会有损我们的全部新方针和破坏我们如此顺利开始的瞒天过海术。

政策的这一改变不仅对赈饥募捐，而且对借贷问题及有关租让的谈判，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晌。为什么要这样做？那种以为普罗库基什委员会会破坏我们与胡佛的关系的担心已证明是毫无根据的——胡佛已经在驱逐和搜查问题上作出让步。根本不存在普罗库基什委员会在国外变成危险组织的危险。相反，该委员会会有助于瓦解国外的白卫团体，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要不然我们还不会很快去和白里安接触，而离开法国就没有也不会有大笔的贷款。

胡佛甚至厄克特^②关于我们已向“社会人士”让步的错觉只会对我们有利，消除他们的错觉现在还为时过早，也毫无必要。因为我们只是刚刚踏上通向成功之路，赈灾方面和贷款及租让方面均尚无成就可言。不要以为这一切会很轻松！今天抵达的那位厄克特

① 即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由其3个活动家的名字组成：普罗柯波维奇、库斯柯娃、基什金。

② 厄克特，莱·（1874~1933）——英国金融家和工业家。1921~1922年间苏维埃政府谈判收回其原先在俄国的康采恩问题。

在给胡佛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成立普罗库基什委员会就是正在出现与我们做生意的机遇的证明。“为什么要取消这个委员会？”面对厄克特在抵达莫斯科的两三天内就会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该如何作答呢？在我看来，我们不必给自己设置障碍，既然有人想出了普罗库基什委员会，那就让它去弄几百万来吧。

致同志敬礼！

列·克拉辛

No04375

卢那察尔斯基等就赈济饥民委员会

出访问题致政治局

(1921年8月21日)

我们，下面署名的俄共党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赈济饥民委员会委员，非常了解此事，且极为关心此事的人，认为自己有责任就政治局拒绝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派代表团出访请求的决定陈述自己的看法。

在我们看来，拒绝这一请求无异于宣布撤销该委员会。委员会在星期六的会议上决定，再次请求俄罗斯联邦政府批准此事。我们表示支持委员会的请求，理由如下：

这里我们不去深究当初允许成立该委员会是否合适，我们认为既然已经成立，它就成了十分明显的受到俄国各种社会力量以及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的国外社会力量关注的焦点。

凡是关注国外报纸或者哪怕《真理报》的外电报道的人都知道，委员会的成立曾被看做“‘布尔什维克’在与贫困做斗争中愿意接受社会力量援助”，另一方面也被看做苏维埃政权已经可以正式承认那些在外国人看来颇为重要、颇有分量、至今避免得到如此承认的社会各界人士的征兆。

我们当然不认为这一切有什么意义，但我们十分明确地预计，解散委员会一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将被看做是这种接近的尝试的破灭。

有些人会真心诚意地说，要么是布尔什维克根本不善于依靠社

会力量，要么是社会力量感到根本不可能与革命政府较为融洽地合作共事。有些人（这要危险得多）则不相信这个，他们会大肆散布谣言并借此大做文章，混淆视听。

我们很清楚，某些国家的政府及国外一大批人对全面撕毁与我们签订的所有赈灾合同颇感兴趣。当然，他们即使利用这次风波也达不到撕毁的目的，但是他们将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他们借此说布尔什维克政府是如此孤立、如此孤僻等等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事先即可预见到，俄国报刊及国外报刊一旦得知自动撤销委员会将会怎样地欣喜若狂。幸灾乐祸的敌人总是能给我们敲警钟的。

因此，鉴于这个委员会尚有一点好处，鉴于暂时毫无坏处，我们认为，与该委员会发生冲突以及委员会自动撤销所带来的弊端现在已经感觉得到。所以恳请政治局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并允许委员会派团出访，当然，人数一定要少，且须经过严格筛选。我们认为，这个决定比政府间接承认自己的错误要好，因为委员会成立和派团出访是得到正式的原则上的批准的。

签名：阿·卢那察尔斯基和阿·叶姆沙诺夫^①、泰奥多罗维奇

我本人再补充一点。工作中我了解到东南部地区所发生灾害的严重程度，我认为不能忽视所谓“社会力量”所给予的实际帮助。据我所知，许多乌克兰农民就是看在柯罗连科这个人^②名字的分上才把粮食捐给饥民的。我认为，假如确有必要取消社会活动家委员会，可以推迟一些，过几个月再说，到时可以借口说赈灾斗争已

① 叶姆沙诺夫，阿·（1891～1941）——1920～1922年任俄联邦副交通人民委员。

② 柯罗连科，弗·加·（1853～1921）——俄作家，俄科学院荣誉院士（1918），曾给卢那察尔斯基写信，认为俄国的经济结构遭到了破坏，饥荒是其后果。

上轨道，今后可由共和国的常设机构来进行，可以此为理由取消同饥荒作斗争的所有非常机构。

伊·泰奥多罗维奇

№04376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1 年 8 月 25 日
会议第 55 号记录摘抄

（1921 年 8 月 25 日）

出席：托洛茨基、莫洛托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索尔茨^①、切雷舍夫^② 同志。

听取：2. 关于赈济饥民委员会。

决定：2. 政治局关于拒绝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派团出访请求的决定仍然有效。

将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及其他同志就此问题所写的信分发政治局全体委员（……）

中央书记 维·莫洛托夫

① 索尔茨，亚·亚·（1872～1945）——189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 年起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1 年起为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1921 年起为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成员，后为苏联最高法院成员，在苏联检察院担任负责职务。

② 切雷舍夫——俄共中央监委。

№04374

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决定

(1921年8月26日)

送列宁

1921年8月26日

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在8月23日召开的委员会会议上研究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8月18日就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代表团出访事宜所作的决定，有委员会全体委员参加的会议认为，政府拒绝立即派代表团出国，这种做法有碍委员会工作并破坏了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7月21日以法令形式赋予委员会的基本权利。

代表团如不在国外开展工作，委员会就无法进行富有成效的活动，因为委员会的特派员受托在各地（无论是发生饥荒的省份，还是收成好的省份）进行的研究均已证实：无来自国外的迅速援助根本不可能向饥民提供切实的帮助。

至于政府有关加强委员会在地方上工作的建议，那么委员会无法通过这项工作向饥民提供帮助。现在无论多少委员前往各地，既不会使那里的粮食有所增加，也不会使整个局面有所改观。

因此，委员会仍坚持自己的决定：立即派代表团出国。如代表团出访的障碍不除，则委员会认为，鉴于目前已无法完成其所承担的工作，惟有被迫停止工作。

委员会决定：8月27日星期六召开委员会会议，以决定委员会今后活动的问题或者停止工作的程序。

№04370

洛佐夫斯基^① 就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
代表团出国访问事给政治局的信

(1921年8月30日)

1921年8月30日于莫斯科

致中央政治局莫洛托夫同志

抄送：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

众所周知，即将出国访问的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出国代表团就其人员组成和性质来看，是反苏反共的自由民主联盟。他们要在国外干什么，我们且拭目以待。现在的问题是要让俄国无产阶级直接并同时向西欧谈饥荒问题。为此我建议：(1) 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选出3个由5人组成的代表团，人员来自几个最大的工会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2) 一个代表团去英国和美国，一个去中欧——德国及其邻国，一个去罗曼语系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3) 三个代表团组成后，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将请求上述国家全体工人保证我国肩负特殊使命——向工人介绍俄国及赈济饥民组织情况——的代表能自由行动。(4) 代表团组成后，外交人民委员部立即与各国政府联系，要求为俄工会运动的代表办理签证。(5) 代表们此行的目的是既与追随红色工会国际^②，也与追随阿姆斯特

① 洛佐夫斯基，索·阿·(1878—1952)——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历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

② 指世界48个国家加入工会国际的规模工会组织。

丹国际的各工人组织^① 进行交往。

有可能让我们入境，哪怕不是所有的国家，有些国家总可以去的。如果不准我们入境，那么这样一来作为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代表出访的目的的自由民主主义的宣传在政治上就会失效。

工会国际总书记 阿·洛佐夫斯基

^① 追随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1919～1945）的有西欧和中欧的 903 个工会。

№04377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1 年 10 月 20 日

会议第 70 号记录摘抄

（1921 年 10 月 20 日）

出席：政治局委员列宁、斯大林、托洛茨基、加里宁、加米涅夫同志。

中央书记米哈依洛夫^① 同志。

报告人；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克列斯廷斯基同志^②、阿尔斯基^③同志。

1921 年 10 月 20 日

听取：21. 有关被捕的前全俄赈济饥民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加米涅夫同志）

决定：21. 建议温什利赫特^④ 同志在两周内将被捕的前赈济饥民委员会委员流放至一个不太远的城市（……）

① 米哈依洛夫，瓦·米·（1894～1937）——1921 年起任俄共中央书记和莫斯科委员会书记，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② 克列斯廷斯基，尼·尼·（1883～1938）——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人民银行总委员、财政人民委员、驻德国全权代表、副外交人民委员、副司法人民委员。党的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38 年被处死，后平反。

③ 阿尔斯基，阿·奥·（1892～1939）——1921～1922 年任副财政人民委员。

④ 温什利赫特，约·斯·（1879～1938）——1900 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19 年任立陶宛—白俄罗斯陆军人民委员，1921 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副主席、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民航总局局长等职。

【专题说明】

对列宁大脑的研究

(1925年2月至1969年10月)

列宁逝世以后，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对列宁的大脑进行研究，其任务是“从物质上证明列宁的天才”。这里收入的11件解密文献揭示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情况和取得的结果。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赵静男翻译)

№06248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列宁研究所申请报告》的决定

（1925年2月19日）

绝密

送托夫斯图哈^①、谢马什柯^②同志

中央政治局1925年2月19日会议第49号记录摘抄

听取：18. 列宁研究所的申请报告（托夫斯图哈、谢马什柯同志）

决定：18.（1）否决医生们关于把弗·伊·列宁的大脑移到国外去研究的建议。（2）建议在俄国开展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脑的研究。

中央书记

附：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和列宁研究所所长助理托夫斯图哈给俄共（布）说明列宁大脑研究工作的未来方向的报告以及列宁研究所医生委员会研究列宁大脑计划讨论会第24号记录。

№31/C 1925年2月18日

秘密

① 托夫斯图哈，H.И.（1889～1935）——1913年入党。1921～1924年在俄共中央机关工作。1924～1926年任列宁研究所所长助理。

② 谢马什柯，尼·亚·（1874～1949）——1918～1930年任俄联邦卫生人民委员。

致政治局

经永远纪念弗·伊·列宁委员会的同意，为了确定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未来的方向问题，列宁研究所邀请了该问题的惟一专家——柏林大学神经生理学研究所所长奥斯卡·福格特教授。

根据福格特教授宣布——从事这一研究的米诺尔、克拉默、德申、布纳克和阿勃里科索夫等教授皆表同意——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

(1) 将大脑切成一系列切片（30.000片），并且

(2) 为此以及为了在福格特教授的实验室里进一步研究，将大脑移往柏林，期限大约为一年。

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根据福格特教授的意见，大脑在近期内就会失去染色的可能性（染色是开展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对大脑研究便无法进行。

根据以上所述，请政治局作出相应的指示。

卫生人民委员 （谢马什柯）

列宁研究所所长助理 （托夫斯图哈）

正式记录第24号

1925年2月17日晚8时，A.A. 德申、B.B. 布纳克、B.C. 魏斯勃罗德、Л.С. 米诺尔、A.И. 阿勃里科索夫、B.B. 克拉默教授和被邀请的柏林大学神经生理研究所所长福格特教授来到列宁研究所。

归纳1925年2月16日会议出席者的发言，会议主席魏斯勃罗德教授受列宁研究所的委托，提出下列问题：

1. 细胞构造研究能否对弗·伊·列宁的天才提供物质上的论证？

福格特教授和全体与会者一致发表了肯定的意见。

初步研究的结果即已断定细胞构造的特殊性；但是，与此同时还应该指出，研究不应该局限于一次性的观察，随着染色技术和科学的发展，需重复研究新的切片。

对这些切片的研究应该与其他人的大脑切片以及（精神分析）心理研究进行比较。^①

2. 这项研究的技术规格是什么样的？大脑应该切成厚度为 1.8 毫米的薄层切片；这些切片作石蜡包埋，然后应该制作薄层的切片，以便进行病理学研究和拍照。

拟定的工作要求有丰富的经验和精心细致，无论是包埋标本，还是制作切片、染色和拍照都是如此。

3. 为什么必须在国外进行研究？柏林的神经生理研究所拥有经验异常丰富的人员，他们在该问题上世界惟一的专家福格特教授的指导下工作，那里有专门干这项工作的精密可靠的全套仪器。那里的工作一直在福格特教授的直接领导和观察下进行。

4. 在莫斯科工作有哪些障碍，哪些障碍可以克服？

标本应该尽快作石蜡包埋，因为否则它仍然固定在液体状态，就不能吸收染色物质，从而也就失去了研究的可能性。这一工作的紧迫性使它不能在莫斯科完成，因为这里没有富有这方面经验的标本专家，也没有全套仪器。从国外订购仪器需要时间，标本在这个期间可能坏掉。邀请标本专家，假如他们不是在福格特教授直接照管下工作，那也与事无补。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大脑的切片包埋都应该尽快进行，在福格特教授的领导下由有经验的标本专家进行，使用良好的仪器，这在

^① 福格特教授认为应该派遣 2~3 名俄国青年学者到柏林去，参与对此大脑的研究，在这个领域里取得某些经验，等把所有的切片运回俄国时能够长期继续福格特教授开始的对大脑切片的研究。

莫斯科未必能够完成。

石蜡包埋以后，便可以放心了，大脑的组织对于未来进行细胞构造研究就不会坏掉。

5. 在莫斯科开展工作的条件下，能够收到哪些成果？

如果具备这些条件（福格特教授、有经验的标本专家、良好的仪器），也可以在莫斯科进行，但是由于缺少这些条件，而工作又很急迫，特别是涉及到包埋标本，福格特教授不能长期进行直接的观察和研究，在莫斯科进行细胞构造研究工作的结果也就值得怀疑。

不得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形态学研究，而这在当代科学状况下上远非完整的，是不够的。

列宁研究所所长助理托夫斯图哈一直出席了会议。

Oskar Vogt (奥斯卡·福格特)

A. 阿勃里科索夫

B. 布纳克

И. 米诺尔

B. 克拉默

A. 德申

B. 魏斯勃罗德

И. 托夫斯图哈

№ 06249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对列宁大脑的研究》的决定

（1925年2月21日）

绝密

送谢马什柯、托夫斯图哈同志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2月21日会议第50号记录摘抄

1925年2月21日向政治局委员们征询通过

听取：

29. 关于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谢马什柯、托夫斯图哈同志）

（2月19日政治局会议记录第49号第18款）

决定：

29. （1）同意谢马什柯和学者们关于在莫斯科进行列宁大脑研究的建议。

（2）准许福格特教授为此目的携夫人和一名女实验员进入苏联并且运进必要的仪器和标本。

（3）对大脑的一片切片进行实验性研究，如果结果良好，可继续制作必要数量的切片。

中央书记

附：

致政治局

学者们讨论了政府的决定，认为在莫斯科进行细胞构造研究是可行的。为此须要把福格特教授的夫人请来，她与他一起进行了20年的实际工作，尚须邀请一名女实验员并且运来仪器。开展工作之前，福格特教授先制作一块切片，以便观察大脑在酒精和福尔马林的影响下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继续用这种方式保存，大脑将失去其全部价值。因此切片并不破坏其以后的价值。

我觉得可以同意在莫斯科采用这种程序对大脑进行研究；准许必要的人员前来莫斯科并且运来仪器；对大脑切片进行一次实验性的研究。

尼·谢马什柯

1925年2月21日

No 0625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
“列宁研究所问题”的决定

（1925年5月22日）

绝密

No. П64/21/c.

送谢马什柯、托夫斯图哈同志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5年5月21日会议第64号记录摘抄
听取：

21. 列宁研究所问题（谢马什柯、托夫斯图哈同志）

决定：

21. 通过列宁研究所的如下建议：

批准研究所与福格特教授的合同草案以及与此相关的事宜：

（1）委托谢马什柯和托夫斯图哈同志为研究弗·伊·列宁大脑寻找合适的房子，并安装专门设备。

（2）委托捷尔任斯基同志物色一个可靠的同志在进行研究期间负责保卫列宁的大脑。

（3）委托谢马什柯同志会同中央组织分配部物色两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医生，把他们派往柏林到福格特教授处进修2~3个月。

（4）用于购买合同第6款规定的仪器、安装设备、劳务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经费，由人民委员会的预备基金中拨给列宁研究所，责成谢马什柯和托夫斯图哈同志提出相应的预算。

中央书记

№06251

谢马什柯就成立大脑研究所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报告

（1926年1月25日）

绝 密

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

根据政治局的决定，对列宁同志大脑的研究作业已展开。购买了并且正在继续买器械和仪器。制作了一部分切片。福格特教授派来的德国女实验员正在工作。两名共产党员医生（萨皮尔和萨尔基索夫同志）在福格特教授那里听了两门课程，在莫斯科开始了工作，已经取得了某些初步成果。

鉴于对列宁同志大脑的研究工作还要继续数年，既包括对列宁大脑的切片研究，也包括把它与他人的大脑进行比较，鉴于这类工作在我国首次进行，并且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希望不是用手工的实验方式，而是搞得更有组织一些。希望所进行的工作不至于毫无结果，而能够保持科学的延续性，为未来这方面的科研工作打下基础。

成立一个以列宁同志的名字命名的大脑细胞构造研究机构是适宜的???

因此，我建议，现在就着手建立大脑研究所，由福格特教授领导并由他任所长。

成立研究所，如果需要补充经费，那也是微不足道的：目前正

在进行的工作构成了基础。

比较困难的是房子问题。但是这也可以解决。

如果政治局原则上同意，我即可承担计划和预算的编制工作，并且按照苏维埃程序上报实施。

卫生人民委员 谢马什柯

№06252

拉姆金就科研人员对列宁大脑研究的看法给 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的报告

(1928年1月11日)

致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同志^①

由于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福格特教授对列宁大脑的研究，我所主管的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中间出现了热烈的议论。我不想分析这些议论的实质并作出评价，但我认为向您汇报下述情况是自己的党员义务：

1. 福格特学派研究大脑的工作受到某些批评，认为它同似乎更有科学价值的现代化研究大脑的方法是对立的。

2. 刊物上发表的福格特的著作不能满足我们神经病理学家们的求知欲，似乎缺乏足够的科学论证，而主要的是对问题缺乏全面阐释。

3. 还有一些个别的议论：为什么在研究大脑的工作中不使用我们（苏联）的学者，就学识而论，他们似乎并不逊于福格特。

4. 福格特向卫生人民委员谢马什柯同志推荐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主任教师、神经病理学家多伊尼科夫博士（阿斯特瓦察图罗夫教授的高级助教）出任莫斯科大脑研究所的实际所长（福格特是名誉所长）。

多伊尼科夫博士是福格特从前的助教和大脑研究的著名学者。

^① 写有批语：“上报斯大林同志。布勃诺夫，1月21日。”

多伊尼科夫拒绝接受研究所所长的职务，理由之一是他在这个领域里的工作方向有些不同。然而实际上，他仿佛认为福格特学派如今在这个领域里已经不能够提供采用别的研究方法所能够和应该取得全部成就。

显而易见，我们的学者们这些谈话是在很狭窄的专家的圈子里进行的，对待国外科学的代表人物不无一定程度的“嫉妒”。因此，准确地判断事情的实质是非常困难的，然而似乎是必要的。

根据以上所述，请求对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和途径给予指示。

工农红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委员 （拉姆金）

1928年1月11日

№06253

斯捷茨基就列宁大脑研究进程给斯大林的报告

(1932年1月10日)

斯大林同志：

共产主义科学院大脑研究所向中央文化部提出了关于自己与福格特教授（德国）的关系的问题，他是谢马什柯同志于1925年邀请来研究列宁大脑的。

据了解，目前列宁同志大脑的保存状况是不能允许的。

大脑保存在大脑研究所的保险柜里。保存的条件总体上没有得到保证。没有保卫。保险柜的钥匙放在研究所研究人员萨尔基索夫手里，据研究所所长办公室称，大脑的研究工作目前没有进行。

研究所所长是福格特教授（德国人），跟他签订了研究列宁大脑的工作合同。可是福格特教授从1928年起便不再到莫斯科来了，事实上与研究所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1928年，他从谢马什柯同志那里得到列宁大脑的一个切片，把这个切片带走，现在在讲课中和发表的文章中使用这个切片的幻灯片。

然而这种公开的展示让人气愤：列宁大脑的幻灯片被放映，并且与一个“女犯人”的大脑相比较，等等。

福格特教授根据对列宁大脑进行的解剖学分析，提出一种机械论的天才理论：有大量锥体细胞并且排列独特。在德国精神病百科全书中，一个“大人物”——施皮尔麦耶尔教授断言，这种大锥体细胞似乎弱智者也有。因此，资产阶级报刊登了一系列有关列宁同

志的恶毒文章。福格特教授不驳斥这些文章，也不驳斥施皮尔麦耶尔教授。

还应该补充，福格特教授在柏林出版一个专门的刊物，叫做威廉皇帝研究所（柏林）和大脑研究所（莫斯科）的机关刊物，而大脑研究所与该刊物事实上毫无关系。

我认为必须结束这种状况。

必须：

(1) 把列宁的大脑放在可靠的保管处——可以放到列宁墓里，责成叶努基泽同志负责。

(2) 中断与福格特教授的关系，派几位同志赴柏林从他那里取回列宁的大脑切片和幻灯片，从而结束资产阶级教授们掌握这些标本所玩弄的卑鄙伎俩。^①

联共（布）中央文化宣传部部长 （阿·斯捷茨基）

1932年1月10日

附上自然科学协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

致联共（布）中央文化宣传部斯捷茨基同志

共产主义科学院自然科学协会办公室和心理神经病学研究所认为必须让您了解与研究列宁大脑有关的某些亟待解决的紧迫问题。

而且问题涉及到诸如列宁大脑（大脑切片和模塑品）以后存放的地点以及下一步对大脑研究工作的性质、我们与身为大脑研究所所长福格特教授的相互关系、他对刊物上（主要是施皮尔麦耶尔的教科书中）出现的对福格特研究列宁大脑的工作的声誉的损害做

^① 文件上有批语：“交波斯特舍夫：斯大林同志认为斯捷茨基的建议是正确的。波〔斯克列贝舍夫〕”。

出反响的必要性、今后对待福格特教授的机关刊物（被认为是莫斯科大脑研究所与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的机关刊物——见机关刊物名称的样本）的态度，最后，从福格特教授那里取回列宁大脑的一个切片、幻灯片和照片（福格特教授常在自己的讲课中放映，并且与一个女犯人的大脑进行比较）的必要性。

也还必须解决我们与大脑研究所所属的设在莫斯科的人种生理德国实验室的相互关系问题。

我们的几点建议：

1. 现阶段直至今后找到研究列宁大脑其他途径和方法之前（因为只用细胞构造法是不够有，它只能损害信誉），停止对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因此把全部材料（切片、模塑品、照片、幻灯片）都移交给马恩列研究院并存放于列宁墓。

2. 为与福格特教授亲自商谈他在刊物上就施皮尔麦耶尔的论点发表文章，从福格特处取回大脑的切片、幻灯片和照片，并且商定停止展示和援引列宁的大脑等事宜，拟派出两个同志（其中一人应该与福格特熟悉，与他在研究列宁大脑的工作中有关联，另一个是共产主义科学院的负责同志），为期20天。福格特教授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最好能在这里商定，务使发表的文本正像商定的那样。

3. 派去的同志应该与福格特商定：

（1）他今后与研究所的关系，特别是为了保持良好的关系（保持良好的关系很重要），必须与福格特商定由他担任研究所形态学方面的顾问，今年组织他进行为期10~15天的来访。

（2）商定我们研究所今后参与福格特教授的刊物的形式，或者从杂志的封面上完全取消研究所的字号，或者杂志继续作为研究所的机关刊物（如果在国外能有一个刊物作为论坛，在政治上也许不是坏事，但必须利用它），商定今后实际上的共同编辑工作的形式，刊登我们文章等事宜。

(3) 商定人种生理学实验室今后的工作形式，并且取得与研究所更紧密的联系，在研究所的会议上定期报告实验室的科研工作等等，或者完全撤消实验室。

为了保持与福格特教授的联系，可以保留实验室，但是必须与研究所建立紧密的联系。

自然科学协会主席 K.A.

心理神经研究所所长 K.A.

№0625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关于列宁大脑的今后研究工作”的决定
(1932年4月13日)

绝密

№. П96/16 - опр.
1932年4月13日

中央政治局 1932年4月13日
会议第96号记录摘抄

1932年4月13日征询政治局委员的意见通过
关于列宁大脑的今后研究工作。

(1) 恢复大脑研究所，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所，隶属于苏联
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2) 留任福格特教授为大脑研究所所长，任命 C.A. 萨尔基索
夫同志为副所长。

(3) 为研究所选定一批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由中央决定任
命。

(4) 派遣萨尔基索夫同志赴柏林与福格特教授谈判，为期两
周。

中央书记

№06255

米柳亭^① 就列宁大脑研究工作的 科学成果给斯大林的报告

(1935年7月5日)

绝密

致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

大脑研究所对列宁大脑进行了大量科研工作，我认为有必要让您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全部工作是在萨尔基索夫同志的领导下进行的——他代理研究所所长职务。福格特教授曾受委托研究列宁同志的大脑，他研究了比较小的一部分大脑。从1930年起福格特教授没有到苏联来过，完全不再从事该项工作了。

现在，根据所做的工作，可以分析列宁同志大脑的出色数据了，这些数据证明他的大脑具有高级的组织结构，不同于研究所作为对比研究的其他15个人的大脑。到1935年11月，研究所将完成对列宁同志大脑的全部研究和详细描述（一个半球已经研究完毕，另一个半球正在研究之中）。

此外，研究所还对人脑的发展问题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严肃的

^① 米柳亭，弗·巴·（1884～1937）——1910年起为布尔什维克。1917年当选中央委员，1920～1922年为中央候补委员。十月革命后任农业人民委员。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4年起历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中央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此时兼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与教学机构管理委员会主席。

工作，搜集和研究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与正在进行的列宁同志大脑的研究工作有关，出现了三个实际问题，没有您的指示，这些问题就不能得到解决：

(1) 是现在立即向您或政治局详细汇报列宁同志大脑研究的结果，还是等到全部工作结束以后。

(2) 研究所采用最新的方法对其他一些人（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①、波克罗夫斯基^②、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大脑进行了研究，得出了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可否把对这些人的大脑研究结果公布。

(3) 必须在物质上帮助研究所（特别是房子大修），充实研究所的工作人员。

请对这些问题给以指示。

（委员会主席） 弗·米柳亭

①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伊·伊·（1870~192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起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工作。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消息报》主编、《真理报》副主编。1926年起任列宁研究院院长。

② 波克罗夫斯基，米·尼·（1868~1932）——历史学家。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5月起任副教育人民委员。

№06256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阿库洛夫 给斯大林的报告

(1936年2月7日)

致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同志：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大脑研究所完成了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

根据研究所副所长萨尔基索夫同志（所长为福格特）的请求，我给了该研究所一个月的期限，以便在对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马雅可夫斯基、作曲家苏克的大脑结构进行比较研究方面能够作某些补充性的工作。

我认为应在三月上旬向中央提交研究所关于列宁大脑研究工作结果的报告。

附上萨尔基索夫同志给我的一封信的抄件。

伊·阿库洛夫

1936年2月7日

附：

尊敬的伊万·阿列克塞耶维奇：

在您视察大脑研究所的时候，我曾汇报过对弗·伊·列宁大脑研究工作的进程。

现在列宁大脑研究的基本工作已经结束。

我认为有必要简短地叙述一下这项工作的历史。

列宁逝世以后（1924年），根据由克拉默、米诺尔、阿勃里科索夫、德申、布纳克和谢马什柯教授组成的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对弗·伊·列宁的大脑进行细致的研究。

政府把对弗·伊·大脑的研究工作委托给最著名的德国学者福格特。早在1924~1925年，奥·福格特及其夫人H.福格特就已为对弗·伊·的大脑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技术准备工作。

由于我们苏联没有研究大脑显微结构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即实验员，特从柏林大脑研究所聘请了福格特教授的技术人员（沃尔恺、黑塞和罗特）来苏联。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派遣了四名苏联年轻的学者（萨尔基索夫、萨皮尔、波波夫、切尔内舍夫）到柏林研究所去进修专业。其中三人返回莫斯科以后也从事研究大脑的准备工作。

1927年，福格特在小范围内的政府成员里通报了研究弗·伊·列宁大脑切片中获得的数据，拟定了下一步工作的计划。

同年（1927年），政府决定把列宁研究所下的实验室（起初在那里制作了大脑切片）移到新房子里并且扩展成为大脑研究所，奥·福格特被任命为所长。福格特直接领导了研究所的组建和设备安装，参加了所有实验室、办公室等的设备安装，包括每一个细节。

给研究所提出了如下的近期任务：

（1）培训干部。（2）为进行细胞结构学研究搜集和准备尽可能广泛的材料，其中包括苏联已故的杰出活动家的大脑。福格特定期来苏联，他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持续到1929年。

1929年，大脑研究所合并到当时存在的高级神经活动研究所，变成该所的形态学科。

与福格特教授的联系中断了，大脑的研究工作停止了。

1932年4月，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恢复了大脑研究所的独立地位，并把它移交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管辖，由奥·福格特教授任所长；我被派往柏林与福格特商谈他恢复在我国的工作。福格特很高兴接受了关于进一步合作的建议，给莫洛托夫同志回了一封感谢信。

我通过我国前驻柏林代表处领事吉尔什韦尔德同志与福格特保持联系，他通知我说，希特勒上台以后，福格特的处境异常困难，他的住宅已经受到2—3次搜查，怀疑他与苏联关系密切。吉尔什韦尔德同志亲自到福格特那里去过，跟他进行了谈话，福格特抱怨民社党徒对他采取无礼的态度（窃听他的电话，暗中检查他的信件）。

根据最新消息，福格特被解除了柏林大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留任代理所长）；他的案件好像移交给了内务部一个专门委员会处理。

福格特至今没有放弃莫斯科大脑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此外，在柏林出版由他主编的杂志至今形式上还是柏林和莫斯科大脑研究所的机关刊物。^①研究所在其存在的几年间，成长起来了，巩固了，没有福格特教授作为领导者也没有特别影响工作。

对弗·伊·大脑的研究是政府委托给福格特教授个人的。但福格特没有来莫斯科的可能性了，因此我们认为必须而且有可能自己继续对弗·伊·大脑的研究工作。我在柏林讨论研究所的工作计划时曾跟福格特谈过这一点。福格特认为研究所的骨干人员已经培养起

^① 我通过吉尔什韦尔德同志通知福格特，我们不能允许在这个杂志里维护和宣传任何法西斯理论。福格特让吉尔什韦尔德相信，只要他还担任主编，他决不会允许杂志里出现这类文章。——萨尔基索夫注

来，足以胜任这项工作。研究弗·伊·列宁大脑的专家学者有萨尔基索夫、H.C. 波波夫、莫诺夫、斯坦凯维奇、切尔内舍夫、波利亚科夫、勃林科夫、科诺诺娃同志。参加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的研究所的科学技术人员有：列兹尼科夫、库德里亚舍夫、弗拉基米罗娃、霍赫洛娃、康多尔斯卡娅、巴什基罗娃、萨尔吉娜同志。

此外，福格特认为研究所的材料相当丰富，足以保证对弗·伊·大脑的科学研究。福格特特别强调指出，这些材料中有苏联一些杰出活动家的大脑，研究所一直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研究所研究了下列活动家的大脑：明仁斯基^①、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片山潜^②、卢那察尔斯基、蔡特金^③、波格丹诺夫^④、昂利·巴比塞^⑤、马雅可夫斯基、米丘林、齐奥尔科夫斯基^⑥、索比诺夫^⑦、苏克^⑧等）。

① 明仁斯基，维·鲁·（1874～1934）——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财政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等职。

② 片山潜（1859～1933）——日本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22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

③ 蔡特金，克·（1857～1933）——187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9年参与第二国际的创建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斯巴达克联盟。1918年参加创建德国共产党，1919年当选中央委员。1921年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选执委会委员和主席团成员兼妇女书记处书记。

④ 波格丹诺夫，亚·亚·（1873～1928）——俄哲学家、经济学家、医生。20世纪初曾是布尔什维克，任中央委员。是“前进”集团的领袖，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是无产阶级文化的鼓吹者。1926年创办输血研究所，不幸在自身作输血实验中牺牲。

⑤ 巴比塞，昂利（1873～1935）——法国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⑥ 齐奥尔科夫斯基，康·（1857～1935）——苏联航空和火箭动力学以及飞机和飞船理论方面的学者和发明家，现代宇航学的奠基者。

⑦ 索比诺夫，列·维·（1872～1934）——苏联抒情男高音歌唱家，共和国人民艺术家（1923）。

⑧ 苏克（1861～1933）——苏联指挥家、作曲家。共和国人民艺术家（1925）。

不过，福格特建议最后批准权应该归托夫斯图哈，他一直代表政府与他就这项工作进行谈判。我回到莫斯科以后跟托夫斯图哈同志谈过，他同意并批准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研究弗·伊·的大脑。

研究所的科研人员和科学技术人员意识到责任重大，尤其是最近几年努力继续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现在这项工作已经完成。

上述工作人员集体所完成的工作，形成了一份庞大的材料，有文字说明并配有插图。

伊万·阿列塞耶维奇，谨此向您报告。研究所准备向党和政府呈上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结果。

萨尔基索夫

1936年2月5日

№06257

加里宁就列宁大脑研究结果给斯大林的报告和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草案

（1936年5月27日）

绝密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约·维·斯大林同志

现送上大脑研究所代理所长萨尔基索夫同志关于弗·伊·列宁大脑研究结果的报告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草案，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审查。

米·加里宁

1936年5月27日

绝密

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

列宁逝世以后（1924年），根据由克拉默、米诺尔、阿勃里科索夫、德申、布纳克教授和谢马什柯组成的委员会的建议，决定对弗·伊·列宁的大脑进行详细研究。

政府把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委托给最著名的德国学者福格特。早在1924~1925年，奥·福格特及其夫人И.福格特就已

为对弗·伊·大脑的研究进行了初步的技术准备工作。

1927年福格特在小范围的政府成员里通报了他在研究弗·伊·列宁大脑切片中获得的数据，拟定了下一步工作的计划。

同年（1927年），政府决定把列宁研究所的实验室（起初在那里制作了大脑切片）移到新的房子里并且扩展成为大脑研究所，奥·福格特被任命为所长。

给研究所提出如下的近期任务：

（1）培养研究大脑结构学的专家骨干，（2）为进行结构学研究搜集和准备尽可能多的材料，其中包括苏联已故的杰出活动家的大脑。福格特定期来苏联，他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持续到1929年。

以后的工作由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集体进行，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份庞大的材料，有文字说明并配有插图（共有153页文字和15册图片集，每册50幅显微照片）。

对列宁大脑的研究所取得的结果，根据一系列涉及大脑外部形体的特征——脑沟和脑回，根据一系列涉及通过显微研究而显露出来的精细构造的特征，使我们有权说，弗·伊·的大脑具有异常高级的组织结构。在这里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特征主要涉及的恰恰是弗·伊·的大脑下述区域，根据中枢神经系统当代形态学和生理学的资料，这些区域与特别高级的功能——精神集中、注意力、言语过程、认知和行动过程、要求转换具有极大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换言之，与高级神经活动的特别高级的功能联系在一起。

上述特征的确认，是把弗·伊·的大脑与一系列属于中等水平以及在某一方面杰出的人的大脑进行比较的结果。为此目的，研究所对10个中等人物的大脑半球和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马雅可夫斯基和波格丹诺夫的大脑（6个大脑半球）从结构学上进行了研

究。

为进行结构学研究而对列宁 大脑所做的准备工作

把大脑用福尔马林和酒精固定，切成块并用石蜡包埋。这些块分成 30953 个切片，全都保存在研究所里，制作了 690 张放大五倍的幻灯片，制作了一些大脑皮质各个结构区域的显微照片，总数约为 700 张。大脑皮质分成细胞结构区域和部位。在记录中对它们做了说明。对各个区域进行了测量，确定了它们的表面面积、部位表面和整个半球的面积。

计算出每个区域和每个部位与整个半球表面的百分比和每个区域与该部位表面的百分比。根据获得的数据，画出放大五倍的示意图，展示出右半球各个区域和部位的大小以及它们的面积对应关系。

左半球有严重的损坏，确定了保存下来的各个部分属于哪个结构区域。在大脑的显微照片上画出了两个半球各个区域和部位的界限。画出了示意图，展示出细胞结构部位表面的数量对应关系，还画出了表面和脑沟里面的各结构区域之间的百分比示意图。找到的数据表明了左半球保存下来的各个部位大小与右半球对应的部位大小比例。

对弗·伊·列宁大脑的宏观和微观研究

对弗·伊·大脑皮质各个部位的研究中所获得的数据分别作详细记录，进行对比之后，得出如下的基本结果：

(1) 众所周知，前额叶对于特别高级的功能，尤其是对于精神

集中，对于注意力具有巨大意义，下前额叶对于言语过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测量前额叶的脑沟和其他部分的脑沟，发现弗·伊·列宁的大脑中前额叶的脑沟与我们在这个方面研究的所有其他人（古比雪夫、卢那察尔斯基、明仁斯基、波格丹诺夫、米丘林、马雅可夫斯基、巴甫洛夫院士、克拉拉·蔡特金、古列维奇院士、齐奥尔科夫斯基）相比较，百分比最高。

脑回也非常丰富，同时，下前顶叶也与中等类型有极大的不同。这个部位对于高级功能，特别是对于认识和行动过程，具有重大意义。颞叶也具有很丰富的脑沟，特别是中下部颞叶的脑沟分成许多的弧状，走向各不相同，尤以横向为多。

(2) 我们研究了其他 16 个人的大脑半球，其中有 6 个杰出人物的大脑半球，我们发现通常从一个区域往另一个区域过渡，或者有明显的界限，或者有明显的所谓缓冲适应现象；在该区域范围内向着邻近区域的方向，存在着结构的变化，使它与邻近区域有某种相似的结构。福格特认为这种变化的发展导致新的结构区域的形成。这样，它就显示了大脑组织的高度完善。

不同于上述人物的大脑，弗·伊·列宁的这种结构特点非常明显地表现在前额、下顶叶和颞叶的许多区域里。这样，在前额叶中，缓冲适应与整个皮质表面的百分比为 2.06%，而与前额区域表面的百分比为 8.07%。波格丹诺夫的大脑相应的数字是 1.3% 和 5.3%，而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为 1% 和 4.1%，马雅可夫斯基为 1.1% 和 4.7%。

(3) 弗·伊·的大脑的精细构造特点也证明其构造的高度完善，其一是在前额（特别是第 10, 46 的 47 区域）和下顶叶发现的细胞成分的高度密集，比马雅可夫斯基、波格丹诺夫和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大脑的相应部位更密集。细胞成分的丰富是同可能转换的丰富性以及相应的功能的极大的多样性相当的。

(4) 大脑皮质其基本部分分为六层。根据现代细胞科学的资料，三层主要为联想系统提供起动物素，这个系统对于高级神经活动和特别高级的功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在弗·伊·列宁的大脑中，在前额叶，特别是在第10和46区域里，在下顶叶，上颞叶和处于第19区域邻界的颞—顶—后脑部位，在后中心部位（第70区域，尤其是第71区域），正是在第三层中可见到特别的大细胞。例如，第71区域内第三层细胞的大小有的地方达到了56~60微米，弗·伊的这个区域平均为32.7微米，而其他被研究的大脑分别是24.3微米（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27.1微米（马雅可夫斯基）和28.2微米（波格丹诺夫）。

(5) 我们把弗·伊·的前额和颞叶及其构成的各个区域表面的大小与其他人的大脑相应部位进行比较，其所得结果对于判断弗·伊·的大脑的高级组织特别重要。弗·伊·的前额部位占整个表面的25.5%，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占24%，波格丹诺夫占13.9%，马雅可夫斯基占13.5%。有一种情况特别有意思，弗·伊·列宁的前额叶比重大，主要是因为与这个部位特别强的分析功能相联系着的那些区域大。例如，第10区域是种类发展过程中最新的结构组成之一，在弗·伊·那里占整个大脑皮质的6.3%，而在波格丹诺夫那里占6%，在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那里占5.8%，在马雅可夫斯基那里占4.2%。

(6) 弗·伊·的大脑左半球受到很大损坏，但是在功能高度分化的部位把它与弗·伊·患病期间所拥有的巨大高级功能相比较，是很有意义的。这种比较可得出一个结论：弗·伊·即使是在患病期间仍然拥有高级的组织，虽然大脑受到很大损坏，但在功能上仍站在非常的高度上。

* * *

然而，研究所认为，完成对弗·伊·列宁大脑皮质的研究，大脑的研究工作并未穷尽。第一，研究所研究了一系列杰出人物的大脑，积累了大量比较资料，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详尽地弄清列宁大脑构造的更细微的特点。第二，对弗·伊·大脑皮层下部的研究具有很大意义。第三，对其他杰出活动家的大脑的研究结果，惟有把它们与对弗·伊·列宁大脑的更精细研究所得的结果相比较，才能得出应有的评价。弗·伊·的大脑今后也跟从前一样置于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中心。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的科学意义也就在这里。

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为研究所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实质上与这项研究是密切相关的。为了正确评价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结果，必须进一步了解大脑的各个部位，而且要使用大量材料。研究所在这项工作的过程中研究了30个大脑半球，其中10个半球是属于杰出人物的。研究所根据这些资料得到了具体的结果，获得了一系列数据，能够说明单个的区域和部位的最大量和最小量，也能说明中等量、变数等等。这些结果除了重大的理论意义之外，也应该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即对于认识损伤部位和治疗大脑皮质疾病都有意义。

第二，组织问题是由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想理解其大脑构造的特点引起的，这涉及到大脑的发展的过程。为了全面理解能够说明成年状态的机体的复杂形态关系，必须了解个体（个体发育）和种类（种系发育）的这些相互关系的发展过程。对于研究像大脑皮质这样复杂机体中的形态关系的结构学来说，这种状况自然获得了特别重大的意义。惟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完全理解纯描述性的方法为我们提供的那些资料。研究所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些工

作，确定了神经科学中一系列新的事实和规律。例如，研究所的研究确定了虽然大脑皮质分成层次，并且在出生时总体上已经定型，但是单个层次的细胞分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只是在胚胎后期阶段才发生。可以理解，这种状况对于弄清解剖发展与功能发展之间相互关系能够开辟如何广阔的前景：不仅可以把解剖发展与难以观察到的功能发展在胚胎阶段进行比较，而且在出生以后也能很容易地观察功能的发展。

研究所在研究大脑皮质的种类发展或种系发育方面的工作也具有不小的意义，研究所研究了哺乳动物各种不同的代表，特别是灵长目的皮质的一系列部位。这里的研究结果也有很大意义，展示了结构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复杂化的进程。

因此，近年来研究所转向大脑皮质带电现象的研究。活组织的带电现象问题是当代生理学最迫切的问题之一。研究所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特点是：把对生物电的研究与结构关系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所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著作以及在神经病学家和精神学家乌克兰代表大会（哈尔科夫，1934年）和国际生理学大会（列宁格勒，1935年）上所做的报告，引起很大兴趣，特别是因为它们除了有重大理论意义之外也有很大的实践意义，对于认识大脑皮质形态特点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大脑皮质生物电现象的研究这一基本任务出发，研究所目前提出了大脑生物化学的研究课题，而且研究不是一般的大脑生物化学（虽然这个科学领域与有机体其他器官的生物化学相比落后了许多），而是与大脑形态特点密切相联的大脑生物化学。

这样一来，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就给我们的研究所提出一系列当代神经病学的问题，这首先要求积累特别丰富的解剖学资料，这是解决这些问题所必不可少的。现在，研究所掌握大量系统制作的成人脑标本（每个大脑10000个切片，切片的厚度为20

微米)，其中包括苏联一系列杰出的政治家、艺术家和科学家（明仁斯基、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古比雪夫、蔡特金、片山潜、波克罗夫斯基、波格丹诺夫、巴比塞、安德列·别雷^①、巴格里茨基^②、马雅可夫斯基、索比诺夫、作曲家伊波利托夫-伊万诺夫、苏克和斯片季阿罗夫^③、古列维奇院士^④、巴甫洛夫院士、米丘林、齐奥尔科夫斯基等）。同时，研究所还搜集了每位活动家性格和生平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具有一般的巨大价值，而且对于解决研究所所提出的任务也具有价值。研究所还掌握有丰富的胚胎学资料——130个作了系统加工的各种年龄的大脑。

研究所开始时是个不大的实验室，现已发展成大型的科研机构，拥有一切条件在神经学非常专门的和最新的领域里进行最复杂的研究，拥有高水平的专家和异常丰富的设备和材料。研究所的作用得到苏联神经学家以及西方一系列杰出的神经学家的高度评价，他们访问了研究所并且实地了解它的潜力和成就。

大脑研究所代所长 （C. 萨尔基索夫）

① 别雷，安·（1880～1934）——苏联俄罗斯作家，象征派主要作家之一。

② 巴格里茨基（1895～1934）——苏联俄罗斯诗人。

③ 斯片季阿罗夫，亚·阿·（1871～1828）——苏联作曲家、指挥家，亚美尼亚人民艺术家（1926）。

④ 古列维奇，弗·谢·（1867～1933）——苏联生物化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

绝密

草案

政治局决定

1. 听取了大脑研究所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完成情况的报告，决定成立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研究工作评估委员会，其成员为阿勃里科索夫教授、克罗利院士、萨尔基索夫教授、奥尔别利院士和沃罗比约夫院士。

2. 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脑研究所设专门的场地和安装相应的设备用以保存与研究弗·伊·列宁大脑有关的切片、标本和一切文字与图片资料，建议大脑研究所将与研究列宁大脑有关的标本、文字和图片资料复制四份，保存于（1）联共（布）中央，（2）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和（4）大脑研究所。

3. 委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大脑研究所设专门场地和安装相应的设备以保存苏联已故杰出活动家（明仁斯基、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古比雪夫、克拉拉·蔡特金、马雅可夫斯基、索比诺夫、米丘林、齐奥尔科夫斯基、昂利·巴比塞、伊·彼·巴甫洛夫院士等人）存在研究所里的大脑标本、图片和科研资料。

№06258

**彼特罗夫斯基就列宁大脑研究工作状况给
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9年10月20日)

绝密
特别卷宗
份数编号：№1

致苏共中央

1969年10月20日

№2501C

苏联卫生部委托苏联医学科学院主席团审查苏联医学科学院大脑研究所对弗·伊·列宁大脑研究的结果。

苏联卫生部审查了苏联医学科学院主席团批准的以有权威的专家委员会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为基础的材料，得出如下结论：由С.М. 勃林科夫教授、Е.П. 科诺诺娃教授、Г.И. 波利亚科夫教授、Н.С. 波波夫医学候补博士、Н.С. 普列奥勃拉仁斯卡娅教授、А. 萨尔基索夫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И.А. 斯坦凯维奇医学博士、И.Н. 菲利莫诺夫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А.С. 切尔内绍夫教授组成的研究集体多年来做了大量繁重的工作。这项工作成了我国研究中枢神经系统中细胞结构学方向的基础。

查清了弗·伊·列宁大脑构造的细胞结构的一定特点，证明了它的高级组织和有根据地指出了弗·伊·列宁在第一次发病以后中枢神

经系统的高度代偿能力。

苏联医学科学院主席团在1968年2月28日的会议上批准了专家委员会的建议，根据这项建议，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细胞结构研究成果形成为专著。

苏联卫生部认为尽管对弗·伊·列宁大脑的细胞结构研究成果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但是不宜发表，^①因为目前还不具备做出最后结论的可能性，不可能把研究所获得的资料与关于人的大脑构造的可变性的说明种群总体特征的统计学上可靠的资料相比较。应该把杰出人物的大脑构造特点与之进行比较。此外，大脑结构与其活动水平的许多解剖生理学上的平行关系还是有争论的。

苏联医学科学院主席团还建议苏联医学科学院大脑研究所描述研究弗·伊·列宁大脑平行研究26个大脑标本的成果时把它与对一系列杰出的文化科学活动家的大脑细胞结构研究相比较。

特别是必须完成对以前用细胞结构方法进行的对伊·波·巴甫洛夫、弗·弗·马雅可夫斯基、阿·马·高尔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和伊·弗·米丘林的大脑半球的研究的分析和文字加工。

要求编写一部专著，除了描绘每个大脑的个体特点之外，还应该把天才人物的大脑的特点与其他一些人已经被研究清楚的某些质与量的指标相比较。这样的专著可以公开发表。

苏联医学科学院建议研究所增加参加对杰出人物大脑的细胞结构研究的青年专家的数量。

苏联卫生部还提出了保存弗·伊·列宁大脑标本的问题。据苏联医学科学院大脑研究所的通报，大脑的标本在一定的温度和湿度的

^① “不宜发表”一句加了着重号，一旁有米·苏斯洛夫、阿·基里连科和尼·波德戈尔内的签名。

条件下几十年来一直保存良好。防火安全由于房子相应的装备而基本上得到保证，有专门的楼板、混凝土墙壁和天棚、专用电线、铁门和铁窗框，以及灭火器数量的增加。

决定今后为了保存弗·伊·列宁大脑的标本，在列宁陵墓管理处所属新的实验大楼里建造专用房。

苏联卫生部批准在列宁墓陵墓所属新的实验大楼里设计 100 平方米的用房，专门用于长期保存弗·伊·列宁大脑的标本（一个房间是标本保存室，面积为 50 平方米，两个房间用于定期检查资料和标本，总面积为 50 平方米）。

苏联卫生部认为研究弗·伊·列宁大脑的细胞结构的科学劳动随着关于人的大脑的细胞结构的科学的发展，要求进一步采用现代化的研究方法。

苏联卫生部部长 Б. 彼特罗夫斯基

【专题说明】

苏联军方关于舰队作用的争论

(1928年5月)

20年代下半期，苏联舰队得到复兴。这时出现一个问题：国家需要什么样的舰队？要求为未来海军力量的建设奠定稳固的基础，明确规定它在保障国家利益中的作用和在可能爆发的战争中的任务。围绕“控制海上”、“海上小型战争”理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建设舰队的远景计划。1928年5月8日问题被提交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专门会议审议。会议由陆海军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主持。出席会议的有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将领38人。图哈切夫斯基等在会前提文的报告中提出了对舰队作用的看法，认为舰队应具有防御的职能和保障军队行动的辅助作用，而对军队的拨款应主要用于发展陆军和空军的技术。1928年5月两名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图哈切夫斯基和彼得罗夫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决定是争论的总结，它在革命后第一次明确规定了舰队的任务：在沿海地带协助陆军；守卫海岸和沿海政治经济中心；在敌方的海上交通线上活动；在海上独立活动。基本舰只应当是重型炮舰，以此为出发点，为平衡海军舰队的配置，决定建设轻型的海面和海下舰只、海上

苏联军方关于舰队作用的争论

飞机、海岸和水雷阵地防御。下面发表的会议记录反映了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校注，
夏风翻译)

№06285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与莫斯科军区、乌克兰 军区、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及波罗的海、 黑海海军司令联席会议速记记录

(1928年5月8日)

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现在会议开始。在今天的议事日程中,实际上只有一个问题:“关于在苏联武装力量系统内海军的任务、意义及作用”。这个问题是由工农红军参谋部提出来的。参谋部认为,共和国为海军武装力量花费了巨额资金,为了更有计划地和更合理地分配国家给武装力量下拨的经费,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在最近的将来要解决我们舰队的现代化问题。

因此我们要讨论的,首先是关于海军在武装力量体系中的总的地位问题,然后再解决我们怎样处理我们那些陈旧落后失去战斗力的战舰:是进行修理吗,如果修理,那怎样修理?如果要使之现代化,那怎样现代化?现代化的目的,也许只是使之成为浮在水面上的炮垒。摆在这里的问题,大体上就是这样。

我们这里有三位报告人:彼得罗夫^①、伊格纳季耶夫^②和弗拉

① 彼得罗夫,米·亚·(1885~1938)——原沙俄海军将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后1920~1921年领导共和国海军参谋部作战管理部。1921~1923年任工农红军海军科学院院长。后任海军技术教研室教授等职。1927年起任工农红军海军管理局教学队列部部长。1930年10月被捕,遭镇压。

② 伊格纳季耶夫,尼·伊·(1880~?)——原沙俄海军将领。1926年起任工农红军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1930年10月被捕,死于狱中。

西耶夫^①。是否可以请海军同志把报告合并一下，只出两个报告人？……

布琼尼：我认为，应该三个报告人的报告都听一下，报告的时间可以限制在半个小时之内。

主席：首先请图哈切夫斯基同志发言。

图哈切夫斯基：关于作用问题，或者不如说，可以拨给舰队的资金问题，最近4~5年不断提出。每年都提出这个问题，它使双方都神经紧张：给舰队大量拨款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如克利缅特·叶弗列莫维奇所说，如今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战列舰的现代化问题以及我们提出的申请。李可夫^②同志曾经指示我们，在制定我们的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我们不能对所有的技术部门平均对待。我们需要找出一种我们的国家能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全部财力倾注其上的关键性的基本技术。显然，海军问题无疑是备战这一总的问题中的组成部分之一。按照已拟定的纲领，我们要给海军6.11亿卢布；需要说明，在五年计划里这个数字无疑是偏低的。实际花费要多的多。过去的实践说明，需要不下于8亿，也许还要多。在我们的预算中海军占如此之大的份额，该重新审查纲领了。

到目前为止，海军并不是按照军事计划所要求的某一明确的纲领发展的。海军的纲领，不客气地说，是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各种借口下硬塞进来的。起初的借口是，舰艇只能服役10年，10年后金属就会疲劳，而这就是说（彼得罗夫同志会雄辩地证明这一点），经过一段时间舰艇必须退役。温什利赫特同志的委员会研究了这个问题并拟定了一个庞大的造船纲领。当时出得一个结论，战列舰将

① 弗拉西耶夫，尼·约·（1878~1937）——海军工程师。1926年起任工农红军海军管理局技术管理局局长。1930年退役。

② 李可夫，阿·伊·（1881~1938）——时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领导政府特别委员会审议1924~1926年拟定的各种不同的舰只建设方案。

一艘接一艘地退役，需要提出制造新的战列舰的问题。而现在海军管理局对问题有另一种提法，说金属不仅不会疲劳，而且相反，只是需要为每一艘舰船再划拨一大笔钱，例如，为“伏龙芝”号再耗费1800万卢布，这样一来，它们就将成为第一流的舰艇了，能够击沉英国的超级无畏舰。尽管普遍的看法是，“库英·梅利”可以在10分钟之内击沉我们的任何一艘无畏舰。我们的海军是从沙皇舰队那里继承来的一份丰厚的遗产。但是，在我们的条件下，按照我们的财力，此遗产是同我们的军事计划不适应的。恢复海军和发展现存的大海军纲领不是发展军事计划，而是，我要说，为了发扬我们海军工作人员的海上爱国主义精神。我说这是这些工作人员的巨大荣誉感和毅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军纲领的扩大符合我们的计划。

我们处于同日本和英国直接对峙的状态。然而，甚至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者，也不可能用海上的军事行动来破坏我们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完整。我们也没有受敌方海军威胁的内部交通线。诚然，登陆会给我们构成威胁。然而，无论如何，威胁我们后方的不是海上行动，而那些登陆后的地面活动。

所以，如果从国防任务的观点看待这一问题，那么应该说，海军在我们完成军事行动的时候只能起到纯辅助的作用。陆军和空军才是我国国防所依靠的基本台柱。我们在这里集中的资金越多，国防事业就会得到越大的好处。正如在所有的事情中一样，在军队的战略指导下，总是希望守住所有的战线，各个方面都得到加强，但是不得不以某些地段进行冒险，以便在主要战线达到所需要的目的。但是在武装力量的组织中也必须贯彻连贯性原则。可以在不同兵种间平均分配资金，但是海军这一兵种无法投入在现时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任何战线去……

毫无疑问，在战争的进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局势。毫无疑

问，当战争和西欧的革命运动对我们来说在成功地发展时，可以设想会出现卓有成效地使用海军的这样一种局面，然而目前这一点还很难说。与此同时，我们的资金很有限，不够进行像武装力量这样的基础建设，而武装力量不够强大，就无法完成我们的军事计划所提出的任务。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彼得罗夫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写得认真扎实。报告说明，彼得罗夫同志是位卓越的战略家。彼得罗夫同志在评价我们海军的潜力时得出结论说，只有在没有任何帝国主义分子进攻的情况下，我们的行动才能取得成功。如果帝国主义者不来进犯，我们是非常强大的。大致说来，在波罗的海我们的敌人有 10 艘驱逐舰、1 艘巡洋舰和 8 艘潜水艇，这些舰只还没有全到位，一部分还只是订货，一部分正在投入，在这些数字中 10 艘驱逐舰和 1 艘巡洋舰已经过时。我们有 3 艘战列舰，又提出了建造 4 艘军舰的问题；有一些陈旧但毕竟是巡洋舰和大量的驱逐舰，这自然完全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在同英国作战的情况下，我们的主力波罗的海舰队的活动将是有限的。需要指出的是，遇到英国舰队，我们的舰队将被封锁在狭窄的海湾中而不能发挥大的作用。当然，它在抗击英国力量中，还是有用处的，然而这种用处同国家为发展和维持这支舰队所作出的努力是不相称的。我记得，三年前好像托沙科夫^①同志在波罗的海舰队演习时说过，战列舰队是一支能够同英国的无畏舰作战的强大力量，而现在的情况却是，如果我们的舰艇不实现现代化的话，我们的舰队只要 10 分钟就会被消灭。而两年后，现代化了的舰艇如果不采取新的措施，仍然会在 10 分钟之

^① 托沙科夫，阿·亚·（1887～？）——1925年起任工农红军参谋部作战部部长。1926～1927年任海军管理局教学队列部部长，后任波罗的海海军参谋长。1930年被捕，死于狱中。

内被歼灭。当时，我曾在劳动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说过：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而且恩格斯也是这样看的，而罗穆阿尔达·阿达莫维奇^①对此表示怀疑。我从《反杜林论》中援引一小段话读一下（读）。根据恩格斯的观点，战列舰对海洋国家来说是基本武装力量，正如陆军、炮兵和航空兵等等对我们一样。然而对于内陆国家来说，战列舰就不是必须的，在战列舰上花费巨额资金是多余的，同其能力和面对的任务不相称。^②顺便说说，不久前德国军事部长格列涅尔在国会发言时说，威廉^③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他把大量的资金用于海军，而不是用于陆军。如果他把用于海军的20亿马克用于陆军和空军的话，那就会有全然不同的结果。在我们这里也是同样的情况。

主要的问题就在于，如何分配现有的资金。这里需要坦率地说，我们不能用战列舰去同帝国主义大国斗争。战列舰会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使我们不能为此花费巨额的资金。投放给海军的资金应只限于保障我们同“边境国”^④的斗争。这个任务还没有大到需要投放这么大量资金的地步。

我们现在的国防任务，应该综合解决。这些任务可以通过下列手段解决：1) 用机动海岸炮，因为对敌人各种各样的可能进攻行动，我们还没有找到固定不变的炮兵武器。2) 相应地部署步兵后备部队和总司令部预备队，它们可以保护侧翼，并且可以粉碎实施的登陆行动。3) 使用轰炸机，这对于现代舰队来说是巨大的威胁。

① 穆克列维奇，罗穆阿尔达·阿达莫维奇（1890～1938）——1926～1931年任工农红军海军首长，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② 恩格斯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515～517页。

③ 威廉二世（1859～1941）——1888～1918年为德国皇帝。

④ “边境国”特指同苏联交界的欧洲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等国。

最后，4) 利用海军本身，使其发展成海岸防御整体的一部分。在我们给海军以如此之大的费用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构建这样的整体。飞机的发展微不足道。海岸防御的发展非常不够。^① 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同工业、同生产能力、同生产周期等等协调才成。无论如何，这样的安排是完全正确的路线。如果将海军建设的费用限定在 2.7 亿卢布之内，我们就可以拨出一笔钱去发展强大的海军航空兵——300 架重型轰炸机，105 架歼击机和 245 架侦察机——超出我们现有的计划。哪个强一些——是我们的三艘无畏舰，还是为我们能拥有的海岸炮兵配备三架轰炸机？至于高射炮等等就不必说了。毫无疑问，这个综合防御体要强得多，能够对我们的国防有更大的保障，并且将这些费用用于飞机、机动炮不会是大亏本的事。它们可以集中于决定性的战场，参与同陆军的战斗。这种方案甚至也会给国防事业带来极大的好处，保证能把基本力量用于主要的方面。这个问题是纯原则性的问题。需要做出最后的决策：我们是否需要战列舰——这种舰只对于同边境国斗争是太强了，而对于同帝国主义国家作战又太弱了，或者是较为清醒和实际地处理问题，把主要的力量集中用于有决定意义的技术上。

彼得罗夫：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讲得完全正确，舰队的问题已经持续很久了，而且不止五年，它已持续了 100 多年。

舰队问题有好几次几乎平息了，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它又被提了出来。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1834 年这个问题被再次提出来，然后重又沉寂。在日俄战争之前，实施了一个十分庞大的造船纲领。经过短短的沉寂，在世界大战之前，俄国的造船纲领重又获

^① 1928 年在波罗的海总共有 3 架鱼雷飞机、21 架侦察机、4 架战斗机和 3 架舰用飞机，在海岸防御方面有 75—305 口径的大炮 91 台、高射炮 22 台；在黑海有 29 架侦察机、17 架战斗机、2 架舰用飞机，120—305 口径海岸炮 76 台，高射炮 24 台。

得了庞大的规模以及某种稳定。

我作这个报告不是为了要使我们的具体纲领因此取得一定的规模，我只是想讲一下俄国所曾经拥有的那些巨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目前，在苏联，客观上也继续存在。

我们有可能建立海军，这是一定的，因为我们建立了强大的技术，努力发展国家的经济，而经济的发展要求有通向世界贸易的出口等等。因此请不要这样绝望地看待我国未来舰队的前景。

确定舰队的任务时以什么为出发点？当然，基本方针还是根据当前的军事计划，帮助确定军事计划的那些设想。我们不能不考虑的另一种方针是，国际形势可能会发生变化，国际局势不是稳定不变的，所以修造舰只应当超前几年才行。此外，我们不应忽略舰队作为实际支持苏联海洋政策的因素的意义。除此之外，我们不应该忽略舰队可能发挥的支持世界革命基地的特殊任务的作用。

自然，主要的任务是由陆军去完成的。当然，海军所担负的任务是辅助性的。主要的舞台是陆地，海洋是次要的舞台。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分歧的。

但是，在对可能来自海上的威胁的评价上，对舰队在未来战争的总的局势中的作用和意义的评价上，是存在分歧的。

因此，很少根据军事行动来考虑，对政治因素的意义估计不足。

请允许我为此援引有关的历史资料。克里木战争是在陆地上进行的，但海面具有很大的作用。在1877~1878年战争中忽视了海面，这种忽视对战役的发展起了惨痛的作用：当军队逼近君士坦丁堡和波斯普鲁斯海峡时，不得不承认无法防御英国舰队的进攻。这明显地说明了舰队的作用。

也许司令部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于陆军是对的，但对海上重视不够则是错误的。

诚然，直到1917年以前的世界大战中，在波罗的海和黑海上，我们的舰队在海岸防御上没有遭遇大的战役。但是不能不引起注意的是，这时候敌方没有机动的后备力量，而到1917年7月出现了这种机动的力量，我们就遇到了蒙海峡登陆战役^①。

对于世界大战的经验，我们应当慎重对待。德国人当时没有后备力量，而我们未来的敌人会有后备的。

在西方也同样如此。战争是从陆地战场开始的。海上未曾出现大战。但是，随着英国部队的结集和美国部队有了保障，海上战线立即显露出来了。众所周知，来自萨洛尼卡方面的一系列战役引发对海上战线作用的重新估价，由此产生了达达尼尔战役^②。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只把海洋看做是使用技术手段的场所，而不是战略方向。如果假设帝国主义将从海上进攻，我们能够忽视海上战线的意义吗？我现在不提用海军还是陆军进行防御，但海上战线是存在的，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谈到认为海上战场对我们只有次要的意义的观点，请允许我说明，保障这些次要战线对于展开我们的力量具有重要意义，不能认为它们是无所谓的。

当然，我们现在的政策和追求已和过去不同，然而地理背景依然如故。

在我们现代观念中，每一个海洋的问题都是个巨大的政治问题。我们还应当承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这些海上问题都有巨大的意义。

现在敖德萨空着，列宁格勒空着。但谁也不认为，以后也将会

^① 蒙海峡战役是德国舰队于1917年9月26日至10月6日实施的。

^② 达达尼尔战役是1915年2月19日至1916年1月9日由协约国的武装力量实施的。

是这样。随着海上贸易的复兴，关于海岸问题我们会有另一种提法。

怎么能认为黑海海岸没有意义呢？怎么可以把它看做一块可以让敌人自由活动的地区，让他们有可能在这里巩固下来呢？

如果将波罗的海问题同它的历史背景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在英国的参加下所进行的持续400年的斗争，并且看一看最近时期的斗争，那么我们完全有权将目前波罗的海的状况同其历史背景联结在一起考察：在彼得时期，英国人就曾三次将其舰队开进这里，支持瑞典，以阻止俄国出海。在拿破仑战争和克里木战争中，英国在波罗的海的政策实际上同样如此。起初大叫俄国的威胁，然后又叫嚷德国的威胁。巩固英国在波罗的海的影响对它来说是始终不渝的任务。

海军的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为一个战略手段的问题。海上战线也不能归结为“使用这种那种技术的舞台”这样一种概念，因为这是与历史相矛盾的，不能这样看。

我们看待海战问题时遇到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敌方的力量占有优势。但是力量对比不能简单地对比各自舰艇的总数来衡量，这我在上次报告中已经说过。不能用我们的舰艇数字与英国的整个海军相比，而不考虑英国海军的其他任务、它的后方。

从世界大战的经验中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后方任务压在英国海军身上。地图上标出了英国海军力量展开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出后方对英国军事战略上的压力（地图显示英国海军的结集点，英国政治冲突的中心）。

我认为，对于英国来说，同我们的战争是战列舰的战争，这就会打破它海军力量世界布局的平衡，把针对我们的海上的开发问题变成战争问题。

英国对自己的后方状况是非常敏感的。谁了解世界大战的历

史，尤其知道巡洋舰战役的话，他就会清楚，英国人感到忧虑的不只是德国人突破了法国的防线，巴黎的命运岌岌可危，它所认为的最痛苦的时刻，莫过于德国巡洋舰收紧这些线路（指地图）。

我重复一遍，对后方的压力起过巨大的作用，这种压力一直继续到今天。

我们并不打算与英国海军进行一场总决战。我们是以“小型战争”的原则作为设想的基础的。这个总决战不是我们战略的主体，也不是我们议论的基础。

对于我们所处的时期，在未来的10年，我们必须从与过去全然不同的角度提出我们的海上问题：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整体问题来谈论整个黑海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的发展。

在世界大战之前，我们通向黑海的出口（巴黎协定，伦敦公约）形式上和实际上是关闭的。这里有个围墙，非常坚固，以至于在俄日战争期间，我们的黑海舰队没能参战。

现在有两个新的战略要素：

第一个，自由通过海峡的权利（有人喊：“在理论上”）。请允许我报告，我们实际上拥有这一权利。毫无疑问，今年我们的船舰可以通过……我可以较为详细地说明海峡问题。

1871年以前的情况是完全禁止军舰通过。现在的情况是可以自由通过海峡，每一个国家都有权把舰只开往黑海，只要其舰只的排水量不超过任何一个黑海国家舰只的排水量。因此，从理论上讲，我们享有这种权利。实际问题在于，在总的政治局势中我们发现了对我们有利的因素，首先是英国帝国主义关于同我们打仗的全部设想导致黑海上的敌对力量的加剧，而这些设想造成军舰自由驶往那里的政策。我们的军舰每次开往那里都可以看做是有利于继续扩大通过黑海海峡的一个先例。

主席：如果我们不是一两艘而是五艘战列舰开往那里，这样我

们赢得了什么呢？英国目前还没有舰艇驶向那里，我们暂时也没有。而如果我们那样做了，那么，它们的舰只也会出现，并且优势在他们那里。

彼得罗夫：战时我们谁都不会去的，我们只需在和平时期进入。我们在直布罗陀海峡会遇到困难这种假设是不对的。如果创造外国船只在直布罗陀海峡停留的先例，那会遇到什么问题呢？丹吉问题^①，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的政策全都立足于这一先例。我们有在战争时期格本和布列斯劳突破波斯普鲁斯海峡的经验^②。它们几乎都是在英国护航舰队下通过的，没有受到阻拦。

另一种情况是伏尔加河—顿河运河。它使我们在战时可以将兵力从一个海域运到另一个海域。在创建轻武装力量之后，我们在可以把兵力从一个海域转运到另一个海域的情况下协同作战。

现在谈谈一个直接的问题：我们打算怎样使用舰队，根据军事计划，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军队有其主要任务，而我们的任务是不是为波罗的海舰队从海上保障其北翼？我们根本不想争取大的地位，我服从来自军队的指示。

舰队的典型的任务是保卫海岸、抵抗敌人、巡航作战，等等……我们需要设置水雷障碍、潜水艇、海岸防御，需要开展有力的侦察活动等等。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后备指挥队，需要战斗的核心，它在部队的作战中能灵活应变，能够进行机动作战。

① 丹吉问题指在直布罗陀海峡占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摩洛哥城市丹吉的地位问题。1923年12月18日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签署了为期12年的协定，宣布丹吉为非武装的中立地带，实际上归国际监管委员会管理。

② 1914年德国战斗巡洋舰“格本”和轻巡洋舰“布列斯劳”停靠在地中海。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海军舰突破达达尼尔海峡，1914年8月16日实际上卖给了土耳其。

我们需要这个战斗核心是为了解决总体任务，因为这样才能创造随机应变的机会。这个基本核心就是战列舰，它是小型战争中的战役保障。

这里谈到了轻快艇队。它把我们引向何处？不是建立战斗核心，而是进行局部的小型战役。

我现在转向最后一个问题，即我们在波罗的海展开的可能性问题。这里指出，（指地图）可以怎样利用波罗的海舰队……

如果军队进攻，我们就敷设水雷，在水下布置潜水艇，以支持战列舰的整个防御体系。

我们在黑海看到的另一幅景象，这里的威胁具有另外一种性质，我们的危险是对乌克兰、克里木、高加索、亚速海的库班的打击。应当认为，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受到威胁的。保卫海岸的任务是最重要的任务……

有人谈到空军。然而，空军只有在一种场合下才能完成保卫海岸的任务，即如果它具有相应的力量实施打击，或者它在各种条件下都是具有活力的。我们现在客观上还不具备任何条件单靠空军来解决防御问题。

我们必须和谐地配合使用所有的手段，别的办法是没有的。不能仅仅靠炮来完成任务。空军有重要意义，海岸防御具有重要意义，舰队以及军队的展开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只有协调配合才能进行有效的防御。

【专题说明】

布哈林同斯大林的争论

(1928年7月至1929年4月)

1928年春苏联发生严重的粮食收购危机，为解决燃眉之急，实行了非常措施。这一措施被某些领导人看做是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办法，准备长期实行下去。由此引发了党内争论，出现了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的两大派。他们在是否继续实行非常措施、合作化还是集体化、对待富农以至中农的政策、阶级斗争的发展趋势是逐步缓和还是越来越尖锐等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这期间为争取支持者，布哈林秘密会晤了原“托季联盟”的主要成员加米涅夫，后者事后追记了谈话内容，这就是著名的“加米涅夫笔记”。关于联共上层的斗争，当时已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在其《反对派公报》中作了详细报道，1929年1月托派又以传单的形式在莫斯科公布了加米涅夫笔记。这就成了布哈林同托派“结盟”的证据，也使布哈林的地位急剧恶化。到1929年4月召开中央全会的时候，斯大林已经在领导层内形成压倒的多数，因此会议就成为对布哈林“集团”的单方面的批判，全会决定解除布哈林的《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本专题所收的有关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会晤的材

料、布哈林在两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是全面了解这场争论的重要资料。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夏风、王希礼翻译)

№01642

索柯里尼柯夫就中央全会事致加米涅夫

(1928年7月9日)

莫斯科 1928年7月9日

亲爱列·波·！

我们回到莫斯科直接参加中央全会，已过去几天了。我本以为在这里可以遇到您，而您却还躲在卡卢加。您会很快来这里吗？很需要同您交谈和征求意见——有无可能于近日内来这里。这极端重要。全会看来明天将结束。今天还在就米高扬报告进行讨论，并开始了“厮杀”。如有可能请电话回复（3—49—24）。很快再见。

握您的手。

格·索柯里尼柯夫^①

① 索柯里尼柯夫（布里利安特），格·雅·（1888～1939）——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年9月至1921年3月任土耳其斯坦方面军司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土耳其斯坦事务委员会主席。1921年11月起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2～1926年任俄联邦财政人民委员。1926年起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1928年起任石油辛迪加主席。1929～1930年任苏联驻英国全权代表。1922～1930年为中央委员。1936年被开除党，死后恢复名誉。

№05904

布哈林在 1928 年联共（布） 七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28 年 7 月 10 日）

同志们，我想在发言中不仅要谈同粮食收购直接有关的问题，还想谈谈我们经济政策的某些总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在谈论有关粮食收购问题时，实质上是对我们在崭新的一个时期的工作进行某种总结，尽管也许不很自觉。大家早已知道，我们生活在改造时期，而粮食收购问题实质上是个我们是否能够很好地解决改造时期的任务的问题。

总结我们自恢复时期结束以来的工作，也就是说采取改造时期的最初步骤的工作（我要在括号内指出，我知道这些界限的相对性），我们可以指出苏维埃国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是在各个不同的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技术改造领域尽管有失算和错误，但毫无疑问仍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毫无疑问，从生产力增长和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发展角度看，我们可以看到毫无疑问的巨大成就。毫无疑问，从农业的社会主义基地的角度看，我们已进入公有和集体经济在我国农业中极为迅速发展的阶段（对这一阶段决不能估计不足）。最后，同样无可怀疑的是，在培养干部上，我们面对世界历史同样有可为自己辩护之词。但是，同志们，在取得这一切的同时（而我认为，这也正是局势的特点），在毫无疑问的前进和取得巨大成就时（这些成就我们可以记入史册），改造时期的经验，准确点说，是我们已经历过的那段改造时期的经验揭示了口张得大大

的漏洞、陷坑，它们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总的经济政策问题。在我们进入改造时期的时候，党在自己的决议，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这样的口号（党强调了这一点）：“有后备的经济”。你们只要看看我们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决议，你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都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有后备的情况下经营，这包括外汇、商品粮和黄金的后备。我们没有执行这一基本指令。

插话：对。

布哈林：我们决不能低估这一点，尤其是因为我们面临着在对外关系上发生大麻烦的极大可能性。同志们，这个问题我认为无须通俗地讲解。只要举几个我们的债务数字和我们黄金储备减少的数字，加上同西欧国家，首先是德国的黄金储备的大量的急速增长相比较，就足以对这条战线上的状况作出总的估计。由于没有执行关于后备的指令而发生的困难，削减粮食出口，我们都知道并且都负有责任的我们基本建设上的失败，反革命力量在这一基础上结集起来反对我们，粮食收购工作上的巨大失败，这是这次全会上要讨论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中的政治核心——所有这一切向我们提出了涉及我们的经济政策的一些总的问题。我想坦诚地为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巨大的摇摆和这种规模的困难是否来自改造时期的本质本身，来自其本性，这些困难是不是我们在改造时期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是不是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克服的事物本身发展进程所必然产生的？我个人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些困难根本不是改造时期的一般条件直接产生的。如果我们想赶上西欧（我们是想赶上），如果我们想加快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速度（我们是想加快），如果我们注意到我们经济的普遍落后性、我们的贫困，那就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建设中的巨大困难是由这一切产生的。我们想立即解决一系列巨大的任务：社会主义工业获得最大限度的积累，农业得到最大限度的增产，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拥有最大限度消费额，以及他

们最大限度的振奋，等等。这些任务不可能同时解决。我们在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决这些任务，有时倒向这一边，有时倒向另一边，自相矛盾。我们时时刻刻在矛盾中前进。不言而喻，这种困难确实来自我们改造时期的本性。例如我请你们注意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即我们时而从这一端，时而又从另一端抱怨经济上的比例失调。

伏罗希洛夫：拿出你的灵丹妙药来。

布哈林：我不想提供灵丹妙药，请你别拿我开心。我想说的是，改造时期十分自然地会引起一系列麻烦和困难，不过与此同时对我来说毫无疑问的是，困难同困难不一样；有一种困难按照斯大林同志昨天发言中的说法，一定会威胁到同农民的结合，这种困难并非从改造时期的性质中必然产生的。而我认为，当列宁给我们写政治遗嘱时（他当然清楚地知道，我们总会在什么时候进入改造时期的），他非常准确地指出了我们遇到的、在我们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会出现的那种困难的界线。伊里奇写道：“如果在这两个阶级之间发生严重的阶级分歧，那么分裂将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们的社会制度内并不存在必然发生这种分裂的基础，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密切注视……情况！——尼·布·）并防止这种情况发生。”^①

当我们现在用斯大林同志的说法，说“我们这里出现对结合的威胁”，这是否属于会产生分裂的情况的范畴呢？当然属于。对结合的威胁是可能产生分裂的情况。不过列宁写道，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以及我们全党的主要任务在于不让这些分歧发展到严重的阶级分歧的程度，即分歧发展到可能威胁结合的的程度。而如果我们现在说，存在对结合的某种威胁，那么非常自然，在这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77页。

里阶级分歧开始在量上发展成可能导致分裂的阶级分歧。按照列宁的政治遗嘱，我们党的任务在于密切注视它并予以防止。

如果对事情作另一种估计，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改造时期的本性本身必然导致社会政治动荡，并威胁结合，那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托洛茨基曾经提出过的理论，即在发展进程中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西方无产阶级不给予国家援助，无产阶级专政就会灭亡，因此对下列问题：我们是否进入了巨大麻烦和困难的时期，这些麻烦和困难可能引起一定的动摇，特别是在发生各种各样的失算、错误等等条件下（而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的失算等等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全知的，而我们的错误乃是我們付的附加学费），我的回答是：这种动摇是不能排除的。

伏罗希洛夫：您去学习的时候，同样会犯错误。

布哈林：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不断威胁到结合的困难并不是改造时期的本性客观上必然产生的。

同志们，我还要请你们注意列宁的另一个论点，这一论点好多同志在我们党的最近一些会议上提过，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在第15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人在发言中也谈过，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和管理的本领不够。

伏罗希洛夫：这是对的。

布哈林：不久前一位杰出的德国教授发表了一篇关于苏联的大文章。他就我们布尔什维克写道：“他们是最优秀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卓越的政治战略家，出色的鼓动家，卓越的改造人的教师；但是他们缺乏经济训练，缺乏经济修养。别看经济战线上有一两万布尔什维克埋头工作，弄得疲惫不堪，但他们缺乏足够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训练。”

这种说法离真实情况并不远。所以我认为，如果从这种观点去看我们经济政策的总结，那么现在开展所谓“失算理论”运动，在

策略上和政治上未必是正确的。米高扬同志在上次全会的报告中说：“我认为无论如何可以直截了当地断定，如果我们能在经济领导方面和组织方面及时采取一切措施，那么这些困难的三分之一的原因是有可能消除的。”

米高扬：谈上年度困难的特殊原因，这是正确的。

布哈林：在尚未废除的四月全会决定中说，这些困难的原因是同国家的迅速准备、国家的工业化中的困难有关的，是同计划经济领导的错误等等有关的。这是绝对正确的。

我完全同意问题的下述提法：粮食收购困难向我们尖锐地揭示了两种性质的困难，提出了两种性质的任务。

第一，一般性的困难，这是同总的远景任务相应的，此任务要我们制定一个管若干年的坚定的总方针。

第二，特殊的困难，并且是尖锐的困难，它表现了所谓当前局势的实质，它要求我们给予专门的回答（取消非常措施，等等）。不言而喻，这些问题同阶级斗争问题有直接联系。

但是，我们只要分析一下我国危机的特殊原因就会明白，用一般的原因不能说明我们的经济体制在本年度所遭受的急剧猛烈的震荡。去年我们出口粮食 2.77 亿，并且大家都吃饱了，今年我们不仅一点也没有出口，而且在许多地区存在消费不足的严重迹象。在一年之内富农不可能发展成这样的力量，在一年之内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分化过程，造成我们的整个经济出现如此迅速的危机性震荡。正因为如此，决议提出了特殊原因的问题，它使基于我们的普遍的缺点，基于总的落后性和分散性的可能出现的困难变成现实。这些原因使得富农进攻的可能性变成现实，而富农之所以能领导其他农民阶层，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的、补充的原因。去年，就粮食收购而言，私商支付的价格高于我们的价格，但粮食的平均价格一般高于今年。去年经济作物不必交税，而今年经济作物要交税。去年不像

今年把这么多的额外钱款用于公用事业。现在谷物在粮食市场上处于非常特殊的、非常不利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出售粮食的刺激力大大下降，正因为如此，恰好在今年富农能够领导农村的某些阶层（在粮食的价格问题上）。正因为如此，今年我们在谷物上使我们的经济机体遭受震动。因此，在这里起作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价格问题。贬低这一因素的意义是不对的。说价格一般只起有限的作用，我们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种议论在这里是不完全正确的。一般说来，价格在很大程度上不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也不具有这种决定性意义。是这样，但又不是这样。当然，在我们国家内部，价格或者价值形式是某种虚象，如果愿意这么说的话。这是我们的计算方法，而不是无政府状态经济的体现。这一切全对，但在我们同小农间的相互关系上，当市场关系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我们所有人在这一点上组成统一战线反对奥辛斯基同志，也部分地反对瓦尔加以及其他同志），在这里价格范畴是有决定意义的，在这里价格不能不是生产的调节者。同样不正确的是，认为似乎在根本不存在价格形式的完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可以随意“规定”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如果某一生产部门，例如农业、工业或这些大部类的分支不断地付出大量超过收入的劳动，如果它不能抵偿自身的劳动费用，那么这一生产部门就不得不收缩。在这种社会里不会有任何市场，不会有任何价格。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社会的领导可以随意对待某一生产部门。如果使它“受委屈”，它就不会发展。价值规律在消亡。但按比例劳动消耗规律仍存在。如果这某一生产部门不能从共同的经济机体中获得足够的营养，它就会衰落。要跳出这一规律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姑且撇开关于价格 and 价值的相互关系、关于价格转化成别的什么等等学术争论，有一点还得说一说：如果某一生产部门在后备的分配上“受委屈”，它就必然倒退。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们这里整个力量的分配是按两个渠道进行的：通过价格政策和税收政策。尽管正确的统计是正确的经济政策的前提，但要弄到所需要的数字却非常困难。经济政策的领导依据的是我们统计机关提供的非常奇怪的资料。我收到一些关于谷物价格问题的资料。我从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从中央统计局等处获得某些数字，可以说，它们说的是某疯人院的情况。但愿它们不太准确。这里说的正是价格问题。我采取了非常简单的办法。北高加索是我们粮食情况最好的地区之一。我从下述角度查了一下北高加索的数字：如果我们算一下农民的收入，即算一下农民不仅从1普特小麦，而且从1俄亩小麦所得的钱数，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如果我获得的数字是准确的（我对这些数字的准确性不能承担责任），那就会感到奇怪，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困难为什么以前没有出现。我获得的北高加索的数字如下：

1925~1926年每俄亩小麦的总产量为69.9普特。1926~1927年末为37.9普特。1927~1928年为39.8普特。

宣哗，插话：不可能！

布哈林：是的，是的。

插话：数字是准确的，那里连续三年歉收。

布哈林：我用中央统计局统计资料的另一些数字做了核对。除小小的出入外，数字是相同的。同志们，如果看一看，我们怎么看这一现象，那么我们是这么看的，每俄亩亩产69.9普特时，农民每普特收入115戈比，而亩产37.9普特时价格下降了整整10戈比，成为102戈比。如果我们提出和看一看这些年农民进款是怎样下降的问题，如果把这些数字互乘并扣除种子的开销，其结果便是：1925年农民每俄亩收入72卢布，1926年为32卢布，1927~1928年为24卢布。

插话：亚麻的情况也是这样。

奥辛斯基：美国农场经常如此。

伏罗希洛夫：而你应当知道，你是报告人。

布哈林：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提高某一个区的价格，那么这对其他区也会有影响。因此如果根据一个区的数字，按照一个区来计算价格，那是非常荒唐的。但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毕竟应当分区采取不同的做法。米高扬同志在报告中也说，如果我们要提高价格，我们应该根据各区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做法。我们没有这样做。因此同志们谈到价格问题时所采取的固执态度是绝对正确的。自然，谷物的情况是这样，而国家机关又从一开始就承担了过多的供应任务，我们自然就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现在对采取非常措施不存在什么后悔的问题。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这种措施。我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关闭工厂，或者征收粮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收购，而是征收）。

插话：不对。

布哈林：而依我看，这是对的。那时我们没有任何别的出路，事后诸葛亮不解决任何为题。如果我们早一点，早几个月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是可以采取别的解决办法的。但是第15次代表大会后我们错过了采取别的办法的时机，这样我们就没有别的出路了。

插话：对。

布哈林：要理直气壮地谈这一点，无须作任何修正。总之，我觉得，把我们争论的中心移到这一领域来是无济于事的。现在问题的中心不在这里，不在我们的过去，而在我们的目前。这里我们要问一问自己，全会现在应抓的政治环节是什么？在政治意义上就是取消非常措施。因此完全可以理解，当人们来这里并提出政治局所提的那种决议时，他们首先就要论证取消非常措施的理由。我们现在说取消非常措施，但它在历史上是正确的，我们过去采取这种措施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必须取消这种非常措施，因为它已经超龄

了，因为它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它在经济上几乎已不再为我们提供任何东西，它在经济上如果还会带来什么后果的话，这后果就是加强一种倾向，一种引向军事共产主义的倾向（改行配给制，日用品消失，以及一系列不由自主地发展起来的现象）。另一方面，它在政治上又造成一种极端尖锐的、巨大的，然而很遗憾，却是否定的后果，使我们同更为广大的农民发生争吵。我绝对同意认为应尖锐地提出粮食价格问题的主张。这一问题首先是我们同中农的关系问题。列宁写他的关于必须爱护我们同中农的联盟的遗嘱时没有提及富农，事情很清楚，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他“没有看到”富农的危险，而是因为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农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胜利地同富农斗争的问题。而我们现在说，我们需要分析阶级、阶级关系，当然，我们首先应提出的问题是，在这段期间无产阶级政权同中农之间出了什么事。在这里我要为受到这里某些同志攻击的那些信件恢复名誉。

柯秀尔：不能仅仅依据信件来判断局势。

布哈林：这当然对，但是贬低这些信件的意义是很不恰当的。我们拿任何一个“领导工作人员”来说，他很少到地方去，而这样的人占绝大多数。不通过这些在群众的低层活动的工人通讯员、农村通讯员以及军事通讯员递交给我们的信息，我们怎么能了解局势呢？如果我们对来自群众深处的声音充耳不闻，我们就是犯了官僚主义的毛病。这样，我们被工作累得要死，却看不见活人，只彼此看到我们这样一些人，并且还不是经常看到。我们的身子严重脱离群众，为了不再脱离群众，我们需要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渠道，使在群众深处的情况传入我们耳中。

全国各地来的同志们极少谈事实。需要列举事实。

瓦雷基斯：我们了解事实。

布哈林：你只知道鼻子底下的事，但不知道全国各地的情况。

波斯蒂舍夫：他们给我们写关于情绪的报道。

布哈林：我们必须依据事实来回答那里发生什么事的问题。毫无疑问，在我们面前的是群众性的不满浪潮。在全国一些地方，在乌克兰，在北高加索等地约有150起事端。

伏罗希洛夫：在世界的六分之一的土地上。

布哈林：我们知道有一系列，几十起各种各样的恐怖行为。埃赫同志就说过，他认为局势的改善就表现在减少对我们的同志开枪。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发生了暴乱或者暴动，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市场有虐杀者，在卡巴尔达及其他许多地方发生了起义。

斯克雷普尼克^①：这一切去年也有，只是现在更尖锐了。

布哈林：去年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去年没有出现过在乌克兰中央全会上所说过的那种情况。请允许我援引某些发言的片段。例如巴达耶夫说：“我们在农民中间出现巨大的政治麻烦……我们不得不面对农村反对我们的统一战线。这对我们来说可不是闹着玩的。应当考虑这一点。如果我们在造成所有这些困难之后不得不爬上阁楼躲起来，那么我们会被从阁楼上推下来的。”难道去年有一个同志讲过诸如此类的东西？萨波夫同志说：“在我们区发生了近50起群众性行动，农民在城里举行游行示威。我们根据各地最准确、最客观和经过多方核对的文件得出结论，各地的领导都掌握在富农手里。”去年发生过农民在城里游行示威的事吗？

插话：5月1日。

布哈林：切尔尼亚夫斯基同志说：“我们出现这样的情况，贫农在城里举行游行示威时不是走向苏维埃政权的代表，而是走向工

^① 斯克雷普尼克，尼·阿·（1872～1933）——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乌克兰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人——企业中支援自己的人。”还是这位切尔尼亚夫斯基同志：“我们这里出现老革命游击队员的发动，他们找到苏维埃政权、军事委员会，声称：‘怎么样，给不给我们粮食？我们争得了苏维埃政权，我们也可以抛弃它。’”同志们，这不是惟一的事实。在奥德萨区这是群众性的现象。

卡冈诺维奇：会上还有别的说法。还应当引用另一些人的发言。

布哈林：那里是有另一些发言，但是我认为这是对形势的正确估计。不过，如果在一个加入我党的一个兄弟党的中央委员会上有此类说法，那么这总是说明一些什么的。

斯捷茨基^①：而总书记卡冈诺维奇同志来到这里，关于此事只字未提。

卡冈诺维奇：给我两小时，像给布哈林同志那样，我就告诉你们一切，并援引每个人的发言。

柯秀尔：列宁格勒的斯捷茨基比所有的人都看得远。

布哈林：我说的是，反正不能说去年有过此类说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来没有要求闭口不谈事实。需要先了解事实，需要查明每一个诸如此类的事实。

伏罗希洛夫：谁否认这一点了，你要说服谁？

布哈林：我不知道谁否认这一点，但我知道，我自己是昨天才听说的。

伏罗希洛夫：而我是一个半月以前从你那里听说的。你告诉过我。

^① 斯捷茨基，A.И.（1896～1938）——1915年入党。1926～1929年任联共（布）西北局委员、列宁格勒省委部长。1930～1938年任联共中央部长、1934年期兼任《布尔什维克》主编。

布哈林：我告诉过你我所知道的一部分。为了解此事，我专门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去呆了两天。

伏罗希洛夫：此事我已从我的工作中知道了。

柯秀尔：你们因什么把他送进国家政治保卫局？（笑声。）

明仁斯基^①：因张皇失措行为。（笑声。）

布哈林：这样，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我们的目前形势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估计我们的面前形势，即我们面前已响了两次铃，第三次铃马上就要响了……

柯秀尔：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第三次铃。

插话：铁路已废除第三次铃。

布哈林：我觉得这样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但是否可以说，我们这里存在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结合的现实威胁？可以这么说，我们应当以确定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

莫洛托夫：在继续非常措施的情况下。

布哈林：在今后继续非常措施的情况下，这是对的。也就是说，目前存在威胁，而如果我们现在继续非常措施，那么威胁就会增加。因此我们现在正在取消非常措施。

插话：有时我们没有取消。（喧哗。）

布哈林：请等一等，我回答你们的一切问题。

伏罗希洛夫：你连续不断地讲了三小时，难怪把你的发言改期。

布哈林：出发点应当是，当我们在前一段时间采用非常措施时，我们确实出现了某种由非常措施转向可以叫做“军事共产主

^① 明仁斯基，维·鲁·（1874～1934）——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财政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等职。

义”倾向的过程。不能掩饰这一点。我们在关于纲领问题争论期间刚刚为军事共产主义下了一个定义——这是在减少对小生产者的个人刺激，在征用、没收等等情况下以实行合理消费为目的的制度。不用说，在我们的目前体制内存在这种因素，继续非常措施的体制，我们就不能发展。这就会是军事共产主义，但是，第一，没有战争，第二，这时（保卫）庄稼汉的“土地”这条论据已消失。在过去那些年代我们采取军事共产主义措施时，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在贫困这一点上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我们工作人员中的干部们同样吃一份定量，而现在实行配给制，生活条件、消费条件以及其他各种条件都不一样了，因为那些实施配给制的人本身并不吃定量。

插话：可以让他吃。

布哈林：我现在说的是目前存在的。这种历史孕育着非常巨大的社会危险性，要看到这一点。而结果如何呢？总结我们所有的现象，我们说：非常措施业已过时。它的作用已走到自己的反面。不过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前途问题，而这个问题更为困难。请看，这是第一个建议，这是弗鲁姆金^①那封著名的信中提出的，它为一系列其他文件所充实……

鲁祖塔克：充实，但没有证实。

布哈林：斯大林读了一个文件，他还可以读读其他许多文件，例如雅可温科的信，此信表达了一大套观点。从我国阶级力量的配置看，这孕育着巨大的危险。它之所以孕育着危险，并不是因为有一些提出这样那样公式的同志，而是因为惰性的力量并非我们的阶级后备力量。只要国内有一个小小的什么借口，例如废除我们的选

^① 弗鲁姆金，莫·伊·（1878～1938）——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起历任粮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粮食人民委员部驻北高加索特派员、副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副财政人民委员。1937年被捕，卒于狱中。

举细则，这就意味着在更大程度上动员富农自发势力、一系列城市的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阶层等等来反对我们。

这些后备力量经常是巨大的，我们党的队伍中在这些问题上稍有动摇，就会产生无比巨大的政治影响。只要对富农的政治权利等稍有暗示，现在党内就会升起一股巨大的力量，并以绝对正确的严密的制度去反对这一危险。至于回到第14次代表大会去的问题，这还不是个大问题。回到第14次代表大会去的口号，决不是恢复或复活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其政治含义是取消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定。

插话：对。

布哈林：因此提出这一口号，实质上，这就是“打倒第15次代表大会及其决定”的口号。我必须说，如果我们看到第15次代表大会是不正确的，党就会在中央全会上提议召开代表大会，并修改这些决定。

插话：非常代表大会。

布哈林：不过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拜物教。我们完全客观地说：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定不仅不应修改，而且应加强贯彻执行。

我们是否应当用向富农让步、取消加紧向富农进攻的口号等办法去改善粮食收购造成的局势？绝对不。目前的问题在于，我们要消除我们这里存在的对中农结合的威胁。我们在取消非常措施，但我们决没有把非常措施等同于第15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这一点我觉得我党的每一个党员都应牢牢记住。

我党15大的决定就针对（非）一时性局面的措施提出了总的方针，而非非常措施则比较特殊，是对一时性局面的反应。对长期原因的反应应当是发展我们的农业，发展个体经济，加紧工业化的方针和继续向富农进攻。

因此，我应当说，当米高扬在打击右的倾向的同时，也打击另

一种倾向（我不认为这是左的倾向，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倾向），这样做是对的。这一危险是确实存在的，对这种危险确实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忘记的。

需要声明，对这里所发挥的关于个体经济发展的极限问题的理论，要全力反对。斯大林同志昨天说过，必须竭尽全力去反对认为个体经济在我们这里已经到顶的偏见，并从经济上予以论证，对此我还要说一下，问题还有其政治方面。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农民说，你作为个体生产者在苏维埃条件下已经完蛋，你已经不能再前进一步，他会说：“谢谢这样的条件，太感谢苏维埃政权啦。”这样我们就会把这些中农打走，把他们赶到鬼知道离我们多远的地方去。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有时提出管用多年的极其尖锐的警告，要我们对我们的中农不要干蠢事。（《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第169页）

列宁的这一有力的见解会使某些人听了毛发倒竖。

柯秀尔：要看是谁了。

布哈林：你不会的，你也不会。（笑声。）

插话：那样我们就没有危险了，让米高扬担惊受怕吧……

布哈林：我们强调发展个体经济的重要性时，我们的打算是应使个体经济同促使其发展的个人刺激挂钩，这里没有任何不体面之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是这样提问题的：（在政治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载《列宁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第1册）。这至今仍然正确。但是如果把这些同农民的个体利益挂钩的方法理解成同把个体经济引导到公共经济毫无关系，那是不正确的。——如果这样看，那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把发展个体经济同建设集体农庄对立起来了。应当这样提问题：集体化本身是立足于发展个体经济之上的。我们对个体经济的政策，一方面是应当发展它，以它为基础，另一方面是不忘记把这种农民经济公有

化——集体化不是建立在生产力的衰落，而是生产力的增长之上的。列宁直接反对过这样一种看法：个体经济越贫穷，它就越易于走向集体化（在政治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因此，包括米高扬同志在内的一些同志说，个体农业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关死，这是绝对不正确的。这完全是胡说八道。这一规律是建立在同资本主义无关的土地肥率递减律之上的。要全力反对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的怀疑主义态度，反对那种认为这种建设似乎只是空谈、废话等等的论调。这不是废话，而是我们的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现在就我们的前景谈谈阶级和阶级斗争。谈到前景，我的情绪不像在这里发言的同志那么乐观。

让我们举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瞎碰的数字，我们将会得到的数字。收成几乎比中等收成多5亿普特。

明仁斯基：这是胡说八道。

布哈林：明仁斯基说，这是胡说八道，尽管明仁斯基不是经济学家。我们应当看一看，这4.74亿是怎么出来的。根据中央统计局的数字，这是把粮食—饲料平衡表加以扩大的结果。拿黑麦和小麦来说，同去年相比亏空3600万普特；比去年少3.15亿普特的黑麦，比去年多2.79亿普特的小麦，平衡表上比去年少3600万普特。不过这个数字是个预计数字。实际收成是按6月15日的百分比计算的，并且通常都要低一些。1924年为预计的92%，1925年（是个例外）为104%，1926年为94%，1927年为96%。

因此，如果实际收成偏离6月的估计5%，那么粮食的总收成不是超额4.75亿普特，而是超额2.24亿普特，而如偏离2%，那就只是3.25亿普特。就粮食作物而论，按第一种方案，我们的小麦和各种谷物要比去年少1.3亿普特，而按第二种方案则少1亿普特。因此，我们大体上应考虑到，明年我们将比今年少1亿普特

——这是一个附加的极大的困难。这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这是前景问题。在这一年我们会不会有去年那样的困难？会有的。对此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明年我们遇到这些困难，我们准备实行非常措施，而如果我们要采取非常措施，是否大体上在相同的程度上？我认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痛苦、最主要的问题。我想事先提出这样一种设想或类比，它们初看起来似乎离题太远或显得可笑。

请大家想一想吧，你们是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国家里的无产阶级政权，但这个政权却要用暴力把庄稼汉赶进公社。

伏罗希洛夫：你说呀，就像 1918 和 1919 年那样。

布哈林：这样你们就会有庄稼汉的起义，富农则让庄稼汉承担责任；富农组织他们，领导他们。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起义反对无产阶级，给以迎头痛击，结果是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消失。你们从这里得到的是什么呢？

斯大林：一场噩梦，愿上帝保佑。（笑声。）

布哈林：可以找到一些聪明人，他们会说：“这里发生了什么？这里发生过阶级斗争吗？”是的，发生过。小私有者抛弃了工人阶级？是的，小私有者抛弃了工人阶级。富农领导了小私有者没有？是的，富农领导了小私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小私有者在富农的领导下抛弃了工人阶级，无产阶级，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一切都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但是，如果这位“无产阶级领导人”照一照镜子，那他看到的不仅有无产者，还有无产阶级的二流子。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大力警告无产阶级政权：让我们同农民的基本群众一道前进。所以当我们这样看问题时，当我谛听某些发言，例如安德列也夫同志的发言，或者斯大林同志的总的提法时（安德列也夫同志声称，我们出现对结合的威胁），我仔细考虑

了整个问题：好吧，如果过几个月我们将重新陷入同样的困难，如果我们在同样程度上采取紧急措施，那么照你们的看法，这些措施会更严厉还是会松一些？它们一定会更严厉。

雅罗斯拉夫斯基：取决于农民。

插话：取决于局势。

伏罗希洛夫：这是在咖啡渣上占卜。

布哈林：我们的方针无论如何不应是允许扩大重施紧急措施。

柯秀尔：这是对的。

洛佐夫斯基^①：现在这不取决于我们。

布哈林：幸而还有好多东西取决于我们。因为我们政策的中心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允许造成对结合的威胁。否则我们就执行不了列宁的基本遗嘱。

伏罗希洛夫：加紧向富农进攻。

布哈林：顺便说一下，这一般说是绝对正确的。

伏罗希洛夫：那时结合将更为牢固。

布哈林：我是把同中农的结合和你所希望的同富农的结合区分开来的。

伏罗希洛夫：是的，我当然“渴望”这种结合。

布哈林：我们的局势是矛盾的：生产力发展带来富农的发展，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发展生产力。可以采取不打击中农的办法去消除这种结合的矛盾。例如我们有像税收这样的杠杆，它使我们有可能几乎剥夺富农，而又不伤及中农。然而我们太少考虑为什么和怎样运用这一杠杆，以便不断地收取富农的积累，用之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又不使中农受损失。因此，我认为局势不是毫无出路

^① 洛佐夫斯基，索·阿·（1878～1952）——历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的。因此，我们的最主要的决定性任务是怎样做到既向富农进攻，又不使中农因此受损的问题。

莫洛托夫：但是中农还是要交税的，而这要占全部税额的四分之三以上，还是要使他们受点“损失”的。

布哈林：不得触犯中农的利益，对此谁也没有提出异议，但是，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提高中农的税率是一回事，而提高富农的税率则是另一回事。如果愿意的话，我告诉你，在我们这里标准应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我们认为，农民经济，甚至个体农民经济，应当发展，如果我们想——这是斯大林同志昨天发挥的正确想法，——如果我们想把结合建立在肥料和经济方法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沙地上，那就应考虑到，中农需要购买这些肥料、机器，等等。如果他需要购买这些东西，以便不只是恢复过去，还要有可能实现真正现实的积累，因为购买机器或肥料是农民经济总的积累。

这就是说，对农民应当采取一种能使农民得到发展的政策。这决定了价格的限度，赋税的限度。

插话：也是自动捐献的限度。

布哈林：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这决定了限度，因为尽管现在从等价理论出发是不正确的，但是以“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为出发点同样是不正确的。托洛茨基的口号是从庄稼汉身上拿取“技术上能拿取”的一切，不给以发展生产力的可能性，这归根到底会打击到工业（通过粮食，通过原料，通过市场）。

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是一种取决于农业积累数量的函数。而对富农我们可以保持这样一种限度，即给他们留下不多的一部分，而其余统统没收。

插话：而他们就满意了。

布哈林：如果要谈这一点，那我必须说，富农会很不同意，会

越来越不顺从地反对我们，不过他们的反抗力量实际上取决于他们能给自己弄到什么样的后备力量。如果中农群众不跟他们走，他们对我们就不可怕，他们可以随意发动阴谋暴乱，我们则可以用机枪扫射他们，但他们动摇不了我们国家。

我们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的经济是头足倒立的，马吃烤面包，而某些地方的人却吃糠，农民不得不到附近城市去买粮，一个农业国进口粮食，却出口工业品。这种倒立的经济会造成倒立的分歧。必须予以纠正。在这里我必须说一说从何着手，如何结束。如果我们问：“我们是否通过了改造时期的考试？”我们必须回答说，考得很糟。我们缺少解决这一时期任务的文化水平。西欧是直接进行技术变革的。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要以幻想来自我欺骗。在这里应当说，例如，作为积累，德国增加100万同我们增加100万不是一回事。在德国这100万具有全然不同的意义，因为在那里会以大量的先进得多的机器去改善（经济）。看看他们那种改善，我们会觉得我们仍然处于穷乡僻壤。我们现在应提出经济领导的方法和经济管理的方法问题。我觉得，我们中央机关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给自己背的包袱太大了——承担大大小小的领导，而不是把领导限定在一系列经过深思熟虑的基本的经济问题上。我们办了几十个小工厂、小租让企业，但在谷物问题上却失算了。我们在谷物上失算了，这一点斯大林同志说过，虽然对米高扬来说，有一系列可以原谅的因素；在出口问题上我们失算了，等等。在对待我们的机关上，我们用一种形式的主动性——来自国家，并且仅仅来自上头的主动性取代各种形式的主动性。我们扼杀了下层的合作社的主动性，地方的以及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主动性。结果就造成超集中的官僚机关和上头负责制，它们终于走向自身的反面。

不久前发表的丘吉尔的札记中写道，当他在战时应召执政时，他的内阁集中了大量的责任和权力，而他的头一件事就是砍掉它四

分之三，使业务机构非集中化。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需要按此比例搞非集权化，但我认为这是个重大的问题。

粮食收购问题是我们国家机关中以及同这一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作斗争中的粮食问题的一部分。如果我们正确解决了这一粮食问题，那么我们迟早会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出此问题，并同样解决此问题。

№11865

加米涅夫所作同索柯里尼柯夫
电话交谈的简要记录

(1928年7月11日)

星期三。7月11日上午9时。同索柯里尼柯夫的谈话。

叙述内容。(1)事情发展得严重得多，布哈林同斯大林彻底决裂了。撤职问题已经具体提出。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背叛了〔布哈林〕。现在因他的让步而对他宽松了一些。(2)布哈林两次说到：难道您不明白，我现在愿意由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来顶替斯大林。布哈林面临绝境，他最怕的是您〔加米涅夫〕说：斯大林的路线是正确的。(3)他发誓说不存在四人集团和五人集团。(4)斯〔大林〕在全会上的发言——两种托洛茨基主义倾向，真正的一种主张调整价格。布哈林分子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要发展工业，就要“农民交纳贡款”。米高扬也说：“剪刀差还将长期存在，不能取消剪刀差。”（说托洛茨基也想取消剪刀差。）“索柯里尼柯夫在偷运托洛茨基主义。”莫洛托夫：“中农强大起来了，所以发生冲突。”(5)布〔哈林〕的回答：“贡款理论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①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并无任何不同。”托姆斯基的回答：“如果莫洛托夫正确，那么会是什么前景？你们想要没有耐普曼、富农和承

^①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叶·阿·（1886～1837）——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1年任中央委员，1920～1921年任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21年起先后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和教育人民委员部职业教育总局局长、《真理报》编辑等职。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租人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办不到的。”李可夫^①痛斥卡冈诺维奇^②。结论：斯大林的路线要破产。布哈林处于绝境。你们不要夸奖斯大林。同您〔加米涅夫〕一起可以制订出正确的提纲。布哈林本人想〔同您〕谈谈。撤换斯大林的联盟——为什么什么事也没有做成——您对他来说是 X, Y, Z。斯大林放出风声说，您在他的掌握之中。

① 李可夫，阿·伊·（1881～1938）——1899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历任内务人民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38年被处死，后平反。

② 卡冈诺维奇，拉·莫·（1893～1991）——191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5～1928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总书记。1930～1935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4～1925、1928～1939年为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

№11866

加米涅夫所作同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

谈话的简要记录

(1928年7月11日)

副本的副本

我到达后1小时(7月11日上午10时),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没有通报和拉门铃即来到我处,后者在结束前离去。〔布哈林〕看样子激动不安和极度苦恼。非常激动地讲了以下内容。他讲了一个小时,我未予打断。我尽量准确地记了下来:

“在转入谈话的实质内容之前,我必须先纠正两个传闻。(1)没有就任命(四人小组、五人小组)进行过任何表决。根本不曾讨论过这个问题。(2)对季诺维也夫文章的注释是斯大林针对我口授的,是作为对莫洛托夫的妥协,因为莫洛托夫坚决反对刊登季〔诺维也夫〕的文章。现在谈事情的实质。

1. 党中央委员会内的事情走得很远,以致您(也许还有托洛茨基分子)必不可免地要被卷进去,并将在解决问题时起重要作用。

2. 这将在何时发生,我不知道。也许还不会很快,因为双方都还害怕向您呼吁。但是,无论如何在两个月内这将无法避免。

3. 因此,我想使您了解局势。我知道(预见到),斯大林分子也会来找您。当然,您作为政治家将会利用这个局势:“提高要价”,不过我不怕这个。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路线,因此我想让您

知道，斗争是围绕着什么进行的。

4. 加米涅夫：“斗争严重吗？”布哈林：“我想说的正是这一点。我们认为，斯大林的路线对于整个革命是致命的。采用这种路线我们就会完蛋。我们同斯大林之间的分歧，比我过去同您之间的所有分歧要严重许多倍^①。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对局势的一致看法是：“如果我们现在在政治局里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而不是斯〔大林〕，那就会好得多。”关于这一点我同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绝对坦率地谈过。我同斯大林已经几个星期不讲话了。这是一个毫无原则的阴谋家，他把保持自己的权势看得高于一切。他的理论变化总是服务于眼前要除掉什么人。在“七人小组”中，我们的同他争吵已到了互相指责“你撒谎”、“你骗人”等地步。他现在作了让步，目的是要致我们于死地。我们懂得这一点，不过他正在耍弄手腕，想把我们打成分裂分子。决议获得一致通过，因为他宣布否定莫洛托夫的意见，声称百分之九十地接受我在“七人小组”会上宣读而没有交出去（一张纸也不能交到他手上）的声明。他现在的任务是从我们手中夺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真理报》，并（用卡冈诺维奇）撤换完全站在我们一边的乌格拉诺夫。他的路线是这样的（在全会上说过）：（1）资本主义的发展，是靠盘剥殖民地，或靠贷款，或靠剥削工人。我们没有殖民地，借不到贷款，因此我们的基础是从农民那里收取的贡款。（你知道，这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理论是一模一样的。）（2）社会主义越是发展，反抗就会越大（见决议中的说法）。这是白痴那样的无知。（3）既然需要收取贡款，而反抗会增强，那就需要坚强的领导。自我批评不应触及领导，而是指向执行的人。

^① 原件注：本文件中黑体的文字与原话一字不差。

自我批评实际上是指向托姆斯基^①和乌格拉诺夫^②的。结果形成警察统治。现在的问题不是“布谷鸟叫了”，而确实是决定革命的命运问题。采用上述理论会毁灭一切。与此同时，斯大林对外奉行右的政策：他把共产国际赶出了克里姆林宫。他建议对沙赫特事件的当事人一个也不枪毙（我们投票反对），在所有谈判中作出让步。托姆斯基是这样描述的：我（托姆斯基）在国际事务中比你（布哈林）右30公里，但是我（托姆斯基）比斯大林左100公里。路线是致命的，但他连讨论的机会也不给。到处设置圈套，给人扣上倾向分子的帽子。他在一次讲话中说：只有“地主们”才会这样议论。——准确无误地转引自从乌格拉诺夫的一次讲话。他要宰了我们。”

5. 我：“您的力量有多大？”布哈林：“我+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绝对的）。彼得格勒人总的说来站在我们一边，但一谈到有可能撤换斯大林便害怕了，因此科马罗夫^③否定了斯捷茨基的讲话，不过当晚乌加罗夫就来找我，代科马罗夫道歉。安德列耶也夫^④支持我们。要把他从乌拉尔^⑤撤换下来。

① 托姆斯基，米·巴·（1880～1936）——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年当选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加创建红色工会国际，任总书记。历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等职。1936年自杀。

② 乌格拉诺夫，尼·亚·（1886～1937）——1907年入党。1924～1929年任中央书记，1924～1928年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8～1930年任劳动人民委员。1923～1930年任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

③ 科马罗夫，尼·巴·（1886～1937）——1909年入党。1926～1929年任列宁格勒苏维埃和列宁格勒执委会主席。1930～1931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31年起任俄联邦公用事业人民委员。1921、1923～1934年为联共中央委员。

④ 安德列耶夫，安·安·（1895～1971）——191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0～1927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铁路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历任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书记；农业人民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等职。

⑤ 北高加索？——托洛茨基注。

斯大林目前把卡冈诺维奇从乌克兰调走，以后收买了乌克兰人。我们的潜在力量很大，不过：（1）中间派中央委员还不理解分歧的深度；（2）非常害怕分裂。因此，〔中间派中央委员〕在非常措施上向斯大林让了步，致使我们对斯大林的攻击发生困难。我们不想以分裂分子的面貌出现，因为那样我们就会挨宰。但托姆斯基在全会的最后一次讲话中公开指出，分裂分子是斯大林。亚戈达和特里利塞尔是我们的人。发生过150次类似小型起义的事件。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在最后关头背叛了我们。我想，斯大林是用某种特别的锁链系住了他们。我们的任务是逐步阐明斯〔大林〕的危害作用，并引导中间派中央委员同意撤换他。组织局是我们的。”

6. 我：“目前他正在撤换您。”他：“有什么办法？目前要撤换在中央委员会通不过。夜里我有时想：‘我们有权保持沉默吗？这是否缺乏勇气？’不过计算说明：要谨慎行事。星期五李可夫要作报告。那时我们将作出总结。我要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

也许还需要再来一次打击，以便让全党知道，他正在把党引向何方。”

7. 作为对上述情况的补充，还有一大批“揭露”“七人小组”的材料等等，等等。语气充满对斯大林的敌视和绝对分裂的决心。同时也犹豫不决：公开出击还是不出击。出击——就会按分裂的条款置我们于死地。不出击——则用小步下象棋的办法弄死我们，而且如果10月份弄不到粮食，还会推卸责任，嫁祸（于我们）。

我：“那么他们打算靠什么得到粮食呢？”

他：“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再发生困难，就恢复非常措施。而这就是军事共产主义，可就要命了。”

我：“那您呢？”

他：“也许不得不采取更加深远的措施，以便同中农和解。富

农消灭多少都可以，但必须同中农和解。不过在斯〔大林〕和笨蛋莫洛托夫（他竟想给我上马克思主义的课，而我们称他为‘石头屁股’）掌权下，什么事也做不成。”

8. 我：“那么你要我们做什么呢？”

他：“斯大林吹嘘说，您在他的掌握之中。你们的人（具体的有茹克）到处在为斯大林奔走效劳。这太糟糕了。您当然自己决定自己的路线，但我请求您不要用赞同斯大林来帮助他扼杀我们。斯大林现在大概会设法同您接触。我想让您知道问题在哪里。”

9. 无需让人知道我们的会晤。不要给我打电话，因为我的电话有人窃听。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在跟踪我，也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人在监视你。希望能得到消息，但不是通过秘书和中间人。知道我同你谈话的，只有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你也不要告诉任何人，不过要告诉你们的人不要攻击我们。”

10. 我：“斯〔大林〕给你看了季〔诺维也夫〕的便条吗？”

他：“没有，第一次听说这事。”

我：“他们将怎样对待我们呢？”

〔他：〕“不知道，他们不同我们讲这些。或者斯大林要尝试以高官厚禄来“收买”您，或者任命什么职位把你们拉过去——准确的我并不知道。再见。以后几天我要忙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无法看到你。总之，要严守秘密。”

我和索〔柯里尼柯夫〕约好了，在我走之前他还要来。

№ 11867

加米涅夫关于同布哈林谈话的便函^①

(1928年7月11日)

我把你给他（个人）的信交给了他。他看过说：怕书面的东西。怕文章会引起麻烦。最好当面谈谈纲领^②的事。“纲领的许多地方都让斯大林给我搞坏了。他自己想在全会上就纲领作报告。是我强行夺了过来。他急切地想要成为公认的理论家。他认为，这是他惟一缺少的东西。”

此外，有大量琐事、细节。他异常激动。常常因激动而双唇颤抖。时常给人一种明知注定要失败的人的印象。所有人都在想：日内另一个阵营就会发出信号。应当平静地等待它们出现。这会来到的。因此你现在不必来这里。我们且瞧今后的进展。明日8时给我回电话。

7月11日6时

（在页边）附笔：这一切都是阿谀奉承。找不到其他的词：当然，是指政治上。

① 可能是写给季诺维也夫的。

② 指共产国际纲领草案。

№ 11868

加米涅夫对同布哈林和索柯里尼柯夫
谈话简要记录的补充

(1928年7月11日)

对布哈林讲述的补充。7月11~12日夜。

(1) 总的说来，给人的印象更像是注定要失败的样子。他的说法是：莫非我们的一切“吵闹”是一种白慰。有时我对叶菲姆^①说：我们的事业不是没有希望的吧？1. 如果国家毁灭了，我们也将毁灭。2. 如果国家能够脱险——斯〔大林〕及时转变，我们还是要毁灭。怎么办？遇到这样的对手——成吉思汗，而中央委员会文化水平又低，该怎么办？

(2)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论退出武汉政府。

(3) 斯大林向共青团员们说：关于就业问题如何解决，取决于布〔哈林〕是否停止卑劣的政策。

(4) 我们如果发起争论——会为此而置我们于死地。中央委员会害怕争论。

(5) 假如我们——我、李〔可夫〕和托〔姆斯基〕——集体辞职，又会怎样？

(6) 我是否避开一段时间——2个月——，不介入日常政治事务。而当危机来临时，再直接和完全公开地表态？

① 策特林，其秘书？——托洛茨基注。

策特林，E.B. (1898年~?) ——1918年入党。1926年~1928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编辑。

(7) 我们不能挑起争论，因为它将会直接变成武装冲突，因为会出现什么样的指摘呢？我们会说：瞧，就是这个人把国家引向饥荒和灭亡。而他会说：他们在维护富农和耐普曼。

(8) 党和国家融合在一起了，糟糕之处就在这里。

(9) 斯大林除了保持权力，对什么也不感兴趣。他对我们作了让步，但把住了领导的关键位置，而只要把住这关键位置，他以后就能置我们于死地。我们怎么办？

因为在中央委员会内撤换斯大林的主观条件正在成熟之中，但尚未完全成熟。

(10) 索柯里尼柯夫：你们应强化自己的政策，哪怕要求撤掉莫洛托夫。

(11) 斯〔大林〕熟悉一种手段——报复，而且是从背后捅上一刀。可以回忆一下“甜蜜的报复”理论。

(12)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不是骑士。曾常来找我，破口大骂斯〔大林〕，而到关键时刻却背叛了。

(13) 全会通过决议的经过和搏斗。1. 我要求讨论总的问题。斯大林回避说：需要制订工业财政计划，等等。2. 我写信给斯〔大林〕，要求进行全面讨论。他跑过来对我说：布哈林，你甚至能够扰乱大象的神经，但他不同意进行讨论。3. 我写去第二封信——他召我到 he 那里去。一开始就说：我们俩是喜马拉雅山。其他人都微不足道。4. 我们去“七人小组”。一个粗野的场面。他对我大喊大叫。我讲述他关于喜马拉雅山的话。他喊道：“你撒谎”。你编造这些东西挑唆政治局委员反对我。”我们分手了。5. 我宣读20页的声明，不让稿子离手。莫洛托夫宣称这是反列宁主义、反党。斯大林：十分之九我可以接受。莫洛托夫离开会场。作为基础得以通过。我出去写决议。他们也去写决议。突然送进来一份从我的宣言中抄袭去的决议案。我作了三处修改。李可夫改了一处。全

部一致通过”。斯大林这样议论说：“我采取非常措施弄到了粮食。我及时转变，并亲自起草了决议。如果需要采取这种措施，我可以一个人加以贯彻。”而实际上他引向毁灭。

(14) 由瓦尔加^①作报告是因为斯〔大林〕不愿意让李可夫做。我该如何对待这个报告，还不知道。瓦尔加将发挥说，既然要工业化，饥荒是不可避免的。

(15) 关于共产国际。塞马尔支持斯大林。台尔曼^②支持斯〔大林〕。埃维尔特不是右派，但迫使他成为右派。

(16) 斯〔大林〕违犯了政治局（“七人小组”）的决议。本来决定把弗鲁姆金的信分发给所有政治局委员并草拟一个答复。斯〔大林〕等不及这一切，自己写了一封回信，发了出去。我们通过决议指责违反决定的行为。“大家都认为回信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我不能再拖延下去。”

(17) 在这一次或是另外一次，我（布〔哈林〕）对斯〔大林〕说：“不要以为政治局是总书记的咨询机构。”

(18) 斯〔大林〕的政策正在导致内战。他会使起义淹没在血泊之中。

* * *

索柯里尼柯夫（引布〔哈林〕的话）：在一次酒宴上，醉醺醺的托姆斯基侧过身对斯〔大林〕说：我们的工人要开枪打死你。

① 瓦尔加，叶·萨·（1879～1964）——经济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生于布达佩斯，先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1919年先后任匈牙利苏维埃政府财政人民委员和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20年移居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成为俄共（布）党员。此后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

② 台尔曼，恩·（1886～1944）——1903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8年成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1920年底成立德国统一共产党时当选中央委员，属“左派”。在共产国际三大上维护“进攻理论”。1923年10月领导汉堡工人武装起义。1925年当选德共中央主席。1933年被捕，1944年在集中营遇害。

№11869

索柯里尼柯夫同加米涅夫谈话的简要记录

(1928年7月12日)

7月12日上午11时。

索柯里尼柯夫讲了以下内容。

在关于集体农庄的辩论中，值得注意的只有以下内容。斯〔大林〕发言以粗鲁的言辞尖锐地反对托姆斯基。“我十分惊奇地听取了托姆斯基的讲话。托姆斯基认为，我们除了向农村让步以外就没有任何预备力量了。这是投降主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信心。那么，要是乡下人要求在外贸垄断制上作让步呢？要求建立农民联盟呢？也让步？这是投降主义。我们的后备力量是国营农场和在贫农中进行工作。”脸色阴沉、铁青，露出凶相，怒气冲冲。给人一种压抑感，现在大家都知道了，不仅布〔哈林〕在攻击，斯〔大林〕也在攻击。其粗鲁的态度令人吃惊。

对于全会的情况索〔柯里尼柯夫〕是这样说的：进攻是李〔可夫〕发起的，斯〔大林〕应战。彼得格勒人对反对斯捷茨基摇摆不定。于是布〔哈林〕挖了一条壕沟，隐蔽起来，还在地下挖好了埋雷沟，但是一颗地雷也没有爆炸。莫洛托夫气势汹汹地向《真理报》开火（特别是攻击阿斯特罗夫，不过总的是攻击整个《真理报》的“片面性”和对克里茨曼所写的按语，等等）。于是托姆斯基攻击了莫洛托夫，但形式和缓。随后，斯〔大林〕直截了当地和粗鲁地攻击了托姆斯基。

№11870

K. 和 II. 两同志和加米涅夫的会见和谈话

(1928年9月22日)

我们是在剧院广场相遇的。他们一行5人刚开过派别会议。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决定去，不过不是作为代表，而是作为 K. 和 II.。简单寒暄几句什么久违之类的话以后，就转入评价国内经济政治局势的基本问题。

由于知道列·波·〔加米涅夫〕在这些问题上是颇有见地的人物，对于经济盛衰十分关注，我们认为了解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很重要。在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列·波·回答提问和解释问题，对国内形势作了以下判断。虽然在第四次丰收后经济得到继续增长，但国家正进入更加尖锐的经济危机。粮食收购的状况是一种标志，说明所采取的措施并未克服危机状态。去年愚蠢地采取的非常措施，触及了很大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在进行粮食收购时，党和苏维埃政权向贫农居民作下许多许诺，只求贫农能帮助政府收拾富农，获得粮食。在不少地方，贫农响应号召，富农被制服了。

贫农帮了忙，可得到了什么呢？春天，当贫农最困难时，当他们不仅没有东西播种，而且连吃的东西也没有时，政府未能兑现自己的许诺满足贫农的要求。迫不得已，贫农只好去恳求富农，重新依附于他们，不同之处只在于富农要拿走的东西比原先多二倍、三倍、五倍。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贫农只好接受这种条件。

夏天过去了，秋播也过去了，而贫农仍然没有得到答应给他们的东西。秋播以后，在许多地区贫农又依附于富农。苏维埃政权又

一次延误了，没有履行诺言，进行了欺骗。理所当然，这种局面引发的贫农情绪，远远不利于苏维埃政权，也不利于向富农分子进攻。富农在春季、秋季搭救了贫农，在困难时刻帮助他们，在贫农面前颇有威信，如果政府和党不得不再一次提出实行非常措施的问题，可以有把握地说，农村的贫农不会再支持这些措施了。这一次大部分贫农将会跟着富农走，因为在困难时刻他们实际上得到了富农的帮助。领导已经把国家引导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用自身的手段使国家摆脱危机的经济措施已经没有了。再次实行非常措施在目前情况下将是极大的错误，而且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农村居民可能为保卫粮食而采用不良的斗争方式。在当前，惟一可能采取的措施是政治性质的措施，即撤换领导，纠正党的路线，使具有更多的阶级性，制定长时间奉行的措施，从政治上动员群众，提高他们的积极性。

在当前，为了缓和危机局势，他们从国外进口粮食。据最新消息，已经这样做了。除了先前进口的 1500 万普特以外，政府又购买了 3000 万普特粮食。

但是提高粮食价格、从国外购进粮食、提高农业原料的价格，将加大农村的积累，却会减少工人的实际工资。随着危机的扩大，矛盾也将增长。危机局势的扩大将向领导提出以下问题：今后怎么办？向何处去？跟谁一起走？如果说，特别是在七月全会之后，季可夫的行动纲领是清楚的，那么斯大林的纲领是不清楚的、模糊的。斯大林不能再仅仅只限于提修正，协调各种修正意见。生活将对提法作出修正，还会摈弃许多东西。不断涌现的生活要比七月全会的提法更有说服力。而这一切将迫使斯大林最终表态，提出政纲，提出行动纲领。因此，列·波·认为，到十月全会上这些问题又将提出，并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提到全会上来。每个集团会各自说出自己的意见，从这里直截了当，不加附带条件，不转弯抹角地走向

热月，或者通过对工人群众隐瞒国内和党内的真实情况，也即通过长期的，更加有害的，愚弄人的道路走向热月。然后，列·波·声称，列·达·托洛茨基对七月全会的评价是绝对正确的。同志们问：列·波·如何解释群众对危机问题完全消极，怎样就正在发展中的严重危机向这些群众提出警告……对这一切，列·波·回答说，在我们采取战斗行动的时期，广大党员群众并不知道我们分歧的实质。他们对于有时在支部会议上爆发的热烈争论没有准备。而我们则看到领导层给党和国家造成的所有困难，直截了当地讲清一切，向党内群众提出了大量重要问题，而且只要能够办到就加以捍卫。但是群众并不熟悉我们，不敢转向我们这一边。而我们则不停地用我们的问题敲打党。正是这种过于坚持不懈的敲打，部分地造成了我们在去年10月和11月所看到的信任和担心（不要变得更坏）。列·波·认为，摆脱这种状态的出路在于加入党，逐步占据苏维埃和工会的负责职位。同志们指出，当你们贯彻这种做法时，右派将席卷一切，你们无法实现这一计划。

对此加米涅夫回答说，危机正在成熟，当它达到某种界限时，我们将予以说明，向党和工人阶级讲明。目前要采取措施，共同工作。

在场的扎罗夫指出，已经发生这样的事，即人们把他们的同志选人支委会，这说明我们的观点在党内是有生命的。

列·波·不赞同印发关于列·达·〔托洛茨基〕生病的传单。他说，这样只会使局势恶化（后来得到的消息说明，关于你们的列·达·转移问题曾在政治局提了出来。另一个地方讲得更为详细。看来，加米涅夫讲局势恶化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接着，加米涅夫说，现在列·达·应当呈递一份文件，在其中说：“召请我们吧，我们将共同工作。”但是，列·达·是一个固执的人。他不会这样做，他将一直呆在阿拉木图，直到派出一列特别快车前去接他。但是要知道，当派出特别快车时，国内形势已经发展到克伦斯基即将乘虚而人的地步了。

同志们指出，如果当克伦斯基伺机行动时再派出特别快车，那么，第一，这已将是克伦斯基政权；第二，你们将对此承担责任，因为你们放弃了阵地，虽然人党是为了纠正路线，却不曾为防止这种严重后果出绵薄之力。同时，人们会说，你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让列·达·从斯大林及其一伙把他赶走的那个濒死的地方接回来。这之后你们又怎么去批评传单？加米涅夫稍稍犹豫了一会，声称 he 可以和布哈林谈一谈。至于我们在这方面采取的步骤，季诺维也夫还在一个月以前就同莫洛托夫谈到了。接着，列·波·对列·达·托洛茨基表示不满，说他在每一封信中都攻讦他们投降，也太频繁和太尖锐了。

现在就不应当这样做了，而应当共同工作。错误人人都会犯，但不应加剧这些错误。列·达·不是也有过一些人们可以议论之处吗。如果他提投降，那我们也可以提第二党问题。这将导致新的议论，现在不应再重复。令人惋惜的是，发生了分裂。生活确认了反对派的所有论点。反对派所作的预测绝对正确。关于各个集团的事，他说道：正在进行组织工作，为撤换托姆斯基和乌格拉诺夫而斗争。按照他们的意见，前者是已经定型的达到完整形态的热月分子，他把赌注押在工会国际与阿姆斯特丹国际的合并上，并且小心翼翼地表示准备把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合并。对于乌格拉诺夫，正在进行基层的工作。他们想通过基层机关欺骗上层。通过拉拢基层机关使斯大林的大多数支持者进入代表会议，并用同样办法使乌格拉诺夫失去候选人资格。至于李可夫，他说，李可夫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说出自己的意见。说他很狡猾，要等别人先说。斯大林是否有可能在十月全会上击败李可夫，坐到他的位置上，然后再执行李可夫的纲领？列·波·回答说，是的，有可能。离开加米涅夫时，同志们受到顺便去坐坐的邀请。

№11871

中—右派集团内部（莫斯科来信）^①

（1929年3月20日）

向你们报道有关政治局内外形势的最新消息。我们绝对保证所传消息的准确性，其中大部分都经过二至三个渠道的验证。许多说法我们都是逐字援引的。

加米涅夫同布哈林谈话的记录是1月20日公布的。在上层，这个文件加剧了冲突的发生，而在基层人们感到震惊。记录的公布破坏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手把戏。政治局就公布的谈话开了……3天会。终于大吵了起来。斯大林集团决定在下一次全会上把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赶出政治局。右派准备进行消极抵抗。斯大林分子正在取得胜利：他们轻易地取得全胜。我们的传单由中央委员会加以翻印，因为所有人都说：我们是从反对派的传单中，而不是从中央委员会那里了解到情况的。传单的政治意义及其在群众中的影响极大。人们都说：党是蒙着眼睛被人领着走的。结果，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立了针对“三人小组”的某种法庭。下面提供一些细节。

12月至1月期间，加米涅夫几次会晤了布哈林，地点是在皮达可夫那里。布哈林就第6次全会的准备工作说了以下内容：“全会前我们力量的格局是这样的：我在基斯洛沃茨克为《真理报》写文章，李可夫应当注视经济情况，由于乌格拉诺夫情绪激烈好斗，

^① 此文发表于《反对派公报》，巴黎出版，1929年第1—2期第15—17页。

要他平静地坐下来，不给斯大林以干预莫斯科组织事务的借口。乌格拉诺夫未能控制住自己，在莫斯科委员会第9次全会上冒然出击，从而被打垮了，惊慌失措之余说了许多自己莫须有的错误等蠢话。我得知李可夫已经完成了准备在第6次全会上用的关于控制数字的提纲。我看出，斯大林在政治局将玩李可夫于股掌，并把本来就可能不大成功的提纲搞得更糟。坐火车我已赶不上下一次政治局会议，就改乘飞机。在罗斯托夫降落。地方领导人可疑地对我大讲继续飞行对我身体有害，等等。我不予理睬，继续飞行。在阿尔乔莫夫斯克又降落下来。我还没有来得及走出机舱，就有人递给我一个火漆密封的信袋，原来是政治局的密件，说是绝对禁止我继续飞行——因为我心脏有病。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就把飞行员带走了，而在我面前出现了一个工人代表团，要求我做一次报告。问火车的时间，说是一昼夜之后才有。不得不做一次报告。”

加米涅夫：“关于反右倾斗争的决议是你写的吗？”布哈林：“当然是我。我应当向党宣告，我不是右派。我于星期五到达莫斯科，而政治局会议已在星期四开过。看了提纲，显然不能令人满意。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莫洛托夫不同意，破口大骂，大喊大叫，说我破坏了和谐的工作，我应当去治疗，等等，等等。政治局会议召开了。我对决议作了很大的改动，尽管经过这些修改决议仍未能摆脱暧昧含混的状况。我们作了总结：莫斯科被击溃，决定加强进攻，提出了要求撤换斯大林等人的11条。当把这些要求给斯大林看时，他声明：没有一条要求是不可接受的。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李可夫、布哈林、斯大林、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则）。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斯大林没有召集委员会开会。

中央全会开幕了。讨论了第一个报告，第二个报告即将讨论。我们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要求召开委员会会议。斯大林在委员会会议

上叫喊说，他不会允许让一个人干扰整个全会的工作，“这算什么最后通牒，为什么一定要撤换克鲁敏^①？”等等，等等。

我大为光火，向他说了许多尖锐的话，离开了房间。在走廊遇到托夫斯图哈，我就把预先写好的我和托姆斯基的辞职书交给了他。斯大林接着来到。托夫斯图哈把辞职书转交给了他。他匆匆看了一遍，走了回去。李可夫讲述说，他双手颤抖，脸色苍白，表示愿意让步。要求销毁辞职书。他们在那里商定撤换科斯特罗夫、克鲁敏和另一个什么人，不过我再没有去参加全会。”

然后，布哈林给加米涅夫看了一份他写的长达16页的文件，其中对经济形势作了评价。按照加米涅夫的话说，这份文件比布哈林1925年的四月提纲还要右。加米涅夫问：“你准备怎样处理这份文件呢？”布哈林回答说：“我要补充一章关于国际形势的内容，最后以党内问题结束。”加米涅夫问道：“那这不成了一份行动纲领了？”——“有可能，但难道你没有写过行动纲领吗？”这时皮达可夫插话说：“我忠告你们不要反对斯大林，因为多数人是跟他走的（多数皮达可夫一类的乃至更坏的官僚？）。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类似的行动结局都很糟。”（就犬儒主义而言，这真是绝妙的论据！）布哈林就此回答说：“这自然不错。但有什么办法呢？”（可怜的布哈林！）

布哈林走后，加米涅夫问皮达可夫：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劝告？这只会妨碍斗争的开展。皮达可夫说，他十分认真地认为，不能反对斯大林。“斯大林是惟一还可以听从的人。（绝妙，果然绝妙：问题不在于哪一条道路正确，而在于听从谁，以免出现“很糟”的结局。）布哈林和李可夫以为将由他们取代斯大林进行指挥，

^① 克鲁敏，加·伊·（1894～1943）——1909年入党。1919～1928年任《经济生活报》编辑。1928年起任《真理报》编委会委员。1930年任《消息报》编辑。

这就错了。将来会由卡冈诺维奇们进行指挥，而我不愿意也不会听从卡冈诺维奇们。”（看来：他也会听从卡冈诺维奇的。）“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把国家银行交给了我，我要关心让银行有钱。”加米涅夫说：“好吧，而我不想关心，让学者参加科学技术局，这不是政治。”他们至此就分手了。

到12月底，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这样表述形势的：“需要抓住舵柄。只有支持斯大林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对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可怜的人：已经付出了多少代价，而离舵柄还远得很。）他们中的一个（好像是加米涅夫）去找了奥尔忠尼启则。大谈中央目前的政策是正确的。奥尔尼尔启则随声附和。当加米涅夫说到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他们留在中央消费合作社联社，奥尔忠尼启则回答说：“目前还早，要清除道路。右派会反对的。”（可是根据决议，右派是主要的敌人。）

加米涅夫说，不一定需要很高的职位，最容易做的是把列宁研究院交给他（可那是斯大林进行伪造的主要据点！），他们需要的是准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等。奥尔忠尼启则随声附和，并答应向政治局提出这个问题。3天以后，加米涅夫去找伏罗希洛夫，在他面前滔滔不绝地讲了2个小时，大肆赞扬中央的政策，对此伏罗希洛夫一言不答（对此应予赞扬）。

又过了2天，加里宁去找季诺维也夫，在他那里呆了20分钟。他通报了关于要将托洛茨基同志驱逐出境的消息，而当季诺维也夫问及细节时，他回答说问题还没有决定，因此暂时不必谈论这个问题。对于季诺维也夫提出的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问题，加里宁回答说不知道。“我们连自己的事情也忙不过来。”接着，他似乎就加米涅夫对伏罗希洛夫的访问作了回答，他的话逐字援引如下：“他（斯大林）正在大谈左的事情，但很快他就不得不以三倍的规模奉行我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我支持他的理由。”（这就对了。加

里宁一生从来没有，后来也再没有说过比这更加正确，更加精辟的话了。)

得知托洛茨基要被驱逐出境，季诺维也夫分子聚集商议。巴卡耶夫^①坚持要对此表示抗议。季诺维也夫说，没有人好抗议，因为“没有主人”。(季诺维也夫又准备向谁付出一切代价呢?)他们在这一点上取得了一致。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去找克鲁普斯卡娅，对她说，听加里宁说要把列·达·〔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克鲁普斯卡娅说，她也听说了。季诺维也夫问：“你们准备怎么办呢?”“第一，不是你们，而是他们；第二，即使我们决定表示抗议，谁又会听我们呢?”季诺维也夫向她转述了加米涅夫同奥尔忠尼启则的谈话。谈到奥尔忠尼启则，克鲁普斯卡娅说，他看到谁都诉苦，但不能相信他。

加米涅夫遇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后者提到他正在出版一本关于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文集，建议加米涅夫帮他干此事。加米涅夫乐意地应允了，之后奥尔忠尼启则邀请他和季诺维也夫到自己家里去。聚会时关于文集谈得很少。奥尔忠尼启则说，他把问题提到了政治局，伏罗希洛夫说：“不能扩大任何权限。瞧他想要什么——列宁研究院！如果他不喜欢中央消费合作社联社，倒不妨换一个别的机构。我们并不禁止出版书刊，但这并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刊印。”(好一个伏罗希尔!^②)——“那么，斯大林呢?”——斯大林说：“扩大权力，就意味着平分秋色。我不能同他秋色平分。右派又会怎么说呢?”(可是，右派不是“主要的敌人”吗?)加米涅夫：“他在政治局就是这么说的吗?”奥尔忠尼启则：“不，这是在政治局开

^① 巴卡耶夫，И.И. (1897~1936) ——1906年入党。1925年任列宁格勒州监察委员会主席。1925~1927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在第15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被开除出党。

^② “伏罗希尔”在俄语中有“搅乱”之意。

会以前。”

他们一无所获地离开那里。季诺维也夫用两页纸写了一份提纲（既然奥尔忠尼启则帮不了忙，只好写提纲了）：“国内富农在壮大，富农不向工人国家提供粮食，富农射击和杀死农村通讯员和农村阅览室管理员，等等。布哈林集团及其路线培育了富农，因此绝不能支持布哈林。我们今天支持中央多数派（斯大林集团）的政策，只要斯大林今天反对耐普曼、富农和官僚主义者。”（也就是说，季诺维也夫不再不惜一切代价了？）加米涅夫说：“同斯大林是谈不通的，让他们都见鬼去吧！8个月以后我要出版一本关于列宁的书，到那时一切都会清楚了。”季诺维也夫则是另一种情绪，他说：“要让人们不忘记我们，要在群众集会上发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等等，要敲每一家的门，把党推向左转。”（事实上，谁也不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那样如此损害了左派的政策。）而他真的发表起文章了。不过，《真理报》的编辑们完全接受了伏罗希洛夫的忠告。他们又一次拒绝刊载他〔季诺维也夫〕的文章，理由是他的文章表现出对富农的惊慌失措情绪。近来，季诺维也夫在中央消费合作社联社的党员大会上、在普列汉诺夫研究所等处就共产国际10周年发表过讲话。

在我们公布了著名的文件——加米涅夫同布哈林的谈话——以后，加米涅夫被召唤到奥尔忠尼启则那里，以书面形式有保留地（哼！哼！）确认了记录的准确性。布哈林也被召唤到奥尔忠尼启则那里，他同样确认了记录的准确性。1月30日和2月9日召开了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右派宣称传单是“托洛茨基分子的”阴谋。但不否认谈话的事实。他们认为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工作条件。给政治局委员（布哈林和托姆斯基）配备了政

委：克鲁敏、萨韦利耶夫^①、卡冈诺维奇等。斯大林对兄弟党采用吆喝的方法。在革命的第12个年头，没有一个省委书记是选举出来的。党不参与解决问题。一切都从上而下进行。布哈林的这些话遇到喊声：你从哪里抄来的？从托洛茨基那里！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谴责布哈林的决议案。但是右派不同意通过这项决议，理由是各个地区已经在“整治”他们。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上，李可夫宣读了一份长达30页的宣言，批评了经济形势和党内制度。在莫斯科省的党代表会议上，公开称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为右倾。不过所有这一切并未全都公诸报端。中央全会推迟到4月16日召开。代表会议推迟到23日。斯大林和布哈林集团之间未能达成和解，尽管有人大肆散布这方面的风声，看来是为了让各个支部对左翼加以打击。

莫斯科，1929年3月20日

Г.Г.

^① 萨韦利耶夫，马·亚·（1884～1939）——历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委员、联共（布）党史委员会副主任、列宁研究院院长、《真理报》编辑等职。

No08320

布哈林在 1929 年联共（布）4 月 中央全会上的发言^①

（1929 年 4 月 18 日）

同志们，我认为，在座的绝大多数同志错误地认为党内产生了某种新的反对派，因此我们将在某种程度上遇到过去已经遇到过的那些反对派一样的反对派。我觉得许多同志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在这里听到的许多发言就是出于这种担心。

同志们，请你们尽量仔细地听我的发言，因为我感觉到，我作为政治局委员在全会上发言已经是最后一次了。首先，应当说，我们 3 个政治局委员，更不要说是迄今为止仍是党的领导集团的成员，目前的处境是任何一个党员都未曾遇到过的。实际上，在中央监委主席团和政治局联席会议之后，在党的有关高级机关没有作出决定的情况下，我们变成了众矢之的。实质上，这种处境令人想起革命前的所谓“公民死刑”——人被缚在耻辱柱上，在鼓声下把各种污蔑不实之词泼向此人，同时禁止他说话。这种“可爱”又“可靠”的古老手段，从我们主观的感受来说是非常沉重的东西。并且还使用别的手段。还“企图”，轻一点说，直接和间接地把我们“拉入”争论。例如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出现各种各样的喊声：“他们没有来参加代表会议”，“他们没有作解释”，“他们没有讲出

^① 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于 1929 年 4 月 16～23 日举行，主要议题为讨论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派别活动问题”，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

自己的观点”，“他们没有在党的面前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他们是不想对党员群众负责的人”，等等，等等，在听到这些意见之后，要有巨大的自制力才能不在代表会议上露面，不回答问题，不开始反驳。

所以我们保持了沉默。我们之所以保持沉默，是因为只要我们在某个代表会议、会议和支部出现，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争论就会开始，而我们当然就会被指责为争论的挑起者。我们处于这样的境地，不解释、不辩护会受到污蔑，而如果试图解释、试图辩护，就会受到更多的污蔑。

我重复一遍，过去的几个月表明，我们这一方表现了最大的、极大的自制力，一般说来，这是一个党员所能做到的，可以向他们要求的极限了。我认为，这对中央委员会里怀有反对我们的情绪的那部分委员来说，在一定的程度上，虽然是较小的程度上，也是一种“历史的经验”（我把这个词加上引号）。

认为我们又出现了“反对派”集团，这个集团大体上会再次经历过去反对派所经历的那些阶段，以这种观点为出发点是否正确呢？

同志们，我可以向你们证实，中央和中央监委中你们许多人作为出发点的这条中心点是根本错误的。你们不会有新的反对派！你们将来也不会有新的反对派！我们中间谁也不会去领导任何“新的”或“最新的”反对派。我在同遇到的许多同志的谈话中都非常自信地坚持这一观点。因为我深信“反对派”不会有好结果的。这种看法的政治根据和政治理论根据是，通过派别斗争来消除党内分歧的旧办法现在是不能允许的，并且客观上这种办法目前在我党也是不可能的。我在所谓同加米涅夫的会谈中也说过这一点，对这次谈话的歪曲成了对我们发动“严厉批判”道路上的信号之一。那时就讲过这一点。你们应当根据我现在提到的事实，从我所说的我们

的行为来想一想，关于新的“反对派”的各种各样“灾难”的描绘并不存在，无须制造“血腥的孩子”，说什么我们要组织党内争论和斗争，等等。我们不会这样做。我们不想这样做。我们不能这样做。整个党内形势都反对这样做。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反对这样做。阶级状况反对这样做。国际大范围内的客观力量对比也反对这样做。

我必须先说明这一点，这个问题以后就不再谈了。

现在我来谈几点也是引言性质的看法，这涉及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草案**，它将成为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认为需要通过的决定的正式出发点。同志们，现在我不谈全部决议，而只想对某些论断提出批判性的意见，我认为，只要对事情稍微认真负责一些，就应当摒弃这些论断。

先谈谈决议的道德方面。我不得不这样做，因为在我党的历史上首次对共事几十年的同志进行种种道德谴责——指责他们不诚实、不正当以及其他一系列罪名。

对此我必须坚决抗议，这不仅是为了捍卫某种个人的主观利益。也是为了捍卫心目中的列宁。重复一遍，我在这里必须坚决反对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决议中滥用1916年4月列宁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信中说，布哈林“轻信流言蜚语”^①，在决议起草者看来，此信应能“压倒”即消灭列宁的政治遗嘱，也就是他对一些负责同志所作的最后的政治评语。我必须坚决地提起此事，因为这是不正当地利用此信。在向我出示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决议时，我不能早一些，立即记起、得知、反驳决议中所引用的列宁同志给施略普尼柯夫同志的私人信件中所提到的有关情况，那时我对此说不出任何东西。我从列宁研究院取来了列宁同志的信，阅读了所有与此

^① 《列宁全集》第47卷第273页。

有关的信件，阅读了我私人档案中的通信，从而明确无误地确定了一个事实：这句话是因马林诺夫斯基奸细案引起的，在此案中我是反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惟一的同他没有任何私人争执和私人关系的证人，在这个案件中我是完全正确的。同志们，现在我要证明多么不正当地使用列宁的信。

首先，我询问了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他是否记得“轻信流言蜚语”这个词组同什么事实有联系。施略普尼柯夫同志回答如下（但愿你们理解，我询问施略普尼柯夫不是因为同他建立了“反对派联盟”，而是因为列宁的信是写给他，而不是写给普希金的）。施略普尼柯夫这样回答我的便条：

“您1929年3月24日的便条收到，但不能立即回答，因为需要查看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所有通信。在他和我的信件中，我没有找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你“轻信流言蜚语”的依据。现在我已记不起，我是否通过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通信查询过信中的这一点，但那时（1916年5~6月）我从一些同志那里听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这一评语是在审查马林诺夫斯基议员奸细案时您的行为引起的……”

现在我接着说下去。在审查马林诺夫斯基奸细案时（此事在座的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可以证实），我是怀疑马林诺夫斯基从事奸细活动的证人。我是惟一的证人，在指控马林诺夫斯基的时候，如我已经说过的，同他没有任何私人的或者与此类似的什么争执。但那时马林诺夫斯基通过一系列非常狡猾非常做作的手段，得以哄骗我们的调查委员会（如果需要，我可以说一下，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奥尔忠尼启则：此事你到党史委员会说去。

布哈林：我要到党史委员会去说的，不过关于您，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同志，我还有话要说。

奥尔忠尼启则：请吧，请吧。

布哈林：同志们，我出来反对马林诺夫斯基。但我所支持的指控被推翻了，通过了一个很长的决议，由已故的伊涅萨·阿尔曼德同志誊抄，其中说我“轻信流言蜚语”，“听信”针对马林诺夫斯基的“流言”。这里犯了一个错误，但不是我犯的，而是调查委员会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信中的表述就是同这一错误有关，通过分析我在战时同季诺维也夫的通信也可以得到证实。这是非常复杂的东西，我下面不再谈了。不过我要问问你们，同志们，在引用这些话之前，有谁核查过没有，核查过这些话是根据什么写出的？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中有人完整地读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给施略普尼柯夫的信没有？核查过没有？是否知道什么，为什么，怎么回事，什么时候的事？没有，没有做过。而只是不光彩地利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党内斗争中无意中犯的错误，甚至不去想一想，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说得轻一些，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下列事实也恰恰证实了这一点：1917年革命后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面目被揭露，而我反对他是正确的，他在被揭露后就被枪毙了，此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做过各种各样的评语，但再也没有使用这一评语，可以理解，这种指责没有再重复。

然而到底是谁提示如此利用列宁的信的呢？从托洛茨基在阿拉木图所写的文章《不断革命和列宁的路线》中我们读到：

“还需要补充一点，在列宁给柯伦泰（如果是给柯伦泰的，那也就是给施略普尼柯夫的。——尼·布·）的这些信中含有对柯伦泰所同情的布哈林的猛烈攻击。不过这些信暂时还藏着。只有在公开反对布哈林的运动中才会问世。这不需要等待太久了。”

托洛茨基这样写，鼓舞了决议的起草者。我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就到此为止。

我现在来谈谈提交全会的决议中的理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决

议在理论方面的特点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以中央和中央监委的名义建议批准的关于“贡款”的公式，这个公式至少是可以争论的。提交给你们的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决议中不容争辩地写道：

“全党（包括斯大林同志在内）的出发点是：农民购人的工业品的价格还较高，而卖出的农产品的价格却较低；而如果我们不想放弃工业化，那就不能取消这种超额税（贡款）……”等等。^①

同志们，我不想在这里大谈“贡款”问题。但我要问你们，每一个人如果自问一下，斯大林同志用“贡款”来说明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经济联系是否妥当，那么，对这一表述难道不应当至少回答说：“此语不当”。如果有谁（首先是此语的作者）出来说：“我同意，我用的此语不当”，这个问题就会取消。为什么不这么说呢？为什么要坚持明显的错误呢？

斯大林：如果伊里奇也说过这个词呢？

施利希特尔：针对专家和资本家的。

布哈林：列宁那里没有与斯大林的从农民那里收取贡款类似的说法。对专家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是就资产阶级专家和资本家而言，我们应当给他们付学费。

斯大林：不，不是这么回事。

布哈林：不，请等等，正是这么回事。资本家收取工人阶级创造的部分剩余价值，即在一定程度上剥削我们，但不应把资本主义世界和资产阶级专家之间的关系同无产阶级国家向农民征税问题混为一谈。这种征税同剥削的范畴毫无共同之处。无产阶级不是农民的剥削者，也不可能是农民的剥削者。请取消您的“贡款”，哪怕作为失言也罢！不要再提这一点！不要把自己装扮成不犯错误的教皇！这就是我觉得需要提出的最低要求。同志们，我完全不懂，一

^① 《苏共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分册，第502页。

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怎么可以用这样的名称去说明在苏联对农民的征税，并且还是在正式的决议上。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同其他所有科学流派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总是要求对经济现象作出相当的历史标志：资本就是资本，而不单是生产资料；商品不是简单的产品。贡款同样如此。贡款是非常明确的历史范畴，它同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也不可能有什么共同之处！不能这样轻率地对待理论观点。这是无知，是有害的！

我现在来谈第三点意见，涉及决议的政治方面。我觉得，下面的话很能说明决议在政治方面的特点：

“今年党不采取非常措施也能够应付过去了……党还算保持了就全苏联说来一般不坏的粮食收购速度，否认这一点同样是不对的。”^①

然而，自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这一决议通过后没过几个星期（一字不差！），这个出色的预言已经被生活所推翻。如果全会在决议中留下这种政治上绝顶聪明的东西，那是极端可悲的，这种绝顶聪明的东西清楚地表明和证明令人吃惊地缺乏起码的政治预见性。不能把它写进现在提请你们考虑的决议中去！

我不谈决议中关于我们似乎反对工业化的指责以及一系列其他莫须有的罪该万死的东西。我将在相关的地方来谈。

与此有关，我只想顺便说一个出色的理论发现，此发现可以同“贡款理论”相比美，这个发现出自自由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签署并得到政治局批准的一个提纲。^②除了其他东西，那里还有一个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非常特殊的“新东西”，可以说是“标新

^① 《苏共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分册，第504页。

^② 指联共（布）第16次代表会议《关于发展农业的途径和减轻中农赋税》的决议，见《苏共决议汇编》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分册第25页。

立异”的东西。在得到政治局批准的提纲中说：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经为国外市场和殖民地服务”，等等，等等（接下去谈苏联）。

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在其最初发展阶段”如何“为殖民地服务”的，马克思说得最好。

加里宁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在其发展的最初阶段就已经为国外市场和殖民地服务”，等等。我是准确援引的。

鲁祖塔克：不是在封建社会，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

布哈林：说的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曙光。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迄今为止是向马克思请教的，马克思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说的：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资本论》1928年版第1卷第603页）^①

不仅马克思，而且连资产阶级学者桑巴特也说，欧洲的资本主义文明是建立在受折磨和被灭绝的其他民族的鲜血和白骨之上的。而现在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却提出一个公式，说资本主义强盗在为（!!）殖民地服务（!!!）！这岂非新发现？

插话：可以说：“资本主义为殖民地服务。”

布哈林：写上了已经写下的东西。如果愿意，请写上：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曙光时期”在为殖民地“服务”。但这是非常错误的！结果，出现了一幅得到政治局批准的新的理论发现的确实奇妙的图景：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曙光时期”“为殖民地服务”，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却从农民那里收取贡款！请看我们走到哪里去了！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265页。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看我们学到了什么！现在我们学到了许多过去从来不知道，也不会知道的东西！

插话：不够，不够。

布哈林：我知道，这并非不够，因为这对你们来说是一剂很好的泻药，亲爱的同志们！

插话：要看是对谁了。

布哈林：现在我要转向主要的重大指责之一，这是昨天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提出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报告的“功绩”之一是，他并不限于各种各样相对来说较为次要的东西，虽然也许是尖锐的，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东西，他还提出一个重大的政治指责。他的指责是，三个政治局委员，特别是我这个罪人，据说犯有深刻的内心的思想政治动摇和摇摆。我被政治之风吹得到处摇摆，逐渐倒向右边，已经到了必须把我排除出党的领导的地步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就是这样说的。好的。同志们，请允许我首先来谈谈“深刻的内心的思想政治动摇和摇摆”。不过为便于“自我批评”，请允许我先越过这个大问题，以便尽量清楚地看看巨大的思想动摇和摇摆总的情况如何。我觉得，这同事情有非常直接的联系。不仅是因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盛情地触及这个题目，还因为既然中央和中央监委要提出指责我们为“右派”等等的决议，所以不言而喻，从通过某个决议来说，根本观点问题具有最首要的意义。

首先，同志们，我要谈谈对农民的态度问题以及与此有联系的莫洛托夫同志的一些言论。

在托洛茨基反对派提交党的 15 大的提纲中有如下语句：

“列宁用下面的话最确切地表述了现阶段我们在农民方面的任务：

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

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①

莫洛托夫同志在党的 15 大上发言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反对这一口号说：

“然而在反对派问题上中心问题是**中农问题**。反对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光明正大的，它企图以列宁的引文来加强自己的反中农的倾向。反对派通常都引用列宁一篇文章中的如下语句（以下系上述引文。——尼·布·）”

“这是（反对派说）对我党政策的最准确、最正确的规定！

是否这样，同志们？不，绝对不是这样，这对目前来说是完全不够的。”（联共第 15 次代表大会。速记记录。莫洛托夫同志的报告《论农村工作》，第 1090 页）

接着莫洛托夫同志指出，此引文引自列宁写于 1918 年秋的文章，那时列宁似乎是站在中立农民的立场上。在“解释”了这一问题之后莫洛托夫同志继续说：

“反对派现在还想把这一公式作为最正确的公式用于同农民的关系！难道这不是对列宁的侮辱？”（同上）

在指责了反对派对列宁的侮辱之后，莫洛托夫同志走得更远了。“但是不是偶然地反对派分子恰恰把这个公式当作自己的公式的基础。”——莫洛托夫同志说道，同时引用伊万·尼基·斯米尔诺夫的话接着说：

“由此可见，反对派根本不要同中农的任何联盟，它不相信此事，它不承认列宁的这一口号、原则和政策，因此自然地持这种观点（斯大林：因而灭亡）。不仅灭亡，而且还不能留在我们党内。（鼓掌）”（同上，第 1091 页）

^① 见《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 1979 年版下册第 833 页。《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191 页。

这样，莫洛托夫同志在 15 大上说，反对派所引用的列宁在 1918 年的口号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正确的；

采用这一口号，把它看做是目前“最正确的”的口号的反对派，必然灭亡；

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能留在我们党内（不是说这是“动摇”或者一般错误，不是的！持这种观点的人不能留在党内！）

莫洛托夫同志是这样说的，而斯大林赞同他的说法。

后来斯大林同志竭力否认；后来莫洛托夫同志写文章自我驳斥，声明这是他的错误。可惜，那里只字未提斯大林同志在代表大会上完全赞同他的说法！此事似乎是“突然冒出”的。这个故事的意義决不在于莫洛托夫起初说这个，后来又说了别的，他动摇、摇摆了，等等。主要的不幸不在这里，并且我的前提也不是要大家都说一种百分之百的真理……

伏罗希洛夫：你习惯于这样。

布哈林：……不管伏罗希洛夫同志怎么说他们（笑声），我不认为莫洛托夫同志会动摇。不过我提请注意下列情况。从莫洛托夫同志所作的论断“不能留在党内”等等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如果严肃认真地对待莫洛托夫同志的话，那么不多不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或者现在的莫洛托夫应当把 15 大上的莫洛托夫开除出党；

或者 15 大上的莫洛托夫应当把现在的莫洛托夫开除出党。

还有，按照莫洛托夫在 15 大上的发言，党既然接受了现在所说的口号，它就必然灭亡，并且是得到斯大林的准许的，斯大林说的正是灭亡。

最后，党现在的做法“在政治上是不光明正大的”。这就是从莫洛托夫同志在党的 15 大上所作的解释中应当得出的结论。

奥尔忠尼启则：那么口号是正确的吗？

布哈林：列宁的口号是正确的。下面我接着谈莫洛托夫同志。要知道，按照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说法，我们犯有巨大的思想动摇；我们有过巨大的思想摇摆。关于这一点我稍后再说。而莫洛托夫同志的这些话呢？斯大林的这些插话呢？不，这当然不是动摇！而莫洛托夫动辄把人逐出党的威胁呢？不，这不是对活人的官僚主义的冷漠：一个人在党内或在党外不是反正都一样吗？莫洛托夫今天因一种原因“驱逐”，明天因相反的原因“驱逐”，用的都是这么强硬的语言。对莫洛托夫来说反正都一样，把一个人驱逐出党还是不驱逐，党“灭亡”还是不“灭亡”——都是小事一桩！没有任何动摇！

“朋友们，你们是否说说，什么时候我来这样做？”

我们来继续分析“非常坚强”、“从不动摇”、“极其坚定”的人的“彻底性。”

大家知道，在托洛茨基反对派 15 大政纲中有如下建议：

“资金从哪里来？……

(2) 为了增加出口，从约占农户总数 10% 的富农和富裕阶层的实物储存中征借不少于 1.5 亿普特的粮食，在 1926~1927 年度这种实物储存已经达到 8 亿~9 亿普特，并且大多集中在上层农民手中。”

托洛茨基反对派是这么说的。在党的 15 大上莫洛托夫同志反对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建议说：

“正是反对派的这种敌视中农、敌视同中农联盟的思想，正是这种思想促使它提出强行征借的建议。

然而这一‘征借’的建议直接破坏我党的全部政策，破坏整个新经济政策。因此，今天谁向我们提出这一强行征借的政策，哪怕是从 10% 的农户那里强行征借 1.5 亿~2 亿普特的粮食，即不仅向富农，而且也向农村部分中农阶层征借，不管他提这样的建议用心

多么好，他都是工人和农民的敌人，工农联盟的敌人……（斯大林：对！），他都是在摧毁苏维埃国家。”（联共 15 大。速记记录，第 1091 页）

这样，莫洛托夫同志在这里“彻底”“坚定”地声明：1）非常的实物征借破坏新经济政策；2）不管这种建议提出者的动机如何，他们都是工农联盟的敌人；3）他们都是苏维埃国家的摧毁者。

斯大林同志也“坚定”“彻底”地完全赞同这一切。而现在在我们这里“非常措施（这比为了出口向富农征借更坏！）正在变成常规，我们这些微不足道的人请求不要忘记新经济政策，我们却受到侮辱，说‘你们干吗把我们拉回去’”这是不是动摇？瞧，莫洛托夫同志过于热心的公式把他引向何方：他现在必须把自己驱逐出党，宣布自己是新经济政策的破坏者、工农联盟的敌人、苏维埃国家的摧毁者。莫洛托夫同志以自己绝对的、“极端坚决的”公式置自身于极其“尴尬的”处境。

在非常措施问题上他也置自身于这样的处境。在中央和中央监委 7 月全会上莫洛托夫同志在作粮食收购运动的总结时说：

“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些措施（即运动的准备措施。——尼·布·）或者采取得迟了和在这方面做得太少，那么我们事先就会看到，这有导致重新采取非常措施的危险，会使对农民结合的威胁成为完完全全的现实。”（速记记录，第 2 册第 127 页）

他在谈到安德列也夫同志在 7 月全会上的发言时重复了同样的东西。莫洛托夫同志在发表于 8 月 5 日的《真理报》上的文章《论当前形势》中写道：

“采取非常措施，把它当做农村长期的或者经常的方针，这就意味着放弃同中农的联盟，以托洛茨基的对中农施加暴力的政策取代列宁主义的政策。”

奥尔忠尼启则：那你是怎么说的？

布哈林：这样，非常措施制度在这里被确定为背弃列宁主义，是托洛茨基主义。而这些同志现在是怎样发展“理论”的呢？啊，现在这些人忘记了自己的昨天，一本正经地说，非常措施并不那么坏，那么危险，因为它推动我们的机关开展活动；因为它似乎把农村所有的阶层“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现在一种臭名昭彰的“理论”在党内获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这就是越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我们遇到的困难和矛盾就越多。这一理论是斯大林同志在7月全会上提出来，而古比雪夫同志加以特别发挥并天才地予以“深化”的。我认为，这一“理论”混淆了两种全然不同的东西。它把某一短暂阶段（我们现在就处于此类阶段之一）同发展的一般进程混为一谈了。它把目前尖锐化的事实本身变成我们发展的某种不可避免的规律。根据这一奇怪的理论得出结论，我们越是朝社会主义前进，就会遇到越多的困难，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而到抵达社会主义大门之时，我们显然应当或者发动国内战争，或者饿死战死。

卡冈诺维奇：不要夸大古比雪夫同志的发言。（喧哗）

布哈林：同志们，听我说。不要激动！

这一“奇怪的”（说得轻一些）“理论”，如我所说，被古比雪夫同志“成功地”深化了，看来，他从自己的经济工作经验中懂得，应当如何加剧阶级斗争。9月19日古比雪夫同志在列宁格勒积极分子会议上是这样谈论阶级斗争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越有成就，国内外敌对力量的反抗和对抗就会在越大的程度上增长。

阶级消亡（我们整个发展的最终结果）应当、自然也将在尖锐化的阶级斗争的局势下进行。”（1928年9月19日在列宁格勒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真理报》9月25日）

这样，由古比雪夫同志补充、加深并提到高级阶段的这一理

论，宣布了这样一个论点，阶级的消亡越迅速，阶级斗争就将越尖锐，显然，阶级斗争的火焰将在已经没有任何阶级的时候燃烧得最旺！（笑声）这也属最近许多“发现”之一，遗憾的是，它们已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我们的政策……

索尔茨：在某个阶段。

鲁祖塔克：而你是根据什么理论去找加米涅夫的呢？

布哈林：……由于理论是同政策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不是玩具，也不是解闷逗乐。这些绝顶聪明的理论已在政策上有所反映，它们把我们导向我们在粮食收购、谷物经济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所遇到的那种奇妙的实际结果。

不过，同志们，我在这里请你们给予某种特别注意，因为你们现在将听到米高扬同志有关这一问题的富有预见的声音。大家知道，在同托洛茨基分子争论的时候，米高扬同志谈过这一理论。下面就是米高扬同志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同皮达可夫争论时所说的话。米高扬同志说——我恳请你们仔细听听他的话：

“他（皮达可夫。——尼·布·）的下一个提法非常重要，好像是偶然从皮达可夫同志的嘴里蹦出来的，但却很能说明反对派的整个方针。皮达可夫同志一字不差地说了如下的话：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的矛盾也将增长。这就是他的提法。

皮达可夫：完全准确。

米高扬：谢谢你证实转述的准确性。皮达可夫所叙述的论点确认了存在这样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不允许进行任何社会主义建设，预先就决定了我们的发展进程确实是热月的进程。我们在建设什么？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减少矛盾，完全消灭矛盾。如果我们是在走向社会主义，那么随着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步伐矛盾将变少，如果还会有矛盾，那么它们将不会那么深刻，然后阶级将消失，我国内部的所有矛盾也将随之消失。而如果我们不是走向

社会主义，如果我们走向热月，即走向资本主义，那不管我们先前走多远，矛盾将越来越尖锐，阶级斗争也将越来越尖锐，等等——按照皮达可夫同志以及整个反对派的看法就是这样。

皮达可夫：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呢？

米高扬：国内的矛盾不是越来越尖锐，而是越来越减缓，因为社会主义成分将越来越多地压倒资本主义。当然如果你们说的是资本主义世界同苏维埃世界之间的矛盾，那是正确的，但这里说的是内部矛盾，是我们国家及其经济内部的矛盾。你们的论点是建立在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的矛盾也将增长之上的。这个论点是绝对不正确的，你们露出了马脚，因为这不是通过消除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而是指靠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在反对派的这一方针下隐藏着真正的热月危险。”（中央和中央监委全会，1927年8月。速记记录。第3册第118~119页）

好，请吧！谁让谁露出了马脚，米高扬同志？从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角度怎么看斯大林—古比雪夫的现代“理论”呢？

奥尔忠尼启则：这不是15大之后吧？而雅罗斯拉夫斯基是在15大之后做报告的。

布哈林：不，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用玩笑是躲不过去的。不，我不玩做有暗记的牌！这样，被皮达可夫同志以及整个托洛茨基反对派所鼓吹的东西，被米高扬同志批判为指靠热月的东西，被他叫做指望资本主义发展的东西，现在斯大林同志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加以鼓吹，尤其是被古比雪夫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天才地予以深化了。如果从我们反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看，这又是什么呢？这是思想上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全面投降。

罗季特：对。

布哈林：我接下去说，当然，发展的经常趋势是一回事，阶级矛盾的暂时尖锐化则是另一回事。有人指责我们，似乎我们否认阶

级斗争尖锐化的事实。谁否认这一事实了？相反地，倒是有人不想告诉我们关于阿扎尔斯坦暴动的事实。^① 但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想向我们隐瞒此事，想抹杀这一事实。但我们还是知道了，我们公开说，这就是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这是无可争议的，这是事实。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现在又向农村通讯员开枪等等，这也是事实；我们应当给予反击，这也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这一切是非常清楚的。但是把阿扎尔斯坦的暴动拔高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并且是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12个年头，如果我说得不对，就让上帝打死我，在古比雪夫同志看来这也许是成立的，但依我看来，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笑声。）

我还可以援引不止一条说明如此明显矛盾，如此鲜明“彻底性”的引文。在这以后这些“不动摇的”同志来找我们并声明：“我们坚如钢铁！我们硬如斧头！”难道这不是对现实的真正侮辱？

这些例子已经足以说明，至少在“理论”王国这里有什么东西腐烂了。而这是不能闹着玩的！

现在我还想说一位同志，这就是莫斯科组织的现任领导人鲍曼同志，昨天他在这里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例如鲍曼同志在合作社理事会第5次会议上所作题为《粮食合作社的任务》的报告。（刊于1928年12月7日《真理报》）鲍曼同志在这里说：

“我们应当通过订购把全体农户，包括富裕农户纳入计划经济轨道。对富裕农户来说订购是农村国家资本主义的特殊形式。它在农村应当成为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成分，使之服从计划经济的手段。”

鲍曼建议对“所有的村社和农村实行订购”。^② 他说：

“农村的富农上层不得不服从贫农和中农的多数，根据国家的

^① 指1929年3月在阿扎尔发生的农民武装暴动。

^② 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订购和计划来生产商品粮。”^①

是否需要向富农订购，可以争论。可以就此争论，也许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恰当形式（我个人对此有怀疑，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既然没有钱可以贷给集体农庄，为什么还要贷款给富农？）。不过，同志们，请想一想，如果使用现在通行的争论方法，其中包括鲍曼同志所使用的争论方法，那么关于鲍曼同志的言论能说些什么呢？可以说，鲍曼同志支持富农；可以说，鲍曼同志把人民的钱花在富农身上；可以说鲍曼同志在经济上指望富农；可以说，鲍曼同志忘记了同富农的斗争；可以说，鲍曼同志到底指望什么……

鲍曼：我说了，需要使富农服从，要限制他们。

布哈林：是的，要使富农服从并予以限制，但不是通过把人民的钱发给他们的办法！！

现在说一下斯大林同志。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同志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讲话中说：

“在我们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上，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反对派企图破坏党的这个政策，提议用一种实际上剥夺富农的政策、恢复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政策代替这个政策。实际上这是重新在农村中燃起内战的政策。”（斯大林《论反对派》第738页）^②

在同一个讲话中斯大林同志还谈到安定农村的必要性：

“党坚定不移地采取了同中农建立巩固的联盟和孤立富农的路线。党这样做获得了什么成就呢？党获得的成就是：安定了农村，改善了同基本农民群众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使贫农组织成为独立政治力量、使富农进一步孤立、使千百万个体农户逐渐被国营机关和

^① 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0页。

合作社机关所掌握。安定农村是什么呢？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之一。在土匪骚扰和农民暴动的情况之下是无法建设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论反对派》第739页）^①

一个月以后的11月23日，即15大前夕，斯大林同志说：

“列宁说，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同基本农民群众一道前进。可是反对派不同意这一点，硬说我们不应该同农民一道迈进，而应当同他们闹翻。”

“实行同多数农民闹翻的政策也就是在农村掀起内战，阻碍我们以农民生产的原料（粮食、甜菜、亚麻、皮革、羊毛等等）供应我国工业，打乱工人阶级的农产品供应，摧毁我国工业的基础，破坏我国的整个建设工作，破坏我国整个工业化的计划。”（斯大林《党和反对派》，1927年11月23日在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第12—13页）^②

在15大前夕斯大林同志是这么说的，并且说得完全正确。不过如果斯大林同志现在想说服我们，包括我本人在内，说现在我们用非常措施的政策联合所有阶层反对富农，那么这是同上述方针绝对对不上的。这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另一种调子。1928年米高扬同志在联共7月全会上的声明怎么能同这种说法一致呢？他说：

“我们只有这种破裂的危险（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尼·布·），它还会加剧，如果排斥中农的事实还不断地继续下去，如果以后继续采取非常措施，这种危险必然还会存在。所以我们主张纠正这些错误，以便坚决取消任何非常措施，使这种危险不致加剧。”（第2册第143页）^③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170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19—220页。

③ 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米高扬：对。现在也应当竭力做到。

布哈林：关于这一点我以后还要对你说：“秋菊春桃，物各有时。”

这就是政治肖像的画廊。这一切是否存在“彻底的”“统一的”路线？这里是否有“铁的”逻辑？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思想多么强烈地影响这些“坚强的”同志？实际上这不是思想上的极端混乱吗？我认为，说得轻一些，这正是思想上的极端混乱吗！

奥尔忠尼启则：那时候这位理论家在哪儿？

鲁祖塔克：那时他在同加米涅夫谈话和打哈欠。

布哈林：是的，我同加米涅夫谈过话。我还尝试写《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并且知道了，“可以”怎样写文章，“可以”怎样纠正某些东西！

现在，同志们，我要转入某些尖锐的思想—政治指责，这是针对我们，首先是对我本人的。在反对我们，其中也反对我的斗争中，卡冈诺维奇同志昨天从托洛茨基的垃圾堆中搬来了关于布哈林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污蔑之词。请允许我说一下，这一“指控”最初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提出的。（见托洛茨基反对派提交联共15大的政纲）我必须声明，“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语在我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一本小册子、任何一个报告中都是找不到的，并且这些词按照托洛茨基一伙的命令都是加上引号的。这个说法甚至获得了合法地位。我所说的政治死刑所敲的鼓声全都是以这一粗暴的谎言为“依据”的。不很久以前，仅仅几天以前，米高扬同志在评论李可夫同志的提纲时也谈到这一点，并用了加引号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一语。我起先口头问他，是从何处找来这一词组的。后来我向他书面提问。我这里读一下给米高扬同志的信：

“尊敬的同志：

由于在你对李可夫提纲的评论中提到似乎是我的‘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且此词组还加了引号，请告知，这些词是从我的那本著作中引来的（务请指出版本页码等等）。

致同志的敬礼！

尼·布哈林”

米高扬：《到社会主义之路》。

布哈林：你曾口头回答我，是从我的某一报告引来的，现在你却回答说是在《到社会主义之路》小册子里引来的。然而，对书面问题你根本没有赐答。

奥尔忠尼启则：读一读，读一读。

卡冈诺维奇：读一读。

米高扬：他不喜欢读自己的东西。

布哈林：我读一下我真正写的是什么。但我不喜欢别人乱喊乱叫，妨碍我说话。还是得请你们安静下来，不要一片惊慌！（笑声）卡冈诺维奇同志，不要用大声干笑来掩饰自己的窘态！（笑声）

昨天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也提出同样的指控，他在犯罪现场被逮住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污蔑有什么根据呢？顺便说一下，我还是得向在这里参加“轻率”争论的所有可敬的同志们说一下：这本小册子写于1925年；就是说，我那时是极右倾的化身？那么为什么你们那时给我加上那么重的担子？而关于右倾却不置一词呢？

奥尔忠尼启则：那时你抛弃了这些错误。

布哈林：不，我没有抛弃这些所谓的“错误”，小册子后来还

多次再版。如果那时你们自己真的相信现在的这些废话，“那就会高喊救命”，这本小册子就会被抛到它该去的地方！但我不想“把问题复杂化”。还是回到被打断的思路上来。

托洛茨基分子从我的小册子中摘引了什么，某些同志向他们学到了什么？依我看，总的说他们从托洛茨基分子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在这一问题上也学到了东西。他们在这一问题上向托洛茨基分子学到了这样一些东西，开始按照托洛茨基分子的小抄重弹反对我们的伪造的攻击之词。他们按照托洛茨基的方式以我现在宣读的那些地方作为依据，这些地方卡冈诺维奇同志昨天在这里也引用过，但故意不把引文读完。我是这样说的：

“因此，我国基本的农民合作社组织网将不是由富农式的而是‘劳动’式的基层合作社细胞构成，这些细胞将长入到体系中去。”

卡冈诺维奇：长入体系？

布哈林：等我读完，卡冈诺维奇同志，我不像您，我不拿引文弄鬼，卡冈诺维奇同志！

卡冈诺维奇：这么说您同加米涅夫弄鬼。

布哈林：关于加米涅夫，我也要说的，您会看到，谁跟谁弄鬼！“长入到我们的一般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去，并通过这一途径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单一链条中的环节。”

（鲁祖塔克同志的插话听不清）

鲁祖塔克同志！大家都知道，当你看到多数站在哪一边的时候，你是奉公守法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笑声）

接下去是：

“另一方面，富农合作社的窝巢也将会通过银行等等同样长入到这个体系中去”……

卡冈诺维奇：什么体系？

布哈林：我们的国家和合作社机关体系。

卡冈诺维奇：对不起，说的是社会主义经济。

布哈林：“不过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将是……”

卡冈诺维奇：某种程度上！

布哈林：“……异物，例如像租让企业那样。”这就是1925年我在小册子中所说的！（喧哗）

请允许我回答所有的问题！请稍安毋躁！你们说，布哈林在这里——啊，真可怕！——允许“同资产阶级合作”，同富农合作，他竟允许有富农的合作社窝巢，哪怕是异物，但毕竟在这总体系中活动、存在和起作用……

奥尔忠尼启则：它对不对？

布哈林：等一等！我说我所想的！我认为，中央监委主席必须保持最大的冷静，尽管他有其南方人的气质！（笑）

奥尔忠尼启则：我认为可以向共产国际总书记提问题，尽管他在政治上已经破产。

布哈林：请用书面提问题，以后如果我有发言的机会，我会回答的。

奥尔忠尼启则：迄今为止我们认为也可以不用书面形式提问题。

布哈林：你是在妨碍我发言，打断讲话，就如你旁边的朋友那样！

插话：旁边的人没有说话。

布哈林：我必须就此说一说：政治局是否作出过允许富农参加一般合作社网（但不给他们选举权）的决定？我肯定，这是政治局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我们也允许富农参加合作社网。我们自己在政治局作出了这一决定，而我不能取消政治局的决定。

莫洛托夫：不过也不能歪曲。

布哈林：我也不能歪曲，我可不是莫洛托夫，他可以今天赞成

这个，过后又赞同相反的东西！

当然这是同资产阶级进行某种合作的一定形式。现在某些人为此而歇斯底里大发作。不过，让我们回忆一下列宁的说法，他在确定我国的阶级结构时说：我们目前的制度是建立在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合作之上的，在一定条件下也允许资产阶级参加这一合作。列宁说过这点没有？你们为什么要用这来责备我？

或者你们想既允许资产阶级，又要他们处在国民经济之外？也就是完全处于国民经济之外？你们这不过是在玩玩具！这是小儿的童话。这是苏兹达利的拙劣绘画！

有人说，在我的小册子里（一本旧的小册子，现在根据托洛茨基的忠告就这本小册子发出喋喋不休的议论！）似乎只字未提阶级斗争。但这是更为无耻的污蔑。我不想再念引文了，这里只指出页码：第46—47、53、59页以及其他各页，国家出版社第2版。想弄清问题的人可以自己去看！

现在我想立即谈谈针对鄙人及亲密的政治朋友提出的所有美妙的思想和政治指责。

伏罗希洛夫：你有自己的政治朋友！这怎么理解？

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同志请闭嘴！

我想把反对我的所有指责集中在一起。

插话：说说资产阶级。

布哈林：请安静！请等等！我一切都要谈的，我还没有谈到资产阶级，还有许多东西都没有谈。但不要以为我不懂得这些喊声的辅助意义，想把我搞糊涂，你们是办不到的！我想把反对三人，其中也反对我的所有政治指控集中在一起，指控很多，我试把它们编成一个清单。请听一听这张清单：

1. 对工业化估计不足；
2. 不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强大的工业才能改造农民；

3. 不懂得在农村的支柱和社会基础是贫农和雇农，反而指靠富农；
4. 不懂得农民经济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对富农估计不足；
5. 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
6. 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他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

你们瞧，相当广泛的清单。

卡冈诺维奇：对你来说，清单是对头的。但还不全。

插话：关于德国党。

布哈林：“关于德国党”，这是另一个问题。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很在行地宣称我这清单是“对头的，但还不全”。好吧，我应当在这里声明，我所宣读的这几条，几乎逐字逐句摘自托洛茨基给联共 15 大的政纲。托洛茨基的政纲同现在对我提出的指责竟有如此奇怪、如此可疑的“思想上的一致”！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这全都是从托洛茨基政纲中读到和抄来的，在那里这些指责不是针对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而是针对全党的。托洛茨基反对派在列举这一清单的时候写道：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是沿下列最主要的路线进行的：”（以下便是我念过的“指责”的汇集）。

反对派写道：“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同我们国家机关的某些环节纠结在一起，他们依靠官方方针中的这些修正主义倾向，公然要把农村政策扭向资本主义道路。”

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央和中央监委禁止散布反对派政纲？难道不是因为这缘故，它被宣布为反党政纲，难道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联共 15 大认定赞同此纲领的人不能留在党内？

所以你们看到，昨天在全会上卡冈诺维奇同志所表演的“绝顶聪明的最主要的根源”就是托洛茨基的政纲。现在当重复所有这些无谓的思想，所有这些托洛茨基的污蔑之词的时候，没有援引任何

东西，如果引用的话，引文也会在最有意思的地方中断。这表明，说得轻一些，是……某种“思想上的犹豫不决”。

同志们，总的讲，我完全不理解目前的讨论方式。如果需要同人争论，同他们谈话，弄清什么问题，等等，那就应当立足于争论对象的口头或书面声明，而不是捏造。例如，难道可以指责我们反对工业化，反对所采取的速度？我们赞同工业化，我们赞同所采取的速度，我们赞同提出的计划，这要说多少次才行呢？我们就此声明过多少次！而大量的污蔑不实之词滚滚而来。我这是最后一次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说话。我们在争论中，在搏斗中有时难免相互使用激烈的言词，但难道不能遵守最起码的规则，不要互相倾倒明显的废话？而除了发言、声明和文章之外，你们还有哪些反对我们的论据？而如果比如说，我是古比雪夫即经济工作者，那我还会有可能说一套，做一套。那时还需要检查工作。但我的全部活动不是就是说就是写。你们根据什么把在文章中，讲话中所没有的东西强加于我？你们大谈杜撰的谎言，依据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谁需要？如果从党的利益出发，谁也不需要。我们赞同集体农庄，赞同国营农场，我们赞同伟大的改造，我们赞同向富农坚决进攻，要作多少次这样的声明才能最终中止对我们的诬告呢？你们是否记得，在15大上莫洛托夫因“加紧进攻富农”的口号而从右边批评过我？我在什么地方放弃了这一口号？请对我说！然而，正确贯彻加紧进攻富农的口号是一回事，而用可以说是“聪明”的办法贯彻这一切，则是另一回事，其结果完全相反——贫农无面包可吃，城市缺粮，中农动摇。现在需要的不是大喊大叫和施加压力，而是头脑和计算。现在需要懂得局势的复杂性。经济政策的复杂性。我们需要什么？金属还是粮食？这样提问题是荒谬的。而如果我说，既要金属，也要粮食，就会对我说：“这是折中”，“这是二元论”，不，你一定得说要什么，是金属还是粮食，否则，你就是支吾搪塞，就是

玩戏法。

莫洛托夫：多么左的布哈林。

布哈林：“戏法”不错！请试试取得金属而没有粮食，请试试播种粮食而没有金属！使我们面对蒙昧无知的问题提法，这种提法只适于少先队员，而不适于经济政策的领导人。

同志们，现在我来谈我们经济政策本身的问题。

目前需要把什么突出在第一位？当然是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五年计划。

实现这一计划是一个巨大的建设任务，要动员我们的所有力量来齐心协力地提出并解决这个巨大的任务。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彻底理解和思考这样一个真理，即我们必须以目前的经济状况作为出发点，来解决这一任务。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制订大型的行动计划，对我们来说，重要的还在于拥有阶梯，可以沿着这个阶梯登上大型经济计划的社会主义顶端。我们需要这一阶梯的各级台阶不是腐朽的，我们不会随之倒塌；相反地，我们要沿着这些坚固的台阶越登越高。

因此当我们在谈论实现摆在我们面前的五年计划的时候，我们必须以目前的经济状况为出发点，记住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乃是本经济年度。我们正是应当以本经济年度为出发点，无所畏惧地分析我们所面对的远非美好的局势。（来自主席团的插话听不清楚。）在发言时间问题上我打算满足同志们的愿望，但不知道能否做到？同志们，你们完全清楚，主要矛头是针对我的。

奥尔忠尼启则：应当让不想争吵的人多讲。

布哈林：我可以完全走开。

伏罗希洛夫：为什么，说下去！

奥尔忠尼启则：我们听得非常认真。

布哈林：我知道，任何一种东西都有不同的用途。

柯秀尔·斯坦：任何谜语都有谜底。

布哈林：那又怎么样？

同志们，现在我来分析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以便采取在我看来解决某些经济任务的必要办法。

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所谓经济困难的基础，就在于基本的经济比例遭到某种破坏，首先是破坏了工业和农业之间正常的相互关系。我在这里要着重强调，出现这种局面不应理解为我们采取的工业发展速度太快了。前一段时间也许可以这么看。最近的分析表明，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今后的速度，即我们所采取的速度，也许还可以再快一些，——我们能够发展，但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即如果我们能够使作为工业基础的农业得到发展，城乡之间有很快的经济周转。

与此同时，由于迟迟不实施某些措施而造成的我们的一系列错误（我认为，属于此类毛病的有：不灵活的价格政策，过去改革前对农业税的过度征收，政策常变，实行非常措施——这在第一轮是被迫采取的，也是先前的错误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禁止商品流通），农业，其谷物部分没有增长，反而减少了——粮食征收的总量减少了。我在这里重复并强调，是因为这一提法极为重要：问题根本不在于我们无力实行我们所采取的建设速度；它引起极大的非常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对基本农民群众缺乏足够正确的态度。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做某些改变（关于这些改变我下面还还要谈），那么我认为，我们就会使伟大建设的五年计划成为完全现实的，不仅可以实现，而且是有保证的。

我想谈一下我是怎么看待我国的经济困难进程的。“困难”不是经济学名词，但这是我们大家都在使用的名词，是公认的名词，所以我也就这么用了。

对不断扩大的困难可以这样分析：近来基本建设的大量花费

(工业，电力，住宅建设，市政建设，仓库业，等等)，是在对农业的许多部门特别是对其谷物业极其不利的情况下投入的。我们目前困难的起点就在这里。后来越来越增加的困难的初始阶段表现在何处？表现在我们没有关心我们谷物业的状况，在我们这里，1) 在农业税方面，谷物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2) 在价格方面，谷物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3) 在农业的各种价格和工业价格间的相互关系方面，谷物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4) 在农业生产的不同部门之间的价格对比方面，谷物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就是说，就所有的基本渠道而言，谷物业都处于最不利的地位。而由于我们这里我们的计划调节作用不那么强有力，不足以把农民经济（即无数的，两千万农户）直接纳入本义上的计划轨道，所以我们这里出现某些生产力从谷物业向别处转移的现象。农民或者不按他所能扩大的那样去扩大耕种面积；或者用谷物去喂养牲口，而不用于播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改种其他作物。这一生产部门陷入了最不利的境地。这不意味着“绝对”不利。起作用的是相对的数字和相对的量。正是这一状况成为所有其他状况的出发点。

因此，出口的重要项目之一，农业中的谷物业实际商品价值下降了。我们必须以确定不移的，几乎是铁的逻辑（虽然我们有时没有感觉到），哪怕是自发地提出下降的粮食出口的替代品问题。可以用什么来替代呢？暂时可以有两种办法：动用我们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发行纸币。我现在不提在那种局势下做得对不对的问题。我认为，我们那时是半自发地卷入的，但我们卷入了，这是事实。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没有看清谷物业的现状，在一定的时间里是靠动用储备和纸币发行税来维持工业化的。

加里宁：15 大上看到了谷物的不足。

布哈林：问题可以这样来表述：我们走向了不可避免的困难，而不是在过去几年重视谷物业的状况，在牢固而不是摇晃的基础之

上，在1~2~3年会获得大规模的加速度的建设，不是拥有稳固的国际经济地位，有良好的外汇状况，有黄金，有储备，有出口顺差和国际贸易平衡，有稳定的外汇并有平稳过渡到自然的外汇平价的前景。同志们，困难最清楚地表现在我们在一段时间里据以前进的那些后备消耗殆尽的时候，那时我们看到不能这样继续走了。这个时刻也就是最困难的时刻。既然出现了这种状况，既然这些困难成了客观事实，我们就陷入了第一轮非常措施。

插话：问题就在于你袖手旁观。

米高扬：好一个预言家！

布哈林：依我看，你米高扬同志是一个糟糕的预言家。我看到，你在同皮达可夫争论时预言得多么棒！

（米高扬同志的插话听不清。）

米高扬同志，我可以对你说，看来你对希腊哲学家和犹太预言家的个人不太熟悉，但对你不懂这些范畴我是没有责任的。

插话：这意味着预言家的粮食收购工作做得很糟糕。

布哈林：关于预言家问题我要说一下，当我问米高扬同志莫斯科的粮食状况如何，他解释说，这“没什么”，这是因为人民吃得太多了。

米高扬：不要撒谎。

布哈林：当我在11月全会前夕问米高扬同志秋播全部耕地的状况如何，米高扬同志说：“你惊慌什么！农民以极高的热情打着灯笼在连夜耕种！”而实际上秋播的土地减少了好多。所以谈到预言，不管谁的母牛在叫，反正你的母牛是不叫了！

米高扬：我们要完蛋，总是叫唤我们要完蛋。

布哈林：我一次也没有说过我们要完蛋。

米高扬：怎么没有说过？没对皮达可夫说过，没对加米涅夫说过，没对我说过？

布哈林：我不知道是什么。

米高扬：没说过？

布哈林：什么完蛋？我说过，你很卖劲地想做到这一点，但你毕竟无法毁灭之。（笑声）

所以同志们，如果我们的巨大的经济困难的起点和基础是工农业之间的不正常的比例关系，如果对以大量中农户为代表的农业的生产刺激受到压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出现当前生产资金的短缺。

（伏罗希洛夫同志的插话听不清。）

军事部门历来是纪律和秩序的模范。

没有粮食出口；我们不能从国外购买足够数量的原料和设备。一切都不够，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新建设项目和日常生产、大修和周转资金之间的资金分配只能处于如下状态：用于消费市场 and 用于农民生产市场这两种市场上的商品都缺乏。这样只好开辟另一个来源：为进口而出口，我们不得不削减消费（出口消费品），这就更恶化了粮食市场的状况。我觉得，我们的经济困难的机制就是这样运转的。这个过程的各种因素沿着无穷的螺旋线互相影响，互相缠绕，而问题在于……

鲁祖塔克：正是互相缠绕。喏，绕吧，绕吧。

布哈林：你认为，这很俏皮？

鲁祖塔克：绕吧，绕吧。

布哈林：我可以完全不讲，鲁祖塔克同志！

斯大林：别理会插话。

乌加罗夫：让他讲。

布哈林：他们对饥荒问题，对群众的苦难的态度非常“认真”。他们非常认真地对待！

米高扬：你不再感到痛苦了……

布哈林：他们当然对认真讨论这些折磨人的问题“非常感兴趣”。（笑声）

奥尔忠尼启则：除了你和乌加罗夫，谁也不干此事。

布哈林：你为什么打搅？哈哈大笑和打搅！

奥尔忠尼启则：瞧，连笑也禁止。法律并不禁止笑。

布哈林：我知道，谁也没有禁止你打司机的耳光。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同志们，如果可以把农业状况归结为一点的话，那么可以这样来表述：现在小商品生产者从卖粮者变成了交粮者。因此破坏了结合的基本形式，而它在长时间内还应当是我们的主要形式，决定性形式，这就是市场联系的形式。由于卖粮者越来越多地变成交粮者，而出售变成了国家贡赋（交纳），所以粮食也越来越多地从商品变成贡赋的对象，同时变成货币的代用品和积累的手段。因此它开始消失，因为它变成了“统计数字”。而在这时候，“机关的开销”和取得粮食的花费也随着市场联系的消灭而剧增。收集到的每一普特粮食的附加费用急剧上升——特派员的开支，各地巡视以及所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有其经济方面的问题，有其经济上的“附加费用”。配给原则，摊派原则（随便怎么叫都行），过去和现在无疑都在使生产基地继续缩小的危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作用，它在城乡周转中的作用下降了，并且还在下降。紧接着的是，既然这一杠杆的作用削弱了，那就继续加强压制，采取直接的行政命令措施，直接施加压力。这里也是一环扣一环的。这正是新形式的“非常措施”的根源：所谓捐献、抵制以及一系列其他新的（公开的或隐蔽的）非常措施。

缩小秋播的耕种面积是形势尖锐化的一个警报，众所周知，大约减少了3~4%。我认为，减轻农业税会是纠正现状的一个重大

步骤，不过我必须公开说出来，政治局的进一步决定^①，即一些同志在西伯利亚、乌拉尔和哈萨克斯坦谈论过的实行新的非常措施（其中包括实际上对中农的强制摊派制），使形势急剧恶化了。不能这样来摆脱目前的困境。

我想在这里指出，依我看，怎样在总计划，总路线（当我们说总计划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框架内摆脱目前的经济困难。波斯特舍夫同志说什么“戏法”，说不直接回答，等等，而其他同志也在重复这些话。然而问题并不像“头脑简单的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如果认为总路线和总计划就是我们现在的五年计划（这里包括这一计划的全部基本组成部分：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工业化速度），你们问我：“你赞同这一总计划吗？”我的回答是：“我百分之一百赞同。”

斯克雷普尼克：那你为什么反对？

布哈林：斯克雷普尼克同志，我以后来说这一点，我什么都有，为什么会这样。

我赞同这一总计划。不过，同志们，问题在于怎样使这一总计划得到执行，为实现此总计划应当做什么。我觉得，在政治局多数和我之间在目前情况下是存在分歧，此分歧……

插话：是在少数那里，而不是多数那里有分歧。

布哈林：……可以表述如下。现在接下去需要做什么？政治局讨论过的五年计划提纲中有一个地方说，需要在新的结合形式下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我向政治局委员们建议（我先把建议提交委员会，然后提交政治局），把这一点改为两点。我的第一点是：

“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扩大由国家调节的城乡商品流转的基

^① 指 1929 年 3 月 21 日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加强粮食收购的措施”问题。

基础上，加强工人阶级同基本农民群众的联盟和无产阶级在这一联盟中的作用。”

第二点：

“鼓励和发展工业和农业之间，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之间结合的新形式。”

我修改的意思是希望重申新经济政策和扩大商品流转。有的同志会说：“你想退回到1921年新经济政策初期的状态，而我们应当向前看。”对此我表示反对：如果我们拒绝谈扩大商品流转，拒绝重提新经济政策（尽管我们在上次全会上还提到过），而来表述同农村的联系，完全在“新的结合形式”（这首先是订购）的基础上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那我们就会陷入极端片面性之中。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似乎只能立足于一种新的结合形式，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这正是我们现在产生分歧的根源，对这些分歧我在这里正在认真地进行分析。那么，在五年计划的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方针的根源是什么？我是这样看的（也许我错了，以后发言的同志可以纠正）。我觉得，同志们对不经过市场关系影响基本农民群众的可能性估计过高了。我可以这样来表述：他们过高估计了直接影响小农和最小农的可能性，他们跳跃到我们经济关系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去了。正是跳跃。有同志说，这同新经济政策无关。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什么呢？关于这问题我们争论过不止一次，但据我所知，在政治局委员之间没有任何分歧。我们是完全一致的；在讨论共产国际纲领的中央全会上，我和斯大林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我不引我自己的话了。我读一读斯大林同志就新经济政策和军事共产主义所说的话。他说：

“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利用市场，通过市场，而不是以直接的产品交换，不要市场，在市场以外来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并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新经济政策是一切国

家社会主义革命必经的阶段。”^①

对！我对此百分之一百赞同。然而能不能从理论上一般地认定，我们已经可以超越此定义，即跳出新经济政策的阶段？依我看，不，远非如此。

插话：谁也没有这样建议。

布哈林：等一等。

插话：而你的建议是什么？

布哈林：我认为，远非如此！实际上，如果我们大家说，在国外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在英国，甚至在美国，我们都必须经过新经济政策阶段，那怎么用我们目前状况的尺度来衡量呢？

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市场联系的形式在我们这里还将存在许多许多年。我甚至可以说，市场联系的形式在许多年内将是经济联系的决定性形式。决定性的！**而如果是这样（请试试反驳，确定不是这样），如果是这样，那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什么？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社会主义的发展要通过市场联系，通过城乡市场商品流转，那就是说，我们经济中的结合形式的基本路线是市场路线，我们的主导的经济作用应是通过市场关系，即通过扩大商品流转。这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

斯大林：在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条件下。

布哈林：自然，在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条件下。对此没有任何争论。如果在关键地方发展要通过商品流通，那么请说说，起某些“非常”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在削减这种流转，从经济观点看是什么意思？从经济观点看，它们是极大的祸害，障碍了发展。就是这样。我们现在有一系列这样的“措施”（我不讲表现在什么地方，这我过去已经说过了），它们强行缩小商品流转，是一种直接施行

^① 《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28页。黑体是布哈林用的。

行政压制的形式，是施行直接行政影响和“命令”的形式。因此我们出现了非法的粮食市场，往往在森林里，在地下出售粮食，等等。这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东西？我认为，这是非常消极的东西。如果这是非常消极的东西，那为什么在决议中不说呢？为什么不注意呢？为什么不纠正这种状况呢？对此我怎么也不理解。只有在认为新经济政策已是根本过时的发展形式的情况下才能这样行事。

从15大开始，我们是否进入了某种新阶段？是的，进入了新阶段，但在什么意义上？是在新经济政策时代已经结束的意义上吗？是市场联系已经需要取消的意义上吗？不。只是在以下意义上我们进入了新的阶段，即由于我们经济命脉的发展，由于我们经济的发展，由于政治稳定性的增长，等等，从15大起我们得以比14大的决定走得稍微远一些。我们在发展订购方面能够往前走了；我们能够也应当加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我们应当开始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设，等等。这一切都对。我们是否应当“无精打采地”对待这一事业（这是某些同志对我们信口开河地提出的不公正指责）？决不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否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这—问题是近期内会结束的问题？不，这是今后多年的前景。因此不应忘记商品流转和贫农中农的个体经济。决不能说，这是“混乱”和“折中”；如果我说，新的经济联系形式的增长不能也不应当同扩大商品流转的任务对立起来，这不是“混乱”和“折中”。大罪孽大错误的根源就是这种反辩证法的对立。我们对所有这一切考虑得不够。我们没有充分地沿这条路线去纠正自己的政策。我们不善于把发展商品流转的任务同新的直接经济联系的发展结合起来。因此，我们越来越深地让自己遭受非常措施机制的折磨，妨碍经济发展，给自己制造不必要的困难。

同志们，我问你们，你们的前景如何？今后将会如何？很好，我们今天施展全部压制手段收购了供一天之需的粮食，但明天，后

天会是什么样的呢？今后怎么办？总不能搞只顾一天的政策！你们有没有摆脱现状的长期的出路？

插话：应当迫使把粮食送到市场上去。

布哈林：我知道这种争论的手法：比如，你说粮食收购的数字，会回答你：“奥，奥，奥，那你为什么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反对列宁？”（笑声。）这是非常不高明的手法。这种赤裸裸的“迫使”口号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有一个生动的例子足以说明。我从西伯利亚的一家报纸《劳动权力报》中引一篇文章，报纸在伊尔库茨克出版，它清楚地说明我们现在的状况。这是一篇署名文章，具有指令的性质。署名为卡拉巴也夫。这位卡拉巴也夫同志写道：

“对凶恶的囤积者——富农的抵制需要进行到底，把所有的社会组织和贫农中农群众都吸引过来投入抵制。”

下面是加着重号的：

“在居民自身不协助粮食收购员揭露凶恶的粮食囤积者的地方，要实行整村、整区抵制，要使在这些地区的消费合作社社员参加抵制。

在这些地区应当使住在该区的所有的人，而不是个别的人都参加抵制。参加抵制应当不仅仅是伊尔库茨克联社，还应当有所有消费合作社和国营商业。

全村或者消费合作社管区参加抵制的目的是什么？让各组织和全体居民参加揭发个别凶恶的拒交余粮者，影响他们，以做到不是在两三天里，而是在所有时间里都提高粮食收购工作的效率。”

接下去：

“整村和整区对个别拒交粮食者的抵制，是反对破坏城市粮食供应，因而也是反对破坏城乡结合的武器，只要不达到经常的目的，就应当认真对待。”（《劳动权力报》第65号文章《加强抵制，认真实施》）

我要说的是，有时候“结合”的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全体居民、整村以结合的名义实行抵制。通过有组织的散伙来实施的结合！这简直是疯人院！

沙茨金：这是谁写的？他是党员吗？

布哈林：既然在官方的报纸发表指令性的文章，那显然是党员。让瑟尔佐夫同志给我们作出权威的解释。你说，面对这种东西我们是否有责任说：“不要急，同志们，我们新经济政策毕竟还没有取消！”有人对我说，新经济政策是1921年开始的，我是在向后拉。但我是从刚才谈到的那种经济和政治疯人院往外拉，这就是我要拉的！不从这种地方拉出去，就会错过许多良好的机会，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我们是不可能完成任何五年计划的。按照这种做法，五年计划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变成一部写得很好的文学著作，仅此而已。

分析目前经济现实的困难何在？困难在于，在我们这里，我们前进的真正成分，我们经济计划调节的先进成分（它们在成熟，它们完全有希望，它们是从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中产生的），同“非常措施”的成分交错在一起，混合在一起，纠缠在一起。这就是现实生活状况。在党的意识中，在同志们的意识中这些成分纠缠混合在一起。比如说，订购和农村的抵制。订购同农村抵制之间是否有什么共同之处？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订购是好东西，订购推动我们前进，订购不是非常措施。

我认为非常措施同订购不是一回事。我断定，它们的经济性质和政治性质是绝对不同的。依我看，这次全会的任务应当是，我们要向全党清楚说明，引导我们沿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前进的东西（订购、集体农庄、国营农场、村际拖拉机站、国营农场对农民的帮助）是一回事，而应当摆脱、应当结束的“非常措施”，则是另一回事。应当把非常措施同多少直接影响农民经济的，经济上得到论

证的必要的合理形式区分开来。说来可笑，我觉得，15大提出了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因为15大没有把农村保持经济联系的进步形式和非常措施混为一谈。15大没有忘记扩大商品流转的任务，没有忘记合作社，等等。

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联席会议的决议向我建议：“抛弃弗鲁姆金，说你没有抛弃15大的决定”，这简直是笑话：这样写决议太可笑了。也不能这样对待老同志！你们大家是知道的，我在7月全会上谈了弗鲁姆金的“退回到14大”的口号。要知道，我提出了一个公式：“退回到14大”就等于“打倒15大！”

插话：不是你。

布哈林：不，是我！请查速记记录……

斯大林：关于富农的书面争论？

布哈林：我在回述我在全会上说的话，至于你在全会之前所写的东西，我并没有对你的荣誉提出异议！因此，我不理解（或者准确地地点说，非常理解），为什么要把问题说成似乎我有什么别的看法。我不认为从党的利益看玩弄这种严肃的东西有什么好处。

现在回到被打断的议论。

新的结合形式——订购、集体农庄、村际拖拉机站、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对周围个体经济的帮助，所有这些自然是我们近期的任务。但这一点也不取消新经济政策，即市场关系。而如果存在市场关系，那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刺激贫农和中农的经济。决不要把个体经济同富农经济混为一谈。你们把我们对贫农中农个体经济的关怀说成纵容富农。你们谈论加米涅夫……文件，然而加米涅夫文件也说要消灭富农……

斯大林：这怎么消灭？限制，而不只是消灭。

布哈林：是的，限制，但还要消灭。要限制，甚至排挤它。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同志们，需要限制它，并且我重复一

遍，比限制再进一步：要排挤它，方针是把它彻底排挤出去。

斯大林：不让它长入，而是排挤。

布哈林：不让它长入，而是排挤——完全正确，但不是通过“第三次革命”，现在某些人在转向这种观点。也不是通过托洛茨基的剥夺富农，就像现在许多“反托洛茨基分子”所希望的那样。至于长入社会主义的富农，那是荒唐透顶的，因为这种公式意味着在发达的社会主义里还有阶级，还有富农。怎么想都可以，但认为在共产主义下会有富农，这就犹如说在共产主义下会有尖锐的阶级斗争那样，是天才的发明。我决不想转向古比雪夫的观点。决不！为什么要把这莫名其妙的发明强加给我呢？

我说下去。如果关怀个体经济，刺激农民经济（贫农和中农个体经济）问题，与新的结合形式问题一起是极端重要的问题，那么关于新经济政策也可以并且应当这么说。因为，否则我们就会在另一端遭到失败：我们在一端建立自己的房子、梯子和横梁，而另一端我们给自己造成巨大的损失，削减商品流转，从而也减慢社会主义成分积累的速度。这里可以回想一下列宁在实物税的报告中所说的话：

“我应当再就个体商品交换问题讲几句话。

我们说流转自由，就是指个体商品交换，也就是鼓励富农。这是怎么回事呢？不要闭起眼睛不看这个事实：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就意味着富农在这种制度下会比过去有更大的发展。他们会在过去他们不能发展的地方发展起来。但是同这种现象作斗争不能采取禁用的办法，而应当自上而下由国家实行联合，由国家采取措施。如果你能给农民机器，那就能帮助他们发展，当你给他们机器或实现电气化的时候，几万或几十万个小富农就会被消灭掉。如果你还给不了这些东西，那就要给他们一点数量的商品。如果商品在你手中，那你就掌握住政权，而停止、割断和取消这种可能，那

就是取消流转的一切可能，就不能满足中农的要求。”（实物税。在第10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8卷第1册第133页）^①

我想，重温这些话对我们非常有好处。我们现在对富农采取的影响手段要比10大那时候坚决得多。总的说，我们大大成长了。你们记得，还在两年前我们有过私人资本问题，托洛茨基反对派用这个私人资本吓唬过我们。现在你们再看看这个问题。甚至都把它给忘了。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经济的和整个经济国家机关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其含义。总之应当立足于正确的估计，而不是对私有者的惊慌恐惧。

主席：还剩下多少？现在是3点钟。

布哈林：我请求换个时间接着讲。

主席：发言者请求把发言结尾部分挪到晚间会议去讲。谁赞成，请举手。请放下。

（休息后。——编者）

主席（李可夫）：布哈林同志发言。

布哈林：同志们！为了真正实现国家计委制定的五年计划需要做些什么，这是鲜明的工业化计划，其特点你们大家都是知道的。同志们，我这里故意强调后一点，因为我听到有同志说：“他赞同计划，但反对工业化。”

斯大林：对。

布哈林：也许这种对立在你看来是正确的，但依我看，这种对立纯属无知，因为五年计划是我国工业化的计划。如果从这一五年计划中除去工业化，那说的就是另一个计划，而不是提交全会审议的那个计划。

那么，从五年计划的观点看，从我国已经形成的经济状况看，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62页。着重号是布哈林加的。

为实现国家工业化需要做些什么呢？我觉得，从以上所述事情非常清楚，既然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所以我们面前的中心问题之一，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同提高贫农中农个体经济结合起来。同志们，我认为在目前，在相对严峻的历史转折关头，重温列宁同志的下述原理是有好处的。列宁同志说，在我们时代以前，许多社会主义者都遇到过把私人利益同公共利益、个人刺激同公共刺激结合起来的问题，而我们找到了这种结合点，首次找到了结合的具体形式，这就是我们叫做“新经济政策”的东西。^①这就是为什么关于把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设同发展贫农中农个体经济结合的原理，在贫农中农经济同我们工业以至整个社会主义成分结合的条件下刺激其经济发展的问題，是我们有效的经济政策的基础。

同志们，如果我们从大问题转向日常经济问题，即如果我们给自己提出完全具体的经济联结物问题，我们现在所需要的阶梯问题，以便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五年计划，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的问题，最折磨人的问题，非常复杂的问题，具有巨大的社会阶级和经济意义的问题，这就是粮食危机问题，粮食问题。

这个问题在不很久以前最后一次摆在中央，即我党政治局面前。像某些其他同志一样，我个人认为，作为某种初步的临时措施（我甚至想说得更清楚一些：是可以叫做非常程序的措施，但不是非常压制的意义），可以也应当提出进口粮食的问题。

插话：这是非常措施。

布哈林：是的，是进口粮食。我认为有些同志说得对：不是进口，就是非常措施。

我认为，如果掂量一下这两种办法——进口粮食还是继续非常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62页。

措施（政治局决定继续非常措施，我应当预先对你们说，不久后会再次向我们提出此问题），我认为，对我们比较有利的是进口粮食。

（主席团有人插话：关于什么？）

布哈林：我现在就说。这完全是具体的事务安排。

鲁祖塔克：不全是事务性的。

布哈林：鲁祖塔克同志，不要“太卖力气了”！我必须说一下，不太久以前我们还曾准许为远东进口 300 万卢布的粮食。这不是 5000 普特，但我们毕竟准许了，这里象白雪一样纯洁的“原则”动摇了。就是说，问题不是完全否定进口，我们可以来议论进口多少，到哪里去购买，价钱如何，期限如何，等等。

我断定，我们有可能用贷款来购买粮食（有过向我们出售粮食的建议）。我认为，从各种观点看，用贷款来购买粮食比实行非常措施对我们要有利一些。为什么？进口粮食对我们有什么坏处？进口粮食的坏处如下。对我们的坏处是，会有人说：一个农业国家却进口粮食。从国际地位看，这当然不那么好。就是说，这是我们的国际地位问题，这当然具有一般政治意义及其经济意义，它发出经济状况严重的某种信号。

不过，同志们，首先请告诉我，难道我们的粮食状况对国际资产阶级是个秘密？这一点秘密也不是！粮食收购进程不是秘密，购货本不是秘密，粮食困难不是秘密。而与此同时，不进口粮食我们会有什么损失呢？我们的损失是，同我们的全部保证相反，必须重新实施非常措施，使我们未来的前途急剧恶化。不很久以前，我们还大声宣布，我们将避免采取非常措施。我们面临削减秋播面积的事实。全党和所有苏维埃机关都竭尽全力设法扩大春播面积以弥补秋播面积削减造成的损失。我们做了一件改革粮食税的大事，这所有同志都知道，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向广大中农阶层保证不采取非常措施。而在大谈一通之后，我们实际上又在有望以春播弥补秋播

的那些产粮区实行非常措施。众所周知，我们在乌克兰食言了，在北高加索食言了，我们指望扩大春播面积的主要地区是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在这些地区，在我们作出全部保证之后，我们又实行了披着伪装的非常措施！

现在，让我们看看，那些不是出于对社会主义的热爱才同我们结成联盟的农民会作何议论。我们对他说：扩大春播面积吧，而他说：我知道，我扩大了，有一天会实行非常措施，会从我这里拿走一切。要农民提高技术改良种子等等，他会说：很好，我去提高和改良，而你们会来拿走一切。

雅罗斯拉夫斯基：得到我们帮助的农民不会这样说的。

布哈林：如果春播能弥补秋播，我会第一个感到高兴的，但我觉得，由于采取非常措施，我们不会出现这种增长的。我们不会得到这种补偿的。因此在来年农业的基础，秋播加春播，将比今年差。这是什么意思呢？开始了关于小白牛的童话：我们将在同一个圆圈里转——起初粮食收购状况良好，某些同志会说：“瞧，惊慌失措分子，一切都进行得很好”，就如莫洛托夫同志在编辑会议上所说的，而过十天半个月又出现下降曲线，只会比今年更坏的曲线。我们又出现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办，是进口粮食还是采取非常措施。于是又开始非常措施，不过是在恶化的基础之上。应当提出一个问题：**怎样走出这个怪圈。必须走出这个怪圈。必须跳出这个怪圈。必须爬出这个怪圈。**如果我们郑重地对待国家的继续工业化，那么我们首先关心的应当是怎样走出这个怪圈，用什么办法挣脱它。

当然，可以设想，一年间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会给我们提供一切。但这只表明不懂起码的算术。

斯大林：不，不是一年间。

布哈林：而我觉得需要这样做：需要建设国营农场和集体农

庄，发展我们社会主义自己的农业基地，向前发展，不过，无论如何要保证避开非常措施，它打击了中农阶层，并会最终打击到整个工业化事业。需要采用紧急办法保证有一定的机动存粮，其中包括通过进口，这要做些牺牲，削减某些进口开销；经过这些“火急”措施，继续实行基于坚决抛弃非常措施的政策。我认为，这是把事业推向前进的首要的和最根本的前提。同志们，归根结底你们应当明白，成为制度的非常措施（象我们大家过去所说的，象莫洛托夫同志过去所说的，象米高扬同志过去所说的）堵住了我们的所有出入口。

坚决抛弃伪装或不加伪装的非常措施，应当是我们政策的坚定不移的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新经济政策的体系。非常措施同新经济政策是相互矛盾的。非常措施就是取消新经济政策，虽然是暂时的，当然。作为制度的非常措施是排斥新经济政策的。

与此相联系，还存在革命法制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今年你用进口粮食来解决困难，而明年你用什么办法解决？

布哈林：我以后讲。我们需要“顶真的”、长期的、稳定的和经常的革命法制。经济要求有相当的立法和法律措施，如果法律遭到破坏，经济往往就不能发展。我们必须懂得，如果我们老是说“计划原则”、“坚决合理化”、“评估”、“农艺帮助”等等，尤其是在对农民说这些话，我们进行鼓动宣传，劝说农民更好地耕作，使经营合理化，进行成本评估，更好地计算，以便事先制定出自己的“草鞋”“计划”。但为此首先应当让农民事先知道，要从他那儿拿走多少，在什么期限内，按照什么样的日程安排，等等。

（回答莫洛托夫的插话。）我在说到发展的必要性时，说的不是富农，要跟你们声明 20 次?! 要记住这一点，你们并不需要多么好的记忆力!

总之，必须有革命法制。当我们自己向农民鼓吹用新的，较为文明的方法去经营的时候，农民现在需要革命法制，没有革命法制他是无法经营的。应当懂得，是我们自己在瓦解他的经济，不仅是从经济上，也从法律立法上，如果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后天又是另一样，如果事先不能预见，不能计算，那他就不能进行经营。他会逃出这一部门，到处乱跑：用马车拉脚，去城里当小工，到哪儿去都可以，只是不再去种粮食。要求革命法制不是偶然提到第一位的，我们需要革命法制，正是在改造时期我们迫切需要革命法制；它是我们建立某种稳定关系的前提，是繁荣贫农中农经济的某种框框的前提。我谈此事是因为在反官僚主义委员会上我投票赞同雅可夫列夫同志提纲^①，但我关于革命法制的修正案却被否决了。修正案的内容如下：

“恰当改造国家机关以及正确执行苏维埃政权的极其重要的前提，就是严格执行革命法制，存在国家机关和国家经济机关的所有环节都必须遵守的法规保持稳定。这些法规不断地变来变去，缺乏起码的稳定性，以及得不到严格的执行，乃是官僚主义胡作非为、机关人员变坏及其与改造时期经济需要不相适应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修正案被否决，被涂上特殊的政治调味品：说这是隐射非常措施不好。是的，非常措施不好，应当放弃！我们不应当规避革命法制问题，而应当以其真正实施为目标。

总之：1) 进口粮食；2) 坚决抛弃非常措施；3) 革命法制。

第4条是价格政策问题。这是大问题之一，我觉得，对此我们还没有探索到正确的解决办法。同志们，我下面先说一下前提，请你们记住，免得千百次地重复。我的出发点是：谈不上“等价交

^① 指雅可夫列夫向第16次党代表会议提交的《关于同官僚主义斗争的总结和最近任务》的报告提纲。

换”，我们在价格中必须从农民那里取得参与建设的那份资金。不过，我认为，我们大概需要制定一个较为灵活的分季节分地区的价格政策。也许这难以做到。我决不认为我所说的一切百分之一百正确。但我认为应当提出和讨论这一问题。这里问题何在？需要注意，在市场价格问题上，富农、中农以及出售谷物的贫农都是站在卖主的立场上的。我们不能（或很困难，因为这会引起极大的混乱）到处都实行“阶级”价格。在市场关系中，如果贫农、中农出售或者富农出售（他有时不得不出售粮食），他们都对一定的价格感兴趣；由于他们是**卖家**，他们是不会欢迎低价格的。这是很清楚的。他们中间有些人较有良心，另一些人较没有良心。但所谓良好的动机，在经济关系中，在大规模的经济关系中是不起多大的作用的。其次，现在我们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区缺乏弹性的价格政策，不适应市场粮食的数量。而如果我们能够弹性地采取不同的价格，我们就能够使价格同粮食的数量相适应，避免收购价同“自由市场”之间出现严重的脱节，使市场同生产相适应。当然，春天较高的价格使农村富裕阶层获得额外收入，春天的价格比秋天的高，而春天富农手上有较多的粮食。但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用相应**提高赋税**的办法予以弥补。还有一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税收制度，足够正常、足够灵活能及时察觉农户收入增加的那种税收制度。我要问问你们，如果我们实行较为灵活的分地区分季节的价格政策，同时看到，由于这种变化我们在一定的时期会不由自主地帮助较为富裕的阶层，但与此同时，把我们的赋税制度搞成这样，对于进到较富裕户手中的额外收入，我们将通过我们的税收制度大大超额地收回，这样做有什么危险呢？

奥尔忠尼启则：你认为这你样骗得了富农？

布哈林：我决不反对骗一下富农。就是说，重心在于制定相应

的税收制度，而收取额外收入的可能性应当同较为灵活和弹性的价格政策结合起来。

其次。我已向 11 月中央全会提出，现在再重复一下：我觉得需要更加仔细地查明富农的地区性特征。我们这方面做得太少，因此划分农民的标准，区分贫农、中农和富农的标准往往用于全然不同的条件，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制订赋税定额的时候，结果中央发下的定额在地方引起真正的混乱。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没有地区的标准，没有区分不同农民阶层和集团的特殊标准。因此，赋税和税率不很符合地方的条件，因此打击经常不是落在需要打击的地方。

关于加强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这类措施，已经说过了。

米柳亭：这是中心问题。

布哈林：这是中心问题之一。

米柳亭：工业品，首先是农业机器，工业化是中心问题。

布哈林：关于作为生产资料的工业品，现在往往有这样的说法，在某某地区它们都放坏了。不过必须看到，只有我们的整个关系体系是正常的，才有可能改善我们同中、贫农的关系。你们也许拥有生产资料，但如果你们以非常措施施加威胁，那么农民是不会购买生产资料的，因为使用起来不合算。

米柳亭：你们提高了货币价格。

布哈林：因此，这里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把事情搞糟，从这个角度或从那个角度，不能一手降低税收，另一手推行非常措施。所有法规的某种稳定性以及农业税在更大程度上的稳定性，乃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也许为此需要补做大量的工作，而这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和劳动，不过，同志们，你们大家根据经验都知道，甚至在进行这次农业税改革之后，在某些地方也出现了抗议，因为有许多所谓“不调协”。因此，深思熟虑的税收政策，极为稳定、非常稳定的农业税率，应当成为我们所应采取的基本的和中心的措施之一。

最后，在涉及此关系领域的诸问题中，我要谈谈合作社问题，在此合作社中的巨大选择性等等。这个题目本身是相当清楚的，在我们的党机关，在我们的报纸上，已经不断地谈论过。不过我还是要说，由于非常局势和非常措施，合作社机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国家强制的工具，国家“行政命令”的工具。由于经济政策各种因素的凑合，这种现象是完全“自然”形成的。这种现象应当同非常措施一起予以消灭。这就是我觉得应当采取的措施的大致数量，这样我们就可以以稍微不同，准确点说，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处理我们同基本农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同中农和贫农的关系问题。

米柳亭：这是消费观点，而不是生产观点。

布哈林：这里我必须稍稍谈一下“自由市场”问题。我受到指责，似乎我在鼓吹我们的“资本主义市场”。首先，我必须说明，“我们的资本主义市场”的说法即使我没说坚强的国家调节，也只是一块绝对毫无意义的东西。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市场是生产关系的反映。比如说，即使在“自由市场”的基础上，即在不受任何国家调节的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在中、贫农与社会主义国有工业之间存在自由市场关系，即使这样，这种市场也不会是资本主义市场，因为国有工厂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而简单的商品生产者也决不是资本家。另一方面，说由于市场的缘故，资本主义关系会生长（局部地），这是对的；但要把这种类型的市场叫做资本主义市场，那需要非常大胆的想象力，或者不懂得市场关系实质上是生产关系的反映。其次，不言而喻，在我们的条件下谈论“自由市场关系”，这就等于说“干的水”一样。请说吧！甚至在垄断资本主义下也不存在自由市场，因为那里存在生产的高度聚集和集中。而在我们这里，我们的生产更集中，工厂更集中，可能有“自由市场”吗？要存在“自由市场”需要有“一点小东西”才行——需要取消土地国有化，需要取消工厂国有化，需要消灭无产阶级专

政——不多不少！这种“解释”，客气点说，是对什么叫做“自由市场”做某种粗浅的理解。我再重复一遍，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具有垄断的集中的工业的那些经济部门已不存在自由市场。因此强调“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比赛”，就是不懂得所议论的对象，是关于“干的水”的议论。然而，不言而喻，在我们这里这些因素还不多，还少。不言而喻，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利用我们所拥有的整个强大的调节器：我们整个国家经济机关的的全部集中的强大力量。这是一回事，而非常措施则全然是另一回事。如果我说不要利用国家经济机关的集中的强大力量，那我就完全是个疯子，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当然，这支强大的力量是我们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以及其他各种势力的最强大的武器。但这离使用非常措施，离动用我们庞大的机关的镇压措施有十万八千里。说我似乎鼓吹“各种经济力量的自由比赛”、“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等等，等等，对这种指责我必须坚决予以摈弃。这一切全是紊乱想象的产物。

同志们，我必须指出并尖锐地强调，决不能以富农来代替个体经济。当我谈到个体经济时，席上有一些插话。“它是各种各样的。”多谢！非常感激这种“发现”！当然，它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一直说的是农民经济的基本群众，即个体的贫农中农经济。富农经济也是个体经济，但这在这种那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经济，或者是生长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即剥削雇佣劳动的经济。然而许多人有一种完全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的概念，你一谈发展个体经济，似乎你这就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为什么这样？其实，同志们，应当看到我国存在的现实。和反对派的神话不同，我们的农村并不是那么富裕的农村。我们的农村多数还是贫穷的农村，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野蛮的贫困。在我们的某些地区，无马的农民占40%，甚至还要多。

柯秀尔：超过40%。在北高加索达到50%。

布哈林：甚至超过 40%。这就是你们看到的我们的农村。从经济观点看，我们的中农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半贫困者。当然，不同地区有不同类型的中农。例如，西伯利亚的中农不是中部黑土地地区的中农。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关于此事我过去已经说过了。

卡冈诺维奇：而富农？

布哈林：富农？尊敬的同志，我们的社会范畴是以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作为划分标准的。富农也许并不特别“富”，但如果他经常剥削雇佣劳动，他就是小资本家。其实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旧争论，并且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坚持这一标准，而不是别的什么标准。

所以，同志们，如果你们想象一下我们农村还存在的这种贫困景象，看到其全景，然后自问：就这些群众而言，如果我们谈论个体经济及其沿着个体经济的道路发展，请问要达到上层剥削者的地位，还需要多少发展时间？我认为，需要许多时间。这个距离（从贫农和中农到富农）对基本群众来说是非常长的距离，我们绝对无须担心这里很快会生长出庞大的富农阶层。正是这种状况允许我们把集体农庄国营农场的建设同发展个体经济（在使之不断合作化的条件下）结合起来，同时无须害怕我们公开谈论发展中农和贫农经济的可能性及必要性。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许多“最新”理论认为，这里已经没有发展的可能性，这里所有的可能性都已经“消失”，同这种理论相反，这里还有巨大的发展可能性。斯大林同志在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说得对，简单的识字、文化上某些起码的改善都会使产量有巨大的增长。如果这在两年前是对的，为什么今天就不对了呢？为什么不把这个“真理”变成我们政策的杠杆之一呢？这里没有什么可怕的。

米柳亭：这是谁说的？

布哈林：同志们，我觉得，目前如果我们采取一切措施去刺激个体经济，与此同时不断采取措施，通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建立大型的谷物生产基地，如果我们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那时我们就会为工业建立牢固的基础，从而创造一切条件沿国家工业化的道路飞速前进。

从这种观点出发，从这种经济方针的观点出发，还有（属于这一问题的另一面）一个阶级分类的问题。存在对结合的威胁，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并且现在也没有消失，有些地方还有些激化了，对这种威胁当然应当从社会阶级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很多同志往往认为，好像那里并不存在什么可怕的问题。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在影响我党的工人阶级的一些阶层中，存在一种极为积极的自我感觉，有一种前进的感觉，有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发展的感觉，等等。这暂且是存在的。

斯克雷普尼克：怎么是暂且？！

布哈林：我现在就说，为什么我要说是“暂且”。

如果说这不存在，那是可笑的。因为现在的问题跟1921年危机的时日完全不同，也不可能相同。我们这里阶级力量的配置，基本经济力量的配置与过去完全不同。我们现在没有一蹶不振的工厂，我们现在的工厂是生气勃勃的，我们现在没有生产“打火机”的一蹶不振的大型工厂。这些强有力的大型工厂在发展，我们的建设在前进，问题完全不是因为我们存在零散的工厂，像过去那样。问题在于，无产阶级所坐的庞大的机器，像飞机一样，刚离开地面，发动机就有熄火的风险。危险就在这里。

伏罗希洛夫：然后怎么样？

奥尔忠尼启则：发动机熄火了，大家知道怎么样。

伏罗希洛夫：然后是灾难？

布哈林：我认为不会发生，因为毕竟坐着非常有经验的飞行

员。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对的。

布哈林：但一个有经验的飞行员的素质就在于他能看到着陆的状况如何，飞出多远，发动机的工作状态如何。

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有您飞出多远。

布哈林：同志们，从阶级力量配置的观点看，我们这里处于主要地位和软弱地位的是广大农民群众。在农村，毫无疑问，富农现在掌握一定的力量。他们不是“一般地”掌握一定的力量，也不仅是因为我们作为社会主义成分向它进攻，还因为在许多产粮地区我们的非常措施也伤害了中农，而在许多消费地区我们给贫农和部分中农供应的粮食不足。另一方面，现在贫农的状况如何？

由于我们帮助他们的规模还不足以立即把大部分群众纳入集体农庄运动，由于还不能给他们提供充分的粮食，他们到哪里去寻找起码的出路呢？毫无疑问，他们的思想是、也必然是按照“贫苦农民委员会”的思想路线形成的，因此非常自然，在实行非常措施期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贫农。但这决没有解决全部问题，即生产问题，因为这只解决一年的问题，解决如何分配在这一年内已经生产出来的粮食问题，但一点也没有解决谷物生产的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做到一年比一年生产得多的问题。与此同时，富农却挨家挨户地分送粮食，建立富农同部分贫农中农的联盟。

现在，当我们讲阶级斗争问题的时候，我们承认现在存在阶级斗争尖锐化以及阶级斗争形式激化的事实。

奥尔忠尼启则：几个月前，你还就这一点提出争议。

布哈林：没有，没有，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奥尔忠尼启则：争议了，争议了。在起草决议的委员会上争议过。

伏罗希洛夫：你把阶级斗争尖锐化叫做白痴。

布哈林：争议的不是这个问题。有一种理论说，我们应当把阶级斗争尖锐化当作我们改造时期的规律，我把这种原理叫做白痴。这就是我过去叫做白痴的东西，现在也要这么叫。不过，事实是有的，农村甚至存在这样一些阶级斗争的形式，如互相纵火，火灾的数量增加了，杀人案件增加了。我不认为我们喜欢这些形式的阶级斗争，喜欢阶级斗争如此尖锐化。同志们，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加紧进攻富农应当首先沿征税的路线展开。如果愿意，我们可以用这种办法使之陷入绝境。

米高扬：那你为什么主张废除富农的个体税？

布哈林：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走发展我们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经济的道路。米高扬同志这里又对我提出同样的谴责：你在这里主张废除个体税。

是的，我现在也主张废除个体税。

米高扬：使陷入绝境！

布哈林：看来，你认为只有通过个别程序才能限制富农并缓和其状况。

插话：按照你的看法，可以通过大规模程序！

布哈林：是的，可以大规模地，也可以按照法律，还可以把税率提高到高于你的个体税率。这是可以做到的。我想只有小孩才不懂这种简单的真理。为什么我反对个体税，主张用较高的甚至非个体税来取代它，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个体税意味着地方当局可以随意征税。

伏罗希洛夫：这意味着揭露富农并向他们征税！

布哈林：揭露富农可以是揭露一两个，也可以是揭露全体；而如果是全体，那就应当向全体征税，而不是挑几个人征税：自己的亲家不征，只征别人的。

伏罗希洛夫：这不好，你连自己的亲家也征税！

布哈林：而征收个体税的做法恰恰造成了这种现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到过要同资本主义成分进行殊死斗争。在我今天引用过的引文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我们要用拖拉机等等去打倒数以万计的富农。这完全正确。

奥尔忠尼启则：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建设拖拉机工厂。

布哈林：阶级斗争问题可以归结为，我们要拼命提高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分和我们工业，为自己争得这种阵地，并继续向前推进，把资本主义分子排挤出去，并最后埋葬他们。

插话：而富农会沉默吗？

布哈林：富农不会沉默，不过富农是居民中的少数，是一小撮。如果执行这样的政策，中农就会站在我们一边，贫农就会站在我们一边，农村无产者就会站在我们一边，那么孤立的富农作为阶级敌人就会一钱不值，而如果通过“非常措施”以及其他绝顶聪明的东西把部分贫农和部分中农抛到他们那里，成为他们的盟友，那时他们就变成了巨大的社会威胁。

斯大林：而富农毕竟是不喜欢非常措施的。

布哈林：它当然是不喜欢非常措施的。不过，遗憾的是中农也不喜欢非常措施。您没有发觉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全部问题就在这里，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这里！

插话：对富农的的新奇理解。

布哈林：同志们，这里有许多发言者对我提出这样的指责。他们说：“很好，那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谈过所有这些问题？”另一些人说：“你为什么从来没有谈过自己的不同意见？”

奥尔忠尼启则：对！

布哈林：好吧，“对！”，你们用自己方法迫使我来向你们宣读给斯大林同志的信，这还是在7月全会以前，即1928年6月初写的。下面是我给斯大林同志的信的内容。

插话：什么时候写的？

布哈林：在6月，1928年6月1~2日。我给斯大林同志写道：

“柯巴：

给你写信而不当面谈，是因为我觉得谈起来很沉重，也怕你不会听完。而信你总会读完的。我认为国内外的局势非常严重。我想我们需要设计出一个完整的计划，特别是在收获临近之际。集体农庄救不了我们，它们还需要建设几年。我们还不能立即给它们提供流动资金和机器。如果我们进入新的收获时期同庄稼汉保持极端尖锐的关系，我们在新的运动中就有破产的危险。需要准备，在各方面做认真的准备：在税收方面，在商品的运输作业计划方面以及作业按地区具体化方面。

而我们在做些什么呢？我们开展了自下而上的大量批评工作。这很好。但我们一次也没有，哪怕在最小的范围内，哪怕在每星期一，我重复一遍，一次也没有讨论过总的政策问题。还在全会之前，我曾犹犹豫豫地试图提出总的问题来。但没有成功。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和全党没有任何完整的计划。我们做得比最草率的超经验主义者还糟糕。

其次，我们在思想上也使党失去了方向……

我们的特殊措施（必要的）在思想上已变成和发展成同15大不同的新的政治路线……如果必要的话，即使离开代表大会的决议，我也丝毫不会害怕。但这种必要性在哪里？……

如果全部问题在于富农，那么这9亿之数^①算什么？——现在已承认这是神话般的数字。而如果我们的粮食本来就少，那怎么

^① 指认为农村拥有的商品粮储备，是统计机关错误计算的结果。

能说是‘富农控制了’我们？如果全部救星在于集体农庄，那么从哪儿取得供它们机械化之需的钱？在我们这里，要在贫穷和分散的基础上发展集体农庄，总的说来这正确吗？吸收小额储蓄的方针是继续有效，还是已经过时？发展个体经济的方针仍然有效，还是也已过时？根据新的事实看，你当时曾批评过的伊·尼·斯米尔诺夫的错误表现在什么地方？等等，等等。

不过，这是‘一般情况’。更迫切的是秋播运动的计划。然而，我们既没有路线，也没有共同的想法。难道这不令人担心？我们甚至不再谈这些问题：怕谈，谁都不喜欢听骂声。然而，如果连中央思想实验室都被摧毁了，如果相互间不能毫无顾忌地，推心置腹地商量最重要的政策问题，那么情况就会变得可怕。国民经济不是执行秘书。你不能用提交法办去威胁它，不能对它大声叱责。而我们缺乏深思熟虑。”

“我向你声明，我不要争吵，也不愿争吵。我非常清楚，争吵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在我们全国和我们党目前所处的这样艰难的条件下。

我请你现在考虑一件事：使（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有可能平静地举行；不要在这里制造不必要的裂痕；不要制造唧唧咕咕的气氛（不要以无法容忍地把斯列普可夫打发走的办法去帮忙）。

大会（及中国）结束后我打算到随便什么地方去走走，没有任何争吵，没有任何喧闹，也没有任何斗争。

尼·布哈林”

我为什么读这封信？因为有人嘲笑我，说我不光明磊落，我没有向任何人说过自己的不同意见，谁也不知道这些意见分歧，说是

只是由于公布了《托洛茨基传单》^①，事情才暴露了，揭露了。

而我说，这种指责是不光明磊落的。因为我说过，写过，敲过门，但没有任何回答。这封信彻底粉碎了一个神话，似乎谁也没有写过，谁也不知道此事，不知道有任何意见分歧，因此只是在此纯粹“不知情”的基础上……

奥尔忠尼启则：为什么？

布哈林：等等，不要打断！……只是在不知情的基础上写了给共产国际元老会议关于政治局观点一致的声明。

斯图鲁阿：在加米涅夫信之后？

布哈林：这在所有信之前。我说了，是6月1日……

插话：一致的。

布哈林：如果你们竟然要提加米涅夫的信，那么那里说的是，我极其激动。

米高扬：什么，这是事实？

布哈林：是的，这是事实。

米高扬：那就说说，什么不是事实，否则弄不清楚。

布哈林：同志们，实际情况到底如何？

你们问，为什么你那时要求写关于一致的声明？这是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声明，我就不能把大会开到底。这就是全部。我有什么选择？我不能把大会开到底，我在那里几乎是单身一人。怎么，你们希望我出于个人考虑而不开完大会？抛开大会，最终制造一个世界丑闻？要这么做？我只有一个出路，我也就这么做了。而你们，同志们，以此为依据提议在决议中指责我不守规矩！

关于经济政策我们也有过较为详细的谈话。例如，幸好我还保存了一张我和斯大林同志就米高扬同志的某些建议而交换的便条。

^① 指托派公布的布哈林同加米涅夫谈话笔记。

这比我宣读的那封信要早一些。这是在1928年5月17日。我前面宣读的是6月1~2日的信，而这张便条是1928年5月1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事，在讨论米高扬的进口计划的时候。我给斯大林同志写了一张便条。便条的内容如下：

“我非常害怕下列情况：

米高扬的三个便条都有这样的倾向：1) 加强工业品的出口；
2) 抛开作为出口物的粮食（谷物）不管。

结果：

- a. 我们会延长国内的商品荒；
- b. 在国内商品荒的情况下，我们却迫使工业为出口而生产；
- c. 我们不采取措施去发展农产品（谷物）的出口；
- d. 一个农业国却搞工业品的出口。

应当采取另一种做法：

1. 加强工业化，为国内市场生产；
2. 使农业工业化，提高其生产率（同时使谷物业机械化）；
3. 为工业化的目的而采取出口农产品的方针。

农业缺乏一定的积累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化，因为机器是不能白拿的，而用一千台木犁也装配不成一台拖拉机。

我很担心下述本质性的缺陷：

打算搞的工业化并不同时使农业也工业化，而是使工业脱离农业和谷物生产的稳定，等等。

这种政策只会加深巨大的困难。”

斯大林同志对此便条加了批语：

“对。米高扬有这种（不正确的）倾向，它不是来自某种自觉采取的方针，而是来自某种（我所不知道的）经验主义的实际考虑。但这并不可怕，因为米高扬在这里不决定问题。斯大。”

这就是对方针可能出现的错误的小小的警告。可以不同意我，

可以说我鼓吹的不是地方，但在这些事实面前不能提出指责，似乎谁都一无所知，谁也没有同谁说过，“绝无此事”，等等。不能这样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真相。

也许我不得不向中央全会散发某些旧文件，它们会说明这里所提出的指责有多少是正确的。

现在来谈加米涅夫的信。

同志们，我需要说说关于对众所周知的《加米涅夫的信》的指责，你们大概知道，我在正式的会议上已经说过几次了：在政治局的第一次会议上，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第一次和第二次联席会议上。我当即承认，从我这一方面犯了一个错误，我认为同加米涅夫的整个谈话是个错误。但我必须坚决反对一直不断地一再把根本没有的东西强加于我。我完全否认关于联盟的说法，加米涅夫否认这一点，索柯里尼柯夫也否认这一点。

斯大林：加米涅夫并不否认自己的信的真实性，而那里谈到了联盟。

布哈林：他在信中两次否认此事，而谈到联盟的，如果我没有搞错，那不是加米涅夫同志本人笔记里说的。

插话：是加米涅夫笔记里的。

布哈林：我似乎同加米涅夫“谈定”改变政治局的组成。

奥尔忠尼启则：那里说，我们宁要你和季诺维也夫来取代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布哈林：“那里说”。但我绝对没有义务为那里“说”的每一个字负责……

奥尔忠尼启则：这是另一回事。

布哈林：……没有义务！请你们向我解释一下，我同加米涅夫“谈定”改变政治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般说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可能同加米涅夫“改变”政治局的组成呢？

奥尔忠尼启则：说得对，这是件大蠢事。

布哈林：我根本闹不懂。

插话：我们也闹不懂。

斯图鲁阿：那么您去访问加米涅夫同志是什么目的呢？

布哈林：谈话的目的我已经说过并刊登在红皮书上。我前面给你们读过的信中谈了是怎样对我个人进行污蔑的，当我得知他们也想污蔑我时，我说：“请不要污蔑我。”

奥尔忠尼启则：而你说“我们宁要你和季诺维也夫”？

布哈林：我对你说过，没有。你可以相信我，也可以不相信，可以说我在胡说——这是你的良心问题，但我不能老调重弹。

奥尔忠尼启则：这不是老调重弹。

布哈林：为什么加米涅夫声明说根本没有谈到联盟问题，而你们不相信他？实际上当然没有谈到联盟问题，不过你们需要建立联盟，于是你们“建立了它”。你们每个人都知道，我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有巨大的政治分歧。后来的事变进程证实了这一点。但所有这些关于同加米涅夫联盟的谈论，目的都是为了掩护正在准备的另一个“联盟”，这就是政治局的某些同志同某些原托洛茨基分子目前正在缔结的联盟。

奥尔忠尼启则：举个例子，同谁？直截了当地说。

鲁祖塔克：把话说完。怎么回事？

插话：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同托洛茨基曾经有意见分歧，但后来联合了。

布哈林：好吧，而我同托洛茨基从来也没有联合过，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任何联合的政治基础。我没有一点点这样联合的政治基础！而请求与我同事几十年的党员不要参与对我的污蔑，我看不到这里有什么可指责的。我的错误在于过于坦率过于轻信地谈论了某些内部问题，议论了一些人，等等。我从未料到，会下流到这种程

度，会把这些谈话“记下来”并“加以利用”。

奥尔忠尼启则：布哈林，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的政治局委员是谁？

布哈林：关于此事我要说的。我现在说的是思想方针。至于思想方针，其中包括反对我们，反对我个人，托洛茨基就此写道：

“毕竟不能否认，在某些基本问题上斯大林学到了一些东西……他所说的反对右派的一切言论，已不止一次地反对过他本人。他没有补充任何一点新东西。”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给托洛茨基写信说：

“与此同时，在许多最基本的经济政策问题上，我们的分歧大大缩小了。眼下出现了我们同左翼中央建立联盟或其他形式的协同行动的因素。这一点应坦率地讲出来，并由此作出必要的结论。”

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回到我们党内，对此我不反对。

柯秀尔：这点还不清楚。

古谢夫：斯大林走向他了？

布哈林：你古谢夫同志认为，一定是加米涅夫走向我，因为否则我这个大人物的威望或者官位就会受到影响。我的官迷还没有到这种地步！

瞧，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最近的一篇著作，即告反对派分子书中所写的。他在列举了党内生活的各种事实后说：

“把所有这些事实加以比较，应当得出如下基本的和总结性的结论，即党的政策在15大以后没有像反对派所担心的那样右转（见政纲和关于工业问题的反提纲），相反地，在某些重要论点上走上了正确的道路。这首先是联合反对派向党提出的两个中心思想：加快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积累速度的思想，同作为蜕化和转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主要危险的农业资本主义斗争的思想。尽管反对派的

观点取得了巨大的道义上的胜利，但它的微小的力量与此很不相称（因而也说明胜利的取得不仅仅是由于它的努力），同在 15 大上被开除的时候比较，由于党的领导的错误，也由于自身的错误，反对派被抛得离党更远了。”

他们感到道义上的胜利，因而他们……

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也是这样写的吗？

布哈林：也是这样写的。我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及其他反对派分子“道义上的胜利”并不感到特别的高兴……

奥尔忠尼启则：而你认为他们胜利了？

布哈林：……也不准备道贺。但奇怪的是，甚至在本次全会上直接讨论的问题，即把 3 名政治局委员开除出政治局的问题早就有人写到过，把开除作为自己的最主要的要求，这不是别人，正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

奥尔忠尼启则：作为自己的要求？

插话：开诚布公地说。

奥尔忠尼启则：托洛茨基写了，可以同李可夫分子联盟。

布哈林：不，他写的是别的东西；他是这样写的：“关于同右派的联盟和其他废话。”

奥尔忠尼启则：不是。

布哈林：不是不是，而是是！

奥尔忠尼启则：让我们去读文件。

布哈林：同志们，关于托姆斯基同志这里所说的东西，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还想简单地说一下关于我在共产国际“不工作”的问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关于此事谈得很多。我已经说过，到 7 月全会前，共产国际 6 大前夕，在共产国际内形成一种沉重的、完全无法忍受的局面。同志们，我已经说过，正是由于这缘故，我不得不请求政治局（这是我的倡议）向 6 大元老会议发表著名的声

明。我向你们，同志们，解释过，否则我无法把大会进行到底。我在那里被置于这样的境地，我回避接见任何一个来找我的外国代表团。

（插话听不清。）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斯大林同志！我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回避接见任何外国代表团，在大会期间没有同外国代表团进行过任何单独谈话，尽管表面上我在共产国际六大上起领导作用。洛夫斯顿，一个美国人，在元老会议上说，实际上在举行两个大会：一个是公开的，另一个是幕后的，这幕后的大会涉及各种各样的集团，是反对布哈林的。

这就是大会之前和大会期间的情况，正是由于这种局面，我才在那时候给斯大林写了那封信……

而现在，在事件的最近阶段，3月9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带着所有王牌在政治局做了关于事件的情况报告，但却没有把全部材料提交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信息取自红皮书，只选取对报告人有利的。很好，如果在全会之前有必要把事件移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我决不反对。但为什么做的时候不取得政治局的正式允许？为什么关于此事不通报？我不懂怎么回事。

奥尔忠尼启则：说的是什么事？

布哈林：说的是我的事，李可夫、托姆斯基和布哈林的事，3月9日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把此事转到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我说，我不反对这样做，但还是得正式通知政治局。我也许不会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去正式为自己辩护，但我有为自己辩护的正式权利。共产国际不是联共（布）的支部，然而联共（布）却是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工作的。程序上我有权去，说明什么什么不对。

插话：为什么到共产国际去？

布哈林：我实际上并没有去控告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即使我认为它在决议中对我极不公正。但我还是有权要求至少通知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处理涉及联共（布）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事务时可以不告知？我不知道过去是否有过此类做法。这一切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非常清楚，怎么、什么和为什么。

接着，——请听我说！——在通报3天之后，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①上，德国人邓格尔同志，作为参加这里的大会代表之一，在美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我的问题。对此我还是没有得到正式的通知。政治局对此也一无所知。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讨论就通过了决议：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出“布哈林同志继续留在共产国际领导岗位上的”可能性问题……

斯大林：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

插话：我们对此也一无所知。

奥尔忠尼启则：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布哈林：……我应当说——我希望斯大林同志予以证实——，在俄国代表团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就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集团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我说，在他们破坏了纪律，组织了有形的小集团之后，我主张消灭这个小集团。

斯大林：谁也不知道此事。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能对此负责，因为政治局委员中谁也不知道此事。

布哈林：算了！很好！“谁也不知道”此事。不过也许毕竟有什么人知道，这一切都刊登在德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在《红旗报》上，并且用的是粗体字。

插话：这是洛夫斯顿干的。

布哈林：我不知道是洛夫斯顿，还是不是洛夫斯顿；我知道

^① 指1929年3月举行的美国工人党（共产党）第6次全国代表大会。

《红旗报》的编辑不是洛夫斯顿，而是别的什么人物。而在你们今天提出的这一决议之后（它今天还具有法律效力），还要求我在共产国际工作！

伏罗希洛夫：你多少时间不工作了？

布哈林：不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们不信任你布哈林，我们觉得你推行不正确的路线，让我们分手吧！”——我也建议这么做——，然而采取的是另一种做法。因为首先必须羞辱、侮辱、败坏名誉、踩在脚下，然后问题就不是满足辞职的要求，而是“因怠工”而“解职”。这里的游戏是绝对清楚的。

关于右倾危险。

伏罗希洛夫：你多少时间不在共产国际工作了？

布哈林：我在私下谈话时对你伏罗希洛夫同志说过：如果对你的各位司令说，对全军说，你是凶神恶煞，然后没事似地向你建议：“请吧，亲爱的，去领导这支军队吧”，那时你至少会摇摇头……

我必须就右倾危险说几句话。有人对我说：你在关于右倾危险的决议上签了字，而现在你在表决的时候却弃权，并且是因为关于右倾危险的条款。不过，同志们，问题不那么简单。看到没有，根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的决议以及地方组织的头一批决议，我“在陷入”右派的观点，而现在，虽然我没有迈任何步子，但我似乎“已经陷进去了”！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委联席会议上我还只是“在陷入”右倾观点。从那时起我一句话也没有说，什么事也没有干。而现在我已经“陷进去了”。我一点也没有动。但都说：过去的提法，那是“已经过去”的阶段。不过，对不起，谁走过这个“阶段”了？决议走过这个阶段了，结果我也走过了！（全场笑声。）这东西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就为了下述原因需要这种东西，因为需要的不是“允许”，不是同意辞职，而是经过这种“陷入”，变成“已经过去

的阶段”。同志们，我必须说明，我准备同右倾危险作坚决斗争，但这是指真正的右倾危险。

莫洛托夫：它到底有没有？

布哈林：它当然有，如果没有，那是可笑的。不过，莫洛托夫同志，它并不在你们寻找的地方。

莫洛托夫：它在哪儿？

布哈林：我给右倾危险下这样的大致定义：这是真正反对工业化的人，反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的人……

米高扬：这不是共产党人。

斯大林：你暗指谁？

布哈林：……这不是共产党人。

米高扬：什么样的布尔什维克会反对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工业，如果他反对，就是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

布哈林：问题在于可以以不同的时限，不同的速度，等等，去搞工业化。谁确实把我们拉回到 14 大的立场，谁否定 15 大的立场，谁就是右派。但是，米高扬同志，反对皮达可夫—托洛茨基关于矛盾不断增长的理论，反对这种废话的人不是右派。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反托洛茨基主义时期米高扬的观点。

米高扬：你不要瞎扯。你善于瞎扯。讲了 6 小时，尽是瞎扯。

布哈林：好吧，我听你的！是的，这些人是右派，必须同他们作斗争。但我一秒钟也不能承认自己是右派。我不能向托洛茨基主义投降。我曾请求在关于五年计划的决议中写进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条款，因为决议里关于反对右倾危险谈得很多，而关于托洛茨基主义不置一词。但我的修正被否决，关于也必须同托洛茨基主义危险作斗争的条文遭到了否决！

奥尔忠尼启则：无法同托洛茨基斗争。他在君士坦丁堡。

布哈林：看到吗，谢尔戈同志，可以同托洛茨基进行激烈的斗

争，而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却进行的很不好。进行前一种斗争甚至并不需要多大的智慧。

我现在来做结论。

我承认同加米涅夫谈话是个错误。

我认为我有权向中央全会申诉，我现在的发言就是一个政治局委员向自己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申诉。

我看出，现在我将被“开除”，没容我辞职——以最简单的理由提出的辞职。为什么不让辞职，为什么一定要开除？

我服从中央的任何决定。

我赞同在国家计委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党的总路线，但我坚决反对在贯彻经济政策时采用“非常”措施。

至于强加于我的其他所谓错误，我不能承认这些并不存在的错误，理由很简单，它们不存在。我之所以不能承认不存在的错误并自我污蔑，还因为我认为必须在我们党内捍卫可以思考、可以讲话的做法。然而我们这里往往有这样的东西，例如我们在2月19日的《真理报》上就可以读到（关于第12次维堡区代表会议）。短评中说：

“关于右倾危险问题有一些旗帜鲜明的发言。代表们要求同右倾危险进行坚决斗争，中央要对动摇者和调和者、对思考者^①采取强硬的政策。”（笑声）

如果我们党提出“旗帜鲜明的口号”：“不许思考！”我认为，我们是走不远的。在改造时期这是非常“合适”的东西，尤其是如果记得马克思曾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常常进行自我批判，列宁也说过自我批评，而我们也向左向右谈论自我批评。

我认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分裂的担心，在工人和农民之

^① 着重号布哈林加的。

间可能分裂的担心，对与此相联系的我党内的摩擦的担心，对与后者相联系的政治局内部摩擦的担心，对这一最高机关的分离和分裂的担心——列宁的这些担心应当引起高度注意，每一个党员都必须对此进行“思考”。

斯大林：不要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

插话：对。

布哈林：不跑到加米涅夫那里去，但也不要**用赤裸裸的拳头政策去取代思想和思考！**

柯秀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毕竟存在选举的书记？

乌加罗夫：我们知道，你是怎样选出来的。

【专题说明】

布哈林的清党材料

(1933年11~12月)

1933年1月12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决定在1933年进行清党。清党的实际原因是党内出现对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的抵制。1930年底瑟尔佐夫—罗明纳泽集团反对政治局内的斯大林多数派,尖锐批评了工业化的高速度、集体化的方法以及党的活动中违背列宁主义原则。1932年柳亭集团起草了长达200页的反对斯大林个人及其政策的行动纲领,要求罢免总书记。同年揭露了亚·彼·斯米尔诺夫、尼·博·埃斯蒙特和B.H.托尔马乔夫“反党集团”。他们主张修改失衡的工业计划、解散集体农庄,要求国家政治保卫局服从党、建立独立工会、把斯大林排除出领导班子。此外,某些现体制的著名拥护者也表示反对对反对派分子实施死刑。需要通过清党消除此类“异己分子”。此外,通过清洗还可以检验追随者以及被粉碎的所谓“右倾”领袖的忠顺程度。这时候布哈林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局长。他作为中央委员本可以不参加清党的,但他有过“右倾错误”,因此不得不参加这次清党中的“自我批评”。清党期间他有两次讲话。第一次是报告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的工作,第二次是作了所有参加清党的人都要

作的例行讲话。它的发言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布哈林最后通过了这次清党。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赵国顺翻译)

№06488

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组织委员会会议 记录关于布哈林参加清党问题的摘抄

(1933年11月5日)

听取：关于准备清党的措施。

决定：……2. 鉴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的工作对整个工业有巨大的思想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鉴于完成面临的任务需要动员每一个党员关心这些任务的实现，党组织委员会认为，在即将进行的清党过程中我局党组织尤其需要在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的工作进行检查，以查明每一个党员究竟怎样在实际工作中为党的总路线而斗争。

因此党组织委员会向联共（布）人民委员部党委清党委员会提出原右倾集团首领、现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局领导人和我局党组织成员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的问题。

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组织书记 （波雷金）

№06489

**联共（布）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会议
记录关于布哈林参加清党问题的摘抄**

（1933年11月10日）

听取：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组织委员会关于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的决定。

决定：确认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组织委员会的决定，联共（布）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

决定：鉴于布哈林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充当右倾集团的思想家和首领，并进行反党活动，联共（布）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向清党委员会提出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的问题，以便审查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整个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对工业有巨大思想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的工作中实际执行党的总路线的情况。

联共（布）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书记 （济科夫）

No 06490

联共（布）莫斯科河南岸区清党委员会

关于布哈林参加清党的决定摘抄

（1933年11月13日）

听取：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关于尼·伊·布哈林同志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委参加清党的决定。

决定：同意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关于尼·伊·布哈林同志在其所登记的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委参加清党的建议。

请联共（布）莫斯科州清党委员会批准本决定。

莫斯科河南岸区清党委员会主席 （巴良）

№06491

莫斯科州清党委员会关于布哈林参加清党的报告

(不晚于 1933 年 11 月 15 日)

秘密

联共（布）中央斯大林同志

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卡冈诺维奇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鲁祖塔克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联共（布）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和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组织委员会决定请求清党委员会批准联共（布）中央委员尼·伊·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根据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在某一党员大会或某一党的组织提出理由充分的声明时中央委员应参加清党的决定，莫斯科河南岸区清党委员会同意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和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组织的建议。

莫斯科州清党委员会特向联共（布）中央和中央清党委员会呈送上述决定，并声明对莫斯科河南岸区委员会的决定没有异议。布哈林同志所在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委的清党工作于 11 月 20 日结束。

联共（布）莫斯科州清党委员会主席 （克诺林）

No06492

布哈林在清党大会上的报告

(不晚于1933年11月21日)

尼·伊·布哈林：

同志们，尽管现在我应当报告的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的业务工作，但因为这是清党大会，我认为作为一个党员有义务在报告纯业务工作之前先讲讲纯政治部分作为引子，——至于原因嘛，我想在座的同志都清楚。

问题在于，不管是从技术方面讲，还是从科学方面讲，或是从两者相结合方面讲，根本不可能把工作同我们党作为国家领导力量所采取的政治方针分开。从这个角度说，审查任何一项工作，哪怕是审查具有极狭窄的专业性质的工作，只有在这项工作中自始至终真心实意地切实贯彻我党领导人确定的政治方针并将其转化成专业语言时，才能认为这样的审查是党的工作。可见，这里指的不是领导纯科学，也不是领导纯技术，而是要把这些因素看做有助于为按照我们党和政府的主要指示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伟大进程服务的因素。

我应当说，我作为两个部门的领导人数年来一直把必须切实捍卫党的总路线作为出发点。很清楚，5年前在我们中央政治局核心中以我为首的集团，就是布哈林集团、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多年以前我是这个集团的思想家，很清楚，该集团的产生是许多重大的理论政治错误必然导致的结果。它不懂得我国的富农在崛起这一基本事实，在富农进行疯狂的阶级斗争，斗争激化到了发生粮食收购危

机的时候，它认为无所谓，会过去的。它不懂得我国的阶级斗争必然要尖锐化。不懂得必须迅速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农业基础，对我国集体化的进程根本估计不足。它不懂得外部的政治力量、外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不懂得无论从国内力量对比的角度、还是从国防的角度来看，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快的速度奠定工业建设基础和相应的技术装备。总之，它的表现实质上从理论上可表述为害怕展开社会主义进攻，而这一进攻却是事物发展的整个逻辑和我国进一步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整个进程所引起的。这是从逻辑上看。如果从政治实践上看，它则成了所有反对开展社会主义进攻的力量的喉舌。由于反抗这一冲击的主要社会力量，反抗冲击变成了疯狂的反攻，严重激化了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这是历史地完全不可避免的，这一点现在看得很清楚，很自然，相应的实践和理论表述的代言人，即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代言人（我作这种理论上的表述），成了后来党的决定极其正确地称之为富农 [进攻] 的第一个回合。

从我们党的角度来说，无疑这恰恰在党的这个阶段^① 会涣散党的队伍，在这个阶段上党必须在开展社会主义进攻中保持步调一致，所谓步调一致，就是要求我国的基本领导力量中思想和行动的绝对统一。这就是右倾危险在我国成为主要的富农危险的原因。

党的领导，如果从领导的组成人员上讲，列宁的领导之后是斯大林的领导，其最大的功绩是，它历史性地成长起来，不是靠什么组织手腕得到锻炼，而是靠极有原则的路线得到锻炼、成长起来并赢得了历史地位。当时，大约是 28~29 年吧，问题是要制定 [总路线]，因为那时处于我们开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所以很自然，当时处于制定这一路线的过程。我们是在特定阶段从特定意

^① 原件如此。

义上，从继承和发扬全部列宁主义传统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路线的。总路线的代表人物是斯大林和那批形成坚强有力、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的同志，他们历史性地取得了成为我国基本力量的资格。当前历史阶段党的总路线的制定及其积极贯彻，为〔其〕贯彻创造党内先决条件，即从组织思想上和思想组织上粉碎所有反对派并动员群众。如果从我国建设的宏大规模来看，这是我党领导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功绩。

体制问题在中央委员会内外发生的所有争论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争论也掺杂了对最杰出、最著名的我党领导人的个人攻击等等，这实质上是这种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在组织上的反映。应当记住，围绕我党党章第一条发生的争论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截然不同和革命进程的发展而引发的，早在那时布尔什维主义的所有对手就对阶级斗争作了截然不同的解释。他们不知道这一斗争将有多么残酷，多么激烈，正因为如此，要进行这种斗争就必须在国内有这样一种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类似军队的组织，党应当是一支力量，而不应是争论俱乐部，不应是棋局，不应是议会党，不应是选举机器，而恰恰应是能够以铁的手腕领导群众并带领群众去战斗以夺取胜利的力量。

如果我们现在从国际角度来看整个形势，特别是如果注意到资产阶级阵营中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注意到在我国已经出现并将在国际范围内出现的斗争的激化，那难道还不明白什么是马尼洛夫习气，什么是自由主义空话吗？那就是认为可以把重大的历史性事业交给一个没有铁的纪律、不是钢铁般坚强的党。这就是必须抛弃一切关于体制、关于破坏民主等等的争吵的原因，这些争吵的目的在于涣散党的队伍，客观上帮助了党的敌人。这里领导的历史功绩就在于粉碎了所有派别并为真正胜利的进攻创造了党内前提，事实上正是如此。

我不准备讲当时我的错误的一些理论前提。这只能在另一个场合借另一个机会讲。但我要说，如果从逻辑方面讲，错误的根源在于机械唯物主义及由此而来的若干理论体系，如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理论等等。我把这些观点灌输给一大批同志，这些同志后来虽脱离了我的领导，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于我的过错即我向他们大谈民主而滑到了很糟糕的地步，这大家是知道的。^①我早已同这一切划清了界线，想起这一切我就很不愉快，——我同这一切划清了界线并且可以说，多年来我一直是按照另一种方针——按照真正捍卫党的总路线的方针来工作的。

党的这条路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你们知道，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大工业国，我们把分散的小农业变成了社会主义大农业。这个事实非常重要。我们有时没有充分理解一个农业结构酷似中国的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农业国这一事实的世界历史意义。这是巨大的革命步伐，是重大的农业革命，这一革命连同我国的工业化确实把我们国家变成了有强大技术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家知道，“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知道，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建成，新的劳动刺激因素在我国工业和我国农业的整个战线已经开始起作用。大家知道，动员了群众来从事这项事业，党团结起来了，我国的国防工作有了保障。而这后一个事实无比重要，因为世界上一切都发展到了全新的高水平。我们正进入新的世界历史时期，这时我们在国内拥

^① 指“斯列普科夫等人反党反革命右倾集团”（“布哈林学派”）案。1932年10月~1933年4月，未经检察长批准逮捕了38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在1933年4月16日审理了伪造的材料后，在没有起诉书的情况下判处剥夺34人期限不等的自由，罪名是参加“以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的反革命右倾组织”，进行“有利于国际资产阶级和积极的反革命活动和反革命宣传”。1936~1941年，卷入这起案件的大多数人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庭和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州“三人小组”判处枪决。现所有因此案遭镇压的人都已平反（见《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2期第32~48页）。

有建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之上的多种成分的不断前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国外我们将面临一大批国家的极强大的对抗。

一切都在走向巨大的冲突，因而我们大家，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明白，一个统一的党，一个意志集中、空前集中的党，因为我们面临的任務就其规模来说甚至超过了过去曾经完成的任務，一个意志统一集中的党，一个能从理论上正确指明道路的党，这是我们未来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一先决条件会带来更大的胜利。

我认为，在我们的工作中，为了正确地领导工作，首先必须制定某种行为规范即这一或那一部门的工作方式。这绝不是一个纯学院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实践问题，而且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尽自己所能协助解决那些问题，以便把党的解决办法转化成我遵照党的意志应当从事的工作的专业语言。

我是怎样认识这项事业的（我不是作为一个个人，而是作为一个正在对党员进行清洗的机关的领导人来谈我自己的），我已经表露了并对整个工作作了指示。

因此，如果撇开克服我个人现在有时仍然犯的理论错误不谈，我必须在科学领域的两条路线进行斗争，而且这绝不是官方报纸杜撰的战线，这确实来自实质本身。

在我国的学者当中，在分布比例不同的老学者和年轻学者当中，还有两种特别倾向的残余（而数年〔前〕要多得多，〔而且这些残余〕相当严重和危险）。具体说就是：一方面是纯学院残余，它主要来自学院派，学院派在最初时期顽固地反对理论与实验研究实践和工厂实践的任何联系。他们强烈反对对科研工作计划作任何变动，〔反对〕直接与工厂机构等有关的确任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较为年轻的干部中，特别是在我们的干部中，对理论

持鄙薄态度。这就是说，一部分人把理论看做神圣的公设，另一部分人则对理论估计不足：帮忙做个螺丝钉吧，但不要去研究原子结构或其他什么问题。他们把工作变成了不符合党的方针的事务工作。第三条路线，这就是科学在理论与实践最大限度相结合的情况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因此，我认为我作为我们部门的领导人必须把全党的路线转化成专业语言，一方面反对空洞的纯科学和经院主义，另一方面反对反对理论的鄙薄态度^①，并竭尽全力推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路线，让所有理论学科和各种实验工作及其他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

在技术领域，同样必须这样解释全党的方针，将其转化成同这样的专门路线相连的语言。这里同样产生了在两条战线斗争的必要性。这种必要性的产生是由于在工程师中间，特别是在老工程师中间，如同在老学者中间那样，曾有过“纯”科学的旧学院派传统的残余。同样在以老的代表人物为代表的工程人员中间曾存在“纯”技术观点的残余，而且现在也还有，但已经很少了。这里存在着技术脱离政治、脱离经济的现象。

技术发展“自在”的逻辑占了上风，根本不懂得，当我们为新技术而斗争时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这非常容易理解，只要我们设想一下，现代农业机器不仅小资产阶级经济无法容纳，甚至富农经济也无法容纳。有些机器只适应于社会主义大经济。既然我们不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应打碎的不仅是富农的脑壳，而且还有所有走狗的脑壳，既然我们想要从技术角度建立真正的农业基础，那么这就是同争取建立我国社会主义超大规模农业的斗争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这方面的一切都是相互

^① 显然，布哈林想说的是：“对理论的鄙薄态度”。

联系在一起的。从任何一个领域都可以举出成百上千的例子。

这就是我们的方针，它要求我们不要坚持“纯”技术观点，而要把技术同政治和经济结合起来，并把技术看做无产阶级为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同一种相反倾向的斗争，这种倾向同样可以不止一次地看到。这就是人们说得非常动听，并用同技术问题多少沾边的政治说教来代替技术改造工作本身，也就是说，技术实质完全消失，剩下一堆没有任何技术实质的废话。

正如在科学领导有两个侧面一样，在技术方针领域也应当把技术同政治经济结合起来，应当把反对阉割技术实质的斗争作为主要任务，把这件事看作无产阶级和我党阶级斗争的事业，把技术思想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我们的机关，不论是科学研究所还是技术宣传，它们也都不是组织上的“自在之物”。我们应当在这项工作中走上相当广阔的舞台，甚至超出我们人民委员部的范围。应当说，科研总局的领导在这里不但要同我们人民委员部各机关打交道，而且还要同科学院这样的机关打交道。我们从当前的形势出发，在科学院开展了相当大量的工作。在我们的倡议下制定了科学院新章程^①。我们通过了一大批科学院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合同。在我们的倡议下这些问题提了出来并得到通过，其他人民委员部也按我们的榜样与科学院签订了一系列合同，从而保证了我们这个最大的和在此之前最纯粹按学院式发展的组织的转变。

我们把整部机器坚决转向了同工业密切联系的方向，于是我们人民委员部在这些人中被公认为吸引我国即超出我们人民委员部范围的所有科研力量的中心。更不必说，近日我们放置了一块最大的

^① 指1930年5月23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的苏联科学院章程，布哈林积极参加了起草工作。

奠基石——在我们的倡议下出版了一卷大部头的马克思专著，最有声望的名人在书中都赞成马克思关于理论方面的论述^①。

主席：这是真的呢还是挂在嘴上的？

布哈林：真的。这本书明天我就可以给大家看。当然，对他们不能提出马克思主义正统思想的要求，但所有当代问题他们都愿意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去理解。

主席：这仅仅是文字，还不是行动。

布哈林：任何一种说法后面都隐藏着一定的行为，因为思想是行为的缩影。所以这还是会发生的。有些人已经付诸行动了。

其次是第二个主要思想，这一思想是在这些方针（我从较一般问题转而谈较具体问题）的基础上产生的，我们遵循这一思想发展了党特别是斯大林的口号。应当说，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本人有关掌握科学和技术、关于掌握的热情、关于其他一系列事情的口号，这些口号确实正在成为推动力量。为了解释党的这些指示和斯大林同志本人的指示，为了发挥那些来源于党对我们的事业的一般指示的指示，我们两个部门提出了指导我们整个工作的两个重大的调节思想，一是我们整个科研工作的计划，二是工厂内部工作即技术工业财务计划。

科研工作计划给了科研局领导我国整个科研网的权力。我们在两年前召开了首次科研计划会议^②，仿佛在全世界学者当中爆炸了

① 指1933年出版的由布哈林和阿·莫·德波林主编的集体著作《纪念卡尔·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1883～1933）论文集》。文集的作者有：阿·马·高尔基，科学院院士布哈林、阿·阿·鲍里夏克、谢·伊·瓦维洛夫、维·彼·沃尔金、阿·莫·德波林、A. H. 越飞、弗·列·科马罗夫、尼·谢·库尔纳科夫、尼·米·卢金、伊·伊·墨山宁诺夫、弗·费·米特克维奇、亚·尼·萨莫伊洛维奇、尼·尼·谢苗诺夫、亚·伊·科梅涅夫、亚·阿·切尔内绍夫等等。

② 会议于1931年4月6～11日举行。布哈林在会上作了关于科研工作计划的报告。

一枚炸弹。今天这已为世人所公认。可在那时却必须同旧学者的残余进行残酷的斗争，他们说：怎么能够搞订货呢，这可是自由的创作，正如普希金的诗中说的“在我喧哗的市街游荡”一样。当时需要为计划思想本身而斗争。我们在有关科研工作计划的两次会议^①上都这样做了。我认为我们做得成功，很少见到敢于对此说个不字的死硬派。当前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同歪曲这种计划的言行进行斗争，但是应当在全社会范围内，在下达给我们的建设工地、有关整个建设战线的理论计划、技术经济计划的基础上规划科研工作的思想，这一思想不仅得到了普遍认可，而且成了我国的一项具有公理性质的原则。

我认为，提出并推行这一思想的科研局领导可以把这件事情当作功劳。

另一个思想是技术计划思想。这一思想产生的原因如下。当我们着手研究工厂的技术宣传问题时，有个问题立即提到我们面前：围绕什么开展整个技术宣传工作，为了贯彻这项工作需要些什么？在对工厂进行研究时，我们着重指出了一个乍看起来很奇特的事实即工厂的经济指标总是同工厂的技术指标有关，如精心挑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密切注视工艺流程，认真检验原料，认真注意产品的质量，认真考虑利用一切可能的全速运转系数和一切设备，如热力装置、动力装置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工厂里受到极其密切注意的问题。此外这意味着掌握技术并围绕这一点开展宣传。这意味着力争百分之百地利用任何一种技术设备。这时可以举出许多我们称之为设备不配套的事情。我们在任何一个工厂都遇到了这个问题，就是一部分同另一部分不配套。

^① 第二次全苏重工业科研工作计划会议于1932年召开。布哈林作了《技术改造和当前科研工作问题》的报告。

由此产生了技术计划思想。我们在这方面依靠许多工厂，首先是列宁格勒的工厂。围绕着这一技术计划建立了完备的技术宣传体系。大家可能还记得，我在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上第一次谈到技术计划问题^①，而现在我们人民委员部已经有了技术生产局，其任务恰恰是技术计划问题。

主席：各处都制定了技术指标体系吗？

布哈林：每个工厂都应专门制定自己的体系。我们召开了一系列这样的会议。我亲自参加了许多会议，其中包括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我们在会上详尽研究了这个问题。许多工厂如“斯维特兰娜”和其他莫斯科的工厂在制定这种计划方面堪称典范。但是我再说一遍，这件事远远没有完成，而且我认为，我们人民委员部设立生产技术局，这件事肯定会迈出更坚决得多的步伐。

现在，如果我们转到科研局问题，那么我在这里首先可以说，1933年我们各研究所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地质研究方面，合成橡胶研究方面，铝的研究方面，各种特种钢研究方面，钛-磁铁矿方面，新型飞机和发动机的设计方面，石油的气化方面，许多国防工程方面，通过添加化学元素而对地面进行化学加固方面。这些元素可使地面立刻变硬，简直只要几分钟。

总之，最近一年完成的工作数以百计。但正如波雷金同志所说，迄今为止最头痛的问题是，尽管有大量宣言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我们的研究所和我们的工厂企业之间的联系仍很不够。

我想简单谈谈工厂的实验室，因为无论从好的意义或坏的意义来说，受到注意的通常都是我们的研究所，但关心我们的工厂实验室的人却寥寥无几。此外科研局的领导还负有领导工厂实验室的责

^① 见《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会议。速记记录》1932年莫斯科版第75～80页。

任。当然，这并没有明文规定，但科研局下辖一个工厂实验室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代表就是我本人。在该委员会工作的有布里茨克^①院士这样的名人。

应当说，我们的实验室的状况五花八门。有一流的实验室，它们在实验基础甚至在人员方面都比研究所强。例如，拿“斯维特兰娜”工厂来说。“滚珠轴承厂”有很好的实验室，它参预整个工艺流程。实验室不仅检验制定工艺流程，而且通过派人操作有关设备的方式修改工艺流程。

同时，在许多工厂，特别是乌克兰的冶金厂，有人对实验室的态度简直不像话。这种情况在列宁格勒的工厂，在莫斯科的工厂也时有发生：最糟糕的例子当属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工厂的状况，该厂的科学工作、研究工作、实验工作被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

但应当说，最近以来我们发布了一系列由谢尔戈^②签署的决定和命令来整顿这一工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前不久召开了工厂实验室会议。实验室工作人员对这件事作出了极其迅速的反应。我们有一份专门的杂志作为工厂实验室的指导性杂志^③。

至于需要采取什么基本工作方针来解决重大问题，那么首先要努力使科研网接近生产需要。这是最薄弱之处。我们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研究所划归重要工厂，派遣研究所工作队帮助工厂，在废品率升高时从研究所派遣紧急抢险工作队。选择课题，工作的安排应做到使工厂提出课题并使我们的研究所围绕这一课题工作，建立销售小组，我们为了做到这样的接近大致采取了这些措施。

① 布里茨克，埃·维·（1877～1953）——苏联化学家和冶金学家，1932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

② 即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时任重工业人民委员。

③ 指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研局的杂志《工厂实验室》，布哈林是该杂志的编委会成员。

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说过，这最终带来了什么结果。应当说，开展这一工作后，进展是有的，成绩是有的，但同我们工厂集体的巨大需要相比，同我们工厂工作的无限需要相比，同对这种工作的需要相比，我们大大落后了，因此需要再做一次坚决的转变，我个人认为必须做。

其次是计划。我已经报告过，科研工作计划已得到了普遍认同。然而我们遇到（如果通过清洗取得某种平衡，如果能给予我们部门以帮助，那再好不过了）相反的危险，遇到实际起了扼杀主动性作用的所谓计划过度。这首先是由于财政人民委员部的不正确的报表制度。老实说，报表对我们部门是一种负担，一种折磨。我们迫使人们做大量的工作。但这是对我们的要求。

主席：财政人民委员部不明白这一点吗？

布哈林：不特别明白。我们把网内研究所从 256 个减为 150—160 个，但要求我们报告所有研究所即不仅包括我们的研究所而且包括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研究所的每个课题的研究情况，而课题的数量大约有 1 万个。结果我们变成了统计数字的会计处。应当说，这不叫审查。要求我们提供记录本，提供“纸片”。另一方面我们也把研究所教坏了，因为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按时从研究所得到的公文。而研究所对待这些文件就像对待记录本一样，它们像填写调查表一样填写这些公文，或者凭空杜撰数字。

什么最重要，我应当特别提请本次会议注意什么，——这就是开始越出界限了，具有会计财务报表性质而无实际意义的所谓计划，在许多部门对许多创造性工作成为真正的绞索，这就太过分了。

这可不是做凳子。你在这里开始了一个课题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另一个课题，你就应当立刻着手研究，因为有时它比你开始研究的课题更重要，但像常言所说的编制内没有这方面的钱。

主席：为什么人民委员部不提供帮助呢？

布哈林：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总是想法进行再分配，有时并不完全合法，从别处弄来再发下去。但我认为，应当完全取消这样的报表制度，应当使呈送报表的仅限于重大实验或研究所负责的某些课题。第三，每个研究所应有一定的机动资金，这笔资金应事先拨给研究所，如果工作过程中出现新的任务和课题，研究所有权支配这笔机动资金，从中拨款用于新课题。我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其次，是同歪曲计划的行为作斗争。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整顿计划的斗争就是同歪曲计划原则的行为作斗争。

最后，我们为精简和整顿我们的科研网进行了相当大量的工作。应当说，研究所所长向我本人和其他领导同志提出的最迫切要求是：我们准备好了挨你们的板子，但只限于你们。现在我们不知道谁有权打我们的板子。完全正确，存在着严重的政出多门现象，其表现是我们许多研究所存在双重领导体制，不通过我就无权任命所长，但是任命了，结果许多事情的处理我们都不知道。研究所所长们说，我们只需要一个主人。在这个问题上应当以某种方式彻底明确一下。

这就是说，要精简科学网。我们把这个网从250个单位削减为150个单位。但我附带声明一下，这绝不是要削减科学工作的规模。我们的拨款在增加。我们只是要把包袱扔掉。这一工作是同工农检察院共同进行的，并得到工农检察院各机关的帮助。因此我认为，这一工作还要继续搞一段。还可以清除某些东西。

然而精简科研网也产生了某些副作用。例如，我们科研学会的作用遭到了极大削弱，而恢复这种作用是完全必要的。

科研局方面主要的严重缺陷是——忙于财务问题，而且财务报表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虚构性质；第二，最终产品不能完全销售出去；第三，我们的工作和我自己赶不上抽象的财务报表；第四，学会薄弱，科研局整个机构薄弱。

现在谈谈我们将来的计划，谈谈我们在这方面打算怎么办。为了使你们对这里的问题所在更清楚，我应当说，我们的所长们的抱怨有下述几个方面：抱怨无计划地从研究所抽调工作人员，没有一个研究所不是痛哭流涕地提到它们极其需要的工程师被调走等等；有时这是对的。

起初我认为，可以保留旧的结构并用这一结构来周旋，以便把这种研究所组织完整地保留下来。然而现在这一观点我认为是不现实的；我们应当来一个大胆的转变，也就是说我们应当把所有专业研究所移交给联合企业、总管理局，有些研究所则移交给设备最好的工厂企业。那样一来销售问题将走上另一轨道，将开始销售工厂得到的外部产品，而研究所则成为工厂的主要车间。在这条道路上有没有风险呢？有。起初有些研究所会消亡，有些会不知所措，但以后终会理解，因为生产的需要会反映出来。因此应当冒这个风险，我们将在所有战线取得胜利。我对研究所所长们说：基本的历史需要可是掌握技术的需要；你们是想把人们零零散散地派往工厂呢还是作为一个现成的团体派往工厂。这一计划有待人民委员签署。科研总局内还会留下理论性的综合研究所，其他所有研究所将转归总管理局、托拉斯、工厂。整个工作在将要召开的计划会议上将得到全面协调。

关于中央技术宣传局。我在《工业化指挥部》^①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如果看一看技术宣传局各部门，那么我们可以说，在科学咨询方面我们组织了以雅赫宁同志为首的工作人员的发起小组。小组根据工厂的需要对我们研究所的咨询能力进行了考察。往常是这样提问题：研究所面向工厂，人们从来不把触角伸向研究所。现在情况则相反。他们对70个研究所做了这项工作：研究所能提供什

^① 看来是指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出版物《工业化指挥部》。

么呢？它们出版了一本手册，很快便销售一空。现在正编一本有关整个研究所网、整个国家设计单位网的手册。

对莫斯科工厂、企业和研究所在掌握进口的 150 种和大约 500 个型号的金属切削车床方面的情况进行了检验。车床制造具有何种意义是无须多说的。在这一基础之上编了一本附有掌握这种设备的细则的很有意思的新型手册。其次在研究的基础上现正筹备出版目录、说明书等。最后，是一系列的群众技术咨询活动，对此甚至国外报纸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在技术情报方面，我们成立了整整一个研究所——技术经济情报研究所。简而言之，我们出版了简报《技术新闻》，制作了两套卡片，因为我们迄今为止既未利用过世界专利文献，也未到国外出过差。这两件事都无人过问，而且在一次对我们一部分发明进行审查时发现，我们大约 80% 的发明都是早已发明出来的东西，也就是说，随便翻翻专利文献就会发现，所有这些“美洲新大陆”都不需要去发现。而在这个研究所把所有这一切都担当起来了。

建立了技术资料处，在工厂建立了 500 个技术情报站。这一问题在我们局务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中央技术经济情报研究所得到了很好的评价。

我们有一个庞大的出版社——科技出版社联合公司，它集中了所有的技术文献。我们去年出版了 2112 种不定期出版物、570 种教科书、70 种大型技术手册，出版了 122 种杂志，其中包括新杂志《社会主义改造和科学》^① 和《技术宣传》^② 杂志。近来我们的

① 《社会主义改造和科学》（《СОПЕРА》）是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工作和发明局的机关刊物。1931～1936 年出版。布哈林是该杂志的责任编辑。

② 《技术宣传》杂志 1932～1936 年在莫斯科出版，是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技术宣传局的机关刊物，责任编辑是布哈林。

基层出版物也有了极大的增长。我们有 32 种靠我们资助的工厂报纸。出版 23 种工厂月刊、大约 300 种技术杂志、大约 80 种托拉斯简报和 4 份州技术报纸，其中 3 份靠中央技术宣传局资助。这项出版工作的最大缺点是书的质量，我们书的质量还“不稳定”，既有外观装帧质量，有时也有内在质量问题。

还有一条特殊的战线即参考书战线，关于这一战线讲得最多，必须加以整顿。但今年我们在纸张上很吃亏，纸张比去年缺。但在种类方面我们比去年多得多。印张量则受到纸张储备的限制。

其次我们提出了生产技术教育问题，而且根据我们的建议政府机关通过了有关生产技术教育的强制法令。我们中央技术宣传局的领导人就这一点向执行委员会莫洛托夫同志作了汇报。大概很快将再次面临这一问题。我们制定了 112 个规划，出版了 16 种教科书，32 种正在排印中。我要提请大家注意，这里要预先进行极其大量复杂的教学工作，就是说这里指的是迄今未曾有过的技术教师、新型的技术员。

所以参加这一工作的有优秀的专家，例如你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大专家托钦斯基^① 同志就直接参与了这一工作，就铺开的面来说我们的计划能完成，但在提供毕业生方面我们大大落后了。我们在这里能够引用的只是抽样调查材料，但整个情况简直是五花八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的经理对这件事情抱什么态度。那些有好的实验室、重视技术宣传、制定了技术工业财务计划等等、重视生产技术教育的工厂，往往是完成计划的工厂，也就是文明工厂。

但在某些工厂存在下述缺点，即技术教育提供的毕业生同铺开的面不相称。

^① 托钦斯基，A. C. ——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金属工业总局总工程师。

下面谈直观教具、展览会、技术博物馆等等，我应当逐一列举以便汇报。出版了145种宣传画，有11种技术教育方面的技术用表正在印刷，举办了5次佐洛塔廖夫方法展览，在莫斯科建立了科学技术城，举办了汽车制造、节约金属、科索格尔冶炼、废物利用、集中调度等展览，在列宁格勒举办了工业展览，在巴库建立了科学技术博特馆：那里巴里诺夫^①给予了帮助，情况很好。

技术电影的情况不妙。我们原定出40部，实际出了15部。同“技术电影”托拉斯弄到了打官司的地步；它没有完成我们的订货，因此这是大失误。

群众组织工作。我们在这个方面同共青团的关系不错，同工会的关系不好。总的我应当说，同共青团相比工会完全是个消极的组织。这个方面我们有一些示范基地，如在戈尔洛夫卡，在“斯维特兰娜”工厂；在卡·马克思工厂、在34号工厂。

我们在列宁格勒就技术宣传和部分技术问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我们到各地进行了走访。

如果谈到两个部门的缺点，那么可以看做漏洞的是：就提供毕业生来说，未完全完成技术教育计划，参考书不足，提高工程技术人员素质的工作存在缺点，同我们总局领导干部的联系不够，对工作统计做得不够。两个部门的财务和整个工作方面最大的缺点是专业人员严重不足。我们应当坚决地使我们全体人员成为工程师，以便完成我们肩负的职责。应当在人民委员部内争取更有利的地位，也就是说更经常地在部务委员会提出问题等等。

我认为，允许在细小问题上进行争论，而现在我们要工作，要

^① 巴里诺夫，M. B. (1888~?)——1904年入党，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石油工业总局局长，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有发言权的代表。1937年遭镇压。

尽全力完成全国都在努力完成的任务。

主席：集体怎么样，工作协调吗？

布哈林：当我们机关出现波动，当要取消技术宣传时，我就这一问题提出了非常坚定的方针。其次我同波雷金召开了会议，就放弃还是不放弃我们的阵地进行了表决。所以在所有原则问题上我都尽力争取达到最大限度的一致。我本人同党组织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06493

布哈林在清党会议上的发言速记记录

(1933年11月21日)

尼·伊·布哈林：

同志们，我发言之前首先要声明，我认为，我们党的组织提出我参加清党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大家知道，中央委员一般是不参加清党的，但如果哪一个团体要求某一位中央委员参加清党，那么这位中央委员就应当参加清党。我认为，我们党的组织向上级机关提出这一问题并要求在这次清党会上对我进一步审查，这样做是正确的，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

第一，我们国家的整个形势，社会主义进攻的继续，这是一方面；第二，国际危险开始露头，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我们党的全体领导成员现在同过去一样地团结一致，甚至比过去更加团结一致。

清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清党会使党的队伍得到整顿，甩掉一切包袱，像我们党这样一个大党，包袱肯定是有的；定期清党是我们党发展的规律。因此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因为我，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党内的活动中，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在政治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因此我在报告一开始先声明，我毫无保留地拥护党的组织要求我参加清党的决定。

首先请允许我简单地谈谈自己的经历。我不能讲得很详细，因为在我的年龄履历和党内政治履历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太多，我只有

拣主要的讲。

我是知识分子：父亲是教师，母亲也是教师，我出生于1888年。早在孩提时代我就同政治有了联系。从1904年起，我开始对有关问题发生兴趣。当时正处于革命前的形势，我在莫斯科一所中学上5~7年级时，先是积极参加非党革命小组，而且被卷入1905年革命，我这个中学生特别积极地参加了集会、罢工、街头游行，当时就被推举为莫斯科中等学校学生组织的一名领导人，后来又成为全国中等学校学生组织的一名领导人。这个组织起初是个非党组织，参加者中有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后来这个组织发生分裂，分离出一个在全俄各地有分支机构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我也相当快地被推举到了该组织的中央领导岗位。在当时参加的同志当中，有索柯里尼柯夫^①同志，当时他在全俄组织中央委员会。因为整个斗争遵循的是社会主义方向，就由这个组织来领导，而这一组织在最后几年则处于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之下。

1906年我在莫斯科河南岸区入党，担任宣传员、鼓动员、组织员，为举行一系列罢工而奔波，并在毕业考试期间组织了莫斯科河南岸的壁纸厂的罢工。1908~1909年我先是被增补为莫斯科党委会成员，因为我当时已具有丰富的党内政治经验，也是为了进行日益激烈的同召回派的斗争以及同孟什维克的斗争。

后来我入选莫斯科委员会，担任莫斯科河南岸区代表和莫斯科河南岸区责任组织员。我作为区的代表成了莫斯科委员会成员。

我于1909年5月23日（俄历）被捕。出卖我们的是一个

^① 索柯里尼柯夫（布里利安特），格·雅·（1888~1939）——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17年以前在莫斯科和国外从事党的工作。十月革命后从事经济和外交工作，1922~1926年任俄罗斯联邦（后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1936年被开除出党。因所谓的“反苏平行中心”案遭到迫害。死后恢复名誉，1988年恢复党籍。

奸细^①，详情就不必说了。过了些日子我取保释放。此后莫斯科组织决定保护我，不让我从事秘密工作。我成了把整个合法工作统一起来的中心人物。当时布尔什维克在合法机关中的工作是驱逐取消派。我亲自参加并把各合法机关的全部工作统一起来。我成了合法机关同地下中央之间的联系人，当时中央的代表是后来被高尔察克枪杀的雅柯夫列夫^②，他是瓦·尼·雅柯夫列娃^③的弟弟。

时隔不久我再次被捕。这一次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组织遭到完全破坏，一夜之间逮捕了将近86人^④。许多人记得，我们是怎样被从四面八方抓来，在保安处会合的。我被关了相当长的时间，莫斯科大多数区警察局和莫斯科两个监狱——塔甘监狱和布尔特尔监狱我都蹲过。

由于第一个案子我是取保释放的，第二个案子他们不想送我去流放，尽管第二次从表面上看不是法律案子。我设法争取到把我送去流放。我流放的地方是奥涅加。由于第102条对我有威胁，我的此案律师给我发来暗语电报，说我有被判处苦役的危险，确实有大批同志后来被判处苦役。

① 指罗·瓦·马林诺夫斯基（1876～1918），此人是莫斯科保安处密探，1912年当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第四届国家杜马代表。1914年辞去代表资格后出国，在这之后被开除出党。1918年回俄后被捕，经法庭审判执行枪决。

② 雅柯夫列夫，尼·尼·（1886～1918）——1904年入党。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1918年任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在高尔察克分子夺取政权后从事地下工作。1918年被白卫分子逮捕和枪杀。

③ 雅柯夫列娃，瓦·尼·（1884～1941）——1904年入党。在莫斯科从事党的工作。1916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莫斯科区域局书记。1918年在莫斯科肃反委员会工作。1920年12月至1921年4月任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书记。1918年加入“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在1920～1921年的工会争论期间加入“缓冲集团”。1924～1926年追随托洛茨基，后同反对派决裂。1937年被开除出党。遭镇压。死后恢复名誉，1958年恢复党籍。

④ 原件如此。

我从奥涅加逃走。辗转到了莫斯科。我在莫斯科秘密住了将近1个月，便逃到国外。在国外，我到过欧洲各国，后来又去美洲各国以及亚洲的部分国家。每到一处，我都在布尔什维克地方小组工作，因为我们有一些小组同住在巴黎并代表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央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保持着联系。我同中央保持不间断的联系，并以同国外的俄国侨民保持联系为目的。我同伊里奇直接相识是在他住在克拉科夫和他后来住在扎科帕内时，而且在侨居国外期间始终同他保持着联系。1912年我是中央机关报^①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代表大会的代表。

这一时期我开始了更紧张的写作活动。我开始在《真理报》、在我们党的合法刊物《启蒙》杂志^②、还有卡·考茨基^③主编的《国际社会民主党人》杂志工作，当时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大家都为这家杂志写文章。这是我工作的开端。

在维也纳我同托洛茨基^④进行了斗争。当时在维也纳的有现任驻美国全权代表的特罗雅诺夫斯基^⑤和现在莫斯科工作的一位叫瓦西里·索洛维约夫的印刷工人。战争爆发前不久，战前1个月或2个月，我在奥地利被捕并被关进位于维也纳附近的“梅尔”军

① 指《真理报》。

② 《启蒙》杂志——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理论月刊，1911年12月至1914年6月在彼得堡出版。

③ 考茨基，卡尔·(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领袖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④ 托洛茨基(勃朗施坦)，列·达·(1879~1940)——189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1927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年起成为党内反对派的首领。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死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务之手。

⑤ 特罗雅诺夫斯基，亚·安·(1882~1955)——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0年侨居国外，住在瑞士、巴黎和维也纳。1927~1933年任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1933~1938年为驻美国全权代表。后来从事教学和写作。

事要塞。过了一段时间我被逐到瑞士。

这次被捕和被逐出奥地利之后，我就同中央委员会住在一起，担任党中央机关刊物的编辑，为当时的《共产党人》杂志^①撰写有关社会民主党的文章。

我出席了伯尔尼代表会议^②。这一阶段的末期我同弗·伊·之间产生了分歧，在这些分歧中我的意见是错误的。这些分歧涉及和平口号问题。我认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同和平口号并不矛盾。弗·伊·指责我是半无政府主义^③，因为我认为进行争取民主要求的斗争的同时必须直接进行社会革命。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提出反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斗争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的问题。当时我还有一个重大的分歧意见，就是关于民族问题的分歧意见。我同国际社会民主党即波兰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荷兰社会民主党和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左派一起反对民族自决权，说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提出一个口号：民族自决权就是偷偷地推行保卫祖国的原则，因为我认为，这一权利不值得保卫。这里主要的错误是，我们对革命运动发展进程的多样性毫无认识，这一运动既包括无产阶级革命，也包括民族战争、武装起义，这在弗[拉基

① 1915年9月出版了惟一的一期《共产党人》杂志（合刊）。出版计划由列宁制订。编辑部成员有资助出版的格·列·皮达可夫和叶·波·博什，以及尼·伊·布哈林。是由于列宁同编辑部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产生分歧而停刊（见《列宁全集》第27卷第307～309页）。

②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支部代表会议于1915年2月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伊·费·阿尔曼德、格·雅·别连基、尼·伊·布哈林、格·叶·季诺维也夫、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尼·瓦·克雷连柯等人。列入议程的主要是战争和党任务问题。列宁坚持和发展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论点，这些论点获得了一致赞同。布哈林在提纲中反对民族自决权的要求，反对最低纲领的要求，认为这些要求和社会主义革命是矛盾的。

③ 见列宁给亚·加·施略普尼柯夫的信（《列宁全集》第47卷，第273页）。

米尔]·伊[里奇]的一篇名著^①中已作出过阐述。围绕这一问题在《共产党人》编辑部内产生了分歧。

在经历了一连串的磨难之后我转入了秘密状态并离开瑞士。从那时起我的名字不再是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而改为摩西·阿贝·平库斯·多尔哥列夫斯基，我穿越了瑞士、英国和法国等国的边界。结果并不十分顺利，因为在纽卡斯尔我在即将登船时被捕，不过最后还算比较顺利，因为我已学会熟练地签署摩西·阿贝·平库斯·多尔哥列夫斯基这个名字，他们便决定把我放了，但在护照上盖了个黑色印章，表示我是嫌疑分子。

之后我动身前往瑞典。我应当起转运站的作用，即接送人员和传递消息等。我准确按时地完成了这些任务。我开始在瑞典左派小组工作。我在后来发展为瑞典共产党的青年联盟工作过，我们出版小册子，接送人员，把从俄国来的通讯转给中央刊物等等。我在瑞典刊物做编辑工作，定期为极左派的刊物《风暴之声》供稿，经常在这一刊物上发表文章。而后我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组织和我们党中央的情报部门工作。因为瑞典当时肯定要站在德国一边，所以我们产生了必须进行真正的斗争的想法。我们打算召开反战代表大会。

我被捕了，后被释放，尔后再次被捕并被投进监狱服苦役，我衣衫褴褛，对我的审问滑稽可笑，关于这些审问可以写一本有教益的书。我被监禁几个月后被驱逐并前往挪威。在挪威我在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组织工作。主持其机关刊物《阶级斗争》的工作，而且有时从头至尾由我一人撰写文章。

^① 看来是指列宁《论正在产生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倾向》一文或《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98~107页，第115~170页）。

后来出于一系列考虑我必须到丹麦去，在那里的德国工人中间开展工作。

由于我被邀请前往美国把孟什维克的报纸^①争取过来，我行动有点不够谨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我已无法在丹麦呆下去，只有一个办法——逃到美国去，我在施略普 [尼柯夫]^②的帮助下如愿以偿。

我取道瑞典前往美国。在那里我险些被捕，因为我随身所带的钱达不到要求出示的数量。好在我有一封布兰亭^③的信，我就靠它到了美国，到了纽约。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我几乎走遍了整个美国。革命爆发时我正在芝加哥。在我们的拉脱维亚支部的帮助下我们从孟什维克手中夺走了《新世界报》，建立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中央。

二月革命爆发时我正在芝加哥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久我即取道日本前往 [俄国]。在日本，经片山潜^④帮助我与日本革命派别建立了联系，我同片山潜在美国是好朋友。我动身前往莫斯科，一路上在士兵中开展所谓的瓦解工作，我认为自己只能活两个星期。在当时周围的人们都充满爱国主义精神的情况下，我公开号召推翻临时政府，消灭战争，最后被孟什维克的车里雅宾斯克代表苏维埃逮捕。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纸电文使我获释并送往莫斯科。可以说，我进行了很长的一轮鼓动，因为从纽约出发的行程大约为

① 指的是1911~1917年在纽约由一批俄国侨民出版的《新世界报》。从1917年1月起布哈林成了该报实际上的编辑。

② 施略普尼柯夫，亚·加·（1885~1937）——1901年入党，1914年初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的委托前往斯德哥尔摩工作，以建立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同中央委员会国内部分及彼得堡委员会之间的联系。1920~1922年是“工人反对派”的组织者和首领。1933年清党时被开除出党。遭镇压。死后恢复名誉。1988年12月恢复党籍。

③ 布兰亭，卡尔·亚尔马（1860~1925）——瑞典社会民主党领袖，第二国际领导人之一，瑞典议会议员。

④ 片山潜（1859~1933）——日本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日本共产党的创建人和领导人。

45天。在莫斯科，我被选人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并成为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之一，而且当时进行工作的所有同志都知道，无论哪个工厂开会，我必定要进行所谓的瓦解工作。

1917年7月我当选为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是报告人，接着又负责起草第六次代表大会宣言，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我们党处于半地下状态的时刻召开的。1917年秋天我属于坚持起义方针的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别，反对一部分采取动摇或妥协和动摇立场的同志^①。我积极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我以莫斯科委员会的名义在工会中活动，反对国务会议^②，属于同莫斯科组织中的机会主义动摇情绪进行斗争的那个部分。我作了关于在莫斯科起义前夕逮捕资本家的报告。参加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关于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问题的决议，我说过，如果资本家不滚开，我们就逮捕他们。而后我参加了准备起义的文字服务工作：参加起草宣言。

后来莫斯科组织派我去报告起义的过程，我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党团会议上发言，十分激进地要求枪毙那些擅离职守的同志^③。我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关于莫斯科起义的报告，就在当时〔我〕被

① 指维·巴·诺根、彼·格·斯米尔多维奇、П. Н. 库什涅尔等人。

② 国务会议是临时政府在1917年8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在1917年8月6日通过“关于8月12日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指出这次会议是反人民的阴谋。布尔什维克本应发表声明揭露这次会议，然后退出会议。但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人不让布尔什维克参加代表团。

③ 指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弗·巴·米柳亭、维·巴·诺根、阿·伊·李可夫于1917年11月3日退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以抗议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拒绝建立一个“从布尔什维克到人民社会党人”的联合政府。米柳亭、诺根、李可夫以及伊·阿·泰奥多罗维奇辞去了人民委员职务。附和他们声明的有达·波·梁赞诺夫、尤·拉林（米·亚·卢里叶）及其他负责工作人员。

任命为《真理报》的编辑。在立宪会议^①内我是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主要发言人。

而后我的最大一次失败是布列斯特和约，当时我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首领，这些人对问题的看法很幼稚。政治上这是对庄稼汉的估计不足，实践上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跟着这一派别走，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就会遭到极大的危险，说得重一点，就会灭亡[……]^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得到了多数票，于是结局不错。德国之行以后我承认了整个“左派共产主义”的这个错误。

详情我就不讲了——当时在经济建设，一长制方面有些分歧。

1918年秋天我作为我们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专程前往德国，以便同积极进行革命斗争的李卜克内西^③、梅林^④等人建立联系。我同越飞^⑤大使一起被捕，而后成了霍夫曼^⑥将军手中的人质。后来我被释放，乘车到达明斯克，接到电报后又重新出发去参加全德工人和士兵代表大会。途中一天夜里德国军官把[列车]调到了另

① 立宪会议于1918年1月5日在彼得格勒开幕。立宪会议的大多数成员拒绝讨论布尔什维克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相继退场，几小时后会议被警卫部队驱散，1月6日夜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报告通过了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

② 下一句难以辨认。

③ 李卜克内西，卡尔（1871～191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19年1月柏林工人起义失败后遇害。

④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创建人之一。

⑤ 越飞，阿·阿·（1883～1927）——19世纪90年代末起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初任苏俄代表团团长，后为团员，最后任顾问。在此后的年代从事外交工作。赞同托洛茨基观点。1927年自杀身亡。

⑥ 霍夫曼，麦克斯（1869～1927）——德国将军。1916年9月起任德军东线参谋长，实际上是总司令，在苏俄同德国及其同盟国举行的布列斯特和谈中，是德国代表团中起举足轻重作用的人物。

一条线上，[结果]我又落到了霍夫曼将军手里，除我之外还有拉狄克^①、马尔赫列夫斯基^②及其他一批人。那里的处境相当不妙，但我和拉狄克成功地策反了押运队。他们提出如发生悲惨事件即引渡全部军官。军官们吓死了，3分钟之后便通知将我们释放。把我们送到国境，安置到列车上，他们就走了。然后红军过来把我们带走了。

我积极参加了镇压左派社会革命党叛乱的行动。

过了一段时间我先当上政治局候补委员，后来又当上政治局委员。

我曾任中央委员会驻全俄肃反委员会有否决权的代表，处理了一系列案件，其中包括“民族中心”^③案，此案处决了大约65个人。所有这些人的名字和鉴定都是我写的。

有一次我在列昂季耶夫斯基巷作报告时，发生了爆炸^④。有人三次企图[对我]实行暗杀，我都幸免于难，但有一次一位刚参加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姓沙波什尼科夫的军队同志却遭杀害。

-
- ① 拉狄克（索别尔松），卡·伯·（1885—1939）——19世纪90年代初起参加波兰和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7年和1936年两度被开除出党。1937年1月30日因所谓的“反苏平行中心”案被判刑。1989年6月13日苏联最高法院全体会议撤销了判决。1989年恢复党籍。
- ② 马尔赫列夫斯基，尤利安·（1866—1925）——波兰、德国、俄国革命运动的著名活动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创建了“斯巴达克联盟”。1919年起为德共中央委员。参加创建共产国际。
- ③ “民族中心”——反苏维埃组织。大本营设在莫斯科。该组织成员主要为知识分子和企业界的代表，按党派划分主要是立宪民主党人。1919年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取缔。总共逮捕了大约700人，其中67人被判处死刑。
- ④ 1919年9月25日，在举行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大会的列昂季耶夫斯基巷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所在地发生炸弹爆炸事件。这次恐怖行动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干的。

我是共产国际创建工作的积极参加者之一。起草过共产国际纲领。作过有关议会主义的报告，参加了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领导工作。

1921年我在工会问题争论方面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大家知道，当时有好几个派别。我起初持所谓的缓冲立场，也就是介于“十人”纲领和托洛茨基观点之间的立场^①。这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一篇著名文章^②中已经指出了，当时[我]支持施[略普尼柯夫]关于必须由工会组织来推荐经济部门领导人的人选的论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了一篇措词尖锐的文章。在工会争论中，我们试图把“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同托洛茨基的“生产场所”统一起来，为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一篇堪称周密运用辩证方法的措词极其尖锐的讲话中嘲笑了（我们）。[……]^③。

我在这一时期从事工会工作，代表中央委员会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报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我起草了关于党的民主的决议^④。

后来我工作过的部门有：政治局、共产国际执委会及其主席

① 《十人纲领》由列宁、杨·埃·鲁祖塔克、斯大林、米·伊·加里宁、格·伊·彼得罗夫斯基、费·安·谢尔盖耶夫（阿尔乔姆）、米·巴·托姆斯基、列·波·加米涅夫、索·阿·洛佐夫斯基、格·叶·季诺维也夫签署。他们认为工会是学习管理的学校，是学习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党同群众的联系渠道之一，他们论证了首先应当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进行工会工作的必要性。列·达·托洛茨基、尼·尼·克列斯廷斯基、格·列·皮达可夫等人主张工会国家化。布哈林是“缓冲集团”（尤·拉林、格·雅·索柯里尼柯夫、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的首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纲领。

② 指列宁《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错误》，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40卷，第263～306页。

③ 难以辨认。

④ 指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建设问题》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49～63页，人民出版社版，1964。

团、《真理报》、《布尔什维克》杂志和各条“战线”。而且中央还委托我从事与青年工作有关的工作，即发表意见和领导共青团中央。

大家知道，列宁逝世对所有人和我个人都有很大影响，因为弗·伊·临终时我在场，我非常爱戴他，不仅把他当成一位政治领导人，而且当成一个人来爱戴；列宁同志逝世后，我与其他同志一起同托洛茨基主义进行了斗争。这点我不想多谈；你们大概是知道的，那时我没有特别的过错。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我参与制定了共产国际纲领并在相当大程度上主持了代表大会，负责起草了那一时期党的许多文件。

随后开始了右倾机会主义形成的时期，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应当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时期，它表现为我被开除出政治局、共产国际主席团、《真理报》等机构。我要说，这些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仅凭当时我所坚持的政治方向，就不可能把我留在这些机构内，而且我的留任只会阻碍对同我当时那种完全错误和极其有害的政治方针的斗争。

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时期吧，因为我认为，在对我进行审查中这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重点应放在这里。

我只是想提请同志们注意，我做了不少工作，也犯了不少错误，所以我如果漏掉了什么，请不要以为我不想说。我愿意对每一个问题从实际上和政治方面作出回答。

我还忘了说开场白。我认为，我参加清党对我们党来说意义很大而不是很小，这是因为一大批年轻的同志可以从中受到一定的教育，在动摇的一切根源及其实际危害都已一目了然的今天更是如此。

这就是我近些年来政治错误（同志们，这里我首先要再重复一遍我在党的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发言，我的发言刊登在我们的

中央机关报上^①)。

现在，此时此刻，我丝毫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我认为，这几年我一直在积极地捍卫党的总路线。

但是另一方面，我应当马上说，如果谈到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体系的发端者，那么我是这方面的主要人物，因为所有最重要的说法、所有观点的提出，我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我决不会把责任推到任何人头上，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逃避。

我想，首先简略地谈一谈当时的形势是适宜的。

我先心平气和、分门别类地谈一谈，对错误作出分析，然后对此作出政治评价。而且我不会心平气和地谈第一部分作为挡箭牌，从而逃避最尖锐的政治评价，因为一般说来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稍稍全面的批评；我认为，必须这样做，免得半吞半吐的。

如果这样来谈论错误，那么我的主要错误就是由于在哲学上经常倾向烦琐哲学而对辩证法有不正确的认识，或者说根本不懂辩证法。

我认为我的主要错误是根本不懂新经济政策的不断展开的矛盾。

我当时大概是这样看问题的：援引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话并以他的话为依据，却对他的话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我认为，]我们在恢复时期稍稍壮大并展示了自己的工业化之后，小生产者已不能把我们压垮。我们将有许多经济组织、银行及一大批其他调节机构；进入这一网络的小生产者（包括富农）越多，这一网络就越能坚持得久，反复就越少，其他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弗·伊·说，重点是和平的鼓动工作，我也正是这样解释的。

^① 见1933年1月14日《真理报》。

对于从新经济政策开始直到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整个路线，首先应当理解它，〔而〕不仅仅是谈论它。这样提问题是不正确的。应当看一看所有阶段是怎样具体形成的，并根据这些阶段作出总的结论。

这些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正当我提出这些说法并在后来以此为依据并且不断重复时，经济和阶级斗争领域出现了巨大的矛盾。富农壮大了，富农已经通过简单商品经济组织起来，于是出现了来自农村的、得益于中介资本和商业资本的残余的加强的资本主义成分和沿着我国大工业的路线前进的社会主义趋势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我曾设想，由于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平衡杠杆，一切都将自然而然地发展，由此而产生了著名的“长入”理论。在这方面我甚至主持通过了几个决定，甚至还发表了包含所有这些内容的执行委员会决议。我并不是想以此来诋毁党的方针，相反，这是由我的过失造成的，因为我当时身居要职，我的错误论断甚至影响到正式的工作。我关于长入的论断类似伯恩施坦^①。他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长入，而我讲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的长入。这方面一个很大的错误是认为，既然资本主义有其平衡杠杆，有银行，那么我们也有银行和自己的平衡杠杆。我当时认为，我国简单的商品经济的基本趋势是巩固殷实农户。我没有注意到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我认为，现在一切经济命脉都掌握在我们手里，再加上我们有社会主义的平衡杠杆，因此我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进行调整。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趋势有利于发展的是这些大杠杆，而不是有利于小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扩大商品经济方面我预见了反对社会主义杠

^① 伯恩施坦，爱·（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首领，修正主义理论家。

杆体系的那些成分。当时我国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矛盾特别尖锐，所以我当时所作的类比是错误的。

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弗·伊·总是说，我的一个长处就是把一切都归结成一个根源。而根源就是不能辩证地提出问题。我不是对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套用死板的公式：资本家有其银行体系，于是我们也有自己的银行体系；资本家有其平衡杠杆，于是我们也有自己的杠杆；那里是长入资本主义，于是我们也将长入，不过是长入社会主义。这个前提也是错误的。我没有考虑到我国当时面临的全部复杂性和所有矛盾。当时我国的粮食收购方面存在怠工现象。党采取了打垮富农和以社会主义大经济取代富农经济的方针。而我却提出一整套错误的东西。我认为，发展殷实农户比较容易，[而]后再对其施加压力。我提出了提高工业品价格的计划，以便在这一基础上建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这样，靠富裕[农民]和富农，当然还有中农农户，进一步进行建设，即靠富农成分迂回前进。

一盘棋可以有多种下法。但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不正确的，因为这实际上会导致[……]^①富农阵地的加强。结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比重得不到增长，得到增长的是富农经济的比重。

我们当时怎么可能迂回前进呢？由此产生的后果将是在以后面临复辟的可能。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如果富裕阶层的比重提高了，如果它们与城市资产阶级成分联合起来，再加上知识分子，加上所有有害进程，加上必不可少的外部局势的紧张，那么就会出现反面性质的危险。

这样一来，就不懂得阶级斗争的一系列阶段，不懂得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由此产生了我们未能展开社会主义进攻的祸根，它导

^① 以下几个词写得难以辨认。

致了富农分子的反抗。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应当弄清一个简单的道理——我们断了富农的前程。当我们一开始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就断了富农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发展的前程。

从上述整个情况〔得出了〕对富农施加压力的结论，由此得出了断掉富农发展前程和消除这个整个机制的问题提法，恕我直言，这一机制同形势有关。由于这种不理解，我们得出了一系列同后来被称作阶级斗争递减曲线的说法有关的结论^①。这些话我都没有说过，但实质上就是这样，党在这方面做得对。

形势要求我们从各个方面而不是从一个方面加强无产阶级阵地和工业化。我们应当奠定自己的工业基础，以造成能巩固社会阵地的真正有效的杠杆。最后，我们必须这样做也是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就是为了保证国家的独立。

当时我提议，并有一大批同志附议，从大量收入中^②寻找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工业化所需资金。这是空想的、错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想法。这样呼吁是可以的，如果能够放弃我国工人阶级进行的工业化的高速度的话。其次，调动无产阶级以及所有其他方面的力量的方针这里不见了。

我们开始加紧实行集体化时，还没有打下今天的机械化基础，但为的是明天开始打这一基础。我当时认为，不追求生产结合，保留商品结合的形式，就利用税收的杠杆。这〔会〕导致出现加强我们的敌人的趋向。

当时我们实质上已在其他业已形成的杠杆的基础上跨入新经济

① 布哈林指的是他在1928~1929年间的讲话，他在讲话中反对斯大林提出的所谓随着苏联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理论。

② 原件如此。

政策的又一个阶段。

在其他“细节”中包括下面一些“细节”：我的论断同人们若干年前可能作出的论断一样。而且当时还形成了这样一些杠杆，以致可以提出用各种杠杆对农村施加巨大影响的问题，这些杠杆中也包括组织的杠杆，镇压富农的杠杆，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杠杆，等等。当时首先提出我所不理解的生产结合的公式。当时已经使用的是那些若干年前还不曾有过的业已形成的杠杆。这样一来，在对小的和细小的经济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方面的问题提法就发生了变化。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在这方面起了作用。细小的和小的经济已不再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飞速发展的充分基础。当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行集体化等的坚定方针已显而易见。因此出现了一系列其他问题。

还有两个问题必须指出，它们在这方面必须涉及到。我指的是填补我在《真理报》刊载的一篇文章（《一个经济学家的札记》）^①中为之辩解的所谓“薄弱环节”。我由于对向农村施加影响的种种可能性估计不足，认为必须极其谨慎。我认为，首先应当寻找限制的因素。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问题是我们进入了改造时期，而我却没有想到这一点，这是个错误。当时问题在于必须来一个跳跃，要进行改造，要加紧进攻，这一进攻在经济技术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有了相应的速度。当时没有坚决地提出这些“薄弱环节”。当然，这并不是说，无产阶级想干什么就能够干什么，这并不是说，这里不应当估量形势，然而这样的公式表明，这一方针有某种消极的东西，而当时要求坚决跨越障碍，要求有坚定、大胆的方针，坚决打破当时形成的比例。不打破比例，就不能着手进行改

^① 见《布哈林文选》中册，人民出版社，1981。

造，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转而实行改造恰恰意味着打破国民经济各部分之间的旧比例，坚决向重工业倾斜。过后只有像现在这样，才谈得上轻工业的增长，谈得上以将近3倍的速度增长，但这恰恰是具有极其强大的重工业基础的时候。我当时根本不懂断然打破的必要性。

最后必须提一提对外政策方面。假使当时党没有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同我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假使当时没有在工业方面、在军事工业、航空工业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那会怎样呢？

当时有两个阵营。然而应当说，脱离自己的阵营是不可能的。你要是脱离自己的阵营，必然会进入另一个阵营。假使处理得不果断，假使采取另外的方式，那就会使过程拖长，而且也许对于那些日后认识到自己错误的同志反而更不妙。因此我应当说，把这一切看做是富农的代理人的活动是正确的，采取的所有措施及组织结论是正确的。我只能对我犯的错误感到懊悔，但不能因中央当时对我采取的措施感到懊悔。

主席：如果右翼反对派得势会怎么样呢？

布哈林：那就会出现严酷的党内斗争。这一斗争必然超出重大党内斗争的范围，党内斗争会演变成鼓动起一切反对社会主义进攻的分子的残酷的国内阶级斗争。这样一来，就会给敌人在阶级斗争中造成更多的机会，复辟的危险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况且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阶层。富农当然不是资本家阶级，而是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富农的旁边是殷实农民，殷实农民的旁边是在这种大混乱中一直摇摆不定的那部分中农，其次在城市还有懂技术的知识分子。这些势力在总的力量对比中并非无足轻重，至于有关资本主义复辟的提法，我完全赞成这个观点，并认为有必要再重复一遍。

许多了解我的老同志可能会问：这怎么可能呢？但问题不在这

里。我当初认为可以今天愚弄富农，明天就把它消灭的想法也许太随心所欲了。实际上呢，我在纵容富农，尽管我准备把整个一生都献给无产阶级。实际结果却恰恰相反。因此这一悲剧一次次地极其清楚地说明，我们的队伍必须有真正铁的纪律、思想一致和行动一致。

我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人犯错误也是在那一时期。这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领域，我应当指出，我所犯的一些重大错误成了所有其他问题的基础。我对资本主义的稳定性估计过高，因而，用相当明确的政治语言来讲，我在某种程度上庇护了德国共产党的调和派及其他一些派别，因为当时德国出现了同俄国问题有关的各种各样的分歧。主要错误是对资本主义的稳定估计过高。在这方面斯大林同志和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这已为后来整个事件的进程和后来的思想方针所证实。

这里我还要就自己理论错误说几句，因为既然要清理，那就应当全面清理。同志们，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是我国和整个共产国际的某种理论力量。为避免任何误会，我要说，现在出版了成堆的专著和教科书反驳我，反驳我所写的东西（布拉托夫：比您写的东西还多），——多得多。老实说，对于反驳我的所有文字，我并不是句句都同意。对于党的正式决定中说的一切，我完全赞同，对于弗·伊·所说的一切，我完全赞同，但我请大家别要求我句句都同意。我认为，这方面的文献中有许多东西是正确的，我要说，其核心是正确的。但不应由此得出结论：不管是谁写的，所有文章我都应当奉为律条，因为人们像我一样同样有错误。

首先我不打算对有益的工作说得过多。我认为，我在自己的一生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其中包括理论工作。我要在这次会上谈谈自己所犯的确实很严重的理论错误。弗·伊·在著名的遗嘱中揭示了这些错误的经典根源，他说，这样宝贵的理论家却不懂得辩证法。

“理所当然的”全党喜欢的人物却不懂得辩证法^①。说得多么好。

你们看，我的核心问题是：迄今为止我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没有研究过黑格尔学说。过去我的学识非常渊博，现在也是如此。从年轻时起我的学识就非常渊博，大概当时我们党内像我这样博学的人为数不多，但我没有研究过黑格尔学说。

我熟知经验批判主义^②、实证论者^③、康德^④，熟知旧唯物主义者，但对于黑格尔^⑤，说实话，我的评价不高。我当时认为，这是抽象的东西，是用适合于老处女的语言写成的连篇废话，我可没功夫去研究这种东西。

因此，如果谈到我的哲学观点的基础，那么这些观点首先是（现在用不着羞羞答答而应直截了当地说）机械唯物主义和某种折中主义的混合物，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受了波格丹诺夫^⑥的深刻影

① 见《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

② 经验批判主义——哲学流派，19世纪末产生于德国和奥地利，20世纪由于自然科学遇到危机而得到传播，始人为瑞士哲学家理·阿芬那留斯和奥地利物理学家恩·马赫。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这一流派进行了批判。

③ 实证论——产生于19世纪30~40年代的哲学和社会学流派，它断言哲学作为试图对现实进行翔实的研究的独立科学没有存在必要，认为真正的、“有益的”（“实证的”）知识就是各个专门学科或这些学科的综合的总成果。而获得综合成果被看成是新的、“实证论”哲学的任务。实证论著名代表人物有奥·孔德、约·斯·穆勒、亨·托·巴克尔、伊·泰恩、赫·斯宾塞。

④ 康德，伊曼努尔·（1724~180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创始人。

⑤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1770~1831）——德国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者。

⑥ 波格丹诺夫，亚·亚·（1873~1928）——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医生。19世纪90年代起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的编辑。后成为召回主义的首领。经验批判主义的变种——经验一元哲学体系的创始人。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是“无产阶级文化”的鼓吹者。1926年起任输血研究所所长，在自身输血试验中不幸牺牲。

响。[……]

他那不同寻常、非同一般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印象。他是俄国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之一。我认识他本人，读他的书，就像我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一直读他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我想从内心摆脱这种影响，但这种影响已在我的身上深深扎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的混合物、经验批判主义的混合物，就是我所推销的那个金玉其外、貌似高深的社会主义大杂烩，但它有着很大的缺陷，这种缺陷表明我没有研究过黑格尔学说。但在那时总共只有两三个人研究过黑格尔学说。我对黑格尔有成见。我甚至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这个问题讨论过，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信给我，说我要是能通读一遍黑格尔的著作，那他一定把波格丹诺夫的同义反复的书全都读一遍。但我当时认为读黑格尔的书，读这样的鸿篇巨著枯燥无味。

如果谈得更具体一些，那么这种不正确的想法导致了什么结果呢？

第一，把运动解释为仅仅是机械运动，这在我的著作中屡见不鲜，哲学著作和政治经济学著作中都是如此。在这方面我是始终如一的。我的著作中不正确的哲学观点比比皆是，在许多哲学著作和政治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运动的所有各个领域及对运动的本质的各种评价，所有这些都建立在机械论的基础上。就是所谓的“平衡论”。我本来可以把平衡论写得比人们对我的批评要好得多。人们对我说：“你谈的是平衡中的静止，而应谈的是运动”。我谈的不是静止，我谈的是作为运动的一种形式的静止。然而由于我们这里人们对平衡论不甚了解，因此他们认为动态的平衡就是静止。而我所谈的恰恰是动态的平衡。

然而我的主要错误是把平衡的变化当作出发点，而应当是把平衡的运动当作出发点并把平衡的形式看做变动的形式。整个“平衡

论”都是不正确的理论，这一理论是反辩证法的和机械论的。但（在批评我的理论时）人们写了许多庸俗政治学的东西。

其次，我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极其重要的特点不理解。我把一切都归结于单个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我引申出一系列辩证法定律。早在青年时代我对马克思的理解就是诡辩式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理论，于是我就认为，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这是不正确的。

至于其他问题，世界经济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等等，那么我在两三年前的正式声明中已经谈过这些问题，我现在彻底放弃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

我为什么会主张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理论呢？如果又说到哲学根源，那么这不是辩证法的深奥道理。我曾有过这种倾向，我醉心于此并藐视一切，对其他矛盾视而不见。我当时没有这样的精微，所有这一切铸成大错。我彻底思考过，但却是歪曲的，因而最终也未能把握住整个矛盾。

有人说：请谈谈转化论。

布哈林：转化论中既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感兴趣的是什么？

在过渡时期，错误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方面，出于垄断和竞争的相互关系方面，出在一系列与我上面所讲的有关的其他问题方面。

布拉托夫：那么新经济政策呢？

布哈林：谁能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的两年前就知道要搞新经济政策呢？如果您谈的不是未来而是过去，——伊里奇说过，我们开始是有一个纲领的，但后来国内战争打乱了我们的计划。

所有这些问题我都参与了，我的公式化也表现在这方面。我本应提出更加〔谨慎〕的说法，以便说明可能有各种途径。

关于国家和自决，关于和平长入理论 [……] 我认为，我基本做到了伊里奇关于黑格尔学说的教导。我写过一些著作，同志们可以评判一下其中旧的东西剔除得如何。

我再说一遍，我远未涉及所有问题，因为那样一来就得把我所有的著作都复述一遍，但一些尖锐的政治问题我必须谈一谈，否则你们完全有理由责备我。

我应当尖锐地提出党内斗争和党内制度这一政治问题。我认为，对这一问题应当更详细地谈一谈。弗·伊·逝世后，正确的领导未能立即形成。斯大林的领导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当时存在着党内斗争，同时也存在着上层的斗争，斗争涉及到一系列党政方针。我们失去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天才，我们失去了弗·伊·，后来，如果从大范围讲，希望得到领导职位的有三批人：一批是有意识的，另两批是不完全有意识的——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的领导班子和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尽管我并不想取得权力，但这是不作数的。对问题应当抱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讲得清楚，明确，客观。这里自有其党政方针。

托洛茨基主义为什么遭到失败，根源何在？问题在于托洛茨基暗地里不相信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从许多方面都能看出来，这同托洛茨基在革命的某些时期起积极作用并不矛盾，尽管他所起的并不是通常认为的积极作用，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不失为积极作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显然认为应当冲破历史：不是完全成功，就是彻底失败。但在作为他的政策核心理论方针的深处，是暗地里不相信能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他认为苏联不是一个同资本主义相对抗的体系，而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添头，资本主义这个强大的对手把它纳入了自己的体系范畴并将魔爪伸向这个名叫苏联的较弱的添头。正因为如此，也正是由此便产生了早已出名的公式：如果没有西欧国家无产阶级的国家帮助，即没有德国、法国、美国和

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不是社会主义灭亡，就是社会主义政党蜕变。

布拉托夫：你这位“左派共产主义者”当时是否抱着这种观点？

布哈林：不完全是。我当时的思想状况是：对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态度不明朗，但并未抱着我们一定蜕变的观点。

我还犯了另一个大错。我认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主张（照我当时所用的难听话）是不愿意打仗的投机小贩的主张。庄稼汉大量涌入了党内。

布拉托夫：你在提纲里不是这样说的。

布哈林：那是莫斯科局的提纲^①。我同它没有任何关系。当时我竭力摆脱它。

布拉托夫：我这里有一份摘录（读）。

布哈林：完全正确。我可以在我的小册子《阶级斗争和革命》^②中举出类似的东西。我当时并不这样认为。我不认为我们会灭亡。不同之处在于：我认为我们应当进行干预，这必将导致世界革命。关于不可避免会发生热月蜕变的提纲，在我的著作中是找不到的。这是错误的提法。这是未经深思熟虑的理论观点。所有这一切托洛茨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因此我认为，当托洛茨基鼓吹所有这些货色时，党立即粉碎了他。根据是什么呢？这是赤裸裸的热月事件。我们应当开创改革时期。他的观点是：这不会有任何成果，要不就是你们开始蜕变了。这一逃跑观点、投降观点已被粉碎。

^① 可能是指恩·奥新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起草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提纲》（载于1918年3月14日《共产主义者报》第8号）。

^② 指布哈林的著作《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1917年莫斯科版；1919年莫斯科、彼得格勒版。

至于右倾路线，我对它作了相当多的评述。我再说一遍，党处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因为同已冒头的自发势力的斗争相当艰巨。这场斗争是严酷的。我们现在的领导，我们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在两翼进行的斗争中以斯大林为首的领导，在所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既包括理论方面，也包括政治指示方面，还包括组织实施党内斗争方面等等。

这里我再说一遍，总路线的制定和干练地进行粉碎反对派的斗争，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动员，共产国际中的正确路线，对外政策方面极为出色的路线，这都是在两翼进行的斗争中形成的领导的功劳，是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功劳。所有这些问题上的〔功劳〕：远东的具体军备、非常措施、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①的方针及其他一系列问题上的〔功劳〕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归于列宁直接而合法的继承人——斯大林同志。

所以我要说，可以把斯大林同志看做我国革命力量的思想统帅（鼓掌）。

我要说，与此相关连的是制度问题。

我在第一次发言中已经谈过，现在还要作些补充。那一次我忘了谈一个想法。我认为，也许是不自觉的，但关于某些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反党观点的事情问题，当年反对中央的斗争，大概都同和平长入的幻想有关。这也许是纯粹的个人隐私吧，但我认为在我犯严重错误的整个时期，我始终自认为是党的儿子，我是在党的怀抱中成长起来的，从刚刚懂事时起，从孩提时代起就为党工作。如果说我发生过动摇，那是因为我对我们还在进入的时期缺乏认识。我想说，在组织上这同平静的发展进程的观念有关。我今年45岁，

^① 马克思主义者土地问题专家代表会议于1929年12月20~27日举行。斯大林在代表会议最后一天发表了讲话（见《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26~151页）。

我入党已 25 年，我入党 25 年发生过 4 次严重动摇，这够多的了，但有的人比这还多。

谈谈制度。我想说，有些在第一个报告中作了简要的叙述。问题在于，我们不久前纪念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著名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由于这次代表大会同孟什维克发生过争吵。我认为，在列宁的天才贡献中，他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党本身变成了科学分析的客体 and 对象。我们有一种偏见，认为分析工艺流程是科学，分析整个社会是科学，但如果有人提出研究党问题，研究这个学术问题，那就不是科学了，就是不屑一顾的事情。同时我认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实践等领域中的列宁阶段，与俄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普列汉诺夫阶段（更不用提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了）的不同之处，在于理论与实践的密切联系和积极行动的方针。这一点可以从一切方面得到证明，从认识论到对自由派的态度，[……]^①

因此，早在列宁开始研究党的问题时，他就把党的理论同政治结合在一起。我说的理论不是一般 [理论]，而是专门研究什么是党、党活动的条件如何的理论。列宁把这同未来阶级战争的进程连在一起。我们正面临国内战争——我们应当建设一个战斗的党。我们在未来世界规模的阶级战争展开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正由此走向世界共产主义。我们应当成为一个战斗的党，而不是争论俱乐部，不是费边社式的团体，应当成为一个有核心的党。这是对问题的科学提法。它已付诸实践。党正在向世界进军。

因此我认为，党章第一条——这不是普通的第一条，也不仅仅是个组织问题——，它同关于革命进程、国内战争、无产阶级专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观念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

^① 以下至句末无法辨认。

我想说的是，这种解释是科学的解释，这是党的理论。而且我应当说，因此我们有的只是铁的纪律，仅此而已。这是由我们党的战斗结构所决定的。

因此对制度、压制等进行批评，这种批评并不是最近时期的反对派所特有的。众所周知，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马尔托夫派和托洛茨基派领导人已经提出过所有这些问题。他们指责列宁实行戒严，压制一切自由，采取非常措施，实行个人独裁，使自己成为党的路线的化身，指责列宁是戒严状态下的独裁者。所有这些假民主的空话有着完全不同的基础，具有不同的党性概念。我们正是坚持这样的结构才取得了胜利。

这里历史在重演。当我们这里形形色色的反对派，其中包括第一个反对派和右翼反对派，批评领袖至上和制度、攻击斯大林，所有这些都应作为垃圾扫除干净。党的制度是一个有战斗纪律的、钢铁般的党的制度。我再说一遍，这个党具有历史性领导，它不是凭压制而是凭原则性的政治方针带领我们取得辉煌的胜利，保证我们拥有近年来的这一切，包括美利坚合众国最近承认我们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强国。这表明，我们得到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不想在这件事上散布什么幻想，不必像一个因征服了大叔叔的心而感到高兴的小孩子那样来看待〔这件事〕。

我们还将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值得为我们的成就而鼓掌欢呼。但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大国承认两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存在，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坚不可摧，仅此一点就有很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应归功于工人阶级，因为我们依靠工人群众的英雄主义做到了这一点，然而我们还应归功于我们的共产党、列宁主义的中央和斯大林同志——世界无产阶级的国际大军的远见卓识的英明统帅。

至于说到因我的过错而产生的右翼反革命集团，我在联共

(布)中央全会^①上，在第十七次党代表会议上都[谈到了]，现在我可以再说一遍，我承认自己对那些现在堕落成为反革命集团的人负有罪责。这些人是：斯列普科夫、艾亨瓦尔德、马列茨基、阿斯特罗夫等。我认为我对他们最近所作所为并无责任，但在右倾机会主义露头时我首先“传染了”他们。

我的第二个错误是，我同他们建立了过于亲密的关系，后来他们不再把我放在眼中并摆脱了我的影响，背着我干起了反革命勾当。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最坚决地谴责他们并完全赞成联共(布)中央采取的措施。

我想就党的总路线接受历史检验问题再说几句。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可以分几部分谈，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谈)一个情况。我们人民委员部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关心理论问题的同志、从事党的工作的党员大概还记得，就在几年以前，就在不久以前，我国存在一个私人资本问题。就我国的私人资本应占多大份额、私人资本有多大危险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说法不一，众说纷纭。

私人资本问题曾经由于“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大问题。今天谁还考虑私人资本问题，谁还考虑“谁战胜谁?”的问题呢。在我们看来这已不成其为问题了。就在几年[前]我们引以为自豪的只有一个沃尔霍夫工程，当时正值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生命垂危期间，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好几个沃尔霍夫工程。今天我们已置身于另外一种情况下了。几年前许多人认为，战胜小农经济——这是一个遥遥无期的历史前景，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而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在我国的农业中实现了巨大的革命。

我在报刊上撰文，提请注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的一段话，他说：我越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我就越是确信，农业改革以至

^① 指联共(布)中央1933年一月全会。

小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将是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①神父就是对的了。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工业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小农基础及其所有制已不能养活日益扩大的城市。我不知道马克思还有比这个更激烈的说法。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评论^②你们是知道的。

马克思的正确论断阐明了问题的提法的深度。我们拥有社会主义大经济。“谁战胜谁？”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是个核心问题、决定性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也就是说内部问题已基本解决。因此我们确实把我国变成了工业大国，把小农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大经济，“谁战胜谁？”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我认为，近一年半最大的成就是，我们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建立了新的强有力的劳动刺激手段。在近一个时期，富裕的集体农庄庄员的口号，根据斯大林的指示进行的立法，今年夏天我国庄稼汉感觉到沿着新轨道前进的前景这一局面的形成，——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劳动刺激手段，于是整部机器全速运转起来了。我们将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新人在形成，新的自然财富在国内不断发现，党的团结在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正像莫洛托夫在最近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日本人向我们进攻，我们将把他们粉碎和消灭；美国承认了我国——这一切都同我上面所说的有关。

主要的是，我国的工业、农业，我国的社会主义实力和政治实力的增强。我们开始在这方面收获我国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所完

①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1776～1834）——英国经济学家，牧师。力图用“人口的绝对过剩”，“人口自然法则”的作用来解释劳动者的贫困状况和原始积累时期的失业现象。

② 布哈林引用的是马克思的下述说法：“我越是研究这个臭东西（指比·约·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我就越确信：改造农业，因而改造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所有制这种肮脏东西，应该成为未来的变革的基本内容。否则，马尔萨斯神父就是对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331页）

成的巨大工作的成果。

党的团结——这绝不像某些同志认为的那样是件小事。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试想，一个松松垮垮的党如何在国际搏斗中战胜日本法西斯呢？很自然，加强党的团结的方针是胜利的必要先决条件。

布拉托夫：有危险吗？

布哈林：我已经说过，不应当助长乐观情绪，即使在美国承认我们的问题上也是如此。我甚至认为，危险很可能春天就要出现，在国际形势方面可能会出现重新组合。我认为，危险确实存在。问题仅仅在于，危险何时出现。正因为这种危险我们才特别需要保持党的团结。

在我国，个人意志过去没成为成文法，但在战争时期集中力量和努力需要个人意志。有一个统一的超集中领导，这没什么不体面的，因为这是我们的内部团结和我们的力量不断增强的推动力之一。军队应当有一个久经考验的统帅。只要党存在，只要我们还没进入世界公社，我说的这些话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

现在我想谈一谈我在报告中说过的问题。当时我对所有的团体、部门、方针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现在我想说的是：我作为以我为首的机关的领导人，认为自己的责任首先是把我从事的工作变为党的总路线的具体语言。在科学领域我们必须在两条战线进行斗争。这既不是文字上找托词，也不是为了保险起见不得不说，而是要谈事物的实质。既同经验主义作斗争，也同贬低理论任务作斗争。在技术领域——既反对单纯技术观点，也反对阉割技术内容的空谈。发挥党的方针就自然要把它们变成我们的特殊语言，我谈了这方面的成绩和不足。我们产生了一大批指导思想：技术计划思想，科学研究工作计划思想，我们的全部工作都以这些思想为中心进行。

我想补充一些我个人的情况。首先，我认为需要指出，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以无事可干的人的身份，不是以遭到痛打并因此在这里躲风头的官僚的身份，我从事这项工作，不是把它当成临时性工作和在这儿等待更好的工作，而是认为这项工作是有意义的，我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应当这样说，因为一些同志将就我个人发表意见。至少听到了这样的暗示：这个人倒是作过好的指示，但与实践脱离太严重，没有进行任何具体有效的领导。我承认自己犯过许多错误，但对于这样的评价我却不能同意。我还有其他一些缺点，这我以后要说，但现在我认为必须说，任何最好的思想，最好的方针，只要没有在组织上落实，只要没有有效地表现出来，那就一钱不值。

布拉托夫：需要好的领路人……

布哈林：您恰恰想到了我要说的话。这正是我们共同工作的[共同]点。

请允许我谈谈我个人在机构中的情况。我主管的有科学院、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的科学研究局、技术宣传局、部务委员会。有时我要去办委托我办的事情，例如我考虑过工人供给部的情况。还有任命或审查教授的鉴定委员。各种杂志。其他各种服务机构的附带工作如科学家之家理事会、捷尔任斯基俱乐部等。各种接见。我不仅要接见来自人民委员部的人，还要接见学术界人士、工程师，接触文学作品，有时还要间接推动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等等。有时要审读重要理论著述。有时还有中央委员会委托办的事。例如，高等学校的改革。我经常参加中央委员会有关委员会的工作等等。这纯粹是事务性工作。

说我只是发布一般性指示，那我是坚决反对的。我在科学院作报告。我从事组织工作。我通过上级“推动”问题的解决。前不久我通过中央委员会，后来又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我甚至连预算也

亲自去“推动”。谁都知道，我在党团内是一个决定性角色。我是科学技术研究所的所长。

干练的领导。事事都管，直至房屋的位置。我正做这件事。我有意援引这本马克思主义文集，它获得交口称赞。

布拉托夫：有危险。

布哈林：什么危险？

布拉托夫：被偷走。

布哈林：您是第一个偷的人。人人都说，这本书搞得不错。不是说我的领导“不具体”吗？我不仅审阅所有文章，而且经常下印刷厂，去装订车间，设法搞到所有材料，包括人造革和皮子，还在肃反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收到了运到火车站的一批书。我不得不动用肃反工作人员，把铁路职员吓唬了一通，才收到这100本书。

关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我认为我的所有工作人员都不会拒绝证实：主要指示和行动方针从来都是在我的参与下通过的。我的接待室里来访者络绎不绝。我那儿挤满了人。我不是说这样很好。但我不得不接待大量来访者，我已经感到穷于应付。难道我没有处理有关住房、口粮、申诉问题吗？这些都由我来处理，我认为，可惜我处理的事情太多了。我要为杂志撰写文章，我要发表演说。如果报纸上刊出了有关我们工作的文章，那你们大概知道，这都是我写的。

其次是巡视。现在，清洗结束后，我必须马上去乌克兰，去顿巴斯，去巴统。我从没有拒绝过部务委员会的委托。彼得斯基^①前不久对我说，我是最认真地研究工人供给部的人，在这方面收集了具体的材料。鉴定委员会在我的参与下讨论了学位问题，其基本条例是我起草的。我警告不要让一个废物蒙混过关。所有这些都是

^① 彼得斯基，A. M. ——时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工人供给总局局长。

非常具体的。提起《社会主义改造和科学》杂志，请你们问问杂志工作人员，我不仅要设法搞到纸张，而且要蹲在印刷厂，校改前三次校样。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的领导工作不够具体，我对此无论如何不能同意，我要说，我有很大的过失，但那是另一种性质的过失：第一，我这个人机关工作方面过于民主化，本应由其他同志做的事我做得太多，我缺乏把机关工作人员配备得恰到好处的组织素养。这是我在事务工作方面的一个大过失，由此就产生了我们机关工作的许多严重的问题。这一点我承认。至于我干了所有副手的活，充当〔他们的〕保姆，拉着手把他们送到皮达可夫^①那里去，这也是事实。

所以说我的一大过失就是，有时我不得不处理根本不必由我过问的问题，我们的人员配置不够理想，干部的业务水平不尽如人意。这是我的一大过失。我同意布拉托夫同志的意见：“他不对自己的副手负责”。我对此负有责任，但我再说一遍，如果为了改进工作，就不应当说，你应更具体地进行领导，而应当说，要有一个组织得更好的组织结构，要使工作人员有更高的业务水平，少揽一些应当由别人去处理的事情。这就是我的观点。

现在谈几点结论。结论很短。我认为，我理应从党组织得到组织结论。我声明，我没有也不想提出任何要求，如对工作不满意，有其他希望等。我不想拍着胸脯说，一旦爆发战争，我们将为国捐躯。我认为，这是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义务，我不想在这方面激发人们的情绪。从自己、从一个党员的角度来说，我惟一的希望是我目前这种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原有身份的状态尽快结束。我希望我能满

^① 皮达可夫，格·列·（1890～1937）——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33年任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遭镇压。死后恢复名誉，1988年恢复党籍。

负荷工作，因为机构的惰性太强，我在工作中不得不处理许多琐事，有时是不太好的琐事。

布拉托夫：这是谁的错，是谁让你处于失去原有身份的状态呢？

布哈林：常有这种事：报刊上登了我的广播讲话，随后又予以撤消。我从来没有指责^①。我说的是机构的惰性。机构常常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我可以举出许多这样的事。这方面我有很大的过错。根已发芽，[它们]具有惰性作用。

我希望我不留任何尾巴。我真诚地谈了自己的错误，我将担负党交给我的任何工作，我希望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个人的领导之下，我能够为我们伟大英勇的党和我国工人阶级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做一份贡献，并必将为我从青少年起就全心全意投身其中的这一伟大事业做一份贡献。

^① 原件如此。看来布哈林想说“任何人”。

№06494

清党委员会关于布哈林的决定

(1933年12月13日)

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委清党委员会收到了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组织委员会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关于要求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的决定。

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组织委员会的决定说：

“鉴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的工作对整个工业有巨大的思想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鉴于完成面临的任務需要动员每一个党员关心这些任务的实现。党组织委员会认为，在即将进行的清党过程中我局党组织尤其需要在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对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的工作进行审查，审查每一个党员实际捍卫党的总路线的表现。

因此党组织委员会向联共（布）人民委员部党委清党委员会提出原右倾集团首领、现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领导人和我局党组织成员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的问题。”

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的决定说：

“鉴于布哈林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曾充当右倾集团的思想家和首领，并进行反党活动，联共（布）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向清党委员会提出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的问题，以便审查布哈林同志在他的整个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在对工业有巨大思想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的工作中实际执行党的总路

线的情况。”

根据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1933 年 4 月 28 日关于在某一党员大会或某一党的组织要求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委员或候补委员参加清党并提出理由充分的声明时上述人员应参加清党的决定，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委清党委员会与莫斯科河南岸区清党委员会共同决定：联共（布）中央委员尼·伊·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

布哈林同志向清党委员会表示，党组织要求他参加清党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他“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党内的活动中，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其次，布哈林同志承认犯了理论和政治错误，承认这些错误给党造成的危害，并表示，他认为对他错误的批评及党针对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他还认为总路线和联共（布）中央的实际领导是正确的。关于党的总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布哈林同志说：“总路线的制定和干练地进行粉碎反对派的斗争，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动员，共产国际中的正确路线，对外政策方面极为出色的路线，这都是在两翼进行的斗争形成的领导的功劳，是斯大林同志本人的功劳。”“我要说，可以把斯大林同志看做我国革命力量的思想统帅……我将担负党交给我的任何工作，我希望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和斯大林同志个人的领导之下，我能够为我们伟大英勇的党和我国工人阶级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做一份贡献，并必将为这一伟大事业做一份贡献。”

有鉴于此，清党委员会通过决议：

认为布哈林同志是可靠的。

同时清党委员会认为必须指出，布哈林同志说他似乎总感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是党的弃儿，这种情况根本不是由于党对他的态度所造成的，而只能解释为布哈林同志自己还没有彻底消除他同党的离心情绪。党的组织为布哈林同志提供了一切机会来消除他由于站

在右倾机会主义立场和反对党而造成的同党的离心情绪，例如给他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作报告，在党的刊物上撰文，从事积极的党务工作。同时，党的组织有理由对布哈林同志表示某种程度的不信任，因为在斯列普科夫集团从事反党活动期间，布哈林同志没有极其坚定而明确地同过去是他的学生的该集团成员断绝关系。

因此清党委员会建议布哈林同志消除他同党的组织的离心情绪，他把这一情绪归因于党的组织对他的态度是毫无根据的。

清党委员会主席 （布拉托夫）

№06495

莫斯科州清党委员会主席的请示报告

(1933年12月13日)

联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同志

联共（布）中央书记和莫斯科市委书记卡冈诺维奇同志

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同志

兹呈上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清党委员会（委员会主席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布拉托夫同志）根据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党委核心组和重工业人民委员部科学研究和技术宣传总局党委的要求作出的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尼·伊·布哈林同志参加清党情况的决定。^①

布哈林同志是在公开的支部会议上参加清党的。

本决定尚未与布哈林同志和支部见面。

请指示。

莫斯科州清党委员会主席 （克诺林）（亲笔签名）

1933年12月13日

^① 见本卷№06494文件。

【专题说明】

布哈林案件

(1937年2月至1938年3月)

1934年基洛夫遇刺身亡后，苏联开始了大规模镇压。1936年8月进行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1937年1月举行了“托洛茨基平行中心案”。与此同时，对布哈林的迫害也在逐步加紧。1936年8月22日苏联检察长发布命令，开始审查布哈林问题。后因没有发现罪证而宣布停止侦查。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结束，1937年2~3月联共召开中央全会，主要议程就是所谓布哈林和李可夫问题。会议对布哈林等提出了一大堆指控，布哈林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极其雄辩地有充分根据地为自己以及其他受诬陷的人辩护。全会成立的处理布哈林问题专门委员会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李可夫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案件移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处理。布哈林等被直接从全会会场投放监狱。经过一年的准备，1938年3月开始了所谓“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布哈林是此案的主角。他以抽象承认，具体否认的办法，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辩护。但这已不能改变他的最后命运。布哈林要求服毒自杀，但还是难免被枪毙的结局。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夏风翻译)

№05905

布哈林在联共（布）1937年

2~3月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37年2月26日上午）

我从伊克拉莫夫同志的最近发言讲起。伊克拉莫夫同志大谈所谓右派反革命组织的档案问题，然而这个名称暗指的是我的个人档案。我批评问题的这种提法本身，因为从证词看得很清楚，那里大量的文献是党和共产国际的正式文件。

伊克拉莫夫同志对其中的一个文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但这并不是策特林^①供词中所说的那个文件。策特林在供词中说的是我们的共产国际纲领草案，而伊克拉莫夫同志谈的是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草案，在策特林的供词中关于这个草案只字未提。（喧哗，许多人插话：还是老一套；又是律师的玩意儿）。如果那里有关于当前形势的提纲，如果那里有初稿，此初稿是我提交，后来在斯大林同志指导性的指示的影响下作了很大的修改，即使这样，我也看不出有什么根据把这个草案看做反革命。第二，如果这个文件保存在档案中，我也看不出有任何错误，因为档案中保存的是同某一重要事件有关的全部文件：如果这是纲领草案，那里就有这一草案的各种各样的方案，如果这是提纲草案，那就有这些草案的各种各样的方案。

^① 策特林，E. B.（1898~?）——1918年入党。1926~1928年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编委。1929年是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人员。1931~1933年在苏联工商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后遭镇压。

伊克拉莫夫同志认为，这种东西可能构成对苏维埃政权的危害。我准备回答一切问题，但对这种东西我不能回答。

米高扬同志说，我像托洛茨基那样，给政治局送去大量的信件，致使政治局除了读我的信件外，干不了别的事。但是，要知道，托洛茨基给政治局大量的信是要攻击政治局。而我在这期间没有给政治局发一封旨在攻击它的信。（席上喊声：而最近关于绝食的信^①呢？）同绝食有关的信，请允许我保持自己独立的看法。（科萨列夫^②：而给伏罗希洛夫的信^③呢？）给伏罗希洛夫的信完全是在神经质的情况下写的。其中只有一句话会引起反感，我对此深为遗憾，而从总的看，其中没有任何进攻性的东西。我不能给别的任何人写信。当我写信的时候，在政治局就有人对我说，你抛出大量的信件。如果我给个别政治局委员写信，这看来也不完全合适。说我使用某种狡猾的手法，先给政治局写信，然后给斯大林个人写信，利用他的善心。（斯大林：我不抱怨。）我谈此事是因为有人已提及这个问题，然后提出许多指责和准指责，说我给斯大林写的信同给政治局的不一样。很自然，一个人写信给党的正式机关是一种写法，而在给国内和党内的最高权威斯大林同志写信的时候，他在这里表达了一系列的犹豫，提出一系列的问题，写上在正式的文件中没有写的东西。这里存在某种差别，某种细小的不同。我觉得还在列宁时期这种做法已经确定了。当我们中间某一个人给伊里奇写信的时候，他提出不提交政治局的问题，同他谈自己的不同意见和犹豫，等等。谁也不认为这里要什么狡猾手段。现在同样如此，写

① 1937年联共中央决定于2月18~19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布哈林问题。布哈林决定不参加全会，同时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② 科萨列夫，弗·米·（1881~1945）——历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党中央西伯利亚局成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等职。

③ 指1936年9月1日布哈林写给伏罗希洛夫的信。

信给政治局是一回事，而写信给斯大林又是一回事。我个人不觉得这有什么可指责的。

有人说我想用斯大林同志的善心投机。我想，斯大林同志不是可以利用其善心投机的人。

第二个问题是似乎我攻击内务部。我想说，所有指责我的同志都出于同一个论断。这个论断就是：证人的证词说的都是实情，不实之处只在于他们没有全说出来。所有反对我的同志都发挥这一论断，对我批判针对我的证词的方法提出批评。我绝对不能同意这种论断。

我在这里必须说，诬告这种事是有的。我不谈自己，不谈李可夫，也不谈这里所涉及的人。不过，我再重复一遍，到底有没有诬告的事呢？我知道有过，《真理报》上登载过此事，那上面直接写道：“不管托洛茨基分子诬告什么人，我们都能识别出正直的苏联人。”我说的是，存在不存在诬告的事？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一般说来，存在诬告的事实，那么怎么能得出这样的论断，这些人只讲实情，只是有时没有讲完全？可能有谎言，需要作具体分析，哪些是实情，哪些是谎言。

我个人并不事先先验地认为证词都是正确的。由于我觉得自己在如此这般问题上是全然无辜的，所以请允许我不是为这些证词辩护，而是摧毁它们。辩护的任务在于摧毁它认为不正确的证词。摧毁这些证词是不是攻击内务部呢？我认为不是对内务部的攻击，因为内务部不是证词的主体。它不必为证词承担百分之百的责任，它搜索这些证词，它获得这些证词，它设法弄到这些证词，它帮助形成这些证词，然而，它不必为每一个证词的真实性负责。这是侦查的材料，还要经受检验，等等。

另一个问题，较为复杂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一系列证词（它们的量很大），等等？我在受到不同的同志攻击的札记中专门谈了这

个问题，那里谈得很详细。我这里只说明如下：“右派的大量统一的污蔑可从以下情况得到解释……（宣读。席上喊声：读过了，读过了。斯捷茨基：这您全是从托洛茨基那里取来的。在审讯期间托洛茨基也在美国的报刊上写过同样的东西。）我不知道托洛茨基写过，我这是从记录中抄来的。我不知道谁那么好心地把记录提供给托洛茨基，但我是按记录读的。其次，我不知道，托洛茨基是否写过，不过，引文之后我是自己写的。我不知道，也许斯捷茨基能告知，托洛茨基也是这样写的，这样一来托洛茨基处在并不特别愉快的境地。

我写道：“这样的以及更为鲜明的例子……（宣读）……被捕者也许 would 认为，又是因为我而被捕了”。（什维尔尼克^①：您把人们想得太坏了。）昨天梅日劳克^②还说，如果不是斯大林同志制止了，他会把我撕碎的。（梅日劳克：会这么做的。喧哗。）我说的就是这个，我自己就是这么说的。有人指责我，说事情并非如此，但我引用的是这样严肃的的旁证，你们的旁证。（席上喊声：为的是取消对您的指控。）我在这里也写了，不存在法律资料，就是说，没有取消指控。这是大家知道的。你们说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人……（宣读。）……向全世界”。（科萨列夫：您这是为记录说的，读这些东西，而不是为自己辩白。）

科萨列夫同志，我没有什么可为记录宣读的，因为这些已经印在上面了。（科萨列夫：我们全都读过了。）

① 什维尔尼克，H.M.（1888～1970）——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4年起任俄共（布）中央检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5—1926年任列宁格勒区委书记和联共（布）西北局书记。1925年起为中央委员。

② 梅日劳克，B.И.（1893～1938）——1918年起任乌克兰副财政人民委员、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等职。

莫洛托夫：应当懂得，有过两个托派案件，他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过。他们承认自己是恐怖分子、暗害分子，等等，可以相信这些供词吗？

布哈林：可以。（米高扬：为什么？）

莫洛托夫：如果您的逻辑是这样的，从我的讲话得出结论，承认自己的罪过只是出于个人利益，那怎么能解释托洛茨基分子的行为呢？我们要您做我们曾要皮达可夫等人做的事。因此您……多少可以满足全会对您的这种期待。

布哈林：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我个人决不是在败坏托派案的声誉。

莫洛托夫：你的朋友遵循这种做法，他们先也否认，然后说是的。

布哈林：不能这么说。因为有一批犯人起初否认，后来承认，而另一些没有过错的人则会不承认，予以否认，而过后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又予以承认。

米高扬：你很熟悉拉狄克，他为什么承认？

布哈林：我以为我相当了解拉狄克。但现在我认为，我对他了解得不够。

莫洛托夫：托洛茨基分子供认的东西属实吗？

布哈林：当然。

莫洛托夫：而你的学生提供的证词就不属实。

布哈林：不，哪些托洛茨基分子？

莫洛托夫：拉狄克、索柯里尼可夫、利夫希茨，等等。

布哈林：我这里说的只是一种情况……

莫洛托夫：我的问题不难回答。

布哈林：……我来回答，这里没有统一的标准。这里需要区别不同的情况。

莫洛托夫：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分子的供词是属实的。

布哈林：哪些托洛茨基分子？

莫洛托夫：索柯里尼可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

布哈林：他们针对我的那部分供词不属实。（笑声，喧哗）你们笑什么，这里没有什么可笑的东西。

莫洛托夫：关于他们自己的供词属实吧？

布哈林：属实。

莫洛托夫：而有关阿斯特洛夫及其他人的属实吗？

布哈林：我昨天晚上已经说过，我不相信罗齐特会搞恐怖，策特林会搞恐怖——我不相信。至于阿斯特洛夫，我不知道。

莫洛托夫：怎么不知道，有阿斯特洛夫的供词。

布哈林：我说的是他在供词中所说的：这里有属实的，也有不属实的。

莫洛托夫：哪怕有一个右派分子的供词是属实的，还是没有这样的右派？

布哈林：也许有。不过，请允许我分开来讲。我为什么要这么谨慎地说话？因为我不习惯于简单地指责别人，说某某人某某人从事恐怖活动，我认为“属实”。这已经几乎是一种指责了。为此需要哪怕某些资料。而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问到的那些人，你们知道的很清楚，从1932年起我就没有见过这些人。

莫洛托夫：阿斯特洛夫你见过没有？

布哈林：在对质时见过。但我并不知道他的变化，不知道从我了解他和见过他以后，他会发生些什么样的变化。我肯定，我同这些人失去联系已经有好几年了。

莫洛托夫：但他们的供词属实还是不属实？

布哈林：关于他们我什么也不能说。理论上什么也不能排除。但是对我目前实际上一无所知的人，我既不能说是，也不能说非，

因为我不熟悉他们，我已经不了解他们。我不能解任何一个有许多未知数的方程式。在继续反党斗争中他们可以走到任何地方。但在这里同我有什么关系？

波斯蒂舍夫^①：让我向他提一个问题。当李可夫同工会某些中央委员一起读柳亭纲领的时候，他同你谈过此事吗？

布哈林：没有，没对我说过。（席上插话：说谎！）可以随便说多少个“说谎”。

米高扬：而李可夫关于你的札记说得很准确，可见无火不冒烟。

布哈林：一般说来，无火之烟大概是不可能的。

米高扬：我们说的就是这个。

布哈林：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关于我的札记叫做烟。

米高扬：李可夫说的对不对？

布哈林：他说什么，那是他的事。他说，是托姆斯基的过错，这是他的看法。但我不知道。我不能因为一个人死了，就说是他的过错。

波斯蒂舍夫：那你就谈活人，李可夫没有死，你就谈他吧。

布哈林：关于活人我只能说如下一点。如果不谈早先的年月，那么在1935年和1936年我一次也没有见过李可夫、托姆斯基以及没有参加三人团的乌格拉诺夫。

莫洛托夫：第四个人是不可能参加三人团的。

布哈林：维·米·你认为这种俏皮的说法是对我的驳斥，而这恰恰是对你自己的驳斥。因为“三人团”是当时流行的名词，谁也没

^① 波斯蒂舍夫，П.П.（1887～1939）——1926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27年起为联共中央委员。1930～1934年任联共中央书记。后遭镇压。

有提到“中心”，因为三人团就是三人团。

莫洛托夫：你认为这很俏皮？

布哈林：不知道，不过，无论如何我认为很有说服力。

赫鲁晓夫：而策特林说过，你们实际上是第二个中央。（布哈林沉默）

布哈林：（席上喊声：您今天就像所有被告的律师。）如果说我想败坏内务部的新组成，那么我要声明，我绝对不想败坏它。（洛佐夫斯基：我们这里写着：供出于需。）供出于需，这意味着提出证词的那些人知道，总的气候是什么样的。（笑声，会场喧哗。波斯蒂舍夫：这总的气候到底是什么样的？）请说一说，你们询问右倾运动的领导，他们就会指出我、托姆斯基、李可夫，这有什么奇怪的。（丘巴尔^①：那你为什么不指出自己呢，为什么你的学生们不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没有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的中心呢？）就是说没有成立自己的中心，也可能是想指出。（丘巴尔：没有成立，就是说他们有自己的反革命中心。）关于“中心”我有专门的一节，我想对你们谈谈此事。曾有过“三人团”，它半公开地存在到1930年，被叫做布哈林集团。然后是第二阶段，关于这个阶段我想在这里谈谈。在此期间曾有过偶然的会面，但会面已不像当时那样经过仔细安排。后来就是这一切全都停下来的阶段。……我应当说，大约在第一阶段，那时确实存在“三人团”，施米特根本没有加入。我记得，托姆斯基甚至害怕这位施米特；后来托姆斯基和施米特开始新的接近（如果真有过接近的话），对此我一无所知。

同志们，现在我继续讲下去。我对内务部机关是否有某些怀疑

^① 丘巴尔，弗·雅·（1891～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3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7月至1934年任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先后任俄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决，后平反。

呢？有的，就像你们每个人那样。如果在叶若夫同志的提纲里写道，那里揭发了多少双重间谍……（席上喊声：间谍——不是机关。这不是间谍，而是已关起来的人。）我说的是机关的组成人员。（柯秀尔^①：您对证词部分有怀疑？）也许还有间谍，也许还有机关尚未彻底清洗。关于此事我能不能写？可以写。可以把这看做是攻击中央委员会吗？我不认为。

可以这样提问题：一些杰出的中央委员在中央全会上发言，而你反驳他们，就是说，你反对中央。可以这样反驳吗？我认为不能，否则就会处于这样的境地，只要莫洛托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等等说话，就根本不能辩护。（丘巴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也采用这种手法。）（赫鲁晓夫：你同库里科夫讨论的是什么样的干部——党的干部，还是反革命干部？）这我以后讲。……就是说，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反驳。我不想败坏任何人的名声，但我过去和现在都要尽我之所能为自己辩护，我有责任辩护，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责任，也是党的责任，因为如果我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我就有责任出来辩护。

还有一个许多同志都重复的一个说法，由于我详细发挥了我的论证——丘巴尔同志想把此论证说成是中世纪的决疑法，他们就说，这不是法庭，如果那是法庭，就是另一回事了；而我们要从政治上掂量一切。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也不理解这原理。说这里不是法庭，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论断的根据是什么？难道这里没有对个别事实做出判断？难道没有分发大批证词？有关事实的证词？分发了。难道这些事实的证词没有去压制同志们的头脑，让他们去议

^① 柯秀尔，斯·维·（1889～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0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1922年调任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1923年起先后任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死，后平反。

论并作出结论？压制了。（席上喊道：这不是法庭，这是中央委员会。）我知道，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不是革命法庭。如果在叫法上有区别的话，那这只不过是同义反复而已。区别何在？问题在于苏维埃机关和党的机构的相互关系。问题先按党的程序详尽解决，然后按苏维埃程序贯彻。第一次解决时也是对所有的细节作出估量，有时甚至是很小的细节，然后按苏维埃程序予以贯彻。所以我认为结果是一样的。难道问题是靠直觉解决的？不，是靠对事实的估量来解决的。实际上，这就是党的法庭。

既然如此，那我要问：怎么驳倒众多的事实？我认为，这些事实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各别的面对面的私下谈话，这是第一类。第二类是所有其他的事实。我请求同志们细想一下，从辩护的角度看该怎么办。如果你们有一些事关面对面谈话的事实，怎么能够予以推翻？只有对人说：没有，此外没有别的办法。（波斯蒂舍夫：你们开过许多会，谈谈会议。）波斯蒂舍夫同志，请等等，我要谈到会议的。我要答复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谈到的许多事情。……如果不要听，我就不说了。（斯大林：您不想讲？）不，我想讲。关于第二类事实。这里要求仔细分析，对事实、矛盾进行比较，确定你那时不可能在那里。我就是这么做的。谁反对这种做法？丘巴尔同志说，这是诡辩。（丘巴尔：毫无疑问。席上喊道：说得对。布琼尼：耶稣会教士是这么说的。）我不知道，布琼尼同志，也许你知道耶稣会教士的历史……（布琼尼：我起码知道自己的党，而您污蔑自己的党。）同志们，是否需要做这样的分析？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推翻事实，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而你们却为此向我大力开火。

现在我请你们注意卡冈诺维奇同志的发言。先谈索柯里尼可夫和库里科夫。谁也没有提拉狄克和皮达可夫，关于他们我在书面回答中已详细谈到。我认为，有一段时间同我最接近的策特林的那一

类的证词我已经予以摧毁。（喧哗，笑声。施基里亚托夫：摧毁了?! 波斯蒂舍夫：只是从你那里简直什么也没有剩下……）好。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人认真地谈过这一点呢？这不是回答。（卡冈诺维奇：谈到过您的基本论据，即因您没有为策特林辩护，他抱怨您了。）但这决不是我的基本论据。我把好多事实、许多日期做了对照。我就是根据这些推翻策特林的所有说法的。（莫洛托夫：不是这么回事。你的辩驳一钱不值，因为有足够的事实。）如果有谁说过，我会非常感激的，但这一点谁也没有说过，谁也没有说过此事。我不想败坏策特林的名声。对中心的组成、柳亭纲领、斯列普可夫会议、恐怖行动等，我作了一系列对比。……马特维也夫在10月17日的速记记录中供认，1932年秋在乌格拉诺夫家里开过一次会议。

他声称（读）：“乌格拉诺夫邀请我去家里喝杯茶。我去乌格拉诺夫那里，在他家遇到一些人。乌格拉诺夫说，开始彻底粉碎右派了，在这种局势下旧的反党斗争方法已不中用了，必须转向更为积极的斗争方法。乌格拉诺夫直截了当地提出必须转向恐怖手段的问题，首先是针对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说的时候，乌格拉诺夫几次强调，最大的祸害是斯大林。我记得，库里科夫，还有别的什么人问乌格拉诺夫，这是他个人的观点，还是来自“三人团”（布、李、托）。乌格拉诺夫回答说：“谁需要，谁就知道”——这一字不差是乌格拉诺夫的说法。”（速记记录，第3页）

卡冈诺维奇：乌格拉诺夫是怎么回答的？

布哈林：我说，乌格拉诺夫说：“谁需要，谁就知道”。同志们，1932年秋库里科夫向乌格拉诺夫打听恐怖行动的指令，而他本人在供词中却针对我，供词作出了不同的解释，说他在1932年秋从我这里得到指令。并且似乎他早从在乌格拉诺夫那里得到的指令证实了这一指令。

卡冈诺维奇：当乌格拉诺夫和库里科夫一道的时候，他不一定要谈马特维也夫。他可能是春天同库里科夫在一起，而秋天同马特维也夫在一起。马特维也夫说，库里科夫在场。

布哈林：库里科夫以及别的什么人还曾向乌格拉诺夫打听！（米高扬：这不是大矛盾，这里没有任何矛盾。）也许没有矛盾。然而这东西完全推翻了库里科夫关于恐怖行动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这是1932年的事。……

米高扬：库里科夫面对面地向你证实了一切，你提不出任何东西予以反驳。有没有这些东西？我对对质记忆犹新。

布哈林：关于我们同库里科夫的谈话，我并没有否认。我否认的是说我给予什么恐怖行动的指令。（雅基尔^①：你们为什么要库里科夫这类骗子？埃赫^②：干部，干部。波斯蒂舍夫：科托夫供认，乌格拉诺夫提出了杀害斯大林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向我提出的“最有力的”论据，即他们为什么指供自己。关于这个问题我不久前已经回答过了。关于其中之一可以这样说，理论上说，他们既然要继续斗争，那就什么都干得出。至于其他部分，我已经说过，是不大可能的。不过我请诸位审视一下如下事实。他们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想，既然对他们讲，你反正要被揭穿，你撒谎，你是两面派，他们就会做这样的打算，如果他们承认点什么，自我诽谤，这对他们会好一些。这是诽谤的情况。而另一种情况，谁真正有罪，被揭发，罪证、自觉有罪、担心害怕等等都向他压来，反正一切都会被揭穿，那时还会更糟。（卡雷金

① 雅基尔，И. Э.（1896～1937）——1917年入党。1925年起任基辅军区司令。1930～193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后遭镇压。

② 埃赫，Р. И.（1890～1940）——1905年入党。1925～1930年任联共中央候补委员。1925～1929年任西伯利亚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9～1937年任党的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区委第一书记。后遭镇压。

娜：而同库里科夫的对质呢？要知道，这是挑衅，污蔑。）我说自我污蔑，这是一种猜测；我说这是一种猜想，并且我同时还说，我不能回答全部问题；如果我知道审讯规则，向被告提出的全部问题，他们的全部供词，其他供词向他提出的指控，如果我知道这些招供的程序，等等，那我就可以，就能够回答全部问题，但我现在做不到这一点。……

现在谈谈中心。我必须说，如果不算 1930 年以前时期的“三人团”，那就没有过任何中心。（莫洛托夫：没有过记录？）是的，没有过记录。什么都没有。（波斯蒂舍夫：就是说，乌格拉诺夫以及其他人在说谎？）

卡冈诺维奇：您从帕米尔回来，向您通报了柳亭纲领，您为什么不去中央，而是去李可夫那里打听消息？

布哈林：那时我们还会面。（卡冈诺维奇：在街头？）不。可能是我去他那里，或者他来我这里。

卡冈诺维奇：当您从帕米尔回来，您为什么不去中央，说“同志们，我没有参加中央全会，请向我通报所发生的一切”，而是去找李可夫？

布哈林：这时我们还没有中断联系。是的，我正是从李可夫那里得知“所发生的一切”的。（米高扬：就是说，“三人团”还存在到 1932 年？）不是这样。从这一事实不能得出这种结论，因为“三人团”已变成人们不密切的和非派别性的联系。（米高扬：而密切的程度？）部分原因是，事情可能变成组织某种秘密组织，或者相反，组织消失，即完全拆散。

卡冈诺维奇：请您证实一下您在对质时的供词：您在 1932 年还同党斗争？

布哈林：我没有这么说。

卡冈诺维奇：不，是这么说的。

布哈林：我还要谈库里科夫，那时我将谈到这一点。……

关于中心。我收集了给我寄来的所有供词。一部分供词说的是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其他供词加上乌格拉诺夫，后来还有科泽列夫的方案，把施米特和瑟尔佐夫包括了进去。后来，来了科托夫方案，又把斯米尔诺夫包括在内。（席上喊声：而布哈林列入哪儿？列入所有的方案里？）不，没有列入所有的方案。请看，问题在于……（阿库里努施金：您最好说说，谁加入了中心？）关于这一点我已经说过了。你们说——谁被列入了这些方案，而要我说说关于这些方案的真相。不过，这些方案实际上不可能都存在。存在这众多的方案本身就使长期存在这“中心”的说法不攻自破。

还有两种方案。有一份卡申的供词，其中说，“从1934~1936年间同托姆斯基的多次谈话中我了解到，是托姆斯基、瑟尔佐夫和乌格拉诺夫领导整个右派地下恐怖组织。”最后还有扎伊采夫方案，它谈到一个似乎把所有中心联合起来的“超中心”。对此我还要说一下，曾分离出三人团，当时党的正式文件中把它叫做布哈林同志集团。有三个人：我、李可夫、托姆斯基。此集团在三人团领导的斗争期间（至1930年）实际上是存在过的。至于乌格拉诺夫，他毫无关系，很少来，仅有时来一下。（卡冈诺维奇：乌格拉诺夫同你们毫无关系？你们的基本据点。波隆斯基：他在莫斯科组织起巨大作用。）

乌格拉诺夫在莫斯科组织起过巨大作用，这不说明任何问题，不过波隆斯基对此应知道得很清楚。维·米·正确地指出，他没有加入三人团。而当时甚至已有“三人团”这个名词。关于施米特。在那个阶段施米特根本没有参加。关于斯米尔诺夫。斯米尔诺夫也根本没有参加。瞎说斯米尔诺夫加入什么组织队伍有什么好处？我很清楚。（布琼尼：那你就说说，什么你知道得很清楚，你不清楚的是什么？）布琼尼同志，等一等，等一等。（布琼尼：你对耶稣会教

士很了解，请说说，您是怎么扮演耶稣会教士的角色的。) 斯米尔诺夫·福马起初说，他在克里姆林宫的路上会见我，要我甚至不出席中央全会。(茹可夫：他在什么地方会见你的？还是在路上?) 他后来同谁联系，我不知道，但福马·斯米尔诺夫也没有参加“三人团”。也许他后来投靠了乌格拉诺夫或者别的什么组织，但那时期没有福马·斯米尔诺夫。我决不想由此作出结论，说福马·斯米尔诺夫没有从事任何右倾的工作。我甚至不想说，他没有自己人、自己的组织或集团，但他完全是独立行事的。

我再重复说一下，你们不是从党史的角度，而主要是从目前形势的角度来评论我的活动的，但这样做当然需要知道党史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不过，我要对你们说，从1932年起我没有见过他乌格拉诺夫，并且我觉得，他也不在莫斯科，所以我也不可能见到他。1935~1936年我一次也没见过李可夫。1935~1936年我一次也没见过托姆斯基。最后一次见到施米特不知是1932年夏，还是1933年夏。

如果存在一个从事什么活动的、有集中领导等等的什么组织，那从这些事实的观点看来该怎么解释它呢？或者我说的不是真话，那就请你们证明，我见过乌格拉诺夫，见过托姆斯基，见过李可夫，见过施米特。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这些并不存在。至于1935~1936年，这绝对是真的。如能说，也许你搞错了，不过1935~1936年可以而且排除在外，那就很好了。要知道，关于我说了很多，说直到最近，到今天，我是耶稣会教士，叛徒，从事破坏活动，唆使儿子去反对老子，等等，等等。对这些我认为需要用大量事实来为自己辩护。

至于乌格拉诺夫，你们全都知道，他不在莫斯科。(米高扬：他来莫斯科，来过两三次莫斯科。) 有可能，不过我甚至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工作。(米高扬：你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的，我知道的

我就讲，我不知道的，我就无法讲。请证明，我在莫斯科见过他。（波斯蒂舍夫：您是通过斯列普可夫^①同他联系的。）既然从1932年起斯列普可夫和马列茨基^②就关在监狱里，我怎么能够通过斯列普可夫同他联系？（波隆斯基：您同拉狄克有联系。）而拉狄克难道同乌格拉诺夫有联系？（会场喧哗。安德列也夫：请不要妨碍发言者，否则他无法说话。）我肯定，我同什么暗害理论，同托派集团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一点点关系也没有。

现在请允许我来谈谈在这里发表的几个有分量的发言。莫洛托夫同志谈的是很有分量的有关历史性质的那一部分，这一部分应当证明，我怎么会必然滑入反革命的泥坑。我在党内的历史大家都知道，对这个问题我不多谈。我要说的是，我做的不单单是坏事。我也干了许多好事，在十月起义期间，在十月起义以前及以后都是如此。所以，如果……（莫洛托夫：甚至托洛茨基也做过一点好事，然而现在他是法西斯间谍，落到这地步！）对，对。不过我要指出这一事实，否则党就不会让我担任非常负责的职务。我也为党干了好事。（莫洛托夫：谁也不怀疑。）

在布列斯特和谈时期我反对列宁的斗争是我的极大的缺点，这是严重的、有罪的一场大斗争。但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后，我迅速认识了错误，你们知道，我在莫斯科苏维埃会议上发表了声明。于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召见了，事情也就到此结束。你们知道，参加当时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不仅我一个人，参加的还有

① 斯列普可夫，A.H.（1899～1937）——1919年入党。1924～1928年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工作。1928～1932年任伏尔加区委常务局委员和宣传鼓动工作部部长。后遭镇压。

② 马列茨基，Д. П.（1901～1938?）——1919年入党。1925在《真理报》工作。1929～1932年任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计划委员会学术秘书和经济室主任。后遭镇压。

瓦列里安·古比雪夫，布勃诺夫·安德列，叶梅里扬·雅罗斯拉夫斯基，后者很清楚党走过的历史道路和实践道路……（雅罗斯拉夫斯基：我没有和你一起参加反对列宁的阴谋。）阴谋倒是没有，但您加入了“中心”。在这“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里还有一个左翼。而你，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当你把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冒丧失专政的危险进行战争）加在我头上的时候，你犯了个错误。我对此表示过反对，这是该集团中的极左翼。（莫洛托夫：我没有这样说过。）你说过的，甚至提到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提出此提纲的恰恰不是我，而是莫斯科区域局。

涉及党史的第二个意见是作为党的一种类型的“劳动党”问题，是1923年出现的问题。不过，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你读过这份当时叫做“备忘录”的著名文件没有？某些政治局委员似乎看过。要知道，那里说的是一种假设——“我们是否可能出现这种东西”？但未曾有过任何指令，也没有鼓吹过。没有过。那个时期大家都喜欢把各种各样的东西理论化，这种理论化被用于实际问题和迫切的问题。（莫洛托夫：你算了吧，不知是理论化呢，还是出卖理论的灵魂。）好吧，就算是出卖理论的灵魂，我并不辩护说这里有什么宝贵的思想。（加里宁：结果还是辩护。）我不知道，我只解释有过的事情，说的也是这个。这是问题的某种假设性提法。诚然，问题的提法本身是有害的，我同意这一点，因为问题的提法本身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应当区分一定的路线和问题的某种抽象的理论提法。（卡冈诺维奇：您以后在党的方面的整个路线说明，这不是偶然的理论化，而是深刻的根源。）

一切都可能。不过我以后的情况说明的是另外的事。例如，在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期间我有很多尖锐的讲话。这是事实，谁也不能从党史上抹去。在那里我和全体同志一起非常激烈和热烈地捍卫党的一元性，摧毁了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这一切都记忆犹

新。(卡冈诺维奇：这延续了多少年?) 喏，四年。(卡冈诺维奇：不到四年。) 也许吧，我不知道。要知道我从1906年起是党员。建立党以及党的队伍和组织的问题，众所周知，是从作为流派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时产生的。(莫洛托夫：加米涅夫比你早入党，但他滑到哪里去了。) 是的，但我讲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如果计算我有多少年捍卫党的立场，那么年份不算少了。(斯大林：少了。) 不特别少。

其次，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当他在这里援引极其卑鄙的库兹明的行动纲领(我是第一次听到)时，我像他一样感到愤慨，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叶若夫：您的学生。莫洛托夫：不仅库兹明，还有斯列普可夫。) 这是令人愤慨的纲领。你们以为我不懂得，这种纲领不仅应受谴责，而且鬼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但是我在这里反对一点，我同库兹明从来没有接近过。库兹明从来不是我的亲密学生。(席上喊声：但推行您的路线。) 不对。他有一套，尽管他加入了青年集团，这一点我并不否认。(席上喊声：他是用从您那里得到的证件进入教授学院的。) 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人。我向你们保证，关于学院的成分我比你们知道得清楚。我现在说别的，库兹明是一个非常疏远的人，而决不是最亲密的人，他不住在莫斯科。有一个明确无误的政治事实：库兹明很长时间拒绝同我握手，因为他认为我完全叛变了。(斯大林：而斯列普可夫是否亲密?) 斯列普可夫过去非常亲密。我不想仅仅因为他写了这个卑鄙的纲领，就说他那时同我不亲密。现在他们都离我有几千公里之遥，不过我说，所有的证词都说，库兹明是亲密的人之一。我不同意这一点，我说——不对。库兹明被当作最重要的事实，对此提出异议对我来说极其重要，因为我要为自己辩护，我必须辩护。(莫洛托夫：在青年人中斯列普可夫加入了没有?) 加入了，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伏罗希洛夫：这怎么搞清楚

——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加入。他们全都结集在一个集团之中，由你直接领导，思想的、实践的和组织的领导。而你这个组织者是微不足道的。) 是的。不过在其内部分成若干部分。(伏罗希洛夫：这已经是你的事了。) 这是我的事，我也没有说这是你的事，我没有把库兹明强加给你，而是说，他是最疏远的人之一……(席上喊声：在亲密的人中间一批远一点的人。)，而是疏远的人中间的一个。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我讲话或写条子的时候，我是想给策特林一个信号，不过我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我给你们送去一份，我怎么搞出多份并分发出去？(莫洛托夫：鬼知道你做了些什么，你什么都会做出来。) 如果这么说，说我杀了自己的老娘，因为鬼知道我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论据。(莫洛托夫：问题在于你的行动路线。) 关于最后几年我提出了一条论据，请予以审查。(伏罗希洛夫：在这三年里你是单独工作的。请仔细看看7日的《消息报》。) 我，当然罗，从事“破坏活动”？好吧，我从事破坏活动？同志们，这么说，你们亏心不亏心。

梅日劳克同志感到委屈，因为我说过，他加入了集团，他否认，说没有参加，说他参加的是中央委员会建立的集团，有许多人加入了该集团。梅日劳克同志认为不是所有的证词都是真实的。然而列文指供他。那里直截了当地写着。你们说那里写得不对吗？(梅日劳克：您是不光彩的撒谎者。) 或者存在不真实的证词？(梅日劳克：1921年和1922年不是在您的学校工作，而1926年和1927年是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这是受中央委员会的派遣。) 您和斯列普可夫同时睡在一张床上过夜。(梅日劳克：坏蛋，卑鄙的家伙！在什么样的床上，什么地方，不光彩的撒谎者？) 当然可以不体面地骂人，发脾气，但事实还是事实。它对您的名誉损害极小，因为那是全然不同的时代。(梅日劳克：那时当然会见过斯列普可

夫，我不否认此事。但我同他睡在什么床上？这是子虚乌有的。）

我不同意卡冈诺维奇同志在这里所做的结论，他谈到了库里科夫。关于索柯里尼可夫我不同意，原因是这怎么是1932年的事？他的证词的主要中心是最近右派同托洛茨基左派的联系。其第一个证词依据的就是这一点。（叶若夫：卡冈诺维奇同志宣读了文件，你为什么绕过文件？）我引用刊载在《真理报》上的索柯里尼可夫的发言，我没有其他的任何文件。而那里说的是同右派的联盟，在最末尾谈到同右派中心的联系和右派组织。关于库里科夫。在对质时库里科夫的证词我记得很清楚。拉扎尔·莫伊谢维奇在这里引用文件。该文件听起来像是证词。此文件我没有签字，没有读过，没有检查过。不过我清楚地记得，涉及的正是卡冈诺维奇，一点也没有提到斯大林。（卡冈诺维奇：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对我来说，您说的完全没有说服力。

卡冈诺维奇：怎么没有说服力，这一切都是写着的？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在场，用速记记下的，而他却说没有说服力。

布哈林：在我的笔记的右边用大写字母写到卡冈诺维奇，而关于斯大林什么也没有记上。（席上喊声：你那里写上的，没写上的，还少吗？）在我的笔记上没有，而我相信自己的笔记，超过相信别人的。

卡冈诺维奇：他在这里声称，他的记性坏了，他的神经受到可怕的刺激，等等。而他在这里说，对他来说别的都没有说服力。有七名政治局委员在场，有速记记录，他对这一切都不信，而只信自己的笔记。

布哈林：这一点我来回答您，您读的涉及我的东西，您说都记上了，但那里记的尽是一些无法理解的毫无意义的胡说八道。（喧哗，闹声）其次，卡冈诺维奇同志制造了一条极端尖锐的反对我的结论，超人的尖锐。他这里还是引用库里科夫的证词。库里科夫

说，在右倾反对派初期他曾到我家里来，我不知道怎么办，有时还哭了。卡冈诺维奇同志把哭变成1932年春在街头哭，并就此作出这样的结论：布哈林到底哭什么？他哭是由于看来他尝到了恐怖行动的全部后果。（卡冈诺维奇：你自己这么说的。）什么废话！我来回答您，拉扎尔·莫伊谢维奇，说的是全然不同的另一种哭。我不知道，您是在哪本残暴的教科书上看到这种胡说八道的。

卡冈诺维奇：可以把没有译解的速记记录拿去做任何鉴定，可以查明的。

布哈林：对这一点我来回答您，卡冈诺维奇同志，您请求我不要根据未经修订的速记记录来批评您，而您却把根本没有修订的速记记录当作大炮来反对我。昨天有一处根本无法理解的地方。您讲到科学院时提到一本文集的前言，说前言是我写的，其实这本文集有两位编辑——我和德波林^①。我认为前言是德波林写的，也许还有什么别的人，后来阿多拉茨基还有别的什么人提出申诉，这以后就更换了，因为那里有失误的语句。在你们看来前言不好，而整个前言的内容也是法西斯主义的。不能这样的。当我向你们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那时你们为什么不说话……

斯大林：有一个条子，您读出来。（把条子交给布哈林。）

布哈林：“兹证明，科学院出版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文集的前言，从……字起是布哈林的笔迹所写。除我以外，这样一些人也可以证实这一点……”（席上喊声：谁？读名字。）出版者恰金、瓦列里安诺夫和列宁格勒国家图书出版社的代表……（席上喊声：谁写的？）恰金写的。我没有看到别的什么。我记得此前言不是我

^① 德波林，阿·莫·（1881～1963）——苏联哲学家和历史学家。1903年起是布尔什维克，1907～1917年为孟什维克。1928年加入联共。1929年起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0年起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和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

写的，是德波林写的。好吧。即使我弄混了，搞错了，然而文集的内容仍留着。难道一句不成功的话就决定一切？也许我搞错了，让我们把手稿找出来。也可能恰金搞错了。我们有几个文集：有马克思纪念文集，有列宁纪念文集，有恩格斯纪念文集。马克思纪念文集的前言是我写的，这我记得很清楚。（卡冈诺维奇：说的就是这本文集。）

我想这里可能弄混了，因为第一个前言是我写的。阿多拉茨基^①同志，你记不记得谁写了第二个前言？（阿多拉茨基：不记得。）我认为第二个前言不是我写的，让我们核对一下，因为恰金也可能搞错，他会记错的。（笑声。斯捷茨基：第一个文集也被扣下了。）好的，好的。斯捷茨基同志，您经常这样做的，先是扣下，然后实行监督，最后不承担任何责任。在一系列文章上也是这么办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卡冈诺维奇：那里准确地指出，是什么样的前言，以什么样的语句开始。）对的，不过我说的是，恰金可能把第一个前言同其他的前言弄混了。（席上喊声：全都搞乱了，唯你除外。）我说过，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因为当阿多拉茨基控告此前言的时候，我根据德波林的请求同这位阿多拉茨基或者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就此谈过话，那是阿布拉姆·莫伊谢维奇的请求。此事我记得很清楚。也许是他写的，也许是我。我只是认为，较为可能的是恰金把两种文集搞混了。这不是个大事实，这一切都可以核查。不过，归根到底这个问题已不那么重要了。（斯捷茨基：问题不在于文集，而在于在你的科学院中的反革命集团。）

关于反革命集团——好的，我对你们说。在科学院被捕的人们中间，在我的熟人中间，依我看职位最高、党内地位最高的是科学

^① 阿多拉茨基，弗·维·（1878～1945）——历史学家。曾任中央档案局副局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院长等职。

院党组书记彼切尔斯基，是斯捷茨基派他去担任主要负责人，由他处理党组内的全部事务。他是被派去监视的，他想组织一个党组，他自己专门扮演土皇帝的角色，这时大家还没有看出他是个小人。这是第一个，因为科学院党组书记，这是个大人物，他是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斯捷茨基有意派去或任命的。（斯捷茨基：谈谈你的集团。）而彼切尔斯基是否加入了你的集团，这我不知道，也不感兴趣。

第二。第二个是干部部部长……（席上喊声：第二个比第一个更糟。）……布瑟金。布瑟金早在我去科学院以前已在那里。是沃伦斯基介绍我同布瑟金认识的，他当时是科学院办公室主任，老契卡人员。沃伦斯基安排布瑟金住在科学院宿舍，我们都到过那里。布瑟金经常出入列宁格勒政府机关。这就是第二个被捕者。接下去，那里还有谁呢？乌拉诺夫斯基。乌拉诺夫斯基是生物部的，我记得他是《自然界》杂志的编辑，同我从来没有任何联系。这就是乌拉诺夫斯基的情况。

什么事在这种那种程度上同我有关？现在就说说，什么同我有关。在我们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需要一个既懂哲学，又搞技术的人。有一次我在巴库做报告，在科学院巴库分院，分院的院长是某加尔别尔。（斯捷斯基：托洛茨基分子。）我不知道他曾是托洛茨基分子，但他当时是科学院分院的院长。他问我，能不能去从事技术史的研究。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人。我收到一份专电，——我甚至曾拿它去对质，不过它在什么地方丢了。请我就这位加尔别尔的事同贝利亚或巴基洛夫谈谈。他得到斯捷茨基办公室和中央委员会文化宣传部的批准，被从那里调来了。（斯捷茨基：请您说说，关于这个集团您同拉狄克是怎样议论的，您说这是您的手枪。）您没有好好读拉狄克的证词。他说的“手枪”是指姆拉奇科夫斯基。（巴基洛夫：插话听不清楚。）是的。我不能使您确信……（巴基洛夫：

那您为什么归咎于斯捷茨基呢？是您要的他。他为您在巴库组织了托洛茨基白卫工作。然后您要了他。）我是在你们这里有生第一次见到他，而在你们那里他是科学院整个分院的院长。既然他在你们那里担任这种职务，我说，我能对他事先就持不信任的态度吗？（巴基洛夫：拉狄克谈到这一点。）我讲我所知道的，而不是别人知道的事。如果你们要拉狄克对你们说，那就让拉狄克对你们讲好了。我对你们讲过了；你们相信谁，那是另一回事。顺便说一下，关于加尔别尔我在拉狄克的证词里没有读到。加尔别尔在研究所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关于瓦西里耶夫，他在研究所不是我任命的，他当时是在越飞的研究所。我知道他有过一段反对派的历史。但瓦西里耶夫是惟一个很熟悉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历史，同时又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由于研究所需要这样的人，我就选上他并要了来。我能从那里把他要来，是有特殊原因的。因为越飞研究所里有一些负有特殊使命的同志，所以那里的监视特别厉害。我认为，那里的风险并不很大。这就是全部情况。而拉狄克所说的，他说的很多的东西，我不一定全都得信。（斯捷茨基：他从哪里知道你的研究所全都由反革命分子组成？）并不是整个研究所。（斯捷茨基：请读一读拉狄克的证词。）

我还要向卡冈诺维奇同志提一个问题：好吧，我为什么要鼓吹巴甫洛夫？（卡冈诺维奇：谁知道您在那里鼓吹什么。席上喊声：我们都知道，他在鼓吹谁。）好吧，关于此事我不说了。莫洛托夫，你知道吗？（莫洛托夫：我知道你在那里什么好事也没干。）这是超级公道，我别无他言了。我想说一下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所说的有关柳亭纲领的情况。关于柳亭纲领卡冈诺维奇是这么说的：喏，布哈林说过谁写的，各种各样的阴谋，耶稣会教士，等等；请说说事情的实质。据我的理解，卡冈诺维奇同志所说的事情的实质，指

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实质和斗争的尖锐形式。不过，同志们，我应当说，根据我所知道的有关柳亭纲领的情况，我对它的政治实质一向持最否定的态度。（卡冈诺维奇：这还不一定。）不是不一定，而是对丑恶的反革命文件的否定态度。

当某些人指出，某些部分同右派思想相近，其采取的就是这种手法。当然有一些思想是同过去右派所捍卫的思想相近的。是这样。不过，同志们，马克思主义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历史地看事物。一切都在变动中。如果说在柳亭纲领中有某些右派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我早就放弃了，那怎么能把它们强加于我呢？如果在那里说的是这些右派思想向右演变，而这时我自己却向左演变，那怎么能说实质相同等等呢？关于在发展的某一阶段我曾在思想上和实践上捍卫某一极端有害的集团，这就不用说了，但我要说，我早就离开它而走向党，并热烈地捍卫党的路线。你们可以不相信我，不信任。我说的是同我整个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因此不能作出这样的结论，既然有近似的东西，就是说这是你的行动纲领。（卡冈诺维奇：还由于托姆斯基同李可夫讨论过这个行动纲领，而后来在中央全会以后李可夫又同布哈林讨论过……）事实总归是事实，不管是李可夫，还是托姆斯基，都没有告诉我他们看过柳亭纲领。怎么解释这一点？也许是因为，如这里人们说我的那样，我好饶舌。但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事实。卡冈诺维奇同志说，我在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在《消息报》任职期间从来没干过好事。（卡冈诺维奇：您说说您在1932年对刺激因素的怀疑，您在第17次党的代表会议上关于实验室的发言。）关于刺激问题，我在反驳米高扬同志发言时已经详细讲过了。

米高扬同志这样提出问题，如果你承认1932年你对刺激问题还不清楚，那就是说你还持旧的立场。我对此表示反对。我这样表述：我不清楚的是农业中的刺激问题。（加马尔尼克：这意味着反

对农业集体化。席上喊声：没看到社会主义的动力。）因为有过不同的任务，解决了不同的任务，如摧毁富农，把农户联合起来，组织上巩固，这也属于集体化的发展。所以我说，关于工业化、集体化、全盘集体化、消灭富农，这一系列问题对我来说是清楚的，我完全同意。这些极端重要的问题对过去来说是完全清楚的。（斯捷茨基：而您 1934 年的文章，那是什么？）

关于实验室的问题（卡冈诺维奇的问题）解释非常简单。我谈实验室问题是因为我专门研究过此事，这是我的职务的一种。我应当在代表会议上报告我当时的实际工作。你们看到，现在卡冈诺维奇同志还在指责我，说我关于实际工作什么也没讲。（莫洛托夫：你们别干扰布哈林同志讲话。他已经谈了一个半小时。）好的。我接受你们的意见。同志们，我想说的是，对我提出了非常严重的指控。我向你们保证，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如何，我都要否认自己有罪，因为我确实没有犯那些伪证人强加于我的任何罪行。

我在党的面前犯的过错是很严重的。在社会主义坚决进攻的时期我的过错尤其严重，那时我们集团实际上成了巨大的阻力，给社会主义的这种进攻造成严重的危害。我承认这些过错，从 1930 年到 1932 年我有长长的尾巴，我已经意识到了。但我要用和承认自己的过错同样大的力量去坚决否认强加于我的罪行，并且以后也要始终予以否认，这不是因为这仅具个人意义，而是因为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承担额外的东西，特别是当党不需要，国家不需要，我个人不需要的时候。（会场喧哗，笑声。）

尽管我不能解释许多事情和向我提出的合理的问题，我不能彻底解释指控我的那些人的行为问题，甚至一半也无法解释。不过我无法解释这一切，依我看，这种情况也不能成为给我定罪的论据。我重申，我有很多过错，但我要全力反对诸如背叛祖国、搞暗害活

动、搞恐怖活动之类的罪名，因为具有这种品质的任何人都是我的死敌。我准备采取任何手段去对付这号人。（喧哗。喊声。皮捷尔斯：你自己写了。）我的处境的全部悲剧在于，这个皮达可夫及所有此类人物毒化了整个气氛，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不相信人的感情——无论激情、无论心灵活动还是眼泪。（笑声。）过去作为一种论证方法的一系列人的行为，并且其中并无不体面之处，现在已失去自己的力量。（卡冈诺维奇：两面派手法耍得太多了！）同志们，我讲的是过去……（赫罗普梁金：该进监狱了。）什么？（赫罗普梁金：早就该关进监狱了！）好吧，关吧。您以为你喊关进监狱，我就会有另一种说法？我不会的。

莫洛托夫（主席）：下面李可夫发言。

№05907

李可夫在联共（布）1937年2~3月

中央全会上的发言

（1937年2月26日上午）

同志们，首先我要表示歉意，我不能详细回答这里提出的所有问题，因为我不能听全所有的发言，并且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缺席了。现在全会在决定我的最后一个问题了。这次会议将是最后一次，我的一生中最后一次党的会议。根据我在这里所听到的，这一点我是完全、绝对清楚的。由于我在党内已经36年以上，所以这对我具有整个生命的意义。向我提出了极端广泛的指控，也就是说，提出的犯罪的指控已无以复加了。而所有这些指控都被看做是已得到证实的事实。许多发言者引用针对我的证词。我在第一次发言时试图对证词作一评述，证词不是一个，而是五个或者六个，是直接针对我的，我想证明其中某些证词，例如拉金的证词，是恶毒的诬陷，有一些也许不恶毒，但我这里遇到的是诬陷。

当我听到发言……卡冈诺维奇同志特别准确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态度。他说。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他们处于同样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承认了被认为已证实的东西。但也隐瞒了许多东西并把它们带进了坟墓。不过他们可能承认被认为已得到证实的东西，以改善自己的境况，以免以后被查出来，说它们已经承认了，在这里可以算了结了。这一点他们错了，境况没有改善，以后全都查出来了，事情一步步地深入。而现在布哈林和李可夫改变了这种策略，他们现在持另一种态度，他们统统否认，布哈林厚着脸

皮否认一切，李可夫承认点东西，鸡毛蒜皮的东西，而根据证词他们已被揭露无遗。

如果按照证词描绘出来的图景——按照那里有的东西，那么由此可以非常合乎逻辑地推导出由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组织的这个中心，推导出托姆斯基加入此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中心；推导出总纲领——复辟资本主义以及这些法西斯分子用以同我们苏联斗争的骇人听闻的策略。形成一个完全闭塞的集团。一切都可以理解，从上到下一切都清楚，全都得到论证，一切都按照某个人的需要办了。这整个图景不是非常合乎严整的逻辑，一切都具备。等待招供，当然完全合乎自然，是完全自然的事。我常常暗中说，如果我接受并说一通我并没有做的事，心里会好受一点吗。这从四面八方，从左和右，压得我透不过气来。一个结局，全都一样。而诱惑力是很大很大的，——也许折磨会少一些。当我面对这一大堆指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极大的意志力才不至于沿着以下逻辑垮下去：“喏，当然在我目前所处的情况下，反正都一样，这是非常清楚的。”

我听说，索柯里尼可夫曾是……但我怎么也无法想象曾经有过什么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有联系的中心，同他们联络过，怎么也……皮达可夫案件对我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但我是否设法搞过这种秘密活动呢？我这时候正在西伯利亚，我离开那里时报纸上开始出现这些文章。我记得，不是在伊尔库茨克，就是在鄂木斯克，我问过一位区委书记：“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从哪里来的？”他说，目前从中央来的只有关于阿尔库斯的文件。我说，阿尔库斯领导皮达可夫，不过如果我在某种程度上参加了这种罪恶活动，难道可能这样吗？要知道，我过去知道阿尔库斯和皮达可夫的关系并说了我的想法，过去我知道阿尔库斯和皮达可夫的关系，那时我认为阿尔库斯是皮达可夫的帮手，如果没有发生变化……

这从哪个方面都同我无关。恰恰相反，如果我在这一点上有过错，这给我的就会是全然不同的印象，然而我却立即产生一种想法，谁站在这后面，立即产生关于皮达可夫的想法，我考虑并说出了这一点。如果我参与了这些事，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你们理解这一点。我还能怎么向你们证明？我试过向你们提出这种逻辑程序的论据，关于这关于那的论据，但这有什么用？实际上，我同他们并非亲密的朋友，因此他们谁也没有对我说过此事。有人提出这样一种猜想，李可夫为人谨慎，因此他没有同他们谈过，而托姆斯基不谨慎，布哈林也不谨慎，他们谈论。就算是我为人谨慎，但是同谨慎的人比同不谨慎的人要更好谈，更乐意谈，他们为什么不试图同我谈呢？在我同索柯里尼可夫对质的时候，拉扎尔·莫伊谢耶维奇提过这问题，他问他说：“也许李可夫拒绝了同你们见面？”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查过，他回答说：“不，我们没有试过。”也就是说，无论是他，还是他们中间的任何人都没有试过。我重复一下，像索柯里尼可夫所供的那样，我们应同他一起组织一个什么政府，他们要让我担任不小的角色，这种事是不可想象的，要知道，这不是同托姆斯基，而是同我，而不是同布哈林。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想同一个人组织政府，此人加入了臆造的右派中心，然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不试一试同他建立如何联系，这可以想象吗？我问索柯里尼可夫：“您对我为什么不像所说的那样，哪怕是握一下手，发一个暗号，检验一下，我们现在是不是比过去亲密了？”我问他：“他做了什么没有？”而他说：“没有。”然而同我会见是较为容易的，我同他们曾无数次在一起。

我还能用什么来证明？显然，不能用我的政治信条做交易。还能怎么样证明，用什么证明？大家想说，我曾加入这个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中心，实际上，皮达可夫案件对我来说是完全出乎意外的。我在很长时间里曾经相信，拉狄克与此无关。我们还在人民委

员部同什么人谈过，并且我真诚地认为，他与此无关。当在季诺维也夫案件里——我们同什么人在人民委员部里读到过记录——透露了索柯里尼可夫的名字，我记得，斯大林同志对我们说，他们有后备人才。而他并没有在此案出庭。我说了一种设想，他可能属于后备中心。我的态度大概同这里出席者中你们的多数人一样。但是这种东西我怎么能证明呢？

当然，同布哈林一样，我要随时随地坚定地说，这是难以置信的。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要澄清这些东西是极端困难的，我想证明自己清白是绝对不可能的……（什维尔尼克：关于纲领您谈得太少。）关于纲领我要谈的。问题在于组织联系。而此后，在这以后，当皮达可夫被枪决以后，冒出个别洛博罗多夫^①来。而关于别洛博罗多夫同我谈妥了什么，皮达可夫也好，其他什么人也好，都一无所知，什么都没有说过，而我同别洛博罗多夫在索契沿索契大道行走！……鬼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也许要来一次对质，由他来证实？见鬼，那里不会有任何回答此问题的东西。我很清楚，这一切都是荒谬绝伦的东西。

第二个中心。我认为，这里布哈林是对的，从这样的中心建立了这样一种特殊的神话……（会场喧哗。）他关于此事所说的一切，全都是绝对正确的。我曾建议过，在对质的时候，也许可以通过女仆或再加上别的什么人去调查技术设备。怎么可能这样呢？要知道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过面了。有人对我们说，“如果我们通过女仆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不过那时每一个人都在巧妙地欺骗我们，难道你们不会欺骗这些女仆？”事情很清楚，那时候我们在秘

^① 别洛博罗多夫，亚·格·（1891～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年起任东南边疆区经济委员会主席，内务人民委员会部务委员，后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二副人民委员。

密的条件下有时也欺骗了女仆……（席上喊声：而现在你们在欺骗党和苏维埃政权。）但怎么证明？你证明看看，什么没有发生过！还能怎么证明？

三人团。我们这里只有两人，没有第三者。没有第三者？怎么证明？用什么事实材料来证明三人团呢？要知道这个三人团本身并不存在，在这整个时期内它都不存在，而它在季诺维也夫案件、皮达可夫案件，在这所有案件中获得了承认，得到了核准。关于这些案件报刊上刊载了，出庭的我们右倾分子也发了言。在那里获得了另一个新的名称。按照寄给我的证词，我回答了，而这里说的却是特罗菲莫夫。对我来说，这完全出乎意外。我想理解，一个人为什么这样说自己。我没有同他谈过什么右倾。而他却坚信，他们还是到我这里来过的。

我同特罗菲莫夫关系不错，我知道他的全部历史，他同我的关系同样不错。我从列宁格勒收到关于他的良好鉴定，有一个鉴定是基洛夫签署的，还有哈萨克斯坦来的好鉴定。我毫不怀疑，他是个好工作人员。政治局关于发展在哈萨克斯坦的联系的纲领，他执行的很好。所以我对他不可能不信任。后来通知我，说他加入了什么右倾组织，组织了什么恐怖集团，鬼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对质应能查清什么，也许不能，对此我说不准。但当我离开此地时，我逐一回忆了我同特罗菲莫夫的全部交往，我认为没有任何这些谈话的影子。（……）这里有人嘲笑我，不记得是谁了，并且说，我们是健忘的伊凡。我无法说，我说过什么话。不过我请你们相信，如果认为所有说过的东西，都准确地记下来，在5~6年期间都有记录，那他们是说谎。不能相信他们这一切全都记得。对我来说，毫无疑问，如果他们在记忆中有一点点什么，8年前印在脑海中的，那么在以后的8年中他关于这个问题会有新的后来加上去的東西，所以这一切会忘记和弄乱的。我既不是法学家，也不是律师，不过在司法

的实践中下列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一件罪案过几年以后被揭发，在那些证词中会有无数的矛盾，严重的矛盾。（波斯蒂舍夫：没有特别的矛盾。）矛盾在于我是不是托洛茨基杀人犯，对我来说这不是小事。

斯大林：有一种人，他提供真实的证词，尽管是可怕的证词，为的是最终清洗掉身上的污物。也有另一种人，他不提供真实的证词，因为他喜欢身上的污物，不想同它分开。

李可夫：在这时候，在我目前所处的境地，只是为了走出死胡同，你就承认没有的事。

斯大林：您失去头脑了。有什么好处？

李可夫：什么，什么？

伏罗希洛夫：什么利益？

斯大林：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李可夫：我说的是不由自主地承认没有的事。

斯大林：姆拉奇科夫斯基、舍斯托夫、皮达可夫，他们想去掉身上的污物，不管花多大的代价。无论如何，对这种人，不能像对那些提供不真实证词的人那样去责骂，因为后者已经习惯于他们身上的污物。

李可夫：对的。现在我完全明白，如果我承认，就会好一些对待我，我完全明白，对我来说一系列折磨就会结束，只要不惜任何代价，哪怕走到什么终点。（波斯蒂舍夫：明白什么啦？什么折磨？把自己描绘成殉难者。）对不起，不要拿这个作文章。

我还想谈一下同这个特罗菲莫夫的关系。我对以下事情承担完全的责任：我在工作中支持他，我对他很好，我个人认为，他身上没有留下旧东西——他曾是斯米尔诺夫的助手，他为人真诚。我同他谈过这一点。由于他工作得好，我说过，您应当同党，同工人组织保持更为亲密的关系。有一次他来找我，谈了剥夺富农的问题。

我当时回答他说，现在在农村进行的这种事，是要付一定的生产成本的。很清楚，是要有的，这是世界性的事业，没有这个是不行的，但所达到的东西是我们的。我对他说，这是解决世界性问题，将会做到这一点。这就是我所记得的我同他之间的谈话。而他现在说些什么，我不知道。

我还想谈谈柳亭纲领。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我已经说过了。你们应当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总是坚持己见，而我接过这个问题，并且谈了。要知道，谁也没有逼我说，谁也没有问我，是我自己谈了我同托姆斯基的谈话，我同加米涅夫的谈话，我同他在人民委员会的谈话，那时我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他是租让总委员会主席。谁也没有逼我说。我说此事是因为我想讲讲有助于此案的事情。我也同样谈了柳亭纲领。（柯秀尔：当然隐瞒了。）那时我没有全说出来。（席上喊声：为什么？）对我提出了指控。我说，除了其他人指出的以外，那里还有两个人。我记忆中还有别的什么人，不过那里发生的事，就在于我那时做得不好。关于这一点已经对我说过了。

我重申，那是一次偶然的旅行，我在那里遇到很多人，一部分人进了房间，派人来找我，说带来一张在工厂散发的传单。我们听了传单，我骂此传单。（席上喊声：谁读的？）不记得了。他们一伙站着，我坐的离他们较远，但能听到。我骂了它，这个行动纲领本身。但认为那里会举行会议，认为我赞同要和陌生人一起开会的人……（贝利亚：您认识他们。）我说我所知道的，贝利亚同志，您去说您所知道的。（波斯蒂舍夫：为什么在中央委员会上不说？有什么考虑？）没有任何考虑。（伏罗希洛夫：瞧，你多天真啊。）那里有托姆斯基，文件是从工厂拿来的，中央委员会知道它，在那里宣读过。（伏罗希洛夫：为什么你需要第二次听这个文件？）我知道存在这个纲领，结果怎样，进行了逮捕。（伏罗希洛夫：专门去

听?) 我不知道那里会有这个纲领。(雅罗斯拉夫斯基: 为什么在全会上说没听过? 伏罗希洛夫: 既然幸好它落到你手里, 你本应把它装入口袋并送到中央委员会去的。)

这就是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那里没有对它进行谈论, 没有予以确认。(波斯蒂舍夫: 为什么在中央委员会上没有说?) 第一, 既然谁也没有表示赞同, 我不认为它有什么意义, 我没有听到有人表示赞同。(席上喊声: 为什么传播反革命文件? 波斯蒂舍夫: 如果大家赞同, 你就会送交中央?) 每个人都骂它, 我也骂了。(柳勃钦科: 为什么在中央全会上没有说您在托姆斯基那里已经读到过它? 赫鲁晓夫: 我们这里预备党员碰到反党文件, 他们就会把它送交支部, 而您是中央候补委员。) 这是极其明显的错误, 不过我对柳亭纲领始终是, 现在和永远是持否定态度的, (波斯蒂舍夫: 为什么支吾搪塞?) 如果我赞同此纲领……把没有的事诬赖于我。我想说一件……(波斯蒂舍夫: 为什么没有送交中央?)

提出指控我的证词的 50 人中间, 谁也没有说起柳亭纲领, 而只说我推荐此纲领, 怎么会这样的事?(什基里亚托夫: 而施米特?) 我指的是拉金、涅斯捷罗夫以及其他所有的人。

施米特关于这一点也没有说。施米特说了我参加了纲领的谈论, 但一个字也没有提到我赞同纲领。我绝对排斥此纲领。布哈林绝对排斥, 我们从来没有谈过柳亭纲领的片言只语。在逮捕的人中谁也没有指控说, 我们把柳亭纲领看做我们的纲领。(鲍曼: 施米特说, 这个纲领被批准了。莫洛托夫: 博尔舍沃会议以后您怎么……斯大林: 在什么地方开的? 莫洛托夫: 在博尔舍沃的托姆斯基别墅里。斯大林: 而我还以为在人很多的一个什么旅馆里。)

莫洛托夫: 而结果怎么样呢, 在托姆斯基的别墅里宣读了此柳亭纲领后, 举行了中央全会, 那里提到了这一纲领, 您在那里发了言, 说如果您知道谁手里有这个纲领, 您就把他送交国家政治保卫

局。您说过此话没有？有过此事没有？有过。

李可夫：那是我的过错，我承认完全是我的过错。

莫洛托夫：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您糊涂了，李可夫同志。

李可夫：在什么问题上？

莫洛托夫：您在全会上是这么说的：如果您看到此纲领，这是白卫纲领，您就把他送交国家政治保卫局。而只字不提您已经读过此纲领。为什么会这样呢？

李可夫：我说过，我不记得这是在全会前还是在全会后。（全场哄笑。喊声：全都撒谎。）

也许是在全会前。我说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所记得的一切。这一切中有不好的，当然不只是好的。我没有断言，关于自己我要说不真实的东西，只说能救我的东西。为此我受到指责。可以为我所做之事惩罚我，但不能为我没有做的事惩罚我。

莫洛托夫：我们说的只是为某种目的而撒谎。

李可夫：完全正确。由于我在全会上没有讲这一情况，我应受到惩罚。然而，如果由于我没有把托姆斯基及其他人送到该送去的地方，而惩罚我，这是一回事，而如果断定我赞同这一纲领，这是我的纲领，这就全然是另一回事了。（什基里亚托夫：既然没有报告此事，就意味着你是参加者。）如果我骂了这个什么纲领，就意味着我支持此纲领？（席上喊声：我们不知道。）这是施米特供述的，在同我对质时供述的。（卡冈诺维奇：施米特供的是理论部分，您说，您不完全喜欢经济部分。）施米特不会说出这方面的全部情况，不过从现在这里的情况出发，正如我对自己所做的解释，我确实没有参与起草，从来没有赞同过这一纲领，也不能赞同，没有以纲领为出发点。（莫洛托夫：在一个地方赞同，在另一地方则不。）我没有赞同任何地方，也不能赞同这种纲领。（莫洛托夫：您自己招供的。波斯蒂舍夫：这是乌格拉诺夫的供词，读吧。）

连施米特也没有招供此事，也不可能招供，而从施米特所说可以看出，他证明布哈林、我以及其他制订了什么纲领，在这次会上曾试探我的意见。他们这件事没有成功。（席上喊声：您没有出卖他们。）我重复一遍，如果我捍卫了此纲领，那么像拉金和涅斯捷罗夫这样一些我同他们谈过话的人，他们招认了恐怖、暗害以及鬼知道什么东西，——我怎么会不对他们说，把我们活动的柳亭纲领给你们？要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向这个地下组织的自己的同人推荐这个纲领，那为什么要接受它呢？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波斯蒂舍夫：这是乌格拉诺夫的供词，给您读读？）我读过。乌格拉诺夫招供，我在圣母地听过他关于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谈话的报告，真见鬼，还有以后的事，而我此时在克里木，没有参加安葬，也没有去圣母地。（卡冈诺维奇：1931年底您自己同加米涅夫谈过。）我在人民委员会说过的东西……（卡冈诺维奇：您自己说过的。）我从来没有肯定过此事，也不能肯定，并且没有同加米涅夫谈过。（卡冈诺维奇：在1930年。）我在1929年或其他年同加米涅夫谈过话，那时我是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他是租让总委员会主席，所以这种谈话我没有正式通知政治局。

谈话内容如下：他向我报告了租让问题，取消或不取消什么，怎么搞，然后他对我说，就是说，现在您恢复了党籍，有许多误会，而如果领导党成长的老布尔什维克们……就是说，我们是有可能消除误解的。对此我回答说，同老布尔什维克集团不相干，我叫他来不是为了背着党和中央委员会来谈什么老布尔什维克的——废话，我请他不要讲这种愚蠢的东西。如果这是严肃的，如果这是需要正式记下的关于老布尔什维克的谈话，那我是没有记下，我也从来没有隐瞒过。这就是我有过的一次谈话，那时我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

其次，我不懂，为什么所有的证词都以此结束，大概都以

1934年结束；大体上是这样。关于1935~1936年一点也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很清楚，这也可以作为证明，按照皮达可夫的供词，我们在这时候同中心建立了联系，成为它的成员……要知道，此中心应当积极活动，同某某人建立起什么联系，干点什么事，发点什么指令，如果确实有这么一回事的话。然而，在1935年也好，1936年也好这些都找不到，我在证词中什么也找不到。这只有在现在和过去都不存在任何中心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关于中心的偶像或虚构，是由于一系列原因构想出来的，所以这些拥护者，在地方上的原右倾的拥护者就开始组织此类东西。而以后没有从中心得到任何指示，没有任何领导，它们就又一次瓦解了。否则，这就得不到解释。要知道，为什么人们只指证1930年，1931年，记得6年，8年的事，而忘记了1935~1936年，对这段时间完全不记得了，而中心却继续存在并继续工作。（莫洛托夫：涅斯捷罗夫有证词。）不，同样如此，关于1935~1936年没有任何东西。（丘巴尔：特罗菲莫夫有证词，涅斯捷罗夫有证词。）特罗菲莫夫的证词我没有读到。这一切是怎么一回事？人们记得6~8年的事，记得早先的事，而1935~1936年发生的事却根本不提，记不起来？（莫洛托夫：阿尔捷缅科有证词，涅斯捷罗夫有证词。）不，所有这一切都是针对那个时间的，是在1936年的谈论，谈的是过去的事情。（莫洛托夫：不是，是1936年的事。）

在存在中心以及中心在工作的情况下，这几年失踪了，这是不可能的。大多数证词涉及1930~1931~1932年，部分涉及1934年，而涉及1935和1936年的或者没有，或者几乎没有。而中心统一之后，似乎应当开展工作，发布什么指令，等等。然而这一切正好相反。这就出现了虚构有我同季诺维也夫分子参加的这个中心，这种集团或同什么中心的接触，全都驴唇不对马嘴。这是无法从现存事实中得到解释的。

同志们，我再提一下许多人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人们要自我指控，这不可能。我自己也为这个问题感到苦恼，现在同特罗菲莫夫一起尽力之所能来给你们一个回答。对我来说，问题只能在于（你们当然可以不相信我）这些证词的某种假设、解释，我在很大程度上要重申布哈林的证词。当然，我不知道的，我没有过错的是，重复一遍，没有同任何托洛茨基恶棍在一起，而是和你们一起进行了斗争，从来没有偏离你们，一分钟也没有同他们在一起。在党的历史上我个人同季诺维也夫斗过不止一次。再说一下，我当然也犯过不少错误。我早就入党，有36年了，但这不是原谅的理由。我说，在这样的大过渡时代，每年都可以遇到各种错误。

我在党的历史上的这样一些决定性的关头犯了错误，这时候，一年、一个月也许胜过较为平静的地下工作的整整五年。同季诺维也夫斗了，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从来没有给他以高评价。自从捷尔任斯基因皮达可夫而死之后，我个人就不信任他了，（梅日劳克：他的死亡应归功于您。）那时我和捷尔任斯基很亲密。我一向认为皮达可夫要两面派，不能信任。（梅日劳克：您在人民委员会那里天天都在污蔑捷尔任斯基，您的记性太差了。）而他差不多每天都到我家来，他住在我的下面。（梅日劳克：不是住在您那里，而是在克里姆林宫。）在我家附近，在下面。我现在说的是皮达可夫，我一贯认为他是个恶棍，知道不能信任他。我想过，他如果转向我们，会出卖自己人的。这一点我完全相信。我还认为，当需要的时候，他会出卖人的。也会出卖我们。而同他勾结，同皮达可夫，同他结成联盟，同我认为最讨厌的人结盟？！我没有在会上公开说这一点，因为他的位置很高，但我从来不信任他。对季诺维也夫也同样如此。

莫洛托夫：而1928~1929年到底同他们建立了联盟没有？

李可夫：没有任何联盟。

莫洛托夫：那么谈话是怎么一回事，布哈林说了些什么？

李可夫：谈话是这样的：布哈林来到我这里，事后告诉我谈话的情况。他来到我这里，说了，我记得我为此骂了他，问他：“而他对你说了些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有说”。

斯大林：而在夺取政权后的第二天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结成的联盟呢？

李可夫：有这回事。

斯大林：而起义前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呢？

李可夫：没有这回事。

斯大林：你是反对起义的。

李可夫：那时我在这里，在莫斯科。（莫洛托夫：起义以后他……）当成立人民委员会，政府的时候，我有过此事。我说在大转变的时候一个月等于许多年，我指的就是这一点。

斯大林：而你知道不知道？中央委员会里有捷尔任斯基的3封信，在不同的时间送交中央的，他提出辞职说：我不能再同李可夫共事了。

李可夫：我知道此事。捷尔任斯基同我说过此事，好像斯大林也同我说过此事。我同捷尔任斯基和解了。我们之间没有过任何争论，他抱怨的是，我各种各样的问题……

贝利亚：而您现在说，他是您的朋友。

李可夫：在这以后我同他是朋友。是这样的朋友，当捷尔任斯基在皮达可夫发言后倒下、病倒的时候，他要求我到他身边去。我送捷尔任斯基回到他的住所。那时候他真的会找我吗？我当时正主持苏维埃代表大会，我把事情交付给另一位主席，去到费利克斯那里，咨询了医生的意见。（席上喊声：这不是在代表大会上，而是在全会上。）对不起，是在全会上。他叫我，而不是别人。我送他回住所。（席上喊声：原来他倒是你最亲密的朋友。）医生拿不定主

意，送不送他回去。捷尔任斯基干了件蠢事，说马上休息一下，一切都会过去的，我就回到席位上去了。（卡冈诺维奇：给予帮助，您认为是友谊？席上喊声：这不对。）问题不在这里。

波斯蒂舍夫：你说1935年你同谁也没有见过面。这里库里科夫招供，1935年科托夫在三个地方同您见过面，你还给了关于恐怖活动的指示。

李可夫：这是在1934年。库里科夫引科托夫的话作证，而科托夫说，是在1934年。我曾和他对质过。这是在1934年的事，我在上次发言时已经对你们说过。他想证明，会见是在1935年，而实际上是在1934年。我同科托夫对质过。（波斯蒂舍夫：而什么时候同别洛博罗多夫见过面？）我同别洛博罗多夫没有见过面。（席上喊声：而在索契呢？席上喊声：从1935年起工作收缩了。）不知道，当然，可以挖苦。我现在是要完蛋的人了，这对我来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徒劳地挖苦我？（波斯蒂舍夫：不是挖苦，而是有确凿的事实。）这是毫无道理的东西。（波斯蒂舍夫：没有什么挖苦你的，您责备自己吧。）我当然，我明白，这是我在中央全会，也许是在我的一生中最后一次发言。不过我再重复一遍，我永远不会为了改善自己或者别的什么坏蛋的处境，而承认我没有做过的事，给自己抹黑。

斯大林：谁要求这么做了？

李可夫：上帝，随你的便吧，这是自然的推论。我没有加入任何联盟，没有参加什么右派中心，没有从事任何暗害、间谍、恐怖活动，没干什么卑鄙肮脏的勾当。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坚持这一点。

№05909

叶若夫在联共（布）1937年2~3月

中央全会上的发言^①

（1937年2~3月间）

同志们，我党中央全会讨论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问题已经第4天了。当中央全会提出问题时，指的是这两个候补中央委员应当为自己的反党和反苏维埃政权的全部政治行为向中央全会，向全党做一政治交代，这是他们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的行为。

提出三项主要指控。第一项是布哈林和李可夫在递交完全服从党和放弃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之后，欺骗党，用两面手法伪装放弃了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但他们保持自己的派别，其成员转入地下，继续坚持自己的旧的政治纲领，没有停止反党斗争，而只服从自己派别内的纪律。为领导这一派别，早在1928年就建立了中心，它一直存在到最近。此中心的最积极的参加者和成员就是布哈林和李可夫。

第二，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拒绝放弃其有害于我国的政治信念，坚持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纲领。

第三，我们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为达到其推翻列宁斯大林的领导的目的，而直接同托洛茨基派、季诺维也夫分子、“左派”、左派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早就被粉碎的派别集团结成联盟。在同所有苏联敌人结成的联盟内，他们采用恐怖手段，组织武装暴

^① 未经订正的记录。

动，进行暗害活动。这就是向布哈林和李可夫提出的政治指控。然而，布哈林也好，李可夫也好，都没有对这些政治指控作出回答。大家把他们叫做资产阶级律师是对的。不是偶然的，他们在自己的发言和声明中完全回避对不久前已被我们枪毙了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匪帮作出评价。不是偶然的，布哈林和李可夫在辩护中主要是寻找被捕的同伙的供词中的矛盾。

如果他们坚持这样的路线，那么讨论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给他们加上一条政治指控：他们仍然是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他们向所有在我们苏联的以及在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发出信号。这是经过讨论我们完全有权向布哈林和李可夫提出的第四条指控。他们向自己的党徒发出信号：继续干，隐蔽得深一些，如果落网了，不要承认。路线就是这样。在辩护的时候，他们不仅对侦查本身表示怀疑，而且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还不得不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审讯案表示怀疑。

至少布哈林在自己的声明中曾明确地谈到这一点。（布哈林：我在什么地方说的？）仔细读一读，你到处都说。你为所有这帮恶棍辩护…（布哈林：这是什么玩意儿？这真是岂有此理！）

是的，你为这帮恶棍辩护，你企图败坏所有审讯案的声誉。（施基里亚托夫：对，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你说得对！）你在自己的声明中很巧妙、很聪明地端出这一套，但实质上你是为这帮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孟什维克、法西斯分子、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辩护。（布哈林：我没有为任何东西辩护。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同意？你不可能同意，如果右派自我诽谤，并且也诽谤你的话——你就是这么说的，但你不能说，托洛茨基分子自我诽谤。为什么他们不自我诽谤？（布哈林：完全牛头不对马嘴。我说的是这里不可能给予全盘回答。莫洛托夫：不要妨碍发言，布哈林。）我转过来回答。我不想涉及审讯程序。我只是一般地提出问

题。看到没有，布哈林在某些被捕者的供词中寻找个别矛盾，并由此作出结论说，瞧，审讯是这样进行的，向被告提示，并且提示得牛头不对马嘴。看见没有，如果我们想为布哈林暗中准备好这全部供词，那就显而易见，这一切就会全安排好，全准备好的……（波斯蒂舍夫：就会消除任何矛盾。）是的，就会消除任何矛盾。每个人只说需要说的话。这也说明审讯是正常进行的：在不同的地点对几十名被捕者进行了审讯……（贝利亚：在不同的时间。）且不谈有多少是针对他的证词，这些被捕者各自提供存在的事实。当然，布哈林，当我们要做结论的时候，我们当然还要对质，补充审讯——我们要对一切进行核实。此外，我还要说一下，如果我们令人遗憾地这样办案，我们在这条路上迷失方向，那我们当然就不可能揭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审讯被捕者的时候，关于他所掌握的材料，谁供出他，都不向他提示，他会突然提供新的事实。李可夫已确信这一点，有一次当着李可夫的面提供了施米特的证词。没有记下施米特的谈话记录。施米特从远东来，同侦查员谈了一小时，然后我要他去对质，说：“施米特，把一切都讲出来。”他就开始讲。（席上喊声：李可夫在场？）是的，李可夫在场。这样，存在个别矛盾等等的论据就统统消失了。

我想，如果全都对上了，布哈林就会向全世界大喊大叫，全都是安排好的。（贝利亚：那时他就会利用这一切。）毫无疑问，会利用的。现在布哈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企图说，这是对他的诬陷，而当问他，为什么他们要自我诬陷，他就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说，有的人怕别人诬赖自己，所以他们自我诬陷……请问有这样喜欢把自己的脑袋做枪毙目标的人吗，能找到很多这样的人吗？能找到这样的爱好者吗？他提着自己的脑袋说：“我是恐怖分子，我是坏蛋，这都是真的，为使我愉快，请枪毙我吧。”（席上喊声：运动员。）布哈林为他们所有的人辩护不是偶然的，因为他需要为自己辩护，

因为如果他们把不真实的东西加于自己，那他们为什么不诬陷布哈林呢？因此他不得不为他们所有的人辩解。

其次，第二个论据：说是我早就同所有这些人划清了界限，把他们叫做反革命分子，因此他们自然仇恨我，诬陷我。现在我向布哈林引几个文件，说明他是怎样划清界限的。他确实同斯列普可夫划清了界限，准确点讲，同所有的斯列普可夫兄弟划清了界限，早就划清了界限，即在在他们被捕之后，而当斯列普可夫被开除出党后，他也同此人划清了界限。这指的是弗拉基米尔·斯列普可夫。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他秘密打电话给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事先向他打听，然后他发出了一封信。我说此事是因为他已被捕，被开除出党，而在这以后你给叶梅利扬写信。（布哈林：对的，他同这个集团毫无关系。）不对，其实你知道，他有直接关系。（布哈林：没有，没有。）

等一等，你且听文件，要有耐心。他写了一封关于斯列普可夫的信，斯列普可夫是其弟兄中最年轻的一个：“我只能说，我很了解，弗拉基米尔·斯列普可夫在任何阶段都没有干过什么糟糕的勾当，没有参与任何派别活动。也许在什么时候他曾有过怀疑，但他在政治上同亚历山大无关。”他要求恢复其党籍。（斯大林：布哈林这是给谁写信？）他总是写给雅罗斯拉夫斯基的。事实上他很清楚，弗拉基米尔·斯列普可夫也好，瓦西里也好，都参加了在波克洛夫斯基—斯特列施涅沃召开的著名会议，总共有 17 人参加，库兹明在这里第一次说，如果全部问题在于斯大林，那就把他收拾掉。他们全都这么说，瓦西里，弗拉基米尔·斯列普可夫都这么公开地说，自此组织存在之日开始，他俩就跻身于该组织，兄弟们吸收了他们。此弗拉基米尔·斯列普可夫几乎参加了所有的会议。（布哈林：他住在列宁格勒啊。）对，是住在列宁格勒，完全正确。此斯列普可夫 1933 年被捕，后来获释，被开除出党，而 1934 年尼古拉·伊

凡诺维奇·布哈林为此人说情，而后来却说：“他们污蔑我，是因为我同他们划清了界限。”甚至在这种小事上也可以看出他的两面手法。

第二个文件——也是相当可疑的友谊：是这样一些著名的人物，恐怖分子卡塔雷诺夫，暗杀基洛夫的组织者，枪手尼古拉耶夫。请看，也是在1934年布哈林写道……（席上喊声：写给谁？）写给列宁格勒的梅德维季。他写道：“亲爱的梅德维季同志，你那里有一个工作人员遇到困难，——接着提出请求——最好能解除他的行政事务，你们列宁格勒有个小伙子瓦尼亚·卡塔雷诺夫”，简而言之，用其他人的话向他作了详细的介绍，说斯莫洛基诺夫可以推荐他。然后写道：“他被开除出党一事，我且不提。我知道的只是，听说他是非常有才能的党的工作人员。”（布哈林：一个著名的工作人员，很杰出的肃反委员会人员……）问题不在这里。（布哈林：一名肃反委员会人员，科学工作人员请求我提供这个卡塔雷诺夫。我给梅德维季写信，请他对此人核查一下。）同恐怖分子的奇怪认识。（布哈林：我可以把证人给你叫来，说明我是根据谁的请求这样做的。）

安德列也夫：布哈林同志，请不要妨碍讲话。

叶若夫：布哈林把一切都建立在谎言之上。懂吗，每一步都扯谎，听着都觉得羞耻。（席上喊声：对。）为了替自己的处境辩解，他不惜撒谎狡辩，甚至在被文件揭露的时候，他还企图抵赖，就像不久前他在关于前言的问题上抵赖一样。这是必然的。不仅如此，为了替自己辩护，他拉列宁做证人，为的是一方面求得怜悯，另一方面想说明，列宁是在他的看护下去世的。他写声明给中央委员会说，伊里奇是在他的看护下去世的。胡说八道！谎言！全是撒谎！说这个干什么？现在我来读一读报纸，季诺维也夫写道……（莫洛托夫：什么报纸，哪一天的？）这是著名的《真理报》，1924年1

月 30 日星期三第 23 号。季诺维也夫在报上写道：“……医生证实了一切。而现在来电话了：‘伊里奇去世了’。一小时以后我们——布哈林、托姆斯基、斯大林来到哥尔克已去世的伊里奇身旁，李可夫病倒躺着……”

布哈林：伊里奇去世时在场的有：玛利亚·伊里尼奇娜，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佐里卡医生和我。对不对，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叶若夫：我给您读文件。

布哈林：我用双手扶着他，已去世的伊里奇，还吻了他的脚。

波斯蒂舍夫：也许你是扶过死者。

布哈林：我那时是住在哥尔克！

波斯蒂舍夫：死者，这就是说，他已经死了。

叶若夫：同志们，我举这个事实是为了说明布哈林企图用什么方法为自己辩护。（波斯蒂舍夫：这是亵渎行为。梅日劳克：犹太之吻。）他的学生们，他的密友们称他为“恬不知耻的政客”。我认为可以把此种行为说的更严重一些。我认为，这是政治娼妓行为，企图用任何方法和手段为自己洗刷，当面扯谎。当他开始读这些证词的时候，他公然歪曲文件。谁需要它？同谁互相呼应？（贝利亚：同敌人。）这就是我想就侦讯和布哈林的行为提出的部分看法。

第二个看法是关于李可夫的。他说，所有的证词都只到 1934 年。第一，我为您，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感到高兴，我并不认为我们把一切都挖掘出来了。我们还要查到 1936 年，1937 年。其次，有直接针对您的证词，特罗菲莫夫、阿尔乔姆耶夫、涅斯捷罗夫以及许多其他人的证词，他们都谈到了您在 1936 年的“活动”。

还有一点看法。是关于中心的。他们在这里企图把事情描绘成这样，既然我们没有见面，没有开会，那会有什么鬼中心……众所周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中心也没有开会，没有记录，但

工作是干了。众所周知，并行中心也没有开会，但有一个中心。你们是怎么想的，如果你们定期聚会喝茶，或不喝茶，你们不会被发现？（布哈林：而如果根本就不聚会呢？）问题就在这里，你们吸取托洛茨基分子的经验，行动特别秘密。

最后一个论据——这就是此涅斯捷罗夫神经失常问题。同志们，没有比这更倒霉的辩护了。作为他的秘书，他的密友的这个人，在1931年病了。通常是神经方面的毛病。此人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医院住了5~6个月，正如他所说的，根本就不在疯人院。（波斯蒂舍夫：在水疗医院。）对，对。从1931年起头脑正常，记忆力很好，工作过，关过，也流放过。您想有的都有。甚至在对质的时候他也企图以此为论据。如你们所知道的，此人非常接近李可夫，像狗一样忠实于他，他直截了当地说，我同他有亲密的关系。他甚至发怒了，说“你怎么不害臊，阿列克谢·伊凡诺维奇，用这种东西来指控我”。我认为他是对的。利用这种小论据，这是完全用不着的，是救不了您的，完全无济于事。

我还想说一点。作为替自己辩护的主要论据之一，布哈林说，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同他的学派有关。此学派中人指证的是同样的东西。据说，这会造成一种心理状态：他们全都在坐牢，因而招供的也全都一样。然而您怎么推翻其他更为有分量的证词呢？我指的是雅科文科的供词。请允许我宣读一下。要知道，我们在审讯时是无法杜撰雅科文科所说的那些东西的，并且顺便说说，这得到某些文件资料的证实。

我已经对你们说了与布哈林有联系的雅科文科组织游击中心一事，说了布哈林向他发布了什么指示。审讯员问：“说一说武装发动和在西伯利亚夺取政权的实际计划。”答：“在莫斯科游击中心讨论过武装起义计划……（宣读）……关于远东”，等等。同志们，下面是所有供词：1931年，1932年，1933年的。（布哈林：这全

是雅科文科的?) 是的, 这全是雅科文科的供词, 您同他定期会见, 谈话, 通电话, 邀请他——“您是否想去医院?”, 于是在医院会见。(布哈林: 这一切全是无稽之谈。)

此雅科文科并不属于您的学派, 他怎么能够杜撰同您相互协调之类的东西? 诬陷您对他有什么好处? 同志们, 我必须对你们说, 不要认为这是神话。他们干了, 采取了行动。现在我们根据这些供词采取了没收武器的行动。仅一个阿尔泰小组(在“3k”小组)就收缴了约 500 支步枪, 仅仅一个阿尔泰小组。(贝利亚: 他们为什么自我诬陷?) 就算他们诬陷, 但武器就是武器。(波斯蒂舍夫: 而这一切全都来自布哈林。布哈林: 原来布哈林像军事专家那样行动。) 这已经是另一种证词, 不属于布哈林学派的人的证词, 对布哈林并不怀恨, 他为布哈林辩护, 没有同他划清界限, 相反地, 有良好的关系。从 1921 年起就认识你。这就是供词。(波斯蒂舍夫: 谁的? 贝利亚: 雅科文科的。) 这是雅科文科的供词。我必须说, 所有这些供词, 此游击小组的供词, 都得到了证实。(艾赫: 他们举行过起义。) 是的, 在两个区举行的起义, 他们没能坚持下去, 失败了, 这是两起富农起义……(席上喊声: 雅科文科组织的?) 是的, 是雅科文科, 而他的亲密助手特列季亚克(布哈林: 我一辈子总共只见过他 3、4 次。) 是为日本人服务的。特列季亚克是您的朋友雅科文科的亲信。

现在, 同志们, 谈几个实质性问题。如果撇开所有侦查的事实, 而只谈我们这几天在这里所听到的那些讨论, 只谈布哈林、李可夫的那些声明和发言, 再加上对质的证词, 仅仅根据这些事实, 我认为, 我们仍然可以在政治上提出同样的指控, 甚至依据他们的“招供”。这是些什么样的招供?

第一, 关于派别。布哈林和李可夫都肯定, 从 1930 年起他们已经同自己的全部过去决裂,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在党内诚实地工

作。同志们，实际上不全是这样。第一，对我们来说是新闻的是：直到1930年，即到1932年，看来布哈林并非一切顺当，并不是全都理解。有什么不顺当的东西。（日丹诺夫：逐渐消除两面性的时期？）逐渐消除两面性的时期，不过这种两面性相当奇怪。假设单独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人，他坐在办公室，作哲学思考，并逐渐消除，但实际上他不是一个人消除，而在1932年——他承认此事——他没有割掉学派的尾巴，同库利科夫有联系，告诉他哪里有坚强的干部，同乌格拉诺夫会见，揪住朋友的衣服问他，你干吗行动，沃伦人到工厂去，发出不良的气味，哎，伙计失事了，要坚持住。

这是布哈林的证词，实际上，需要按另一种方式来读。事情实际上是这样的：他去找乌格拉诺夫，不是去制止，而是要他行动，催促他，他告诉库利科夫哪里有坚强的干部，为什么没有坚强的干部，他向他施加压力。对自己的学派他也照此办理。所以，即使只看他本人在事实和对质的压力下不得不作出的承认和证词，也足以说明派别作为派别至少存在到1932年年底。根据你的所有同党的供词可以看出，你们的派别一直存在到最近。这一点您是跑不掉的。

李可夫也说，从1930年起断了任何联系，同一切决裂了。实际上，1932年拉金去找他，把国内的政治形势说成是灾难性的，规定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实行失败主义的方针，提出右派进行积极斗争的问题，对他李可夫说，您干吗还在睡觉，等等，而李可夫仅限于给以慈父般的训诫，说你算了吧，等等。现在他说：我懂得，这大概是托洛茨基组织派来的。废话，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被推着走的人。如果你认为不正确，为什么……说，我后悔没有送交内务人民委员部。如果需要送交内务部，就是说谈话是严重的。就是说，这是李可夫关于同拉金会见的证词，而他不仅同拉金会见。阿尔乔

缅科住在他家里，他经常去流放地，同隔离所建立了联系，收到隔离所的来信。而李可夫也往隔离所寄去什么信件。所以，甚至根据布哈林和李可夫本人的证词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派别是存在的，当他们说，从1930年起什么都不存在了，那是扯谎。第二个，依我看，也是最重要的中心事实，就是关于李可夫在1932年8月份在博尔舍沃的托姆斯基别墅里读柳亭纲领的证词……诚然，他们否认他们是该纲领的作者，他们也否认施米特的证词，施米特是作者之一，参加了该纲领的讨论。他们否认一切。只承认孤零零的事实——读过纲领。但我觉得，李可夫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因为他做了点保留说明，承认了这一点。事情非常简单。在同拉金、涅斯捷罗夫、科托夫对质的时候，还没什么。这时候李可夫事先对他们中的每个人做了评论。其中，他自己请求，把拉金放在前面，他是一个非常聪明、信守不移而又镇静的人。喏，拉金就是拉金，对我来说全都一样。而现在他千方百计说他的坏话，把他说成是疯子。

当瓦西里·施米特报告自己的全部卑劣工作，完全公开地报告的时候，李可夫捂住自己的心区，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用额头去碰玻璃。而在这之前我们正在谈论柳亭纲领，李可夫断然声明，他只是在中央委员会才得知柳亭纲领的，而在此之前他对此一无所知。而当施米特开始谈柳亭纲领的时候，李可夫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而我是怎么称呼它的——梅德维杰夫纲领。”我们当然就问，这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是的，他把该纲领叫做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杰夫纲领。但这是在什么情况下的事呢？在批评该纲领的经济部分，说它过于露骨地倒向一边，它像施略普尼柯夫—梅德维杰夫纲领，太露骨地提出复辟资本主义的问题，应当设法使它隐蔽一些。施米特证实，放弃了此类语句。施米特证实，全体读了此纲领，讨论了，发言了。托姆斯基发了言并声明，这不算什么，主要部分——这很重要。

布哈林和李可夫都企图证明，他们同该纲领的制订毫无关系。根据许多参加者和主要参加者——中心成员之一施米特的证词，该政纲是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等人的直接创造。如我所报告的，1932年4月起草了提纲草稿。然后委托乌格拉诺夫会同柳亭把它写成，他们写成了，拿出来，宣读并散布了。现在人们竭力设法踢开此纲领。关于1929年的纲领我已经说过了，它没有见过天日，也没有送交中央委员会。它为什么没有送交中央委员会？因为它太露骨、太直接地提出和柳亭纲领相同的经济问题、国家工业化问题和农业集体化问题。

我想在这里把两个纲领——柳亭纲领和1929年纲领的某些部分做一些对比，让你们看看，谁是两个纲领的作者。布哈林和他的人写了。请看比较。众所周知，柳亭纲领的政治部分非常注意一点，即党滚到托洛茨基主义的道路上去了，偷运托洛茨基的货色，等等。请听1929年的纲领：“在上述所有问题上，以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多数滑到托洛茨基立场上去了。如果看看斯大林及其他人在第14次和第15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并同现在的讲话比较一下……”（宣读。米高扬：这是1929年布哈林纲领中的话。柯秀尔：这是他在政治局宣读的政纲。）这就是这个政纲。（斯大林：谁的？）柳亭的纲领。“斯大林偷运托洛茨基及其集团全部货色，断言他的超工业化——不仅压制富农……”（宣读）也就是重复那一套，说滑到托洛茨基的轨道上去了，偷运托洛茨基的货色。这两个纲领的作者们的思想是一样的，表达略有不同，但作者是同一批人。

其次，让我们看看关于阶级斗争的说法。（布琼尼：这里风格很清楚。）是的，这里风格很合适。（席上喊声：布哈林的。）布哈林1929年政纲中说：“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化的理论被古比雪夫加深到荒谬的程度……”（宣读）而在此柳亭纲领中是怎么写的呢？“在党的正确政策下，在确实巩固工人阶级同中农的联盟以及在依靠贫

农的情况下……”（宣读。）请看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难道它在这里看不出来？（梅赫利斯：他在报刊上也这么写的。席上喊声：对，对。）这完全是布哈林及其阶级斗争熄灭论。在把这两个政纲加以对比之后，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作者是同一个人。（布哈林：绝对错误的结论。）这一点你还可以论证。（斯大林：非常相像。）那里关于党说的也是这种污蔑性的东西，这我就不说了。在这两个政纲之间存在什么区别？

在于经济部分和政治部分——对整个形势的评价，没有任何区别。区别在于斗争的结论。那里他们还指望正面冲击，公开向党进攻。在提出 1929 年政纲的时候，他们打算发动争论，然后再脱身。在 1932 年，在党取得胜利的情况下这样做是毫无希望的。他们懂得，没有地方可以脱身，因此提出恐怖手段和武装起义的问题。区别仅仅在这里。（布哈林：仅仅？）是的，仅仅在这里，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你去读一读这个和那个政纲——尽管你是这两个政纲的作者——你会知道得更清楚的。

同志们，如果得到证实，柳亭纲领是右派纲领，其真正作者是右派中心，即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乌格拉诺夫、施米特等人，他们毫无疑问是作者，那么布哈林和李可夫等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全部论据就统统站不住脚了。对不起，如果你们承认该纲领，而你们读过它……（布哈林：我没有读过，尼古拉·伊凡诺维奇，为什么要这么说？）……那里白纸黑字分明写着联合包括托洛茨基分子在内的一切力量，而您现在竭力否认此集团；那里谈论恐怖行动，而您现在竭力否认恐怖行动；那里谈论武装起义，而您竭力予以否认。但事实终归是事实。不管你们怎么说，不管你们怎么躲躲闪闪，事实是存在的——你们是纲领的作者，这你们是逃不掉的。而既然逃不掉，你们以后的全部活动都完全符合该纲领，都可以纳入该纲领。而我正是试图证明，它可以纳入，而且不是偶然纳入

的。

同志们，顺便讲一下托洛茨基分子。布哈林企图给自己摆功，说他不可能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因为他有一个时候曾同托洛茨基斗争过，和党一起进行过斗争。对的，斗争过，但是怎样斗争的呢？他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斗争的。（波斯蒂舍夫：抱什么样的目的？）还是让我们回到你们的备忘录去吧，此备忘录也不是偶然的产物。如果像布哈林和托洛茨基那样理解党在我们苏维埃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作用，像备忘录所说的那样，那首先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应当对托洛茨基分子采取什么样的态度？由此完全可以理解“进行斗争，同时和睦相处”这一口号了，这是他们奉行的口号。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同托洛茨基斗的。布哈林学派斗争了，但它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进行斗争的。党单独进行了斗争，而他们不是同党一起斗争的，而是在同党建立某种联盟的情况下去反对托洛茨基的，并同时准备好自己的反党王牌，而暂时同党一道斗争。您的所有学生是都这么说的。

为什么你们一方面同托洛茨基斗争，而同时却要用自己的炮火去反对党？（布哈林：这在什么地方？）你在各种小组的所有讲话。您的所有学生都说，您日复一日地鼓吹，说列宁在如此这般问题上是不正确的，而我是对的。而由于众所周知，党中央和斯大林同志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列宁，彻底地进行了斗争，我认为，这对您来说是不很愉快的，所以你在自己的各种小组里大讲斯大林同志的坏话。您的所有同党，您的整个学派都这么说。（波斯蒂舍夫：您的所有学徒。）

同志们，我想，如果承认……顺便说一下，布哈林同志，我提醒您一下斯大林的引文，1930年在第16次代表大会上，他也曾就您同托洛茨基分子的关系向您提醒过。谈到您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时斯大林声明，“同托洛茨基分子秘密会谈……，寻求同他们的联

盟，其原因就在于此。”一个事实是1928年你同加米涅夫会谈，不是一次，而是两次：一次是在1928年，我们从马列茨基的证词中发现了此事。（赫鲁晓夫：托姆斯基在国家图书杂志出版社联合公司也说过此事，有速记记录。）第二，托姆斯基也说过此事。1930年您会见了加米涅夫，您一直围着这些联盟转来转去。

不过，同志们，让我们暂且放下此纲领的作者问题，到底如何解释李可夫的行径呢？在党的中央全会之前讨论了此问题。（米高扬：柳亭纲领。）讨论纲领是在8月份，召开全会是在10月。李可夫只字未提他知道纲领的事，虽然他同全体一起投票赞成全会的下述决定。全会根据关于柳亭—斯列普可夫反革命集团的报告通过以下决定：“同意关于……的决定”（宣读）实际上，那时就可以把你们开除出党，并且应当开除，因为李可夫向党隐瞒了此事。（席上喊声：“他指天发誓来着”。）是的，他指天发誓过，并投票赞同决定。

我还可以从托姆斯基的档案和保存在《消息报》的布哈林档案中举几十个事实和文件。为什么他极端喜欢复印件，例如送到他那里的所有反苏声明、信件。他没有把它们送交国家政治保卫局，而把复印件保存在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的卷宗里。所有这些复印件都保存着。现在达里转交给我一大堆这样的丑恶的反苏声明。漫骂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些都向您提出。（波斯蒂舍夫：这是为了估计力量。）就是这样。保存一切，结集，收集。（布哈林：但我没有见过，这保存在秘书处，我对此一无所知。）

同志们，我这就讲完了，我稍微拉长了一些。我认为，他们没有给予政治答案，而只以侦讯中的矛盾作为论据。我认为，全会以事实向布哈林和李可夫提供了足以相信侦讯的客观性的可能性，让他们看到，侦讯是怎样进行的。（席上喊声：对。）

安德列也夫：同志们，有一个建议，选一个委员会给刚刚讨论

的李可夫和布哈林案问题起草决定草案。(席上喊声：对。)有人反对吗？(席上喊声：没有。)建议选以下人员为委员会成员：米高扬——委员会主席，安德列也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宣读)这就是建议的委员会成员。有反对的没有？(席上喊声：“没有。”)

斯大林：加上安季波夫、加马尔尼克。(席上喊声：好，加上。)

安德列也夫：就是说，批准对委员会成员的补充。建议晚上的会议从8点开始。(席上喊声：好。)

№05906

联共（布）1937年2~3月中央全会 布哈林和李可夫专案委员会会议记录

（1937年2月27日）

出席：

米高扬同志——主席。

委员会委员：安德列也夫，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叶若夫，什基里亚托夫，克鲁普斯卡娅，柯秀尔，雅罗斯拉夫斯基，日丹诺夫，赫鲁晓夫，乌里扬诺娃，曼努伊尔斯基，李维诺夫，亚基尔，卡巴科夫，贝利亚，米尔佐扬，埃赫，巴基罗夫，伊克拉莫夫，瓦雷基斯，布琼尼，雅可夫列夫，丘巴尔，科萨列夫，波斯蒂舍夫，彼得罗夫斯基，尼古拉耶娃，什维尔尼克，乌加罗夫，安季波夫，加马尔尼克。

听取：

委员会委员叶若夫关于撤消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把他们移送军事法庭并处以极刑——枪决的提议。

1. 波斯蒂舍夫同志：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并移送法庭，不枪决。

2. 布琼尼同志：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并移送法庭，处以枪决。

3. 斯大林同志：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布哈林和李可夫案转送内务人民委员部。

4. 曼努伊尔斯基同志：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并移送法庭，处以枪决。

5. 什基里亚托夫同志：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移送法庭，不枪决。

6. T. 安季波夫同志：同上。

7. 赫鲁晓夫同志：同上。

8. 尼古拉也娃同志：同上。

9. 乌里扬诺娃同志：同意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10. 什维尔尼克同志：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移送法庭，并处以枪决。

11. 柯秀尔同志：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并移送法庭，不枪决。

12. 彼得罗夫斯基同志：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并移送法庭，不枪决。

13. 李维诺夫同志：同上。

14. 克鲁普斯卡娅同志：同意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15. 科萨列夫同志：撤消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移送法庭并枪决。

16. 亚基尔同志：同上。

17. 瓦雷基斯同志：同意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18. 莫洛托夫同志：同意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19. 伏罗希洛夫同志：同意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决定：

1. 撤消布哈林和李可夫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资格，开除出党，不移送法庭，而把案件转交内务人民委员部。

（一致通过）。

2. 委托由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叶若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通过的决定起草一份说明理由的决议草案。

主席 A. 米高扬

№05903

布哈林给斯大林的信^①

(1937年12月10日)

未经约·维·斯大林允许他人勿阅

绝密

约·维·斯大林亲收

7页+7页报告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

我这封信很可能是我临终前的最后一封信。因此请允许我写这封信，尽管我是个囚犯，没有任何公职，并且信只写给你，而它是否能存在完全取决于你……

现在我的人生戏剧，也许还有我的肉体生命，已翻到最后一页。我在痛苦地考虑，要不要动笔——由于万分激动、百感交集，我现在浑身战栗，难以控制自己。然而，正因为大限临近，我想趁手还能写，眼还能睁，脑子多少还能工作，现在还不为时不晚，提前同你告别。

为了不引起任何误解，我一开始就要对你说清楚，对世界（社会）我1、不打算收回我一件件写出的任何东西；2、在这个意义上（及相关点上）我不打算向你提出请求，也不想恳求你改变事件既定的运行轨道。我写信只是要向你个人提供信息。不给你写完这

^① 布哈林的信于1956年曾分送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们。

最后几行，我不能去死，因为我感到极端痛苦，这一点你应当知道。

1. 站在万劫不复的深渊的边沿，我要向你作出临终前的真诚的保证：我没有犯在侦讯时曾经承认过的罪行。

2. 我就所能回顾了所发生的一切，作为对我在全会发言的补充，我只想指出：

1) 我在什么时候从什么人那儿听到过好像是库兹明的喊叫，但从来不认为这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在我脑海里从来没有出现过；

2) 至于代表会议，我一无所知（就像柳亭纲领一样），事后艾亨瓦尔德在街上匆匆告诉我（“伙伴们聚集在一起，做了个报告”），或诸如此类的话，由于怜悯“伙伴们”，我当时隐瞒了此事；

3) 1932年在“学生们”的问题上我也要了两面派，那时我真诚地想把他们完全引向党，否则就甩掉。这就是全部真相。这样我就能完全净化自己的良心了。其余的一切，均属子虚乌有，或即使有过，我也毫无印象了。

我在全会上说过同样的大实话，只是大家不相信而已。我这里说的也绝对是真话：最近几年我一直真诚地、忠实地执行党的路线，并学会理智地评价你，爱你。

3. 除了认罪，承认别人的供词并加以发挥外，我别无出路，否则我就是“不缴械投降”。

除了外部因素以及上述第三点外，我思考所发生的一切时，得出大致如下的设想：1) 由于处在战前时期，2) 由于向民主过渡，产生了进行总清洗的宏大大胆的政治思想。这种清洗包括（1）罪犯，（2）嫌疑者，（3）潜在的嫌疑者。这里不牵连到我是不可能的。

对一些人采取一种方式消除危害，对另一种人采取另一种方

式，对第三种人采取第三种方式。人们不可避免地互相举报，人与人之间永远互不信任（就我自己而论，当拉狄克对我胡说八道时，我对他是那么气愤！而后来自己也走上了同样的道路……）这样一来，领导就有了充分的保障。

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认为我这是在含沙射影，甚至在默想中我也没有这种念头。我已走出孩提时代，我懂得大计划、大思想和大利益高于一切，与首先落在你肩头的那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相比，提出我个人的问题那是太渺小了。

但这也正是使我深感痛苦，极为烦恼的一种怪论。

4. 如果我能绝对肯定你也正是这样想的，我的心情就会平静得多。好吧！需要就是需要。但是请你相信，当我一想到你会相信我有罪，你会从心底里认为我确实有罪，我的心中就会热血沸腾。结果会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说我亲自帮助消灭一批人（从消灭我本人开始！），也就是说，我在故意作恶！那就无可辩解了。我脑子里是一片混乱，我想大声叫唤，用头撞墙，因为我造成了他人的毁灭。该怎么办？怎么办？

5. 我不是凶狠的人，也并不残酷无情。我不是耶稣会教士。但我也有自己的乖谬行为。我认为，我应当为我确实进行过斗争的那些年月而受到报应。如果你想知道，有一件事一直压得我非常难受，此事也许你已经忘记：有一天，也许是1928年夏天，我到你那儿，你对我说：知道吗，我为什么跟你要好？因为你不会搞阴谋。我说：是的。然而，就在这时候我去找了加米涅夫（“第一次会晤”）。信不信由你，但这一事实老是出现在我的脑海，就像犹太教徒的一种原罪那样。天哪，我是多么幼稚而愚蠢啊！而现在我要为此付出自己的名誉和整个生命。原谅我的这个过失吧，柯巴。我现在边写边哭。我已一无所求，你也知道，我把这一切写出来，只会恶化自己的处境。但是，我不能，不能不向你最后说一声“请原谅”而保持

沉默。因此我不抱怨任何人，无论是领导，还是侦查人员，我请你原谅，尽管我已受到惩罚，一切都黯然失色，眼前只有黑暗。

6. 我曾有过幻觉，有几次看见了你，有一次看见了娜捷日达·谢尔盖耶夫娜^①。她走近我说：“他们对您干了些什么，尼·伊·？我去对约瑟夫说说，让他给您作保。”情景是如此真切，我几乎跳了起来，要提笔给您写信，让……您给我作保！现实和梦幻在我身上就这样交替出现。我知道，娜·谢·怎么也不会相信我会蓄意谋害你，我那不幸的“我”的下意识也不会无端引出这种梦幻。而我和你是一谈就是几小时。上帝啊，如果有一种仪器能让你看到我那破碎的、痛苦不堪的心，那该多好啊！如果你能看到我的内心对你有多么依恋，并且其方式全然不同于斯捷茨基和塔利之流，那就好了。不过，请原谅，这只是“心理学”。如今没有能挡住亚伯拉罕之剑的天使了，在劫难逃啊！

7. 末了，请允许我提最后几个小小的请求：

(1) 对我来说，死比承受将举行的审判要容易千百倍：我简直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你是了解我的禀性的；我既不是党的敌人，也不是苏联的敌人，我将尽力之所及去做，但在这种情况下力量是有限的，而沉重的感觉压在心头：我甚至会抛开羞耻和高傲，跪下来祈求不要出现这种情景。然而这大概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如果可能的话，我想请求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审判之前死去，尽管我知道，你是多么严厉地看待这些问题的。

(2) 如果^② 等待我的是死刑判决，那么我事先向你请求，请看在你最珍贵的一切的份上，让我在狱中服毒来代替枪决（给我一些吗啡，让我长眠不醒）。这一点对我来说极端重要，我不知道应

^① 娜·谢·阿利卢耶娃是斯大林的妻子。

^② “如果”后面布哈林删去“你们预先决定”几个字。

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恳求给予这种宽大待遇。其实，这样做在政治上不会有任何不妥，而且谁也不会知道。无论如何请允许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度过最后几秒钟。发个善心吧！

你对我很了解，肯定能理解我。我有时能直视死神，就像（我知道得很清楚）敢于采取大胆的行动那样。而有时同一个我却如此心慌意乱，身上一点勇气也没有了。所以如果我非死不可，请给我一盅吗啡。恳请满足这一要求……

(3) 请允许我同妻子和儿子告别。女儿就免了，她太可怜，告别对她来说太沉重了，娜佳和父亲也一样。而阿妞塔，她年轻，经受得住，而且我也想同她说几句诀别的话。我想请求在审判之前同她见面。理由是，如果我的家人看到我招认的东西，他们会由于感到意外而自杀的。我要就此做点工作。我觉得，这样做对于案件以及官方对案件的解释都有好处。

(4) 万一我能保全生命的话，我想请求（尽管我还需要征求一下妻子的意见）：

a) 或者把我送到美洲去呆上若干年。理由是：我会就几个审判案发动一场运动，会同托洛茨基展开一场殊死的斗争，会把大部分动摇的知识分子拉过来，我将实际上成为反托洛茨基派，我将轰轰烈烈、满腔热情地进行这一事业；可以派一个老练的契卡人员与我同行，并且，在我用事实证明如何狠狠地打托洛茨基及其一伙的耳光之前，作为补充的保险措施，还可以把我的妻子扣在这里半年。

b) 但是如果对此哪怕有一点疑虑，可以把我发配到伯朝拉或科雷马集中营去哪怕呆上25年：我会在那里办大学、地方志博物馆、技术站等等，建研究所、画廊、民族学博物馆、动植物博物馆，创办集中营杂志和报纸。

总之，我会从事开创性的文化工作，我和家人会住在那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不管怎样，我声明，无论在哪儿工作，我都会像一台大功率的机器那样运转。

然而，说实话，我对此并不抱希望，因为改变二月全会的指令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问题（并且我看到，日内就要举行审判）。

看来，这就是我的全部最后请求了（还有留在我身边的哲学著作——其中我写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你因为失去我而失去一个最有才干、真正忠实于你的将军。但这已经没有关系了。我记得，马克思曾经写到过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巴克莱·德·托利，说亚历山大一世因此白白失去一个助手。想想这一切是痛苦的。但我思想上已做好离开尘世的准备，我对你们，对党，对整个事业只有一腔伟大的无限的爱。我正在做人所能做到和不能做到的一切。我把一切都向你写了。该说的都说了。我提前做好这一切，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明天、后天……我会处于什么状态。

也许我会像一个神经衰弱患者那样变得麻木不仁，连一个手指头都动不了。

而现在，虽然我的头很疼，眼里充满泪水，但还在写。柯巴，现在在你面前我的良心是纯洁的。我请求你最后一次原谅（心灵的，而不是别的）。为此我在心底里同你拥抱。永别了，我这个不幸的人过去如有对不起的地方，就请原谅吧。

尼·布哈林

1937年12月10日

附录7页^①

^① 布哈林的信于1938年12月12日被送交中央特别部，无附件。档案中也没有信的其他抄件。

№05908

布哈林给拉林娜的信

(1938年1月15日)

亲爱的安努什卡，我的心上人！

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审判即将开始，给你写信的目的有三点，不管你读到、听到多么可怕的东西，不管对我说了些什么，也不管我说了些什么，你都要勇敢地、平静地对待这一切。让全家人做好准备。我既为你担心，也为其他人担心，但首先为你担心。决不要生气。要记住，苏联的伟大事业仍然存在，而这是主要的，同它相比，个人的命运只是过眼云烟，微不足道的。你面临着巨大的考验。我亲爱的，我求你采取一切措施，绷紧全部心弦，但不要让它们绷断了。不要同任何人闲扯任何东西。你知道我的状况。你是我最亲密，最亲爱的人。所以我用咱俩间最美好的一切请求你尽最大的努力，倾全部的心思去帮助自己和全家人度过这可怕的阶段。我觉得，不必让父亲和娜佳读到这几天的报纸，让他们暂且像睡着了那样。还有，你自己看着办吧——自己安排一下，给自己想个办法，以免发生意外的可怕震荡。既然我提出这种要求，那就请你相信，我饱经忧患，其中包括提出这一要求，一切都会发生的，正如伟大的重大利益所要求的那样。你知道，我给你写这样的信要花多大的代价，不过我写信的时候深信，我只能这样做。这是主要的，基本的，决定性的。这短短的几行表达了多少意思，你是懂得的。像我所请求的那样去做，要控制住自己，就像石雕像那样。

我非常为你担忧，如果允许你写信或者就以上所述给我写几个令人放心的字，那就会多少减轻压在我心头的这一重负。

这一点我求你啦，我亲爱的朋友，我恳求你了。我的第二个请求要小得多，但对我个人却极端重要。将向你转交三份手稿：

1. 数量很大的哲学著作，计 310 页（《哲学短篇集》）；
2. 小诗集；
3. 小说的头七章。

它们需要用打字机各打三份。父亲可帮助加工诗歌和小说（诗歌附有设想，表面上很混乱，但可以理清楚；每一首诗都要打印在单张的纸上）。

最重要的是不要把哲学著作弄丢了，这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写成的，我往那里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同我过去的著作相比，这是非常成熟的作品，并且与那些著作不同，自始至终贯穿着辩证法。

还有另一本书（《资本主义文化的危机和社会主义》），其头一半我还是在家里写成的。你设法把它找出来：它不在我这里，——如果丢了，那太可惜了。如果你收到手稿（好多诗歌是同你有关的，你从中可以感觉到我对你的眷恋），而如果允许你给我写几行或几个字，也不要忘记提一下我的手稿。

现在畅谈自己的感情，不是地方。但是你这封短信可以看到，我是多么无限深情地爱着你。在我这艰难的时刻，请你用完成我的第一个要求来帮助我。不管审判的结局如何，无论如何宣判后我将看到你并能够吻你的手。

再见吧，亲爱的！

你的 科利卡

38 年 1 月 15 日

又及：我有你和孩子的照片。替我亲亲尤尔卡。还好他不会读报。我也很为女儿担心。关于儿子哪怕写几个字——大概已长成孩子了，然而还不认得我。拥抱并爱抚他！

No03359

布哈林在“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

案中的最后陈述^①

(1938年3月12日)

法庭警卫长：法官到，请起立。

庭长：请坐。被告布哈林，现在由您作最后陈述。

布哈林：庭长公民和法官公民们，请允许我就我的活动和与此相关的事作最后的陈述（其实际内容我在法庭侦讯和审判中已经作了叙述），并回答国家检察长对我提出的最重要的指控。^②

我完全同意检察长公民关于历史性^③ 审判的说法，这次^④ 历史性审判揭露了由“右派托派联盟”犯下的我们恶毒罪行。而我是这个联盟的首领之一，因而对其全部活动我负有责任。

这次审判在一系列审判中是总结性的，它揭露了所有的罪行、贩卖活动，揭示了我们进行的反对党、反对苏联政府的斗争的历史

① 1938年3月2~13日在莫斯科进行了“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的审讯，18人被判处枪决。布哈林是此案的主角。在俄联邦总统档案库存有约1500页的原始审讯记录以及布哈林所写最后陈述的纲要。后来正式公布的记录是经过删节和修改的记录，有编辑的修改，也有斯大林审阅时所做的修改。现在刊登的是原始记录。为便于同正式公布的记录对照，这里把修改处用不同的字体标出：楷体是编者和斯大林所删的地方，仿宋体是经过修订或与最后陈述的纲要不同的地方。注释中说明删节者或修订者，某些语句的异同对照。

② 编者所删。布哈林纲要中的标题是《被告布哈林的最后陈述》，以“法官公民们”开始。

③ 纲要中是：“普遍历史性”。

④ 纲要中是：“……其中揭露了最恶毒的……”。

实质和根源。^①

我坐牢已经一年多了，不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不过从偶而得知的片断事实我看到、感觉到和理解到，我们如此罪恶地加以出卖的利益正在进入巨大发展的新阶段，现在已经作为国际无产阶级^②最强大的因素进入国际舞台。

我们被告们坐在栅栏的这一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隔了开来^③。这是伟大斗争战线的象征^④，而我们处于可诅咒的反革命队伍之中，成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在审判刚开始时，对于庭长公民提出的我是否承认有罪的问题，我就回答说承认^⑤。在预审时的对话中我也承认自己有罪。

对于庭长公民向我提出的我是否确认我提交的供词的问题，我回答说，我完完全全承认自己有罪，我在法律上是苏联刑法典的罪犯。

当预审结束时，我被唤去接受国家公诉人的审问，他检查了所有的侦讯材料后，作了如下的概括：（第5卷，第114页，1937年12月1日）

问：您是否曾经是右派反革命组织中心的成员？我回答：是的，我承认。

① 纲要中是：“这次审判在一系列审判中是总结性的，它揭露了我们犯罪的叛卖活动的所有关节点，揭示了我们在连续不断的阶级斗争中反对党和苏联政府的反革命斗争的历史含义。”

② 纲要中是：“不过从偶尔通过牢友（布哈林本人所删）得知的片断事实我看到，我们如此罪恶地出卖其利益的我们的（布哈林本人所删）苏联正在进入其巨大发展的新阶段，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伟大力量进入国际舞台。”

③ 纲要中是：“我们被告们站在街垒的另一边。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和公众分开的栅栏，是伟大斗争战线的象征，我们被列入社会主义敌人的队伍，被列入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这可诅咒的反革命队伍。”

④ 编者从记录中所删。纲要中在此句后面是标题“我的罪行何在”。

⑤ 纲要中是：“我回答说：我承认，在预审时我提交的供词的范围内。”记录中后一句被编者删去。

另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您是其成员之一的反苏组织中心进行了反革命活动，并以用暴力推翻党和政府的领导为目的？我回答说：是的，我承认。

第三个问题：您是否承认，这个中心进行了恐怖活动，组织过富农暴动，并策划过反对政治局委员、反对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的白卫军富农暴动？我回答说：是的。^①

第四个问题：您是否承认在策划旨在进行国家改变的阴谋方面有罪？我回答说，是的。

下一个问题：您是否承认在组织富农暴动反对党和苏联政府的领导方面有罪？您是否参加了地下右派反苏组织？我回答说，我承认所有这些指控。

1938年1月10日，检察长公民就阿·马·高尔基的死对我进行了审问。我也对此也提出供词。最后，2月20日，也就是在审判的几天之前，检察长公民在就“左派共产主义”一事审问我时，安排了5次当面对质，又一次提出了阿·马·高尔基被暗杀的问题。在1月10日的审问中，检察长公民没有向我提出任何用法律表述的指控。^②我在法庭上过去和现在都承认，我对于我所犯下的罪行，对于国家公诉人公民在审讯结束时根据检察长所掌握的侦讯材料认定我所犯的罪行，认罪服罪。在法庭上我也曾声明过，而且现在我也再加以强调和重申，在政治上我承认对于所有“右派托派联盟”

① 编者删去写在边页上的文字，建议改写为：“我再次重申，我承认自己犯有背叛社会主义祖国的罪行，这是空前严重的罪行。组织富农暴动，准备恐怖行动，参加地下反苏组织。”斯大林不同意这样的修改，在边页上写道：“恢复。刊印。”在纲要中，上述写在边页上的语句为：“庭长公民问我是否承认我的供词，我回答说：‘完全承认。’从法律上，即从苏联刑法典的条文的角度，我承认自己有什么罪行呢？”

② 写在边页上的话也被编者删去。斯大林起初不同意编者的做法，但后来涂去关于恢复的批语。

犯下的所有罪行都是有责任的，我甚至承认对那些我不知道的和一点概念也没有的罪行负有责任。

甚至对于公诉人运用刑法典的条款，也即运用那些如果我加以承认，从狭义的法律观点看^①，我就会被处以最严厉的惩处的那些条款，认定我犯有的罪行，我都承认，而且我也同意检察长公民几次向我重复过的话，即我正站在死亡的门槛上。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有权对于：1. 在打印成的起诉书；2. 在法庭审讯期间；3. 在苏联检察长公民的公诉词中出现的指控进行驳斥^②。

我认为有必要提到，国家公诉人公民对我进行审问时曾断然地向我声明，他禁止我，作为被告^③，承认多于我承认的事，要我不要臆想出不曾发生过的事，并要求把他的讲话、声明写入记录。

我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大概将是我的最后的话了。但我的发言不是为了对多次认定的事实和检察长公民一再作出的结论表示异议，不是为了减轻量刑的尺度。这并不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④

总之，我再重复一次，我承认我在背叛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最严重不过的罪行方面有罪，在组织富农暴动、策划恐怖行动、参加地下反苏组织方面有罪。我还承认在策划“宫廷政变”阴谋、策划国家政变方面有罪^⑤。不过，由此可以说明国家公诉人公民的起诉书

① 编者所删。

② 编者对此句做了部分修订。在纲要中此句为：“但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有权就对我提出的一系列新的完全出乎我意外的指控进行辩护……”

③ 作了部分修订。

④ 编者所删。纲要中是：“如果我在法庭的最后陈述（也许是我的最后讲话）中有进行法律辩护的成分，那我这样做的目的只是要对实际性质的错误论断和错误结论表示异议，而不是为了减轻惩罚。我的罪行本来就够大的了，并且现在的问题也不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

⑤ 编者所删。

说到我摆出纯粹理论家、哲学家等等的架势等等说法是不正确的。这完全是实际事务。但是我说过，而且现在也重复一次，我是反革命事业和运动的领导人，而不是下手，执行者。由此可见，并且人人可以理解，许多具体事情我可能根本不知道，并且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事情，但这也并不能摆脱我的责任。

我承认自己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对于失败主义方针是有责任的，因为这种方针在“右派托派联盟”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尽管我要肯定地声明：

(1) 我本人并不曾持有这种立场；

(2) 关于打开前线的话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在同托姆斯基谈话时提出的一种评论；

(3) 如果李可夫第一次听说过这句话，那么我再重复一次，这是我同托姆斯基谈话时提出的一种评论。^①

我认为打开前线是一种愚蠢的反爱国主义的方针。但是我承认自己对这个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最大的极其荒谬绝伦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进而认为自己对破坏活动负有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责任，尽管我本人并不记得我曾下达过关于进行破坏活动的指令。关于这一点我没有说过。我只有一次以肯定的态度同格林科谈过这个题目。我在供词中就曾说过，我认为这种斗争方法是不合适的^②。但是^③ 国家公诉人公民却说我起了暗害活动的领导者的作

① 纲要中有布哈林在法庭上没有宣读的如下语句：“……他告诉了我军事密谋分子的观点，为回答这一点我建议予以谴责，如果他们真的打开前线的话，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愚蠢的反爱国主义的方针。”排成楷体的结尾，布哈林是当作独立的句子宣读的，也被编者删去。

② 纲要中接着是：“在起诉书中检察长用了很大的篇幅谈暗害活动，那里把我的作用说成是领导作用。根据什么？主要是根据沙兰戈维奇的供词，所以，我就转入陈述的另一节，反驳一些指控。二、我反驳什么。

③ 编者所写。

用。

现在我转入我最后陈述的第二部分，即对指控的辩驳。

我首先驳斥似乎我参加过坐在被告席上的那个集团的说法，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集团，更不是这个被称做“右派托派联盟的集团”^①。

检察长公民在起诉书中解释说，强盗团伙的成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抢劫，但他们终究要相互承担责任。这后一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强盗团伙的成员应当相互认识，这样才能成其为一个团伙，并且要保持比较密切的关系。然而，我却是从起诉书中才第一次得知沙兰戈维奇这个名字，而且是在法庭上第一次看到他的。我第一次知道有马克西莫夫这个人。从来不认识普列特尼科夫，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从来没有同拉科夫斯基谈过有关反革命活动的话，也从来没有同罗森戈尔茨谈过这个题目，也从来没有同泽连斯基谈过这个题目，一生中从未和布拉诺夫谈过话，如此等等。顺便说一下，连检察长也没有问过我有关这些人的事。

“右派托派联盟”首先是右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联盟。例如，参加的人中怎么可能有列文？他在法庭上供认，他到现在也不知道孟什维克是怎么回事。普列特涅夫、卡扎科夫等人怎么可能也加入呢？

因此，坐在被告席上的这些人并不是某个什么集团，他们沿不同的路线进行密谋同伙，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的集团。既然如此，那就清楚了，这个并不存在的集团，与起诉书的说法相反，不可能是按照情报机关的指示组成的^②。所有被告都在某种程度上与“右派托派联盟”有牵连，其中有的同情报机关有牵

① 编者所删。

② 编者所删。

连，但仅此而已。然而，这并不能提供任何根据认定这个集团就是“右派托派联盟”，认定这个集团是按照外国情报机关的指示组织起来的。^①

第二，实际上存在过的和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粉碎了的“右派托派联盟”是历史上形成的。它确实曾经是现实存在的，直到被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粉碎为止。它是历史地产生的。我曾供述，还在1928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那是我领导的大会，我第一次同加米涅夫谈了话^②。

怎么能够断言这个联盟是根据法西斯情报机关的指示组建起来的呢？那是在1928年呀！顺便说一下，那时我差一点被波兰情报机关的间谍暗杀，这是接近党的领导的人都知道的事。

第三，我绝对否认，我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它们是我的主子，我按它们的意志行动。同外国情报机关签订什么协议是愚不可及的，因为通过这种协议我们阴谋分子能得到什么呢？仅仅是允诺而已^③。

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那么，为什么在我的案件的侦讯材料中，除了诬陷者伊万诺夫的供词以外，关于这方面却没有一个字？而且为什么检察长公民在审问我时没有就此询问过我？尽管我蹲监狱已经一年多了，而检察长直到开庭审判时才第一次问到这个问题，这怎么可能呢？显然是因为没有根据充分的材料^④。

现在向我展示的又是什么呢？是沙兰戈维奇，在看到起诉书之

① 编者所删。

② 共产国际第6次大会于1928年7月17日~9月1日在莫斯科举行。布哈林同加米涅夫会见是在1928年7月11日。

③ 编者所删。

④ 删去并作了部分修订。

前我从来不知道其存在的一个人。一个不存在的切尔维亚科夫^①，因不存在而根本无法对他进行审问^②。向我展示了沙兰戈维奇口供的前后文，按照他的口供可以认为，我几乎制订过一个破坏白俄罗斯练习簿生产的计划。我觉得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情况了。沙兰戈维奇……^③

沙兰戈维奇：不要撒谎，哪怕一生中有一次不撒谎也好，见鬼去吧^④。您现在在法庭上还撒谎。

庭长：被告沙兰戈维奇，不要妨碍法庭。

沙兰戈维奇：我无法控制。

布哈林：伊万诺夫。关于他的供词，总的方面我要说说以下内容：过去和保安处有过关系的相应人员供认说，他们怕被揭发而决定同苏维埃政权作斗争，于是走向右派分子，参加搞恐怖活动的地下组织。看，这算什么逻辑？多妙的逻辑，怕有可能被揭露而参加恐怖组织，而明天他就可能被逮住而被绞死。而且，例如泽林斯基还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伊万诺夫也是这样。那就是说，起先他们两个为了避免引起怀疑参加了十月革命，后来又由于胆怯，出于怕被揭露而参加反对十月革命的阴谋^⑤。很难想象，至少我很难这样想象。但是，检查长公民相信了他们，尽管这听起来显然难以令人置信。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明显存在不正确之处，那么其余的一切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伊万诺夫和沙兰戈维

① 切尔维亚科夫，亚历山大·格里戈里耶维奇（1892～1937）——1920年起任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1937年自杀。

② 编者所删。

③ 编者所删。

④ 编者所删。

⑤ 编者所删。

奇就不会继续玩他们的旧战术吗？^①

霍贾耶夫断言，我曾建议他同英国的间谍头子取得联系，而伊克拉莫夫则说我对他讲过，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斯坦真是一块肥肉。实际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我只是对霍贾耶夫说，应当利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并用不明朗的形式支持了土耳其斯坦独立的想法。但没有谈到过关于间谍头子的任何一个字。要把所有这些东西栽到我的身上，除非把我说成是一个傻瓜。我是一名罪犯，但谁也没有把我看成是一个忙于把国家的各个部分分送给别国的傻瓜。那样我们努力去夺取的政权又要它干什么呢？我们是“右派托派联盟”阴谋的参加者，可是竟会采用这样的犯罪方法？国家公诉人公民在这整个案件中采用了十分奇特的逻辑。他^②问道——您看到过霍贾耶夫吗？看到过。那是在塔什干？是在塔什干。您同他谈到了政治吗？谈到了政治。那就是说，你们谈到了间谍头子。但是，这同所谓数学归纳法没有任何关系。这里^③这样一类结论出现了不止一次，而当我抗议此类结论时，检察长公民就指责我讲假话，支吾搪塞，想掩盖真相，等等，而他又得到一系列我的同案犯的支持。但是，在我看来，在这种场合真正的逻辑在我这边。就是以这类完全不充分^④的材料为根据，国家公诉人公民宣布说，一切间谍联系都是通过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渠道进行的。可是，检察长公民又说，这里每一个字都是重要的，也就是说要求极其郑重地对待用词和事实。但是在检察长公民的起诉词中却没有一个事实是有充分根据的。在这份起诉词中引用了两家日本报纸的话……（没有

① 编者所删。

② 编者所删。

③ 编者所删。

④ 编者所删。

听清)^①。但从这些报道中怎么能够看出，讲的正是我和右派呢？

不过却说从这些报道可以看出，讲的正是我，或者甚至是右派。而日本人又怎么会公开向自己的公开间谍暗示，如果这个集团或这个人真是他们的间谍？真是奇怪的观点。而且，检察长公民，又有哪怕一事实能说明我和外国情报机关有联系呢？而且，为什么检察长公民在预审结束时不问我这个问题呢？那时他曾对预审的全部材料提出检查性问题^②。

但是，我承认在分裂苏联的恶毒计划方面我是有责任的，因为托洛茨基讲到过作出领土让步问题，而我和托洛茨基分子是一个联盟的。这是事实，我承认这一点。

第四^③，我绝对否认我参与暗杀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马克西姆·佩什科夫。据亚戈达供认，暗杀基洛夫是根据“右派托派联盟”的决定进行的。我不知道此事。李可夫在法庭上供述说，我不知道此事。此外，法庭有李可夫的供词、我的供词、亚戈达的供词，而亚戈达又援引了叶努基泽的证词，不过已经不可能审问叶努基泽了，而他的供词我不知道，不曾出示给我看过^④。不过这是对于检察长公民的实际内容有所帮助的，是他称之为逻辑的东西。他的问题，为什么布哈林、李可夫站在一边，并且回答说他们不可能站在一边袖手旁观，因为他们知道^⑤。然而，袖手旁观和知道，这是一回事^⑥。如果先提一个问题，然后再改述成

① 编者所删。纲要中为：“根据这一点检察长公民宣称，全部间谍联系都通过李可夫和布哈林的渠道！甚至是全部！有关我的事实没有一件是稍有根据的！为支持这种说法，引用了两家日本报纸，那里谈到反政府分子中的奸细。”

② 编者所删。

③ 编者所删。

④ 编者所删。

⑤ 部分修订。

⑥ 部分修订。

一个肯定的回答，那就可以得出任何结论。不过^①，这是在初级逻辑学中称之为同义反复的东西，也就是说，把需要证实的东西当作已经证实了的东西。那么，怎么才能解释呢？可以问——请问，您这个坏蛋如何解释这些事实，您能否认这件事情存在过吗，在某方面经叶努基泽和亚戈达同意作出了决定，或者您连这一点也否认？我无法否认这一点，法官公民们。但是，要是我不能否定，而与此同时我也不能肯定，我可以作出某种设想。不过你们应当看到工作的保密性，由于保密，此案的整个罪犯集团才得以维持下去^②。总部没有开过会，但偶尔说说话，有了这样一种秘密交往和联络方法，这样的事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我还要继续问下去——究竟为什么在我的侦讯材料中什么也没有，而且检察长公民为什么一个字也没有问过我，要知道他最后一次看到我就在开庭前几天。为什么如此有分量的指控在几个小时内冒了出来，虽然其分量是尽人皆知的^③。

马克西姆·佩什科夫。亚戈达自己声称，这是直接涉及他的事情^④。我无权利闯入这一领域。但是，这亚戈达的声明，此声明由于有下述重要事实而显得相当有分量，这就是他请求把这个问题转为秘密审判等等。然而，从政治观点看，甚至从最恶毒的白色恐怖的角度看，这种暗杀是显然毫无意义的，何况^⑤克留奇科夫已经开始说，这样做是为了削弱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乐观愉快程度。而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甚至一位辩护人公民也开始表示这样的观点。这已经是昭然若揭了。这无论如何不会成功，——这样的论

① 编者所删。

② 编者所删。

③ 编者所删。

④ 修订。

⑤ 编者所删。

据，何况^①反对这种论据的有像亚戈达本人的声明这样极有分量的事实，而此声明又得到把此事转入秘密审判这一事实的证实。

明仁斯基。布拉诺夫对于个人动因的供词也完全是这样的。如果从政治上提出问题，也仍然从最恶毒的白色恐怖的实际行动的角度看，明仁斯基已经患病，他怎么也不会对“右派托派联盟”造成危害。为了这样的目的去干这样的事，这完全是精神错乱，单纯从暗害的合理策略的角度看也是精神错乱^②。怎么能认为这是可能的呢？

庭长乌尔利希同志：亚戈达说的刚刚相反^③。

布哈林：我不是讲亚戈达，而是讲布拉诺夫的供词，而在法庭上，按照庭长的权威解释，我有权讲我认为需要讲的事^④。

最令人痛心和最可怕的事件，是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的死。我供认了什么，我是怎样和在什么情况下供认的呢？人们问我（看来已有这个案子的某些侦讯材料），我是否能回忆起某些事，足以说明联盟的右派和托洛茨基分子那一部分人对高尔基有过敌对态度？我开始在记忆中搜寻，看我就此能想起什么^⑤。我想起了同托姆斯基的一次谈话，关于这次谈话我曾在法庭作了陈述，检察长也就此谈话向我提问过。这次谈话的内容是，托姆斯基匆匆地对我说，托洛茨基分子正在策划反对斯大林分子高尔基的敌对活动或者类似的话^⑥，我在那时刻完全没有想到说的是某种恐怖行动。为什么我没有想到这一点？看来是因为这种想法对阿列克塞·马克西莫

- ① 编者所删。
② 编者所删。
③ 斯大林所删。
④ 编者所删。
⑤ 编者所删。
⑥ 编者所删。

维奇而言我以为是极端荒谬的，他不是政治家，而是文化工作者，而且，夺取政权后还要他出来表态，以作为一种保障，诸如此类思想在我头脑中不可能出现^①。所以我对此置若罔闻。在审问时我想起了同托姆斯基的这一次谈话。对检察长公民一再的追问，我一直回答说，当时在我的意识里一点也没有想到什么恐怖行动。在这次庭审时，在回答检察长公民的一个问题时我说过：“现在我感觉到，当时讲的正是这个。”于是，检察长公民就由此得出以下看法——他说：“但这不是含糊的承认又是什么？”含糊承认了什么？承认了什么呢？承认我在法庭上听说了原先我并不知道的许多新的事实，因此可以来回顾我同托姆斯基在另一种情况下所作的谈话？我认为，在这里国家公诉人公民的论据不能被认为是充分的，而我自己明确地确认，我只想我想的事，不想我不想的事^②。

1918年。检察长公民首先宣称，我于1924年不得被迫承认在斯莫尔尼宫的某某次谈话。没有人强迫过我任何事情，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除了我，没有任何人提起过此事，而我提到这个例子只是为了说明，派别斗争在1923~1924年期间造成了多大的危害，达到了何种地步。而我首先是想消除这个误会。

国家公诉人公民说，布哈林没有提出任何理由反对5名证人的供词，他们在这里，在所有人面前，在本案全体法官面前经过，隆重地走过，他们认定，我曾经顽固地宣扬过一种意图、思想、主张，要求逮捕列宁并从肉体上将他消灭，并且除列宁外还加上两个杰出的党的活动家：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不过，说我没有提出任何论据是不正确。检察长公民可以认为论据不正确，软弱无力，不能令人信服，但不能说我什么也没有提出。我提出了一大批看

① 编者所删。

② 编者所删。

法。

主要的证人是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把所有这一个事件，包括“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列宁的阴谋，以及逮捕他们并准备加以杀害等等，在自己的供词中——第一次，在对质时——第二次，以及在庭审时——第三次，把这一切都算到布列斯特和约以前的时期。我在对质时、预审时、法庭上都说过，并指出这种设想是明显没有意义的。这种认定，也同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设想^①“左派”和托洛茨基分子在布列斯特和约以前希望利用强制手段实现国家政变是没有意义的，说这没有意义是因为，托洛茨基分子也好，所谓“左派”也好，在中央委员会中拥有多数，如果在就布列斯特和约举行投票的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分子不俯首投降的话，那么托洛茨基分子和“左派”就会在中央委员会中占多数。所以怎么可以设想，在这种形势下他们之所以投降是为了转而采用密谋的方法？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清楚地知道，“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布列斯特和约之前的情绪是，他们希望在例行的党的代表大会上赢得党内的多数，而当时我是那个集团的领导人，该集团在代表大会上有一半的席位。这是任何人都知道、都清楚的事。既然如此，那么请问^②，在此种形势下怎么会有可能出现证人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现在讲的事？不过我举出过别的例子。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曾经断言，问题在于我们“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派别中心是莫斯科区域局。那样，我可以说出几个名字，几位受尊敬的党员。我这样做只是想驳倒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的论据。人所共知，有一大批杰出人物——古比

① 部分句子经修订。

② 编者所删。

雪夫、叶梅利扬·雅罗斯拉夫斯基、明仁斯基等等——他们当时都是“左派共产主义者”的拥护者，属于我的这个“左派”集团。他们这些人的分量要比曼采夫们、斯图科夫们以及其他任何人重得多，无论政治禀赋还是政治积极性也都比上述一些人要强得多。因此，实际上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列宁格勒的中心集团包括上面这些人。那么我请问你们，如果这些人在集团中占有主要地位，那么暴动计划怎么可能呢？十分明显，这是一个荒谬至极的胡说八道^①，这是不可思议的，不可能的。在这里针对我的主要证人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把事情同布列斯特和约以后的完全不同的时期，莫斯科时期搅混了。但是如果需要和可以谈论莫斯科时期的话，那么所有这些记录，包括我下达给斯图科夫的指令，包括斯图科夫的发言，都不再存在。而如果也许有过这些发言，也许有过这些记录，那么这与我无关，当时我在那时的彼得堡，不可能下达这些指示^②。

法官公民们，我很抱歉，让你们长时间关注此事，但是由于这是一个极其沉痛和极其重要的内容，而在法庭上也对之十分重视，所以我才贸然就此重复我已讲过的话。然而，国家公诉人公民却硬说我没有提出任何理由为自己辩解。

我不准备再谈其他事情，如卡姆科夫和卡列林供词中的前后矛盾之处，以及一系列其他事情^③，因为不想占用你们的时间。我承认那个事实，即同卡列林和卡姆科夫有过一次谈话，而关于逮捕列宁24小时和继续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结盟一事，则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倡议的，但是对于第一个谈话的回答是粗暴地予以否

① 斯大林所删。

② 斯大林所删。

③ 斯大林所删。

定，至于后来通过皮达可夫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谈判一事，如同检察长公民所表述的那样，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可以把它看做企图用暴力方法推翻苏维埃政权——这一点我承认，有过这样的事。至于从肉体上消灭的意图，我绝对予以否认，而且公诉人公民这里讲到的关于强行逮捕就是从肉体上消灭的逻辑是无论如何帮不了忙的。立宪会议曾被逮捕，但其中没有任何人从肉体上受到伤害。“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曾被我们逮捕，但是那时一个人也没有在肉体上受到伤害。捷尔任斯基曾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捕，但他在肉体上也没有受到伤害。我要说明，在这些犯罪的和恶毒的谈话中专门讲到，无论如何不得触动有关人员的一根头发，这一点被公诉人公民的起诉词略去了。可以对此有各种看法，但这是事实。

布列斯特之后的这个插曲在时间上总的说只占很小的位置，因为此后不久“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起事了。我们不得不逮捕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我本人参加了这次行动，我本人参加了逮捕“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党团的领导。此后，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没有过什么联系。我去国外进行革命活动，后来回国，然后，我再说一遍，我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炸弹炸伤^①。我不是想以此来说明，这是直接针对我的行动，如同证人曼采夫和其他人所说的那样，但是我想说，人人都知道我应去莫斯科委员会作报告。就在这时候搞了暗杀，我受到轻伤。好几个党的活动家被炸死。众所周知，这次暗杀行动是由以切列帕诺夫和他的妻子塔马拉为首的原“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所谓地下无政府主义者搞的。我提到曼采夫，是因为“左派共产主义者”曼采夫逮捕了这个切列帕

^① 指1919年9月25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列昂季耶夫斯基巷莫斯科委员会大楼制造的炸弹爆炸事件。

诺夫，是因为他不是这个切列帕诺夫的盟友。说贝拉·库恩赞许过“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想说的是，有过一次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罪恶密谋，但很快，在他们起事以后，就破裂了。许多“左派共产主义者”^①积极参加了对他们的镇压。

国家公诉人公民在起诉词中，我用法律语言来说的话，这叫做（讲的不是俄语），我对此表示反对^②。

尽管公诉人又提出了一批涉及实际情况的有待举例说明的情事，为支持自己的发言，我想^③为一个时期，为我生平中的一个黑暗时期提供一些基本资料。

这里有几个十分明显的错误。第一，我在一生中从来不曾像国家公诉人检察长所说的那样，是召回派（全场活跃）。检察长公民断言，1909年我是召回派，其实相反，我当时是负有同召回派作斗争的特殊使命的党中央的代表。

国家公诉人认定我因写了《世界经济》一文有罪，我不知道指什么而言。这篇文章是列宁编完在杂志上刊登的，列宁还亲自为它写了前言。^④

国家公诉人还指控我有罪，因为我在《新世界》杂志担任编辑，和托洛茨基一起工作，说我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我对此表示反对。我不能离开编辑部，因为我得到党的中央委员会的相应指示。在这份杂志内部，我同托洛茨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因为我是支部的组织员，支部是我们在这之前在美国组织起来的。我们同托洛茨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刊登了《打倒派别活动》的一批系列文

① 原为“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集团”，斯大林亲笔修改。

② 斯大林所删。

③ 斯大林所删。

④ 斯大林所删。

章。国家公诉人竟为此事指控我。我必须声明，这些文章是我在斯大林同志住所里写的，经过斯大林同志的相应修改，作为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指示发表的^①。

国家公诉人指控我说，1924年我曾反对过斯大林同志。我不知道有这样的事。我马上结束国家公诉人公民^②在法庭审理时向我提出的指控^③，然后再回到我确实犯过的罪行上来。我已经两次列举过这些罪行。这些罪行极其严重。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去重提，它们的严重程度不说也是清楚的。

我只是想说，托派那一部分不止一次单独行事，也可能集团的个别成员，如亚戈达一类人，也可能会单独行事，因为，据布拉诺夫的口供，亚戈达认为李可夫和我是他的秘书，而他本人在这里把我称作组织白痴式群众暴动的空谈家，因为问题在于策动宫廷^④政变。

由此可见，不能说这个右派中心在被告亚戈达眼里拥有足够的威望，能在各个方面采取行动。^⑤“右派托派联盟”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政治上我自然要为所有这一切坚决承担责任，即使，我再重复一句，对于我并不知道的事情也是如此^⑥。

罪行的严重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政治责任是无比重大的，从法律的责任说，任何最严厉的判决都不为过。说最严厉的判决都是公正的，是因为为了这样的罪行可以枪决十次。这一点我是完全绝对地承认，没有任何怀疑的。

① 斯大林所删。

② 斯大林所删。

③ 斯大林修订。

④ 斯大林修订。

⑤ 斯大林所删。

⑥ 斯大林所删。

我想不仅向法庭，而且向广大的世界进步人士，^① 简要地说明自己犯罪活动的事实和我对自己罪恶的忏悔。

我在法庭侦讯期间提供主要供词时已经指出，并不是简单的斗争的逻辑驱使我们反革命密谋分子走向罪恶的地下状态，它已在这次审判中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了。这类纯粹的斗争逻辑伴随着思想的蜕变、心理的蜕变、我们自身的蜕变、人的蜕变。历史上这类蜕变的事例是众所周知的。可以举出白里安、墨索里尼等等。我们也发生了蜕变，它把我们明确的，也许不是完全正统形式的布尔什维主义^② 导向了其方针、特色很接近于富农御用法西斯主义。由于这个过程在我们国内阶级斗争急速发展的条件下一直发展很快，于是这一斗争本身，它的迅速发展，它的存在就成为这一过程的加速器和催化剂，其表现就是加快蜕化的过程。

不过包括我在内，人们的这个蜕化过程所处的形势，与西欧国际工人活动家蜕化过程所处的形势完全不同。它是巨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拥有极其巨大的规模、任务、胜利、困难、英雄事迹……）形势下发生的。

根据这一点，我认为应予肯定的是，我们这些坐在被告席上的每一个人，都存在意识上的独特的两面性，对自己的反革命事业的信仰是半信半疑的。我不是说这种意识不存在，而是说它是不完全的。正因为如此，如所周知，发生了意志的半麻痹状态，反应迟钝，我觉得，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应迟钝的人。这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客观上十分巨大而使思维缺乏连贯性。在我们蜕化加速和反应迟钝之间产生的这种矛盾，反映出反革命分子或者发展中的反革命分子在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处境。

① 编者所删。

② 编者所删。

形成了双重心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心灵上感受到这一点，尽管我并不准备对别人进行深入的心理分析……

庭长：被告布哈林，您讲您自己的感受，别人会讲别人自己的感受。您这样做就不是被告的最后陈述了。

布哈林：请原谅，我不知道。我以为在最后陈述中我可以什么都讲。^①

有时我自己也沉湎于认为我写作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想法，但是到了明天我又用自己罪恶的实际行动加以否定。这里出现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中被称作最不幸的意识的东西。这种不幸的意识不同于普通意识的地方就在于，它同时又是犯罪的意识。

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把不论多少数量的敌人送上被告席并不难，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这样做，只是成功的程度大小不同^②。但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并不仅仅表现在它从肉体上 [……]、政治上^③粉碎了反革命匪帮，而且还在于从内部瓦解了自己的敌人，摧毁敌人的意志。这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也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无法做到的。

我认为，如果说一部分西欧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对于在苏联进行的几次审判产生了某种怀疑和动摇，那么这首先是因为这些人并不了解这样一种根本的差别，即在我国敌人恰恰具有这一种双重的、两面的意识。而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要首先认识的。

我之所以要谈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在国外这些高水平的知识分子中，特别是在学者当中，有相当多的交往，我应当向他们解释在苏联每一个少先队员都知道的事。

① 斯大林所删。

② 斯大林所删。

③ 斯大林所删。

有人常常用各种各样的纯粹胡说八道来对忏悔作解释，诸如说使用了西藏的迷魂药片之类。就我自己来说，近一年时间我蹲在监狱里，我工作、学习，一直神志清醒。这就是对所有奇谈怪论和荒诞离奇的反革命谣言的实际驳斥。

也有人说是使用了催眠术。但是，我在法庭上、在审判中用法律为自己辩护、当场分清是非，同公诉人辩论，任何人甚至对相关医学部门并无特别经验的人，也会承认，这样的催眠术是不可能存在的。

也经常有人用陀思妥也夫斯基式的精神变态，某种特别的心灵特点（所谓斯拉夫灵魂）来解释这类忏悔，如人们论及阿廖沙·卡拉马佐夫、《白痴》中的人物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其他人物时就是这样说的，这些人准备走上广场，大喊：打我吧，正教徒们，我是坏蛋。

但这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我们国家里，所谓斯拉夫灵魂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人物的心理早已是过去时代的事了。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里不存在，除非在外省的小厢房后面的空地上，但那里也未必就有。相反，在西欧，这种心理状态倒是存在的……

庭长：您在最后陈述中也扯得太远了。我们的文学和西方的文学中有些什么样的人物又怎么样。不要忘记，您是在作最后的陈述。

布哈林：我问过您，庭长公民，我是否可以什么都说，您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

庭长：但这并不是说可以讲到荒诞不经的地步。

布哈林：我当然服从，但是既然国家公诉人连塔西佗的话都可以引用，我不懂为什么我就不能说。

我想说的是，这些都不能对忏悔作出解释，因为如果甚至可以谈论斯拉夫人的话，那么关于霍贾耶夫、伊克拉莫夫、拉科夫斯基

又可以说些什么呢^①。现在我谈谈自己，关于我自己忏悔的原因。当然，应当说，罪证也起很大作用。我约有3个月一言不发，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②。后来我开始提供供词。但是，我在这里，在最后的陈述中应当说，证据远远没有把一切说清楚。真正的^③原因在于，在狱中，在长期的监禁中，当处于生与死的长期动摇不定之中，出现的问题是以另一种，和平常的实际生活不同的衡量标准来看待和加以解决的^④。因为，当你自问“如果说你会死去，那么你是为什么而死呢？”的时候，特别又是在苏联发展的现阶段，当它昂首阔步走向无产阶级国际斗争的舞台之时^⑤。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会立即极其清晰地展现出来，如果考虑到意识的这种两面性的话^⑥。如果想不作忏悔而死去，那又为什么去死呢？然而相反，如果想到在苏联正灿烂发光的一切美好事物，这一切在人的意识中就会有另一种衡量的尺度。这会最终使他^⑦解除武装，激励他，并强迫他^⑧在党和国家面前屈膝悔过。我又自问：好吧，你不死；如果竟出现某种奇迹你活了下来，那么又是为了什么呢？与全体人民隔绝，处于非人的状态，与一切构成生活实质的东西完全隔绝。面对这个问题，也同样立即得出同样的回答。于是，在这样的时刻，法官公民们，一切多余的东西，一切个人的积怨，残存的恼怒，自尊，以及大量的其他东西，统统都不再存在，统统都烟消云散了。而且有的时候，你还能听到广泛的国际斗争的反响，所有这

① 斯大林所删。

② 编者所删并作了修订。

③ 编者所删并作了修订。

④ 编者所删。

⑤ 编者所删。

⑥ 编者所删。

⑦ 原为“我”，编者修改。

⑧ 编者所删。

一切综合起来起了作用，从而使苏联对屈膝投降的敌人获得内在的道义上的胜利。我一次偶然地在监狱的图书馆中看到福伊希特万格^①的一本书，其中谈到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审判。这本书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印象。但我应当说，福伊希特万格并没有触及事情的实质，而是停留在半路上，他并不是什么都清楚，而实际上一切都是清清楚楚的。世界历史是世界法庭。托洛茨基主义的一批首领都身败名裂，被抛进深渊了。这是正确的。但是，不能像福伊希特万格对托洛茨基所做的那样，把他同斯大林等量齐观。在这方面他的议论是不正确的。因为事实上在斯大林背后是整个国家，是世界的希望，他是表达者和^②缔造者。海涅说得好，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将作出重大的决定……^③

但是，问题在于心理特点，在于政治。^④拿破仑有一次说过，命运是政治。托洛茨基的命运就是反革命的政治，斯大林的命运是……^⑤

庭长：书的内容我们知道，何必引用？您又向旁边叉开去了。

布哈林：我马上就结束。但是，庭长公民^⑥，这也许是我一生

① 福伊希特万格·里昂（1884～1958）——德国作家，1936年末到1937年初曾访问苏联，1937年初旁听了所谓“托派平行反苏中心”案的审判。1937年出版《莫斯科，1937。为友人写的旅行报道》。

② 斯大林所删。

③ 斯大林所删。

④ 斯大林所删。

⑤ 斯大林所删。现按布哈林纲要恢复，中断的句子为：“……斯大林的命运是伟大的新世界。无可估量的人物、任务、规模、作用、阶级、世界。背叛斯大林——这是我的罪行——就是背叛社会主义祖国，与此相连，也是背叛国际无产阶级。这个新世界决不是仅仅同自由对立的一块面具，如福伊希特万格书中经常透露出来的想法那样。这里有一块面包，因而也有空前规模的群众及其个人发展的自由，等等。

请改变一下视角！”

⑥ 斯大林所删。

中的最后一言，请允许我把话讲完。^①

我解释一下我是怎样转而认为必须向侦讯机关，向你们法官公民举手投降的。我们曾以极为罪恶的斗争手段反对欢乐的新生活。我否认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暗杀指控，但是我的反革命同谋者和领导他们的我，却在残害列宁的事业，斯大林继续了这一事业并取得了巨大成就。由种种思想促成的这一斗争的逻辑把我们一步一步地引向最黑暗的泥潭中去。这又一次证明，背离布尔什维主义的立场就是转入政治上的反革命强盗行为。现在反革命匪帮已经被粉碎，我们被击溃，对自己的可怕罪行进行了忏悔。

当然，问题并不在于这种忏悔，也不在于我个人的忏悔。没有这种忏悔法庭照样可以作出判决。被告的认罪并非必不可少的。被告认罪是中世纪的法学原则。不过这里也存在一个从内部摧毁反革命势力的问题。只有像托洛茨基那样的人才拒不解除武装。

我必须在这里指出，在形成反革命策略的各种力量的平行四边形中，托洛茨基是 *spiritus rector*，即运动的主要推动力。^② 而最激烈的做法——恐怖行动、情报机关、分裂（苏联）^③、暗害活动，都首先出自这个源头。

现在我个人的恼恨首先是针对我自己的过去。^④ 我可以 *apriori* 设想，托洛茨基及其他罪恶盟友，以及第二国际，将试图为我们，其中特别是为我进行辩解，尤其是〔因为〕关于此事我同尼古拉耶夫斯基谈过，我拒绝这种辩护，因为我向国家、向党、向全国人民低头认罪。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开展斗争的新的阶段。但愿这一次审判将是最后一个沉痛教训，但愿所有的人们都能

① 斯大林所删。

② 编者所删。

③ 编者所写。

④ 编者所删。

看清苏联的伟大力量，但愿所有的人们都能看清关于苏联民族局限性的说法已像破布条一样挂在空中。谁都能看到斯大林保证了对国家的英明领导。

我正怀着这样的认识等待着判决。问题不在于忏悔的敌人的内心感受，而在于苏联的繁荣及其国际意义。^①

① 在纲要中布哈林所写的前一句为：“我怀着这样的认识等待着判决。问题不在于忏悔的敌人的个人命运，而在于伟大的无产阶级国家及其国际盟友的胜利斗争。”

最后一句布哈林是用拉丁语写的：“Ave, communismae. Morituri te salutant!”（光荣，共产主义，走向死亡的人向你致敬！）但后来他本人把它删去了。

№05902

布哈林的赦免请求书

(1938年3月)

(1938年3月)我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赦免。我认为法庭的判决是我所犯的反对苏维埃祖国、反对它的人民、反对党和国家的滔天罪行应得的惩罚。对此我内心毫无反对之意。为我的罪行应把我枪毙十次。无产阶级法庭作出了我罪有应得的决定，我准备接受我所应得的惩罚，并在我卑鄙地背叛的苏联伟大英雄人民的正义愤慨、仇恨和鄙视之中死去。如果说我现在还敢向我跪对的我国最高政权机关提出请求，那只是因为我认为，如果能得到赦免，我还能对国家有用；我不说，也不敢说，我能够赎回自己的罪行：我所犯的罪行是如此之可怕，如此之大，无论怎么做，我的余生都不足以赎罪。

不过我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保证，一年多的监狱生活促使我作了反思和重新审视，连我本人也怀着愤慨和鄙视的心情看待自己的罪恶的过去，现在它在我的头脑中已荡然无存了。

我请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赦免和宽恕，这不是由于对我所应得的惩罚的恐惧，也不是由于对我所面临的作为正义的报复的死亡的畏惧。我的内心已解除武装，并按新的社会主义方式重新武装起来了。我重新思考了所有的问题，从我的理论错误开始，它起初是我个人错误倾向的基础，后来则越来越成为可怕罪行的基础。我一步一步地重新审视自己过去的一生。

过去的布哈林已经死去，他在地球上已不再存在。如果能赐我一命，我还会为社会主义祖国做点好事，而不管在什么样的条件之

下：在单人牢房，在集中营，在北极，在科雷马——在任何地方，任何环境，任何条件下都行。我还有知识和能力，保存了完整的头脑机器，过去它的活动实际上都用于犯罪方面了。

现在此机器已转向新的轨道。我想在各种各样的领域，各种各样的环境下工作。我在监狱里写了一些著作，它们证明我已完全解除了武装。不过我也能不仅仅在纯学术领域工作。

因此我斗胆向你们，政权最高机关，请求宽恕，理由是我有工作能力，并期待从革命的适宜性来考虑。如果我已丧失工作能力，那就不值得提出请求，我就会期待尽快地执行死刑，因为如果那样，我就没有理由提出请求。作为解除了武装，但没有用处、没有工作能力的敌人，我只有一个用场，那就是用我的死作为他人的教训。

正因为我有工作能力，所以我斗胆向政府请求赦免和宽恕。我们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党和政府实行了总清洗。反革命已被镇压，无能为害。社会主义祖国迈着英雄的步伐，走向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斗争的舞台。在国内，在斯大林宪法的基础上正在发展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伟大的富有成果的创造性的生活蓬勃发展。请给我机会哪怕在铁窗内力所能及地参与这种生活！我请求，恳求你们，让我哪怕部分地参与这种生活！请给新的第二个布哈林——哪怕叫彼得罗夫也罢——以生的机会，这个新人将同已经死去的完全对立。他已经诞生，请给他做点什么工作的机会。我为此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提出请求。旧我已永远地、永不复返地死去。我很高兴，无产阶级政权粉碎了所有把我看作首领、而我确实是首领的犯罪行为。我坚信，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必将越过伟大的历史界线，而你们将不会抱怨我的赦免和宽恕请求；我将竭尽全力向你们证明，无产阶级的这种宽大为怀的做法是正确的。

1938年3月

【专题说明】

关于布鲁西洛夫 回忆录问题的调查

(1925年2月至1962年7月)

布鲁西洛夫，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1853～1926）——沙俄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第八集团军，1916年任西南战线总司令时，成功突破奥匈军队的防区。1917年5～7月任俄军总司令。1919年转到红军工作。1920年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下设的特别会议主席。后任骑兵监督。1924年退休。他一向被当做俄杰出的军事家、爱国者。但1948年，官方突然通告：今后不准再提布鲁西洛夫的名字。对贬谪的原因，未作任何解释。新公布的解密档案揭示了问题的前因后果。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刘明翻译）

№0871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第 47 号关于
布鲁西洛夫出国事宜摘抄

（1925 年 2 月 5 日）

绝密

П47 /25 к.

1925 年 2 月 5 日

送伏龙芝同志

中央政治局 1925 年 2 月 5 日会议第 47 号记录摘抄

听取：

25. 关于布鲁西洛夫出国事宜的报告（伏龙芝同志）。

决定：

- 1) 批准布鲁西洛夫出国治病。
- 2) 责成伏龙芝同志保障布鲁西洛夫一行的全部物质需要。

中央书记

№08712

伏龙芝就发给布鲁西洛夫外交护照问题

致俄共（布）中央

（1925年3月21日）

急件

绝密

1925年3月21日

第60915号

莫斯科

致俄共（布）中央

由于波兰驻莫斯科代表处最近大量拒绝给予中转签证，我认为可以发给前往卡尔斯巴德治病的公民布鲁西洛夫（73岁）、他的妻子（60岁）及其妻妹日利霍夫斯卡娅（50岁）外交护照。

请求外交人民委员部给予相应安排。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伏龙芝

№08713

伏罗希洛夫就布鲁西洛夫妻子出国治疗事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年5月6日）

绝密

1927年5月6日

第010375号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已故的阿·阿·布鲁西洛夫的妻子——娜杰日达·弗拉基米罗夫娜·布鲁西洛娃提出申请，请求批准她前往卡尔斯巴德治病，1924年夏天她曾到过此地。此行在下列方面引起了极大的怀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和一些私营出版社对于阿·阿·布鲁西洛夫的文学遗产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布鲁西洛夫一家在出国期间，不能排除，会将布鲁西洛夫留下的全部资料转交给我们的敌人。但是，受我的委托，军事科学院的院长艾德曼同志同娜·弗·布鲁西洛娃谈了话，已经妥善解决了关于在苏联出版布鲁西洛夫日记的问题，并达成协议，由专门编辑委员会来加工布鲁西洛夫的全部文学遗产，布鲁西洛夫的妻子也是编委会成员。

在卡尔斯巴德治病需要一定数量的费用。布鲁西洛夫的妻子没有钱，因此，她将不得不利用外国的帮助，私人的或者是政府的帮助。这样或那样的帮助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尤其是如果注意到布鲁西洛夫的名字对于还在我们这儿工作的旧军事专家的意义的话。

既然为布鲁西洛娃在苏联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已经提出把她的养老金数额从150卢布提高到200卢布的申请），并且还将给她提供去国外治病的物质帮助，所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方面没有反对布鲁西洛娃的旅行。

鉴于以上所述，我请求：1) 批准布鲁西洛夫一家，即两名已丧失劳动能力的妇女，前往卡尔斯巴德进行疗养治病；2) 保证治疗所需的相应数量的外汇。

伏罗希洛夫

伏罗希洛夫附笔：“请求以征询的方式表决”

斯大林批注：“斯大林——赞成”。

№ 0872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01 号记录关于
批准布鲁西洛夫一家出国治疗的决定摘抄**

（1927 年 5 月 12 日）

绝密

第 П101 /опр 4 - с 号

1927 年 5 月 9 日

送伏罗希洛夫、布留哈诺夫、特里利谢尔、李维诺夫同志
1927 年 5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01 号记录摘抄

听取：

30. 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建议。

决定：

1927 年 5 月 9 日政治局委员以征询方式通过：

30.1) 批准布鲁西洛夫一家，即两名丧失劳动能力的妇女，前往卡尔斯巴德疗养治病；

2) 保证这次治疗所需的相应数量的外汇。

中央书记

№0871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19 号记录关于
批准布鲁西洛夫一家出国治疗问题摘抄

（1930 年 2 月 28 日）

绝密

第 П119 /16 ~ pc 号

送梅辛，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政治局 1930 年——会议第 119 号记录摘抄

政治局 30 年 2 月 28 日决议

伏罗希洛夫同志的申请。

批准布鲁西洛夫姐妹^① 出国。

中央书记

^① 文件此处错误。指的是阿·阿·布鲁西洛夫的妻子娜杰日达·弗拉基米罗夫娜及其妻妹叶·弗·日利霍夫斯卡娅。

№08715

关于布鲁西洛夫手稿使用问题给马林的信

(1956年7月14日)

致苏联共产党中央总务部主任 B.H. 马林同志

根据《历史问题》杂志主编潘克拉托娃同志关于允许 Г.В. 库兹明上校阅读阿·阿·布鲁西洛夫的手稿《我的回忆录》的报告（该手稿是1948年由内务部转交苏共中央的，并保存在中央主席团档案馆），我认为，应责成苏共中央办公厅和科学部了解上述文件并就其使用的可能性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

1956年7月14日

(签字)^①

^① 签字无法辨认。文件上有批注：“手稿已经交康斯坦丁诺夫同志（宣传鼓动部）。1956年7月25日”。

№08717

别洛夫就研究有关布鲁西洛夫的 文献资料问题致苏共中央

(1961年3月30日)

同决议一起退回

绝密

关于苏共中央书记处第182号会议记录，第81rc，副本

苏共中央

最近，一些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多次向档案管理总局提出阿·阿·布鲁西洛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问题。

众所周知，1948年以前在苏联的一些学术报刊上对布鲁西洛夫的作用是肯定的，一些著名的作家写了许多献给他的作品。苏联的军事历史学家们把布鲁西洛夫看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杰出战略家，他善于在敌方广阔战线的最坚固的防御地带准备和实施突破。此结论的依据就是俄国军队1916年在卢茨克突破中的光辉经验。

考虑到这一切，还有布鲁西洛夫对待苏联政府的态度表面上是忠诚的，在国内战争中没有站在革命敌人一边，1920年甚至参加红军服役，因此他被看做是俄国的爱国者，不想反对自己人民的俄老一代将军的优秀代表。组织和实施卢茨克突围的全部功绩都被记在布鲁西洛夫本人身上，他那时是西南方面军的总司令。

1948年10月8日，前内务部长С.Н. 克鲁格洛夫在致约·维·

斯大林同志的信中报告中说，在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布鲁西洛夫《回忆录》手稿，其中充满极端反苏情绪，此后布鲁西洛夫就被遗忘了。回忆录是1925年布鲁西洛夫夫妇在卡罗维发利为其妻子治病期间写的，有他本人亲笔签名。

由于报刊上没有对布鲁西洛夫做出评价，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中的作用问题，对于广大的学术和历史学界就成为一个不清楚的问题。

鉴于《回忆录》手稿是布鲁西洛夫在去世前不久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的情况下签的字，这就需要再一次研究现有的档案材料，以确定对阿·阿·布鲁西洛夫活动的评价。尤其是在他本人所写的全部手稿中，包括在我们所缴获的国外的资料中，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反苏行为。

鉴于以上所述，档案管理总局认为，责成苏联国防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档案管理总局研究有关布鲁西洛夫的文献资料并向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是适宜的。

问题已同国防部（B.B. 库拉索夫同志）和国家安全委员会（B.C. 季库诺夫同志）协商过。

苏联部长会议档案管理总局局长 Г. 别洛夫

1961年3月30日

第11/2724-B^①

① 文件上有这样一句话，后不知被谁划掉：“附上苏共中央决议草案”。

№08722

佩列别利钦就调阅回忆录一事致苏共中央

(1961年6月2日)

绝密

1961年6月2日

第2099号

莫斯科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责成苏联国防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档案管理总局提出关于使用阿·阿·布鲁西洛夫文学遗产事宜的建议。在这方面，苏联内务部于1949年10月8日根据第4082/K号报告提交给苏共中央的阿·阿·布鲁西洛夫的《回忆录》具有重大的意义。需要《回忆录》的原件进行鉴定，以确定是谁，什么时间写成的。有鉴于此，请求将上述《回忆录》转给国家安全委员会临时使用。

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佩列别利钦

№08716

苏共中央书记处 1961 年 4 月 19 日会议
第 182 号记录摘抄
(1961 年 6 月 6 日)

绝密

苏联部长会议档案管理总局 1961 年 3 月 30 日第 11/2724~B
号报告

责成苏联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档案管理总局研究该报告所提问题，并向苏共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

中央书记

№08724

希利娜就转交回忆录等致佩列别利钦

(1961年6月7日)

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

阿·伊·佩列别利钦同志

同意您的今年6月2日的第2099/П号要求，将阿·阿·布鲁西洛夫《我的回忆录》手稿207页、1948年8月5日的第420号鉴定文件2页以及2张照片转交给您供临时使用。

用毕请退回苏共中央总务部。

苏共中央总务部第6处主任 T. 希利娜

№08723

伊瓦舒京就归还资料致苏共中央

(1961年11月16日)

绝密

1961年11月16日

第5284号

莫斯科

答复第3622号

致苏共中央（总务部）

以阿·阿·布鲁西洛夫名义编写的《我的回忆录》手稿以及与研究手稿有关的资料已用毕，现归还。

附：文本（在袋子里的）和14页。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伊瓦舒京

№08721

有关阿·阿·布鲁西洛夫资料综述

(不晚于1961年11月17日)

1948年以前，苏联的军事史学家们把阿·阿·布鲁西洛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杰出战略家。在文学艺术作品和定期刊物上也给予肯定的评价。

1948年以后，所有的与阿·阿·布鲁西洛夫名字有关的资料均遭封存。

最近一段时期，一些作家、历史学家和记者都向苏联部长会议档案管理总局提出了如何确定阿·阿·布鲁西洛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档案管理总局也请求苏共中央责成苏联国防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档案管理总局研究关于阿·阿·布鲁西洛夫的材料并就该问题提出建议。

苏共中央书记处责成苏联国防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档案管理总局提出自己的建议。

—

问题的历史

苏军摧毁希特勒德国之后，在柏林缴获了敌人的档案。

1948年，在整理这些资料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军事历史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发现了阿·阿·布鲁西洛夫《我的回忆录》的手稿，仿佛是1925年在卡罗维发利（捷克斯洛伐克）治病期间写成

的。与手稿同时发现的，还有由希特勒德国东部占领区事务部档案处翻译成德文的该手稿的部分材料。译文上有该处工作人员贝提歇尔的附言：“我希望这些从《布鲁西洛夫将军回忆录》中摘录下来的东西能引起对这部重要手稿的兴趣”。

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将阿·阿·布鲁西洛夫的《我的回忆录》手稿的前言和最后一页送到警察总署犯罪侦察学研究所进行笔迹鉴定。鉴定的任务是确定：“送来的几页手稿是阿·阿·布鲁西洛夫还是其他什么人手写并签字的”。

专家的结论是，手稿的前言和最后一页是阿·阿·布鲁西洛夫手写并签字的（根据——1948年8月5日第420号鉴定报告）。

根据这份鉴定报告的结论，苏联前内务部部长克鲁格洛夫于1948年10月8日以第4082号文件的形式报告苏共中央约·维·斯大林同志，说布鲁西洛夫专门利用在卡罗维发利逗留的机会写成这部分回忆录并准备在其去世以后在国外出版。

在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中还指出：

“……《回忆录》反映了他的激烈反苏观点，并企图在指责他与苏维埃政府合作的白俄侨民心目中为自己恢复名誉。

布鲁西洛夫详细地描写了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夕和苏维埃政权建立的最初几年他是怎样组织反革命力量的。其中还写到，他接受任命到红军里供职（1920~1924年），目的完全是为了从内部瓦解红军队伍。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地位，向红军中的军官灌输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思想。在布鲁西洛夫的《回忆录》中还有造谣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弗·伊·列宁，攻击苏维埃政权和苏联人民的内容……”

鉴于这一点，自1948年起，阿·阿·布鲁西洛夫的文学遗产被查封了，有关他的作品也从公开场合取消了。

根据对以上所述进行的实质性核审和研究，确认如下。

二

阿·阿·布鲁西洛夫（1853～1926）毕业于彼得堡贵族子弟军官学校，参加俄土战争（1877～1878）时是中尉军官。战后毕业于彼得堡市的骑兵学校，不久被任命为该校的校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布鲁西洛夫被任命为华沙军区司令助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指挥第8军，然后是西南方面军。在布鲁西洛夫的领导下，于1916年5月制订并实施了卢茨克城地区奥匈战线的突破。这次军事行动不仅被苏联，而且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写进了历史课本。

1917年5月，布鲁西洛夫被临时政府任命为总司令，但在同年6月，用反动的独裁者科尔尼洛夫取代了他。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阿·阿·布鲁西洛夫没有留在敌人的阵营里，而是成为一名忠诚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

1918年，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委托，布鲁西洛夫解散了沙皇的军队。1920年，布鲁西洛夫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下设的特别会议主席。1922年任骑兵总监督和俄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养马业和养马场的代表。1920年5月30日，在波兰白军发动反对苏维埃俄国的战争之际，以布鲁西洛夫为首的专门会议成员发表了“告各地原军官书”。呼吁书在动员爱国力量参加反对武装干涉者的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由于已近垂暮之年而退休，但被列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承担特别重要任务的成员之列。1925年，阿·阿·布鲁西洛夫携妻子以及妻妹一同前往卡罗维发利治病，4～7月一直呆在卡罗维发利。

布鲁西洛夫于1926年去世，按全套军仪安葬在新圣母公墓。

三

对《我的回忆录》手稿的调查

在研究《我的回忆录》手稿时，将其与“军事出版社”出版的描写1918年以前事件的《我的回忆录》一书加以对比，从中可以发现：手稿中的许多地方是以一个小市民的观点，而不是以一位像阿·阿·布鲁西洛夫这样伟大的军事指挥官的观点写成的。

有鉴于此，对手稿再作一次专业笔迹鉴定，以确定《我的回忆录》手稿是不是布鲁西洛夫本人所写。

为了进行笔迹鉴定，曾采取措施寻找确实属于阿·阿·布鲁西洛夫手稿的样本。这样的手稿基本上采取了在档案中发现的阿·阿·布鲁西洛夫给妻子娜·弗·布鲁西洛娃的信和他给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要求归还搜查时被没收的镶钻石的军刀的呈文。

鉴定要解决的是下列问题：

——布鲁西洛夫是否写了以“……为了她而坚持下来”的句子开头的“最后一卷的前言”。

——布鲁西洛夫是否写了以“……年到了特洛伊察”的句子开头，而以“1925年6月10日卡罗维发利”的句子结尾的最后一页，即第196页。

——手稿中是否有阿·阿·布鲁西洛夫笔迹修改的地方。

——《我的回忆录》手稿前言中说，阿·阿·布鲁西洛夫向其妻子娜·弗·布鲁西洛娃口授了回忆录。《回忆录》是否是他妻子手写的。

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业务技术管理局由三人组成的鉴定委员会做出结论：“手稿最后一卷前言和最后一页，即第196页和整个手稿一样，均系娜·弗·布鲁西洛娃手书。手稿里没有由阿·

阿·布鲁西洛夫亲手所作的修改、插入和补充部分”。（依据——1961年6月29日第180号文件）。

对上述问题重新进行鉴定的是苏联国防部中央法医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最后的结论是：《我的回忆录》手稿是娜·弗·布鲁西洛娃手写完成的，但文稿中的个别修改是阿·阿·布鲁西洛夫手写的。（依据——1961年7月14日第2294/55号文件）。

为了消除出现的矛盾，曾责成俄联邦司法部中央犯罪侦察实验室第三次进行笔迹鉴定。

俄联邦司法部中央犯罪侦察实验室鉴定委员会作出了肯定的结论，《我的回忆录》手稿不是阿·阿·布鲁西洛夫完成的，而是他的妻子娜·弗·布鲁西洛娃之作。文稿中也没有阿·阿·布鲁西洛夫手写的修改。（依据——1961年9月27日第176/97c号资料）。

因此，根据笔迹鉴定可以作出结论：《我的回忆录》手稿是娜·弗·布鲁西洛娃，而不是阿·阿·布鲁西洛夫所作。

该手稿的前言指出，手稿是阿·阿·布鲁西洛夫与娜·弗·布鲁西洛娃在捷克斯洛伐克治病期间留在国外的。当时，布拉格自1923年起就活动着一个所谓的《俄罗斯国外历史档案馆》，这是侨居国外的一伙人利用捷克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政府的资金建立起来的。因此，有一种推测：手稿可能保存在该档案馆里。但是，核查表明，据档案馆资料登记簿记载，只是在1932年10月25日，娘家姓日利霍夫斯卡娅的娜·弗·布鲁西洛娃才第一次把材料交给档案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1925年，无论是布鲁西洛夫，还是他的妻子都没有向档案馆送交过文件。

接着，又对最后一种说法进行了审查。如果《我的回忆录》手稿是由娜·弗·布鲁西洛娃写成的，那么是否可能她是根据阿·阿·布鲁西洛夫的口授完成的？

为了检验这种推测，指定由苏联科学院俄罗斯语言研究所的专

家进行语言学鉴定。

专家们的任务是，根据对《我的回忆录》手稿所作的语言学和修辞学分析作出结论：谁是手稿的作者——是阿·阿·布鲁西洛夫，是他的妻子娜·弗·布鲁西洛娃还是其他什么人。

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语文学博士奥日戈夫为首的专家小组，对阿·阿·布鲁西洛夫出版的著作、他的手稿及其妻娜·弗·布鲁西洛娃的手稿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我的回忆录》的手稿主要是阿·阿·布鲁西洛夫口授的片断、草稿等……特别明显的是阿·阿·布鲁西洛夫手稿中一些叙述其个人生活或者客观（没有反苏倾向性）记叙社会政治事件的部分，手稿和书在修辞上很相近。

但是，手稿中出现的很多句子、对人的看法、对事件的评价等等，使人怀疑它们是否属于阿·阿·布鲁西洛夫的。将这些内容同娜·弗·布鲁西洛娃的手稿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在语言和文风方面非常相近，某些表述和评价完全一样。根据这一点可以确定，娜·弗·布鲁西洛娃……“在最后编定手稿时加进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评价，加进了相当多的自己的创作，破坏和歪曲了阿·阿·布鲁西洛夫所特有的‘笔法’”。（依据——1961年9月15日鉴定结论）。

因此，语言学家得出结论：阿·阿·布鲁西洛夫去世后留下的《回忆录》的一些草稿和片断被以反苏精神“加工”过了。

这个结论得到1927年2月21日的业务文件的证实，该文件是在保存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的第302286，т.1л.д.327号卷宗里发现的。从该文件可以看出，阿·阿·布鲁西洛夫在去世后留下了一部分零散的回忆录的杂记，他的妻子娜·弗·布鲁西洛娃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对这些《回忆录》的草稿进行了加工。

在文件中还写道：

“这些手稿是已故的布鲁西洛夫以一些单个的句子、札记和提

纲的形式写成的，很不成形。

阿·阿·布鲁西洛夫死后，他的遗孀将这份材料交给三个人加工整理：B.H. 戈托夫斯基、安·叶·斯涅萨列夫和自己的亲属多利沃-多勃罗沃尔斯基。

娜·弗·布鲁西洛娃亲自指挥了这一重奏曲……加工整理工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外，都应根据英国“顽固派”和德国保皇党精神来进行。娜·弗·布鲁西洛娃答应上述人员，如果整个事情顺利完成，她将从拟定的一大笔收益中取出一定的百分比付给他们，以此来诱惑他们。B.H. 戈托夫斯基笑着说，只是为了一大笔钱才跟娜·弗·布鲁西洛娃打交道的，因为她也直截了当地这样说：‘没有你们这些傻瓜，我自己也能“回忆”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想表达的一切，但是，我需要让你们来证明，这些确实是阿·阿·布鲁西洛夫的回忆录，反正你们的名字国外军事界多少知道一些…’。（依据——1927年2月21日第684/6号谍报照片复制件）。

四

对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登记处和俄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问询处档案中的侦察卷宗和业务登记卷宗的核查结果

为了查清涉及阿·阿·布鲁西洛夫的材料，对一系列提到或引用阿·阿·布鲁西洛夫的侦察卷宗和业务卷宗进行了研究。

1) 阿·阿·布鲁西洛夫曾涉及第1710号案件。从该案资料可以看出事情的经过：1917年5月，以社会革命党人索洛缅斯基为首的一批怀反动情绪的人士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黑帮组织，命名为《在军界和民间加强东正教协会》。该会有自己的章程和旗帜，约有250人。协会由12人组成的理事会领导。除了理事会以外，为了领导协会并提高其知名度，邀请了莫斯科和科洛姆纳大主教吉洪和

骑兵将军阿·阿·布鲁西洛夫担任名誉主席。

在 1917 年 9 月 21 日和 28 日以及 10 月 5 日召开的协会理事会会议上，布鲁西洛夫主持了会议并发了言。

由于缺少资金协会解散。协会主席索洛缅斯基被捕，1918 年 6 月 26 日，布特理工兵代表苏维埃侦察委员会判处他死刑。

在此案中布鲁西洛夫未被追究责任；

2) 在 1918 年，在第 1158 号案件中阿·阿·布鲁西洛夫同其他人一起被逮捕。他被监禁了约两个月。显然，根据这个案件逮捕他时，没收了他的镶钻石的军刀。释放后他在致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呈文请求归还这把军刀。

关于阿·阿·布鲁西洛夫的案卷（完全没有根据的），“因不具业务和学术意义”，于 1955 年 11 月被销毁；

3) 阿·阿·布鲁西洛夫曾涉及第 7749 号 П. Н. 切尔尼亚夫斯基的案件。在 1918 年 10 月 25 日审讯被捕的切尔尼亚夫斯基的记录中写道：1917 年 12 月，一伙怀反动情绪的原沙皇将军和军官们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白卫军组织，其任务是给予集结在顿河的反革命力量以援助。

这个组织的领导人中似乎有阿·阿·布鲁西洛夫。

在审讯切尔尼亚夫斯基的记录中没有看到有关阿·阿·布鲁西洛夫在该组织里从事什么实际活动的材料。案卷中也没有有关阿·阿·布鲁西洛夫的其他材料；

4) 第 51834 号案卷，指控 B. H. 戈托夫斯基等人的第 76 卷，指控 H. H. 拉捷尔的第 P-8904 号案卷涉及阿·阿·布鲁西洛夫。

在上述所列案卷材料中，没有有损阿·阿·布鲁西洛夫名誉的具体资料，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

5) 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朋友们提供的情报，阿·阿·布鲁西洛夫

和妻子以及妻妹于1925年在卡罗维发利治病期间，马萨里克^①总统在兰河接见了他们。负责监视阿·阿·布鲁西洛夫和他的家庭成员的是官方的警方代理人维麦尔。

1926年11月，马萨里克总统借用别人的名字寄给了阿·阿·布鲁西洛夫的遗孀一万克郎，但是，无法确定被借用名字给娜·弗·布鲁西洛娃寄钱的这个人，因为苏联外贸银行记录1929年以前国外划拨业务的档案资料都被销毁了，而在苏联国家银行外汇业务管理局的资料中又没有发现这笔汇款。

自1934到1938年，娜·弗·布鲁西洛娃每个月可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基金中得到2300克郎的养老金。

娜·弗·布鲁西洛娃去世后，每月给她的妹妹——叶·弗·日利霍夫斯卡娅寄去1000克郎的养老金。

五

在审核中发现，女公民别索诺娃·奥利加·伊万诺夫娜非常了解阿·阿·布鲁西洛夫和他的家庭成员，自1918年到1930年期间她经常出入布鲁西洛夫家。

娜·弗·布鲁西洛娃和她的妹妹叶·弗·日利霍夫斯卡娅在国外生活期间经常与奥·伊·别索诺娃通信。

在与奥·伊·别索诺娃交谈中，她说，阿·阿·布鲁西洛夫对待苏维埃政权一直是忠诚的。她列举了一系列阿·阿·布鲁西洛夫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看法，比如：尽管在那个时期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阿·阿·布鲁西洛夫从来没有表示过打算离开苏维埃俄国到国外定居的想法。

^① 马萨里克，托·加·（1850～1937）——1918～193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

当他的妻子或者是妻妹谈起这个问题时，布鲁西洛夫总是予以否定。在这种情况下，他总是说，现在不仅仅是他们处于困境，而是整个俄罗斯人民都处于困境，他作为一个俄罗斯的爱国者，在这个时候是不能抛弃自己的祖国的，无论这一点对于他来说是多么困难。奥·伊·别索诺娃在评价娜·弗·布鲁西洛娃和叶·弗·日利霍夫斯卡娅时，说她们是喜怒无常的妇女，她们多次表示对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满情绪，希望到国外生活。

她们于1930年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娜·弗·布鲁西洛娃于1938年，叶·弗·日利霍夫斯卡娅于1947年在那里去世。

* * *

因此，根据上述资料可以作出结论，阿·阿·布鲁西洛夫在去世后留下了一些他的《回忆录》的某些零散的草稿，内容都是有关他在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情况的。根据这些零散的笔记整理出了《我的回忆录》的材料，其形式应是已由“军事出版社”以及在国外出版发行的阿·阿·布鲁西洛夫的著作《我的回忆录》的续篇。

布鲁西洛夫的妻子参加了这些笔记的加工整理工作，给这份材料加上了反苏的倾向性。

在档案馆现有的资料中，没有找到能说明阿·阿·布鲁西洛夫从事过反对苏维埃国家的犯罪活动的证据。

此外，在全俄肃反委员会1921年8月5日《关于援助饥民组织中的契卡工作》的命令中指出：“……应该把赈济委员会吸收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工作看做像在波兰战争吸收布鲁西洛夫参加一样，他虽然没有任何实际权力，但不管其想法和目的如何，他可以帮助我们同波兰资产阶级作斗争……”

阿·阿·布鲁西洛夫去世以后，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发表了悼念

文章，高度评价了他对于俄罗斯人民和苏维埃政权的功绩。

白俄侨民和我们祖国的敌人试图把阿·阿·布鲁西洛夫拉到他们的阵营里，没有成功以后，又伺机报复他，他们极端憎恨阿·阿·布鲁西洛夫为苏维埃政权服务。他惟一的儿子就是被邓尼金杀害的。

1931年在巴黎，白俄侨民、苏维埃国家疯狂的敌人涅斯捷罗维奇—贝尔格出版了回忆录《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在此谤书中，关于阿·阿·布鲁西洛夫写道：“在会议上作出决定，联合当时在莫斯科的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宣布科尔尼洛夫将军为执政者。

但是，谁来指挥我们的士兵呢？而主要的是，谁来领导整个政变呢？最后决定去请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布鲁西洛夫将军。那时谁也没有想到，像后来表明的那样，布鲁西洛夫原来是个叛徒……同我一起去的还有非常熟悉布鲁西洛夫的别尔纳索夫斯基上尉、委员会（指武装力量‘逃亡战俘委员会’）主席克雷洛夫以及另外两名军官……对我们来意，他回答说：

——你们不是第一个来向我提这种建议的人，但是，我还是应该对你们说，就像我对以前来过的所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我认为这种打算是一种冒险，我，布鲁西洛夫将军，不想当这种领导…我奉劝你们，军官先生们，平静一些。捍卫国家的政府已经存在。

我们对布鲁西洛夫的拜访就这样结束了”（第23～24页）。

第二次拜访阿·阿·布鲁西洛夫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关于这次拜访的情况涅斯捷罗维奇—贝尔格在书中是这样写的：“我们去拜访布鲁西洛夫，当时他正躺在鲁德涅夫医院里（莫斯科发生混乱时，一颗流弹将他击伤）。他躺在那里，但很精神。他说，伤口不是很严重，但总是故意不让愈合，也许布尔什维克，或者非布尔什维克，想给予他安静。我来自新切尔卡斯克的一封信转交给他，信中向将军建议，在我们委员会的协助下逃到顿

河去。布鲁西洛夫看了信，把信放在枕头底下并清清楚楚地说：

——我哪里也不去。该是我们忘记三色旗而联合在红旗之下的时候了。

这令我非常震惊。

——您有什么话要转告顿河方面吗？

——请转达我现在所说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我说过后就匆忙离开了。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的上帝！而顿河那边一直让我相信，能把布鲁西洛夫带走的！”（第 100，102 页）

结论和建议：

1. 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阿·阿·布鲁西洛夫没有进行反对革命力量的斗争，也没有逃到国外去，尽管他当时处于反革命分子的包围之中，完全有可能逃跑，不仅如此，他还给予了年青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力所能及的帮助。

2. 认为可以确定，在德国希特勒档案馆中发现的带有反苏内容的《我的回忆录》手稿，不是阿·阿·布鲁西洛夫所写，而是在他去世以后，其他一些人在他妻子娜·弗·布鲁西洛娃直接参与下伪造的。

3. 有鉴于此，恢复阿·阿·布鲁西洛夫在军事历史上的地位，就如 1948 年以前确定的那样，是适宜的。

“同意。”

谢维林上校
戈尔巴坚科上校
格里巴诺夫中将
古希科夫少将

№08719

扎哈罗夫等给苏共中央的关于 布鲁西洛夫问题的总结报告

(1961年11月17日)

机密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1961年4月19日的第182-81rc号决议，苏联国防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档案管理总局对中央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馆所存有关阿·阿·布鲁西洛夫活动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研究，其结果如下：

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布鲁西洛夫（1853～1926）出身于贵族。1872年毕业于贵族子弟军官学校。参加过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后在彼得堡市的骑兵军官学校学习，不久被任命为该校的校长，自1902年2月起直到1906年12月一直担任该职务。档案中没有发现布鲁西洛夫对1905～1907年革命事件的态度任何资料。

后来，阿·阿·布鲁西洛夫先后担任了第14集团军司令，华沙军区司令助理和第12集团军司令。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指挥第8军，自1916年3月起担任西南方面军总司令。在他的指挥下，1916年夏成功地突破了奥德战线，这是俄军事艺术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2月到10月期间，阿·阿·布鲁西洛夫作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主张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支持临时政府在这方面的措施。1917年5月，他被任命为最高总司令，但是，同年的7月，临时政府用反动将军科尔尼洛夫取代了他。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阿·阿·布鲁西洛夫成为一名忠诚于苏维埃共和国的公民。他不仅没有跑到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阵营里，而且还给予苏维埃政权以力所能及的帮助。1920年，他参加了红军。在担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下设的特别会议主席时，布鲁西洛夫在苏波战争期间签署了著名的《告各地原军官书》，这在同波兰白军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自1920年10月6日起，他成为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立法会委员，1923年2月1日起，担任工农红军骑兵监督，1924年3月31日，阿·阿·布鲁西洛夫被列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承担特别重要任务的的成员之列，留任此岗位直到1926年3月17日在莫斯科去世为止。

在阿·阿·布鲁西洛夫逝世之际，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部发表了悼告，高度地评价了他对俄罗斯人民和苏维埃政权的功绩。白俄侨民因阿·阿·布鲁西洛夫为苏维埃俄国服务而憎恨他。布鲁西洛夫惟一的儿子就是被邓尼金军队枪杀的。

后来，1948年，在缴获的希特勒德国的档案文件中发现了《我的回忆录》的手稿，以阿·阿·布鲁西洛夫的身份记叙了他在苏维埃时期的生活。回忆录具有明显的反苏的性质。从回忆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指责他与苏联政府合作的白俄面前为阿·阿·布鲁西洛夫辩解的倾向。

苏联前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仅仅根据一名专家的鉴定就作出结论：手稿是阿·阿·布鲁西洛夫本人所写的，并于1948年10月8日将该结论上报苏共中央。他在呈文中指出，似乎阿·阿·布鲁西洛夫在1925年专门利用去卡罗维发利治病的机会来写作此回忆录的。

对《我的回忆录》手稿进行的全面分析和调查，以及对档案资料和研究文件的研究表明：阿·阿·布鲁西洛夫在死后没有留下任何有关苏联时期的完整的回忆录手稿，有的只是一些草稿和一些零散的笔记，只是在他去世数年之后，在其妻娜·弗·布鲁西洛娃直接参与下才被其他人加工整理成一份完整的手稿。在加工整理过程中，手稿被加上反苏倾向。《我的回忆录》手稿的整个文本不是阿·阿·布鲁西洛夫手写的，而是1930年在国外他的妻子娜·弗·布鲁西洛娃写成的。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1. 在所研究的档案卷宗中，没有发现任何可以证明阿·阿·布鲁西洛夫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敌对活动的文件。

2. 正如调查所表明的那样，《我的回忆录》手稿不是阿·阿·布鲁西洛夫写的，而是在他死后伪造的。

3. 阿·阿·布鲁西洛夫无疑是进步的军事活动家，俄罗斯的爱国者。虽然他属于旧社会的高层人物，在军队中位居要职，但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他没有留在敌人的阵营里，而是转到了苏维埃政权一边，并参加了红军的建设。

М. 扎哈罗夫

И. 伊瓦舒金

Г. 别洛夫

1961年11月17日

№08720

苏共中央关于布鲁西洛夫问题的决定

(不早于1961年11月17日)

绝密
草案
决定

审核了苏联国防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档案管理总局提交的对于阿·阿·布鲁西洛夫的活动所作的总结报告，苏共中央决定：

1. 同意总结报告中所阐述的结论和建议。
2. 建议报刊编辑部和出版社公布有关阿·阿·布鲁西洛夫生平事业的资料。

苏共中央书记

№08725

科马里涅茨就笔迹鉴定问题致苏共中央行政部

(1962年6月30日)

致苏共中央行政部

苏共党员鲍里斯·马克西莫维奇·科马里涅茨的说明

1948年，当我在苏联内务部警察管理总署犯罪学侦查研究所工作时，对以阿·阿·布鲁西洛夫名义写成的回忆录手稿进行了笔迹鉴定。作为鉴定专家，我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手稿和上面的签字都是阿·阿·布鲁西洛夫所写的。

1961年10月将被研究的文件和较完整的笔迹样件以及几份鉴定报告（国家安全委员会某处的鉴定报告，专家A.H.克拉斯诺夫等人的鉴定报告，1961年6月29日第18号，中央法医实验室鉴定报告，专家维诺格拉多夫和托米林，1961年7月14日第2294/55号，中央犯罪学侦察实验室的报告，奥尔洛夫和其他专家的报告，1961年9月27日）转给了我，根据这些资料作出的结论是：手稿的文本不是阿·阿·布鲁西洛夫，而是娜·布鲁西洛娃所作。

研究了这些资料以后，我确信1948年我在下鉴定结论时犯了错误。实际上，被研究的手稿文本系娜·弗·布鲁西洛娃所作，上述鉴定结论，包括其手稿文本写作情况的说明，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在1948年的鉴定中，我所犯错误的原因是：当时研究的不是整个手稿，而只是其中的2页，以及少量的阿·阿·布鲁西洛夫笔迹的样件（笔迹的样件是1916~1922年期间的，而当时研究的手稿是1925年的，也就是说在他去世之前不久写的），当时没有其他可

关于布鲁西洛夫回忆录问题的调查

能写作手稿的人的笔迹样件（其中包括娜·弗·布鲁西洛娃），并且要在极其短暂的期限里作出鉴定结论，而阿·阿·布鲁西洛夫与娜·弗·布鲁西洛娃的笔迹又非常相似。

还应该注意的，在 1948 年我们对笔迹研究结果的评估的可能和原则的认识要比现在有限得多。

科马里涅茨（签字）

1962 年 6 月 30 日

№08718

米罗诺夫、马雷金就恢复对布鲁西洛夫

评价问题致苏共中央

(1962年7月10日)

同决议一起退回

中央书记处传阅

同意——苏斯洛夫

波诺马廖夫

伊利切夫

谢列平

科兹洛夫

1962年7月10日 /222

绝密

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第182号第81-rc, 附件

副本

致苏共中央

根据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委托, 苏联国防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档案管理总局研究了有关阿·阿·布鲁西洛夫本人及其对苏维埃俄国态度的资料。

1948年以前, 在苏联军事历史、文学艺术和定期刊物上对布鲁西洛夫活动的评价都是肯定的。

伟大卫国战争以后, 在缴获的希特勒德国的档案文件中发现了

《我的回忆录》的手稿，手稿以阿·阿·布鲁西洛夫的身份记叙了他在苏联时期的生活。回忆录具有反苏性质，并向国外的白俄侨民作辩解，因为这些人指责他与苏联政府合作。

苏联前内务部没有弄清楚手稿的来历，也没有对其进行仔细的研究，就于1948年向苏共中央报告，说该手稿是阿·阿·布鲁西洛夫本人于1925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治病期间写成的。关于这个问题没有作出正式的决定，但是，所有涉及布鲁西洛夫名字的文件都从公开场合消失了，被封存在秘密档案库。

目前，对上述《我的回忆录》的手稿又重新进行了仔细研究，对手稿做了笔迹和语言学鉴定，以确定其作者，对一些有关布鲁西洛夫活动的档案资料做了研究，检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中提到或直接援引布鲁西洛夫名字侦察案卷和业务登记案卷，找出了一些认识布鲁西洛夫的人并同他们谈了话。

笔迹和语言学鉴定的结论是：《我的回忆录》的手稿不是布鲁西洛夫本人手写的，而是他的妻子娜·弗·布鲁西洛娃利用了布鲁西洛夫所口授的和书写的一些草稿和片断写成的，反苏倾向性是在回忆录定稿时由她加上的，这已经是在其丈夫去世后的事了。

可以证明这个结论的还有1927年2月21日的业务文件，该文件是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登记处第302286т.1л.д.327号卷宗里找到的。从上述文件中可以看出：阿·阿·布鲁西洛夫死后留下了一些他的《回忆录》的零散的笔记，她的妻子娜·弗·布鲁西洛娃采取了积极措施，对这些《回忆录》的草稿进行了加工。

在文件中还写道：

“这些手稿是已故的布鲁西洛夫以一些单个的句子、札记和提纲的形式写成的，很不成形。

阿·阿·布鲁西洛夫死后，他的遗孀将这份材料交给三个人加工

整理：B.H. 戈托夫斯基、安·叶·斯涅萨列夫和自己的亲属多利沃 - 多勃罗沃尔斯基。

娜·弗·布鲁西洛娃亲自指挥了这一重奏曲……加工整理工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外，都应根据英国“顽固派”和德国保皇党精神来进行。娜·弗·布鲁西洛娃答应上述人员，如果整个事情顺利完成，她将从拟定的一大笔收益中取出一定的百分比付给他们，以此来诱惑他们。B.H. 戈托夫斯基笑着说，只是为了一大笔钱才跟娜·弗·布鲁西洛娃打交道的，因为她也直截了当地这样说：‘没有你们这些傻瓜，我自己也能“回忆”阿列克谢·阿列克谢耶维奇想表达的一切，但是，我需要让你们来证明，这些确实是阿·阿·布鲁西洛夫的回忆录，反正你们的名字国外军事界多少知道一些…’。但是，在有些地方，娜·弗·布鲁西洛娃用布鲁西洛夫的语气向我们口授一些军事上荒谬的东西，所以我们很清楚自己的作用，B. H. 戈托夫斯基如是说。

1930年，布鲁西洛夫的妻子到捷克斯洛伐克居住。估计布鲁西洛娃在捷克斯洛伐克将手稿交给了布拉格的《俄罗斯国外历史档案馆》，关于这一点档案馆的登记册上有1932年10月25日的记录，战争时期德国人将手稿从那里运走了。

还应指出，1948年对手稿进行笔迹鉴定的是专家鲍·马·科马里涅茨，他作出的结论是：手稿是阿·阿·布鲁西洛夫的手迹，但后来他声明说，由于实验的条件不好出现了错误。

在档案资料中，在被调查的业务文件中，均没有发现有损于布鲁西洛夫名誉的具体的资料。

熟悉和了解布鲁西洛夫本人和他的家庭的人讲述道，按照他们的看法，布鲁西洛夫对苏维埃政权是忠诚的，尽管在那个时期存在一系列困难，可他从来也没有表示过要从苏维埃俄国迁居到国外的

打算。

根据以上所述的一切，可以得出结论：布鲁西洛夫无疑是进步的军事活动家，俄罗斯的爱国者。虽然他属于旧社会的高层人物，在军队中位居要职，但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他没有留在敌人的阵营里，而是转到了苏维埃政权一边，并参加了红军的建设。

1918年，根据苏联政府的委托，布鲁西洛夫解散了沙皇军队。1920年他被任命为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下设的特别会议主席，并签署了著名的《告各地原军官书》，该呼吁书在与波兰白军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自1920年10月起，担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立法会委员，1923年2月起，担任工农红军骑兵监督。由于已近垂暮之年于1924年退休，但一直被列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承担特别重要任务的的成员之列，留任此岗位直到1926年3月17日在莫斯科去世为止。

因此，缺乏根据地改变对布鲁西洛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的作用的评价，是原苏联内务部依据不正确的情报做出的。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审理了调查的资料并对其进行了一些补充核查，同意苏联国防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档案管理总局的结论。

为了恢复对布鲁西洛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活动及其在苏联军队中的工作的正确评价，我们认为采取以下措施是适宜的：

——批准苏联部长会议档案管理总局向研究人员开放已经处于解密状态的有关布鲁西洛夫的档案材料；

——委托苏联国防部在军事历史杂志上公布若干有关布鲁西洛夫的文章，确定布鲁西洛夫在发展军事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评定他在苏联军队中的活动；

——建议苏联部长会议图书出版事业总局管理局允许出版社公布

有关布鲁西洛夫生平事业的资料。

请予以同意。

苏共中央行政机关部主任 H. 米罗诺夫

国家安全机关处主任 A. 马雷金

1962年7月6日

【专题说明】

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巴黎会议

(1921年5~6月)

1920年11月弗兰格尔军队在克里木失败之后有大量难民逃往国外。据不完全统计，1917~1922年移居国外的人数达200万以上。克里木的失败加剧了俄国侨民中的思想政治分化。“人民自由党”是立宪民主党的正式名称，成立于1905年。十月革命后成为非法组织。其成员大量流亡国外。国外的立宪民主党人大体分为3派：右翼继续指望用武装斗争来反对苏维埃政权，主张保存弗兰格尔的军队，指望外国武装干涉。他们依靠复辟势力，反对同左翼社会党人达成政治协议。党的左翼以米留可夫为首，他们指望俄国国内和国际舞台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制订了党的“新方针”，其实质是，国内战争结束之后应放弃通过外部武装干涉推翻苏维埃政权的企图，而寄希望于俄国人民。鉴于复辟帝制无望，他们持共和方针，认为必须在政治上妥协，同左翼社会党首先是社会革命党联盟。因此，他们同国外的社会革命党人有密切的联系，一起参加立宪会议成员会议，成立民族委员会。还有一些人数不多的立宪民主党侨民对上述两派持批评的态度。他们认为立宪民主党应当持彻底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原则。1921年5月26日至6月2日在巴黎召开的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举行的。出席会议的有19名立

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议的目的是在党内各派之间达成妥协，制订共同的行动纲领。议程如下：1. 党的策略；2. 党员在立宪会议成员会议和执行委员会上的活动；3. 党员在其他社会政治组织中的活动；4. 国际会议上的俄国问题；5. 召开党的代表会议问题；6. 中央委员会的驻地以及其他组织问题。中心问题是讨论党的策略路线。本会议纪录含有大量反映立宪民主党在国内战争中的活动的信息。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吴能翻译)

№04016

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会议

第 2 号记录摘抄

(1921 年 5 月 27 日)

巴黎

出席：姆·斯·阿杰莫夫^①、尼·伊·阿斯特罗夫^②、尼·康·沃尔柯夫^③、И. И. 格龙斯基^④、И. И. 杰米多夫^⑤、帕·德·多尔戈

-
- ① 阿杰莫夫，姆·斯·——1916 年立宪民主党第 6 次代表大会起任中央委员。法学家。第 2—4 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 年二月革命后是法律会议成员。预备国会方案的设计者，后为预备国会成员。十月革命后去法国。
- ② 阿斯特罗夫，尼·伊·（1868—1934）——1916 年立宪民主党第 6 次代表大会起任中央委员。1917 年 3—6 月是莫斯科市首脑。国务会议参加者。当选立宪会议代表。反布尔什维克运动的积极活动家。是右翼中心的组织者之一，同时也是俄国复兴会和民族中心的领导成员。1918 年夏去南方。邓尼金属下的特别会议成员。流亡国外。1920 年任巴黎委员会副主席。1920 年 12 月放弃这一称号。
- ③ 沃尔柯夫，尼·康·——1916 年立宪民主党第 6 次代表大会起任中央委员。第一届临时政府副农业部长。预备议会成员。1918 年去南方。民族中心理事会理事。侨居法国。
- ④ 格龙斯基，И. И. ——立宪民主党第 6 次代表大会起任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参加研究有关召开立宪会议问题的委员会。预备议会成员。十月革命后参加筹建民族中心。1918 年去南方。曾任邓尼金手下的内务局局长。侨居巴黎。
- ⑤ 杰米多夫，И. И. （1873—1946）——立宪民主党第 6 次代表大会起任中央委员。第 4 届国家杜马代表。短期内任临时政府副农业部长。预备议会成员。十月革命后参加筹建民族中心，领导其基辅分部。侨居法国。

鲁科夫^①、安·弗·卡尔塔舍夫^②、瓦·阿·马克拉柯夫^③、M. JI. 曼德尔施塔姆^④、巴·尼·米留可夫^⑤、B. Э. 诺尔德^⑥、弗·阿·奥波连斯基^⑦、索·弗·帕宁娜^⑧、弗·伊·罗季切夫^⑨、C. A. 斯米尔诺

- ① 多尔戈鲁科夫，帕·德·（1866～1930）——立宪民主党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第2届国家杜马立宪民主党党团主席。1927年秋当选立宪会议代表。1918年在莫斯科领导中央组织局的工作。秋去南方，任民族中心副主席。组织支持志愿军的运动。1920年秋移居君士坦丁堡。俄罗斯委员会成员。
- ② 卡尔塔舍夫，安·弗·（1875～1952）——二月革命后加入立宪民主党。1917年7月起任正教院总监、宗教部长。民族中心组织者之一。1919年初去芬兰领导俄罗斯委员会。协助尤登尼奇的军队。1920年移居巴黎。1921年参加临时俄罗斯委员会，筹备民族代表大会。
- ③ 马克拉柯夫，瓦·阿·（1870～1957）——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第2、3、4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任临时政府驻法国大使。当选立宪会议代表。1919年参加在巴黎召开的俄罗斯政治会议。
- ④ 曼德尔施塔姆，M. JI. ——律师。立宪民主党左翼代表。在第1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在第4次代表大会上因在策略问题上不同意多数派的意见而退出中央委员会。1917年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主张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协调工作。预备议会成员。
- ⑤ 米留可夫，巴·尼·（1859～1943）——历史学家、政论家。立宪民主党终身中央委员。第3、4届国家杜马代表。第一届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十月革命后在基辅，拟借助德国军队来消灭苏维埃政权，其亲德方针受到中央委员会的谴责，米辞去党的主席职务。在国外制订“新策略”的基本原则。1921年起任《最近新闻报》编辑。
- ⑥ 诺尔德，B. Э. ——法学家。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第一届临时政府副外交部长。预备议会成员。1918年春是右翼中心的积极参加者。1919年夏移居巴黎。
- ⑦ 奥波连斯基，弗·阿·（1869～1950）——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当选中央书记。《自由人民报》编辑。国务会议参加者，预备国会成员。1917年10月26日夜被选人反布尔什维克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12月去克里木。1920年移居国外。
- ⑧ 帕宁娜，索·弗·——1917年在立宪民主党第8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临时政府副教育部长。1918年去南方。加入民族中心理事会。后移居国外。
- ⑨ 罗季切夫，弗·伊·（1854～1933）——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历届国家杜马代表。临时政府芬兰事务部长。国务会议参加者。当选立宪会议代表。1918年秋去南方。参加在敖德萨的民族中心常务局的工作。在邓尼金手下的特别会议工作。民族代表大会代表。

夫^①、尼·瓦·捷斯连科^②、阿·弗·梯尔柯娃。

1. 巴·尼·米留可夫被推选为本次会议主席（……）。

2. 主席建议转入讨论会议日程的主要问题——党的策略问题，并认为应当谈谈在策略方面的差别，说明差别是怎样形成的，并确定自己对这种差别的态度。

Б. Э. 诺尔德认为，应当确定党对未来的观点，这是指党的作用，而不是只进行批评。

尼·伊·阿斯特罗夫就这个问题提请会议注意自己的纲要，他在纲要中正是试图回答这样一些问题：党的现状，党在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过程中做些什么，党内存在的分歧的出路何在，其结果是提出新的条件，对“新策略”作出修改，或者发明一种所谓“最新策略”。简单地说，在纲要中试图重新寻求党的统一。尼·伊·阿斯特罗夫先请求原谅他在纲要中的措词有些尖锐，因为他并不想伤害任何人，然后宣读以下内容的纲要：

“我们的行动和议论是以这样一种情况为出发点的，即立宪民主党是存在的，不仅侨民需要它，而且新的俄国也需要它。

但是，党是否存在呢？从法律上说，是存在的。但事实上它看来已经丧失了自己的统一，瓦解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为了恢复它已经瓦解了的内部统一该怎么办呢？

党在过去曾经不止一次地经受过打击和震荡。但是，这些打击和震荡并没有破坏它的统一和完整。它坚定地接纳了革命，而且直到布尔什维克政变之前一直保持了自身的存在，成为俄国惟一个

① 斯米尔诺夫，С. А. ——莫斯科大工业家。1917年加入立宪民主党。

② 捷斯连科，尼·瓦·（1869～1962）——女作家、新闻记者。1906年当选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预备议会成员。十月革命后编《斗争报》，号召推翻苏维埃政权。1918年春去英国。一年后任邓尼金军队的宣传部长。民族代表大会常务局委员。

体现国家观念并对抗社会主义者的“妥协政策”的组织。

虽然在临时政府中拥有自己的代表，但是党并没有丧失自己的面貌，仍然是独立自主的。虽然它同其他政党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但是它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目标。

即使在布尔什维克政变以后，它也仍然一如既往，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阵地，而且公开行动。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是统一的，至少在形式上是统一的。

在1918年5月17日以前，它过着紧张的生活。在科科什金和盛加略夫被杀害^①以后，党被宣布为非法，但它继续工作，并把中央机关迁到了莫斯科。

在那里，拥有众多成员的中央委员会经过几乎不停顿地开会，确定了几项基本原则，后来在5月份经代表会议^②批准，成为党的策略的基础。

这些原则总的说来可归纳如下：

继续同德国人作斗争。

忠于同盟条约。

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和保留国家观念。

全力支援在俄国南方兴起的志愿军。

确认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必须集中掌握强有力的政权。

确认必须同各种政治集团协调和联合，组成旨在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联盟。

坚决反对分立主义和肢解俄国的主张。

当时还确认斗争的目标应当是召开立宪会议，认为任何试图复

^① 科科什金和盛加略夫于1917年11月28日被捕并关押在彼得保罗要塞，后因病于1918年1月6日转移到监狱医院，1月7日夜被水兵所杀。

^② 立宪民主党五月代表会议于1918年5月13~15日在莫斯科举行。

辟 1917 年立宪会议的企图都是政治上有害的和不能容许的。

在党的机关遭到破坏以后，党员和中央委员带着这些指令被派往全俄各地区，在那里组织同布尔什维克的斗争。

例如，佩佩利亚耶夫^①、沃尔科夫、沃斯特罗京^② 和其他人被派往西伯利亚。

斯捷潘诺夫^③ 和我受命前去南方到阿列克谢耶夫^④ 将军那里，以劝他把军队开过伏尔加河，并在那里参加组建政权。

在立宪民主党人积极参加下建立的民族中心^⑤ 和复兴会^⑥ 坚持主张立宪民主党人参加即将在乌法开展的行动。

此前不久，维纳韦尔^⑦、纳波柯夫^⑧ 从莫斯科出发。后来离开

-
- ① 佩佩利亚耶夫，B.E.——立宪民主党中央东方部部长。高尔察克政府总理。1920年2月7日被枪决。
- ② 沃斯特罗京，C.B.——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8年初去远东，同日本谈判由日本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
- ③ 斯捷潘诺夫，B.A.——立宪民主党人。1917年8月去南方。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向米·瓦·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报告莫斯科反布尔什维克组织活动情况。民族中心理事会成员。1918~1919年在邓尼金的特别会议领导监察机关。
- ④ 阿列克谢耶夫，米·瓦·（1857~1918）——俄步兵上将。1915年起任总参谋长。1917年3~5月任最高总司令。十月革命后领导志愿军。
- ⑤ 民族中心，1918年春在莫斯科成立，由因右翼中心不同意亲德倾向而退出中心的一部分立宪民主党人组成。主张军队统一，同盟国军队服从俄指挥，建立军事独裁。
- ⑥ 俄罗斯复兴会，1918年3月由立宪民主党、人民社会党和社会革命党等党派在莫斯科成立的反革命组织。其任务是为统一、完整、自由的俄国而奋斗，为完成这一任务，复兴会认为必须建立临时专政——督政府，需得到同盟国的帮助，军队是实现目的支柱。主席是韦·亚·米雅柯金。1919年4月，该会加入战术中心。1920年被取缔。
- ⑦ 维纳韦尔，马·莫·（1862~1926）——律师。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8年在克里木政府任外交部长。后移居巴黎。
- ⑧ 纳波柯夫，弗·德·（1869~1922）——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法学家。1917年10月去南方。参加克里木政府。后移居柏林，领导该地立宪民主党小组。民族代表大会副主席。

的有诺夫哥罗德采夫^①、多尔戈鲁科夫公爵、捷斯连科、尤列涅夫^②、卡尔塔舍夫、格里姆等人。巴·尼·米留可夫到南方去要早得多，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政变之后就去了。

从这时起，开始了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有组织的整体的党的行动，不如说是个别地方小组、个别中央委员小组，最后是个别党员的行动，一切任凭自己决定并自担风险。

后来的这一切都是巴·尼·米留可夫和他关于取向问题的几次发言而开其先河的，包括基辅立宪民主党人小组进而为盖特曼政权效劳都是采用这种取向的后果。

这是对党的沉重打击，动摇了党的纪律，动摇了它内部的团结。导致党目前如此分崩离析的党内声名狼藉的各种派别、党员自作主张的政策都是由此而来的。

党的领袖的这种行动导致我们在俄国南方竟无法约请巴·尼·参加志愿军内的工作。对于我们声称必须吸收米留可夫参加的要求，人们回答我们说，这样做不行，因为在他的和党的死敌手中掌握有他的信件的复制件，其中他对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邓尼金吁请他前去志愿军的邀请作出回答。在这些信件中，他坚持亲德的方针，要求解散志愿军。

分散在全国各地，又各自处于不同的条件之下，立宪民主党人未能保持统一。缺乏统一的领导机关，缺少领袖（我们那时知道，巴·尼·下决心采取亲德方针时，解除了自己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的行动和党联系在一起），最后还有，同莫斯科的联系遭到破坏，这一切的影响很快显现出来了。在基辅、

① 诺夫哥罗德采夫，帕·伊·（1866～1924）——法学家、哲学家。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加入社会活动家委员会和右翼中心。

② 尤列涅夫，П.П.——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1918～1919年在敖德萨领导民族中心地方小组。1920年移居国外。主张支持俄国军队。

敖德萨、克里木、叶卡捷琳诺达尔、鄂木斯克、巴黎、伦敦出现了各不相同的策略，各不相同的行动方式。基辅的立宪民主党人把右派组织了起来，建立了国家联合委员会^①，并竭尽全部才能一再论证，只有右派才是国家思想的体现者，而国家思想是必须千方百计地予以拯救的，即使依靠德国人的帮助也在所不惜。而在克里木，立宪民主党人此时则在同社会党人合作下不断奠定民主基础。在叶卡捷琳诺达尔，立宪民主党人给自己提出的目标是，阻止志愿军的庞大臃肿机关过于向右和向反动势力方面倾斜。在敖德萨，则是一面争吵不休，一面既同复兴会又同国家联合委员会进行合作。巴黎一面生闷气，一面要求志愿军显示出民主主义的面孔。伦敦一开始沉默不语，后来又坚决地既支持高尔察克^②又支持志愿军。在鄂木斯克，进行了紧张的工作，发表了许多精彩的宣言，但与此同时在立宪民主党人的宣言和他们的行动之间的不相适应则日益增大。

在个别集团内部也开始出现意见分歧。例如，叶卡捷琳诺达尔的中央委员几天里就至少出现3派。这个集团又同罗斯托夫的地方委员会存在严重冲突。

对于在志愿军中开展工作来说，这些分歧显得十分严重。最近召开的两次代表会议并未能很好地消除分歧。党的统一不断受到破坏。在总的环境的影响下，向右倾斜的趋向日渐增大。许多立宪民主党人看出这种状况不会导致好的结果，而有一些人则以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党得到拯救。与此同时，作为向左靠的支柱，我们只拥有组成为虚幻的复兴会的人数不多的人民社会党人集团，而当时支持

① 俄国国家联合委员会，1918年10月在基辅成立的组织。主席是B.B.美列尔-扎科梅尔斯基，副主席是米留可夫等。持比俄罗斯复兴会和民族中心为右的立场。

② 高尔察克，亚·瓦·（1874～1920）——沙俄海军上将。1918～1919年自称“俄国最高执政者”。1920年被枪决。

军事独裁的立宪民主党人刚刚退出了这个复兴会。依靠向左转力量的企图丧失了基础，因为从社会革命党人方面自督政府^①垮台起就开展了激烈的反对军队的斗争。1919年5月克伦斯基的宣言^②最终给局面定了音。社会革命党人和军队成为相互搏斗的双方。“不要列宁，也不要邓尼金^③”的口号清楚地表明，需要“作出选择”。于是，我们就作出了选择。或者，更准确地说，只不过是认为这个口号是有害于我们所进行的事业的。在这方面，我们无论是同克里木，还是同巴黎，或是同伦敦，都既没有争论也没有分歧。在这个问题上，立宪民主党人的一切分歧都消失了。运动获得全党的赞同和支持。党的大多数成员都全身心地投入这项运动，并给自己同这项运动的联系印上了自己作为苦难圣徒的鲜血。这样的抉择自然从道义上和政治上约束了我们。由此也就产生了我们的所谓“心理状态”。

我们还是选择了同布尔什维克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虽然组织得不好。从左面向我们提出的建议是不要这样做，而是用某种被称作“民主本身”、“人民本身”的不确定的，不定形的东西来取而代之。

迅速行动——这就是任务。只有迅速行动，才能阻止敌对力量的发展，才能阻止组建红军和建立布尔什维克可以用来把这个人民本身和这个“民主本身”压得“服服帖帖”的整个机关。需要解救人民和民主，使他们站立起来，那时才能够由他们建立国家。

这就是目标。而这样的目标是与在莫斯科时作出的规定相符合

① 指乌法督政府（“临时全俄政府”），1918年秋在乌法国务会议上成立，主席是社会革命党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被高尔察克驱散。

② 指得到俄国复兴会支持的克伦斯基声明，其中要求高尔察克提供民主保障，作为对其承认的条件。

③ 邓尼金，安·伊·（1872~1947）——沙俄将军。1918年起先后任“志愿军”司令和“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后流亡国外。

的。

这个目标没有达到。但我们未必因此就认为这样的目标是错误的。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主要的原因在于，国内的瓦解的过程尚未结束，任何一个政权都会遇到斗争和反抗，而国际上的态度对于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不仅仅是不利，常常还是敌对的。

当国家处于这种状况之下，而原先的同盟者又采取这样的态度，即使军队没有它身上的缺点，就算它在同室操戈的条件下能够存在，这样的军队也达不到目的，特别是在南方更是如此，那里的人们为所欲为，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反对任何政权，被各式各样的宣传鼓动搅得混乱不堪，并且处于不断的暴动之中。

而缺点则比比皆是，数不胜数：奸淫、抢劫、布尔布维主义的精神和行动，以及其他等等。不过，历数军队的缺点，不属于我的任务。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斗争时期。如果认为他们那时已经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建设国家，那是错误的。他们只不过是具有一定政治目的的军队，即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国家政策从广义上讲就服从于这种军事政治目的。在他们那时，国家管理机构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与行军指挥机构没有多大的不同。

尽管如此，军队以其存在这一事实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虽然它们和它们的指挥机关存在种种缺点，虽然军队中右翼的布尔什维主义有所发展，对这种作用立宪民主党人中没有任何人有所怀疑，至少迄今为止是这样。

军队以其存在本身表示了对于布尔什维克无耻行径的强烈的、舍生忘死的抗议。

这种抗议是心灵的要求。我们参加了抗议，我们支持我们的孩子和青年中这种抗议的声音，号召他们为此牺牲，为此献身。

我们是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尽管运动遭到失败，我们并没有理

由将它摒弃，因为这就等于自己摒弃自己。从历史上说也好，从心理上说也好，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我就不去说，志愿军保证了协约国有可能进行复员并拯救了欧洲免遭革命烈火的袭击。当听说有人把这个运动一脚踢开，把它与某一位将军的错误同等看待时，真令人感到惊奇。而特别令人感到惊奇的是，某些立宪民主党人的意见竟和法国外交机构的意见“相同”，正是这个法国外交机构在弗兰格尔^①身上输光了自己的赌注，而现在正在我们那些被剥光衣服的人身上抢走他们最后一点财产，也正是这个法国外交机构曾经和萨文柯夫^②一起惨遭失败，后来又在乌克兰和恩诺^③一起丢人现眼，在敖德萨和丹谢尔姆^④及弗雷登堡^⑤一起丧失脸面，后来又因1919年从克里木逃之夭夭和对伊尔库茨克的雅宁^⑥将军的行为予以默许而声名扫地。

对于我们，没有参加弗兰格尔的事业的人，对问题的态度仍和在邓尼金和高尔察克时期一样。

我们的希望所托并不是在弗兰格尔身上，而是在军队身上，只不过是正好把军队收集起来，组织起来，并促使军队继续进行抗议的事业。

① 弗兰格尔，彼·尼·（1878～1928）——沙俄将军。1920年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后流亡国外。

② 1918年春，萨文柯夫制订了成立保卫祖国和自由联盟的计划，其任务是以起义的城市组成莫斯科的包围圈。萨文柯夫想让立宪民主党的民族中心来领导起义。

③ 恩诺是法国驻基辅的副领事。1919年3月被召回法国。

④ 丹谢尔姆，法国将军，敖德萨法国占领军司令。自1919年3月宣布敖德萨戒严后，市当局倒向他一边。

⑤ 指法国上校弗雷登贝尔，丹谢尔姆将军的参谋长。在敖德萨的某些社会政治圈里，把他的姓按照德语发音，读成弗雷登堡，怀疑他的行动中包含德国的阴谋。

⑥ 雅宁，将军，驻西伯利亚军事使团团长。1920年1月同意把高尔察克交给捷克斯洛伐克人。

但是，克里沃舍因^①、萨维奇^②、司徒卢威^③带着他们的反常的口号“用右派的手执行左的政策”，一再要我们坚持克里木的事业，即继续为俄国斗争，继续抗议对俄国施加暴力。

因此，几名立宪民主党人从支持军队转而投奔其死敌社会革命党人，这不能不使其他立宪民主党人深感不安和十分愤慨。曾经和军队一起生活和工作过的那些人甚为愤慨。问题根本不在于反对这种突然转变的抗议是由原先的那些部长们（当然不是现在的部长们）在将军们面前发表的，问题在于突然发出的“立宪民主党人，从左边向后转”的口令完全不合时宜，完全忽视了时局的本质，对于自己的昨天和自己同志的处境缺乏起码的尊重。

就让有的人深深相信以前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并且急不可待地要摆脱渎神的罪人们而洗刷和粉饰自己吧。

但是，这样的出走为什么要选在发生惨祸和灾难的时刻，为什么要彻底打垮军队并宣称必须加以消灭，为什么在它处于悲惨时刻之际不说一句关心、感谢和同情的话语，为什么又要宣布“战败活该”的原则，为什么要抛弃一些罪人的建议接受另一些更严重的罪人的建议？这一切，至今没有得到解释。但是，人们在寻求解释，并且在卑劣不堪的猜想中找到了解释。新的组合符合法国的俄国事务专家的愿望。

我们对过去、对军队、对党的关系，我们同自身生命和我们亲友死亡的联系，所有这一切被称作为“心理状态”，于是找到了一

① 克里沃舍因，亚·瓦·（1857～1921）——沙俄农业大臣。俄国国家联合委员会副主席。反对同各社会主义政党协作。

② 萨维奇，H. B.——十月党人。俄国国家联合委员会常务局委员。参加弗兰格尔政府。

③ 司徒卢威，彼·伯·（1870～1944）——经济学家、哲学家。立宪民主党领袖之一。民族中心理事会成员。1920年任弗兰格尔南俄政府外交部长。

个优雅的名称就心安理得了，并且认为就此也可以对这种心理状态不再予以理会了。

也许这样做是有意识的，是为了在党内引起分裂，把右派抛开？但是，分裂并没有按照预期的路线发生。党并不是分裂为右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而是干脆瓦解了。所谓“新策略”使党受到十分沉重的，也许是致命的打击。那时的打击是很多的。党还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打击，而且还是在它没有了自己的机关的时候。

这一次打击的强烈和致命之处，在于它破坏了党的威望，使它丧失了它所享有的人们对它的信任。

威望丧失殆尽，信誉全完。不能相信它了，它会在最困难的时刻出卖别人。新策略粗暴地破坏了《最近新闻报》一篇社论（第287期，《美国反对布尔什维克》）中宣告的那个真理：“……如果把种种盘算和利益与公共道德的要求结合起来，政治不会丧失什么，而只会有所得。”^①

正是这种“公共道德”遭到了所谓“新策略”的破坏。

那么，它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好处呢？

新策略没有显示出立宪民主党人的面目。取代立宪民主党的意见的，是某一种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大杂烩，而且社会革命党人还宣称，立宪民主党人只不过是附和了他们的意见，立宪会议^②讨论的全过程证实了这一点，当通过社会革命党人的决议时，立宪民主党人表示同意，发表了一些并未被写入决议的保留意见，以“有幸意见一致”为满足。

^① 《最近新闻报》1921年3月21日。《最近新闻报》是立宪民主党机关报，1920—1940年在巴黎出版。

^② 立宪会议成员会议于1921年1月8—21日在巴黎召开。

新策略也没有表达民主俄国的意见，因为刚刚产生的立宪会议中某些人员只是偶然结合在一起，同俄国没有联系，当然拿不出意见来。

它形不成任何联合、任何阵线、任何联合的中心、任何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新的方法，因为喀琅施塔得起义^①、安东诺夫^②、马赫诺^③、农民骚动、工人不满，这一切都不是社会革命党人实行的新的斗争方法，而在这些运动中当然并没有立宪民主党人的位置。一小撮社会革命党人和一小撮立宪民主党人的意见有幸一致并不能保证立宪民主党人返回俄国的政治前台，也不能保证他们进入借以实现尚未结束的革命的遗训的轨道。

新策略不会为欧洲和美国带来任何威信，这 33 个人^④ 没有任何人作为依靠，也不代表任何人。这是法国人临时使用的工具。

最后，对于俄国侨民来说，新策略败坏了党的全部威信。

由于害怕迟误，害怕进入不了轨道和得不到前台上的位置，他们分裂了党，使得同别人的正常协议无法进行，并且试图用自己和党的威信作为代价来为克伦斯基^⑤、切尔诺夫^⑥ 等政治僵尸恢复名

-
- ① 喀琅施塔得起义于 1921 年 2 月 18 日爆发，其口号是“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3 月 18 日被镇压。
- ② 安东诺夫，亚·斯·（1888—1922）——社会革命党人。1920—1921 年领导坦波夫省农民暴动。在逮捕时被击毙。
- ③ 马赫诺，涅·伊·（1889—1934）——无政府主义者。国内战争期间领导南乌克兰暴乱部队。1921 年逃往罗马尼亚。
- ④ 指立宪会议成员会议的 33 名参加者。邀请了 56 人，其中 20 人没有答复，3 人拒绝。
- ⑤ 克伦斯基，亚·费·（1881—1970）——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司法部长、陆海军部长、总理、最高司令。1918 年 6 月到伦敦与同盟国谈判。是立宪会议成员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是其执行委员会委员。
- ⑥ 切尔诺夫，维·米·（1873—1952）——社会革命党领袖和理论家之一，党的中央委员。1917 年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 年 1 月任立宪会议主席。参加在巴黎召开的立宪会议成员会议。

誉。

总之，新策略的成绩等于零。没有任何好处。结果闹出丑闻，使党处于绝境。

怎么办呢？是否设法恢复党和党的威信呢？

最近几个月来，可以看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党像死去的机体的组织腐烂那样腐烂下去。如果我们继续维持我们习惯的做法——公开进行相互谩骂，并称之为可尊敬的辩论，那么我们很快就可以把党彻底打垮。

但是，也许有可能把党重新联合起来，重新提高它的威信。也许有可能经过对新的条件和新的形势作出判断，努力找出新的道路，使大家重新走在一起？并且在这新条件的基础上制订出“最新的策略”？如果从本质上看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如果有承认自己的错误、愿意相互接近的真诚愿望，以及如果能够找到自我，那么，这一切是可能的。

新的策略曾经向我们允诺说，要把党的真实面貌展现出来。但是，必须承认，这个面貌并没有得到展示。相反，它却完全消失了。

而和以前一样，这样一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党在哪里？自称为立宪民主党的这些人究竟是什么人？

是什么造成立宪民主党人的分裂，仅仅是策略上的口号和行动不同，还是见解上有本质的区别？

一些人力图“摆脱过时的人”，同自己的过去决裂，而为了巩固这种变更，希望同社会革命党人实行联合，认为只有留在议会进步同盟^①之外的左翼派别才是真正的民族联合。另一些人则认为，

^① 进步同盟，成立于1915年夏，联合了第四届国家杜马多数温和的右翼和自由主义党团以及国务委员会中的三派。同盟常务局主席是十月党人谢·伊·施德洛夫斯基，但实际领导人是米留可夫。

只有右派是国家观念的体现者，而且只有他们有能力建立政权，应当在同他们的接触中寻求恢复国家和政权的途径。最后，第三种人认为，右派也好，社会党人也好，都无法建立法制的国家秩序，而无论是右翼复辟派，还是没有生气没有民族特点、并且在相当程度上信誉扫地的左翼社会主义派，对于未来的原始民主主义的农民资产阶级制度都是敌对的和危险的。而且，即使布尔什维克开始交出他们的社会主义阵地，立宪民主党人也没有任何根据凭借自己的威信为社会主义者平反，支持社会革命党人，从政治上为他们大力效劳。立宪民主党人应当加强自己的民主阵地，并仍然充当自由主义思想的正义信使。

一些人认为，为了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必须组成一个共同的、广泛的民族阵线和采取共同的协调一致的行动。另一些人说，共同阵线是根本不需要的，需要的是民主阵线，而且要用社会党人取代民主派，拒绝共同联合，增强混乱和分歧，抵制他人寻找协商一致基础的努力。

一些人认为，作为同布尔什维克斗争的方法之一，有组织的武装斗争是必不可少的，也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的有准备的干涉，而另一些人则宣布：“不许干预俄国事务”，但同时却忍受着其卑劣程度和结果都无比严重的干涉，并且把希望寄托在某种神秘的所谓“人民自己”斗争的新方法上，等待着摆脱农民的暴动、罢工和无组织的起义。

一些人认为，道义上的责任和国家的利益要求在军队处于最悲惨的时刻给予支持，应当齐心协力地争取达到这个目的，而另一些人则说，不会让将军们的军队进入俄国的，于是用自己的行动来协助消灭这支军队，并且从道义上为法国人这样做进行论证。

一些人认为，在俄国军队的残余被消灭之后就会呈现出实现新策略的广阔余地，而另一些的看法则是，随着俄国军队的被消灭，

必然是俄国反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机构也被消灭，那时取胜的将不是新策略，而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

一些人力图登上政治前台，拼命奔向虚幻的政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布尔什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时期，前台上没有作为法制国家，也即个人在国家中的价值体现者的立宪民主党人的位置。

一些人主张保持党的完整，并巩固党的威信，而另一些人则通过加强党的权力机构，违背大多数有组织的党的集团的意见，对党进行强暴控制，并且实行一种与党格格不入的策略，有意识地摧毁党。第三种人则宣称，必须建立统一的民族的民主党。

从以上大体列举的，并且还可以继续加以补充的矛盾和分歧可以看出，已经出现语言交错和思想混乱。看来，许多令人愤慨的分歧涉及由一些暂时的和变动中的条件所决定的行动，有的则可能是因一些不难消除的误会所造成的。因此，就目前而言，涉及干涉，涉及用过去采用的方法进行武装斗争的一切假设都可消除。但是，有一些分歧根源较深。

这里提出的问题不是选择左的还是右的方向，不是把绿色改染为红色还是黑色，而是涉及对待社会主义的态度，对待我们的政治信仰的基本原则——即在民主法制国家中的个人价值的思想的态度。

突然向左转的行动证明，这不仅仅是方针的改变，而是掩藏着对社会主义的态度的改变。《最近新闻报》在一篇社论中说社会主义派别其实是民族派别，这种说法绝非偶然。在民主战线出现社会党人并不是平白无故的。立宪民主党人为身败名裂的社会党人平反也绝非偶然。这样的转变并非属于两个相互平等的，正在磋商的双方为了达成共同目标而从技术上协商的性质，而呈现出一种由某些立宪民主党人对以社会革命党人为代表的社会党人暗地里进行支持的图景。

但是，能否认真地说和认为，俄国将真的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它的命运将真的操在社会党人手中呢？能否认真地说，农民的王国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呢？如果在布尔什维克之后社会党人果然能够维持一个时期，那么俄国当然永远也不会是社会主义国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政纲中加入了非社会主义的因素。立宪民主党人何必要跟在社会党人后面亦步亦趋？而社会党人将继续幻想着社会主义王国并为之而奔忙，继续鼓吹阶级斗争，何必要死缠着和他们联合，而不是利用形势，准备给他们一个决定性的打击？

把自己的命运同挥霍光自己的信誉后又 在俄国被布尔什维克打翻在地的社会党人连结在一起，是不能容许的，如同不能容许把自己的未来同右派连结在一起一样。

除了右派的黑色百人团和萎靡不振的社会主义以外，有一个阵地一直为立宪民主党所占领而如今却被他们放弃了，这就是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的真正民主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思想。除了在跟谁一起前进和谁掌握着复兴俄国的奥秘这类问题上进行辩论和争吵之外，必须开始构建国家和安排人民生活方面的完全现实的工作，以免在布尔什维克垮台时不至于像在革命时期发生的那样陷入措手不及的状态。

立宪民主党人必须回到这个阵地上去，并同他们缔结同盟，签署协议，进行协商和联合。

迄今为止，没有为返回自己的“家”做任何事情。领袖们一头冲向左方，却没有保证党保留自己的阵地，忘记了立宪民主党人的位置在中央，在右派和左派中间。党并没有跟着他们走。他们脱离了党，而党也失去了自己的领导人。

如果党是需要的，那么，就应当达成一致，停止自作主张的行动，形成共同的意见，不再让党忽左忽右地摇摆，使个别人的行动服从总的计划，加强纪律，要求每一个党员对自己的行动负起责

任，不是含糊不清地，而是切切实实地负起责任。党有权处于一种自主而独立的位置，而不是不停地来回摆动——从同盟国一边转向德国人一边，再从德国人转向法国人，从右翼黑色百人团、官员、官僚和工厂主转向社会党人，从俄国军队的将军转向支持社会主义的将军。

如果分歧从实质上还没有把党分裂到无法挽回的地步，似乎还可以试一试恢复党的统一。形势和条件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 社会革命党人不愿意同立宪民主党人联合，而是想在俄国建立一个采用社会革命党土地制度的社会主义王国。

(2) 看来新策略现在已经远远不是立宪会议处于极盛时期的那个样子了。那时谈论过前线、民族委员会，有的人还描绘了必须从那些不会掌权的人手中把政权机关夺过来的图景。如今，新策略要简单得多。已经不谈联合，不谈前线，不谈政权，谈的只是自己的阵地（见《最近新闻报》所载《向右还是向左》一文）。^①

(3) 军队正在被取消，而且正在转入一种它所不具有的新的状态。这个行动是用一种对我们有侮辱性的方法实现的。只有发生全欧洲性的事件，如果这种事件发生的话，才有可能恢复这支军队。我们感到不幸的是，军队是在立宪民主党人的协助下被消灭的。一些人说，人们支持军队及其总司令，而又不善于捍卫保留军队的主张，这就置军队于死地了。另一些人认为，军队是被出卖了，出卖给了社会革命党人和那些寻求与贝特洛^②和其他法国外交官的意见有幸一致的人们。

(4) 最后，目前总司令为了把自己称作是继承的、俄国的、国

^① 《最近新闻报》1921年5月3日。

^② 贝特洛——法国将军，罗马尼亚和俄国南部法军司令。主张西南反布尔什维克力量统一指挥，由法国人掌握。1919年3月解职。

家的政权而穿上的政治服装已失去了实际的内容。

以上就是形势和条件的实际变化。引起分歧的理由，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没有完全消失的话，那么也是发生了质的变化。看来，如同以往一样，剩下的只有“心理状态”了。可以尝试制订最新的策略了。

但是，为此必须承认，“新策略”是个别人的意见和行为，而不是党的意见，并没有使党承担任何义务。

如果在当前侨居的条件下，在既没有国家形态又全面解体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内部无法找到达成协商一致和恢复党的基础，如果自由主义思想对于目前所处的粗暴的革命和无政府主义时期过于柔弱，那确实应当把党“收缩”以等待将来更加有利的时机，而党员则可以根据自己的看法发表意见和采取行动，但是无论如何必须遵守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些行动和言论不能够同党的名字联系起来，发表意见的个别个人必须说明他的行动并不代表党。

实质上这样做就等于确认了目前党的实际状况，换句话说，也就是确认党实际上已经取消。

在作出这样一个把党置于死地的决定之前，必须弄清党员们的意见。

在目前情况下想要召开代表会议是不可能的。即使召集中央委员开会，也会有许多人因为没有钱而无法前来。因此只剩下一条路，就是向中央委员和由立宪民主党人组织起来的小组发出通告，陈述5月10~26日中央委员会议^①的情况，并建议他们回答若干问题，问题由这次会议随后拟出。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应能获悉现在国外的立宪民主党党员们的意见。党员应当服从这个意见，并据

^① 1921年5月10日的会议具有预备性质。会上讨论了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议的成员、会议的性质以及会期问题。

以协调自己的行动。

今后任何背离党的总策略的重大行动也必须用这种方式加以审查。

在辩论过程中将会提出各种建议。现在我自己认为，主张在军队从克里木撤出以后的最艰难的时刻中止对军队的支持并力求在1917年立宪会议成员开会的人为的基础上同社会革命党人联合的意见，只是个别人的意见和行动，只得到一个立宪民主党人小组（巴黎小组）的赞同，无论如何不能算作为立宪民主党的意见和行动，因为其他地方小组（君士坦丁堡小组，柏林小组，贝尔格莱德小组，索菲亚小组）对于这些问题表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

帕·德·多尔戈鲁科夫不完全同意尼·伊·阿斯特罗夫的纲要，他认为，党内的分歧虽然目前很深，但只不过是策略问题上的，而不是在原则问题上，党仍然像1918年一样存在着，甚至比其他党（社会革命党、十月党等）保存得更好，而那些党已经溃不成军了。党的统一不仅存在于莫斯科，而且已经在叶卡捷琳诺达尔的代表会议^①上恢复（在某些党员出现亲德国的取向以后）。虽然有某些差别，但各地在策略路线上是统一的，在鄂木斯克^②和叶卡捷琳诺达尔^③的两个代表大会上不约而同地通过了相似的决议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现在找到合力的希望当然要少一些，但是这样的愿望却很强烈。即使现在找不到这种合力，那也不算太糟糕，不必千方百计地寻找这种合力，因为不应当人为地掩盖分歧，而这样做反到必然会导致党不光彩地灭亡。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在党内让策略上不

① 指1918年10月28~31日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召开的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

② 指人民自由党的西伯利亚代表会议，由其中央委员会的东方部组织。会议于1919年5月20~21日在鄂木斯克举行。

③ 1919年6月29~30日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召开了立宪民主党东南代表会议。

同的两个派别都存在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能恢复党的统一。何况分裂本身是被严重地夸大了，原因在于巴·尼·米留可夫在党内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巴黎曾表示支持新策略。事实上并没有发生分裂，只不过是巴黎小组脱离了党。

巴·尼·米留可夫把详细反驳尼·伊·阿斯特罗夫的纲要的论点留到以后，即下一次开会时再谈，在这一次会议上仅限于陈述自己的总的观点。首先指出，在反对新策略的人们中存在两种情绪：一种表现在今天宣读的君士坦丁堡小组的纲要中，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小组如此迅速地向新策略方面演变，并认为以这个纲要为基础，用它作为出发点可以交谈，并且可以尝试按照它所表达的各点建立党的统一；另一种则在尼·伊·阿斯特罗夫的纲要中反映了出来，从他这样的情绪出发就无法希望达成和解。但是，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小组的纲要中有一项建议——在国外建立新的党的正式机关——，如同尼·伊·的征询意见还必须作出决定的建议一样，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如果由国外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不被承认，那就是说现在在国外没有有权威的党的机关，用一个代用品取代它并且必须接受，这是不行的。接着，巴·尼·声称，只要帕·德·多尔戈鲁科夫仍然留在俄罗斯委员会^①上，并且像在今天所说的那样看待他，那他就不能同多尔戈鲁科走到一起。至于民族代表大会^②，那么，在他看来，参加会议就是导致分裂的真实导火线，因为这已经不是像立宪

① 俄罗斯委员会——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军事政治中心，主席为弗兰格尔。它在支持俄军队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1922年解散，改组成纯技术性的财政监督机关。

② 全名为俄罗斯民族联合代表大会，1921年6月5~12日在巴黎召开。大会的任务是“集中俄罗斯难民的政治智慧去同布尔什维克斗争”。行动纲领的基本原则是：放弃复辟的企图，争取“民主的人民政权”。

会议执行委员会^①那样的联合，（如果形势需要，从那里退出是轻而易举的），而已是某种不定形的机关——已经是形成新的政治集团，并且还是右翼集团。因此，不能在同一时间既关心保持党的存在，又去建立此类联合——但是是以联合的形式出现的。这无疑将是一个右翼集团——它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有益的，因为离开我们这些代表真正立宪民主精神的人的是右派分子。发生这些事实（它们的数量还在增加），无可挽回地把我们分开来并推向不同的方向。在这里报纸上的辩论受到指责，但是报纸上的辩论是生命——政治意义上的生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使正在发生的一切定形并得到思考。简单的策略步骤，正如君士坦丁堡小组最近的纲要所表明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变化着，但是，通过同《舵报》^②的争论，我们找到了我们分歧的根源。而这份报纸使我甚感惊异的是，它竟然并没有真正的立宪民主主义。同它的辩论揭示了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深层的内容。而这并非偶然，因为俄国本身正在出现极其深刻的过程。《舵报》和尼·伊·阿斯特罗夫纲要中关于俄国发生的事件的提法表明，人们不理解革命和俄国所发生的事。没用的一时的事实和暂时的组合消失了，但沿路可以发现对于在人群深处发生的事件的评价存在极大的差别。这是南方事件之后的第二次考验，把一些人同我们分开了，而在南方第一种人已经分了出去。我们所做的，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是高于党的。像尼·伊·建议的那样仅仅是站在党的道德的观点上，那就意味着，并没有站在时代的水平上……

① 在立宪会议成员会议上选出了协调委员会，委员会具有执行职能，其中之一是准备成立一个民主机关。以后委员会被叫做执行委员会。

② 《舵报》，日报，实际上是柏林立宪民主党小组的机关报，1920~1931年出版。

No04017

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会议

第 3 号记录摘抄

(1921 年 5 月 28 日)

巴黎

1. 选举姆·斯·阿杰莫夫为本次会议主席。
2. 继续就党的策略问题进行辩论。

巴·尼·米留可夫继续上次会议上的发言。他首先指出，新策略并不是他米留可夫的，而是还在他来到以前由整个巴黎委员会在会议上拟订，并经巴黎小组后来表示赞同的。然后，他对尼·伊·阿斯特罗夫的发言按其顺序进行了详尽的反驳。在纲要一开始简略地提到革命和党对革命的投入的那一段，就显现出分歧的实质性要点。“它坚强地接纳了革命”这一句话似乎是对革命采取一种防御的姿态，而这正是反对新策略的人们的典型表现，弗·德·纳波柯夫在《舵报》上就明确无疑地这样说过。但是，我们（也就是党）在革命中起着有机的作用。《新时报》^① 直接把革命强加于我们，说是我们招致革命，这并非偶然。而从他的观点看，确实是我们招致革命，并且要对发生革命承担责任。这个责任我们决不摆脱，而我们对革命的态度也许因此而变得肯定。不过我们也确实积极地参加了革命，因为，除了对社会党人的“妥协性政策”进行抵制外，我们

^① 《新时报》——周报。1868 年创刊，1917 年被布尔什维克查封。1921 年 4 月在贝尔格莱德复刊，有君主色彩。

也同他们进行了联合。我曾经一度反对这样做，但是我们也好，他们也好，都不由自主地走向联合，因为联合是革命的基本特点。如果从《俄罗斯意志》^①来看，现在社会党人对联合采取了否定的态度，但联合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联合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民主的组合，这种组合不言而喻也应当是资产阶级的。没有社会党人，这种组合就会过于狭隘。尼·伊·说的看来是指社会党人对布尔什维克的妥协政策，但他们对待我们也是这样的，而且为此，为了同我们联合，他们也受到损失，丧失了自己在居民群众中的影响。

在这里按着事件的顺序我也谈一谈尼·伊·在自己的纲要中没有涉及到的事情，这就是科尔尼洛夫举行政变的企图，我们是有意识地加以配合的。那时将军运动的负面特点刚刚开始显露出来：正是他周围的人们、军队和居民对他的态度那时害苦了科尔尼洛夫；但直到以后的斗争阶段才为了解他当时遭到惨败的原因提供了线索。

然后回到尼·伊·的纲要和他指出的由1918年5月代表会议确定的党在布尔什维克统治条件下策略的基本要点，他认为必须指出，几乎所有这些基本要点在生活本身的发展过程中都已被推翻。其中迄今为止完全保留下来的只有一条：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至于谈到同德国人作斗争和效忠于同盟国，那么前一条已经自行消失，而效忠于同盟国这一条，在它们犯有严重错误（尼·伊·自己也历数了这些错误）的情况下，不难理解，不可能仍然保持原样不变，自然而然必须有所变动。在这里我要顺便指出，我当时寄给中央委员会的私人信件，显然转给了同盟国，因为后来它在所有同盟国家的代表团里和报纸上都出现了，为此中央委员会有负于我。

^① 《俄罗斯意志》——右派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1920~1921年在布拉格出版。

然后转入尼·伊·提到的我们策略的下一个基本要点，即关于强有力的独裁政权，我现在应当承认，左派在雅西会议^①上反对这一点是正确的，而我们错了，虽然当时我自己也激烈地维护这一条。正是在这一时刻，发生了我们同左派的决裂，而在此之前我们同他们一直处于联合之中，而我们那时主张由总司令掌管地方政权，正如后来看到的那样，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错误。也许，如果当时我们采取另一种做法，我们也会同左派一起分出去的，这对我们只会有好处，因为这种“权力的合并”是整个南方政策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原先策略的下一个基本特点，是“否定分立主义思想”。我自己很长时间一直站在否定的立场之上，但是甚至在放弃专政之前已经放弃了这一立场，早就主张联邦了，因为“不可分割的统一的俄国”的口号断送了我们。还在当时，在一封给尼·伊·的信中我就说过必须用联邦的口号来取代它。这个口号好像在弗兰格尔时期已经被接受，但是直到现在索非亚小组仍然反对这个口号。至于策略的下一个要点，即反对恢复1918年的立宪会议，那是完全正确的，我完全同意。

1918年5月代表会议确定的所有其他各点，都被生活所彻底否定。我们称之为“尼·尼·舍普金遗嘱”^②的东西也证明了我

① 雅西会议于1918年11月召开，会议讨论了盟国给予俄反布尔什维克力量以援助的可能问题。出席的有三个政治组织的代表：俄国国家联合委员会、民族中心和俄国复兴会，还有盟国的代表：法国、英国、美国和意大利。会议提出几项要求：统一指挥，承认志愿军是俄军事联合的核心，盟国立即给予南俄武装力量以援助。

② 舍普金，尼·尼·（1854~1919）——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是右翼中心和俄罗斯复兴会的成员，协调两者的活动。后加入民族中心，领导莫斯科分部。1919年8月底被捕前，他向本党同志通报了因条件改变莫斯科的立宪民主党人的方针在左倾化、先前的国内制度设想已经过时。

这方面是正确的。遗嘱的内容安·弗·卡尔塔舍夫曾向我们作过介绍。

安·弗·卡尔塔舍夫应与会人员的请求根据回忆提供了这份“遗嘱”的内容，他介绍说，1919年8月，即尼·尼·舍普金被捕和随后枪决之前，会见了于当年12月份从苏维埃俄国逃出来的一个人，请他转告党内同志说，莫斯科和整个苏维埃的情绪在急剧向左转。因此，当时在莫斯科制订的民族中心关于国民教育、法院、婚姻法、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劳资关系等方案都已大大过时，而关于土地问题的方案则完全过时了。然后，尼·尼·还请求转告，他和其他立宪民主党人在莫斯科同“统一”^①派小组的成员们和社会革命党人（个人）一起工作，后者的作用正在减弱，因为在土地问题上生活已经走在其前面，他们仍然主张专政。

巴·尼·米留可夫解释说，在尼·尼·舍普金的这份“遗嘱”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在他看来，恰恰是指出了在1919年那时生活已经远远地向左转了。接着回过来谈阿斯特罗夫的纲要，巴·尼·谈到了其中包含的对个别党小组行动的批评，认为批评中针对基辅小组所使用的名词，即说这个小组“为盖特曼之流效劳”而不是为俄国服务的说法过于主观，而他本人则责怪叶卡捷琳诺达尔小组和基辅小组对于党的其他小组过于不能容忍。例如，在叶卡捷琳诺达尔代表大会上人员良莠不齐，上述其他一些小组的策略遭到断然的否决。而实际上，所有其他小组当时奉行的策略却是既符合各地情况，又符合俄国利益的。

我个人的立场，用尼·伊·的话说，那时，根据我给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信，被描绘成是要求解散志愿军。给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几

^① “统一”派是孟什维克护国派的组织。1914年产生，1917年3月8日最终成立。出版同名的报纸。

封信，不久前开始在《新时报》^①上刊载，即使这本杂志不把它们登完，我也要自己设法做到这一点，既然它们已经不是由于我的过错而落到了新闻界手里。在那几封信中，确实提出了要作出二者择一的选择：或者解散军队，或者把军队交由顿河政府供养，我写道，因为，期望从莫斯科提供几百万元的款项显然是得不到了。不过我本人当时主张后一个方案，而不是解散军队。

尼·伊·接着提到我放弃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职责的事。我当时在南方确实放弃了这个称号，但不久前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在这里对我说，我的这项声明当时并未被接受。现在既然尼·伊·提到这个问题，我请求再次予以明确。

尼·伊·接着说，“在基辅，立宪民主党人把右派组织了起来，并建立了国家联合会。”确实如此，我们在基辅参加了国家杜马议员的联合会，随后又参加了国家联合会的理事会，不过基辅的这次体验恰恰促使我现在对于这样一类组合，包括议会委员会^②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因为当时一开始国家杜马议员联合会掌握在我们手中，后来头一批百人离去，并形成这样一种局势：几乎通过普里什凯维奇^③关于建立绝对君主制国家的提法。在基辅，我们确实在当时亲德国取向的基础上和右派友好相处。

关于尼·伊·对伦敦、巴黎、克里木、鄂木斯克等地党的小组，

① 在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始之前，《新时报》刊载了米留可夫的两封信和阿列克谢耶夫的回信。此后还发表了米留可夫的两封信和志愿军司令的回信。米留可夫证明，为了恢复国家，必须同德国人谈判，接受他们的支持，只是要争取有利的合作条件。

② 议会委员会成立于巴黎，其成员为原国家杜马代表和选出的国务会议成员。在君士坦丁堡和柏林也有类似的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通报俄国内状况，发展同国外各组织的合作。委员会认为必须继续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斗争，号召保存从克里木撤出的军队。

③ 普里什凯维奇，弗·米·（1870～1920）——极右君主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首领之一，十月革命后领导一些反布尔什维克组织。

以及对于叶卡捷琳诺达尔小组及其3个派别的评论，我不准备现在在这里详谈，而只想说明，那一段时间内向右倾的趋向确实有所增强。伊·伊·彼得龙凯维奇^①抨击过的叶卡捷琳诺达尔决议，我还曾加以维护；但是，就是哈尔科夫代表大会^②及其著名的决议和中央委员会罗斯托夫分部的活动都已大大地右倾，以至于当时已不代表党内的中间派。更不用说索科洛夫^③领导的，阿·弗·梯尔柯娃也参加的臭名昭著的“奥斯瓦加”通讯社^④的活动了，但是就是我们在邓尼金政府中的同志们的整个活动（按照索科洛夫描述这个时期的那本书^⑤的说法，他们只不过是提供了立宪民主党的招牌，并没有纠正右倾的势头），——也要求作出认真的解释。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也就不会有过分的左倾作为对右倾的自然的反应。后面这一点当时十分强大，以至于所有左的表现都从地平线上消失了，因为能够存在的只有官方的右派报刊或者与之相近的报刊，而左派团体的任何活动都没有可能进行。正是由于这一切，居民对于解放者产生了疏远的情绪和否定的态度。如果我们的同志当时表现得更加独立，而且也没有丧失党的面貌，那么他们本来是有可能施加自己的影响的。在南方，从整体上说党没有采取行动，只有个别人除外，因为没有人问过我们大家在那里干了些什么，虽然我曾试图就此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现在的策略也不是突然出现的新的东

① 彼得龙凯维奇，伊·伊·（1843～1928）——地方自治人士，法学家。立宪民主党终身中央委员，名誉主席。十月革命后住在克里木，后移居法国。反对党内右倾。

② 立宪民主党哈尔科夫会议于1919年11月3～5日召开。会议决议表示完全支持“民族专政”，支持立即实施新的土地法，反对复辟的企图，反对联邦制思潮。

③ 索科洛夫，K.H.——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教授。在俄国南方领导民族中心。支持邓尼金执政。

④ “奥斯瓦加”通讯社——邓尼金的主要宣传机关。其任务还包含收集政党、组织以及个人的情报信息。成立于1918年8月。

⑤ 指索科洛夫的书《邓尼金将军的统治（回忆录）》，索非亚1921年版。

西，而只不过是很久才传到我们那里的种种事实积累的结果。早在邓尼金时期中期在俄国已人所共知的事，直到邓尼金时期的晚期才传到我们那里。

尼·伊·说：“目的没有达到，但它们并不就是错误的”，但是，在我看来，目的之所以没有达到，正是因为它们是不正确的，如果目的指的是策略，而不是解放俄国本身的话。

尼·伊·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分化的过程尚未结束。”但是，事实上，如果居民宁要布尔什维克而不要志愿军，那么其原因并不在于分化过程如何，而在于志愿军不懂得居民的利益所在。要知道，早在邓尼金覆灭的几个月以前，鲍加耶夫斯基^①上校就曾预言，按志愿军对待居民的态度看，覆灭必不可免。

同盟国的态度——缺少它们的援助，确实妨碍了迅速把俄国从布尔什维克手中解救出来。如果它们的援助能及时来到，那么目的很可能会达到，也就是说，解救俄国就会通过建立白色战线的方式加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就会出现保守主义的复辟，尽管我们当时设想的不是这样。我们设想的是，革命的残余会保存下来。直到后来，军队中反动分子结集，而自由派人士则纷纷被赶走或者陷入无法忍受的境地，上述希望才开始消失。但是，由于我并不畏惧政治上的反动，认为它只是暂时存在，而且当时还相信有可能采用军事解放的办法，相信迎难而上有可能取得成功，于是我仍然下狠心支持这一斗争，或者，当发生如同在南方发生过的那种情况，而使支持斗争已经变得过分困难时，保持沉默。我当时曾对尼·伊·说：“前去罗斯托夫对我十分艰巨。”但是，我感到自己对于我们过去的思想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因而加以捍卫。

^① 鲍加耶夫斯基，米·彼·（1881~1918）——在顿河统领克拉斯诺夫手下任办公厅主任，克拉斯诺夫下台后于1919年2月5日当选为其接班人。

但是，最后，这一时刻到来了：在克里木灾难之后，我毫无疑问地看出，甚至军事解放也无济于事，因为原来俄国不可能违反人民的意志而获得解救。我于是懂得了，人民具有自己的意志，能够选择他们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尽管这种选择是以消极抵抗的形式加以表达的。一个不久前从彼得格勒来的人对我说：“对他而言，社会革命党人是自己人，而立宪民主党人不是。”人民的这种心理和我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军人的联合，应当予以摧毁，虽然必须经历长期的工作过程。

与尼·伊·的设想相反，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的政策，并不是纯军事的，而是力求进行“国家建设”，哪怕是口头上的：有政府各部，有民事机关。而我们立宪民主党人本可以对他们的政策施加影响的，然而没有这样做。尼·伊·自己不出任内务部长，却想出了两个不称职的候选人（切贝绍夫^①和诺索维奇），他们两个则推出了一套必然要导致失败的政策。这期间，那里有立宪民主党人，也做了点什么，他们应当向党作出交待。

在一定时间之前，我为尼·伊·说到的那个要我们的儿童和青年加入军队的呼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但后来应当停止这种呼吁了。当我还相信斗争会取得胜利的时候，我能容忍其道义上的残酷性，容忍杀人甚至残酷屠杀的心理，容忍大规模杀戮；但是当我对这些丧失了任何希望的时候，我无法再为俄罗斯人的鲜血在 frontline 两边流洒而辩解。现在人们又在呼吁拯救作为军队的军队，但是，既然旧的斗争方式已不能奏效，为什么要这样做？

尼·伊·说：“军队拯救了欧洲使它免遭革命烈火的侵袭。”这是一种对于我们的自尊而言十分愉快的幻想，但是这是不正确的，我

^① 切贝绍夫，H.H.——邓尼金统治叶卡捷琳诺达尔期间领导内务部。后由诺索维奇接任。移居君士坦丁堡。

们也没有这样想过。事实上，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只会由于同布尔什维克在战场上的斗争增大。布尔什维克为了同军队相对抗，建立了自己的红军，并在同白军及其同外国人的联盟的战斗中巩固了红军，因为红军的爱国主义苏醒了。这就是新策略中对武装干涉持否定态度的原因，关于干涉在1919年是可以谈的，到1920年谈已经于事无补了，到1921年说简直就不道德了，因为现在从心理上说干涉是不可能进行了。

有人说，立宪会议的33名成员——我们也就在其中——是法国的工具，但对此甚至在同同志中间也难以回答。

接着又批评我们“投奔社会革命党人”，但首先这并不是“投奔”，而是我们逐渐接近的一种成果，它来得甚至有些太晚了。虽然并没有“指令”，也没有强制党这样去做，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将来而拯救党的惟一方法。在克里木撤退以后，出现了政治上的真空，应当加以填补，而我们选择的道路是同布尔什维克继续进行斗争的惟一方法。我们认为，如果布尔什维主义只有靠原先的斗争方法来巩固自己，那么，只有随着这些实验的终止，俄国内部积累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抗议才会爆发出来。这是我们预言过的，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最近的事态所证实。因为喀琅施塔得起义就是这种内部抗议的表现：作为这种抗议的表现的蒸汽，只有当作为原先斗争形式的盖子被拿掉以后，才会喷发而出。可以理解，现在鲜血在流，将来也还会流，但是采用旧的斗争方法时，血是徒劳无益地流掉了。喀琅施塔得起义可惜发生得过早，但是目前在俄国内部，也包括在西伯利亚，所发生的一切，就是我们的预言的实现和证明。正是中止了外来的危险，才加强了内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并使得同国外的联系有了可能。谁坐在君士坦丁堡，坐在俄罗斯会议中，谁就不会来俄国，因为喀琅施塔得事件证明，俄国不接受某些势力。必须清除掉那些老的著名的分子，他们现在只是已经

使用过的废蒸汽，因为如果他们认为自己还有用处，那是危险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同老的事物划清界线做得确实十分生硬粗暴，而且毫不隐讳。现在已经做到了这样一点，即新策略尽管一开始令人反感，但现在已经使人愿意接受，哪怕君士坦丁堡小组逐渐向它那一方演变的事实也足以说明这一点，如果从这个小组的纲要来判断的话。新策略的这种吸引力说明它是正确的。

时间正好选择在灾祸发生之时，这是因为正是这个时机使转向新策略必不可免，因为在此之后向新策略转变已经不能再拖了。

尼·伊·说：“本不该把军队彻底打倒。”但这样讲是不公正的，因为实际上并没有过这种事情，而且即使我们因未曾及时向军队说些同情的话而有过错的话，那这也不是反对新策略的理由。

随后纲要指出，“新策略也许使党遭受到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个打击“使党丧失了威信，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违背了“公共道德”。但是，一般说来根本不能向政党提出这样的指责，因为任何政党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同政党的本质相矛盾的。还有，到底是谁丧失了威信呢？在南方，党确实在居民眼中大大丧失了威望，而现在我们为了将来正在挽回群众的信任和党的威望。如果有什么方法能维持广大居民群众对党的信任的话，那就是走我们现在的路。

接下去，又对我们说，我们把自己同社会革命党人捆到一起，“没有显示出立宪民主党人的面貌”，“产生的只是某种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大杂烩”，我们只不过在立宪会议成员的会议上“附和了社会革命党的决议”，而这种联合“并不能保证立宪民主党人返回俄国”，总之，新策略根本没有带来任何好处。对于所有这一切，我的回答是，我们的新策略，正如现在所有人都已应清楚的那样，是独立存在的，与我们是否同社会革命党人合作无关。我们同他们合作正是因为我们有了新策略，而不是相反。新策略使我们打开了同民主主义党派实行合作的道路，而关闭了同右派合作

的道路。重要的完全不在于我们来到了哪里，而在于我们从哪里走了出来。同左派的组合也许不会形成——这取决于左派——但是，我们的道路仍然是这一条，这样我们将只是暂时被孤立，因为我们不愿意再和右派走在一起了。未来将对这些新策略的拥护者和反对者作出评判，会表明谁对谁错。我们深信，同右派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盟友，如 K. H. 索科洛夫等人分手，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我再也不能够跟他们走在一起了。

尼·伊·随后转入有关如何克服党内积累的分歧和矛盾的问题。其中有许多确实是可以克服的，而且生活本身已经克服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可惜的是有一部分分歧更加深刻一些，例如：（1）对于俄国革命的不同认识；（2）对于人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的不同认识；（3）对于人民在革命中的意愿的不同态度；（4）对于民主概念的不同理解。尼·伊·站在自由派对这一切的认识一边，而对社会党人采取否定态度。而我对他们作为一个政党并不否定，在我看来，同社会主义作斗争是可以的和应当的。但是，认为社会党人作为一个政党在俄国已经彻底名誉扫地并将从俄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则是错误的。其中一些人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家，他们还将长期这样存在下去；另一些人则是农业社会党人，将来必然会有演变，无论是他们还是将接替他们的人，都是一样。而同社会党人，特别是同后一类社会党人，我们必不可免地要和他们走在一起，因为我们总不能和地主及舒利金^①一起去农村。即使我们要组织自己的农民党，那也不能采用原先在南方的做法，因为那样无法进入农村。据从俄国来的人证实，在那里是这样讲的：“立宪民主党人不是自己人，而社会党人是。如今如此断然地与社会革命党人划清界限，如同尼·

^① 舒利金，瓦·维·（1878—1976）——君主派分子。志愿军的组织者之一。流亡国外期间是弗兰格尔将军属下的俄罗斯委员会成员。

伊·所做的那样，就意味着必不可免地要向右滑，而我奉劝不要去那个方向。因为俄国已不会再回到原先的“旧的立场”上去了，而我们应当看一看，俄国现在需要什么，阿·德·哥利岑^①是自由派，但并不是我们的盟友，因为俄国再也不需要这些人了。

在批驳新策略时，尼·伊·说，需要一种“最新的策略”，因为生活起了种种变化。第一，“社会革命党人不想和立宪民主党人实行联合”，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毕竟已经并且现在仍跟我走在一起。

第二，我们开始谦虚一些了，“已经既不谈联合，不谈前线，也不谈政权了”。但是，我们从来不想要政权，或把自己变成政权机关，而是相反，千方百计力图摆脱政权；关于前线我们仍然继续在谈，关于联合也是一样，而且甚至实际正在这么做。

第三，“军队正在被取消，而且正在转入一种新的状态。”这一点，正是这样。

最后，第四，“总司令给自己穿的政治服装”正在消亡，因为“正在丧失实际内容”。这一点，也是正确的。

由此可见，把我们分开的某些事实确实正在消失，而且看来很快就将完全不再存在。但是，我们未必会从这一点再向前走下去，因为原则性的分歧毕竟仍然存在：我们不会离开自己的立场，帕·德·多尔戈鲁科夫不会离开“俄罗斯会议”，而别的人也不会离开“布尔采夫的民族代表大会”，因此矛盾不会消失。一般说来，与柏林、索非亚和伦敦几个小组接近将来也未必就有可能，但与此同时却不排除和君士坦丁堡小组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它最近一次纲要中有了达成一致的基础，因为这个小组的原则立场正在与我们的立

^① 哥利岑，阿·德·——俄国国家联合委员会成员。流亡国外期间，是在贝尔格莱德的非党联盟常务局成员。

场靠拢。我也对君士坦丁堡抱有希望，即有可能今后我们会同它走得十分靠近。

最终分手，也即党内的正式分裂，目前并不可能，因为没有能够予以批准的党的机关。因为，如果中央委员会按照现在的组成不能被认定为是能解决我们的分歧的有权威的机关，而国外就没有别的有权威的机关了。我们也好，别人也好，都将认为自己是立宪民主党人，也许只是加上一些补充性的称谓。将来到俄国我们再相互清账，并再进行总结。

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现在是否需要通过一个什么决议？尼·伊·的决议在我看来是一种挑衅，因为，作为回答，我必须提出另一个与之相反的决议。这样做是否必要，是否有利呢？你们自己去决定吧。我还没有开始。

阿·弗·梯尔柯娃反对巴·尼·的说法，指出，她在“奥斯瓦加”通讯社只不过从事接触面很窄的技术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诚然，政治工作她进行得不成功，那是因为得不到党内同志的任何支持。至于居民对于志愿军的态度，那么，巴·尼·所说居民不接受志愿军而接受布尔什维主义的话是不正确的，因为尽管有过这样的地方，但不能说普遍如此；相反地，在许多地方，当白军撤离时，居民同他们告别时十分悲伤。

然后，在批评巴·尼·在5月26日会议上所作报告时，她认为这个报告十分注意根本不值得予以注意的事，即关于立宪会议成员开会的事。阿·弗·说，从这个报告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这是立宪会议，但同时又不是立宪会议，而我们在伦敦把它称作巴黎立宪会议，意指它是彼得格勒立宪会议和乌法立宪会议之后的第三次。为什么要有这么一整套名堂呢？“为了对国外施加影响和为了俄国”，——您这样说，但是您将和谁一起拯救俄国呢？是同几个其中某些人的名字（切尔诺夫、克伦斯基）使俄国反感的社会革命党

人一起吗？他们不是盟友，因为他们不想作为盟友，他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您的提法并完全作为一种画谜加以运用，而在这张画谜中无法分清哪里是社会革命党人，哪里是立宪民主党人。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对我们的一系列概念都必须重新加以审视和重新评价，因为思想更新确实必不可少，但是资产阶级和社会党人的统一战线不能归入这一类。现在要做的是做出抉择：或者是资产阶级，或者是社会党人。在布尔什维克帮助下，以及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及其他社会党人的纵容而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导致出现可怕的后果，并且表明：社会主义是文化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反动。害怕在一个从物质上和思想意识上都已成为废墟的国家内进行重建，是令人奇怪的。权力有限的杜马能够在10年中推动国家的生活前进，而布尔什维克则在3年的时间内将其破坏殆尽。恢复经济是必要的，在这里可以把一切不是左的东西（而这些左的东西是毫无生气的）动用起来，因为来自俄国的人很少说到害怕复辟，诚然这些来人并非工人，也非农民。关于统治形式根本用不着争论，但是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是没有社会党人的君主制，还是有社会党人的共和制，那么我将选择前者。同社会主义党派作斗争是必要的，因为它们仍坚持自己的旧立场。临时政府中的联合未能导致好的结果，因为这种联合没有创造性，把人民引向了布尔什维主义，政府的工作那时由于联合反而受到损失。让死人即立宪会议复活，无疑不是有益之举，我们现在就应当说明，以便将来不为此承担责任。同样，不能回避立宪会议成员召开会议的费用问题，应当公开说明它用的是些什么人的钱。就这个问题我建议在某个人时候投票通过这样一项决议：“注意到社会政治组织的经费来源对于从社会和道德的观点来评价这些组织及它们的成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确认立宪民主党党员不得参加这样一类社会政治组织，如果它们阻碍属于其组织内的立宪民主党党员在本党内讨论这些组织的经费来源问

题的话。”

巴·尼·说，对于今后继续流血，我们不应当再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作为一名妇女，一直十分痛心地对对待这种情况，但是，要知道即使内部斗争方式（发动暴乱并不是社会革命党的事，他们只不过是借此说说大话而已）也要流血，而赞同推翻布尔什维克的我们大家和以前一样，既然主张进行武装斗争也就要对此负责。至于巴·尼·对军队的否定态度，那我首先应当说，军队及其所处的境况，总的说是相当悲惨的，而巴黎的一派又给这些人的苦难增加了道义上的负担。军事斗争，与巴·尼·的看法相反不是将军们，而是人民的斗争，是争取自由反对布尔什维克压迫的斗争，因为靠将军们的办法是集结不起来这样大得一支军队的。可以回想一下，阿列克谢耶夫在开始召集志愿军时手头只有几百卢布，这就有力地说明，这不是将军们的斗争，而是人民的斗争，因此也不要从左派那里借用这类术语。你们的联盟似乎是为了加速新政权的到来而建立的，但是新政权在同社会党人接近的标志下是无法产生的。试图废除军队的领袖，对于参加军队的人来说是一种侮辱，这种办法会使他们远离俄国的激进主义，使它更难以参与政权。至于社会党人，就算他们能上台执政，那么，请相信我，他们是不会让您也参加政权的。

至于说到欧洲的态度，那么外国人对俄国人争吵不休和分裂的态度，如同对我们在报纸上的争论一样，是持极其否定的态度的。要改变他们的这种态度，确实必须建立起某种真正联合的和有威望的组织形式，但和社会革命党人，同切尔诺夫之流在一起是办不成的：为此需要走别的道路。例如，我本人对于布尔采夫代表大会的态度已从以前的审慎对待转为积极肯定，这是因为，（1）立宪会议开会时的争吵和工作状况；（2）俄国一部分不善于溶入外国环境的侨民的状态，他们因此要求自己具有某种形式的联合。正是应当把这

些未能溶入社会而分散独处的人们集合在一起，由有经验的人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对于我来说，民族代表大会因此首先是把必须联合起来的俄国侨民联合在一起的一种形式。有人说，不能和古尔柯^①走在一起，那么为什么又可以和切尔诺夫，和这个把俄国出卖给德国人的腐败政客切尔诺夫走在一起呢？在我们之中积累了极深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需要时间，用任何决议我们也无法把它们掩盖起来。但是，应当找出一种形式说明，现在，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以党的名义活动，一切由个人承担风险和责任（……）。

帕·德·多尔戈鲁科夫继续自己的发言。他指出，过去同社会党人联合的经验是不成功的：无论是巴·尼·自己也曾经抨击过的临时政府中的联合，还是1918年在莫斯科就督政府的组成和不承认前立宪会议问题同社会革命党人签订的协议（后来在乌法被社会革命党人破坏），都是如此。当时，巴·尼·自己也怀着另一种情绪，而且在寄往莫斯科给我们的信中指责我们说，我们处于社会党人和协约国的魔掌之中。而现在，您，巴·尼·，和社会革命党人走在一起，您在取消军队问题上的行动同法国人的行动相一致，他们则在您的讲话和文章中得到对自己的道义支持。所有这一切您让人们有理由指责您：您现在处于社会党人和协约国的魔掌之中。

我们的南方政策及其右倾的趋向也使我们不满意，但是，我们在可能范围内还是做到了把党团结了起来（无论在罗斯托夫，在鄂木斯克，还是在基辅），而现在党却分解了。立宪民主党的名称与军事立宪民主党人的联合虽然是一场误会，但是与您的意见相反，并不使我们丢脸，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放弃它。

您说，内部的起义证实您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从俄国传到

^① 古尔柯，B. H. (1863~1927) ——国务会议成员，俄国国家联合委员会常务局成员。

君士坦丁堡的大量消息判断，它们并非是社会革命党人的产物。

您说，君士坦丁堡的立场同您的立场接近。在这一点上，您确实是正确的。在那里的小组中有不同的派别，但是，我们，即与我观点相同的人，在20几个人中占了8个，我也告诫其他人说，现在必须界限分明，不然的话，他们如果采取一种既非弗兰格尔又非米留可夫的观点，那他们就会走上下坡路，现在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

您认为，在俄国人们相信社会党人而不相信立宪民主党人，但是，第一，不能为了取得政权而不惜任何代价，如果可以通过他们回俄国去，那在这种情况下不如干脆报名去参加社会党；第二，事实上社会党人在俄国并没有威信，因为据现有的材料，农民反对演说和演说家，而社会党人只是发表演说。

至于说到尼·伊·阿斯特罗夫关于通过公决的办法搞清党的意见的建议，那么从符合手续的观点出发我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巴·尼·的意见，何况公决实质上已经进行，因为从对我发出的信件的答复看，所有各个小组，有组织的和没有组织的，除巴黎小组外，都表示反对新策略……

№04018

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会会议 第7号记录摘抄

(1921年6月2日)

弗·德·纳波柯夫：(……)宣读决议定稿全文：

“1. 人民自由党中央委员会17名委员1921年5月26日~6月2日在巴黎会议上认定，关于党的策略问题在与会人员中存在不同派别。会议一致认为同复辟派别合作对党而言是不能容许的，同时多数人对于所谓“新策略”也表示了否定的态度。

2. 会议不认为，这一分歧一定会导致党的分裂，因为造成分歧的原因是由于对在俄国发生的事件有各不相同和不免不全面的评价。

3. 会议认为，只有在党为争取建立民主国家和在祖国恢复自由和权利的基础的斗争中党和俄国建立起频繁活跃的联系以后，党的策略才能够最后确定。建立这样的联系也应是党在国外的各个小组的基本任务。为使这一斗争顺利进行，必须保持党的统一。”

会议主席将所宣读的整个决议付诸表决，同时提醒说，倒数第二句话（“建立这样的联系”等等）不得向报界发表。

此项决议以多数票通过：11票赞成、1票反对，5票弃权(……)。

【专题说明】

阿斯特罗夫关于境外 俄国难民问题的报告

(1922年6月)

十月革命后有大批俄人流亡国外。这里有贵族、地主、资本家、将军、知识分子以及一般平民百姓。这些人构成俄国的难民群，人数在200万以上。他们多数人处于颠沛流离，生活艰苦困难的状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阿斯特罗夫（1868—1934）于1905年加入立宪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选中央委员。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莫斯科城市事务副委员。6月底以前领导市议会。11月当选立宪会议代表。1918年夏参加南方的白卫运动。邓尼金失败后移居国外。他给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的报告提供了白卫运动参加者流亡国外一年半的情况，以及国外各救济组织为救援俄国饥民所做的工作。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乌传袞翻译)

No 03963

**阿斯特罗夫就对境外俄国难民实施国际救援一事
给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①的报告**

(1922年6月1日)

不得公布

关于救援俄国难民的问题，是1921年2月向国际联盟^②提出的。5月10日，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任命了派驻日内瓦国际人道组织的代表。自6月4日此代表处开始工作。

回顾一下对境外俄国人实施国际救援所经历的主要阶段，同时判明这种救援取得的成果，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本报告只简要列举能说明问题经过的主要方面，并指出曾经向委员会及时上报的文件，说明实施国际救援的机关所做工作的内容，指出因此项内容而进行奋斗的阶段、地方和城市委员会代表处参与国际机构工作的程度，以及影响所取得的成果的这种那种原因。

① 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全名为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联合会军需供应总委员会，1915年7月由全俄城市联合会和全俄地方自治机关联合会设立的机构。1917年2月以后，其领导人参加政府。1918年3月27日撤销，成立直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管理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的总委员会。在国外以俄国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联合会援救国外俄国公民委员会的名义恢复活动。主席为格·叶·李沃夫。

② 国际联盟，国际组织，根据《国际联盟盟约》于1920年1月成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解，1946年正式宣告解散。在国联代表俄侨利益的是原俄驻瑞典公使 K. H. 古尔维奇。

材料按以下几部分陈述：

1. 救援俄国难民最高专员的任命。
2. 对最高专员所承担任务的两种观点。
3. 财政问题的提出。
4. 关于责任问题。
5. 南森^①博士身兼的两职。
6. 解决难民问题的计划。
7. 返回祖国（遣返）。
8. 计划的实施。
9. 国际救援和俄国人组织。
10. 俄国组织，包括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所拟计划的基本特点。
11. 国际联盟在难民事务上的实际作用和个别国家政府的参与。
12. 其他国际组织参与救援俄国难民的工作。
13. 结论。
14. 国际组织和俄国饥荒。

救援俄国难民最高专员的产生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②于1921年2月20日致函国联理事会，提请其关注俄国难民的苦难处境，并提出有必要任命一名最高专员，其任务是：

① 南森，弗·（1861—1930）——挪威科学家、社会活动家。任国际联盟主管战俘事务的最高委员。1921年苏俄饥荒时期，他组织了国际赈济饥民委员会。1922年获诺贝尔国际和平奖金。

②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1863年成立于日内瓦，最初叫日内瓦伤兵救护委员会，1880年改用此名。它是瑞士的民间团体，是国际红十字会的会员团体。

- (1) 确定难民的法律地位；
- (2) 将难民送回俄国或在俄国境外予以安置；
- (3) 统一安排已采取的难民救援措施。

1921年2月26日，国联理事会经过了解认为这个问题相当重要，值得认真予以关注，但是鉴于自己无法对问题的各个方面都加以解决，表示愿意在一定范围内尽力予以帮助。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中还指出：“国联理事会的活动不包括建立实际救援难民的组织和承担与此相应的财政义务。理事会认为目前不应当请求国联成员国从财务上参与此事。无论对于这些不幸的人的苦难多么同情，理事会不能坚持要求各国政府为了帮助难民而向居民征收新的税款。”

根据理事会的委托，秘书长请求各国政府提出解决这个国际难题的设想，并发表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可进行何种程度的国际合作，国联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此事。

这就是在对难民实施国际救援这件事情上采取的最初步骤。

应当说明，在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发信之前，先有俄国红十字会^①向它发出呼吁，请求关注俄国难民的苦难处境。

5月14日，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主席格·叶·李沃夫^②公爵以该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国联理事会主席达-孔尼亚，其中提到“不仅难民，而且还有给予他们庇护的国家，以及人道组

^① 俄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867年。根据1918年1月4日苏维埃政府的法令，该会的财产被国有化。红十字会总理事会被撤销。1919年流亡巴黎的总理事会主席П.И. 伊格纳季耶夫成立了俄国红十字会事务会议。1921年2月26日宣布恢复俄国红十字会的活动，总理事会设在巴黎。

^② 李沃夫，格·叶·（1861～1925）——立宪民主党人。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1917年3～7月任临时政府总理兼内务部长。

织，都寄希望于国际联盟。他们希望，体现国际团结和公正的国联会同意承担起捍卫背乡离井的俄国人的权益的重负……”在信函的另一处说道：“对俄国难民的救援应当协调和统一起来，方法是成立一个公认的中心，作为捍卫俄国难民权益的全权机关”（……）“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是由国际联盟任命一名由它赋予全权的人员，来统一安排和指导对难民进行救援的各种机构的活动。”

在格·叶·李沃夫公爵 1921 年 10 月 4 日呈交全俄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报告中，对于如何理解这项任务作了说明：“当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着手进行此项工作时，它主要寄希望于国际力量——国际联盟。它希望，最终会有一个强大的国际组织到来，而本委员会便会将自己现成的地方和城市组织提供给它，虽然掌握的经费不多，但却拥有一批经验丰富的社会工作人员，以及遍及有难民暂时栖身的所有国家的机构网络。”

对于国联理事会提出的问题，各国政府表示了意见。这些意见可归纳为：认定必须任命一名最高专员；协助愿意返回祖国的那些人实现这个愿望；帮助就业和安置；确认难民的法律地位，等等。（有关重要意见的陈述，参见《俄国难民和国际联盟》一文，载《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通报》，1921 年 7 月 15 日，第 5—6 期）。

收集到的有关难民境况的材料、各国政府的意见，以及对难民的情况所作的更加充分的了解，为向 1921 年 6 月国联例会提出关于俄国难民问题的报告提供了根据。俄国问题的报告人是法国驻国联理事会代表加诺托。报告于 6 月 27 日经国联理事会研究通过。

为便于了解对于处理俄国难民问题的基本任务以及有关财务方面的各种观点，有必要对这个报告的某些内容加以回顾。在谈到任命一名最高专员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时，报告人说：“承担责任如此重大的事务的专员，必须具有崇高的个人威信，以便能得到各

国政府的充分支持，并在俄国人的组织中能够享有应有的影响。专员的个人品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他的国籍，以及他过去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政治地位。”按照报告人的意见，“俄国难民的问题，是一个政治社会性质的问题和仁爱问题，但主要是财务问题”。如果能够期望，某些类别的难民，例如，儿童、孕妇、残疾人等，可以获得人道组织的慷慨捐助，那么“所有其他类别的难民，凡至今仍没有生活费用而且在目前状况下也无法获取生活费用者，将处于国联常设机构的庇护之下。这个常设机构应当负责照料大约 20 万难民，他们分散在各国，而主要集中在无法找到工作的近东某些地方……为了使各国摆脱对于难民的义务，必须拟制一个总的计划，并保证执行计划所必须的费用。应当研究在最短时间内——不超过一年——获得这笔费用的可能性，并转交给国联的社会机构。”

在论及费用的来源时，报告人认为，向国联所有成员国呼吁纳款无异于给其中某些国家增加负担，因而不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不过，也许可以从最为利益攸关的国家得到能够提供资助的许诺。同样值得研究的是，属于原先历届俄国政府而如今在一些外国的存款中，是否其中有一些可以全部或部分动用于俄国难民之需。财务问题应在专家的参加下进行研究，然后国联理事会才能向各国提出建议。同样，关于如何从社会政治的观点出发最终解决难民分散安置的问题，也应在专家的参加下进行研究。在紧急研究这些问题后，应任命一名最高专员。

这便是加诺托先生报告的内容。

6月27日，国联理事会批准了加诺托的报告，并一致通过以下几项决定：

1. 国际联盟理事会认为，从总的方面解决因俄国难民大量涌现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最好方法，是十分审慎地选任一名最高专

员，委托他协调各国政府本身的以及各国私人组织的活动。

2. 理事会认为，在选任最高专员之前应先对与最终解决难民问题有关的政治、法律和财务问题进行实际的研究。因此，理事会委托总秘书处紧急实际研究并准确决定这些问题。有鉴于此，总秘书处应继续负责协调从事救援俄国难民的私人组织的活动。它应当独立地要求相关国家政府提供涉及整个问题，特别是涉及财务问题的资料。

3. 为了保证各国政府的行动协调一致，总秘书处应尽可能在最近期间召集各国专门负责俄国难民事务的官员举行会议，以便尽可能快地在坚实的基础上组成将受命最终安排难民前途的最高专署。

4. 理事会委托理事会主席在有必要时，在两次例会之间关注最高专员的选任问题，并与理事会其他成员国进行磋商。如有需要，主席应任命一批将同按上述程序选任的最高专员共同工作的人员。

应当指出，1921年3月17~18日，在伦敦举行了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美国救济总署^①、美国红十字会^②和救援儿童基金会等组织代表的会议。会议认为，欧洲的俄国难民问题太大，仅靠私人组织的努力无法解决，为此应当呼吁各国政府进行国际救援。

上引加诺托报告的摘录和就此报告作出的各种决议，都无庸置疑地表明，国联理事会在作出任命最高专员的决定时，已充分意识到这项决定必然会需要动用一笔相当可观的费用。

因此，南森博士1922年3月15日提交的关于最高专员活动的

① 美国救济总署存在于1919~1923年，由胡佛领导。苏俄1921~1922年饥荒期间该机构曾在俄罗斯联邦活动。

② 美国红十字会成立于1881年。

报告中所说的看来是完全不准确的。例如，他在报告中引证理事会的6月例会和加诺托的报告说：“与此同时，理事会概括地规定了最高专员，据它的意见，能够完成的任务：它在已予批准的报告中指出，最高专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对难民进行直接救援”，“理事会并不建议各国政府和国联成员国向最高专员提供专项的资金。它只是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即最高专员可以在他有必要使用款项来执行自己的任务时就能否动用俄国的存款征询国联财务委员会的意见。”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所摘引的南森博士3月15日报告中的段落与摘引的加诺托的报告不相符合，而加诺托的报告恰恰说到必不可免地要对慈善组织不予救济的那些难民给予直接的救援，而且也作了恰恰相反的指示，即必须研究相关国家政府参与承担此事的费用的问题，至于提到俄国存款的问题则是作为财务问题的一部分而说到的。此种不准确之处，在秘书长3月18日关于财务问题建议的报告中也存在。

关于最高专员任务的两种观点

内容叙述不准确这一缺点证明，对于国际联盟参加俄国难民事务的性质存在两种观点，在实行中存在两种政策，其中之一在形式上占了上风，从而在总体上决定了国际救援境外俄国人的性质和基调。

如果说最初在国联理事会2月份的报告中说到，组织对难民的直接救援不属于国联的活动范围，因此它不承担这一事务的财务责任，那么在同一届理事会的6月例会上，经过切实了解情况之后，提到某些类别的难民应当处于国联常设机构的庇护之下，因此应拟定一个总的计划，并保证拥有实施此项计划所必须的费用。

这两种观点自始至终处于冲突之中。第一种观点完全为最高专

员南森博士所接受，并在1921年9月16~19日相关各国政府代表举行的会议所作决议中得到具体表述，即“最高专员的任务在于最终消除俄国难民问题，而不是进行慈善式的救济。”（见“Proces Verbal’《速记记录》）。9月16~19日会议通过的决议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只是措词稍有不同。通过的提法是：“最高专署的任务在于最终调整俄国难民的问题，而不是从事慈善事业。”此后贯彻的也是这一观点，并在最高专署的各种报告中得到反映。

第二种观点则得到俄国组织的代表的全力支持，并在1921年8月22~24日有关国家政府全权代表的会议的一系列决议中得到充分的反应，其中说明必须救援在境外的俄国知识分子并使他们的知识得以发挥；从精神和物质上救助妇女；对儿童进行专门教育。这次会议认为把对俄国难民的庇护完全推给某些在此之前因人道的考虑或因地理位置关系而独立承受超过自己力量的重负的那些国家承担的做法是不公平的。

按照这次会议的意见，文明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应当在这一个刻不容缓的涉及世界性责任的事业中进行与各自力量相适应的全力合作。

这第二种观点在《泰晤士报》刊登的萨·霍尔^①先生1922年3月6日的著名的信函中得到最为鲜明的表现。霍尔在这封信中说，分散安置难民的任务并不是无止境的，也不是无法解决的。如果国际联盟立即着手处理，这个任务有望在6个月获得解决。国际联盟对俄国难民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因为国联从成立了以南森博士为首的专门的俄国难民事务专署之时起，就对他们承担起了责任。如果国际联盟迟迟不采取行动，如此缺乏主动精神，它将在东欧造成极

^① 霍尔，萨·（1880~1959）——1919~1922年任国际联盟俄国难民问题副特派员。

坏的影响，“国联应当立即向全世界通告，说明它拥有履行它在一年之前承担的义务所需要的费用，否则国联理事会将会得出结论，认为既不能获得款项，也无法得到帮助。”

在萨·霍尔 1922 年 3 月 25 日呈交国联理事会的报告中，他也表述了同样的思想（见《速记记录》）：“我知道，国联从来没有对难民承诺过财务方面的义务。它一直在拒绝承担这样的义务，而正因为如此它才没有款项。然而，我可以断言，直到去年最高专署才得以成立，也就是说，国联承担起了某些义务。”

从实质上说，正是这两种观点的冲突，决定着救援俄国难民最高专署的活动。这项活动不得不依赖于最高专员手中能够拥有的财务能力和储备。

财务问题的提出

8 月 22~24 日的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得到国际联盟全体会议的批准）表达了一个愿望，要求国联理事会建议国联的经济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对于俄国难民问题的各个财务方面，以及对于可能提供给最高专署用于执行其所担负任务的款项进行研究。其中包括，按照这个委员会的意见，应当着手研究加诺托先生在他给理事会的报告中提及的关于能否使用属于以前各届俄国政府而如今仍在国外的存款的问题。

同是这一些国家政府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但已是在最高专员南森博士及其助手弗里克^①先生的领导下，在同年 9 月 16~19 日就同一个财务问题却表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

当得知最高专员并无进行慈善活动的任务，但应当在最短期限

^① 弗里克·爱德华——1918 年初任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驻苏俄代表。1920 年在国联最高专员南森博士的机关工作。

内消除难民现象时，会议建议最高专员单独同每一国政府分别讨论一个个面临的需要立即解决财务问题才能完成的最终消除难民问题的任务。同时，还向最高专员提出了向国联财务委员会进行交涉的建议，以便讨论能否负担部分费用的问题，但已不需要文明世界所有国家支付（8月22~24日会议），不是相关的国家（加诺托先生的报告），而是至今为止对俄国难民救助较少的国家。

关于俄国的存款问题，最高专员助理在同一次会议上声称，这个问题不属于紧急问题之列，因为必须进行长时间的研究（见《速记纪录》）。

这三个各不相同的愿望，实际都未实现。无论是全世界的国家，还是最有关系的国家，或者最不相干的国家，看来都没有收到财务委员会关于要它们参与救援难民事务的建议。1922年5月29~30日咨询委员会收到国联财务委员会1922年2月23日~3月1日发出的结论：财务委员会研究了最高专员助理在11月的备忘录中提出的问题，认为自己无权处理所提的已经超出纯粹财务范围的问题。这个结论，看来涉及动用俄国存款的问题。在现今政治局势下，这个问题正在变成政治问题，如同财务委员会在结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已超出了财务问题的范围。至于最高专员对于俄国存款的态度，从1922年3月18日关于财务设想的报告可以看出，他征询过，结果使他深信，这笔款项丝毫也不能动用。

向国联只申请了用于维持工作机关所必需的经费，为此1921年拨发了1500英镑，1922年4000英镑。一接手工作，最高专员就不得不借款25万法郎用以支付把大学生、儿童和土地所有者从君士但丁堡迁往布拉格的费用。

很快就发现，认为采取某种行政措施，而且只需由私人慈善组织出钱，就有可能解决难民问题的观点，是极不现实的。

当美国红十字会停止在君士但丁堡的救援活动，而法国政府又

声称它将不再负责维持各营地的生活供应，这是最悲惨的时刻。当时，最高专员手头没有任何款项，处境十分困难而令人尴尬。面对向他提出来的种种需求和问题，他只能推托说规定他只起行政人员的作用，而且国联并未对难民的前途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国联最高专员继续采取这样的做法，必然会使国联处于困难的境地，正如国联不给自己的最高专员任何款项而使最高专员陷入绝境一样。最后的结果，那就是给予关注和要求消除的对象本身可能消失，因为难民可能会饿死，也可能分散流落到别的国家。人们看到，在某种尖锐的情况下，即使人为地把任务缩小，实际的救援工作仍是绝对无法回避的。在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的压力下，最高专员不得不设法筹集款项。他只好请求人道组织借钱给他，并请求国联理事会“允许他向俄国难民进行慈善性救助。”

在1921年11月19日的会议上，国联理事会正式表示允许这样做，也就是把最高专员在君士坦丁堡地区难民方面的任务表述为：关注难民的转移、生活供应和分散安置。

但是，时机已经错过，未能充分利用国联的全体会议（1921年9月和10月），财务问题未予研究，而形式上向各国政府发出的关于提供金钱资助的呼吁未产生任何结果。剩下的只是一份关于不承担道义责任和物质责任的书面说明。

关于责任问题

直到萨·霍尔先生发言之后，关于国际联盟的责任问题才有了某种新的提法。直到这次发言以后，文件中才出现了对于最初那种拒不进行救援和不承担责任的绝对说法作出修改。例如，在由秘书长呈交给国联理事会最高专员1922年3月18日的报告中写道：“最高专员认为，一旦着手处理难民问题，理事会就在某种程度上使整个国际联盟承担起责任。理事会不可能有意委托最高专员去完

成一件看来从一开始就需要支付费用的事，而不让最高专员有可能向它申请款项。”在这份报告的另一个地方，最高专员声称，“他向理事会成员坚持要求这个数目（3万英镑），而这比起赋予他的责任少得无可比拟。”

3月25日决议的文字与新的趋势并无矛盾，但它也并未加以批准。在伊曼斯先生和布尔茹瓦^①先生的口头声明中（《理事会1922年3月24~28日第17次会议速记记录》）指出，国际联盟并未承担金钱方面的责任，在它以后的行动中这种责任应当严格加以确定；国联下达给最高专员的任务只是协调各国政府和私人团体的所有行动。结果，决定把霍尔和南森的报告通报给各国政府，恳切要求向最高专员提供3万英镑的款项，并呼吁关注君士坦丁堡难民的境况。

1922年5月11~17日的例会期间，在5月13日的理事会会议上再次提出同样的想法，最高专员则亲自在会议上做了报告。他又一次说明：并没有款项交由他支配，而赋予他的任务只是协调各国政府的活动，但是在冬季来临之前把15000人从君士坦丁堡分散安置到其他地区是需要钱的。巴尔福^②和布尔茹瓦坚持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筹措到3万英镑。他们说，国际联盟不能拒绝这项任务；如果这一点竟然做不到，那对它的威望是致命性的（disastrous）。在对南森博士致词时，J. 布尔茹瓦为他所做的工作向他表示感谢，并称他为“世界公民中一位坚强刚毅的公民”。

3月25日和5月13日在理事会上发生的事，实质上是1921

① 布尔茹瓦，莱·维·奥·（1851~1925）——法国激进派领袖之一。1895~1896年领导法国政府。1902~1904年任众议院议长。1919年起率领法国驻国联代表团。

② 巴尔福，阿·詹·（1848~1905）——英国保守党人。1902~1905年任英国首相，1915~1919年先后任海军大臣和外交大臣。

年11月19日通过的决议的重复和发挥。理事会的这些决议放弃了拒绝救助的观点。对于必须承担义务、责任和救助已不再有怀疑。

应当指出，11月19日以后英国政府答应为难民的需要从自己的财政中提供价值2万英镑的物资。

现在，同一个英国政府，按照费舍尔的说法，答应提供1万英镑，条件是其他国家政府提供不足的其余部分，以便凑齐分散安置君士坦丁堡难民所需的数目（3万英镑）。

概括地说，在解决难民问题上指导国际联盟机关的几种主要观点大体如此。

那么，解决问题的实际计划又是怎样的呢？

在转入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就最高专员着手工作时以及工作进行中的条件讲几句话。

南森博士身兼两种不同的职能

加诺托在报告中不无根据地指出，在选任最高专员时必须采取特别谨慎的态度。这个人物必须拥有崇高的威望，这样才能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他在俄国人组织中也应有相当的影响。1921年8月20日，南森博士宣布同意接受俄国难民事务最高专员这个职位，9月初他就来到日内瓦，并接手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时发生了一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情况，这个情况在设置最高专员职务时并不曾考虑到，但在整个工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最高专员与难民的相互关系上一直有所反映。这就是，把两个完全不能相容的职责，即救助俄国的饥民和救援俄国难民的职责，集中到一个人身上。

这种集两种职责于一身的做法是在8月22~24日会议的决议中宣布的，决议“鉴于各国救助俄国饥民问题和境外俄国难民问题有密切联系，认为必须把这两种行动联在一起。”但是，必须指出，

这项决议是在南森博士于8月15~16日在日内瓦俄国问题会议上被选为俄国饥荒问题最高专员之后形成的，8月20日他宣布同意也担负起关注俄国难民的工作（参见国联理事会3月25日的决议）。由此可见，会议的这项决议似乎只是批准了作为实现此前的计划与意图而准备好并已采取的行动。

一开始拒绝接手难民事务的南森，在众多劝说下宣布同意，遂成为两种从原则上和实际上都不能相容的事务的兼任者。

两种相反的职责从技术上和从原则上都无法兼容的事实很快显现出来。如果南森全身心地投入俄国的饥荒问题，并克服一切困难去履行自己的慈善任务，那么难民问题就会不由自主地退居次要地位，即无法加以注意，也无法加以关照。

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驻日内瓦代表处曾不止一次地向最高专员和最高专署口头和书面指出，在难民事务上已经错过了许多时间，各国和各私人组织已经无计划地花费了极其大量的款项，必须采取迅速而果断的行动，以便消除这种现象的最紧迫的和最不正常的方面。

承认集两种职责于一身的错误，在萨·霍尔先生3月25日呈交理事会的报告中有最鲜明的反映。他在报告中说：“我不能不说，因为我坚信，把救助灾民的工作与救援难民的工作联结在一起是一种错误，因为根深蒂固的成见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在理事会的同一次会议上（3月25日），英国政府的代表费舍建议通过大体如下的决议：“考虑到问题的紧迫性（分散安置君士坦丁堡的难民），以及南森博士因兼管俄国饥荒和救援欧洲其他地方的难民担负着大量而又多头的事务，理事会认为最好能任命一名驻君士坦丁堡的专员助理，委托他处理涉及这个城市中难民的所有问题，并最终解除英国政府对于埃及、塞浦路斯、马耳他、塞尔维亚等地俄国难民所承担的义务，为此王国政府拨出款项15万英镑。”

理事会会在自己的决议中把费舍的措辞改成比较婉转的提法，但是与此同时，正如3月25日决议中所说，经英政府同意把整个君士坦丁堡问题和此前由英国政府担负的难民前途的安排工作，委托给了普罗克特上校^①和查尔兹。

如果说可以把这些行动看做官方机构对救援难民最高专员的态度，那么，在“在俄国人团体中应有相当影响”这一点（加诺托对此曾表示关注），某些俄国人团体于1922年1月10日递交给国联理事会的备忘录（其中指出，必须把救助饥民的职责和救援难民的职责分开）充分证明，可惜，最高专员并不具备这种影响。

至于承认兼管救灾和救援难民两种职能的错误，对于最高专署的代表来说，也并不新奇。从1922年初开始，兼管这两种职能的最高专员助理弗里克先生就摆脱了难民事务^②，如今难民事务方面的工作集中在最高专员助理德-巴特维尔手中，而后者在救助俄国饥民方面已不承担任何正式职责。

解决难民问题最高委员会的计划

1921年6月27日，国际联盟理事会以不很明确的表述方式确定了最高专员的任务：“协调各国政府和各国私人组织的活动”。以后，提法的内容逐渐明确起来。

这个计划是“相关国家”代表于1921年8月22~24日和9月16~19日的会议上拟订的。

由塞尔维亚代表约万诺维奇主持的第一次会议提出了较为概括性的意见；由南森博士主持而实际上由他的助手弗理克先生领导的第二次会议使计划进一步明确起来，使之更加服从于这样一种倾

^① 普罗克特上校由国联任命为巴尔干难民事务特派员。

^② 弗里克仍任难民事务技术顾问。

向，即不履行任何义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实施一系列在短期内消除整个难民现象所必须做的机械性措施。这种倾向在弗里克先生于9月19日会议上的发言中得到充分和完整的反映：“首先必须尽快中止现有的人道组织的工作，而不是予以推进。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消除俄国难民现象。”（见《速记记录》，9月16—19日）

境外俄国人士一直专注而紧张地倾听着掌管其命运的人们的每一句话，他们不能不看出上述话语中对自己的敌意；但愿弗里克先生那句话中包含的也许是另一种意思。这句话不胫而走，尽管是不慎说出的话，却立即造成人们不满、疑虑和戒备的态度。

在救济饥民的条件问题上对苏维埃政府看来过分迁就退让的态度，又引起误会和抗议。这也许使人们对上述说法找到了新的理由和根据。

拟定的消除难民现象的计划相当简单。必须在“3周”时间内对在欧洲的所有俄国难民进行登记，问清他们的职业；询问所有国家，俄国难民中哪几类工作人员在它们那里较容易得到最终的安置；吸收迄今为止从事援助俄国难民的私人救援组织共同参加工作，并和它们一起筹措必需的款项，进行紧急救援直到难民群众的严重境况消除为止。同时认为必须在每个国家指定2名负责难民事务的代表：1名由本国政府任命，1名由南森博士指定。

这项设想，如前所述，又增加了一项内容，即指出必须了解迄今为止对俄国难民救援较少的国家有无可能参与解决费用问题。

1921年9月16—19日会议决议的主要内容大体如此。

关于1921年8月22—24日会议的决议，值得指出的是，曾几次试图确认对难民法律地位的共同的观点。在讨论法律问题时可以确定无疑地看出，在这件事上每个国家大都保留自己的独立性。

此外，还指出，如前所述，必须救助俄国妇女，对难民子女进行专门教育，以及爱惜俄罗斯知识界的力量。

最后，必须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看法，即“任何一个俄国难民

都不应被强制地送回俄国”。

还规定，必须收集关于愿意返回祖国的人数的材料。

这就是拟定的计划的内容。

遣 返

下面将要说明，这个计划是通过哪些行动加以实现的，以及效果如何。这里必须谈到对于解决整个难民问题具有首要意义的问题。这就是关于俄国难民返回祖国的问题，或者按照人们后来习惯的说法，叫做遣返问题。

规定“任何一个俄国人都不应违反本人意志而被送回俄国”的原则，并不是没有经过斗争的。

在作出此项规定之前，曾有过一些值得怀疑的意见和做法被看做是无庸争议的。

某些政府在回答如何才能更好地解决难民问题的调查时提出，最正确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他们送回祖国。

国际红十字会在提出俄国难民问题时指出，遣返应当成为最高专员的任务之一。国际红十字会的代表表示，没有可能强迫各个国家为养活离开自己祖国的人而花费钱财，最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如同人道组织常常喜欢讲的那样。还在任命最高专员之前，国际红十字会就为委托“救援儿童基金会”委员汤姆逊将军研究救援俄国难民的问题。根据研究结果提出过一份报告，也列举理由说明必须实行遣返。在进行研究时，汤姆逊将军也曾和俄国人组织的代表进行过交谈。例如，1921年5月4日和6日，汤姆逊将军和临时城市委员会主席 П. П. 尤列涅夫^①

^① 尤列涅夫，П. П.（1874～1943）——立宪民主党人。1920年初流亡法国，参加各种侨民组织。

进行了两次谈话，后者做了记录。在记录最后写道：“谈话的印象令人心情沉重。人道组织的代表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实质没有任何概念；竟认为让他们返回苏俄是解决难民问题的主要办法之一。”

1921年4月，法国占领当局采取措施把列姆诺斯岛等处军营^①中的哥萨克、上兵和军官计约12000人送回俄国。

1921年8月6日，李维诺夫^②致函汤姆逊将军，以“充满人道动机但并不准备为解决这一难题做出任何牺牲的”苏俄政府的名义表示，同意接受那些“愿意成为善良公民并效忠现政府”的难民返回俄国。接受难民返回俄国的条件是：解决转运安排、运输期间和途中停留时的伙食、被转送人员的衣服和鞋袜供应，以及允许专门的工作委员会前去有难民停留的每一个国家对于愿意回国的人员进行登记和发放准予回国人员的名单。信函最后说明，不言而喻，凡经允许回国的人员，俄国政府均保证予以大赦。

由此可知，对于难民问题的解决作了简单的准备，而在许多人看来这也是十分自然的。苏维埃政府作出了保证，遣返机关正在完成遣送战俘回国的巨大工作，即将无事可做，难民回国所需的费用比之对于境外大量俄国人的极不明确的义务要少得多。总之，解决难民问题被归结为已实际进行的一系列行政事务。在日内瓦的俄罗斯人组织通过大量的函件和交涉力图全面地阐明这个艰难的问题，并指出简单化处理这个问题的巨大危险性。

关于俄国人不返回祖国的问题本可以就这样得到解决，如果不是饥荒和疫病又一次使俄国陷入新的灾难的话。欧洲和全世界都越来越关注遭到新的不幸的俄国。在这种情况下，已不能提出返回祖

① 列姆诺斯岛的军营有弗兰克尔的库班部队的残部（16500人）。

② 李维诺夫，马·马·（1876—1951）——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苏俄驻英国全权代表。1918年起先后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副外交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等职。

国的问题。难民问题的解决因原先并不曾存在的情况而不得不推迟。最高专员南森博士在第一次与俄国人组织交往时便对它们说，所有关于强迫遣返的传闻是绝对没有根据的，甚至对于愿意去俄国的人也应当予以劝阻，并且当他在位时不会有一个俄国人被强行送回俄国。

他的助手弗里克对南森博士的话予以确认，并说“目前不可能提出遣返问题”。

南森博士 1922 年 3 月 15 日提交国联理事会的报告中说：“毋庸置疑，欧洲有 150 万难民存在的事实所提出的问题的最终彻底解决，是让他们返回自己的家园。最高专员最认真地从总的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且从具体细节上对着手认真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实现的一些必要的条件也作了考虑。不过，最高专员并不试图实现他从研究问题中得出的结论，因为在目前条件下设法让大量难民回家是不可能的和不公正的。除了各种其他原因以外，因饥荒和瘟疫而造成的俄国的衰败状况，就足以成为目前排除此类措施的充分理由。”

在 1922 年 5 月 13 日国联理事会的会议上，他再一次重复了上述思想。他在向理事会作报告时说，就目前而言，难民返回祖国并不是实际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最好是让难民留在中欧或西欧，无论他们的境况多么艰难，总比回俄国好。

国际劳动局代表别特勒在 1922 年 2 月所作的关于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三国的难民的境况的引人重视的报告中说，“绝大部分俄国难民都向往返回祖国。有些人已经启程回乡。但是，在得到相应的保证以前，大多数人是不会回去的。此外，谁也不会相信苏俄政府的任何许诺。这是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在这方面施加任何压力都会受到十分不友善的反应”。

萨·霍尔先生在关于遣返问题的报告中表述了这样一种意见，“国际联盟应当经常不断地研究出现的返回祖国的一切可能性。看来，不会有一个俄国人被违背本人意愿地送回俄国。但是，时间一

到，会有许多难民，也许其中的大多数人愿意返回自己的国家。按照我的意见，国际联盟应当派代表出席热那亚会议^①，以便注意问题的发展，并坚持要求苏俄政府作出相应的保证。”

至于苏俄政府提出的是什么样的保证，为此需要什么样的代价，并未向俄国人作出解释。令人惋惜的是，连一些优秀人物似乎也愿意相信这种令人怀疑的保证。但是，事态恰恰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此后就将不得不就此面对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苏俄方面宣布了“在真心诚意地悔过的情况下”对各类人员的大赦，宣布了取消公民权的时限，采取措施分化俄罗斯侨民组织，等等。所有这一切证明，新的一方又开始介入返回祖国的问题，难民们再一次陷入一个紧密的包围圈之中。于是，从一开始直到现在，解决难民问题的惟一措施仍然是遣返。这项措施之所以没有实行，是因为俄国发生了灾荒。但是，研究问题、取得苏联政府的保证，力图尽快摆脱难民问题等因素，最终还是导致决定在南森的报告中称之为“最后的解决”的做法，即遣返。

计划的实施

谈到最高专员本人如何描绘自己的活动时，首先应当知道，早自11月份开始，他就试图提出一份他所完成的事项的清单。例如，在1921年11月24日的人道组织代表委员会的会议上就提出了这样一份清单，而在上面提到过的南森博士1922年3月15日呈交国联理事会的报告中则包括了一份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说明。南森5月13日给国联理事会的报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而5月29日又向咨询委员会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这些报告在委员会的案卷里都

^① 热那亚会议——国际经济和财政会议，1922年4月10日至5月19日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

有。其简要内容可归纳如下。

最高专员在 14 个国家中^① 有自己的代表。

12 个国家任命了自己的代表或指定了负责难民事务的机构。

按照报告的说法，登记几乎已经结束，并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可以用来进行新的交涉，以便把难民从他们可以^② 找到工作的国家迁出。报告用来确定登记取得的成果的这句话，未能准确反映实际状况。

某些国家，例如德国、法国、波兰等，还没有材料。其他国家的材料也是十分概约的。只有关于君士坦丁堡的情况获得较大的成绩，但花费的钱财很多。总的说，登记未能满足原先对它的期望，无论从完成的期限还是从获得的成果看都是这样。目前公布了以 2 月 18 日为准的材料，共在 11 个地点登记了 68865 人。

下表所列就是这些数据。

1922 年 2 月 18 日俄国难民登记材料

南斯拉夫(由英国政府供养)	955	705	316	2016 ^③
拉脱维亚(暂时寄居)	5327	5708	5871	16906
爱沙尼亚	4864	2420	1833	9117
罗马尼亚(犹太人)	3552	3803	4008	11363
捷克斯洛伐克	3462	1254	300	5016
匈牙利	700	130	70	900
君士坦丁堡	13888	45732439	20900	
埃及;伊斯梅利亚 (原顿河士官武备学校)	373	12	65	453 ^④
西迪比什尔营地	1116	352	133	1601
塞浦路斯	367	142	43	552
马耳他	15	20	6	41
共 计	34662	19119	15084	68865 ^⑤

① 英国、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保加利亚、土耳其、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塞尔维亚、匈牙利、德国。

② 原文如此，似应为“无法”。

③ 原文如此，计算有误。

④ 原文如此，计算有误。

⑤ 原文如此，计算有误。

向各国政府询问是否愿意接受某种类别的难民的工作，其效果就更不足道了。报告声称，未能取得预想的结果。最高专员得到的几份回答都是否定的，只有巴西再次提出可以利用他们的咖啡种植园。最近已开始和澳大利亚谈判，也提及加拿大和美国。

报告说：“最高专员刚刚着手工作，在君士坦丁堡的难民境况中就出现了严重的麻烦。这个问题，如果按照国联理事会决议提出的行动计划来看，严格讲与最高专员并无关系。但是因为君士坦丁堡难民的困难已经十分严重，以至于对于事实上正在因挨饿而死去的人们寻找工作已经没有用处。正因为如此，最高专员尽管并没有任何经费，还是竭尽全力同这种灾祸进行了斗争。”

接着叙述了最高专员为减轻君士坦丁堡难民的处境而采取的行动。其中说明，他曾向法国政府、美国红十字会，以及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驻君士坦丁堡的最高专员，3个主要盟国政府的首脑，各个保卫妇女组织提出过援助的请求。

与此同时，最高专员还向私人组织发出呼吁，请求捐款或借贷。表示响应的有：犹太人移民协会代表留森·沃尔弗捐赠 1000 英镑并提供短期贷款 3000 英镑；国际犹太人协会捐赠 25000 法郎；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把向法国政府申请的 20 万法郎转让给他。利用这笔款项购买了 400 吨黑麦面粉。后来，英国政府又同意专门救助君士坦丁堡难民 2 万英镑。

同时指出，萨·霍尔先生在君士坦丁堡组建了一个国联办事处，集中管理这个城市的难民事务。

报告没有提到，国联理事会 11 月 19 日听取了关于君士坦丁堡难民情况的报告后，承认必须向各国政府提出请求，要它们给予最高专员一切协助，以便其执行的任务，其中包括把难民转移到其他国家，支付签证费用，保证生活供应，以及在生产企业予以安置。

其中也没有谈到，1921 年 11 月 4 日私人组织曾向最高专员悬

切要求他担负起对在君士坦丁堡处于悲惨境地的难民进行救济的责任。

接着，报告说明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安置 1000 名大学生和 2000 名农民以及某些类别难民的材料，以及关于向保加利亚转移的情况。保加利亚政府提供 200 万列夫贷款准备接纳儿童。至今安置了 1000 名儿童，有望再接纳 1000 名。

与此同时，最高专员得以说服英国政府不反对在保加利亚领土上接纳来自盖利博卢营地^①的 9000 人。

保加利亚政府同意接受 1000 名农民及他们的家人。

谈到分散安置时，报告提到曾协助个别离开君士坦丁堡的人办理签证事宜。支付签证的费用每月约需 200 英镑。接着谈到：德国同意接受 300 名农民和 50 名大学生；奥地利、罗马尼亚同意接受少量农民；法国救援俄国儿童协会负责解决 50 名儿童；该协会应允今后再从君士坦丁堡接受 60 名儿童，从波兰接受 27000 名儿童；已协助爱沙尼亚人返回祖国；有可能把 600 名犹太人送往巴勒斯坦，把 1000 名西伯利亚人送往远东，等等。

关于波兰，报告承认最高专员尚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他希望在办理护照和签证方面能给予协助^②。关于这个问题和关于难民法律地位的谈判有了相当的进展。报告以特别的关注提到国际劳动局在就业安置方面的工作，认为类似的团体对于安排难民的前途具有重大意义。国际劳动局副局长别特勒所介绍的劳动局在叙利亚的活动证实了最高专员的观点。

可以认为，最高专员在各地的代表本应当向他报告关于由俄国

^① 盖利博卢地区有原志愿军第 1 军团的军营，26596 人。

^② 1921 年根据南森的决定为侨民办理了身份证，所谓南森护照。1923 年有 31 个国家认同这种护照。

人组织，特别是地方自治联盟所成立的此类劳动局的活动所取得的令人欣慰的消息。联盟在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支持下实施的劳动救援体系，在 11 月份就向最高专员的助手和国际劳动局作过通报。这方面的某些材料，与国际劳动局副主席别特勒的报告一起于 1922 年 5 月 29 日报给了咨询委员会。

在报告中，对各国政府和私人组织发放借款的系统也表示赞赏，这个系统使某些盈利的企业得以建立。报告指出，塞尔维亚国家委员会的经验对于别的国家也是有教益的。

在关于救援俄国青年大学生问题上，报告认为，这个问题与俄国的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报告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同意接受 5000 名俄国大学生进入布拉格大学就读表示欢迎，指出还有 10000 名俄国大学生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建议别的国家仿效捷克斯洛伐克的榜样，因为捷克斯洛伐克显示出利他主义、决心果断和具有远见卓识。

在 5 月 27 日的补充材料中说明，发给各国政府的关于支援俄国青年并接受俄国大学生进入高等学校就读的呼吁书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

按照报告的意见，儿童问题也应当从复兴俄国的观点来加以研究。

在谈到确认难民的法律地位方面所进行的工作时，报告提到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观点。按照第一种意见，相应的文件应由需要文件的难民目前所在国政府发给。第二种意见则认为，应当由最高专员以国际联盟的名义发给身份证件。最高专员就此问题同“难民中的杰出法学家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些法学家们最后同意第一种意见，但补充条件是难民有权不接受最高专员与各国政府达成协议的措施。

涉及难民法律地位的其他一些还不急迫的问题，如护照问题，

最高专员收集了不少材料，并将继续研究。

补充材料还通报了一些国家政府对证书问题的回复。有一些国家接受了提出的方案（英国、比利时及其他几国）。但是，法国、瑞士、波兰有较大的反对意见，这种意见将使拟议中的证书丧失其主要的优点（便于迁徙）。与此同时，几乎所有作出答复的政府都表示准备放弃相互支付签证费用，在证实申请人无力支付时给予优惠。

最后，报告说：在150万俄国难民中远非所有人都需要救援。很多人找到了工作，表现出令人惊奇的勇气和出色的适应性，有些人手头还有钱财。但是仍有数量很多的人需要帮助寻找工作。与此同时，绝大部分人忍受了并且继续忍受着被迫侨居的痛苦。最高专员相信，国联的活动在物质上、法律上和道义上都会带来良好的结果。

报告认为，如果最高专员能够掌握哪怕一部分花费在难民身上的钱财，他就能够为大部分难民找到生产性工作。不管怎么说，国际联盟在这件事情上已经获得很大的成果，即使仅仅因为国联理事会把这件事承担起来的事实而引起了人们对它的关注。

在同各国政府实行合作的情况下，有可能完成一项重要的工作，它不仅从人道的观点看具有意义和价值，而且对于复兴欧洲的总任务也具有实际意义。

整个分散安置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是财务问题。这一点在所有报告和补充材料中都有简略的说明。据萨·霍尔先生计算的结果，为了分散安置15000名在君士坦丁堡的难民，需要花费3万英镑。上面说到，英国政府愿意拨款1万英镑，条件是其他国家政府能提供其余的2万英镑。美国救济署为了促使更快地解决君士坦丁堡难民的安置问题，宣称愿意在4个月内供养君士坦丁堡的难民，并提供

23000 美元解决他们的生活和安排，条件也是能凑齐 3 万英镑。到 6 月 1 日之前，只有以下几国政府应允提供资助：中国 100 英镑，巴西 500 英镑，日本 3 万日元，瑞士 1 万瑞士法郎。这样，到 6 月 1 日之前，勉强凑到了 14000 英镑。

除了国联理事会的呼吁和最高专员南森博士的恳切请求，咨询委员会也致电法国和意大利政府，请求它们在决定性的时刻给予援助，以免好不容易促成的事情因为在欧洲无法凑足 15000 英镑（不足之数）而宣告流产。

国际救援和俄国人团体

在报告中，也提到了私人团体对最高专员作出的无法估量的帮助。在 16 个团体中有 2 个是俄国人的组织：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和俄国红十字会（两个都是私人团体）。这 16 个组织是：Near East Relief（“近东救济署”）、Comité international de la Croix Rouge（“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Ligue des Societes de la Croix - Rouge（“红十字会联合会”）、European Student Relief（“欧洲大学生救济署”）、Comité des Zemstros et Villes russes（“俄国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Croix - Rouge russe (a.o.)（“俄国红十字会”）、Jewish Colonisation Association（“国际犹太人救援联合会”）、Save the Children Fund（“救援儿童基金会”）、Armenian Refugees Fund（“亚美尼亚难民基金会”）、Union Internationale de secours aux enfants（“儿童救援国际基金会”）、Russian Famine Relief Fund（“俄罗斯妇女救援基金会”）、Imperial War Relief Fund（“帝国主义战争救援基金会”）、Russian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Fund（“俄国救援和建设基金”）、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American Y.M.C.A.（“美国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Comité universel des Unions chretiennes（“基督教联合会国际委员会”）。

这两个组织属于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在国联之下建立一个负责关怀俄国难民的机构的一批团体之列。这两个组织都曾向最高专员宣称，只要他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它们就将认为自己有责任将自己、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供他支配，并愿意成为在他承担的艰巨的事业中实际有用的团体。国联理事会6月27日的决议看来并不怀疑，有责任联合各国政府和私人团体的活动的最高专员，也会把一直在为难民而工作的俄国人团体吸收过来。但是，这个看来毋庸置疑的规定，在实际执行时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由于种种原因（其中有一些原因是俄国人自己造成的，诸如他们相互争吵、不能协调一致地行动、力图否定自己的政治对手），俄罗斯人团体的代表未能参加讨论最高专员今后行动的基本计划（8月22~24日和9月16~19日的会议），只是8月例会的最后一天听取了他们的发言。在9月例会的会议上，虽然有一些私人组织的代表与会，但俄国人团体的代表未获准出席，而不得不以书面形式陈述自己的观点和希望。最高专员及其助手对于俄国人团体参与最高专员的工作的态度，在9月16~19日会议上主席的有代表性的讲话中反映了出来。他在回答一位与会者关于吸收俄国人参加委员会时感谢这一忠告，但又提议不要为了非实质性的细节浪费宝贵的时间。一开始人们还不愿意把俄国人列入最高专员所属人道组织代表委员会的名单；建议把他们同其他组织分开单独召开专门的会议。经过某些与会者专门的要求和干预，才否决了上述建议，允许俄国人以平等地位参加会议（9月16~19日会议记录）。

中央部门的态度立即在地方上有所反映。工作最集中、最紧张的地方传来消息说，“俄国人团体的工作能力和发挥的作用‘微不足道’”。

准备着手帮助俄国人的人和已经在帮助俄国难民的俄国人团体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开始，并逐渐形成。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样的观点和行动是正确的。在 3 月 25 日呈交国联理事会的报告中，萨·霍尔先生宣称，他得到俄国人的充分协助和支持：“我断言，没有俄国人组织的帮助我什么事也不可能做成，而且要补充一句：没有俄国人的合作，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这就是无疑愿意帮助俄国人摆脱困境的人们中间在对待俄国问题上存在的两种观点和态度。

不过，现在有理由相信，在最困难的几个月结束以后，最高专员和俄罗斯人团体之间的关系正在进入比较正常的阶段。

代表处参加最高专员的活动包括：直接参加讨论涉及难民前途的问题（参加理事会的会议、与理事会参加者会谈、与最高专员交涉）；向最高专员通报各国，主要是君士坦丁堡的有关情况（通过信函、个别问题的专门材料、情况简报），以及，最后，提出涉及难民前途和安置的个别问题。

俄罗斯人团体（包括地方自治机关 和城市委员会）计划的基本特点

最初，当最高专员今后活动计划的基本原则还在拟议时，代表处即努力向草拟此项计划的机构（8 月 22～24 日和 9 月 16～19 日的会议）提供有关难民境况的实际材料，并指出难民问题应包括的几个组成部分。为此目的，除了同会议主席及与会者进行直接交谈并提交信件及便函外，还拟定了概括主要期望的 12 条建议。其主要内容为：请求各国政府和慈善机关（法国政府和美国红十字会）在总的救援计划拟定和付诸实施以前不要中止自己目前的救援活动。

计划本身则应包括以下部分：

(1) 在巴尔干国家、色雷斯、奥地利、匈牙利、加利西亚等地

分散安置难民。研究移居海外的可能性；

(2) 为难民迁移提供帮助（如协助西伯利亚人迁往远东）；

(3) 安排难民从事社会工作；

(4) 支持俄国人团体的机构、劳动救援机构，特别是农业移民区和工业企业；

(5) 筹措农业和工业贷款；

(6) 如有需要，使用俄国的部分储备；

(7) 支持和发展教育俄国儿童的学校，把俄国大学生分配到欧洲各高等学校去。

这些内容向8月22~24日会议作了汇报。此前，向所有与会人员散发了信件，提请他们注意君士坦丁堡难民的境况，并通报有关遣返问题的消息。

关于对8月22~24日会议决议的意见，曾通报9月16~19日的会议，并且对境外俄国人法律地位的基本条文也提出了修改意见；指出了把难民从君士坦丁堡迁出的一些新的可能性；提请重视境外俄国学者、医生的境遇，以及大学生和儿童的处境。

包括整个难民问题的内容详尽的纲要，在南森博士着手履行最高专员职责时（1921年9月12日）就递交给了他。当萨廖尔·霍尔先生接手调查君士坦丁堡难民的境况时，同样的纲要也给了他一份。包括有关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活动详细纲要，于10月21日递交给了最高专员。

对于最高专员任务的基本内容和行动方法本身的观点分歧，在因1921年10月25日代表处的信件引起的信函往来中有所反映。代表处的观点是：“消除难民现象”的任务不能排除“对难民的救援”。

最高专员助理则坚持认为，国际联盟并没有在物质救援方面承担任何道义上的责任，而且“从最高专员的职权中根本排除了任何

慈善活动”。

前面援引的材料已经证明，关于国联道义责任的问题后来是怎样发展的。至于慈善活动，那么，正如很快就搞清楚的那样，最高专员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并在私人慈善组织的坚持下，不得不向国联理事会请求在一定程度上赋予其采取具有慈善行动一切特征的行动的可能。而为了“不让难民饿死”和“有人可以迁走”，这是绝对必不可免的。关于这一点，在加诺托先生6月27日的报告中作了绝对明确的说明，其中预见多于后来发生的事情。^①

与现实情况接触以后，人们有根据对原先拟定的有关难民问题采用的纯粹理论上的设想进行改动，在这方面，代表处看到了自己面临的任务。

代表处提出的许多问题，经过一系列实践和接触现实状况以后，才得到认真的注意。例如，我们再次强调提出的关于改善越境迁移的条件、关于签证方面的要求，直到最高专员的代表自己在实践中遇到困难之后，他们才予以热烈的支持。例如，他们在解决大学生、儿童和农民从君士坦丁堡向布拉格迁移时为取得同意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因而不得不由最高专员每月为签证支付约200英镑，将之转入国联成员国的金库。

关于大学生的问题，也是在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接受俄国人的倡议而采取的做法取得显著结果之后，才受到最高专员的支持和同情。同样，关于“慈善性救济”问题，也是在美国红十字会撤离后君士坦丁堡难民中出现十分困难的状态以后才不再成为争议的问题。

随着基本问题渐次澄清，任务日益明确，因而对任务有了认识，代表处也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向经办难民问题的领导人说明，

^① 原文如此。

俄国已被饥荒所缠绕而无暇也无力关注难民，最高专员长时间以来处于无严密组织的状态，因而其工作时紧时松、时断时续，未能取得明显的成果；然而解决难民问题的任务只有在集中全力条件下才能迅速完成，而不是在完成其他事情时顺便兼管所能做好的。君士坦丁堡的任务远未完成，军人营地是由俄国人出钱和由俄国人经办而取消的，君士坦丁堡和平居民的境况改善甚少。难民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君士坦丁堡一地。波兰的情况要求最高专员当即采取行动。萨洛尼卡和其他地方的难民的处境也同样不容忽视。把难民分别安置在巴尔干各国并不能全部解决难民问题。对于进一步安排难民的前途，最高专员务必经常予以关怀和从中斡旋。难民群众至今还不很清楚，最高专员对自己的任务是怎样理解的，可以指望点什么。如果最高专员能主动邀请俄国人组织的代表共同讨论某些个别问题，相互关系就能大为改善，共同工作中的关系就会是纯粹务实的关系，许多有害的误解和偏见也会随之消除。

不能不欣慰地指出，在萨·霍尔先生的行动计划中有许多与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的（由它的驻日内瓦办事处所推行的）意见和观点完全一致之处。

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本可以不无根据地承认，解决难民问题计划的基本要点（即它原先拟定并作为自己工作基础的那些要点），最后也还是为最高专员的计划所吸收。如果说，关于“责任”和“慈善性救济”的问题使整个问题复杂化了，干扰了行动，那么，计划的基本要点还是包括了：不抱过大希望地进行海外分散移民；通过发展难民劳动和给生产企业贷款的办法在当地进行就业安置；救助俄国儿童和俄国青年；最后，从法律上保护境外的俄国人。在计划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国联机构常常引用俄国人组织取得的经验。

在这方面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是别特勒（上面已经提及）关于

职业介绍所的意见，以及南森报告中关于向生产企业贷款的意见。如果我们当时关于维持农业移民区的要求受到重视，也许许多移民区已经巩固并继续存在了。

同样，在法律方面，准确点说，在护照问题上，也可以看到，计划有相符和采用的地方。起先在最高专员的观点中存在某种采取统一措施的做法，这会对俄国国外机构的残存部分造成致命的影响。代表处经过努力使最高专员认识到，拟议中的护照设想并非是有约束力和强制性的，其目的在于寻找方法帮助根本没有护照的俄国人。这种办理护照方式的资助性质，在1921年11月24日的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得到确认，一致应允关于护照问题将在听取俄国法律专家的意见以后再行决定。

目前，已获允诺安排俄国法学家与国联法律委员会的代表举行会见，以便讨论俄国人感兴趣的涉及境外俄国人的权利与保护的其他问题。因此，如果俄国的法学家们在关于俄国人的个人地位和投降国中的地位方面已经确立了出发点，能够站到实际事实（个别国家损害和践踏境外俄国人的权力）的基础上，并能利用最高专员愿意充任俄国难民群众与各国政府之间的居间调停人的机会，那么，他们参与安排境外俄罗斯人命运的力量会是很大的。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到，如果说由最高专员进行物质救援，遇到种种原则上的反对和手续上的困难，那么，最高专员作为难民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善意的调解人的角色，看来没有遭到反对，并且有可能以良好的结果加以完成。

国际联盟在难民事务中的真正作用和个别国家政府的参与

一年以来（其间国际联盟的庞大机构讨论过俄国难民问题，建立了执行机关，并着手工作），对于难民的帮助相对较少。君士坦丁堡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关于难民安排的复杂问题，是不可能

仅靠中心机构的几项措施就能解决的。在这方面普遍发生了某些误会，不得不花费时间和精力加以消除。

对于国联寄予了过大的期望，对它的能力估计过高，于是出现失望情绪，并要求予以谴责。

另一方面，国联任命的最高专员在着手工作时又把自己的任务限制得过于狭窄，只准备担负起行政和警察的职能。生活的真理在于折衷。可以期望，找到生活的真理，寻出这个折衷的可能性以后，无论是执行者本人还是关注执行情况的人都不会再背离这个中间点。

国际联盟缺乏用于俄国难民的款项，它将来也未必会拥有这笔钱。也许本来是可以得到的。至于现在，因为一再极力强调国联不准备承担任何道义上和物质上的责任，未必再能获得钱款。

在难民问题上，国际联盟有自己的位置和自己的职能。但是，那些实际上使每一个难民面临眼前这种法律地位、物质状况和道义处境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应占有不小于国联的地位，如果不说应占有更大的地位的话。归根到底，每一个难民的权利也好，能找到足以保证其生存的一份工作的机会也好，以及最后，有可能忍受非自愿地背离祖国的痛苦也好，——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他所在的每一个国家为他提供的条件。

因此，如果国际联盟能够在分散安置过分集中的难民问题上施加影响，能够努力协调各国在确认境外俄国人的法律地位方面采取行动，以及能够减轻难民在个别国家和个别情况下的异常困难的处境，如果它能够运用自己的威望提醒人们关注俄国青年和俄国儿童的命运，那么难民的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就可根据每个国家的条件确定。

由此就产生出俄国人组织在救援难民方面的任务。随着分散安排过分集中的难民，注意的焦点和工作的重心应当逐渐转向各国。

在国际中心应当主要集中力量解决有关难民前途的普遍性问题；对于难民应予保护的權利遭到粗暴破坏的申诉应当送到中心机构。至于所有一切其他工作都应在各地进行。

在进行这样的职责分工时，应注意不要让人们再次失望，也不要造成新的误会。

至于哪些方面的期望可能涉及国际救援难民的中心机构，随着中心机构的发展又有哪些措施可以采取，在代表处的定期通报和报告中都有说明。

必须承认，驻日内瓦的代表处从来不曾把这些可能性和期望加以夸大。相反，在1921年7月5日呈交委员会的报告中就曾经指出，难民问题令人烦恼，这种现象不应再引起激动和痛苦，不必对国际联盟抱多大的希望。

如果这是一年以前的情况，那么现在对于难民问题的态度，则可以从5月29日委员会例会上的一句话做出判断，那就是：“难民问题不在欧洲的日程表上。”

在就7月5日的报告提出的建议中，代表处提请委员会注意必须在大使会议之下成立研究境外俄国人法律地位问题的会议，必须搜集材料并准备提出强制遣返的问题，最后，指出必须在俄国人组织之间在最高专员指导下^①达成协议。

直到得知最高专员拒不承担从物质上救助难民的任务（在9月24日委员会的会议上），代表处才建议就难民在各国未获得解决的困难问题列出清单，以及指出为难民工作的哪些机构应继续予以保留。提出了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必须建立与之相对应的各种机构，并且恳切要求提供那些美国组织感兴趣的关于儿童在教育 and 教养方面有何种需要的材料。还指出，必须同报界建立经常的联

^① 原文如此。

系。

在10月4日的会议上，驻日内瓦代表处建议：

1. 承认必须全力同最高专员合作，以便最充分地满足难民的需要，保护难民的利益并防止可能加重他们困难处境的措施出现，在最高专员的计划中，除旨在消除难民现象外，增加进行人道救济的内容。

2. 鉴于最高专员和现今参与救援俄罗斯难民事务的人道组织的力量不足以解决难民问题，认为必须立即毫不迟疑地提请美国的公众舆论和政府关注毫无出路的俄国难民，并给予实际的救助。

联系到10月份与最高专员助理进行的谈判，曾向俄国工商团体建议成立有俄国资本和外国资本参加的中央信贷机构，以便向俄国难民的生产企业提供工业和农业贷款。

11月8日，就君士坦丁堡的局势又提出建议：向俄国实业界团体介绍解决难民问题方面的真实情况，寻求向英国和法国政府说明真实情况的途径和手段并指出由一个人同时兼管救助饥民和救援难民两件事情是不正常的。设想应坚持要求最高专员承担对君士坦丁堡的俄国人进行物质救助的工作。建议采取措施使俄国人组织立即对君士坦丁堡的饥民进行救济，组织向教皇和英国圣公会、美国教会募捐。这里再次指出必须同俄国和国外的报刊建立密切的联系。还提出必须起草关于为俄国难民申请护照的备忘录，并提到俄国法学家参加国联关于涉及难民前途的法律问题的讨论。

当时还提出，必须在从事俄国难民工作的各组织之间定期交流情况和在必要时采取协调行动。

随着萨·霍尔先生介入难民事务，在10月1月日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向萨·霍尔先生通报关于难民问题状况的详细材料，以及关于设想中的解决难民问题的计划。建议在俄国人中倡导在救援难民事务中的自主精神（如何建立相对应的独立机构），成立银行以支

持劳动企业和以学习知识和经验以复兴俄国为己任的创举。

在3月30日的报告中，除了其他问题外还建议：鉴于集中进行对俄国难民的国际救援的主张未得到预期的进展，而且对于这种救援抱以特别的希望未必正确，应当一方面继续努力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国际联盟所属最高专员组织以利于难民事务，同时要自己努力寻找和吸引新的力量（如美国的组织）参加这项事业，而把自己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各地。

最后，在6月1日的报告中也建议向最高专员通报在波兰的俄国人的状况，并且指出，代表处已经提出了在波兰建立国际联盟分部的问题，以便把维护俄国难民权利的行动统一起来，并在难民和波兰政府之间进行斡旋。

关于法律问题，建议把在国际联盟提出法律问题的全部材料通告即将召开的俄国法学家代表大会，并采取措施通报最高专员，指出必须就保护在各国的俄国人采取具体措施。

这就是根据在口内瓦发现的情况用以制定行动计划的基本方针。

其他国际组织的参与

其他国际组织的参与一直是，现在仍然是极其珍贵的，不过目前安排俄国难民今后命运的工作的方向和性质，并不是由它们决定的。

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是提议由国际联盟参加救援难民事务的首倡者。它的机构交由最高专员支配。它的代表经常参加讨论最重大的问题。

国际救援儿童联盟直到最后一刻一直为君士坦丁堡和巴尔干的儿童提供补充伙食。现在它的注意力已集中于救助俄国国内的饥民。

国际劳动局参与难民登记和就争取安排就业同各国政府进行联系。国际劳动局的代表自始至终对于救援境外俄国人的事业表现了异常认真的关注，而且一直参加有关工作。人们对于在救助俄国饥民的工作中去世的Г. 帕尔多博士抱着诚恳而深深的谢意缅怀于心。

红十字会联盟^① 虽然并未直接参与安排难民前途的具体工作，但始终参加最高专员所属的理事会。

对于参加最高专员所属理事会的所有其他组织，俄国人为它们对俄国人所受苦难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困难提供的力所能及的救助怀着深切的谢意。

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驻日内瓦代表处同俄国红十字会代表处的关系，是严格根据代表处与委员会于1921年6月1日的协议处理的，是一种排除任何政治的严格的事务关系。

两个俄国人团体的大部分行动都是共同进行的。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代表处吸收红十字会代表处参与在发给各个国际组织的纲要和和声明上签字。

在安排俄国难民命运的国际中心所做的事情，大体情况便是如此。

如果所述情景还不够特别清楚，成绩并不如预想的那样巨大，那么其原因在于，如前所述，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国际组织，特别是对于国际联盟，期望有些过高。可以相信，国际联盟是有前途的。不过在目前决定欧洲生活的条件尚属模糊不清之际，国际联盟还在逐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因而其实际可能性还与它所担负的任务远远不相适应。

^① 红十字会联盟是各国红十字会的联合会，由美国红十字会主席于1919年发起成立。

对于国际组织实际条件的深入观察，可以消除不必要的幻想，更准确地判定可能的设想和可以做的事。

尽管在难民事务上的成绩显得并不大，尽管一年来出现了不必要的严重摩擦和令人惋惜的误会，还是应当公正地指出，在解决难民问题时把力量集中于一个国际中心是具有巨大积极意义的现象，而根据今后事态的发展，如果发展的大趋势不发生变化，为了保护远离祖国丧失天然保护的俄国人，这样的中心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只要救援难民的力量集中在国际中心，只要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将继续进行救助境外俄国公民的工作，它就应当保持和维护自己同这个中心的联系。

国际组织和俄国的饥荒

对俄国国内饥民的国际救援^①是完全独立的另一件事。这件事在负责救助俄国饥民又负责救援俄国境外难民的南森博士身上，是与救助难民有联系的。如前所述，这种联系在1921年8月22~24日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得到确认。这项建议的首创者表达了一种完全不现实的希望，以为把两者联系在一起就有可能从收到的用于救助饥民的钱财中分出一点用于难民。这种观点本身就不正确，当即就被现实所推翻。现在，看来已不会再有任何人维护把救助饥民和救援难民两件事结合起来由一个人兼管的主张了。但是，当时事情就这样做了。俄国人组织曾试图把这两件事分开来，但只不过使“现状”得到加强。

在这份报告中，不准备详细叙述救助俄国国际委员会的活动和

^① 1921年8月15日13个国家和48个红十字会组织选举南森博士为援助俄国饥民的领导人。8月27日同俄罗斯联邦政府签订了协议。南森同意担任从国外获得500万英镑贷款的中介人。

在此之前由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联盟双方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的活动，以及1921年8月15~16日内瓦“关于俄国”会议的活动。关于这些活动的材料，在代表处给委员会的通报中已有说明。至于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及其代表处直接参与救援俄国饥民的工作，由于力所不及和可以理解的原因，十分微薄，几乎只限于参加讨论代表会议和委员会的会议；每月支付供养最高专员的费用；以及为筹办个人包裹和家庭药箱的寄送进行谈判。这种家庭药箱是地方自治机关和城市委员会的医疗卫生处设计的，看来可以成为由南森的组织采取措施筹备向俄国发送标准化药箱的基础。

应当指出，我曾经发出一份便函给联合委员会主席阿道尔^①先生，陈述了组织救助俄国国内饥民^②工作的原则和要点，并且说了对于俄国发生灾害的原因的看法，指出不能用错误的方法使之加深。南森博士和布尔什维克签订的协议，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这份便函相抵触的。南森同布尔什维克的协议是以信任他们，承认他们为基础的，是把他们作为平等的一方签订协议的。1921年8月在救助挨饿的俄国居民问题上，情况就是如此。1922年4月在热那亚的欧洲和解问题上情况就是如此。

应当指出国际联盟在救助俄国国内饥民方面的作用和立场。

1921年10月，国际联盟在全体会议上经过在分委员会和工作委员会长时间讨论救援俄国问题以后，仅限于在口头上表示参与其事和呼吁救助，但是否决了南森关于任命他为救助饥荒最高专员和直接参与其事的设想。在1922年内，南森博士开展了大量的宣传工作，用自己的陈述激励人们、打动人们，向他们展示俄国发生的事，呼吁人们、

① 阿道尔（1845—1928）——瑞士政治活动家。多年担任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总书记、主席。

② 1921—1922年苏俄的饥荒席卷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部分地区，有3700万居民遭灾。

各种组织团体、各国政府援助和拯救正在因饥饿而死去的人们。

南森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充满自我牺牲精神的工作，取得了成绩。人们捐款，红十字会和其他人道组织前往俄国直接进行救助。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和救济是微不足道的。人们的罪行和丧失理智造成的天灾，不可能仅仅依靠慈善之心来战胜。邪恶之源仍然占着上风。在达到预定目的方面一贯不知疲劳、坚持不懈的南森感觉到，靠他一个人的力量已经不够了，他的威望似乎已经用尽，慈善性救助形将告罄。于是，在挪威政府的参加下，他又提出一项新的主张，再次向国联提出，力求能激励起国联支持他为之贡献出自己力量的事业。挪威政府于5月11—17日向国联理事会例会提出了一项得到南森本人支持的声明，要求国联指定5名在欧洲和全世界负有盛名的人物认真了解俄国的局面，确认灾难的程度，并向欧洲通报：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战胜灾害并拯救濒临死亡的居民。这5名大人物的威望似乎可以加强他本人的威信。

国联理事会，如所周知，于5月16日决定把挪威政府提出的问题移送热那亚会议研究。

据驻莫斯科的执行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国际救援灾民组织采取措施发往俄国的粮食计有：

通过波罗的海和黑海港口以及铁路，共发运43250吨；

在萨拉托夫工作的国际救助儿童联盟直接接收21105吨；在布祖卢克工作的贵格会教徒^①直接接收9557吨；以及在萨马拉省工作的瑞典红十字会^②直接接收3706吨。

① 贵格会——自称公谊会，创立于17世纪中期英国的一个基督教团体，宣扬和平主义，从事慈善事业。

② 瑞典红十字会考察团于1921年11月7日抵达莫斯科，其任务是为饥民提供粮食援助。瑞典政府为此拨款50万克朗，用此款及其他捐款购买了食品，运往苏俄。

有 22145 吨粮食由南森博士转给了与国际救援俄国组织有联系的组织。

除萨拉托夫、布祖卢克和萨马拉几省外，车里雅宾斯克、察里津和南乌克兰各地区也得到救助，但可惜为数极少。

据南森博士驻莫斯科代表处声称，全部发送物品均按指定目的地送达无误。

国际红十字会和最高专员南森博士共收到 38000 多份要求寄送粮食邮包的申请。为避免转运耽搁时间，在莫斯科、彼得格勒、车里雅宾斯克、萨马拉、萨拉托夫、诺沃罗西斯克、哈尔科夫、基辅、敖德萨建立了发运仓库。还准备在顿河罗斯托夫、塞瓦斯托波尔和梯弗利斯建立新的仓库。准备在 2 个月时间内把仓库的储存提高到 10 万个邮包。

5 月，南森博士又向世界所有大学、所有学术团体、全世界所有知识分子发出号召，请求他们援助曾经对科学、文学和艺术作出过无数贡献而如今却陷于困境的俄国知识分子。南森博士还设立了救助俄国知识分子的专门基金。凡是捐助 2 个半美元的任何人，都算参加了对俄国知识分子的粮食救助。

达成了向俄罗斯寄发个人物品包裹的协议。包裹通过南森在里加的代表直接发往莫斯科海关，经检查后从那里由苏俄邮局按目的地分发。邮寄包裹的内容由海关定出严格的规定。

家庭药箱的寄送至今尚未处理妥当。苏俄政府仍然继续对此类邮品的寄送制造障碍，禁止用个人邮件的办法把药品运入一个由于瘟疫流行而濒临死亡的国家。